

《天一阁文丛》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任继愈 毛昭晰

来新夏 傅璇琮

骆兆平

主 任

柴 英

编 委

王子舟 王世伟 邓洪波 韦力 艾思仁(美) 沈津(美)

郎向东 陈宁雄 岡雅彦(日) 孟建耀 贺宇红 姚伯岳

徐良雄 徐建成 徐雁 袁芳芳 袁逸 袁慧 高桥智(日)

章国庆 龚烈沸 董贻安 程焕文 虞浩旭

主 编

虞浩旭

编 辑

饶国庆

目 录

· 中外藏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 ·

| | |
|----------------------------------|--------------|
| 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 来新夏(1) |
| 论天一阁的贡献 | 虞浩旭(7) |
| 关于范钦及其天一阁的若干思考 | 戴光中(18) |
| 天一阁对藏书文化的贡献 | 陈宁雄(26) |
| 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新探 | 陶 济 万蔚萍(32) |
| 天一阁藏书流布及文化影响研究 | 董桂琴(45) |
| 明抄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的重要学术价值 | 宋家钰(53) |
| 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 | 黄正建(60) |
| 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及其保护经过 | 袁 慧(65) |
| 试论范氏家族藏书立家的文化谋略 | 徐建成(72) |
| 论天一阁藏书社会化的动因与现实意义 | 王宏星(81) |
| 天一阁范钦分书事略考 | 方 东(88) |
| 天一阁藏《通纪》研究 | 钱茂伟(94) |
| 东海三司马的别业及其结社活动——兼谈甬城的诗社与别业 | 袁 慧(108) |
| 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序 | 骆兆平(118) |
| 从近代报刊看天一阁的藏书命运(1930-1949) | 应方舟(121) |
| 闲谈范司马刻书 | 饶国庆(132) |
| 关于天一阁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的思考 | 于美娜(137) |
| 魏晋南北朝著述繁富原因及传承方式初探 | 陈德弟 王宇英(144) |
| 宋代馆阁藏书述略 | 黄建国(155) |
| 宋代市井乡野士民藏书风气及思想诱因浅析 | 刘 云(163) |
| 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的递藏源流 | 李 坚(170) |

- 元代四明私家藏书探析 张如安(177)
- 清代宁波藏书业的发展及其贡献 乐承耀(186)
- 新时期公私藏书的使命与和谐发展 鲍国强(199)
-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康熙时期有关浙江天主教文献考释 龚纓晏(209)
- 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 陈东辉(217)
- 常熟藏书大家 曹培根(224)
- 徽州宗族藏书文化试析 薛贞芳 鲁 燕(235)
- 南浔沦陷时期的嘉业藏书楼 李性忠(244)
- 孙中山读书生活的文化价值 沈春桥 张 真(250)
- 曾国藩的藏书思想及读书理念形成略述 刘日升(261)
- 析朱希祖藏书 匡淑红(266)
- 曹氏棟亭藏书聚散考略 李 军(273)
- 吴引孙藏书和藏书楼研究 李玉安(279)
- 论陆游为代表的绍兴陆氏三世藏书兼及南宋浙江私家藏书风尚 顾志兴(286)
- 略谈古籍拍卖与当前藏书(附倡议书) 范凤书(297)
- 四库全书任事诸臣职名录补考 江庆柏(301)
- 总结百年旧书行业弘扬华夏旧书文化(下)——《中国旧书业百年》读后
..... 吴永贵 黄镇伟(306)
- 传奇的面食铺 袁 逸(309)
- 《史记》名称的由来及变迁 李文洁(313)
- 浙东藏书史上的一桩公案——吕留良与黄宗羲、吴之振购淡生堂藏书之隙辨证
..... 刘尚恒(321)
-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朱舜水遗墨考述 杨光辉(332)
- 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近现代文人学士与北京厂甸旧书集市
..... 徐 雁(339)
- 撷藏书家精华,扬典籍史光彩——《中国藏书家通典》读后 林 英(369)
- 十辑《藏书家》的精魂——齐鲁书社《藏书家》丛刊始末记 叶安然(373)
- 天一藏碑知多少——纪念天一阁创建440周年 徐雪凡(385)
- 后 记 (389)

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来新夏

【摘要】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天一阁的历史地位以及在现代社会的走向与定位。

【关键词】 天一阁;历史地位;走向;定位

在以宁波为中心的近万平方公里繁荣地域内,有事迹可考的私家藏书楼就有154家,但只有天一阁,自明嘉靖创始以来,历经440年,巍然至今,被称为“天下藏书只一家”。历来若干文人学士对其历史地位多有论列,今人著述亦时有涉及,各有评说。我亦曾撰有数文,略有评论。兹综括诸说,撮其指要,撰文以论天一阁之地位。

一、天一阁是我国现存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

明嘉靖时所建天一阁,是中国传统藏书楼中现存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是世界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建阁主人范钦(1506-1585),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明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乡月湖之西芙蓉洲建造天一阁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是浙东藏书最多的一家。建阁的头20年,阁主人范钦还健在,无疑不会有太大的损伤。范钦卒后的80余年,到明清之际,虽有所破损,但一些学者如黄宗羲、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尚能登楼阅书、抄书。其后100余年,虽已有文记其受损情况者,但至乾隆帝兴建南北七阁时,诏谕中仍能赞许有加,取用建阁工程蓝本,而修《四库全书》时,尚能从阁中征调600余种藏书。以此推想,阁书应不至有大损伤。近代以来,屡遭内忧外患,明抢暗夺,鼠窃狗盗,破坏在所难免,加以缺少维护,遂日渐衰败。直至清末,学者缪荃孙登阁开榭时,已是“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佚,鼠啮虫穿”(《天一阁始末记》)。

随着范氏宗族的衰败,阁楼园林日渐荒落。当地人士不忍目见,遂于1933年集资维修,并将文庙尊经阁和有关明州(今宁波)的一批宋以来的碑版移建园中,环镶于尊经阁前墙

垣,世称“明州碑林”,是有关宋元以来明州的历史资料。可惜有的由于风雨侵蚀而字迹漫漶,有的甚至整篇剥蚀,了无字迹,亟待保护和抢修。藏书亦时有流失,学者张元济为免善本佳刻流落海外,斥资收购,贮之涵芬楼,不意竟被日寇丧心病狂地施以炮火轰炸,扼腕腐心,莫此为甚!以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园林一片荒草污水,精刻善本,水渍蠹蛀,零零落落,仅剩原藏书书量之五分之一,有人估约为1.3万余卷。政府多次拨款维修恢复,乃使这座古藏书楼及其藏书得以复苏。其后虽经“文革”劫难,然终胜海源、亩宋之不幸遭遇。据约略考察,现已扩建新建阁庭院多处,藏书亦已搜求回归达30余万卷,较创建时增大四五倍。其中精本善刻已有近十万卷之多,已不负“明州天一富藏书”的美誉了。天一阁这颗历经沧桑的明珠,重又闪耀着固有的光辉。中华大地拥有这座历经440年的古代书府,不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即使之于世界文化史史册,亦决无愧色。

天一阁之所以能数百年传世,确为私家藏书楼所罕见。历来学者于此亦多有探讨。其较完备者为阮元之三点论:第一,“不使持烟火者上楼”;第二,管理的禁令甚严;第三,子孙以天一藏书为荣,官方亦多加鼓励。有此三点故能久而不衰(参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目序》)。但我以为,从私家藏书史考察,经久甚难。而近50年之所以能弘扬发展,则在化私为公。有政府拨款,有社会支持,有学人关注,则天一阁传之久远必可期矣!

二、传统藏书楼建筑的典范

天一阁约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间,在古代藏书楼中是独具特色的。建阁主人范钦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见识,首先抓住藏书楼致命的关键。书的最大灾难是火,而火的最大克星是水。天一阁在初建时,先在楼前的位置,凿一池储水,周围绕以竹木。但当时他尚未想到如何破火的楼名,后来见到《龙虎山天一池记》引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于是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而阁前所凿之池即称“天一池”。天一阁的架构亦即按这一意图修建,整个楼区占地840平方米,藏书楼本身占地281平方米,楼上不分间以体现“天一生水”之说,楼下分六间,以应“地六成之”之义,甚至如书橱的制作,也使之在尺寸上合六一之数。这种引据,虽几近迷信,但足以表明阁主人在建阁之初即对藏书与水与火的连环关系具有明确意识——他希望以水制火来保护图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天一阁的建造设计,颇具匠心。主体建筑“宝书楼”有二层,楼下用书橱隔成六间,楼上为统间,悬有明人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楼前有作为防火设置的蓄水池即天一池。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又在阁楼前后利用山石的奇形怪状堆砌成“九狮一象”等生动形态,并植竹养鱼,使藏书楼周围,增添了江南园林的美色。正由于天一阁结构建筑合理而且创造性地将幽雅的藏书与清丽的环境自然结合的模式,不仅成为传统藏书

楼建筑中的典范,甚至引起清代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帝是珍惜文物并能从众多文物中择善而取的帝王,所以当他为典藏《四库全书》而谋兴建南北七阁的时候,就从遍及全国的藏书楼建筑中选取了天一阁的建筑为唯一的典范,并谕令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调查:“(天一阁)自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之久远”(《东华续录》乾隆七九)。寅著绘呈天一阁图,后即据此为蓝图以建文渊诸阁,乾隆帝还多次以其事入诗。这更足以证明天一阁藏书楼建筑的价值和特色,不愧为传统藏书楼建筑的典范。

三、天一阁藏书独具特色

范钦在修建天一阁之前,就已开始求书、抄书、藏书等活动,所得即贮之于东明草堂。《鄞县志》曾记其初期收书范围,说他“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卷三十六)后又得同邑丰坊万卷楼幸存之余及各家散出之藏,并陆续从王世贞等藏家抄录,加以范钦历官各地,曾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数省,搜访、购买、传抄古籍。特别是在浙江,几乎访遍藏家与坊肆。晚年所藏日富,东明草堂已难敷用,遂建天一阁以扩大藏书量。在“书多设架,架多收书”的规律推动下,天一阁的藏书量无疑增长较快,至清初当已颇具规模。所以当著名学者全祖望观其藏书后,便在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给以相当高的评价:“虽未曾复丰氏之旧,然亦雄视浙东焉。”(《鮑琦亭集》卷十七)丰氏与范钦约在同时代——正德嘉靖时期,大约大范钦十余岁,是当时鄞县地区藏书约五万卷的大藏书家。如据全祖望所记,则范氏藏书至清初,虽尚不及丰氏旧藏,但已逾万卷数。清人陆以湑曾记称:“范氏天一阁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冷庐杂志·天一阁》)似已与丰氏书比肩矣。

范钦不仅丰于典藏,还能精细治学治书,悉心研究藏书,为藏书增加生命力。所藏各书多“手自题笺,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所以人皆称范钦所藏刻各书,有“清鉴而无妄作”(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提高了藏书质量。范钦亦成为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学者型藏书家。

范钦在晚年建天一阁以扩藏图籍,其所庋藏,以宋元以来刊本、钞本与稿本为多,而明刻尤为突出。范钦藏书与一般只注重版本的藏书家不同,他比较重视明代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的收藏。其中明代方志、政书、实录、邸钞、揭帖、供状、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当代文献尤多。而明代方志原藏435种,超出《明史·艺文志》的著录,现存271种,有65%是海内孤本,近年已陆续印行应世。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有387种,也大部分是仅见之本,阁上人范钦的三代简历即赫然具在登科录中,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书。所有这些藏书,都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科技、人物的珍贵资料,也是天一阁不同于其他藏书楼的极大特色,并

表明范钦的藏书思想已超越同时代藏书家的认识水平。

范钦非常珍惜自己费尽心思所营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并为维持长久的一统局面,特别制定了严格的禁例,如“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虽然仍未能完全摆脱历来藏书家“子孙宝之”思想的影响,但也起到了对藏书收藏与保护的重要作用。范钦在析产时,他的长子和次媳代表两房,都愿意按照“欲书者受书,欲金者受金”(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见《鮚埼亭集》卷十七)的原则,以维护其藏书的完整性。但亦因封闭过严,产生相反的后果,后人谓:“易世之后,锁钥甚严。家规:子孙非合各房不能登楼,不许将书下阁阶,不许私领亲戚友人入娜嬛福地,门禁之严,等于中秘。故明清之交数十年,楼下蛛网尘封,几绝人迹,徒动学者羡慕窥测之劳。”(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序》)道光九年(1829)虽重申禁令,但已积习难返,难以令行禁止,甚至视同虚文。天一阁正等待推陈出新时机到来。

四、天一阁为学人注目的所在

是否为著名学人关注,也是论定藏书楼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天一阁自明清以来即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他们或登楼看书,或手编目录,或感叹沧桑,或凭吊故物,无不给以极大怀念与恰当的评说。现任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曾搜集资料撰著《历代名人与天一阁》一书,收录自明丰坊至近代郭沫若共39人。此书资料详备,记述完整,本已足见其概要,而无容赘言,但为说明学者对天一阁之重视,略择数例,以明其事。

丰坊是范钦同时代的前辈,天一阁有丰氏万卷楼若干散失藏书之说,虽尚有异议(有人认为范氏无收藏丰氏藏书之事;有人认为有丰氏散失之藏书,后又从天一阁散失),但天一阁藏有万卷楼旧藏遗物和丰坊相关的帖书和手迹,确有其事。丰坊还曾手记:“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氏郎为业。南禺(丰坊自号曰南禺外史)笔。”而天一阁筹建时丰坊尚在世,以丰、范之亲密交谊,可以推测丰氏于建阁之事或有议及。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是有文献可据的第一位登楼的外姓人。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范钦曾孙范光燮力排家族异议的情况下,成为首登天一阁的外姓人。这不仅是黄宗羲的荣耀、天一阁的光彩,更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由以藏为主走向藏用结合过渡的里程碑。随之而求登楼者比比,如万斯同、全祖望、朱彝尊、袁枚、钱大昕、阮元、姚元之、薛福成、刘喜海、麟庆、冯登府、钱维乔等清代著名学者相继登阁,或传抄藏书,或为之编目。这种适度开放和运作大大地提高了天一阁的知名度。

黄宗羲也无负于此行,为天一阁编制了以稀有的宋元人文集为主的精品书目。在黄编以前,范钦父子曾有自编书目三种,而黄编为外姓学者所专著。黄编流传之后,天一阁之秘藏开始为世所知,而文人学者尤多注目。康熙十八年(1679),光燮之子范左垣拒黄编增订,令成一目,并请黄宗羲为撰《天一阁藏书记》以代序。后范目已佚,而黄记犹存,为天一阁清

初状况下重要藏书资料。自黄编以后有清学者分起效尤,其主要书目有:阮元的《天一阁书目》、刘喜海的《天一阁现存书目》、宗源瀚与薛福成编制的同名书目,均借以显示不同时代馆藏的散佚变化状况。

20世纪以来,学者关注天一阁之热依然,著名学者多以一登天一阁为荣,但所见已为衰败现象。缪荃荪于清末民初曾二登天一阁,但所见已是子孙不识藏书,禁令形存实亡,藏书受损严重,甚至大量被窃而不知。缪氏愤而为编《天一阁失窃书目》,虽不甚准确,但亦可见阁藏之岌岌可危。惟若干近代名人仍怀仰慕之情,纷至沓来,如赵万里、郑振铎、陈乃乾、谢国桢、陈训慈等,皆来登阁阅书。当代名流显要如郭沫若也曾来阁题字赠联。众多学人为藏书编目者,有林集虚的《目睹天一阁书录》,杨铁夫的《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冯孟颀的《天一阁方志目》、《天一阁藏明代试上录目》和《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而白全祖望开始研究天一阁后,学人多有散篇论述,而今人陈登原所撰《天一阁藏书考》,更为系统完备之专著。虞浩旭曾评其书为:体例完备,论述全面;资料富赡,论之有据;津逮后学,影响深远;检核原著,洵非虚誉。类此均可见天一阁在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地位。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更力加赞助,有裨于修建收藏。近年又屡有学术集会,全国学人时来以文会友,对恢复振兴天一阁旧貌有推动之功。天一阁也无论外形内藏均日显新颖,而驰名于海内外。

五、天一阁的走向与定位

历经440年的天一阁虽然主观上尽力维护其传统性和完整性,但事物的变化往往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天一阁无力抵御外来的强力,如乾隆帝开四库馆,天一阁即被勒取图籍638种珍籍。鸦片战争时,盗匪蜂起,明抢暗盗,而子孙家人亦无力维护,天一阁日益走向衰败残破。幸有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较大维修,天一阁方能渐渐走向恢复,中复经抗战及“文革”劫难,明显地遭到一定的破坏,幸而很快地修治创伤,走向扩展,大改旧观。尤其是近年来,天一阁高举藏书文化旗帜,团结各方有识之士,群策群力,藏书日增,园址日扩,变化日新。但其变化并未依照古越藏书楼那样由旧式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也不像嘉业堂那样,归属于地方公共图书馆。那么天一阁的定位走向究竟在哪里?有人主张走向图书馆,有人主张走向博物馆,结果是定向于博物馆。我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图书馆不仅藏书,而且还要具有流通的功能,是普及文化的公益机构,而博物馆的功能在于收藏、维护、展示文化精品,是供人参观的景点。天一阁之所以定位于博物馆,还因为它不仅有享誉学林的藏书,还收藏有一定价值的藏物。比如它藏版千余块,可见明代雕版艺术的水平。另有以保藏晋砖居多而得名的“千晋斋”,所存自汉至清的千余块刻砖和另室所藏的唐宋元明石碑30余块,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移植园中的“明州碑林”虽多有剥落,但

仍具有研究宁波地区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价值,所以同时具有保存文物的功能。因此天一阁势必定位于博物馆。

这座定位于博物馆的天一阁,在近20余年的过程中,发展走向已经不局限于藏书楼一隅,也不限于范氏一族所在,而是逐渐走向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建筑达8400平方米的园林景点。它划分为三大区,即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以来,除了恢复维修藏书文化区外,还着重兴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其中园林休闲区包括东园和南园,东园在藏书楼的东南,占地6000平方米,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开始种植竹木、移迁旧物,历时20余年初具规模,其中由祖关山移来之明嘉靖墓前祭亭——百鹅亭,结构精巧,形态凝重,令人赞叹,于1986年开放。南园在藏书楼南面,占地约3400平方米,是以水石相结合结构的新造园林,一泓池水,池畔奇石层叠。临水有水北阁,由园外移来,为鸦片战争时爱国诗人徐时栋的藏书楼,于1997年建成开放,身入其中,颇感疏朗清新。

南园之南即为陈列展览区,其中芙蓉洲为宋代月湖十洲之一,多为宋明权要府邸,如今物人俱非,徒增感慨。稍前,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民国古建筑——秦氏支祠,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实为移存所少见。

经过20余年的拓展经营,天一阁定位于博物馆,当能得世人认同,而其必将沿着较快速度发展的道路,增厚文化积淀,美化休闲游憩的氛围,弘扬传统文化精品的展示,建成一个为国际所瞩目的以藏书文化为中心的园林景区。海内外人士于此寄予厚望焉。

参考文献:

- [1]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A].南雷文案(卷二)[C].
- [2]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碑日记》.见鮑琦亭集卷十七
- [3]任继愈等.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 [4]傅璇宗等.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 [5]李希泌等.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1年.
- [7]骆兆平.书城琐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8]骆兆平.天一阁藏书史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9]徐良雄.中国藏书文化研究[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年.
- [10]虞浩旭.历代名人与天一阁[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
- [11]虞浩旭.风雨天一阁[M].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 [12]虞浩旭.嫦娥福地天一阁[M].漓江出版社,2004年.
- [13]虞浩旭.智者之香[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年.
- [14]袁慧.范钦评传[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年.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论天一阁的贡献

虞浩旭

【摘要】 本文从八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以及对宁波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 天一阁；范钦；贡献

500前，宁波城西门外范家诞生了一位小孩，取名范钦；440年前，范钦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取名天一阁。现在，范钦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天一阁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回眸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范钦的天一阁不仅对中国的藏书文化，而且对宁波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保存传播了一批典籍文献

典籍的保存是私家藏书的贡献之一。自秦汉以来，每当面临兵燹战火、政策禁锢，古代典籍都会遭受大规模毁损，但在如此环境下仍有许多藏书家将大量藏书保存下来。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是民间藏书。以后历代多有征书举，民间藏书成为国家藏书的基础，扩大丰富了国家藏书。若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都是历经众多藏书家之手而递传下来的。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天一阁在范钦时期藏书最盛时达七万卷，虽历经劫难，经400余年保存下来的典籍仍有17000卷，其中明代地方志、科举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范氏家族十三代人为保护典籍薪火相传的艰辛历程，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和典范。

典籍的传播是私家藏书的贡献之二。传播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不少藏书家通过不同形式、程度向公众、社会开放，使藏书藏以致用，历史上这样的藏书家虽然人数不多，但也值得肯定。范钦时代，天一阁在亲朋好友间是开放的，可借阅的。范钦以后虽然一度封闭甚严，但自清初黄宗羲登阁后，天一阁一直是有选择地向一些大学问家开放借阅的。这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二是借抄。在古代通讯、交通、

印刷术俱不发达的条件下,借抄是藏书家藏书的一大来源,几乎历代所有的藏书家都借抄过书。我国的许多典籍赖抄本而得再续流传。范钦时期天一阁与太仓藏书家王世贞订有藏书互抄之约,丰富了藏书。天一阁原藏书的五大特色之一是抄本多,为传播典籍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同时天一阁藏书也被大量借抄,特别是清修《四库全书》时,进呈638种供借抄,虽多未发还,但客观上促进了典籍的传播。三是刊印。中国古代的藏书家因为藏书的丰富而使自己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范钦就是其中的一位。范钦利用丰厚的藏书、充足的资财刻印了选书精良、质量上乘的《范氏奇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

二、形成了天一阁模式

清乾隆帝时,国力强盛,朝廷为标榜文治,粉饰太平,笼络士人,加强思想控制,开“四库”馆,纂修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四库全书》。在纂修过程中,随着征书工作的开展,乾隆对天一阁的认识逐渐深入和推崇,最终把天一阁树立为中国藏书史上的样板,使天一阁的建筑和管理成为一种模式。

(一)建筑模式

范钦建天一阁时,精心设计书楼格局,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以砖石为垣,松杉作梁,盖成一排六开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下六间一字排开,一一隔断,楼上六间合而为一,中间用书橱隔开,用以藏书。取义《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名书楼为“天一阁”,寓意以水制火。书楼前后开窗,书橱两面开门,以利通风。阁前有一蓄水池,阁前阁后假山叠翠,有“九狮一象”之景,并植竹养鱼,使书楼显得格外富丽典雅、清静幽邃。

在《四库》开馆第二年,乾隆帝就开始筹划《四库全书》修成后的贮藏问题。他下谕依照天一阁来设计藏书阁。谕旨说天一阁:“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并命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天一阁考察书楼结构和书架款式等情况,“烫成准样,开明丈尺”,绘图进呈。后遂依照天一阁建造了“内廷四阁”和“江南三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如文津阁有“收将大段天一范,兼取小斋京口米”,文澜阁有“范家天一于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之句,说的都是仿天一阁建造两阁之事。

由于皇家的推崇,私家更群起效尤,盛极一时。如浙江卢址之抱经楼,当时江苏著名学

者钱大昕曾为卢址作《抱经楼记》，中说抱经楼之构筑无论其外形与屋之间架结构皆模仿天一阁。至此，天一阁才享誉天下，有“人间度阁足千古，天下藏书只一家”之说。因而我们可以说在乾隆时期已形成了天一阁模式。此后，民间藏书楼多有仿造之举，如薛福成文选楼、吴引孙测海楼、黄氏五桂楼、郑氏敬业堂、林氏近性楼、甘氏津逮楼等，或全盘模仿，或吸取天一阁的营建理念，程度不一而已。

（二）管理模式

社会的动乱和家族的衰落，都会给私人藏书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公私藏书均遭厄运。天一阁之所以巍然独存于浙东，是同它严格的管理制度分不开的。

（1）“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范钦生前立下规矩：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阅读之。范钦死后，其长子大冲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藏书遂得以不分。此后，天一阁的阁橱钥匙分房掌管，禁以书下阁，非各房子孙齐不开锁。清代学者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有较详记述。他说，范氏后人“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与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出借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槟逐不与祭。”其严如此。

（2）“禁以星火入阁”。藏书最怕失火。范钦在建造藏书楼时，看到自己的好友、书法家丰坊的万卷楼因失火被毁，损失了上万卷珍本书，非常痛心。鉴于千日之功毁于一旦的严酷事实和教训，天一阁书楼建筑不仅本身有“天一生水”之意，更在楼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阮元说：“阁前略有池，与圜渊杀相远，宽闲静闷，不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这种楼前幽池蓄水的作法多为后世藏书家所采用。天一阁还规定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缪荃荪随宁皮知府夏闰枝登阁阅书，“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楼，约不携星火”。由于防火措施严密，迄今安然无损。

（3）“芸草防蠹”。天一阁在书籍的防潮、防蠹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除天一阁建筑本身有利通风防蠹，橱下置英石以吸潮外，还在每年梅雨季节以后至中伏期，启锁翻晒图书，至今不废。乾隆时此法被“南三阁”所吸收，每年入夏都要组织当地莘莘学子参加曝晒。但最有特色的，当数“芸草防蠹”了。芸草实为产于广西的一种中药材，俗称“灵香草”，至今仍为许多古籍藏书单位所运用。

天一阁藏书的管理模式，曾在公私藏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借鉴、运用。阮元于清乾嘉年间任职浙江达10余年，多次登上天一阁，并为之编目，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文》，并分析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推广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他于嘉庆十四年（1809）在杭州灵隐寺立书藏，并撰《杭州灵隐书藏记》及《书藏条例》；后又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镇江焦山立书藏，并撰《焦山书藏记》及《书藏条例》。两家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此藏立，则凡

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哀之”。他意在藏之名山，传之久远。因此对岿然独存的海内藏书之家之最久者——天一阁的管理经验十分重视。杭州书藏与焦山书藏的《书藏条例》如出一辙，其第六条规定：“书即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烟灯毋许近楼。寺僧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可以说这是天一阁相关制度的浓缩。阮元对于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的推广，使得范氏的家族藏书行为升华为一种藏书的管理理论，从而载入中国藏书史。

三、影响了浙东藏书风气

浙东自古以来多好学之士，加上宋室南渡后，本地又“多世家旧族”，故“收藏之风蔚起”，以积书藏书著称者代不乏人。宋代楼郁之东楼、史守之碧沚、王应麟之汲古堂，元代袁桷之清容居，明代丰坊之万卷楼皆一时名楼。但宁波藏书楼成规模有影响是在范钦天一阁之后。明代陈朝辅之四香居和陆宝之南轩，清代黄宗羲之续抄堂、万斯同之寒松斋、郑性之二老阁、全祖望之双韭山房、卢址之抱经楼、黄澄量之五桂楼、姚燮之大梅山馆、陈自舜之云在楼、冯云濠之醉经阁、沈德寿之抱经楼、徐时栋之烟屿楼、蔡鸿鉴之墨海楼、董沛之六一山房，民国张寿镛之约园、秦润卿之抹云楼、冯贞群之伏跗室、朱鼎煦之别宥斋，皆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名楼。

就原因而言，有两件事对宁波藏书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一是黄宗羲讲学甬上和浙东学派的形成。自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讲学甬上，创甬上证人书院，至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共历时八年。在这八年中，有100多人向他问学，有弟子66人，其中高足18人，开创了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一传即为万斯同，再传而为全祖望，又再传即为邵晋涵、章学诚，大家辈出，均致力于收藏和治学，几乎无一不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们的学术成果，无一不与藏书有密切的联系。以黄宗羲为例，他的藏书宗旨是“当以书明心，毋玩物丧志”。因此全祖望指出：“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名藏也。”“先生之藏书乃先生之学术所寄。”黄宗羲先生不仅开创了浙东学术之风，也倡导了藏书与治学相结合的新风，加强了藏书和学术的纽带关系，并使之成为一种传统。太冲先生之前，这种风气当已存在，先生之后，始成气候，藏以致用的目的更加突出，成为甬上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促进了宁波藏书事业的发展。二是由于清修《四库全书》时对天一阁的宣传，为宁波藏书家树立了榜样。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由于清高宗弘历对天一阁的关注，天一阁进呈图书638部，四库七阁对天一阁的模仿以及乾隆对天一阁的奖赏，使天一阁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殊荣，并大出其名。范氏天一阁所获得的荣誉，让甬上士林羡慕不已，称“天一阁范家”，大大刺激了宁波的藏书事业。

四、促进了宁波社会文化的发展

藏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以及学术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培养人才、嘉惠学者、裨益学术。

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全国范围来统计,私家藏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据范凤书先生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中统计,全国著名藏书家共4654人,浙江省有1062人,江苏省有967人,两省共2029人,占全国总数的43.6%。而据甬籍学者沈登苗先生对于明清进士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上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其结论为:

(1)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重要的地域学派和学术大师基本上产生在进士和巍科人物最密集的地区,科举发达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学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

(2)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区域人才高峰期一般产生在该区域科举高峰期形成至结束后的一百年内。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

(3)明清各省人才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数的40%强;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共69名,占总数的60.5%。换句话说,明清两代共有203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占有105名,超过半数。天下文状元,二人有其一。

从藏书家与历代进士、状元数据的对比可知,藏书与科举人才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足以说明藏书与地域及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强劲优势显现无遗,江浙私人藏书中心持续繁荣的因果也就有了很有说服力的注解。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宁波作为科举人才集中之地,是与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楼所营造的读书氛围分不开的。

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催生了学派的形成。丰富的藏书为学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及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藏书成就了学问家,成就了学派的产生。

清代浙东学术人才群体的出现和浙东学派的形成有赖于以天一阁为代表的浙东地区丰富的藏书。浙东学派的学者们不仅自己是藏书家,而且还充分利用了浙东地区其他的藏书资源。以浙东学派开山祖黄宗羲为例述之。黄宗羲博大精深的学问,与天一阁等藏书楼密切相关。黄宗羲多次登天一阁观书,对他帮助极大。近代著名政治家、学问家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家蔡尚思也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氏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

浙东学派的后代学者代表李邕嗣、万斯同、全祖望的学问都与天一阁密不可分。浙东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无不受到浙东丰沛藏书的滋润,是藏书成就了他们的学问,成就了浙东学派。

五、增加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底蕴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宁波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建于北宋的“江南第一楼”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始建于汉晋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及以著名商帮“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海防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等,构成了内容极为丰富又极具个性的宁波地域文化。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既深深扎根于本土,又在生生不息中影响着世界;既具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具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特别是从明清以来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丰富多彩的宁波历史文化中,浙东学术文化无疑是其核心,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则是其主线。

在这些文化类型中,最主要的是三个,其中浙东学术文化是宁波文化的核心,“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宁波文化的主线,“天一阁”藏书文化是宁波文化的一个品牌。

浙东学术文化是宁波所有文化类型的灵魂与核心,因为它是一种思想,是人类进行精神创造的最高层次成果的体现。恩格斯讲过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区域、一座城市同样如此。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其创造的理论、宣扬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达到了当时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准,比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浙东学术文化的背后,隐藏的是藏书文化,支撑的也是藏书文化。天一阁存世400多年了,作为私人藏书楼能够像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世界上也少有。天一阁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反映了宁波“藏书文化”之深厚。宁波历代的藏书人家都非常多,现在宁波的藏书人家还是很多。藏书与著书、读书联系在一起,三位一体,成为宁波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宁波人读书的风气比较浓,历代出了大量人才,与这个不无关系。藏书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对文化、文明的一种追求,对人类创造成果的一种认同和崇拜。对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大大丰富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品位,成为宁波文化的一个品牌。

六、成为古代藏书楼保护的典范

天一阁的藏书已从1.7万卷增加到30万卷,占地面积从2000平方米增加到2.5万平方米,已从一座藏书楼发展成为“南国书城”,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保护的典范。

(一)加强藏品建设

1.私家藏书聚天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文物、图书的重视,由于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和信赖,许多收藏家纷纷将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给国家。而著名的天一阁,由于已由国家管理,遂以其深远而广泛的文化影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宁波藏书家乐于捐书的好去处,成为宁波私家藏书的汇聚中心。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收藏家捐赠热潮中,就有张侗捐献其父张琴所藏书贴,张伯觐捐献其父张申之所藏书籍,刘同坡兄弟捐赠其父刘楚蓼所藏书籍,张爽清捐赠其父张世训所藏书籍,李蕴捐赠自藏书籍,共有百余箱之多。徐氏荣增、荣辉、荣棠兄弟三人也将其父徐余藻遗书捐赠。1956年,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成立时,市政府调拨了这批捐书入藏。1957年7月,张季言捐赠其樵斋藏书1.7万卷给天一阁。1962年4月,冯贞群家属将伏跗室藏书10万余卷捐出,亦由天一阁接收入藏。1979年8月,朱鼎煦家属将别宥斋10万卷藏书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捐赠天一阁。1979年10月,孙家鞋家属赠送宁波城南塔前街蜗寄庐1400余卷藏书给天一阁。1979年10月,杨容林家属将清防阁藏书1200余卷捐赠给天一阁。此外,还有张孟契捐赠其先人所藏古籍3000余卷,袁梅棠家属赠送静远仙馆藏书,以及其他各家零星捐赠之书。

可以说,现藏古籍30余万卷的天一阁博物馆藏书,实际上是由宁波地区藏书之家的藏品重新构建而成的。从这一点上讲,天一阁已不仅仅是天一阁了,它还成了宁波藏书文化的缩影。

2. 字画家谱增阁辉

天一阁向以藏书名,世人只知天一阁藏书之富,而不知天一阁藏画亦丰。天一阁藏的书画被其藏书盛名所掩,而未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天一阁藏的书画也颇具特色:从数量上讲,有4000幅之多;从质量上讲,品格高迈,不乏名家大作;从风格上讲,汇集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品;从地域上讲,宁波地方书画家的作品占有相当的份额。由于种种原因,天一阁书画长期深锁阁中,“养在深闺人未识”,无法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见面,成为一大憾事。1996年以后,由于天一阁书画馆的建成开放,阁藏书画作品不时展出,加之《天一阁藏书画选》、《天一阁藏法书专辑》的出版,使天一阁所藏书画露出冰山一角。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上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的各族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侵蚀,流传至今的尚有2万余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和认识。天一阁藏有家谱近500种。天一阁藏家谱在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都来建设宁波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统计,仅当代在海外的宁波籍人士就达30多万,国内更难以计数。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海内外宁波籍人士怀着火热的故土之情、乡友之爱到故乡寻根、旅游、走亲访友,他们热情投资,慷慨解囊,造福桑梓,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奉献,家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统战作用。如1984年为“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提供包氏家谱一事,便是最生动的一例。当年10月30日下午,包玉刚先生一行参观了天一阁。当天一阁工作人员拿出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时,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认真查看。家谱中记有包玉刚先生夫妇二人的生日,包玉刚诸兄弟还是北宋赫赫有名的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二十九代嫡孙。人们热烈鼓掌,祝贺包玉刚先生找到了自己的根。新华社专门发了电讯,香港许多报纸作了报道。消息传开,许多宁波籍人士,如万氏、陈氏等侨胞均先后要求来天一阁查阅自己的家谱。

3. 赓续传统收新志

地方史志的编纂有赖于藏书家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提供,凡是藏书事业发达的地方,地方史志的编纂也就发达。江浙两省是中国历史上藏书事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方志编纂最多的省份。自宋以来,浙东的藏书家养成了收藏地方史志的传统。到了明代,范钦更是将收藏的范围扩大,以收藏全国的方志为己任。虽然像范钦一样收藏全国方志的藏书家并不多见,但收藏地方史志的传统在浙东藏书家中传承下来,并成为浙东藏书家的收藏特征之一。

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2000年9月30日,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5881部(卷),已出版4287部(卷),完成规划任务的73%。其中省级志书规划2490部(卷),已出版1583部(卷),完成规划的64%;市级志书规划944部(卷),已出版604部(卷),

完成规划的64%；县级志书规划2447部(卷)，已出版2100部(卷)，完成规划的86%。数倍于三级志的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等地方志也已陆续出版。

1997年，俞福海先生将方志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中国方志馆的建设正式启动。后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并于1999年12月16日正式开馆。此后该馆配备专职干部从事访书、理书，新编方志的征集、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中国新编方志的收藏中心之一。

(二)加强书楼保护

在藏书建设的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天一阁的投入，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天一阁的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以天一阁藏书楼周边藏书文化区环境的整治和建设为主；上世纪80年代以天一阁藏书楼文化休闲区东园的建设为主；上世纪90年代着重于南国书城总体规划的实施，第一阶段以陈列展示区的维修和建设为主。

通过天一阁扩建一期工程的实施，已初步形成以“宝书楼”为核心，包括新书库、东明草堂、范氏故居、明州碑林、千晋斋的藏书文化区，以东园、南园为主体的文化休闲区和以秦氏支祠、陈氏宗祠、天一阁书画馆组成的陈列展示区，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南国书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相信，随着新的《天一阁总体保护规划》的制订，随着规划的逐步实施，天一阁这颗最能反映和体现宁波历史文化名城风采的明珠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七、推动了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

图书的搜集、鉴定、校勘、品鉴、典藏、管理，以及题跋、评点、收藏等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藏书文化。藏书是文化沉积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的阶梯。藏书文化源自于其他诸种文化，又是其他诸种文化总和的反映。藏书文化的形成，说明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所以说藏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花。

中国的藏书文化博大精深，它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学术史关系也极为密切。宁波是中华藏书文化的重地，对于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现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两次研究热潮，涌现出了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天一阁藏书考》，许炳生《古代藏书史话》，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等代表性学术著作。

1996年，宁波举办了“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不仅进一步确立了天一阁在中国藏书史和世界图书馆史上的地位，而且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出版了论文集《天一阁论丛》，并直接催生了荣获中国图书奖的《中国藏书通史》，这

又是“一部拓荒之作,填补了中国藏书通史的空白”。2003年,天一阁举办了首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这期间举办了“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出版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2004年,天一阁举办了第二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推出了每年两辑的学术性刊物《天一阁文丛》首辑,为藏书文化研究提供了平台。同时,近年来又有《天一阁丛谈》、《书城札记》、《历代名人与天一阁》、《范钦评传》、《娜嬛福地天一阁》、《天一阁藏书史志》等著作相继问世。

2006年是天一阁主人范钦诞辰500周年,是天一阁建阁440周年,天一阁将以“双纪念”活动为核心,以研究研讨、陈列展示、编辑出版三大板块为抓手,启动天一阁原藏古籍寻珍合作计划,继续办好第三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届时将举办藏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出版《天一阁珍藏系列》以及“中国藏书文化陈列”、“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晋京展”等十余项活动。

同时天一阁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要把天一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文献的收藏中心、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中心、中外藏书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和中国纸质类文物的保护中心,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管理一流的现代化藏书文化专题博物馆。天一阁提出了实施“书香天一”系列出版研究规划,实施五大出版工程。天一阁还将在世界藏书文化研究和古代藏书楼保护上起积极作用,目前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就共建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基地达成协议,将加强基地的建设。此外,天一阁正积极与古代藏书楼保存情况较好的日本、意大利等国联系,加强现存藏书楼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为藏书楼的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天一阁不仅要作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组织者、推动者,在世界藏书楼的保护和藏书文化的研究上也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八、提升宁波知名度的一张名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都在打造城市新名片。一张个性化的城市名片对于提高一个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人们用“东方大港、河姆文化、名人故居、儒商摇篮、佛教圣地”来形容美丽的宁波,宁波用“宁波港、宁波装、宁波景、宁波帮”四张名片来介绍自己。随着宁波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宁波又有了四张新名片,而且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为:宁波大剧院——三江文化长廊的明珠、天一广场——城市会客厅、南站广场改造——更新城市“封面”、三江口——城市魅力之所在为四张新名片;另一种说法为江、湖、港、桥,即三江口、东钱湖、宁波港、杭州湾跨海大桥,为宁波市倾心打造具有城市特色的四张名片。

这些也许都不错,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建设成就,但它们不是城市唯一的永久的

名片。一张合适的城市名片,应能准确反映出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以及城市的精神面貌和经济特色。我们在亮出“城市名片”时,要让名片叫得响,打得开,容易让人记得住,朗朗上口。一个城市应该有给人印象深刻的名片,要具有唯一性,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想起这个城市。从本质上讲,一张城市名片是一个地区文化的累积,靠临时挖掘,靠东拼西凑,靠苦思冥想,是很难“成文”的。一张成功的城市名片,不仅要求信息传递准确、内容高度浓缩,还应讲求能够让多数的人认同、理解和接受;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一定能将城市最鲜明的文化特色呈现出来,让人过目不忘并且深感认同;一张有影响力的城市名片,一定能进一步提升一个城市的对外形象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城市知名度和竞争力。

评选和打造城市名片应该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一次发掘、提炼,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精髓的集成和一次张扬。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越高,文化品位越高,城市的形象就越好。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无声载体,城市名片是一座城市沧桑与再生的最好见证。它如飘洒的春雨,润物无声,融入市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怀和行为规范,渗透进每一个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融入城市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成为城市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天一阁就是宁波城市这样的一张名片。学术文化和商贸文化是宁波历史文化的两大支柱,藏书文化是学术文化的基础,人皆知晓;而宁波商贸文化“诚信、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被称为“儒商”的宁波商人,骨子里浸透着藏书文化的血液。到宁波看什么?看天一阁和天一广场,天一阁是宁波城市的书房,天一广场是宁波城市的客厅,是学术文化和商贸文化的代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天一阁都会是宁波城市唯一的一张最具个性的世界级名片,它将持续不断地提高宁波城市的知名度。

2006年8月11日完稿于天一阁

参考文献:

- [1]肖东发.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M].
- [2]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
- [3]虞浩旭:《历代名人与天一阁》、《风雨天一阁》、《书院圣地——白云庄》、《嫫嫫福地——天一阁》、《浙东历史文化散论》、《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等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

关于范钦及其天一阁的若干思考

戴光中

【摘要】 本文就范钦天一阁的功能、阁名的寓意、收书特色及其秘藏深藏的成因提出若干新说。

【关键词】 天一阁；功能；特色；探因

一、天一阁的功能和寓意新说

众所周知，天一阁是藏书楼，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然而，张时彻在《寿少司马东明范公七十叙》中谈到：“不佞自解兵政，东归海上也，盖与少司马竹墟屠先生、东明范先生欢甚。时时过从屠先生遂初堂、范先生天一阁，而两公亦时时过余月湖精舍，衔杯酒谈笑。盖无月不会，无会不倾隐衷而赓赋咏。”张时彻和屠大山，都是范钦的亲密挚友，人称“东海三司马”，其说毋庸置疑。由此观之，天一阁并非纯粹的藏书楼，其主要功能倒是供诗酒唱和、交游宴饮之用。

明代中晚期，“游道广泛”是一个人声望地位的标志、令人艳羡的雅事，哪怕高官显宦，也视交游为要务，所以优雅的聚会场所不可或缺。当时，张时彻隐然为宁波文坛盟主，他除了月湖精舍，还有茂屿草堂和武陵庄两处别墅，时引上客共觞咏其间。而范钦罢职归里后，家中大概尚不具备这样的亭台楼阁，眼看屠大山有遂初堂、张时彻有月湖精舍，他岂能不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园林别墅？天一阁落成之际，范钦特致函邀请张、屠二人光临。函曰：

“节届清和，神当游衍，爰傍西湖之渚，乃开北海之尊，画栋朱帘，虽远愧于滕阁；瑶台仙峤，或可希于鉴湖。敢修芜楮，敬展私忱，将期奉竹林之清娱，亦以追兰亭之高会。湖中鱼鸟，依藻荇以交迎；篱下烟花，伫楮阑而望幸。过承金诺，遂启朱轩，舒春来抑郁之怀，吐吞日月；却世上问关之迹，傲睨乾坤。白马霏诸，沧州改色。卧雪本为奇才，却暑遂成雅兴。犹喜平子，黜去四愁；况奉仲舒，夙称三策。酒杯缱绻，忽惊片月之西流；尊艇盘桓，遂睹云光之东逝。望尘成恋，凤藻攀章，列一天之星斗；锦心绣口，吐万斛之珠玑。服以为荣，藏之无斁。遂稽命使，咎刻载移，

爰昇墨卿，神情共迈。”^[1]

由此可见：它显然不是专为藏书而建的秘阁，而是社交宴饮的别业，相当于现今的所谓贵宾楼。平心而论，即使今天来看天一阁，其楼下的功能，也无论如何不像是藏书的，似乎更适宜于接待宾客。而范钦自己撰写的诗文，也能有力地印证此说。例如《上元诸彦集天一阁即事》：

闾城花月拥笙歌，仙客何当结轸过？
吟倚鳌峰夸白雪，笑看星驾度银河。
苑风应节舒梅柳，径雾含香散绮罗。
接席呼卢堪一醉，向来心赏屡蹉跎。

不言而喻，这首诗的题旨与内容正是某年元宵节，范钦在天一阁大宴宾客。又如他的《书本事诗后》：

此为唐孟启作，世罕传布。伏日偃仰天一阁中，池林过雨，凉风荐爽，四望无人，蝉鸣高树，遂披襟散帙，漫书此篇。已而云影低昂，新月吐照，欣焉会于予心。据胡床，披鹤氅，停尘尾，抚无弦琴，歌白云之章、清商之曲，啜杯茗而寝，殊忘其为盛暑。城楼已下二鼓矣。晨起，即题其后。

在这篇短文里，天一阁又成了范钦避暑休憩的别墅，至多是兼藏书、研读、逐录、考订、校雠的场所而已。

天一阁楼上，可能起始就有藏书的打算，但看来也迟至隆庆五年(1571)才实行。这有宁波知府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为证，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高悬于天一阁楼上正中。于是又不得不质疑：范钦建造天一阁，是否真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藏书楼设计理念？考证有关资料，此说乃乾隆君臣炮制出来的。

乾隆早就在考虑《四库全书》修成后的存放问题。听说天一阁屹立二百余年，猜想其中必有奥妙，乃下旨命杭州织造寅著专程到宁波考察。可事实上，天一阁与普通的江南民居无异，并非乾隆想象的“专用砖石，不用木植”，而是恰恰相反；其所以长期不倒，无非是家人小心保护而已。寅著无疑是个聪明人，知道若如实上报，乾隆必定失望，甚至怪罪；必须加上一些玄虚的奥秘，使天一阁变得如有神佑，才合皇上心意。他也肯定知道全祖望关于“天一生水”的说法，但阁成在先，命名在后，显然不够神秘，于是在奏文中巧妙瞎编道：“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两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合六数。”^[2]

这表明，“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寅著首先提出的。他把“天一生水”杜撰在建阁过程中，并想出一个“地六成之”来解释该阁的形制、设备，从而把它与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易经》结合起来了。果然，乾隆非常欣赏，随即下令仿范氏天一阁之制，建造内廷四阁和江浙

三阁,并且明确提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有关诗文中反复宣示,昭告天下。例如《御制诗》五集《趣亭》之“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乾隆注曰:“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津、源、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

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称:“阁之初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阁。”这就是说,范钦建阁时根本没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设计理念,后来受到《天一池记》的启发,才用“天一”作为阁名。乾隆大力宣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不过是自我神化而已。

有趣的是,近来某些言论甚至比乾隆还要玄。譬如:“仅仅理解为‘以水克火’似乎简单了点……以藏书楼主人范钦的见识、品格,对天一自应有一种更大的胸怀、更深的寓意。他视书为清明、纯净、有着高尚品质的水,视为滋生泽被万物的生命之源,人类文化的精神导引,视为生命的、永恒的传承者,可谓真知灼见。”^[3]又如:“范钦以‘天一’命名藏书楼,应该是有深刻寓意的。我以为只有用宇宙生成之说解读天一,诠释天一阁,才算得上是认识到位。”

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先验的前提,即把范钦想象成一个学究天人、深谙阴阳五行的哲人,觉得用“以水制火”来解释“天一”,太直言,太简单,简单得就像这二字的笔画,必定是低估甚至曲解了范钦恢宏高深的本来寓意。然而,只要通读一遍《天一阁集》,就不难发现,范钦实在是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俗人:论学识文才,不如张时彻;论超尘脱俗,不如屠大山。他的长处,在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个讲求实效的现实主义者。宇宙、生命之类的玄思冥想,他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只字没有提到过。应该说,“天一生水,以水制火”确为范钦的本意。甚至可以说,那种天为大,一为始,二字组合,富于想象,能给人以自豪、以自勉的民间理解,也许比宇宙生成、生命本源之说更合乎他的内心思想。

当然,关于“天一”的高深新解也无可厚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天一阁历经四百多年风雨沧桑仍巍然屹立而基本无损,这岂非奇迹?它在世人眼里,已经不是一座具象的藏书楼,而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中华民族灿烂悠久文化的象征。

二、天一阁的藏书特色探因

众所周知,天一阁藏书以地方志和登科录为最大特色,其数量与质量都是独步天下。对此,已有大量论著问世。然而,范钦为何钟情于此,以反潮流的姿态多方搜罗?换言之,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苦心孤诣、独辟蹊径、孜孜不倦地典藏地方志和登科录?这个范

钦藏书的原动力问题,似乎从未引起过学术界的关注探讨。

曾有一位散文家有所涉及,他说:“范钦的选择,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4]但事实上,范钦从来没有“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恰恰相反,范钦热中事功,和普通封建士大夫没有二致,做官才是其人生的第一要务,治国平天下为其毕生追求。

范钦出身于耕读家庭,少年得志,学优而仕,前半生的仕途基本上还算平坦,但当他升任兵部侍郎、如日中天之时,却莫名其妙地突然被劾罢官。这在明代官场,虽然司空见惯,但范钦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为壮志未酬而抱恨终天,其临终绝笔《自赞》写道:

尔负尔躯,尔率尔趋;肮脏宦海,隐约里闾。将为断断之厉?抑为嫫嫫之愚乎?
古称身不满七尺而气夺万夫,陆沉人代而名与天壤俱,盖有志焉而未之获图也。
吁!

该文大意是范钦自谓:“你的一生,对自己负责,走自己的路,在肮脏的宦海浮沉,在家乡的里闾隐居。那么,你死后将是愤激的厉鬼呢?抑或做献媚的愚物?古人云:大丈夫立世,尽管身不满七尺,也应气夺万夫;纵然沧桑变迁、朝代更易,其名声亦与天壤共存。唉!可惜你空怀壮志而未能成功。”显而易见,他对中途罢官耿耿于怀,死不瞑目,要化为厉鬼去追究那些陷害他的奸佞小人。

范钦是个积极进取的儒家事功派,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也相信“有失必有得”的哲理;如果不能治国平天下,则一定要在别的方面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他在《赠包白崖序》中说:

人之所违,天之所相也。时之所吝,道之所裕也。故天定则能胜人,道在则可俟时。夫虞卿、马迁、杨雄、王通,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方其穷居林丘,沉迷下僚,著书自见,若所谓春秋、史记、太玄、元经者,后之人视之不啻和玉。使遇其时,必不能发愤自见,如是炳显。……道不伸于□人而伸于知己,不行于一时而行于后世,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天也。

后来在《贺比部少东包公序》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念:

夫君子应世而兴,鼎峙三才,囊括万汇,岂徒与俗浮沉,淹没终年已哉?将必抗志人代,茂树名行,进则佐人主,遵皇王之略,起仆苴漏,康济元元;否则,奉身而退,闭关却扫。举圣人之道而阐明之,成一家言,以诏人人。斯能矫世振俗,列于儒者之林。前之千古,后之来今,莫不由斯。

范钦才力平平,不可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以诏(昭)人人”,只有另辟蹊径以建功立

业。而明朝历代皇帝，大都重视藏书。明太祖定都南京，即下令将元大都宫中图籍运往金陵文渊阁，又下诏到各地访求遗书。明成祖即位后也如法炮制，同时命解缙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明世宗则建成了闻名中外的皇史宬；范钦罢职归里时，嘉靖正在下令重抄《永乐大典》。范钦是正人君子，皇帝的影响力至高无上。因此可以说，范钦致力于藏书事业，除了真心爱好，还与朝廷重视密切相关。特别是“奉身而退，闭关却扫”之后，他把修齐治平之志转移到天一阁，当作“矫世振俗，列于儒者之林”的事功，力图以此来达到“抗志人代，茂树名行”。试看他致仕后的下列诗句，莫不张扬着强烈的事功意识：“耽书吾道在，弹剑故情违”（《秋日闲居》）；“趋时勋伐从英达，投老心情只典坟”（《纳凉》）；“心远久疏还阙梦，年丰初给买书钱”（《初秋湖阁》）。

认清了范钦独特的藏书原动力，就很容易理解地方志何以成为天一阁藏书的显著特色。首先因为朝廷提倡修志。朱元璋开国不久，即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明成祖对此更加重视，颁布了《修志凡例》十六则，规定了志书的二十四类内容，以及各类目编写原则——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此后宣德、正统、嘉靖等朝，也都诏修志书，因而备受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甚至一修再修，出现了“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局面。其次，政府修志，目的明确，旨在彰往训来、有补风化：“企先贤而思齐，睹名宦而思政，审物力而思阜殷，察利病而思兴革，慨风俗而思移易，阅军实而思训练”，“以图为长治之道”。即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而范钦前半生，主要是担任各级地方长官，这两条正是他的职责所在，岂能不对地方志特别注意搜集？这反映了范钦强烈的事功意识，也是古代学者和藏书家所以不屑一顾的主要原因。“下邑陋志”，连盗书贼也不愿染指。结果，反而成全了天一阁，因保存最完善而成为最宝贵的收藏之一。

天一阁藏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明代科举录。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朱元璋亲自规定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由下而上，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于是就有了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这些科举录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场考试的题目，典范文章选录及其批语，主持考试官员的官衔、姓名、籍贯、功名，中式举人、贡士、进士的名次、籍贯、所治经典等。这对官场中人来说，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公关联络人事档案。宦海浮沉，几乎无人不曾利用过同年、师生的关系。而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最完整。明以前各朝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多，但所存尚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这份功劳属于范钦，我国现存的明代科举录，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科举制度为范钦这样的寒家子弟提供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可能性。因此，登科录作为科举考试最终结果的体现，得到范钦如此精心的搜寻呵护，其中所蕴含的事功意识昭然若揭。

天一阁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府的正书、实录、内部文件，都是一般藏书家既不甚关注又难以获得的文献。如明刻本《军令》、《营规》、《船政》、《大阅录》、《学政录》、《漕运议单》、《军

政条例续集》、《吏部四司条例》、《考功验封条例》、《户部集议揭帖》、《兵部武选取司条例》、《工部为建殿堂修都城劝民捐款章程》，还有极为罕见的《官品令》、《刑统》等等。范钦收藏这些著作的事功意识，更是不言而喻。

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科举录、地方志与上述官方文献，在当今世界均是独一无二的孤本，价值不可估量。范钦独特的藏书原动力，使他超越了同时代其他藏书家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印证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哲理。假如他不被弹劾，只是让朝廷多了一个好官而已，如今早已湮没无闻。范钦的藏书，在他丢官之后成倍激增，天一阁也在此时建成。他最终正是凭借天一阁藏书“而名与天壤俱”。

三、天一阁缘何私密深闭

私人藏书应该深秘封闭还是公开借阅，历来是藏书史上两种不同的藏书态度和价值观念。唐杜暹藏书万卷，他在每一部书上都题写道：“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6]这是最早可考的藏书训诫。后代藏书家颇以为然，以深藏为旨的风气愈演愈烈，“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乐于我知人不知，宝秘自好而不肯传”。^[6]现今论者谈到这一问题，都以范钦为典型案例——“明代范钦‘天一阁’一开始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这些禁戒确实为避免图书流失发挥了作用，但往往也禁锢了图书的传布”。^[7]

然而，其实，这是对范钦的绝大误解。最有说服力的明证，就是他曾致书王世贞，提出“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缺失”的建议。事见王世贞《弇州续编·答范司马书》：

所谕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缺失，甚盛心也。家旧无藏书目，不佞之嗜之，颇有所储蓄，二藏外，亦不下三万卷。而戊辰(1568)后，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整理。今春构一书楼于弇山园度之，长夏小闲，当如命也。闻古碑及抄本，毋逾于邨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书画名迹，庶足供游目耳。

这份书函清楚地表明，范钦并没有秘惜不宣，恰恰相反，他是开互通有无之风气的先驱，主张图书传布、抄录相易。他的《酬王凤洲中丞》一诗有“远书缱绻高怀见”、“平原旧约依然在”之句，说明他确乎实践了这一主张。李邕嗣在《甬上耆旧诗》中也指出，范钦“与王凤洲家，岁以书目取较，各抄所未见相易”。钱大昕还在天一阁看到过王世贞赠送的碑帖。

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倡导藏书相互交流的宣言，是清初曹溶的《流通古书约》和丁雄飞的《古欢社约》。曹溶提出“偕同志申借书约，以书不出门为期，第两人各列所欲得，时代先后、卷帙多寡相敌者，彼此各自觅工写之，写毕各以奉归”的办法。《古欢社约》则是丁雄

飞与黄虞稷订立的，旨在“或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如果以此与范钦和王世贞所承诺的“藏书互抄之约”作比较，显而易见，其想法和办法大同小异，时间却早了许多。而另一个“私密深闭非其旨”的有力证据，便是范钦晚年不惜资财，从自己的藏书中精选细绎，刻印了珍稀古籍20种，广为传布。这就是著名的“范氏奇书”。

由此可以断定，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这一族训者，不会是范钦。据考证，范钦只立下“书不可分”的家训。决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是他的公子范大冲。其后人又再接再厉，对保管和阅览天一阁藏书的制度，规定得越来越严格，连范氏族入平时也极难登阁。那么，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以我之见，是因为乾隆皇帝重视天一阁，地方官员推波助澜，导致“捧杀”。

天一阁经过乾隆的褒扬和赏赐，等于有了一顶至高至大至尊的保护伞。但中国的事情，若与皇室沾边，就不免要染上官气，逐渐失去原有的民间性和活力，变得高高在上，不可亲近。范钦的后人们，在这无形然而强大的习惯势力下，也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族规，努力把藏书束之天一高阁。而当时最有力的推动者，应该是浙江巡抚阮元。因为正是他撰写的《宁波范氏天一阁目序》，首次披露了范氏家族管理天一阁的规定：“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同时公布了对于违规者“不与祭”等惩罚措施。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禁约”早在范钦的第二、三代即已制定并执行了。然而，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证明。相反，全祖望说过：“是阁之书，明时无入过而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昆山徐尚书闻而来抄。其后，登斯阁者万征君季野；又其后则冯处士南耕；而海宁陈詹事广陵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又说：“予之登是阁者，最数其架之尘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①这段话的意思，是指明末清初，天一阁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并不是因为禁约而把来访者挡在门外。对于慕名来访的学者，一般都能满足其登阁的要求，而且在阁中可以自由开启那些尘封的书橱。稍后的苏州藏书家吴翌凤，也在《东斋脞语》中说过：“明季藏书，浙中为盛，而鄞县范氏天一阁尤富，立法亦尽善。其书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故无散佚之患。”试想，如果必须由各房子孙天天集合起来才能开锁取书，“其书借人”和“就阁读之”的事情还能做吗？

范氏族规的制定，很可能出于阮元的督促指导。理由是他登阁前不久，钱大昕和袁枚都不甚费事就登阁观书了，未曾遇到家族共管的种种麻烦和繁杂。阮元于嘉庆元年（1796）首次登上天一阁，立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当官的人，最看重皇帝的态度，为使天一阁对得起“奉诏旨之褒”，他究竟向范氏族入施加了什么压力，当然是个谜，但过了12年，竟由他来公开这些“禁约”，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两者之间，岂无内在联系？

本来，随着家族的繁衍支蔓，怎样使范氏族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

规范,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家族传代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某位祖先的强硬指令,而且需要终生投入,其难度简直无法想象。如今倒是迎刃而解了。在封建宗法制社会,宗族的威力仅次于皇权,看了这些“禁约”,有哪个范氏族人敢贸然答应登阁的要求?“不与祭”意味着他在家族血统关系上出现了危机,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但是,天一阁也因此变成了宗教式的膜拜对象,后人必须诚惶诚恐地保存维护。道光九年(1829),范氏宗族又对禁约加以补充,使之更加周到,并且明确指出:“司马公藏书历三百载,乾隆甲午年间荷蒙绘图烫样进呈,叠叨恩赐奖励,俾远祖德泽弥彰,凡属后嗣,益宜谨慎,永昭世守。”这番话证实了天一阁的深密封闭,实乃封建君臣“捧杀”所致。官气掩盖了书卷气,天一阁变成一个学者免进、仅供瞻仰的圣地。

鄞县有首打油诗:“积德与儿孙,儿孙享其福;积书与儿孙,儿孙不能读;试看当年范司马,藏书空满天一阁。”这是当时的事实,但冤枉了范钦,也冤枉了儿孙。应当承认,正是一代又一代的范钦后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恪守家族藏书遗规,忠实履行保管职责,终于使天一阁渡过了众多难关,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天一阁巍然屹立,实赖大冲以下范氏十三代后裔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创造了这样的文化奇迹。他们无一不是范钦的“好儿孙”。

参考文献:

- [1] 邀竹墟.东沙过湖上小启[A]天一阁集(卷三十).[C].
- [2] 东华续录(乾隆七九)[M].
- [3] 俞立华.秋谒天一阁[N]光明日报,2003-03-19.
- [4] 余秋雨.风雨天一阁[M].
- [5] 周少川.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J]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6).
- [6] (明)徐火勃.笔精(卷六)藏书[M].
- [7] 周少川.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J]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6).
- [8] 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M].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

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

陈宁雄

【摘要】 天一阁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对我国藏书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从天一阁发展史中的一些具体实例出发,阐述天一阁对藏书文化及图书馆学、目录学等方面的意义、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天一阁;藏书文化;范钦

宁波城区的西南隅,有一座巍然独存440年的藏书楼——天一阁,它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在这440年中,天一阁历经风雨沧桑,磨难曲折,坚守并发展了自己的独特风范与魅力,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拓展,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其意义、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文献珍贵资源丰富

天一阁创始人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嘉靖十一年(1532)范钦中进士,先后任湖广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江西袁州府知府;嘉靖三十三年(1554),范钦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便回到家里;嘉靖三十七年(1558)起补河南,升副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去官归里,此时他已五十有五。

范钦一生酷爱书籍,喜好读书、聚书、藏书、抄书、刻书。做地方官时,他每到一地都留心收集,广泛购抄,搜罗海内奇书,重视收集当时各地的地方文献;在京城任职时,他搜集了相当一部分内部官书文件,为一般藏书家所难以收得;同时他喜好搜集说经诸书及前人没有传世的诗文集。经20年的辛勤,其藏书即达7万余卷,而当时明代的国家藏书机构文渊阁,藏书也就四万三千余册。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及碑帖占相当大的比例。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271种,有65%是海内孤本。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有370种,大部分也是仅见之本。这些均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法律、人物、科技的珍贵资料。范钦以后的十三代人,虽尽力保全,但文献散失多于补充。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天一阁

如沐春风,陆续收回散存于民间的天一阁原有藏书3000多卷,宁波的许多著名藏书家先后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籍、字画、碑帖等珍贵文献捐献给天一阁收藏。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30万卷,其中珍稀善本有7万余卷,入编《中国善本书总目》的有5万余卷,无愧是我国古籍文献珍贵的资源宝库之一。

二、藏书理念独具特色

天一阁藏书得以久聚不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高度重视藏书质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这是天一阁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范钦与以前绝大多数藏书家不同,并不一味醉心于珍本秘籍的收集,而钟情于当代的文献资料。在他的藏书中,除了一定数量的明代前的珍本、善本外,大量拥有的是明代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方志、登科录、名人传记及其诗文集等,其中不少是当时许多藏书家所不屑一顾的所谓“三式之书”、“下邑陋志”和“时人近作”,而他却不遗余力,尽心搜集。正因为他具备立足当代、放眼后世的远见卓识,“不薄古人厚今人”,怀抱“经世致用,人弃我取,时著为主”的藏书理念,在藏书建设的思路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有别世俗传统的路子,使得范钦的藏书事业在几百年之后大放异彩,起着别的藏书楼、图书馆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应该说,范钦的藏书思想和行为模式,现今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原则,如突出重点,形成特色,重视地方文献的采集等,不无有着启示作用和影响力。

三、藏书制度严格有效

天一阁对后来的官私藏书直至当代图书馆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重视管理及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的重视,如防火方面。古往今来,火是藏书之大患,楼主取名“天一阁”,用“天一生水”之意,取其“以水克火”之义,使所建的藏书楼永远保存下去。其次是具体措施到位。阁中图书全部贮藏于二楼中间的大书柜内,以有利通风不像我们现在家居中的书房,书柜依墙摆放;书柜底下都放有一块英石,以用于吸潮;书柜内放置芸草,以防止虫蛀;阁前筑一水池,除景观外,兼防火之用。最重要的是有一套严密的管理“条例”:创始人范钦以先见之明,立下了“代不分书”的严训;范钦歿后,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因而典鬻者,永行摈逐不与祭”;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读书也要就阁读之,谓“书不出阁”。这样杜绝了散失的可能,确保了藏书楼的安全。特别是“火烛、烟酒切忌登楼”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直至今天,不仅天一阁,乃至中国的所有藏书楼、图书馆,仍在执行这

一规定。可见,天一阁的藏书保护的管理制度为中国藏书楼创立了系统、完整的范本。

四、奉献《四库》以垂永远

乾隆年间,因编修《四库全书》,乾隆诏谕天下各大藏书家踊跃献书。皇帝的圣旨传到范氏家属,引起了轩然大波。按范钦的遗嘱“书不出阁”,如果将藏书楼的珍藏献出,那无异于违逆祖训。然而,自古忠孝难两全。经家族会议研究决定,最终呈献641种,为当时全国私家藏书楼中的四个献书大户之一。其中95种书编入《四库全书》(该书共收古籍3460多种),另有381种编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合计476种;为诸家进呈之冠。天一阁的献书,充实、丰富了《四库全书》的内涵,提升了《四库全书》的品位,为校勘提供了可靠的版本。同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范氏家属慨然进呈的实际行动,为天下的藏书人家作出了表率,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天一阁原本秘而不宣、徒饱蠹鱼的珍本,通过《四库全书》的传播得到广泛的利用,天一阁之藏书精华也就化作了天下之藏书,任何天灾人祸也莫之奈何了。正是由于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使得天一阁的名声日益远大。

五、建筑法式广为流传

《四库全书》修编成功以后,乾隆下诏,命浙江省织造局寅著到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式样与书柜款式。寅著查后奏称:“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朝南,左右砖甃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阁前凿池,……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意,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俱含六数。”这就是天一阁藏书楼的基本形制。后来乾隆即仿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建造四库七阁,用以贮藏《四库全书》,这是天一阁的又一大贡献。此外,当时不仅仅有皇帝的下诏效法,在民间更有众多因仰慕而效仿的追随者。最相似的是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波著名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完全克隆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其内部结构和外观,均与天一阁一模一样。再过近百年,建于同治三年(1864)宁波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水北阁仍与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十分相似。在宁波本地以外,模仿天一阁藏书楼形制的还有金陵藏书家甘福的津逮楼、扬州藏书家吴引孙的测海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等数不胜数,故不再赘言。

六、注重环境优雅和谐

现代图书馆在强调为读者提供人性化服务的基础上,越来越注意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给予读者更多的人文关怀。

建于440年前的天一阁,如今周围古木参天,鸟语花香,阁前的天一池内清水滢滢,整个园林把天一阁藏书楼点缀得分外优雅,身历其境,醉心读书,使人乐而忘返。其实,这一派优雅的书香氛围早在建阁初即由楼主范钦精心设计,并在历代修缮过程中不断改造与扩建,逐步发展完善而成。乾隆三年(1738),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就指出:“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可见建阁时,挖池蓄水,绿化环境在范钦时就总体设计在内。康熙四年(1665),范光文增构池亭,堆筑假山。1933年,范氏后人依靠地方热心人士的帮助,在修葺天一阁的同时又增设兰亭,移原府学中的尊经阁于宝书楼之后,并增筑“明州碑林”。20世纪80年代后,建新书库,扩建东园,挖地为池,堆土成山。进入上世纪90年代,秦氏支祠修复划归天一阁,抱经楼、水北阁迁入天一阁南园,从而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气势。其中三座有代表性的藏书楼建筑的迁入,使得天一阁成为展示中国古代民间藏书文化最丰富的真正意义上的“南国书城”。

七、传抄刻印传播文献

藏书楼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与今日之现代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许多藏书家把藏书作为自己的自怡行为,把藏书视为私有财产,只供自己和弟子、家人享用,不允许他人染指,采用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应该说天一阁从建楼伊始直至以后的大部分时期,其对藏书的闭守程度是相当严密的,但并非刻板固守陈规,清初以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诸多学者文人相继登阁到访即是明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其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建阁前后,范钦常常到丰坊的万卷楼看书,每每见到自己没有的善本、珍本,就借来抄录,充实自己的藏书,他还与江苏著名藏书家王世贞交换传抄罕见之本。天一阁传播藏书文献的一大特征是刻印书籍,前后刻书约三十四种,其中20种合成一部丛书,世称《范氏奇书》。至今天一阁尚保存着数百块明代刻片,成为研究我国雕版印刷历史的可贵文献。康熙十二年(1673),范钦的第四代孙范光文、范光燮兄弟,开创了大规模抄书的局面。尤其是范光燮,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传抄书籍活动,抄书总数在百种以上,其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天一阁藏书史上是空前的,这在增加文献数量,保存、传播和利用文献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1949年以后,天一阁两次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

选刊》，共收书215种。把大量的珍本、孤本公之于世，可让读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使用这些珍贵文献。应该认定天一阁文献资源在新时期对学术文化的贡献日臻加大。

八、书目编制书楼之最

数百年来，天一阁历经沧桑。随着藏书的增减变动，天一阁曾不断编出藏书目录，据记载有书目近30种，是历代私家藏书楼编目最多的。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范钦及范氏家族自编目录，目前所知的有三种，即范钦所编的《范氏东明书目》一册，范钦重编《四明范氏书目》二卷，范钦儿子范大冲等编的《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二册四卷。二是自黄宗羲登阁编目后，后来学者纷纷仿效，共编了近20种书目，比较有名的如黄宗羲抄录的《范氏天一阁书目》，阮元的《天一阁书目》，薛福成的《天一阁见存书目》，赵万里的《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和冯孟颢《天一阁方志目》、《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等，这些书目虽“随意取舍”，却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和典籍流传的信息，登阁的学者名人功不可没。三是1949年以后，天一阁研究人员为揭示现今馆藏情况所编的书目，最有代表性的，是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骆兆平先生编著的《新编天一阁书目》。另外还有《天一阁遗存书目》、《天一阁新藏书目》、《蜗寄庐赠书目录》、《清防阁赠书目录》等。尤为欣喜的是在2004年年末“首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时，青年研究人员袁慧、饶国庆等编成《伏跗室藏书目録》一书，记录了宁波藏书家冯孟颢先生捐赠给天一阁十多万卷藏书的情况，约占现今天一阁藏书的三分之一，从中看到了天一阁新一代编目人员正在茁壮成长。

九、藏书特色传承创新

天一阁遗存的典籍中，以明代地方志保存得最为完好，这是天一阁藏书的一大特色，使其成为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单位之一。据《天一阁丛谈》记载，天一阁原藏方志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至1949年因散失仅存266种，加上后来补充，目前共存271种，其中有164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为仅见之本、海内孤本。现今天一阁的同仁们一方面仍在千方百计搜寻散失的原藏本，另一方面他们传承“藏志之风”，在新编地方志搜集上另辟蹊径。1997年8月，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李铁映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地方志颁奖会议上宣布，在天一阁内创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修志成果，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1998年12月，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开馆。截至2006年8月，他们已收集了新编地方志1.2万余册，其中三级志占全国三级行政区划（不含港澳台）的91.7%，另有光复后台湾新方志22种234册，成为国内收集新编地方志最多的全国三大中心之一。天一阁有如此创新行为，我们现有的藏书楼乃至图书馆不妨仿效一番，以增强自

身的活力。

十、声誉影响日益扩大

来新夏教授在《再访天一阁》一文中指出：“天一阁不仅巍然存在，成为保留至今的最古老藏书楼，而且还在它的不平静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恢复、充实、扩展、变化成一个新的天一阁。”从地块来看，如今天一阁已经不局促于藏书楼一隅，也不仅限于范氏一族所在，而是一座占地2.6万平方米、建筑达8400平方米的园林景点。它将全馆划分为三大区，即：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从影响来看，天一阁已经不是单纯对自身藏书楼的保护、研究，而扩大到对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和推动，先后成功举办“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和连续两届“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天一阁藏书文化已成为宁波市一张闪亮的“名片”，成为国内外朋友解读宁波的首选。其中为“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提供包氏家谱的事，便是生动的一例。1984年，包先生一行参观了天一阁，当看到阁藏宁波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并知道自己是包拯的二十九代后裔时，引以为荣，兴奋非常。此行宁波，即拍板捐资建设宁波大学，并影响到他后来捐资建设了宁波市包玉刚图书馆等一批公益性设施。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力可见一斑。

结 语

综上所述，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以及对图书馆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谓独领风骚，非其他藏书楼可比。其意义甚至超越了藏书文化这个范围，所形成的既弘扬中国藏书文化优良传统又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发扬光大。实体的天一阁无疑是中华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天一阁在自身延续、发展中形成的范式、经验和精神等财富则可能尤为宝贵。天一阁只有一个。

参考文献：

- [1]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 虞浩旭.天一阁论丛[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 [3] 徐良雄.中国藏书文化研究[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 [4] 袁慧.范钦评传[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 [5] 李万健.开放的藏书楼开放的图书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6] 徐雁.论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力[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8，(4).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新探

陶 济 万蔚萍

【摘 要】 始建于中国明代的私家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原藏两汉以来文献典籍的明代刻本抄本,特别是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刻本抄本7万多卷,历经明清盛世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散不衰而著称于海内外。更为重要的,是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私家藏书文化及其重大演进: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天一阁不仅为浙江而且为中国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的崛起和恣肆,开辟了道路,树立了范式,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私家藏书文化体系

中国唐宋以降,浙江私家藏书和私家专用于收藏的藏书楼后来居上,明清两代更在全国前列。浙江现存私家藏书楼明代宁波天一阁,清代余姚五桂楼、海盐西涧草堂、瑞安玉海楼,以及民国初期南浔嘉业堂,在全国几乎绝无仅有。范氏天一阁1566年落成,距今已经440年,既是中国又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原藏两汉以来文献典籍7万多卷,主要是历代文献典籍的明代刻本和抄本,特别是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刻本、抄本、稿本。天一阁以其历经明清盛世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散不衰而著称于国内海外,被盛誉为藏书文化奇迹。藏书是一个文献典籍收藏、传承、开发、利用和弘扬的文化过程。如何履践藏书的整个文化过程及其各个方面和所有环节,归根到底取决于藏书者或藏书家对于藏书活动及其过程根本的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藏书文化实质上就是藏书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提炼、升华和创新。藏书文化体系实质上就是方方面面藏书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根本上从分散到集中、从外在到内在、从部分到整体的组合构成和有机统一。本文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前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研究表明,天一阁比藏量丰富和藏品珍贵更为重要的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私家藏书文化: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研究进一步表明,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不仅为浙江而且为中国明清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的崛起和恣肆,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树立了有序的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一阁和中国明清私家藏书楼的私家藏书文

化体系,是一个有待明确立项、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本文所谓新探,无非抛砖设问而引玉求解。

一、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

藏书和图书收藏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藏书包括了文献典籍的收藏、传承、开发、利用、弘扬以及书楼构筑等各个不可或缺和互联互通的组成部分。图书收藏尽管包括了文献典籍的搜求、整理、修补、编目、入库、管理等各个组成环节,然而整体上归属藏书。所以,藏书和图书收藏既不能割裂开来,截然对立,又不能简单等同,混为一谈。天一阁创建人范钦及其后代从收藏是藏书的前提和基础出发,重在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搜求、整编和管理,以其独到的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

第一,文献典籍搜求。中国官方、私家、社会三大藏书系列,历来重视传世文化典籍收藏而忽视现实活态文献收藏。即使私家藏书楼也以传世和地方文化典籍为收藏重点。范氏天一阁与众不同的是,重点搜求历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孤本特别是明代现实活态文献。诸如研究者无不乐道的天一阁原藏明代省、府、州、县志书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还多,明代各朝科举考试的《登科录》刻本370种,其中包括各省会试录、乡试录、武举录等。无论收藏总量之多还是原刻本、善本、仅见孤本之多,在当时和现在均为全国之最。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天一阁重在搜求明代现实活态文献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数量多,种类全。除了地方志书、档案、文集、丛编以外,官方事例、家族宗谱、契约文书、乡规民约等,虽然难说应有尽有,也堪称全面丰富。其二,系列互补,价值较高。各级地方志书、各类科举登录以及各种活态文献版本,系列配套,优势互补,有助于辨正和考实,提高了收藏的质量及利用价值。俞宪编撰《皇明进士登科考》苦于文献不足,却在天一阁如愿以偿。他在序文中不无感叹地说:“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辗转乞假,果得补全。”其三,突破地域界线,兼收各地文献。尽管立足当地,又跳出当地,面向全省和全国,跨县域、府域、州域、省域搜求而收藏。全国不少地方的志书和文献,在当地无存或已无原件,却在天一阁留存至今。明代弘治十七年《上海志》、正德五年《云南志》、嘉靖二十八年北京延庆县《隆庆志》等164种地方志书,都是至今仅存于天一阁的无双孤本,有的还是最早的初刻本。

很多研究者认为范钦钟情于当代文献,不外四种解释。一是范钦主要靠俸禄收入,财力决定了只能以当代文献而不是宋元善本为搜求重点。二是范钦为官四方,搜求当代现实活态文献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三是范钦先后主持民政、学政、军政等大事和要务,势必需要比较充分地把握当代和当地自然、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实

活态文献。四是范钦自信、进取、刚强，鲜明凸现的个性使他为人行事独立思考、另辟蹊径，文献搜求也人弃我取、别开生面。这些说法都有根据、很有道理。关键在于贯穿和渗透于其中的，是范钦对于藏书及其收藏根本的理性观念和价值取向，是范氏天一阁的文化精神和藏书文化。在范钦看来，文化典籍诚然具有资治通鉴的重大价值，而当代、当朝、当地现实活态文献既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又具有传世致用的历史价值。这才使大量不见经传然而价值连城的地方志书和实证文献不仅留存到现在，而且改变了世人共识和藏书共识，前所未有地开拓了文献的新门类和收藏的新空间。

第二，文献典籍整编。文献典籍从搜求获得到入库保管，因循整修、鉴别、勘误、补缺、登录、编目等步骤和流程。范氏天一阁认真和严格地因循这些步骤和流程，特别是一丝不苟地将其运用于明代现实活态文献的整编之中。研究者的关注集中在天一阁的书目编撰。范钦亲编2种，其子范大冲增编1种，八世孙范懋柱专编奉命呈书1种，家族后人重编1种。家族外他人编目20多种。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因为重在收藏当代活态文献，文献整编颇有讲究。其一，突出版本辨正。文献典籍特别是现实活态文献各种版本的优劣，根本地制约了收藏质量和价值的高低。范氏天一阁对自藏文献典籍和地方文献的刻本、抄本、稿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真伪鉴别、内容考证和文字定夺。并且范氏同其他私家藏书楼互助合作，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面进行版本辨正和刻抄勘误，常常借抄或分刻善本而互通有无。范钦《明贡举录》稿本，收录明代浙江贡举、乡试解元和三朝会状二元的相关资料。有人疑为范钦随手所作，备记忆而已。其实，这倒留下了范钦辨正文献版本的实据。

其二，突出了收藏分类。文献典籍特别是活态文献分门别类的收藏分类，极大地影响了藏书的利用和收藏的管理。范氏天一阁和当时其他私家藏书楼共同优化了收藏分类和目录编撰。一是传世文化典籍仍按官方藏书经史子集四部总类及其子类统分，却又新增附录别类编入地方文献和相关资料。二是专设地方文献和相关资料为新增别类，附加题记或说明，同四部总类子类二分而互见。三是再设自藏、自编、自著、自刻的文献丛集为专题别类，同四部总类子类、地方文献别类三分而互见。范氏天一阁以不同于四部统分的三分互见体例和机制，分橱收藏，分橱立目。清初佚名《天一阁书目》抄录书名与册数，共分经、史、子、集以及实录、志书等凡三十六类。范氏后人重编的《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按24个书橱逐一登记书名和册数。这两部现存最早的天一阁书目，一部是清初能登阁的人所编录的，肯定与范家相当亲近，一部是范钦直系后人所编录的，肯定恪守范钦遗愿。因此，它们能最接近最如实地再现范氏天一阁整编文献典籍的实态、原貌、特色和创造。一方面，其借鉴和吸纳了官方藏书四部分类和编目的规范、机制、经验，并且舍弃相对片面、僵化特别是忽视当代现实活态文献的局限；另一方面，其一视同仁地对待传世文化典籍和现实活态文献，

推动和促进了版本学、目录学、考证学、编辑学乃至文献学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文献典籍管理。文献典籍搜求并不容易,整编并不简单,而管理相当困难,世代传承则难上加难。历来多少藏书楼书失楼毁,莫不归因于水浸、火烧、虫蚀、盗窃、战乱“五患”或“五厄”。书失多半因为流离:一是分家,分而即散;二是出楼,出而无归。楼毁多半因为火患,星火酿成大灾。收藏管理维系着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兴衰存亡的命运和前途。范氏天一阁和原藏文献典籍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保存完整和良好。研究者无不敬佩和称誉范氏天一阁,以全面、规范、严格的收藏管理模式独步明清私家藏书楼。概括起来主要是:范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凿池积水、禁火入阁的措施,防潮治虫的方法。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最为重要、最为宝贵而最为成功的管理经验是:制度到位、责任到人、预防到心,构建和完善了收藏、管理、预防三位一体化的收藏管理模式及其收藏管理文化。其一,全面总结经验,确立收藏管理的基本理念。范钦高度重视和全面总结了私家藏书楼特别是丰坊万卷楼兴衰存亡的经验和教训。范钦和丰坊既是鄞县同乡,更是收藏好友。丰氏历经两宋元明,代出闻人,家富藏书。万卷楼藏书万卷,其中不乏宋版善本,范钦从中抄录甚多。但是丰坊管理不当,宋版刻本和抄本被人窃走十之六七,后遭大火,藏书所剩无几。丰坊最终把余藏和宅地转让范钦。其中经验和教训对范钦来说,再也鲜活、生动、深刻不过。范钦身体力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真理,高瞻远瞩地确立了收藏管理的基本理念“代不分书、书不出阁”。一是所有收藏归范氏家族所有,代代承继,代代不分,代代不散;二是所有收藏不得流离阁外,即使子孙也只能在阁中就读。其二,围绕基本理念,制定和实施严密管理的基本制度。范钦生前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和其他家产,另一份是天一阁及其藏书和部分维持地产。长子范大冲放弃银两,直接继承父业,并且庄严承诺和定约。藏书世代共有、世代不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房同管、共开共关。此后,管理制度不仅代代恪守,而且不断强化和深化。现存清道光九年(1829)范氏禁牌,明确规定:“烟酒切忌登楼”;“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槟逐,不得与祭”等。有关天一阁及其藏书的维护、修理和月查、周边环境的维护和整治,都有明确的文本规定。其三,依据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预防领先、责任到人。从范大冲承继范钦为第一责任人起,世代族长始终延续为第一责任人,而各房房长始终延续为各房责任人,又授权轮流担任的月值者始终延续为直接责任人。同时,族长、房长、月值者不仅以身作则,而且不懈地坚持引导和养成,做到预防为主、预防到心。道光九年的族规家约首先突出和强调:“远祖德泽弥彰,凡属后嗣,益宜谨慎,永昭世守。”“后人因修理之维艰,益思创建之非易,宜各恪遵勿替。”

范钦确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意义非凡:既重收,又重藏;既重藏,又重管;既重管,

又重预；既重刚性的制度之预，又重柔性的文化之预。从一定意义上说，“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既是刚性制度安排的静态管理和预防，特别是产权关系的制度确立；又是活性机制安排的动态管理和预防，特别是分房同管、责任共担的机制确立；也是柔性文化安排的心态管理和预防，特别是杜绝书失楼毁的警示确立。这不仅符合了私家藏书的管理规律，而且发展了私家藏书的管理文化。

二、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

文献典籍的收藏、传承、开发、利用和弘扬依托建筑载体。建筑既是技术又是艺术，融科技文化和审美文化于一炉。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又自成一体，并且表征文明特质、民族特点及其发展程度和水平的重要分支体系。天一阁的建筑及其营造文化，一直是研究者仅次于文献典籍及其收藏文化而长期关注和探讨的主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楼下六间、楼上一间的格局，引水为池、叠石为山的园林，以及通风翻晒、防潮防虫的方法。清代乾隆皇帝编纂中国典籍总汇《四库全书》，抄录七份分藏内廷四阁和江南三阁。乾隆专门派人考察、测量、绘图，借鉴和效法了天一阁的构筑寓意、书楼结构、书橱款式、营作之制和保管之法。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厚积薄发。范钦曾经出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参与皇家宫殿、园林、庙宇、陵墓的营造和修缮。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格局、结构和工程技术，而且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景观特征、内涵意蕴、文脉风韵和审美表现。对于藏书楼这种特定的建筑类型或建筑样式，范钦就更加熟悉和深知了。他从历史文献中，间接了解和总结历代藏书楼营造的案例和经验。从政期间，他积极履践藏书过程，参加交流活动，直接了解和总结当代藏书楼营造的案例和经验。罢官归里后，他致力于藏书事业，经常组织私家藏书楼的交流活动，并且外出寻访各地私家藏书楼。当时浙江私家藏书楼勃兴迭出，他充分地反复了解和全面总结私家藏书楼营造的范例和经验。范氏天一阁把藏书、建筑、园林结合起来，重在因凭选址、拟象构筑、审美造境，以其独到的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

第一，书楼的因凭选址。浙江人杰地灵，吴越文化特别是藏书文化的人脉和江南水乡的地脉互连意聚，一直是浙江私家藏书楼同家居宅院全面分离而独立构筑的选址因凭。既傍山，又依水，是必备的条件。即使在建筑密集的城镇营造藏书楼，无山则叠山，至少要以山房、山楼命名指称以相补。无水则引水，至少要以水缸、水盆类替代以周全。其原由一是防火，二是防盗，三是引景标胜，四是蔽隔幽静。范氏天一阁位于宁波市区原鄞县所辖的月湖西岸。月湖始辟于唐代贞观盛世，北宋时又大规模疏浚整治，开发了十洲、三堤、七桥。古樟荫盖，垂柳依依，亭台楼阁掩映其中。两宋以来，月湖周边有“三多”。一是高官豪门的深

宅大院多。南宋鄞县有史、楼、郑、丰四大姓,其中史、楼、丰三家集聚临湖而居。二是习礼授业的地方学府多。官方书院和私家书院望湖林立,讲学之风绵延不绝,学术探讨传衍不断。三是家族收藏的私家藏书楼多,特别是传世名楼多。南宋楼钥在月湖南岸构筑了东楼,收藏宋刻善本和异书等超过万卷。史守之居月湖北岛构筑了私家藏书楼,宋宁宗亲书“碧祉”赐名。他收藏了不少宋刻善本,与楼钥齐名。故有“南楼北史”之称。同东楼相伴的有王应麟的汲古堂。王应麟著述宏富,藏书宏富。元代月湖南部又有袁楠的清容居,上承三代,藏书万卷以上,甲于浙东。明代湖西私家藏书楼相当密集,名楼不少。除丰氏万卷楼和范氏天一阁外,王氏汲古堂传至第三代。大姓陆氏南轩富拥宋元善本,为当时宁波私家藏书第三楼。范氏家族久居月湖西部。范钦回归故里,建祖祠,置祀产,恤亲族,训宗学。宅院以东竹木茂盛,左瞰月湖,另有东明草堂,是范钦读书、收藏、会友之处。基于月湖风水宝地特别是湖西藏书宝地,又得丰坊余藏和宅地,范钦大兴土木构筑天一阁。既因凭水乡地脉,以水克火,又因凭藏书人脉,以楼聚书,从而脉连文扬,化外为内。范氏天一阁不仅坚持和继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因凭选址的书楼营造文化。

第二,书楼的拟象构筑。古今中外建筑都是以其实体的造型形象、空间的组合结构、时间的节奏韵律、象征的意趣目的,作为主要的营造文化元素和审美创造手段。而象征的意趣目的居于主导地位,从根本上引领、制约、调控、统一实体造型形象、空间组合结构、时间节奏韵律。象征意趣目的有所不同乃至根本不同,决定了实体造型形象、空间组合结构、时间节奏韵律有所不同乃至根本不同。

天一阁是一座明二层暗三层、重檐硬山坡顶五楹的砖木结构楼房。以建筑青砖基座、青砖砌墙、青瓦铺顶,松木构架、杉木门窗、木板隔断,底层前后木柱条石廊道、单步梁、十字拱。中国传统建筑突出地强调对称、规整、平衡,形象地演绎和显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天一阁体量适中,体型工整,体态典雅,外观比例非常妥帖,实体色彩十分柔和。其不仅严格依循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式,而且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法式典型。从坐北朝南迎阳防湿、前后门窗引风对流,到重檐坡顶和底层廊道既顺风雨又防积水,天一阁的种种做法一如寻常,并无迥异惊人之举。至多在细节处理上,此楼吸收了浙东民居和小品建筑的一些做法,如山面元宝形和廊道单步梁,都是浙东民居的普遍式样和处理手法。

天一阁外观上下两层。楼下广宽六间,进深六间,以木板隔断,既分切又组合,左有楼梯,右为书房,中间是宽敞的明堂,各具交通、研读、会友的特定空间功能。楼上是一大统间,进深压缩为四间,以中间松木脚杉木板的专用书橱集群隔一而为六,收藏文献典籍、碑帖字画和刻书印版。前后檐相交暗建三层,各间设四扇推拉木槛窗,博脊和檐椽之间装有铁栅栏,既强化通风,又防范盗窃。书橱离墙腾空,前后橱门对开,引风入橱,防湿、防潮、防

霉。书橱下设置石灰石质的英石吸潮气,书橱内放置中医草药芸草护书避治虫蚀。下六上一的室内构成,直接照应了《易经》郑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显现以水制火、火为水克和火生万物、万物水润之义。书楼因而以“天一”命名。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下六上一”的内在构成需要进一步深究。其一,构成的变化。下六和上一,是两种不同的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下六以集中的分散为主,以慢板中的快板为主;上一以分散的集中为主,以快板中的慢板为主。上下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的构成变化,不仅形象地演绎和显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结果意蕴、终极意蕴,而且形象地演绎和显示过程意蕴、变化意蕴。若无变化、过程,“天一”何以“生水”?“地六”何以“成之”?其二,变化的构成。“下六上一”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既不对称也不规整更不平衡。上下广宽六间为偶非奇,不合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和规范。所以,一是楼上以书橱集群分一为六同时合六为一。楼下以四间明堂、一间书房、一间楼梯分一为三,又以四间明堂为中心合三为一。三是楼下以六为偶和楼上以一为奇,总合成七为奇。不对称、不规整、不平衡反反得正,从而最终回归对称、规整、平衡。反反归正合乎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和规范。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变化对比的重新构成,不仅形象地而且意象地演绎和显示变化、过程反反归正的内在意蕴。其三,意象和象数。在《易经》中,变化过程的意蕴是意象和象数的分合同一和正反回归。变化过程的意象是以数量必然的象数为基础和条件的。意象和象数的分合同一和正反回归,决定了变化的过程和过程的变化。两种空间组合结构和时间节奏韵律从构成的变化到变化的构成,透过形象和意象从而淋漓尽致地演绎和显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变化过程的内在意蕴,即意象和象数的分合同一和正反归正。这是天一阁拟象构筑的精髓。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范钦如此扑朔迷离是否可能。首先,易、道一家。范钦对于易经文化和道家文化既有浓厚的兴趣,又有深入的研究。他编纂《范氏奇书》21种,其中最多的是《易经》相关文献,次多的是道家相关文献。其次,范钦多次游览拜谒道教龙虎山,多方探寻寻求龙虎山碑帖。构筑藏书楼时,他得到龙虎山天一池石刻,上有“天一生水”之句,以为与己楼前凿池之意相合,即以“天一”为阁名。再次,明代永乐和嘉靖两个皇帝信奉道教和道家,社会崇道信易日盛。范钦深受易道文化影响,迷恋意象和象数之说不足为奇。二是如此扑朔迷离有无实际意义。首先,火灾是私家藏书楼常见大患,往往使世代传承的私家藏书楼毁于一旦。利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易道文化,强化防火举措,强化防火预警,正是范氏天一阁历经明清盛世不散不毁的重要保证。其次,以易道文化统领下六上一的内在构成及其构成的变化和变化的构成,打破了单一的和静态的对称、规整、平衡,特别是单一的和静态的空间组合、时间韵律、时空构成,不仅开发和提高了天一阁藏书建筑的实用功能和效用价值,而且开发和提高了天一阁藏书建筑的审美功能和观赏价值。再次,以往私

家藏书楼尽管注意到藏书的特殊需要,但是在空间组合、时间韵律、时空构成等方面因循守旧、无所创新。书楼建筑的实用功能和效用价值、审美功能和观赏价值,没有多少开发和提升。范氏天一阁的不凡,在于以易道文化改变以往藏书楼千百年不变的象征意趣目的,从而在空间组合、时间韵律、时空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造。范钦及其天一阁匠心独运,全面引进易道文化统领书楼营造的拟象构筑,不仅把建筑审美文化和书楼营造文化结合起来,而且把藏书文化和易道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丰富、发展、创新了拟象构筑的书楼营造文化,就连乾隆也接受了天一阁易道拟象构筑的书楼营造文化。

第三,书楼的审美造境。以山水、花木、建筑的组合构成为本质特征的园林,是建筑的变异类型,或者说是建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建筑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传统园林文化的主流相对而言是道家文化。长江以南的私家园林比较充分地演绎和显示了人物同化、返璞归真的道家文化。江南私家园林始兴于南宋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明清时极盛于浙江东部和江苏南部。江南私家园林以写意山水、小品建筑、四季花木为特色和优势,营造诗情画意、宛自天开的文化时空和审美境界。浙江私家藏书楼崇山乐水,写意抒怀,情景交融,人境合一,再创藏书有意味的文化时空和审美境界。范氏天一阁发挥了易道文化,促进了藏书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易道文化审美造境的书楼营造文化。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范钦在阁前凿池蓄水防火,池水与月湖相通,完全体现了“天一生水”之义。研究者也普遍注意到天一阁落成99年时的1665年,范钦曾孙范光文在阁前阁后增垒假山,遍植花草、树木和竹丛。阁前池南以石为主营造石土假山,石态如狮、如象、如羊、如虎,而峰状拟福、禄、寿三字,全在似与不似之间。阁后以土为主营造土石假山。山南东有小水池,西有小石洞,上有偌大平台。整座假山的全景是五狮献剑。四小狮围拥中间大狮,大狮口含宝剑,似在守护天一阁。山下山上林木森郁,丛竹摇曳,一派山野风光,气势自然天成。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钦建阁仅凿池引水,稍植竹木。之所以没有大举营造园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范钦另有溪隐山庄,又名望春庄,位于鄞县西山。此处既有自然山水,又有农家田野,几乎是一座自然山水园林。范钦常邀友人来此游赏,常作诗词抒怀。诗云:“窈窕神仙窟,飘摇猿鹤群”。“已是成招隐,无劳访赤松。”二是天一阁地处原丰坊的碧沚园。东明草堂和天一阁之间留存了碧沚园数代经营的林木景观。碧沚园水系联通小河,与月湖相连。天一阁西可借景碧沚葱郁林木,东可借景月湖烟波楼台。三是大明律严格规定官舍民居前后左右,不许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因此范钦心有所向,胸有成竹,率先以易道文化策划和造就了月湖深处天一阁的审美意境。

范光文清初曾中进士,授礼部主事,主陕西乡试。他不仅维护了天一阁,增加了藏书,

而且顺应了明清私家藏书楼营造的园林化态势,在阁前阁后重筑泉石林园。石土假山和土石假山互为对比和变化,特别是同天一阁互为对比和变化。不仅融天一阁于写意山水之中,而且融天一阁于月湖山水之中。园林营造的象征意趣目的一如书楼营造的象征意趣目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月湖深处天一阁的审美意境。作为范钦的后人,范光文既继承了范钦遗业,又审时度势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一方面,他把易道文化和园林文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又把园林文化和建筑文化结合起来。此举的意义,一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以易道文化审美造境的园林营造文化;二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因凭选址、拟象构筑、审美造景的书楼营造文化;三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藏书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的三位一体;四是全面实现了范氏天一阁包括园林在内的书楼营造模式和书楼营造文化。

三、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

藏书最终为了什么?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还是为了利用而收藏?这是藏书文化的基本问题,更是藏书文化的首要问题。收藏文献典籍及其世代传承毕竟只是手段,而在保护的前提下,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才是目的。中国私家藏书楼从收藏为主到致用为主的转变,步伐艰难,过程漫长。然而明清时期转变的步伐和过程不断加快和加强。范氏天一阁不断发挥了特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重在有所作为、局部开放、面向社会,以其独到的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

第一,尽力有所作为。长期以来,私家藏书楼特别是浙江私家藏书楼,既以文献收藏传承为己任,又以学术编撰传衍为使命。研究者大都注意到,范钦尽力有所作为,开发和利用明代现实活态文献。一方面,他利用现实活态文献把握和解决现实活态问题。即使回归故里以后,范钦仍然利用从政经验和活态文献,为来访的地方军政官员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和更主要的,范钦在积极校勘、编总、刻印当代活态文献。诸如他抄录、校订、编撰了《嘉靖事例》,包括嘉靖年间土地、租税、生产、赈灾、支俸等经济事例80余件,是一部经济类法律规范的汇编。此书已被列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明代十二种代表性法律文献版本之一。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钦著述不多,编刻不少。其校刻有善本如《建安七子集》,编撰的活态文献稿本如《明贡举录》、《嘉靖事例》等,更为珍稀,更富价值。这不仅说明了范钦重视学术传衍和经世致用,而且为范氏天一阁的学术传衍和经世致用,既确定方向又垂先示范。范大冲校刊范钦遗著《天一阁集》、《范氏奇书》,编刻《天一阁书目》,自著《三史统类臆断》。曾孙范光燮勤于著述,有《希圣堂讲义》等学术专著。五世孙范正范正铨在从政时,利用现实活态文献编修了《德化县志》,并且经常就一方利弊进呈对策条议。这不仅说明了范

氏天一阁的学术传衍和经世致用不断在履践,不断在延续,不断在丰富,而且说明了范氏天一阁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不断在充实,不断在深入,不断在弘扬。

第二,对外局部开放。长期以来,私家藏书楼往往处于家族自身的封闭之中。一是主观历史条件的局限,二是客观防止书失的需要。所以,私家藏书楼能够对外开放的凤毛麟角。研究者大都注意到范氏天一阁严格管理甚至严密封闭,书不借人,更不出阁。为之辩解者强调防止书失,而对之批评者强调自我封闭使然。有的甚至认为范钦爱书如命“只藏而不用”。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和其他私家藏书楼一样整体封闭,局部开放。但是,局部开放的程度则不断有所变化和扩大。范钦生前实行的是交往性局部开放。一是对书朋文友的局部开放。天一阁和其他私家藏书楼经常或互相借阅、传抄文献典籍的孤本、善本;或合作分工校勘、编撰、刻印价值较大的文献典籍。范钦和其他私家藏书楼订立了藏书互抄之约,长期互动合作。二是对研究学者的局部开放。乡贤编撰地方志书、文集,范钦引领开阁查阅、抄录。俞宪编撰《皇明进士登科录》,范钦开阁满足了其搜求相关文献的需要。

黄宗羲登天一阁并且编撰《天一阁书目》、撰述《天一阁藏书记》,经常为研究者大书特书。赞之者以为是天一阁非不可登的开放标志;疑之者以为是“下不为例”的破例特例。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这一案例大有必要探究。明末清初,黄宗羲及其学生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开创和发展了浙东学派特别是浙东史学流派。他们改变了从经学出发务虚清谈的不实学风,更新了从文献出发务实求真的治史良风。他们重在学术文化思想的梳理和经世致用文化的倡导,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发展趋势,勇于探索明清“天崩地解”、“革故鼎新”的社会改革道路。他们是中国最初一代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推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启蒙思想先驱者。范光燮一反旧例,引领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多次登阁,既不仅是对黄宗羲等人学术创新的仰慕和敬重,也不仅是对黄宗羲等人在天一阁进行学术活动的配合和协同,更是对开创和发展浙东史学流派的拥护和支持。事实上,范氏天一阁从此同浙东史学流派和浙东乃至全省学术界、藏书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黄宗羲登阁以后,万斯同和全祖望登阁之前,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学问家李邕嗣、朱彝尊、徐乾学等人已经相继登阁,并且开展了学术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浙东史学流派的倡导和影响下,范光燮更加主动地推进范氏天一阁从交往性局部开放转向学术性局部开放。全国特别是江浙著名藏书家、学问家访问和登临天一阁络绎不绝。当时有诗形容说:“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月湖天一阁出现了家族外人登阁新“三多”:一是为天一阁藏书编目越来越多;二是利用天一阁藏书编撰学术著作越来越多;三是借鉴天一阁管理经验、营造经验和藏书文化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局部开放是尽力有所作为的另一种实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尽力有所作为的特点是化内为外,对外局部开放的特点是化外为

内,这不仅开发和发挥了范氏天一阁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功能效应,而且塑造和弘扬了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藏书文化。范光燮有所突破、有所推进的历史贡献既不能低估,更不能忽视。

第三,逐步面向社会。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实质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路径和方式大不一样。在明清时期,范氏天一阁尽力有所作为是一种路径和方式,对外局部开放也是一种路径和方式。另有一种路径和方式,就是书楼和书院互动。范光燮曾授嘉兴府学训导。他捐资兴建希圣堂,作为府学开展学术论辩活动的场所,并且亲自组织和参与谈经、说理、论史。他从天一阁抄录藏书100多部,收存嘉兴府学,供学生阅读研讨,并且供当地学者借读研讨。不过,这些路径和方式的影响有限、作用有限。

是否还有面向社会、服务社会而影响更大、作用更大的路径和方式?研究者一而再、再而三论及乾隆钦定编纂《四库全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奉命呈献范氏天一阁藏书638种,(一说602种),排名全国第二位;其中人编95种,存目378种,排名全国第一位。乾隆下谕皇家收藏《四库全书》七阁效仿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之法,以垂久远”。除赏赐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外,乾隆又先后特赐《西域得胜图》16幅和《金川得胜图》12幅。虽说呈书发还,实际只归还御题2种,其余呈书后来大都流失,仅人编呈书抄存。现代研究者无不认为呈书使范氏天一阁声名大振,同时无不认为这使范氏天一阁第一次遭劫,藏书第一次散失。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范氏天一阁奉命呈书有失有得,所得远大于所失。首先,这开拓了面向社会、振兴抗衰的新路径和新方式。新朝征召遗书,盛世修史编书,是中国一大历史传统。一方面,这能维护典籍遗产,增加国家藏书,推动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这又能通鉴历史经验,整肃朝纲文治,确保政权巩固。由于皇家藏书有条件适当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借阅乃至抄录,而且选择刻印乃至传播,成为私家藏书转变为皇家藏书以至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特殊路径和方式。所以,历代私家藏书楼往往接受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特殊路径和方式,无可奈何之中又引以为荣,受迫被动之中又积极主动。从范光文增构山亭园林和复购未备藏书、范光燮引黄宗羲登阁和规模抄录藏书以后,范氏家族和天一阁逐步由兴入衰,守成维艰,振兴难望。正当危机步步逼近之际,范懋柱奉命呈书,实际上获得了范氏天一阁振兴抗衰的机遇,并且出乎预料之外获得了比较巨大和良好的效果。一是乾隆高度赞赏、备加推举,致使范氏天一阁盛名天下,无以相比。二是得到了钦赐在中国历史上价值超过明代《永乐大典》、仅次于《四库全书》的珍贵典籍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万卷。至今,这仍是全国属于原书、原地、原藏,并且整体完整的唯一仅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氏天一阁虽然呈书散失、损失极大,然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藏量扩大并且保值增值。三是《四库全书》分藏七阁,江苏扬州、镇江和浙江杭州“南三阁”相对全面对外开放,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包括范氏天一阁在内的私家藏书楼,因此得以拓展了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新路径和新方式。

逐步面向社会不仅是更深层面的尽力有所作为,而且是更深层面的对外局部开放。范懋柱奉命呈书,借助外部机遇和力量,振兴抗衰,推进了范氏天一阁逐步面向社会,并且推进了尽力有所作为和对外局部开放。一方面,这进一步开发和发挥范氏天一阁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功能效应;另一方面,这进一步开发和发挥了经世致用乃至传世致用的藏书文化。继范钦定向、范大冲依循、范光燮突破、范懋柱呈书和范正辂修志,范氏天一阁坚持和弘扬了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的藏书文化。范懋柱的中兴之功,是范氏天一阁历经明清盛世不散不衰的又一重要保证。

本文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范氏天一阁奉命呈书的后发效应和后续效果不仅更大而且更强。这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范氏天一阁在全国私家藏书楼中居首的最高地位得以全面公认。范氏天一阁真正取得居浙江私家藏书楼之首的社会声誉,同黄宗羲登阁不无关系。黄宗羲登阁以后曾说:“明清之交数十年,楼下蛛网尘封,几绝人迹,徒动学者羡慕窥测之劳。”此后,范氏天一阁声名远扬,就连乾隆也心向往之,不过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甚至把范氏天一阁误为万氏天一阁。范懋柱奉命呈书,乾隆属意和倾向范氏天一阁,声称“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他派人考察并绘图后说:“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嘉靖末至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并且他最后决断,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建制“一如范氏天一阁”。范氏天一阁遂被公认为全国私家藏书楼之首。朝廷关注、举国瞩目的范氏天一阁,也从此真正进入地方当局施政尽职的视野和日程。否则,时任浙江督学的阮元亲自多次登阁并且组织编刻书目是不可能的;否则,此后范氏天一阁屡陷困境而转危为安是不可能的。范钦十世孙范彭寿深悟个中干系。他说:“今吾阁中之书,乃曾经丧乱而巍然独存,复得先后官斯士者数贤大夫之屡捐廉俸,修葺栋宇,编刻目录,俾吾子孙抱残守缺,世世永宝。”

其二,范氏天一阁藏书文化体系得以全面确立。乾隆不仅高度而且全面评价范氏天一阁,概括起来主要是:珍藏善本丰富,书楼构筑精佳,累世保管有方,嘉惠士林甚伟。他特别嘉尚范氏天一阁世代恪守其业的藏书精神和书楼构筑陈设的意蕴精义。他已经深刻地感受和意识到,范氏天一阁之所以成为“巨擘”,根本上在于创新和确立了藏书之“制”、藏书之“法”。这里说的“制”和“法”,就是合乎藏书需要和客观必然的规制和法式。其不仅是有形的藏书和书楼之制、之法,而且是无形的意蕴和精义之制、之法。这涉及藏书文化的方方面面,如珍藏保管的文献收藏文化、阁式榭式的书楼营造文化、嘉惠士林的经世致用文化。在乾隆看来,尽管范氏天一阁创新和确立了私家藏书楼的私家藏书规制法式和私家藏书

文化体系,然而皇家藏书楼也要效仿,一如其制、一如其法。范氏天一阁的私家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从此遂被公认为全国藏书楼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和居首巨擘。

其三,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得以全面推广。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南北七阁,效仿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乾隆说到并且做到。他自称北京禁城皇宫的文渊阁、北京别宫离院、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别宫离院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先皇故宫的文溯阁,“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在乾隆如此推举和效法的倡导和影响下,后起私家藏书楼和官方藏书楼乃至寺观、书坊等社会藏书楼,竞相效法和推广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诸如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吴氏测海楼,浙江宁波卢氏抱经楼、余姚黄氏五桂楼、海宁吴氏拜经楼、湖州陆氏研宋楼等。李宗莲在《研宋楼藏书志》的序言中说:“天下藏书家为人人推服无异辞者,莫如四明天一阁。”

乾隆时期的范氏天一阁,是范氏天一阁的极盛时期。纯属机遇也好,“歪打正着”也罢,范懋柱奉命呈书与其说是劫难,不如说是大幸。范氏天一阁以其藏书规制法式和藏书文化体系振兴抗衰,特别是以其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再创辉煌,不仅改变了范氏天一阁由兴入衰的败落颓势,至少保证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不散不衰,而且促进了浙江乃至全国私家藏书楼的兴旺和发达,至少带动了浙江乃至全国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的崛起和恣肆。范懋柱振兴抗衰,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1,101-104,97-98.
- [2]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一辑)[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177,95-97,237-239,242-243,47.
- [3]蒋兆平编纂.天一阁藏书史志[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8-80,16-17,279,283-284,286-287.
- [4]虞浩旭.浙东历史文化散论[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50-51,95-99,287-289,75-76,72,77.
- [5]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二辑)[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238-239,208-209.

(作者工作单位:陶济 浙江行政学院发展研究所;万蔚萍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天一阁藏书流布及文化影响研究

董桂琴

【摘要】 我国私家藏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藏书被频繁收藏、流布,从而推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本文分三个历史时期阐述了天一阁藏书流布的过程:一为建阁早期范钦父子对阁藏典籍的校勘刊刻和借抄互抄;二为清代早中期黄宗羲等名贤硕儒的登阁流布、范钦四世孙范光燮的大规模传抄和清高宗时的四库进呈;三为近现代因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造成的非正常流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对天一阁自身的影响、对中国学术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繁荣的影响,对中国藏书文化尤其是浙东藏书文化繁荣的影响,以及对当代古籍收藏单位的启示等四方面论述了天一阁藏书流布的文化影响力。

【关键词】 天一阁;藏书流布;文化影响力

藏书流布是指藏书主人所收藏的图书向社会的传播。综观我国私家藏书史,其藏书流布形式既有出自藏书主人主观意愿的借抄、借读、借校、借刊、翻刻乃至赠送等的正常流布,也有因各种因素而被掠夺、偷盗、窜出等的非正常流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承下来的历代典籍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是由于历代典籍的流布和利用才得以传承下来。古老的典籍之所以能代代传承,与我国历代私家藏书家对典籍的悉心收藏与流布密不可分。综观我国私家藏书史,聚书的艰难使历代藏书家们大多嗜书如命,他们希望自己苦心收藏的典籍能子孙永宝、诗书相传,并为此制定了无数严厉的措施。天一阁保存至今的一块禁牌上写着:“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清甬上藏书世家万斯同家的藏书印更为令人震撼:“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饘粥。”^[1]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多数私家藏书家苦心孤诣收藏的典籍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因各种原因而被散出。另一方面,许多藏书家并非一味地死守藏书不加利用,他们在强调“子子孙孙世宝”、“子子孙孙世守毋失”的同时,或利用藏书著书立说,或相互借抄,或把所藏珍本秘籍刊布发行,化身千万,造福士林。到了明清及近代,更有一些开明的藏书家将自己的秘藏适度地向文

人学士开放。所以,我国私家藏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藏书被频繁收藏、流布、利用,从而推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因此,研究我国私家藏书的流布状况可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我国私家藏书事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贡献。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也是如此,她之所以成为我国私人藏书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明星,与其建阁伊始就存在的藏书流布及利用密不可分。所以,对天一阁藏书流布历史加以全面梳理,并进一步讨论天一阁藏书流布带来的文化影响,一方面可使人们全面认识天一阁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藏书文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窥见我国历代私家藏书楼藏书流布的大致。

一、天一阁藏书流布的过程

天一阁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范钦一生游历广泛,27岁中进士,后官历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最后任兵部右侍郎。范钦酷爱藏书,每到一地,就想方设法搜集典籍,还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未书,积藏达7万余卷。范钦不像同时代大多数藏书家那样一味追求古代珍本典籍。丰富的游历使他把明代地方志作为搜集重点,希望子孙读书入仕的美好愿望使他分外注重对当时科政书、名人传记和诗文集的收藏,由此形成了自己富藏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实录、诗文集等的藏书特色。如天一阁早期收藏的明代地方志有430多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现存271种,涉及中国20多个省市,其中164种为海内孤本;收藏的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武试录等,现存约370种,占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1]由于收藏角度的独特及搜罗的齐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藏书的价值日益凸现,成为历代文人学士热切向往的“娜嬛福地”。天一阁藏书价值的逐步凸现是通过天一阁藏书的不断流布实现的。

(一)建阁早期的藏书流布

与其他藏书家一样,范钦十分珍爱藏书。为保藏书永存,他借鉴历代藏书楼屡屡毁于火灾的教训,取《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在月湖旁构建天一阁贮书,以水制火,又在“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以避虫害、收阴湿。^[2]此外,他还在晚年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但范钦并非一味地将藏书束之高阁,在不损害藏书的情况下,他也十分重视对藏书的利用,他的一些举措,客观上推动了天一阁藏书的流布。

(1)刊刻藏书,开天一阁藏书流布先河

范钦从政时就已刊刻藏书,归里建阁后,更致力于聚书、刻书等文化活动。据考证,范钦及其长子范大冲共刻书32种^[3]。在当时所刻的书上,留有姓名的写工和刻工多达30多人,可见刻书之盛。所刻书中有范钦利用藏书自著的《奏议》4卷、《古今谚》1卷、《天一阁集》32卷。特别是综合性丛书《范氏奇书》包括范钦亲自校订的《乾坤凿度》、《周易古占法》、《孔

子集语》、《两同书》等20种珍藏,是我国较早为私人藏书家刊刻的综合性丛书^[5]。此书残本至今仍珍藏于天一阁、国家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及中国台湾、日本等地的十余家藏书机构,说明范氏藏书流布范围也辐射到了海外。

(2) 与其他藏书家相约互抄书籍

藏书借抄互抄是历代藏书家增加私藏的重要手段,更是藏书流布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藏书借抄互抄,可使一家所藏的珍本典籍化身数种,分藏数家。范钦藏书的一大来源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主动提出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与范钦藏书互抄的远不止这两家。范钦在《吹剑录外集跋》就云:“是书,余借之扬州守芝山,抽闲录之,四日而就。”^[6]既是互抄,范钦当然也允许其他藏书家前来借抄。由范钦编订的抄本《嘉靖事例》现藏国家图书馆,书中有16处范钦同时代藏书家郑晓父子的藏书印,可见此书是当年郑氏从天一阁抄录而去^[7]。尽管我们无法考证天一阁究竟有多少典籍是通过互抄的方式流布于世,但据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8]。可以想见范钦通过藏书相互抄借而流布出去的藏书绝非个别。沈一贯也在《少司马范东明八十序》云:“翁益购天下奇书藏之,而复取不经见者副墨以广同好,于是四方又争受范司马嘉惠。”^[9]

(二) 清代早中期的藏书流布

天一阁自范钦死后,封闭甚严。阁中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10]。但到了清代,以浙东大儒黄宗羲登阁阅书为起点,天一阁藏书流布渐入佳境。

(1) 名人登阁

康熙十二年(1673),浙东大儒黄宗羲被允许登楼,成为建阁后登楼的第一位外姓人。此后,方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一批名贤硕儒相继登临天一阁。这些名贤硕儒的登楼对天一阁藏书的流布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由于登阁者多兼有学问家和藏书家的双重身份,他们除利用天一阁藏书著书立说外,还抄录珍本为己所藏。他们撰写了一系列对天一阁的评介论著,表彰天一阁的藏书之精粹、世守之功绩。如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全祖望的《天一阁藏书记》和《天一阁碑目记》等等。他们还对天一阁藏书进行整理,编制目录,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广为传播的目录。如黄宗羲除“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余之书日遂为好事者藏之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眷写去者不知凡几”;全祖望搜金石旧拓,首次为天一阁收藏甚富的碑帖编目;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称“余自督学至今,数至阁中翻所藏书”,并编制了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钱大昕也编制了《范氏天一阁碑目》。黄宗羲等名贤硕儒登阁后的所为使天一阁藏书在深藏200年后广为流布。从此以后,“四方好事,时来借钞”。^[11]

(2) 光燮传抄

范光燮(1613-1698)系范钦四世孙,康熙十五年(1676)恩贡,同年至入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嘉兴府学训导。范光燮是一位学者兼藏书家,他曾“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泽”,又“读书其中,披阅探索,深得精一奥旨”。在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范光燮应嘉兴府学之请,从天一阁抄录藏书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所抄多为经部类典籍。这是继范钦之后天一阁藏书史上传抄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抄书活动,对天一阁的藏书流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2]

(3) 懋柱进呈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1773),为纂修《四库全书》,清高宗数度下诏在全国范围进行图书搜访征集。考虑到江浙向来人文渊薮,私家藏书之风甚盛,他特别要求征访包括天一阁在内的江南私家藏书最富之家。以范钦八世孙范懋柱为代表的范氏后人应诏进书,进呈天一阁书籍641种,共5762卷^[13],其中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有377种^[14],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天一阁献书质量之高、数量之多,朝野震动,得到了清高宗的多次褒扬奖励。清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旨中明确指出“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15],并于同年特颁旨嘉奖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后又赐给《平定回部得胜图》和《平定金川图》各一套。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云,《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者为数不少。进呈四库是古代天一阁藏书的最大一次流布。

(三) 近现代非正常流布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的大环境下,天一阁的命运急转直下,珍藏了300多年的藏书在范氏家族的眼皮底下,通过多种非正常途径无可奈何地流布出去。仅损失惨重的有以下几次:

(1) 道光被掠

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入侵宁波,外国传教士闯进天一阁,掠去《一统志》及舆地书数十种而去。

(2) 咸丰被抢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宁波,守天一阁的范氏子孙逃乱他乡,附近游民乘乱从阁后墙垣潜运阁书,论斤出售。其中部分为江北岸天主教堂的洋教士所得,部分为钱塘丁丙、丁申兄弟收藏,更多的是卖给奉化一造纸厂做造纸原料^[16]。

(3) 民国被盗

民国3年(1914),宁波乡人冯某伙同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窃书,历时数十日,盗取

1000余种善本书,多为宋元明别集,明季杂史次之,地方志、试士录约100余种,运到上海的书铺出售。科举录及明季史料辗转卖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保存在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内,但后来全部被毁于日本人的轰炸。余下的典籍中,上海滩洋人及上海、苏州藏书家有少量收藏,别集流入北平图书馆。同时,由于范氏家道中落,已无力维持天一阁的日常管理,藏书楼破败不堪、楼内虫鼠肆虐,藏书在损毁之余也有少量流入社会^[17]。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天一阁藏书仅存原藏书1.3万余卷和《古今图书集成》8300余卷。^[18]

二、天一阁藏书流布的文化影响力

从范钦建阁藏书到新中国成立后化私为公,天一阁作为私家藏书楼历时400年,原藏书由最初的7万余卷减少到13000余卷。其藏书流布既有范氏家族的主动所为,又有迫于社会大环境的被动流布。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藏书流布,都对天一阁自身及中国文化特别是藏书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天一阁藏书流布对天一阁自身的影响

尽管天一阁藏书自范钦后就低调自守,秘不示人,但范钦父子的藏书流布活动却一直昭示着天一阁藏书之富。黄宗羲等一批道德高尚、学养深厚的大学者对天一阁的大力褒扬和对天一阁藏书不遗余力的流布,不但使天一阁的藏书价值得到了空前的挖掘,也使世人在天一阁200年后终于认识到天一阁藏书的魅力。天一阁从此声名鹊起,成为江南著名藏书楼。四库进呈后清高宗对天一阁数次轰轰烈烈的褒奖与回馈,终于使天一阁一跃而为“海内第一私家书楼”,成为我国私家藏书楼的典范。因此,天一阁藏书的流布过程其实也是天一阁从偏于一隅的藏书楼逐渐成为“海内第一私家藏书楼”的过程。但另一方面,所谓树大招风,随着天一阁藏书价值在流布过程中的逐渐显现,严格的家族管理制度根本无法抵御不良之徒对天一阁藏书的觊觎,从而导致了天一阁藏书史上的一次次“书厄”。四库进呈本有去无回,特别是历代经历的数次被动流布,使天一阁藏书损失惨重。如果不是后来的化私为公,天一阁藏书势必也与其他私家藏书楼的命运同样烟消云散了。这是藏书流布给天一阁带来的最严重的效果,是那些为天一阁藏书流布不遗余力的先贤们所无法预见到的。

(二)天一阁藏书流布对中国学术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繁荣的影响

藏书的价值在于利用,但天一阁严格的家族管理制度却使普通学者难以登阁阅览。然范氏家族的刻书传抄、对海内学者有选择的开放、四库全书的纂录分贮,乃至由于非正常因素散落海内外各家等藏书流布活动,使天一阁藏书化为天下之藏书,给天下学者有了阅读使利用天一阁珍本典籍的机会,这对推进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谓近水

楼台先得月,天一阁藏书流布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更加明显。先后登阁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是闻名海内的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他们学识渊博、著述浩繁,在史学、文学、科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惠及今人,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浙东学派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天一阁藏书的流布密不可分。梁启超有言:“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19]天一阁丰富的珍本秘籍为他们广罗史料,著书立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首位破例登阁的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他在阁中博览群书数月之久后著就了《明文海》等多部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登阁阅书之时,正值他主讲甬上证人书院期间。甬上证人书院由黄宗羲创立并长期主讲,目前发现在书院经黄宗羲授业的有姓名的浙东学派士子65人,书院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清代浙东学派得以形成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黄宗羲在天一阁汲取的思想精华无疑会在他讲学的点点滴滴中渗透给浙东学人们。天一阁藏书流布对中国藏书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繁荣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天一阁藏书流布对中国藏书文化尤其是浙东藏书文化繁荣的影响

天一阁经黄宗羲等著名学者的褒扬和清高宗大张旗鼓的嘉奖,一跃而为“海内第一藏书楼”,这是藏书流布给天一阁带来的最大荣耀。天一阁藏书保存几百年无损的奇迹令世人叹为观止,其藏书楼的制式,严格的家族管理方式,防虫、防湿、防火方式,甚至庭院构筑、楼名寓意等被认为是天一阁藏书世守之原因,因而成为上自皇家下至民间藏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乾隆按天一阁的建筑布局和书柜款式建南三阁和北四阁度藏四库全书。阮元在其《书藏条例》中仿天一阁“书不出阁”,规定“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等等,中国藏书文献中诸如此类效仿天一阁的记载不一而足。其实天一阁藏书能世代相传,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后世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并未使他们的藏书传之久远,但天一阁在藏书流布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魅力却是中国任何一个私家藏书楼所无法比拟的,她对藏书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也是中国私家藏书楼中绝无仅有的。

天一阁藏书流布对浙东藏书文化繁荣的影响尤为深远。早期登阁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浙东大儒本身就是家藏甚富的大藏书家。他们登阁后都曾借抄天一阁的稀世珍藏。黄宗羲遍抄天一阁等江南藏书诸家,并把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续钞堂”。全祖望“弱冠时登范氏天一阁……遇稀有之书辄借钞……及放归,重登天一阁,借钞不辍。”^[20]他购乾道《四明图经》不得,在天一阁见《四明文献录》“全引其书,为之狂喜,乃别为抄而出之”^[21]。他们对天一阁藏书的借抄无疑大大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藏书。天一阁书楼形制也为浙东藏书家模仿得最为淋漓尽致。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宁波卢址抱经楼,无论内部结构还是

外观,均与天一阁一模一样。更值得一提的是,浙东文人学士爱惜藏书、传承文化的人文主义品格在天一阁藏书流布过程得到了极佳的诠释。范氏后代恪守祖训,世守藏书,世间罕有,人所共仰。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刊刻、传抄、进呈秘藏,直至最后向国家捐赠秘藏、化私为公,这种使一家藏书为天下所共用的流布行为,更是体现了一个藏书世家爱惜藏书、传承文化的人文主义品格。自清朝直至新中国成立,大多数登阁的浙东学者在利用阁藏的同时,主动整理阁藏,编制书目。特别是在近现代,当天一阁藏书面临非正常流布,总会有浙东文人学士挺身而出,维护阁藏。在民国兵燹不断、范氏后代无力管理天一阁的非常时期,以冯贞群为代表的地方贤达四出募捐,修缮书楼,编制整理藏书,在日寇入侵及时转移藏书免遭洗劫。如果没有他们的倾力护书、尽心保阁,天一阁的命运不堪设想。浙东文人学士在保存和流布天一阁珍本典籍、延续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铸造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卫者。

(四)天一阁藏书流布对当代古籍收藏单位的启示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古人云“纸寿千年”,更何况还有天灾人祸的侵蚀,所以才自黄宗羲才会发出“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唱叹。但古籍收藏的最终目的是为利用,因此,关于在保护古籍的基础上实现古籍的流布利用这一命题,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和已化私为公的现代古籍收藏单位有相通之处。综观天一阁藏书流布的得失,笔者以为,现代古籍收藏起码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

(1)促进正常流布

应采取多种手段开展积极主动的正常流布,在充分挖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前提下,借助外力,邀请专家学者利用藏书、整理藏书,采用刊刻影印、缩微扫描等多种形式使所藏古籍化身千万,为学界所利用,为大众所共享。

(2)杜绝非正常流布

应制定严格管理制度保护古籍,培养有责任心的人员,避免古籍在借阅过程中的遗失和古籍被盗等非正常流布。

(3)形成藏书特色

应借鉴范钦的藏书思想,克服功利主义和盲目跟风倾向,根据本单位的古籍收藏状况确定收藏重点,持之以恒,尽力追求收藏重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形成本单位真正的古籍藏书特藏,以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利用藏书,最大限度地流布所藏古籍。

参考文献:

- [1]张传保等.历代本县藏书纪事,[A]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府县志辑[C].上海:上海书店,1993

- [2]金涛.新编天一阁书目序[A].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C].北京:中华书局,1996.
- [3]袁枚.小仓山房诗集[A].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戴光中.天一阁主——范钦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5]骆兆平.天一阁刻书考[A].骆兆平.天一阁丛谈[C].北京:中华书局,1993.
- [6]骆兆平.天一阁丛谈[C].北京:中华书局,1993.
- [7]徐的.范钦与《嘉靖事例》[A].天一阁文丛(第二辑)[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 [8]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C].北京:中华书局,1996.
- [9]沈一贯.曙鸣文集[A].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A].全祖望集汇校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1]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A].全祖望集汇校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2]骆兆平.天一阁丛谈[C].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3]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C].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4]虞浩旭.历代名人与天一阁[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 [15]袁逸.钦点天下第一楼——乾隆与天一阁独特关系探析[J].津图学刊,2002,(4).
- [16]骆兆平.天一阁丛谈[C].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7]骆兆平.天一阁丛谈[C].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8]骆兆平.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前景[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2).
-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20]严可均.铁桥漫稿[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1]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图书馆)

明抄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的重要学术价值

宋家钰

【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天圣令;天一阁;天圣令;学术价值

天一阁珍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点校、图录本,经各方共同努力协作,终于正式出版。这不仅为唐宋历史的研究,也将为我国经济史、法制史和唐代中国、日本及东亚各国古代法制的比较研究,开辟诸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和前景。

我国古代法制,至隋唐之际(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发展形成以律、令、格、式组成的多达百卷、有六七千条文的严密法制体系,被国外学者称之为在古代亚洲地区有广泛影响的“中华法律文化”的代表。在此之前数十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编纂的集古代《罗马法》大成的《国法大全》法典60余卷,于公元528至533年相继完成并颁布施行。古代东西方世界在相近时期产生的这两大法典,都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是世界法律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来的值得重视的共同财富。然而遗憾的是,唐朝的法典,除《律》尚存外,令、格、式在元、明以后亡佚无闻,这导致我们长期不能正确、全面认识和评价包括唐朝法制在内的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和构成,产生诸如中国古代法制是“以律为主”(即以刑律为主)等误解。

日本古代在大化元年(645)开始的“大化革新”,仿照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国家。至大宝元年(701),日本正式制定了沿袭于唐《律》、《令》的《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唐开元六年)又在《大宝律令》基础上修订成《养老律令》,于天平宝字元年(757)施行,其有效施行时期约有200余年。《养老令》在后世有所散失,其大部分见于现存的天长十年(833,唐大和七年)编注的《令义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古代明法家惟宗直本集诸家解说于元庆四年(880,唐广明元年)修成的《令集解》。^[1]

日本幸存下来的《养老令》,由于许多条文是直接袭用或参照《唐令》制定的,这就为复原《唐令》提供了可能。最早利用《养老令》进行《唐令》复原研究的,是日本著名学者中田熏先生。1904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唐令和日本令的比较研究》,^[2]主要研究了唐日《令》中

三篇重要令文《户令》、《田令》、《赋役令》，开启了唐日法制比较和《唐令》复原研究的先河。20多年后，仁井田升先生在中田熏先生的指导下，遍阅中日典籍，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唐令》复原研究。他于1933年完成并出版搜罗宏富、考订详博的《唐令拾遗》巨著，共查找、复原《唐令》715条，约为《唐令》1500余条的二分之一。这不仅是日本汉学界的重大成就，也是对我国唐史、古代法制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唐令拾遗》出版后，其他日本学者也纷纷进行《唐令》复原研究，并对《唐令拾遗》提出许多修改、补充意见。仁井田升也拟新编《唐令拾遗补》，但他未能完成，就于1965年病于伦敦，次年逝世。为实现他的未竟遗愿，池田温教授等六位学者，汇聚中、日等国学者50余年的研究成果，历经十多年的精心考订、编辑，完成《唐令拾遗》的修订、增补，1997年正式出版《唐令拾遗补》。^[2]这部1500页的宏著，可说是上世纪《唐令》研究近百年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为今后各国学者研究《唐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唐令》的研究，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在很长时期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唐令拾遗》出版后几十年，国内许多图书馆都未收藏，因此很难见到。加之日文阅读上的障碍，在我国唐史、法制史、经济史研究论著中，利用此书成果的也就极其稀少。我国改革开放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恢复和发展，日本学者的《唐令》研究成果，受到我国学者较大的关注和重视。1989年，由栗劲等将《唐令拾遗》译成中文出版，^[4]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相继被翻译或介绍至国内。这对我国《唐令》的研究都极有帮助。

《唐令》复原研究虽获得上述重大成就，但其复原所据的基础主要是各类传世典籍中的《唐令》逸文，因此各篇令文大都不完整，许多条文有缺略或非原文文字。尤其是经济方面，令文未能复原的尚多，这使《唐令》研究仍存在很大遗憾。1998年，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发现明抄本《官品令》十卷，实为北宋《天圣令》，后附的《令》为唐《开元令》，^[5]这使《唐令》的复原和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明抄本《天圣令》，据天一阁一些学者的考证，2001年笔者在该馆的考察，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的点校、整理，其概况如下：

据有关记载，《天圣令》原书为30卷，现存抄本为后十卷，是范钦当年雇人抄写的诸书之一。从抄本封面题签上的“贞”字推测，原抄本可能依元、亨、利、贞次第，分装成四册，现存抄本为第四册。其正文首页起自“《田令》卷第二十一”，册后无尾页。从内容看，最后11页抄的是第三十卷《杂令》。根据末页已抄满文字而语句不全的情况分析，可能没有抄完，或是装订时就已缺失尾页。抄本现存111页，不计空白页、行，实存文字2078行，约4万余字。从抄本所录令文格式和保存唐宋时期行用的俗字、古字分析，当是本于《天圣令》原书的传抄本。也就是说，它虽是明抄本，却基本上保存了《天圣令》当年制订和颁行时的原貌。但因辗转传抄，文字讹误、脱漏甚多，有的因抄者补抄漏文而造成错行、错页和改变条文次第。经

课题组的点校、整理后统计,这十卷《天圣令》共存12篇,293条令文。其各篇后附的末行用《唐令》,共有221条令文。两者合计,共有令文514条。由于《天圣令》基本上是参照《唐令》制订的,课题组已参据《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和有关史料,初步将其中的269条复原为《唐令》,只余有24条未能复原。加上各篇后附的《唐令》221条,共计有《唐令》490条,近4万字,约为《唐令》原文1500余条的三分之一。其中《田令》、《赋役令》、《捕亡令》基本上全部复原,其余各篇多数仅有两三条尚未复原。这使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唐令》后十卷12篇的全貌,这对《唐令》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天圣令》抄本各篇后附《唐令》来看,基本上是《天圣令》参用过的《唐令》条文都被删除。但因《天圣令》有的条文的制订是参用《唐令》两条或两条以上条文,有的只参用《唐令》某条的部分内容,故《天圣令》的条文数目、条文次第及条文内容,与被删除的《唐令》条文不是完全对应的。也就是说,《天圣令》有些篇的条文顺序与《唐令》原篇的顺序可能不一致,有的被部分参用过的《唐令》条文仍附留在后。此外,抄本所录各篇令条之外,据《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和课题组的复原研究,已可确证遗漏少数《唐令》条文,如《通典》卷二记载的开元二十五年(737)《田令》中的屯田条文。这是原书遗漏的,还是后世传抄遗漏的,有待研究。

抄本《天圣令》封面题签写作《官品令》,这是后世传抄者不知原本书名,而将第一篇《官品令》作为书名。宋初法制沿袭唐制,抄本《天圣令》的原名应为《令》或《天圣令》。唐朝的四种法典,本名为《律》、《令》、《格》、《式》。如敦煌文献中的一件《永徽令》残卷⁶就题作:

令卷第六东官诸府职员

但因历次修订,为便区别,遂在《律》、《令》、《格》、《式》前加上修订时期的年号,如《永徽律》、《永徽令》、《开元令》、《开元格》等。到北宋时代,可能主要留传下来的是开元时期修订的《律》、《令》、《格》、《式》,唐朝其他时期修订的基本上逸失,于是自宋以后,较多的称这些留传下来的唐朝法典为《唐律》、《唐令》、《唐格》、《唐式》。⁷如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七到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三《经籍考》中著录的《开元令》,就都作“《唐令》三十卷”,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注中所引《开元令》、《式》,也多称《唐令》、《唐式》或《唐制》。《天圣令》后附各篇《唐令》,据戴建国先生的考证和“课题组”的研究,可以确定是《开元令》,其所据本应当是上述典籍著录的在宋、元时期尚存的《唐令》。

《天圣令》抄本的发现,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汉代简牍、敦煌文献是无价之珍的话,《天圣令》抄本仅文物方面的价值也不在它们之下。《唐令》的原貌,我们仅在敦煌文献中见到少数片纸残篇。《天圣令》抄本使我们重见《唐令》、《宋令》本貌,它虽是明代抄本,实际应被视作北宋孤本而使学术界倍加重视其价值。

《罗马法》学的研究者曾将《罗马法》的发展史分为习惯法、成文法、成文法发展、法典

编纂四个时期。查士丁尼主持编纂《国法大全》法典时期,属于法典编纂时期,也就是《罗马法》发展的最成熟时期。我国古代法制从何时开始由成文法发展阶段进入法典编纂阶段,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不论是认为从《秦律》、《汉律》的编纂或是从《晋令》的编纂开始进入法典编纂时期,显然都早于《罗马法》的法典编纂时期。唐朝法典则是集历代法典编纂的大成,不仅超越前代,影响后世,且成为“东方法制史的枢轴”^[9]。《天圣令》抄本比较完整地保存了12篇《唐令》、《宋令》,这不仅有助于从法学思想、理论的角度全面研究中国古代法典编纂的方法、结构、历史,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存在的我国古代法制是“以刑律为主”的观点,从而能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包括唐代在内的历朝法制体系。例如,构成《罗马法》核心和主体的物权法的三个重要部分——物权、继承权、债权,我们在唐、宋两朝法典中也可看到这类反映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规定,只不过它具有中国古代法制独有的特点,没有《罗马法》那样详密、烦琐和诸多复杂的物权转移形式。在物权方面,唐《田令》规定,土地所有权通过买卖方式转移,必须双方呈牒官府,核准后,从一方的户籍上削除,在另一方户籍上登记,始能生效。这是为了限制土地买卖而作出的规定。对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如奴婢、马牛等的所有权通过买卖方式转移,则在唐、宋《关市令》中规定,双方必须在国家设置、管理的“市”内,两和市卖,由官司审给市卷,确认其合法。这两类所有权的转移,法律均明确规定私契无效。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称为“地主”、“田主”,拥有奴婢、马牛等所有权的人则称为“奴主”、“马主”或“牛主”等。“主”在这里就表示物主对其物拥有所有权。同样,在继承权方面,《唐令》、《宋令》中有清楚的法定继承(应分财法)和遗嘱继承(户绝法)的规定。《罗马法》是到查士丁尼编纂法典时期,才完全确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而在唐、宋《丧葬令》中,都明确规定死者所有资财,“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这显然是沿袭汉魏以来的继承法,不是唐朝才开始有此规定。至于债权法方面,主要在唐《杂令》中分别规定。例如,出举财物、麦粟等,令文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但月息不得过六分,积利不得过一倍,负债人如逃亡,由“保人代偿”。唐朝的法典无疑主要反映了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但私人财产权利也有清楚的规定,不能认为它只有“公法”而无“私法”。

任何国家的古代法典,都是现存社会关系也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冲突的法律表现。利用经济法规来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是古代历史研究首先注重的最准确可信的史料。但在我国古代史籍中,经济制度的记述大多简略,使我们难以了解其全貌和整体运作过程,产生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在30卷《开元令》中,与国家政治体制和军事制度有关的规定,主要编纂在前20卷,与经济、司法、医政等有关的规定,主要集编在后10卷。《天圣令》是参照《开元令》修订的,有关经济、司法方面的法规,仍编在最后十卷。唐朝管理和统治民户的三大重要法规,除《户令》外,《田令》、《赋役令》皆在其中。《开元令》最后十卷

12篇令文,《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共复原295条,其中有不少令文是不完整的;抄本《唐令》加“课题组”复原的《唐令》共有495条,各条令文基本上是完整的。《唐令》、《宋令》中的这些经济法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有管理公田、官田、私田的土地法,征敛赋税、徭役的赋役法,管理仓储、国库的仓库法,管理关、津出入境和市场交易的关市法,管理城市、路桥、水利工程的营造法,以及管理官私牧场、传驿交通的厩牧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宋代以前比较完整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主要经济制度的法规,也是我们首次能确切了解古代国家如何管理复杂庞大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法规。这使我们有可能比过去更深入全面地研究唐朝和北宋初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解决一些长期不清楚或争议不决的重要问题。例如,这次全篇复原的开元《田令》,可说是迄今为止在宋以前的古代法制中,唯一见到的完整的土地法规。它主要由官民受田、官田和军事屯田三部分的规定组成,我们以往所称的“均田制”,实际仅是官民受田部分的法规,它既与经济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有别,也非土地法的全部。在中、日学界研究讨论几十年的“均田制”中,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是民户土地的还受和“均田制”是否施行。在本书中复原的开元《田令》第二十七条“收授田”条有一段清楚的规定:

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

此段令文不见于《通典》等书,只有《令集解》卷一二“授田先后”条集解中的《穴记》引了此句《唐令》。仁井田升先生考证《穴记》等注释书所引《唐令》基本上是开元七年(719)《令》。^[9]池田温先生据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订正《穴记》等所引《唐令》应为永徽以后、开元三年以前的《唐令》。^[10]现在明抄本开元二十五年(737)《田令》“收授田”条中一字不差地有《穴记》所引这段《唐令》,证明它承续了唐初以来的规定未作修改。以往研究者出于慎重,很少采用《穴记》所引这段令文。实际上它对解释民户土地的还受具有决定意义。根据敦煌户籍上33户田籍记载统计,平均每户仅有土地44亩。这就是说,绝大多数民户占有的土地都远未达到每丁百亩的最高限额。户内如果有人老或死亡,他们的土地按照上述规定,实际上都是“先听自取”,户内继承,一般不存在退田问题。^[11]这说明抄本开元二十五《田令》篇,因其令条的完整而为我们正确阐释均田制的疑难问题提供了可能。

除了经济法规,抄本保存的其他令篇,也有很大的价值。近70条唐《狱官令》和近60条天圣《狱官令》,为我们了解唐朝和北宋的审判制度、监狱管理、刑罚执行等,提供了丰富、准确的古代司法史料。《丧葬令》、《假宁令》则将唐、宋法制的法与礼结合的特点很鲜明地表现出来。尤其珍贵的是,一向缺少记载的我国古代医事制度,因《天圣令》抄本中存有唐、宋两朝的医疗保健法规——《医疾令》,使我们得以了解其梗概,知道当时的临床分科已有大小方脉科、疮肿科、伤折科、产科、眼科、口齿科、针科、灸科等13科之多。正是由于统治者对医政医教的重视,在中央和地方都建立医疗机构、药材采种制度和严格的培养、考核、选

拔医务人才的教学制度,才促进唐宋时期官、私医学的繁荣发展,涌现出众多医学著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天圣令》虽然行用时期短暂,它仍是唐至北宋之际诸多失传的重要古代法典之一。唐宋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要变化时期。《天圣令》由于是较多参用《唐令》编纂而成,不仅对《唐令》复原研究和北宋前期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唐宋之际法制、经济等制度演变历程的研究,更有无可比拟的意义。通过《唐令》与《宋令》的比较,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具体地看到,哪些制度未承唐制,哪些制度经唐末五代至宋初,已有变化。其中,大至土地法规的根本改变,小至丧服礼制的细微差别,《天圣令》都为我们提供了准确分析的珍贵史料。

《天圣令》抄本的发现,也将对中日古代法制比较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课题组在此次点校《天圣令》抄本和《唐令》复原研究中,对唐日《令》的关系和异同问题就获得更深的认识。中田熏、仁井田升先生当年复原《唐令》各篇时,主要是依从《养老令》的条序,但后来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像《田令》、《赋役令》等篇,《养老令》可能改变了《唐令》的条序,主张应从《通典》。我们将抄本保存的《唐令》12篇与《养老令》现存相应令篇比较结果,除今本《令义解》辑录的《仓库令》、《医疾令》两篇逸文外,其他各篇均证明二者条序基本相同。毫无疑问,《唐令》条序的复原主要应参考《养老令》,而《养老令》逸失的《仓库令》、《医疾令》条序也因有《天圣令》抄本能够得到正确的复原。在内容方面,《养老令》修改、删除的主要是一些不适合日本情况的《唐令》条文,其他许多条文基本上沿袭《唐令》,部分作了简化、合并、拆分。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养老令》源出于唐的《永徽令》,后来可能参照开元三年以前的《令》做过某些修改。^[2]如果是这样,抄本中的《开元令》与《养老令》的相同部分,可能是它承袭《永徽令》以来的规定没有更改,不同部分有的是《养老令》根据日本情况所作的修订,有的则可能是开元三年以后所作的修订。例如,牧马牛几岁别群问题,《令集解》引《令释》注,日本古代是“以游牝年为别群”,即依牝马四岁、牝牛三岁游牝年为别群。《令集解》同时又引《古记》注:“案《本令》,至四岁别群也。《开元令》:牡马牡牛,每三岁别群。”^[3]《古记》所引《开元令》文与抄本《开元令》文相同,说明开元以前的《唐令》原规定是“四岁别群”。《养老令》此条的实际执行,可能就参用了开元以前的《唐令》和《开元令》,综合为“以游牝年为别群”。仅从这些方面来看,《天圣令》抄本对《唐令》和《日令》的研究都至为重要,其中许多问题,有待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合作、深入探讨。

我国学术界不仅对《唐令》研究不足,对《养老令》及其注释书的研究尤其欠缺。时至今日,像《令义解》、《令集解》这些对唐朝法典研究有重要价值的书,从未在国内出版过。课题组此次点校《天圣令》抄本,许多讹误、脱漏字句及断句,主要就得益于《养老令》和这两部注释书。例如,护送蕃客、囚犯的“防援”,抄本有的就误抄为“防守”,根据《令义解·军防令》的注释,我们知道其义是“防护”,多派遣兵士担任。又如“便附”,抄本有的误抄为“便付”,

根据《令义解》、《令集解》的有关注释,我们明白“便”指“便使”,“附”指“附送”文书。其他许多当时使用的特殊词语,如抄于白纸、未钤朱印的“过所”(通行证)副本称“副白”,不牢、不真的货物称“行、滥”,医师受考核的医经学识和临床疗验称“法、术”等等,因有《令义解》的注释,我们就易理解其含义。在解释《唐令》的一些法律用语上,尤其表现了日本古代明法家们对唐朝法典的精深造诣。如前引唐《丧葬令》中规定的“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令义解》的注释对我们了解唐朝的继承法就非常重要:“谓:证验不相须也。言虽无证人,而亡人署记足应验据,及虽署记不在,而证人分明者,并不用此令。”^[14]这与《罗马法》中“私式遗嘱”的两种确认方式——自书遗嘱和口述遗嘱基本上相同。这都说明,我国今后开展《唐令》研究,对《养老令》及其注释书的研究和唐日《令》的比较研究应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以上仅从个人识见所及,对《天圣令》抄本整理研究的有关问题略作评介。我们深信,随着本书的问世,两部法典的丰富内容和学术上的意义,必将因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讨而得到更深广的阐释彰显。

注释:

[1]《令义解》、《令集解》两书,均收入日本《国史大系》。参见新订增补国史大系[C],吉川弘文馆出版,1980.普及版。

[2]中田熏,法制史论集(第一集)1970.

[3]池田温,唐令拾遗补编纂刍议[A].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C]汲古书院,1986;唐令拾遗补·序[A]唐令拾遗补[C]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

[4]栗劲等编译,唐令拾遗[C].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5]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3)宋代法制初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6]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S.3375号[Z]英藏敦煌文献(第五卷图版)[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7]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序论[A],最早称唐朝各时期修订的《令》为《唐令》的当是日本《令集解》所引《占记》、《穴记》、《令释》等注释书.

[8]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序[A]池田温,《唐令拾遗》后跋[A]

[9]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序论[A]

[10]池田温,唐令拾遗补(第322页正误,补订)[C].

[11]宇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八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12]井上光贞,日本律令的成立及其注释书[A].井上光贞等编,律令[C]岩波书店,(日本思想大系本),1980.743~810.

[13]令集解(卷三八)[C]“牧每牧”条集解。

[14]令义解(卷九)[C]《丧葬令》“身丧户绝无亲”条义解。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

黄正建

受天一阁博物馆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承担了天一阁藏明抄本宋《天圣令》(以下简称为《天圣令》)的整理工作。从整理工作开始,课题组就多次开会,确定分工,讨论整理的指导思想和《凡例》等。初稿完成后,课题组又针对课题组成员各自点校的《令》文,逐条进行讨论,力求将错误率降到最低。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整理本。以下,就这个整理本以及整理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做几点简要说明。

一、《天圣令》自被发现后,学界瞩目。为集中优势力量,充分发挥不同学者的专业素养,特作了适应各学者特点的点校分工,名单如下:

| | |
|-------|------|
| 《令》 | 名点校者 |
| 《田令》 | 宋家钰 |
| 《赋役令》 | 李锦绣 |
| 《仓库令》 | 李锦绣 |
| 《厩牧令》 | 宋家钰 |
| 《关市令》 | 孟彦弘 |
| 《捕亡令》 | 孟彦弘 |
| 《医疾令》 | 程锦 |
| 《假宁令》 | 赵大莹 |
| 《狱官令》 | 雷闻 |
| 《管缮令》 | 牛来颖 |
| 《丧葬令》 | 吴丽娱 |
| 《杂令》 | 黄正建 |

此外,天一阁博物馆的贺宇红、袁慧、王宏星、饶国庆、许晟也参加了点校工作。

二、唐宋《令》久已佚失,较完整的《令》文存世极少,因此这次发现的《天圣令》就成了《宋令》的海内孤本。尽管它是残卷,又是明抄本,但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宋令》(《天圣令》)的原貌。为让学界加深理解该《令》的原状,并据以判断点校整理工作的成败优劣,课

题组决定将整理本分为校录本和清本两个本子。

校录本完全照原文移录,即使有错简错字,也不径改,而将正确者括于要改的字下,或在校记中说明。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读者对校录的文字有疑问,可以迅速回查到影印本原文,以便复核。

清本吸收了校录本中所有的改正成果,按正确的《令》文条目顺序,满行誊录。若有疑改疑补疑删之字,在该字下括号内注出拟改拟补拟删者,并加问号。由于抄本错简严重、错字甚多,阅读清本,可以较方便地了解点校成果。换言之,清本可说是课题组整理出来的一个《天圣令》的善本。

三、《天圣令》残十卷(以下称《天圣令》,均指现存十卷的《天圣令》残卷)表面看抄写整齐、字迹清楚,实际则与许多明抄本明刻本的弊病一样,问题很多。简单说来,抄写《天圣令》的书手第一不懂所抄内容,第二态度不认真,因此错字、漏字、衍字比比皆是。更有一行抄到后面发现少一字,就随便将其添上的情况发生。例如《厩牧令》“宋十”条:

后主识认勘当知实有还其本价

其中的“有”,推测就是抄手抄漏了,发现后即随意补上,以致文意不通。正确的应是:后有主识认,勘当知实,还其本价。

再如《仓库令》“宋十”条:

其外官及京兼任官外官者

其中倒数第四个“官”字,也是抄手发现抄漏后随意补上的。正确的应是:其外官及京官兼任外官者。

其他类似的情况还可举出许多。甚至有些双行小注,抄手乱抄一气,致使语义不可解。《杂令》“唐二”条小注“若因事故停子弟内闲解家及亦取有者同色”就是这种乱抄的典型。就整篇而言,抄写最乱的是《营缮令》。全《令》大概有三个半页完全抄错了,以致《令》文前后颠倒、混杂不一。

上述问题使得《天圣令》虽然只残留十卷,但整理起来难度很大。这也是课题组在整理过程中不断讨论不断修订的原因。经过反复讨论,避免了许多点校上的错误,但未发现或难解决的问题可能还会存在。

四、《天圣令》为海内孤本,无其他版本可作“对校”,整理时只能以“本校”及与其他存世典籍的“他校”为主。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天圣令》是《宋令》,即使“他校”,按理也应使用宋代典籍。但是点校的实践证明,宋代典籍中可校《天圣令》者甚少。南宋《庆元令》虽存有许多与《天圣令》相同或相似的《令》条,但《令》文差别很大,即能用《庆元令》来校《天圣令》者亦甚少。相反,由于《天圣令》源自《唐令》,《唐令》与《天圣令》的相似程度倒要远高于《庆元令》与《天圣令》的相似程度。因此,现存的《唐令》条文(如《通典》、《唐会要》、《唐律

疏议》所引者,以及《唐六典》所记述者)应可以成为校改《天圣令》的依据。同样,由于日本《养老令》也是在《唐令》基础上修成的,研究表明,《养老令》与《天圣令》的相似程度,也高于《庆元令》与《天圣令》的相似程度。因此,《养老令》也可以成为校改《天圣令》的重要依据。换言之,《天圣令》虽是《宋令》,但由于其源于《唐令》的独特性质,致使可以用《唐令》和日本《养老令》来做点校依据。

但是在具体行文时,课题组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可以直接用《唐令》或《养老令》校改《天圣令》。另一种则认为《天圣令》终究是《宋令》,《唐令》和《养老令》既然不是宋代典籍,就只能参改,不能作直接根据。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校录本在不同《令》的校记中,对使用《唐令》或《养老令》来校改《天圣令》中的《宋令》(此指《天圣令》中标明“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条文,下同)部分,会有不大相同的行文。比如有的直接写“据改”;有的则写“据文意与《唐令》(或《养老令》)改”;还有的不出现“据(《唐令》或《养老令》)改”字样。虽然校正的结果一样,但这种行文的的不同反映了课题组成员不同的点校思想。

五、与上述不同观点相似,在点校《天圣令》中《宋令》部分时,如何使用《宋刑统》和《唐律疏议》,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持“《宋令》应用宋代典籍点校”观点的学者主张在点校《宋令》时,若点校所据文字同时见于《宋刑统》与《唐律疏议》,应先引《宋刑统》,后引《唐律疏议》,写作“《宋刑统》如何如何,《唐律疏议》同”。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宋刑统》源自《唐律疏议》,因此只能先写《唐律疏议》,后写“《宋刑统》同”。这也是涉及点校理念以及对唐宋典籍看法的问题,一时无法统一。好在它对点校结果没有本质影响,也只好两种行文方式并存了。至于不写两书“同”的《宋刑统》中的文字,表明该文字仅见于《宋刑统》而不见于《唐律疏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宋刑统》中所引的《令》是不是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从点校实践看,《宋刑统》所引(不见于《唐律疏议》之)《令》,许多与《天圣令》不同。它与《天圣令》的相似程度还不如《养老令》与《天圣令》的相似程度高。由此或可证明,《宋刑统》所引的那些不见于《唐律疏议》的《令》中,有一些很可能不是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是晚唐、五代或宋初《令》。同时更可证明《养老令》与《天圣令》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在使用《宋刑统》所引《令》进行点校特别是复原《唐令》时,要取一种十分慎重的态度。

六、“诸”字问题。一般认为,唐宋令每条令文前应以“诸”字起始。但《天圣令》许多《令》文前都没有“诸”字。那么是漏抄了还是原本就没有?点校实践表明,确有漏抄现象,如《杂令》“唐八”条“在京诸司”前就漏抄了一个“诸”字。但有些则可以肯定原本就没有,如《丧葬令》“宋一”到“宋四”条,在“先皇”、“皇帝”之前,应当没有“诸”字。此外,《天圣令》令文若以机构起头,如“太常寺”、“太府寺”(《杂令》)、“宫城”、“太庙”、“三京”(《营缮令》)、“京都”、“翰林院”(《医疾令》)多无“诸”字。这是否是一个规律?由于《天圣令》是残本,相关证据不

足,因此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凡无“诸”字的《令》文,若遇其他令文相同或相似处有“诸”字者,补上;若无类似情况,存疑不补。

七、避讳问题。宋代避讳甚严,《天圣令》也不例外。点校实践表明,《天圣令》不仅在《宋令》部分避宋讳,在《唐令》(此指《天圣令》中标明“右令不行”的条文,下同)部分也避宋讳。所避者主要有:玄(悬)、征、通、弘等。我们的处理方案是:在《宋令》部分不回改,仅在校记中说明;在《唐令》部分用括号将正字注于避讳字下,并在校记中说明。从道理上说,《天圣令》既是《宋令》,无论其中的《宋令》部分还是《唐令》部分都不应回改,以符合《宋令》原貌。我们这样处理,一是为区别《宋令》和《唐令》,二也是为了有助于读者对《令》文的理解。

八、异体俗体字问题。虽然我们在《凡例》中规定了一律使用繁体正字,但不同时代的正字有所不同。唐宋时的正字到现代可能变成了异体字。因此,如何把握这一标准十分不易,实践起来也很难整齐划一。现在我们的处理办法是:若文字两通的话,按原文照抄,涉及的字主要有“唯”和“惟”、“已”和“以”、“匹”和“疋”、“准”和“準”、“舡”和“船”等。其他习见的形误字或手写形变字(即俗体字),均径改为正体字,不再说明。

九、在校录本和清本之后,我们还作了《天圣令》复原为《唐令》的工作。其内容是各《令》的点校者根据相关史料,将《天圣令》中的《宋令》部分复原为《唐令》。这种复原含《令》文条目顺序的复原和《令》文文字的复原。复原的结果以论文形式展示。复原后《唐令》全部内容的清本,以《令》为单位附在各篇文章之后。

从复原实践看,要想准确、完整地复原出《唐令》,困难相当大。比如条文顺序的复原,虽然从理论上说,《天圣令》中的《宋令》部分加上《唐令》部分就应是完整的《唐令》了,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中不仅有几条《唐令》合为一条《宋令》,以及几条《宋令》本属一条《唐令》的情况,也有《宋令》只取《唐令》部分内容,而将剩余内容舍弃不录,或将剩余内容仍附抄于后等不同处理。将《唐令》插于《宋令》的何处,也令人颇费脑筋。有些《令》逻辑清楚,分类明白,插入比较容易,而有些《令》原本的排序就很混乱,这些《令》的插入工作就具有很大的推测成分。

文字的复原也是如此。有些《宋令》由于找不到相应史料,从而无法复原成《唐令》。对这些《宋令》,我们只能暂不作强行复原。即使那些已经复原的《唐令》,虽然大部分复原都有确实证据,但有些也不一定是《唐令》原文,例如据《唐六典》或《新唐书》等复原的文字就是如此。还有一些复原文字含有一定的推测成分:例如由《天圣令》与《养老令》的大致相同,我们可以断定《天圣令》中某条《宋令》确是《唐令》,但到具体文字时,若《天圣令》与《养老令》有所不同,又无其他数据比较,就很难作取舍。为了保持《令》文的完整性,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只能根据制度、文意、用词方式等(甚至没有任何理由)选择其中的一种表达。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唐令》的复原是一项非常复杂、需要较长时间并作艰苦努力的工作。虽然我们力争在前人成果(主要是《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天圣令》给予的新资料尽量进行复原,但终因时间有限,工作可能做得不很完善。此外,由于各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因此在《唐令》复原中,我们没有对论证形式强作统一。在大致相同的框架内,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是我们将《唐令》复原以论文形式刊布的原因。凡此种,都需要在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唐令》复原,没有明确指出复原的就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因为除《田令》等《令》外,有些《令》似乎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稍有不同。还有,我们的《唐令》复原虽然原则上只复原《天圣令》中的《宋令》部分并将《唐令》部分插入,但也有些《令》文的复原者补上了一些不见于《天圣令》的《唐令》。这些令也很难说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因此为谨慎起见,我们在复原时一般只称其为《开元令》或《唐令》。至于所复原或所补充的各条《令》文到底各自是何时的《唐令》,仍需要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天圣令》是一部学界瞩目的重要佚书,篇幅虽不大,但内容丰富,涉及唐宋时期的诸种制度和礼俗,点校和复原都十分不易。我们虽然已经下了很大工夫,但错误必不可免,诚恳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及其保护经过

袁 慧

【摘要】 本文以历代天一阁书目为主要依据,考述阁藏宋代珍贵法律令典《天圣令》的仅存残篇《官品令》之文献价值及其缺失原因、保护经过。

【关键词】 官品令 政书 保护过程

天一阁珍藏着明白棉纸乌丝栏钞本《官品令》一册,是学术界原以为久已湮没的宋代法律典籍《天圣令》的硕果仅存残篇。清初以来,一些著名学人曾为天一阁编纂过的一系列藏书目录,以及具有全国规范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均将《官品令》作为单独的职官法典,因此误导了不少读者,认为它只是天一阁收藏的一册史部职官类之书而已,以至是书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长久被人们所忽视。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对该钞本进行了缜密考证,指出是书真正名称不应该是《官品令》,而是修定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929)《天圣令》的一部分,作者为参知政事吕夷简和大理寺丞庞籍等。故天一阁藏所谓《官品令》的真正书名应是《天圣令》。^[1]此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政法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同。为避免混淆及方便行文,以下仍沿旧名,称是书为《官品令》。

—

《官品令》30卷,明乌丝栏白棉纸钞本。是书半页十行,每行19至20字,小字双行注,版框宽14.3厘米,高20.5厘米,白口,白尾,四周单栏(末有23页为黑尾,四周双栏)。首页右下方钤“范氏天一阁藏书”朱文方印(朱墨极淡)。未编页码,纸捻装订。全册共112页(末页无文字),约3.5万余字。封皮书签题楷书“官品令”,下端题小楷“贞”字。现存十卷:田令卷第二十一、赋令卷第二十二(卷末题“赋役令卷第二十二”)、仓库令卷第二十三、厩牧令卷第二十四、关市令卷第二十五(捕亡令附)、医疾令卷第二十六(假宁令附)、狱官令卷第二十七、营缮令卷第二十八、丧葬令卷第二十九(丧服年月附)、杂令卷第三十。

书签下端“贞”字为书册号,系出自周易乾卦词“元亨利贞”,古人常用来做书橱、书籍、

器物等编号。据此推断,阁藏《官品令》原来足本应为“元亨利贞”四册,现仅存第四册“贞”;前三册的装订形式与封皮书签题名亦如第四册,并在书签下端分别题小楷“元、亨、利”表示书册号。以“贞”册为依据匡计,全四册约有450页14万字。

那么该部典籍的名称为何未用《天圣令》而用《官品令》呢?通常古籍书名多以正文卷端或书名页、版心所题等为依据,但并非一概如此。有不少书籍正文卷端及版心所题为分卷名,也有版心根本不题书(卷)名的。特别有许多官书文件,既无书名页,亦无序跋题识,封皮后即为正文。有可能是当时范钦所雇用的抄书者将《天圣令》首卷官品令误作该部宋代法典的全称,而范钦因其是内部所抄录资料,尚未摆上重刊日程(天一阁是当时南方私人版刻事业卓然成家者之一),故未及正名。当然这仅是我的推论而已。

《天圣令》的修订是在唐旧令框架内进行的,即使不用的唐令也以附录的方式进行保留,因此阁藏《官品令》里存有不少《唐开元二十五令》的原文^[2]。唐宋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比较昌盛的时代,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深刻影响着后世。在唐宋600多年历史中,统治者曾纂修过数量众多的法律典籍,如唐《律》、《令》、《格》、《式》、《格后敕》,宋《编敕》(据《宋史》记载,宋代纂修的《编敕》就有80余部之多)、《刑统》、《令》、《格》、《式》,等等。然从严格意义上讲,现存世的唐宋法典仅《唐律疏议》、《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以及天一阁所藏明钞孤本《官品令》等数部而已,是书价值可见一斑。

二

《官品令》是一部常人难以接触和觅得的官方法律文献,然多数藏书家的收藏观主要不外乎两方面:其一讲究版本价值,喜欢宋刻元槧;其二崇尚儒学正统,重视阐发圣贤之道的著作,对法典之类书籍不甚关注。《官品令》的存世,多亏范钦慧眼独具。范钦从其多年从政、治军的实践出发,非常重视法律、邸抄、揭贴、招供、奏议等政书文献的重要意义,“历年既久,咸成珍本,堪称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顾廷龙语)。

范钦自嘉靖十一年(1532)考取进士后,任州府以上官职近三十载,先后担任过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府、九江兵备副使、广西布政使参政、福建提刑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中州省政及学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潮、汕等地)、兵部右侍郎等官职,因此离不开法律典籍。他深知娴熟运用法律条文,了解各朝之间法制的内在联系,是朝廷官员的应具素质。由于范钦当代所编的几种天一阁藏书目录均已失传,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范钦究竟藏有多少诸如此类的书籍,但从清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所编的天一阁书目来看,明代及明代以前的职官类、政书类之书就有196部,均是明刻本及钞本。如《唐六典》、《宋刑统》、《职官分纪》、《宪纲事类》、《翰林记》、《吏部四司条例》、《六部

条例》、《嘉靖新例》、《藩府政令》、《军令》、《文武敕割》、《莅阡典要》、《哨守条约》、《漕运议单》、《兵部武选司条例》、《考功验封条例》、《催征钱粮降罚事例》、《礼仪定式》、《万军门勘处夷情》、《船政》、《营规》，等等。范钦本人还在军旅之暇、政务之余编订过《嘉靖事例》三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1]范钦在《嘉靖事例》中辑录了明嘉靖朝经济方面事例80余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体现了明代法制建设所达到的水平，是研究明代经济和法律制度颇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献。

三

无可置疑，当时范钦雇人抄录的《官品令》为全四册30卷。尽管天一阁禁约森严，范氏后人对藏书保管兢兢业业，恪守职责，订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但由于历经沧桑，累遭兵燹盗窃，以及被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巧取暗窃，还有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范氏家族藏书在将近四百年中还是累遭损失，其中《官品令》也一样。《官品令》命运如何，我们不妨从现存阁藏有关书目中作一个比较分析：

嘉庆十三年（1808）浙江巡抚阮元主编《天一阁书目》十卷时，尚称《官品令》30卷完整无缺，并将其归入史部·职官类。

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为浙江布政使，当年秋季，他命人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后人称《刘目》）十二卷。这次编目有其特殊原因，即在鸦片战争英军侵占宁波期间，天一阁藏书曾遭劫掠，“英吉利既撤兵，宁波天一阁藏书有为掠去者。刘氏闻之，乃登阁重编书目”。^[2]刘喜海当然不会自己亲自动手，在他主持下，由府学教谕汪本具体负责编纂。此目仅有钞本传世。刘氏纠正了阮氏的分类失误，因为所存各令内容俱在，它是一部法律典籍，将其归入职官类显然不妥。刘氏在《天一阁见存书目史部·政书类》中明白无误地注明：“《官品令》10卷，乌丝栏钞本，缺，不著撰人名氏，存二十一至三十，原目（《阮目》）不载。”

紧接鸦片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进驻宁波，天一阁成了马厩，大批珍贵古籍被作废纸原料流往奉化棠岙造纸作坊，后虽追回相当一部分，其损失之巨仍难以估量。光绪四年戊寅（1878），宗源瀚（字湘文）任宁波知府，为了检点两次战乱中天一阁藏书损失情况，他特地聘请学府训导何松（字映松）等三人重编《天一阁书目》，历时六月稿成。此稿编纂比较仓促，仅有稿本而未曾刻印（目前阁内已无存）。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薛福成任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又命当地学者钱学嘉（字念劬，贡生，曾任候补道员及民国期间参政院参政）、董沛（光绪三年进士，《明州系年录》、《甬上宋元诗略》等书作者）、张美翊（字让三，副贡生，曾任候补直隶知州）三人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后人称《薛目》），计四卷，首末二卷。书版初存崇实书院，后归天一阁保

管。《薛目》著录该书的保存情况与《刘目》相符，只是又将它归入史部·职官类。

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多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战争等，“兵燹后完善者鲜，今于全者注全，缺者注缺，兼注现存若干，以副命名之意。现存书不及旧目十之四”。^[5]

民国3年(1914)窃贼(受人雇用的专业惯偷)薛继渭潜入阁中大肆盗窃，潜伏经月，按图索骥窃取阁藏图书，致使善本古籍大量散出。“迨知觉，已去大半”。这批书约一千多部，全部运沪，由上海几家古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孤本明白棉纸钞本《宋刑统》就在里面。后蒋氏书散，一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其他科举文献及明季史料等，则归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沪战时被日机炸毁。越四年，又一次遭其他窃贼光顾，损失令人痛心。

民国年间所编的书目有缪荃孙(光绪二年进士，授职编修，充国史官总纂)《天一阁失窃书目》、林集虚(书贾、藏书家)《目睹天一阁书目》及冯贞群(甬上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天一阁书目内编》，此外还有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编纂委员会编)、《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编)，其中《官品令》条著录与《刘目》、《薛目》无甚区别，只是分类偶有职官或政书之差异而已。

从上述书目中可以知道，这部珍贵的宋代法典钞本在嘉庆十三年(1808)时还是完整无缺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编目时，已缺失“元、亨、利”三册(卷一至二十)，可见《官品令》前20卷无疑是在1808年至1847年的40年中流失的。推测尤其在1840年至1847年期间流失的可能性最大——其间，经历了鸦片战争。

同时，上述书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自刘喜海编目后的一百余年中，阁藏典籍虽又历经风雨劫难，但幸存的最后十卷《官品令》一直完好地保存至今。

四

天一阁藏书在漫长的兴盛起落数百年中，最终还是抱残守缺，^[6]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天一阁全盛时期藏书总量达7万卷左右，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范氏原藏书(不包括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只保留下来1.3万多卷。1949年以后，天一阁有关工作人员又千方百计访归原藏之书3000余卷。尽管如此，阁中明代地方志、科举录以及《官品令》等这批劫后幸存的典籍仍不失为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

天一阁藏书为何能保存久远？后人为它总结了多条经验：

一曰重视防火。其实，防火的重要性，绝大部分藏书家都是懂得的，并不是范钦一人的独到之见。明代藏书家胡应麟有藏书“十厄”之论，亦是把防火放在首位。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乃是比较玄的哲理性说法，源于郑玄《易经》注及道教的“太乙生水”的教义。借

用此义之目的，无非是提醒人们要时刻高度重视防火而已。难道只要书楼上面用了一统间，底层分割成六间就可消弭火灾了吗？倒是四周环植竹木，住宅与藏书处隔离，阁前凿池蓄水，严禁携带一切火种接近书楼，才都是防火的有效措施。

二曰重视防潮防蛀。数百年来，范氏后人向以传统方法保护藏书：书中夹芸草辟蠹鱼，树下置英石去潮湿，并于每年伏季进行大规模曝书（通风晾书、掸拂尘灰、检查蠹鱼），但这些传统方法效果有限。

三曰管理措施严格。尽管范氏族人格守职责，订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比范钦稍后的祁氏澹生堂的书约，规定得更为具体，它对“读书、藏书、购书、鉴书”的一整套做法，是比较完备的。但这些仍是属于枝节性措施，还没有抓到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

若加以细究深察，实有其更重要的原因和规律在焉。简言之，有以下几点：

1. 范钦临终前立下“代不分书”的规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其道理很明显：分家就无法使藏书保持集中，愈分愈细、愈散，形不成优势。在范钦以前有“南楼北史”，还有丰氏“万卷楼”，晚于天一阁的有全氏“双韭山房”，卢氏“抱经楼”，徐氏“烟屿楼”，蔡氏“墨海楼”，等等，都没有很好保存下来。至于“书不出阁”的规定，也是相当重要的。范钦经过深思熟虑，把这个最难的问题处理妥善了。他的长子范大冲是贯彻执行“代不分书”的关键性人物。他能体念老父亲的苦心孤诣，担起重责。他将藏书这份特殊产业定为家族共有，首先从自己名下财产中拨出一部分田地产充作公产，其田租收入专供维护藏书楼之费用。其次，由他牵头制订严格的禁约，并使之具体落实。范氏后人，都能深明大义，如范汝楠、范光文、范光燮、范正谔、范懋柱、范邦绥、范邦甸、范多枢、范玉森、范若麒（一名鹿其）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保护好、利用好天一阁藏书作出过有益贡献。所以，天一阁家族藏书楼能基本完好地保留至今，范氏家族中许多有识有功之士的贡献不能忘记。

2. 遇有兵燹变乱，即由地方长官牵头，重新核对编目，及时弄清缺损情况，不因系范氏族产而放任不管。

3. 凡散出之书，千方百计予以追回，选派族中有办事能力的代表，复争取官方和地方社会热心人士大力支持。如边葆诚知府就为追回范氏流失之书发过公文^[7]，冯孟颢先生更是出个人之财，尽个人之力为天一阁访归佚书。新中国成立之后，天一阁前辈工作人员数次访求散佚在全国各地之书，效果甚为显著。

《官品令》一书的保存历程，不由令人想到藏书之不易，特别是私家藏书。一部（册）珍贵古籍能保存下来，首先要被有目光的收藏者所赏识，了解它的收藏意义，然后要有良好的保管条件和可行的制度，还要有忠实的执行者（包括继承者）。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更须

有赖于社会的安宁。如果内忧外患频仍,外敌人侵,内部动乱,藏书就要遭劫,盗贼屑小也会乘虚而入。这也证明了梨州先生那句关于藏书的名言——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近数年来,阁藏法典《官品令》的学术研究和文献资料价值日益得到学术界、政法界的高度重视,认为《天圣令》残篇不仅是了解北宋典章制度和人口问题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而且对于唐史研究,尤其是唐令的研究和复原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整理、出版校注本和天一阁原藏印影本《官品令》,既方便学术界和政法界的深入研究,亦能促使广大读者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法制文化,使阁藏珍贵的古代法律文献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服务于社会。

注释:

[1]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3).

[2]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3).

[3]钞本,目前已被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该书全10册,杨一凡、田涛主编,戴建国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资助出版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级项目。

[4]冯贞群.刘氏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案[A]引自郑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C]

[5]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卷首·凡例[A]

[6]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范钦第十一世孙范多枢(一名彭寿)跋云:“今吾阁中之书乃洊经丧乱而巍然独存,复得先后官斯土者数贤大夫为之屡捐廉俸修葺栋宇,编刻目录,俾吾子孙抱残守缺,世世永宝。”

[7]范多枢在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中跋云:“咸丰辛酉,粤匪(太平军)踞郡城,阁既破残,书亦败亡。于时先府君(彭寿之父邦绥)方避山中,得讯大惊。……闻书为洋人所得,或卖诸奉化紫岙造纸者之家,急借资赎回。……有其散在他邑不听取者,则赖郡守任丘边公葆诚移文提贖,还藏阁中。”

参考文献:

[1]阮元主编.天一阁书目(嘉庆刻本)[C].嘉庆十三年天一阁藏.

[2]刘喜海主编.天一阁见存书目(钞本)[C].道光二十七年天一阁藏.

[3]薛福成主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刻本)[C].光绪十五年天一阁藏.

[4]缪荃孙编.天一阁失窃书目(钞本)[C].民国年间天一阁藏.

[5]林集虚编.目睹天一阁书目(钞本)[C].民国年间天一阁藏.

[6]冯贞群编.郑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民国铅印本)[C].民国年间天一阁藏.

[7]中国古籍善本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该书目共经、史、子、集、丛五部,于1985年10月至1996年12月间陆续出版完毕)

[8]骆兆平编.新编天一阁书目[C].北京:中华书局,1996.

[9]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J]历史研究,1999,(3).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

论范氏家族藏书立家的文化谋略

徐建成

【摘要】 本文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

【关键词】 天一阁；藏书；文化；谋略

范钦家族，是甬上城西范氏的一个支族。《甬上族望表》曰：“城西范氏，宋丞相范宗尹之后也。兵部侍郎钦，一望。”然而，不但范钦家族藏书，城西范氏其他同族也藏书，而且里中闻名。如“卧云山房”范大澈、“落迦山房”范汝梓，^[1]“羲亭”范永祺。^[2]所以，明清甬上藏书，必推范氏。

事实还不仅仅如此，城西范氏同族在明清时期共出过13位进士，这是甬上其他望族所不能抗衡的。这一文化现象，迄今未引起研究者重视，对范钦藏书文化的揭示也是一个最大的忽略。本文以此为突破，来阐释范氏家族藏书立家之宏大谋略。

一、藏书使范氏家族后来居上，成为甬上第一望族

据地方志等有关资料，城西范氏，本不是甬上最为重要的家族。一首在16世纪中叶甬上广为流传的歌谣是这样唱的：屠公甲第隔江涯，甬上人推四大家，恰比宋朝论士族，楼丰史郑亦同夸。这“四大家”是指明代甬上四大家族：江北屠氏、镜川杨氏、槎湖张氏、西湖陆氏。但是不管宋四家，还是明四家，皆为藏书世家。他们对宁波地域文化的原创和发展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这对范钦来说，想必触动、启示很大，藏书乃是望族文化立家之本。城西范氏，乃南宋丞相范宗尹^[3]的嫡裔之族。范宗尹(1101-1137)，字觉民，襄阳邓城(今湖北襄樊)人，年三十岁任丞相，^[4]为史上罕见。绍兴初为秦桧所排挤，落职知温州。绍兴六年(1136)，退居天台卒，年仅三十七。乾隆年间范上林《鄞西范氏宗谱序》曰范家有“三凤”，范钦(少司马公)，范镐^[5](宁国令海南公)、范钜^[6](常熟教谕中明公)。范钦(1506-1585)是一位有抱负之人，自以先人为榜样。明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27岁的范钦参加会试，中第一百七十八名，殿试取为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十八名。这是城西范氏自明以来考取的第一

位进士。之后,考取的进士按时间顺序依次如下:

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范钦堂弟范铉^[7]中进士;

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范钦侄范大濩^[8]之子、范大澈(1501-1562)之侄范汝梓中进士;

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范钦曾孙范光文^[9]、范钦曾族侄孙范光遇、光遇之侄范廷元^[10]同取进士;

清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范光遇^[11]之子范廷魁与族兄范廷凤同取进士;

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范大捷^[12]之孙范光阳^[13]中会元,授庶吉士;

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范光燮^[14]之孙、范正辂长子范从益中进士;

清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范光阳之孙、范廷谔之子范从律^[15]中进士;

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范从律之子范永澄^[16]中进士;

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范懋敏之孙范邦绥中进士。

以上包括范钦,城西范氏家族共考取进士13人。^[17]之所以如此,当归藏书之功。

范钦之所以藏书,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本文不再论述,不过其受家教影响也是不容忽视。范钦的祖父范訢(1450-1516),字诚甫,博览群书,文尚典雅。正德壬申(1512)贡,授江西饶州德兴县训导,以身表率,集诸生于舍而肄之。夜循廊察视灯火,旦起课文艺,程勤惰以为常。士感激淬砺,显庸者相继。后卒于官。范钦的父亲范璧(1480-1554),字伯瑞,少嗜学,几丧明(几乎双目失明)。居常笃人伦,乐施予,表善化愚,守义正身。

范钦的叔父范瑄(1487-1544),字伯良。范钦从小受其叔父影响也较大。范钦撰《祭切斋叔父文》写道:“某少也孱……叔父规诲引喻,靡间寒燠,某稍稍开悟,因缘随叔父校艺,叨举于乡;后某且举进士,服官中外,叔父寓书曰:‘尔毋黷货,毋昵势,毋小人是狎,毋虐无告,毋负尔君,毋斩尔养晦大父之泽,毋背尔父之教。’……某自以不敢逾佚,以至今日。”范钦的勤奋力学和品行成长皆出于此。

在明代,科举制度完善,考取进士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钦去世十年后,范瑄的小儿子、范钦堂弟范铉才得中范氏家族第二位进士。范瑄以子贵,赠刑部山东主事,加赠工部虞衡司郎中,晋赠奉政大夫。范钦之所以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携侄儿范大澈游京师,补为鸿胪寺序班,是因为他欲仿效张时彻送自己二儿子张邦岱(字儒宗)以太学生官鸿胪寺序班一样,让他的侄儿范大澈走上仕途之路。

藏书的作用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直到清朝初才得以发挥、实现。根据《鄞县通志》、《宁波市教育志》以及《四明谈助》、天一阁所藏有关家谱,对明清鄞县进士人数作逐一核对和分族统计,发现城西范氏家族后来居上,成为甬上第一望族。具体列表如下:

| 族姓 | 居地名 | 进士数 | 进士名录 | 获取科举头衔 (包括举人、贡生)的起讫年代 | 跨越年数 |
|----|-----|-----|---|--------------------------|------|
| 范 | 城西 | 13 | 范欽(1532)、范鈔(1595)、范汝梓(1604)、范光文、范光遇、范廷元(1649)、范廷凤、范廷魁(1655)、范光阳(1688)、范从益(1702)、范从律(1733)、范永澄(1766)、范邦绥(1856) | 1484-1874 | 391 |
| 陆 | 西湖 | 10 | 陆瑜(1433)、陆儒(1493)、陆健(1502)、陆僊、陆钊(1514)、陆钱(1521)、陆铨(1523)、陆泰(1533)、陆懋龙(1577)、陆世科(1607)、陆经正(1673) | 1433-1673 | 241 |
| 钱 | 芍庭 | 9 | 钱奂(1436)、钱璉、钱璠(1499)、钱峰、钱若賡(1571)、钱启忠(1628)、钱敬忠、钱肃乐(1637)、钱肃凯(1658) | 1436-1658 | 223 |
| 周 | 浮石 | 9 | 周原(1523)、周保(1571)、周应治(1580)、周应宾(1583)、周昌晋(1613)、周齐曾、周志畏(1643)、周斯盛(1661)、周在鱼(1664) | 1571-1776 | 206 |
| 屠 | 江北 | 8 | 屠隆(1577)、屠惟灏(1658)、屠鏞(1466)、屠侨(1511)、屠倬(1523)、屠惟灏(1658)、屠粹忠(1658) | 1371-1865 | 495 |
| 董 | 西城 | 8 | 董琳(1454)、董钥(1490)、董葵(1511)、董樾(1577)、董允忬(1664)、董允升(1616)、董允茂(1637)、董尔宏(1676) | 1454-1867 | 414 |
| 杨 | 镜川 | 8 | 杨守陈(1451)、杨守随(1466)、杨守陞、杨茂元(1475)、杨守隅(1484)、杨茂仁(1487)、杨承闰(1556)、杨德政(1577) | 1451-1639 | 189 |
| 张 | 高丽 | 7 | 张渊(1547)、张文辉、张文挺(1634)、张士甄(1634)、张起宗(1691)、张姚成(1775)、张姚锡(1835) | 1373-1836 | 464 |
| 张 | 槎湖 | 6 | 张时孜(1499)、张邦奇(1505)、张时彻(1523)、张懋贤(1514)、张子瑄(1541) | 1487-1646 | 160 |

| | | | | | |
|---|----|---|---|-----------|-----|
| 邵 | 竹洲 | 6 | 邵庄(1484)、邵城(1568)、邵仲陟(1655)、邵基、邵铎(1736)、邵洪(1771) | 1484-1844 | 361 |
| 袁 | 西门 | 6 | 袁孟悌(1487)、袁文显(1514)、袁祖荣(1553)、袁时选(1595)、袁时中(1667)、袁德达(1742) | 1487-1742 | 256 |
| 傅 | 五乡 | 5 | 傅金(1472)、傅乾(1496)、傅文藻(1562)、傅光前(1589)、傅邦翰(1898) | 1472-1898 | 427 |
| 黄 | 南湖 | 5 | 黄绉(1514)、黄景峨(1604)、黄象雍(1649)、黄斐(1670)黄绳先(1757) | 1514-1821 | 308 |
| 毛 | 半村 | 5 | 毛允宗(1397)、毛宏(1457)、毛麓(1474)、毛为光(1559)、毛永燮(1742) | 1370-1798 | 429 |
| 包 | 乌丰 | 5 | 包莘(1370)、包溥(1490)、包泽(1496)、包大耀(1559)、包旭章(1752) | 1371-1822 | 452 |
| 章 | 高桥 | 5 | 章绘(1439)、章规(1451)、章泽(1499)、章锐(1472)、章壁(1535) | 1439-1620 | 182 |
| 陈 | 姜山 | 5 | 陈英(1472)、陈瑞(1487)、陈钰(1532)、陈侃(1526)、陈治官(1652) | 1445-1743 | 299 |

进士4位以下的家族在此略作交待:凤滕水氏、古藤史氏、桃源戴氏、砌街李氏、南湖沈氏、君子营赵氏、广济桥黄氏等35家。

由此可见,范氏家族通过藏书,训练家庭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和技术性在甬上首屈一指。

二、藏书赢得官府的庇护,背名保护藏书安全

中国大多数藏书家,都寄厚望于子孙,希望他们能珍守并借以成名成家,维系书香。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般的家族藏书不过数传而已,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五代相传,已被人所钦羨。宁波范氏天一阁十三代薪火相传的历程更是被誉为中国藏书史上的“神话”。然而这一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在宁波,至今作为家族保护的藏书,传承最久的纪录并不是天一阁,而是明代丰坊万卷楼藏书。丰坊为甬上宋代藏书世家丰稷(清敏)的十五世孙,丰氏藏书从丰稷至丰坊历十六代,若从元祐年间(1086-1094)算起,到丰坊(1492-1653)晚年售给范钦止,^[18]历时470年左右。天一阁现任掌门人虞浩旭曾于1999年撰写《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丰坊万卷楼藏书》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笔者认为,天一阁藏书相传的方法很大程度吸纳和总结了丰氏家族藏书办法。但是一种独到的战略眼光却是丰氏家族没有的,那就是依附官府,得到官府的庇护,让藏书楼和书安全地传承下去。

1991年,沙老(沙孟海)曾访天一阁,笔者有幸参与接待。沙老喜见笔者,^[19]如同园丁见新苗。他曾言,浙东乃抗清复明之重镇,范家是如何来保全藏书楼无恙,应该是个研究的好课题,希望学子(指笔者)坐阁做好学问。时至今日,笔者针对沙老点拨,略有研究出一些端倪来。

明代甬上三司马:张时彻、屠大山、范钦。张氏之后、屠氏之后皆有人尽显反清复明之忠节。独范钦之后范光文在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便应试考取举人;顺治六年(1649)与堂弟范光遇同中进士。范氏家族没有一点反清的举动迹象。而甬上其他进士家族苟庭钱氏、西湖陆氏、西城董氏、镜川杨氏也都尽显忠节。难道读书人心中的精神圣地天一阁和守护的主人们真的失节了吗?难道万斯同没有对天一阁留下任何文字表述,原因就在于此吗?笔者真的不敢妄说。本文仅仅提出一种研究性的解释:范氏后人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了范钦既定的藏书方略,得到官府的庇护,确保藏书安全。

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楼和阁原本没有区别,后来有了区别。对藏书楼而言,“束之高阁”,阁更强调于藏。范钦建藏书楼时,心中就有了很高的起点,要让范氏后人成为职业藏书家。范钦生前在建设 and 守护天一阁整个过程中,始终与时任知府张正和、周希吉、曾镒、雷金科、吴道直、徐善庆、王原相^[20]、周良宾、游应乾等密切交往,范钦《天一阁集》中足以反映。万历年间,皇上不上朝理政。京城阅历颇深的范钦,已经预见到明朝的命运和气数。自己藏书楼的书质量、价值如何,范钦心中很清楚。(后来清乾隆诏修《四库全书》时,能够将96种天一阁藏书全本收录,就证明了这一点。包括现今我们研究的《官品令》、《嘉靖事例》等藏书版本,都证明天一阁不愧于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所誉“中国第二个敦煌石窟”。我们通常说的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并不是范钦藏书的核心,只是就现存而言,我们对天一阁新的评价。)如何确保藏书在朝代交替中的安全,范钦没有明言,只是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这八字,成为一种家族的意志,家族成员不可抗拒和违背。笔者认为,这八字,其内涵并不是我们现在常规的理解:家族相传。“书不出阁”,并不是外借利用;“代不分书”,也并不仅仅是家族成员分书。这八字,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含义是:即便战乱,朝廷变更,家族也不要因为保护藏书而分书,不能让书离开书楼。这样对天一阁藏

书命运来说,要么清政府全部把它销毁,要么清政府完整将它保留。从这点上说,范钦力求把自己藏书楼上升为官府藏书楼,以使自己的精力和心血不至于白费。

文化可以定义为“生存的统治和特有阶级的附庸”。天一阁之所以神秘,在清初期,范家相对于地方士绅望族,是孤立的。范光文很好地贯彻了范钦的精神思想,藏得住寂寞,藏得住荣辱。他力求让天一阁得到官府的庇护,所以他去考进士;同时他又要得到地方士绅望族的理解,所以他把自己的姐姐和妹妹分别嫁给了西城董家董天鉴^[21]和南湖林用圭^[22],也算是间接支持抗清了。

清康熙十二年(1673)范廷辅引导黄宗羲登天一阁事件,不应该简单视为一件破例登阁事件,而是一件具有政治性质的事件,所以才在天一阁藏书史中大书特写记录下来。它既是黄宗羲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也是范氏家族融入甬上文化望族的一种努力。而这件事情最直接的撮合人是官府,甚至具体地说是郡守邱业。邱业当时正着手纂修《宁波府志》,而范氏天一阁藏书给予了很大支持。邱业纂修《宁波府志》后来没有刊行,只有稿本。但是在清雍正八年(1730)曹秉仁主持纂修并刊行的《宁波府志》中,将“天一阁”纳入“古迹”篇中;在乾隆五十年(1785)钱维乔主持纂修的《鄞县志》中,将《天一阁图》插入首卷,并将天一阁标注于鄞县城池图中,这是其他藏书家藏书楼以及其他私家园林办不到的事。天一阁俨然已经成为官府眼中需要管理的文化设施。

在清雍正《宁波府志》府学乡贤祠的崇祀名单中有:范钦、范大溲、范钊、范汝梓、范大澈、范汝材、范光远、范光华、范大冲、范汝楠、范钜、范光遇、范廷元、范廷魁、范光文、范镐共16人,这又是甬上其他望族所难以奢望的。范家在清朝初期取得了甬上氏族文化的领导地位。

三、献书于君,等于献书于天下

清乾隆诏修《四库全书》,要求各地藏书家进呈图书。许多藏书家不敢献书,怕的就是文字狱。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目的也是全国人所尽知的,搜集销毁一部分明代书,巩固满汉文化统治。天一阁为什么敢于积极响应献书,不怕遭受厄运吗?笔者认为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本文仅仅浅述两个观点:

(一) 家族的策略

前文所述,既然天一阁得到了官府的庇护,官府介入管理天一阁藏书楼的行为也就产生了。依据各类考证资料,从康熙到乾隆时献书,由官府介绍而来登天一阁观书的人有很多,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并不是天一阁目前解说的那样,都是大学问者,不超过百人。范氏家族似乎拒绝不了官府。于是,范家想通过献书获得皇上恩授(甬上藏书家历来有献

书朝廷之举,南宋楼家、史家、元朝袁家都有,范家也仅仅是仿效而已)。让官府只有履行保护的职责,而不敢有随意观阅的造次。于是乾隆诏修《四库全书》要求各地进献图书,地方官府来跟范家商量献书事宜,范家也可掩饰了自己家族的策略,实现了献书行为。

(二)家族的无奈

以范懋柱为首的范氏家族,原本没必要献六百多种以上的书,这样本身是具有很大政治风险的。献那么多,这应该也是范懋柱的博弈。

望族性格在于文化基因相传的,自我复制总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当家族精英队伍产生之后,让家族落败的队伍也开始产生了。翻阅民国《范氏支谱》,我们可以明了这一点。自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范从律之子范永澄中进士后,范家喜欢读书求功名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才有了道光时候“烟酒切忌登楼”等诸多禁例(笔者承认范家禁例在道光之前也有,但没有道光时那样详尽,更为严厉)。范氏家族中甚至有人勾结官府,在登阁观看问题上逼迫范懋柱就范,从中谋取利益和好处。范懋柱护楼护书的压力可想而知。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依我们现在炒房地产的眼光看,范钦是当时炒精神房地产的投资人。因为当时盛于书籍产业,盛于“海上书籍之路”贸易,范钦由此著书、刻书。但是范钦当时藏书的短期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政治回报,以求东山再起。因为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之后,突遭小人弹劾,“回籍听命”,并非致仕告老还乡。范钦30岁在京城担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在负责紫禁城内外庙基建过程中,建成钦安殿、御花园和天一阁。嘉靖皇帝当时高兴,取天一生水之意,题写“天一之门”。范钦建天一阁,意在唤起皇帝的深刻回忆^[2],表达自己的一颗士人忠君之心和“闭门反省”的收获——藏书。

范懋柱献书,虽然违背了“书不出阁”祖训,却与范钦藏书初衷的政治意图相符,那就是藏书要为家族振兴、荫袭服务。所以,为了天一阁最精华的藏书不受损失,与其让地方官府逐渐蚕食,不如献于皇帝。再加上自己应试不中,甬上其他望族崛起,范懋柱献书于皇帝,或许可能获得一官半职,延续范家在甬上的文化地位。

范懋柱献书后,真正成就了天一阁的辉煌。这恐怕是他策略不及的。乾隆皇帝褒奖赐书于天一阁,并仿天一阁建皇家藏书楼“七阁”,使天一阁屹立于国内私家藏书楼之首。还不仅如此,乾隆皇帝采纳了江南硕儒、士子的建议,续缮三部,分藏在文化发达、文人荟萃的江浙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鼓励士人就近抄录传观。这使范懋柱“献书于君”的行为,达到了“献书于天下”完美结果。

事实上,乾隆帝也有意成就天一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下诏追谥前明忠贞之臣,甬上有钱肃乐、张苍水、董志宁、杨文瓚、屠献宸、袁斌、王瓚爵、周志畏、任斗枢、王翊、黄嘉鸾等13人得谥。褒奖天一阁与追谥甬上忠贞之臣似乎是同步的,极大地安抚了浙东百姓的

心,也使天一阁真正在甬上文化望族中建立了居高的地位。甬上所有文化人都开始呵护天一阁了,范氏家族藏书立家的文化谋略得到了最好的实现,正如何凌汉^[24](“清代书法四大家”之一何绍基的父亲)题撰的楹联“世泽长期子姓贤”^[25]。

注释:

[1]范汝梓,字君材,万历甲辰(1604)进士,范大漉之子,范大澈之侄。博学有名。授工部主事,知南漳府。所藏之书与司马公范钦、鸿胪略等。著有《落迦山房集》。

[2]范永祺(1727-1795),字凤颀。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好收藏明代及清初名人尺牍,自顾辅名儒忠臣文人逸士及闾阎方外无不收录。《国朝书献类征初编》卷439。

[3]《宋史》卷362有传。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

[5]范镐,范钦叔父范瑀之子。嘉靖丁酉(1537)举人。

[6]范钜,范钦叔祖父范諲之孙,嘉靖乙丑(1565)恩贡,常熟县学训导。

[7]范飏,字宣卿,号印山,万历乙未(1595)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四川参政。

[8]范大漉,字子尹,号海东,范大澈的弟弟。生平弹孝极友,邻族多被其周恤。闻似道《宁波府志》。

[9]范光文,字潞公,范钦曾孙,授礼部主事,主陕西乡试,里人高其义。公复购所未被备增储之。

[10]范廷元,字抡三,与叔范光遇同登顺治六年(1649)进士。

[11]范光遇,字逢年,少贫力学。顺治六年(1649)进士。

[12]范大捷,字子谦,诸生。精医,尝游维扬,于望诊、切脉有独到之处。出疗人疾,先往邻族、贫家,而后及舟车只迎,致贫病者常携药而往,不另取资。《国朝书献类征初编》卷484。

[13]范光阳,字国雯,康熙二十七年(1688)会元,授庶吉士。知延平府。著有《双云堂诗文集》。

[14]范光燮,字友仲,晚号希声老人。范廷辅,范光燮之子。盛房。

[15]范从律,字希声,范光阳之孙,范廷谔之孙,雍正癸丑(1733)进士,知山东商河县。

[16]范永澄,号半村,范从律之子,乾隆丙戌(1766)进士,嘉兴府教授。

[17]袁慧《范钦评传》引清乾隆年间稿本《鄞范氏族谱》“范永观,字和宇,雍正进士。”笔者认为,依据不足,没有计算在内。

[18]丰坊晚年得“心疾”,放诞任气,所藏宋槧本、抄本,被门生辈窃去十之六七,后复遭大火,所存无几,最后将幸存之书籍珍帖及月湖碧沚住宅尽售于天一阁范钦。

[19]笔者与沙孟海先生有三次照面,笔者毕业于杭州大学,沙老为杭州大学教授。笔者爱好书法,私淑情结于此。

[20]王原相,广东番禺人,进士,授中宪大夫,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1569-1573)任宁波知府。“隆庆五年岁次辛未季冬末(公元1572年1月)吉旦”,王原相为天—阁藏书楼题额,书颜体“宝书楼”三字。

[21]董德偁,字平子,学者称为天鉴先生,东林四先生之一,多次帮助张苍水抗清义军,四子皆学于梨洲之门。董家与张苍水家族也有姻亲关系。

[22]林用圭(1613-1665),为林祚隆之子宏珪(一作弘珪),崇祇己卯副车,父子并受江上一官。与张苍水交往至深,《甬上三忠遗墨》其中一方为张苍水遗札“弟自奉简书还越……”,此札应为《与林用圭书》。

[23]嘉靖皇帝建钦安殿,与大礼仪政治事件有关。

[24]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一字仙槎,清道州(今湖南省道县)人。嘉庆十年(1805)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一生历任吏、户、工三部尚书,为人处世严谨不苟,办事严明公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文安。

[25]此楹联上半句为“天章特奖图书富”。

参考文献:

- [1]徐兆崙著,周冠鸣等校注.四明谈助[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
- [2]袁慧.范钦评传[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 [3]虞浩旭.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丰坊万卷楼藏书[N]中国文物报,1999-10-20(3).
- [4](加拿大)卜正民著,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1).
- [5]王雄.明朝科举殿试探析[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6]黄俊官,黄明光.关于明代科举考试试卷的探讨[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 [7]鄞县志[Z].
- [8]林丽月.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J]师大历史学报1992.(20).
- [9]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J]东方文化,1978,11(1).
- [10]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A]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
- [11]夏明华主编.宁波市教育志[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

论天一阁藏书社会化的动因与现实意义

王宏星

【摘要】 创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由范氏家族薪火相传,延续十三代,创造了中国藏书文化之奇迹。但它最终由私家藏书实现向社会化转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其动因与现实意义,寻找藏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关键词】 天一阁;藏书文化;社会化

宁波天一阁创建于明嘉靖年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创始人范钦年轻时即开始聚书,其后裔薪火相传,历时十三代,延续四百余年,藏书曾逾七万卷,创造了藏书文化之奇迹。中国历史上藏书楼为数不少,但能世代相传的则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多数藏书楼都如过眼云烟,要不了多久,就相继委谢,藏书荡然无存。康熙十二年(1673),著名学者黄宗羲作为外姓第一人登上了天一阁。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写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这是黄宗羲对藏书难而发自内心的慨叹,也是对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发出的由衷敬佩。天一阁从建立到黄宗羲登阁不过一百多年,要是他能知道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天一阁及藏书仍然得到妥善的保存,不知他又发出怎样的慨叹?但一百多年间只有一位学者登上天一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是由其私有制所决定的。

范钦收藏最具史料价值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在其收藏之初也是普通书籍,是比较容易收集的,然时过境迁,这些书籍至今反被作为古籍善本而列入珍贵文物范畴。范钦建造的天一阁也早就成为藏书楼的经典建筑,清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了天一阁之价值,并把其建筑模式应用到官方建造的藏书楼中去。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都是仿制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的藏书楼。由此,天一阁藏书楼得以名扬海内外。藏书与藏书楼的成功,还在于范钦及其继承者儿子范大冲制订了一整套保护管理的制度和规则,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世代相守,绵延不绝,成为私家藏书楼的典范。那么,是什么原因

促使它逐渐向社会化转变呢？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天一阁藏书楼社会化的动因与现实意义，寻找藏书文化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天一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私有制性质的藏书楼与其公益性目标之间的矛盾

天一阁作为一个私家藏书楼，它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其封闭性与保守性。“在私有制社会里，书籍作为私有财产，保守是绝对的，开放是相对的”。^[1]这种封闭性、保守性对保护藏书、防止散佚是有利的，但对藏书的利用、知识的传播则是不利的。因为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读书，是为了从中获得知识，通过藏书把前人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传授给后人。这种知识传授过程必然带有社会性、开放性、公益性，就需要把藏书尽可能地开放展示。但当封闭性、保守性的藏书手段与开放性、公益性的藏书目的产生矛盾时，换句话说，就是当私有制性质的藏书与公益性的藏书目标相对立，这对矛盾日益突出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必然要促使矛盾一方向另一方转变，这无疑是天一阁藏书楼走向社会化的动因之一。

二、范氏后裔的衰落是天一阁社会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家族在其延续过程中，总会有兴有衰，范氏家族也不例外。到上世纪30年代，范氏后裔已经非常式微。当时有一位著名学者陈登原先生登上天一阁，阅览了藏书。他在《天一阁藏书考》一文中认为：“范氏藏书，自有明嘉靖以来，已历四百年。今虽空虚寥落，非复昔比，然私人藏书安得久而不散？范氏所幸，积岁如斯，尧卿侍郎复何憾耶？但子孙式微，不克绳其祖武，则今日之残卷，殊难授与保存之责之，……谋残卷之收藏久远者，非翻弦更张不可也。”^[2]确实，陈登原先生是有远见的，他看到了范钦私人藏书不可能久而不散，近四百余年来积岁，对范氏来说是幸运的，但是现在子孙式微衰落，已不能承担起整理保管之重任，非翻弦更张不可了。为此陈登原先生提出了“将管理之权，归诸公家；而范氏子孙，仍留有假书检书之权利。于己无损，于人有益，于藏书更有益”的主张，应该说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改良的方法，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哪怕是走一小步，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要实行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但客观上起到了推进天一阁社会化的舆论作用。民国时期范氏后裔衰落，对天一阁藏书楼每年保管整理修缮所需的经济支出已无能为力，不得不向社会求助，这是天一阁转向社会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分房掌管锁钥的管理方法弊端明显

民国3年(1914)天一阁藏书遭窃,是历次书厄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一个叫薛继渭的窃贼,在上海不法书商的授意下,以不法书商提供的《天一阁见存书目》为依据,按图索骥,盗窃天一阁善本图书1000余种。这一盗窃事件,暴露了天一阁的保管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这年3月4日夜,薛继渭越墙从屋面爬入藏书楼窃书,并偷运到上海。上海学者缪荃孙在书贾处看到天一阁藏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考虑天一阁后裔不可能违规出卖,怀疑是贼偷货,当即写信告知宁波天一阁范氏。从3月4日出事到范氏后裔发现失窃,整整有近一个月时间未能及时察觉,反映了范氏藏书楼管理上的弊端。到范氏派人赶往上海,并于6月20日至22日在上海《新闻报》刊登“购入天一阁藏书者注意”的通告,已距被窃三个多月了。可见范氏对此类突发事件反应迟钝,究其原因,和不科学的管理制度有关,因为书楼锁钥由家族各房分别掌管,非各房会齐不得入阁,以致窃贼住在书楼上偷书而始终未被发觉。小偷窃书固然有偶然因素,但从天一阁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管理方式来看,出事是必然的,是迟早的事。

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写道:“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方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9]笔者认为它是象征着天一阁需要更换体制的时代将要来临,也暗示着家族共管制已接近尾声。

四、政府介入是天一阁社会化的前奏

民国9年(1930)10月21日,时任宁波市市长杨子毅等一行前往天一阁视察,这次视察不同于过去历次官员、学者以私人身份登阁,而可以看作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行为和社会化的前奏。杨子毅有一段话说:“近闻散窃之余所存无几,诚恐循此以往将有断灭殆尽之时。维护地方文明,官吏诿无责任?”作为一市之长,担心天一阁藏书的命运前景,寻求保护之良策,说明天一阁的影响之大和古籍善本之重要。它已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私家藏书楼,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和文明的象征,作为地方政府加以关心和保护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位市长不但担心,而且采取了一些切实措施,派遣宁波市图书馆馆长杨铁夫到天一阁,负责编辑《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他还作为一位图书馆学的专家,为天一阁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四策:上策为建设侍郎图书馆;中策为赠诸公家;下策为影印出版珍贵书籍,无策以封锁为政策,秘藏为主义。其“四策”一出,深得社会各界赞同。杨子毅还命范氏家族“为此令仰该族老等妥为保管,如有不肖子孙携出外卖,或外人窥伺盗窃者,许即拿获,解

府以重办”。市长令中不但要范氏后裔妥为保管,而且将天一阁藏书视为社会公产,不许范氏子孙外卖,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天一阁社会化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了。

五、危机为社会的介入提供了契机

民国22年(1933)九月,一次罕见的大台风袭击宁波城乡,天一阁藏书楼东墙被袭倒塌,整个书楼和藏书也岌岌可危。面临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原本极度式微的范氏后裔,已无力维修藏书楼,只能向社会求助,这就为社会的介入提供了契机。

时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孟颀先生,自身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学专家,面对天一阁的危难,他当仁不让,毅然发起组织抢救天一阁他还召集有关部门著名人士,决定建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请鄞县县长陈宝麟兼主任,冯孟颀亲自主持重修天一阁日常工作。重修的首要任务是募集资金,当年十月他向京、津、沪、杭等及宁波本地各界人士发出“为抢救天一阁文化宝库而捐款”的呼吁。在各地各界文化名人、企业家、社会名流等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共募得款银二万余两,重修天一阁工作得以顺利展开。重修委员会修复了倒塌的藏书楼东墙,又将原在府学的尊经阁迁移于其北面,还建设明州碑林,整修前后假山,增建兰亭等。同时他们还对照藏书进行整理编目,从1935年9月至1937年5月完成天一阁藏书编目。由于冯孟颀先生亲自挂帅编目,这份目录成为历次天一阁书目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这次天一阁重修和书目编辑,可以看做是社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说明私人藏书楼如不逐步向社会化转变,就无法抗拒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破坏,难以保证藏书“久而不散”,其意义非常重大。从主观上看,范氏后裔同意社会介入参与重修和编目是出于无奈,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从社会化角度看,由于鄞县县长亲自挂帅,县文献委员会全力以赴,以及知名地方贤士学者积极支持和参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事情办得有条不紊,顺利地完成了个家族难以办到的耗资巨大的书楼维修和藏书编目任务,为天一阁藏书文化延续作出可贵的贡献,也为天一阁实现社会化管理开了一个好头。这一良好开端,用现在的观点,就是取得双赢的局面。

六、天一阁实现社会化表率意义深远

早在1947年2月2日,当时的宁波《时事公报》就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希望天一阁藏书早些公开》。文章指出,范氏深闭固藏的藏书方法是错误的,不合理的。地方文化事业是地方的公产,人人有享受权利,也有保存的义务。天一阁藏书,在范氏后人或视为私产,而在

一般地方人士则已视为公物。文章呼吁范氏后人“顺应时代潮流,变私有而为公有”,下决心实行公开,让一般人都能享受到先人们所创立的事业的利益。应该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广大读者要求天一阁尽快实现社会化管理的呼声,是藏书文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鉴于天一阁作为文化事业的广泛社会影响和范氏后裔已无力管理的实际情况,为加强对藏书的保护,市军管会曾派部队保护天一阁,6月又由军管会文教部实行接管。人民政府成立后,又为天一阁配备了专职管理干部,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又拨出专款对书楼进行必要的维修。天一阁藏书也逐步实现社会化管理,向公众开放,提供阅览和抄录资料等服务。

宁波解放时,“天一阁遗存原藏书一万三千余卷,《古今图书集成》八千二百余卷及少量近代出版物”。¹⁴天一阁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单位后,起到了一种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带动了众多私人藏书家来向天一阁捐献自己的藏书。天一阁社会化后的30余年时间,古籍藏书增加到30万余卷,这里有众多藏书家的功绩。如1957年7月张季言先生将“樵斋”全部藏书5.7万卷和《樵斋藏书目录》捐赠给天一阁。他在《樵斋藏书捐赠天一阁经过》中说:“原拟在镇海霞浦建造樵庄图书馆,为避免图书日久散失,即将藏书悉数捐赠。”1962年4月,冯孟颀先生的家属将冯氏“伏附室”藏书10万卷捐献给国家。1979年9月,朱澍卿先生家属将“别宥斋”10万余卷古籍和1700百余件字画文物捐赠给天一阁,藏书中多善本,有宋刻本《五代史记》、黄宗羲辑《明文海》稿本等共约千余种。同年10月孙定观先生将“蜗寄庐”1.4万余卷藏书捐赠给天一阁。“蜗寄庐”藏书中有许多珍藏图书版本精美、质量较高,善本计447部。杨容林先生家属也同时将“清防阁”藏书1.2万余卷捐赠给天一阁,“清防阁”以清代中后期刻本为多,有善本数十种。此外,先后捐赠藏书的还有张孟契、袁梅棠、张琴、张申之、刘楚芾、张世训、李蕴、翁菊英等,这种“化私为公”之举使天一阁藏书更加充实,影响更加深远,成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藏书家捐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认识到把藏书捐献给国家才能使藏书得到更好的保管,达到“久而不散”的目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天一阁实现社会化管理后的示范作用,如果天一阁仍然维持原有的家族所有制,这种捐赠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天一阁原有藏书也将荡然无存。

除藏书家捐赠外,国家还拨给专门经费,用于收购天一阁散佚的原藏书和其他古籍、字画、碑帖等,“当时收到的有较高价值的古旧图书为数不少,如清早期钞本黄宗羲《四明山志》等,均提供给天一阁收藏”。¹⁵这使天一阁藏书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这样巨大的经费支出,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自然也是难以承受的。

七、社会化以来天一阁藏书事业持续发展

天一阁社会化后,于1981年新建了书库。该书库上下三层,钢筋水泥结构,外貌民族风格鲜明,使用面积近1000平方米,藏有古籍30余万卷。新书库在防火、防盗、避灾方面的功能得到极大提高。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天一阁藏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政府给天一阁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无疑为天一阁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20世纪80年代增建的天一阁东园,占地6000余平方米,园中迁人的古建筑有凝晖堂、明代石雕建筑百鹅亭,建设有假山明池,廊檐竹木,精致自然。20世纪90年代宁波旧城改造时,又将卢址抱经楼的厅堂、徐时栋的水北阁藏书楼都迁移到天一阁南园安置。此时还建成了天一阁书画馆,该馆位于天一阁西南侧,前后三进,建筑面积1600余平方米,常年不定期展出馆藏书画、当代名家书画、摄影图片及艺术品等。1999年12月16日,“中国地方志珍藏馆”落户在天一阁南园,原宁波著名藏书楼水北阁即作为新地方志的陈列室。该馆已收到全国范围省、市(地)、县(市、区)三级新方志2328种,计6135册,收藏专业志、部门志、山水志等4400多册。三级方志收藏占全国三级行政区划的百分之91.5%,占已出版全国三级方志的98%多,并且还在不断征集增加中。该馆是天一阁收藏古代地方志、地方文献的继续延伸。天一阁社会化以来,络绎收集家谱400多种近2000余册。天一阁藏书闻名于世,其实藏画也相当丰富,总计数量在4000幅以上,其中最著名的为北宋黄庭坚草书《刘梦得竹枝词》手卷、元代吴镇的《双树坡石图》轴。此外还有明代的徐渭、文徵明、蓝瑛、陈道复、陈洪绶,清代的恽寿平、虚谷、郑燮、任颐等大家佳作。

天一阁社会化公有制以来,文化、学术界名人,教育界教师,学生、科技界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陆续不断前来参观,他们有的为天一阁题词,有的将天一阁写入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利用天一阁藏书进行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大规模纂修地方志活动,各地修志办公室纷纷派出专业人员前来天一阁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使这批珍藏的古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总之,天一阁古籍、家谱、字画、文物等资源,通过陈列展览、开放利用,不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藏书文化也不例外。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阶段,私人藏书楼走向社会化公有制是其必然的结果,对天一阁藏书楼而言,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藏书文化已愈来愈被人们重视。据悉,宁波市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立项,国家将投入巨资建设国内一流的天一阁新库房,天一阁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 [1]虞浩旭.浙东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名人与天一阁[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
- [2]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M].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印行).
- [3]余秋雨.余秋雨文集·风雨天一阁[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 [4]骆兆平.书城琐记·海内长存天一阁[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5]袁元龙.1949年以后宁波市古旧书业兴衰起落情况的片段回忆[A]天一阁文丛(第二辑).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范钦分书事略考

方 东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古籍,素有“南国书城”的美誉。

范钦,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时年27岁。后任随州知州,由于他洁身自律,勤政爱民,因而很快被提升为工部营缮员外郎,因阻止上级郭勋贪污而被诬陷,以至于廷杖入牢。出狱后他反而以“硬头子”出名,升江西袁州知府,因能体察民情,关心民瘼,而升九江兵备副使,后出任广西布政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河南省政、学政等职。嘉靖三十七年(1558),范钦升副都御史兼南赣巡抚,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因抗倭之功及政绩升至兵部右侍郎,后因官场倾轧,同年突被罢职。

民革宁波市委的袁元龙先生在《难忘四明范司马》一文提到:范钦出身于一个寒儒之家,祖父范訢曾任县学训导,父亲范璧读了一辈子书,无半点功名。由于家里没有什么藏书,就向藏书人家设法借阅。范钦非常喜欢藏书,在各地做官时,悉心求购,辞官归里之后,更是乐此不疲。范钦主要靠俸禄收入,因此收购藏书有时力不从心,因此他主要选择当代著作收藏,实在买不起就用抄的办法。经过历年积累和经营,他共收集藏书达七万余卷。嘉靖四十五年(1566),范钦在东明草堂旁侧建成天一阁藏书楼,此楼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古语建,为木结构二层下六上一通间建筑,他还在楼前置半亩庭园。

天一阁藏书的聚而不散,主要取决于范钦及范氏族人“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理念。关于范钦分书的事略,在天一阁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典故:

天一阁藏书楼,能够历时数百年仍保存完好,这与范钦生前作了周密安排、定下严格规矩有关。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前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时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是白银万两,一是全部藏书。结果,大儿子大冲体察老父心情,继承了藏书,被后人传为佳话,而二媳妇受金而去,而受世人谴责。此后,天一阁所藏的书籍不再作为财产分配,而归家族共同所有,并形成了与家族公有制相适应的严格的管理制度。

上述事略根据全祖望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一文中而来,此文最后一段曰:

吾闻侍郎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自易代以来,亦稍有阙佚,然犹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时来借钞。闽人林佶尝见其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丰氏之余耳。且以吾所闻,林佶之博亦仅矣。

全祖望,浙东大儒,字绍衣,号谢山,又号鮚埼亭长。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生,鄞县沙港村人,14岁补为诸生(俗称秀人),雍正十年(1732),28岁中举,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当时被视为储相,正常发展的话,可以一步一步进入权力的顶层),因学识超众,被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李绂赏识器重。时大学士张廷玉当国,与李绂相恶,迁怒全祖望,将其列为知县候选。全祖望遂自绝仕途,辞官归乡,研究学问,著述颇富。钱穆曾赞誉全祖望为“浙东史学之大柱”。他曾多次登上天一阁,搜罗古典文献及金石旧拓,编成《天一阁碑目》一书。

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一文板刻于天一阁中厅,因此,范钦二子分书之事流传至今。对此事略,我作为一个钱币研究者和藏书爱好者,内心有点怀疑。今日在查资料,看了天一阁博物馆袁慧同志的一篇《为范大潜辨白》一文,更增加了辨别真相的信心。

袁慧同志辨文的主要观点是:一、范钦的家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丰裕。范钦在《告祖宗文》中说:“不肖借我祖宗德泽之贻,先考妣养育之恩,遂以陋贱获厕卿亚……受封虽一十八年,茹苦力勒,朝夕不遑,而家业寥寥,犹图禄养,竟不可待,悠悠苍天,此恨何言。”二、全祖望以前对此事均无记载,为何200多年之后冒出了这个遗闻。《范氏宗谱》和先全祖望近100年的黄宗羲首撰《天一阁藏书记》时也无提及。三、范钦也应充分认识到体弱多病的范大潜挑不起掌管天一阁藏书事业的重担,特别是大潜亡故后其妻陆氏更不能承担这一重任。袁慧同志还对全祖望的学问、人品、道德作了充分的肯定,因此全祖望不会杜撰这个事略,这个传闻可能源自屠田叔的后人。田叔的六世孙屠可堂(乾隆十六年(1751)举人,曾代理过姚州知州)所写的《双柏庐遗闻记》中有一段话,讲到了范钦分书的故事,只是大潜改为其妻陆氏,并说陆氏在分家后产生后悔,幸亏其祖上屠田叔斡旋才平息。因此,看来是屠可堂为先人溢美和歌功,凭想象来演绎故事,使名人学者上当,而使大潜蒙冤近300年矣。

袁慧同志的观点我基本赞同的,同时,我还想从其他方面来做一点补充。

其一,范钦的收入能否积有万金问题。我是钱币协会的会员,近段时间,我正好在研究明清朝官员的俸禄课题。范钦作为朝廷官员,收入以俸禄为主,这在其《告祖宗文》中也明确指出“家业寥寥,犹图禄养”。因此,典故中的“别出万金”,疑义最大。中国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上海周劭老先生所著的《向晚漫笔》一书,其中有一篇《官的俸给和养廉》的文章,提及官员俸禄:“在这里且不说做官的非分所得,只谈谈明代及清代前期的官员正当

收入,那些时代官员的俸给,实在是非薄得可怜且复可怜矣。以清代而言,京官中居极品的正一品大学士,也便是宰相,他的俸银是每年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外官的正七品知县分别为四十五两和二十二石有半……”

在网上,我也查到了一篇文章,在书路文学网之书库首页,是一个叫晓风飞翔的人写的一篇《明朝的官制·兵制》,里面写到:

元代,最多者俸钞六锭五锭,最少者三十五两。明初,洪武二十五年定百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从二品四十七石,正三品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点五石,从七品七石,正八品六点五石,从八品六石,正九品五点五石,从九品五石。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则米钞兼支,正统中,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时钞价日贱,每石米已渐增至钞二十五贯,成化二年,时钞法不行,一贯仅直钱二三文,米一石抄钞十贯,仅直二三十钱,而布直仅二三百钱,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则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清代,文武官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点一两。

在另一篇提到海瑞的文章中,也提及了七品正令海瑞先生的俸禄:“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任职浙江淳安……史称明朝官俸最薄……海瑞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就养活了一大家子。”一个月五两银子,估计相当于现在一千元钱(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基本可以反映价值关系,由于米价各朝和灾丰年波动很大,我取其平均,按一石米抵钱一千,即银一两,古代一石即120斤,过去十六两制,明清代标准一斤约为600克,那么一石即现144斤,按现米价一斤1.5元算,每银约值现价200余元,这只是大体估算,便于了解大概的价值关系),据说当时海瑞先生买不起肉吃,还叫仆人在县衙种菜才勉强度日。还有一次主仆二人上京朝觐,先拜访老领导吏部侍郎朱镇山,因为实在穿得太破了,朱镇山拿出十两银子给他们,叫他们换了件新衣服。

范钦和海瑞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明朝官员俸禄是不高的,明初稍高点,正四品月薪约有二十五两银子,后逐代呈下降趋势。正直的官员看来还是比较穷的。嘉靖年间当时中央政府的金库银两岁入也只有二百万两白银。嘉靖年间正七品官月收入只有五两银子,约值现一千元钱,那正二三品官员按上述比例推算相差约在六倍左右,月薪三十两银子,约为现五千元一月。如按范钦先生做官28年,平均每年年薪300两银子

算,范钦总收入为8400两银子。范钦因是被罢职的,估计是没退休工资了。其实古代也没什么退休制度,干部制度是终身制的,可能古代人寿命不长的缘故吧。范钦先生的总收入要支出家庭正常开支,买地造房,购买书籍以及另外杂七杂八的开支,我估计所剩不会很多,积蓄在两三千两银子左右,那可也很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约五六十万元人民币。

因此,我得出结论,范钦先生是“别不出万金”来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靠俸禄收入积蓄不了万金。因此,这个典故是靠不住的。再退一步,如果这个典故存在,那么,这里的万金概念,可能不是指准确的万两银子的概念,这里的万,可能是个泛指,指多的意思。

其二,我想从万金和七万多卷书的价值关系来探考此典故。

一般父子分家,家产折成数份,价值应大体相等。长子有优先挑选权,并要至亲好友共证。而上述典故以万金和七万多卷书共为两份财产,应对此价值作一分析。七万多卷与七万多册不同,一册书可能里面有好几卷乃至十多卷也有。七万多卷书估计在1.5万册至2万册左右。以现在市场上每册书价30元一本算,两万册书约在60万元钱左右。而范钦藏书也以当时的当代书为主,大体测算其所藏书价值约在两三千两银子。去年,我曾在省文史馆馆员范无伤先生家里看到过一本《古今谈》,今年我想查找出处,却找不到了,为此专门去了省文史馆,在去年《古今谈》的第2期(总第74期)上有一篇蓝燕同志写的《全祖望,宁波人忘记了吗》一文,里面提到:“乾隆十九年(1754),往扬州马氏畬经堂养病,入冬后返里,次年三月,独子病死,悲伤过度,竟于同年七月初二日病逝家中。……家无余银,丧葬无资,其家人只得把双韭山房所珍藏的万卷书出售,换得银二百余两,葬于南郊王家桥畔。”

双韭山房的万卷书,得银二百余两,并且是珍藏书籍。明中后期和清前期官员俸禄相差无几,物价也大体相等。明末著名学者赵南星曾撰《笑赞》一书,其中有则笑话,叫《一钱相贺》,说邻居张三遇喜庆事,其友封银一钱相贺,包银红纸写着:银五分,除五分。可见其囊中羞涩。过了不久,送银者也遇喜事,张三也去贺分,红封上写:银一钱,除五分,除五分。这虽是个笑话,但却反映当时的物价问题,一分一钱的白银在明末清初之际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重量的。全祖望收藏的书籍,档次应也不会低。万卷书,价值银二百余两,约值现四五万元钱。古代重视厚葬,我在一本民间收藏的嘉庆年间《分书》中看见,这家祖上开药店的小康之家把药店盘掉得银六百余两,其中留一百多两银子给已故的先生作坟,而给次子结婚只预算了六十两银子。二百两银子,看来也只能给浙东名士全祖望先生草草葬了。如果按双韭山房售书的出例,范钦的七万多卷书价值可只值一千四百两银子左右。如果再算上双韭山房的书因为急卖而打了折,以打七折算,范钦的书价值也就是两千两银子左右。约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万元人民币。

而天一阁这样的建筑,当时的购地和建造价格不会超过五百两银子,估计只要三四百

两银子够了。这样,天一阁的建筑和书籍,共价值约二千五百两银子,约为现在的五十万元钱。

而万金,一般指万两银子。万是数字,金,一般指钱,因为银子是本位钱制。万金,一般就指万两白银了。当然,也可能是泛指很多钱,或者也可以指万两黄金。万两白银,约相当现在的二百万元钱,除非范钦是个贪官,否则,是肯定积不到这么多钱的。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想,范钦老先生肯定不会糊涂到给两个儿子,一个二百万元,一个五十万元。相差太悬殊了,不合情理。如果范钦老先生糊涂了,那么还有亲朋好友也会糊涂吗?何况每个儿子还有老婆,老婆把关可是最紧的。可见,这个典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如果典故中万金的概念是泛指的话,这个典故存在的真实性还是有的。如果书和阁值二千五百两银子,那么这里的万金指的是与书阁基本同值同样多的金钱,一个是实物,一个是货币。而上文屠可堂《双柏庐遗闻记》提到,大潜妻陆氏在分家后产生后悔,幸亏其祖上屠田叔斡旋才平息。这样一来,这段话就可信了。价值大体相等,取货币的陆氏才会后悔,否则她如果拿了二百万,还后悔什么呀。因为藏书可能会升值,毕竟还有知名度。所以她取了钱后才会后悔。屠可堂是屠田叔的六世孙,此分书故事其家族内口头相传也是有可能的。否则凭全祖望这样的大学问家不会随便记载的,毕竟全祖望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家。(周时奋《浙东学术的最后一块丰碑——全祖望》一文中写到:祖望治史,态度缜密公正,这是他史德所在,也是史胆所在。)全祖望自己也提到:“史以纪实,其非实者非诗也。”他不会不知道大潜先范钦三月而亡之事。因此,典故中次子也是借代,指次子媳。而“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此句,其实正是说大潜妻陆氏取金而后悔之人品之劣也。

2006年7月20日写于不欲庐

参考文献:

- [1]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一辑)[C].宁波:宁波出版社
- [2]许勤彪主编.宁波历史文化二十六讲[C].宁波:宁波出版社
- [3]骆兆平编纂.天一阁藏书史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古今谈(总第74期)/浙江省文史馆编
- [5]浙东文化(总第二十期)/宁波文博学会会刊
- [6]董贻安主编.浙东文化论丛[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7]曹屯裕主编,浙东文化概论[M],宁波:宁波出版社
- [8]范稳著,清官海瑞[M],海峡文艺出版社
- [9]周劭著,向晚漫笔[C],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
- [10]马社香著,中国货币文化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11]中国钱币协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12]秦子脚、任兆凤主编,江苏历代货币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慈溪市收藏协会)

天一阁藏《通纪》研究

钱茂伟

【摘要】 作者对天一阁收藏的三个《通纪》版本,与“台湾本”进行了对比研究,重新探讨了天一阁三个版本的《通纪》价值。

【关键词】 天一阁;《通纪》;版本;价值

明代史学,嘉靖之前,理学化色彩浓,史学的发展显得苍白;嘉靖以后,逐渐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叙事史学成为史坛的主流。^[1]陈建(1497-1567)《通纪》作为第一部叙事型明代编年史,出手就不凡,曾影响了晚明史坛近百年。我接触陈建《通纪》,是1985年的事。那时,我准备主攻明代史学,阅读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其称“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2]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成为我研究明代史学的切入点,陈建《通纪》也就成了我研究明代史学确定的第一个课题。

《通纪》刊刻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自隆庆五年(1571)遭禁毁以后,《通纪》原版流传越来越少。万历以后,虽然出了不少重刊本或续补本,但多非原貌。我在原杭州大学图书馆阅读的第一个《通纪》本子,就是岳元声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这是一个续补本,与原著面目差距相当大。此后,我一直关注《通纪》的原著寻找工作。20世纪90年初,在一次偶然的会中,我了解到天一阁有《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卜世昌等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新锓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于是,我得以一睹与《通纪》原著内容较大程度接近的刻本。在多年积累基础上,我写了《陈建史学研究》4篇系列论文。^[3]1995年前后,我甚至想据天一阁三个版本,冒险将《通纪》原著恢复出来。2005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到台湾半年,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中阅读到了海内外唯一的嘉靖原刻足本《通纪》,这使我兴奋不已。20年的搜寻之功,终有结果。我决定将之复印回大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此书。同年12月,“《通纪》整理”列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课题。2006年上半年,我全力将《通纪》标点成稿。标点工作接近尾声时,我重新借阅了天一阁收藏的三个《通纪》版本,与“台湾本”进行了对比研究。由于有了原刻本做参照,我对天一阁三个版本的《通纪》价值有了更为合适的看法。现将《通纪》三个版本及其他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结果,写成此文。

一、天一阁《通纪》诸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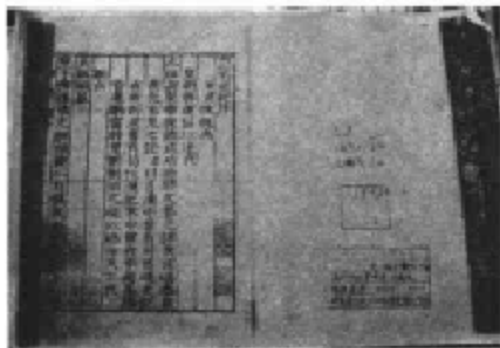
现存各种名目的《通纪》版本有20多种。笔者将这些不同版本区分为原刻本、重刻本、续补本三大类。《通纪》研究中最难工作之一是鉴别不同版本,确定哪一部是原刻本,哪些是重刻本,哪些是续补本。现在,已经可以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原刻本,前面有《皇明通纪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卷目》、《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卷目》、《采据书目》、《皇明通纪凡例》。在内容上,分为前编8卷,后编34卷,总共42卷。一是题名不一,前编称《皇明启运录》,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二是作者署名不一,由于退休,所以,前后编署名方式也不同。《皇明启运录》题“粤滨逸史清澜钓叟臣东莞陈建辑著”,《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题“东莞陈建辑著”。三是版心不统一,前编刻“明录”,后编版心刻“明纪”,双鱼尾,白口。四是版式前后字数不统一,前编10行22字,后编11行22字。字体是方方正正的仿宋体,横轻竖重,比较扁平,行格疏朗。

此外,内容校勘不精,有较多的错字、漏字或衍字。标题不统一,后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一般作“卷x”,但卷之十五与卷之二十一却多“之”。多处文字排成双行小字,可能是漏排造成的。卷二十四成化二十年(1484)秋“东厂太监尚铭有罪,褫职,以太监陈准代之”条,下面括注“此条当在前”。这些随意性、不规范性,正是原刻本才会有的现象。“采据书目”有三处挖刻痕迹,这是家刻本为省钱舍不得别刻的表现,证明《通纪》是陈建家刻本。

目前,原刻本存世有两部,一个是本,一个残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误题为《新刊校正皇明资治通纪》)应该是原刻足本(见图一)。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所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残存《皇明启运录》卷三至卷八,后编存卷一至卷十一、卷十五至卷二十九,共32卷,12册。这个版本,应该与台湾“国家图书馆”本同出一源,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原刻本。

图一 《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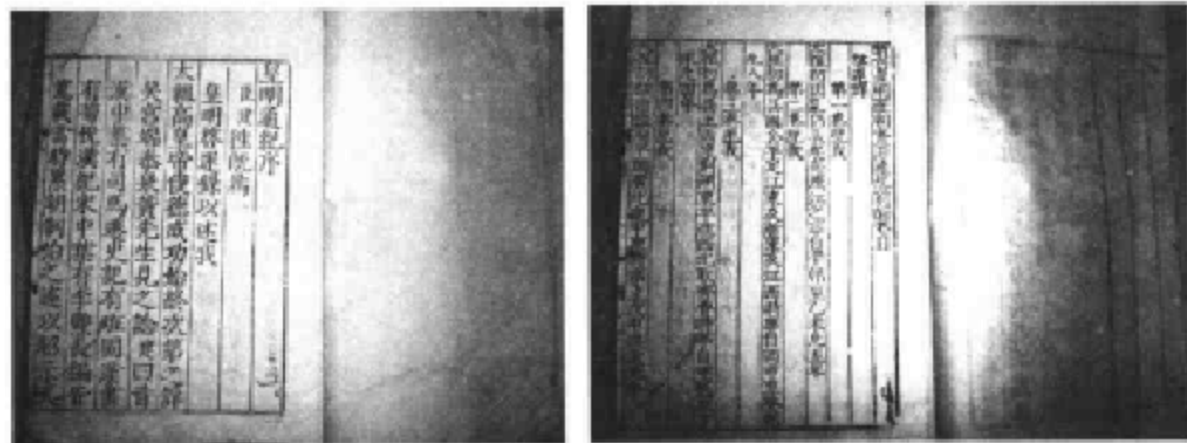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

天一阁收藏的《皇明资治通纪》，属于重刻本。重刻本的特点是，内容上与原刻本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排版格式，重刻本前后编版式统一，且没有双行小字，字体也不同。由于重新排版，所以校勘更精致。重刻本目前有两部，一个足本，一个残本。北京大学有一部朝鲜刻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后编统一为10行18字，共17册，是一个足本。

天一阁藏《皇明资治通纪》，前后统一排版12行25字，前编称《新刊皇明启运录》，后编称《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见图二），版心统一为“皇明资治通纪”，单鱼黑口，是一个残本。前编八卷完整，后编有残缺，存卷一至卷十六、卷二十至卷二十九，共34卷，10册。从编号来看，全书应有12册，缺2册。天一阁收藏本是何时翻刻本的？笔者曾将天一阁本定为“嘉靖翻刻本”，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从种种情况来判断，应该是万历初年以后的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隆庆五年（1571）的17年间，正是原刻本《通纪》正常销售的时代，《通纪》家刻板本存世，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可以加印，书商翻刻的概率比较小。隆庆五年九月，《通纪》突然受政府注目，陈建家所藏板刻被销毁。《通纪》成为禁书后，实际上由政府出面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名声越来越大。禁书越禁名声越大，这也是规律性现象。由于陈氏家藏板刻被销毁，于是，就有书商开始重新翻刻《通纪》，出现版权转移现象。经由书商的市场操作，销售力度显然更大，于是，《通纪》的影响面更大。朝鲜活字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具体的刊刻年代不详，但用的是“乙亥字”，相当万历三年（1575），可以肯定是万历初期的版本。^④天一阁的《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时间也应是在万历初年前后，主要根据是字体略偏长，字迹清秀，版面清楚，印刷质量明显提高。一般说来，嘉靖时代的本子，印刷质量不高，字迹略粗，版面偏黑。

图二 《皇明资治通纪》卷首及目录



图片来源：天一阁所藏《皇明资治通纪》

续补本一般由陈建《通纪》订补和续补两大部分而成。除了续补部分不同之外,《通纪》订补与原著相同部分内容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批语、按语不同。陈建的作品,有一定的学术色彩,保留了引语,但到了《法传录》之类续补本,删除了这些引语。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而删除了主体色彩较强的按语,那样的结果,将陈建作品的思想性抛弃了。这是最大的不足。此外,某些内容也有增加。总的说来,内容上做加法,按语上做减法,这是续补本共同的现象。续补本数量比较多,有一些是坊刻本,其中,有几部是学者订补的,如岳元声订本、沈国元订本、高汝栻订本,质量相对高一些。

天一阁收藏卜世昌、卜六典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新钺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属于续补本。

卜世昌等订合本《皇明资治通纪》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卜世昌,浙江秀水人,应该是史家卜大有(1512-?)同一家族之人,诸生。此人喜欢历史,“甫束发即嗜读班氏书,且时时从长老问朝家典故及诸巨卿琬琰家乘之详”。^[5]卜万祺称“臣兄昌,少负轶才,博洽娴文”。^[6]全书《皇明资治通纪》14卷和卜大有《续纪》3卷组成,版心称“皇明资治通纪全书”,共6册。

卜世臣《皇明资治通纪全书序》称:

粵陈建汇为《通纪》,遂执稗官牛耳。偕薛晋陵《宪章录》,颀颀纸价。奈绝笔武庙,兼岁久蝇头漫漶。禾郡魏塘支君始辑《永昭两陵编年史》,颖端衮钺,何必减涑水研磨!但性好臧否,志狃激扬,间或操议稍偏,用刑太峻。觉襄晦翁《纲目》尺许,大抵□造此等书。要如亚夫将兵,无天于上,无地于下。讨罪虽亲立诛,存一护庇心不得;褒勋虽仇亟奖,存一弹射心不得。贵核弗贵多,贵平弗贵刻,个中肯綮,倚狐后罕能领略者。吾家雁行,圣瑞氏、玉梁氏,金富有才情,尝钺《经世策括》,为握槊前茅,入毅士强半借资。复偷隙驹之暇,手订嘉隆实录,并《通纪》,鼠□更亥豕,以勒梓人。

所谓圣瑞氏、玉梁氏,应该就是卜世昌、卜六典。这位卜世臣,应该是卜世昌弟辈。这篇序的大意是说,陈建《通纪》“执稗官牛耳”,与薛应《宪章录》同样为当时所重。惜仅写到正德。后来,支大纶补写了《永昭两陵编年史》(又称《世穆两朝编年史》),但评价过于偏激。他们理想的作品应该是“贵核弗贵多,贵平弗贵刻”。于是,卜世昌、卜六典参考世宗、穆宗两朝实录,删补成此书。这里似乎表明,卜大有《皇明续纪》上中下三卷,是卜世昌、卜六典编纂的,实际署名是卜大有。那么,卜大有《皇明续纪》是否是根据支大纶《永昭两陵编年史》改写而成的呢?应没有直接的证据,在此仅提出问题,供人思考。

《新钺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版心题“皇明通纪大全”,半叶11行27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坊刻本。这个本子,前10卷为陈建《通纪》,后1卷为嘉

靖隆庆续补部分,共11卷,10册。纸质偏黄,属于价廉产品(见图三)。



图片来源:天一阁所藏《新校校正标题皇明治通纪》

二、《通纪》作者及书名

(一)由杨慎“率意”引出的《通纪》著作权之争

《通纪》是陈建编纂的一部明史著作,按理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但因同时代著名大学者杨慎(1488-1559)的信口开河而出现了不必要的麻烦。

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七《野史不可尽信》曰:

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褒贬,故历代皆有国史,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散失,摭摭逸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然野史不可尽信,……岭南梁亿,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与先大师同年同官,本无嫌隙,特所趣不同耳。亿著《皇明通纪》,隐没先大师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际,迎立之诏,江彬之擒,皆匿而不书,乃以宸濠护卫之请,谓先君与之。时先君丁忧于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将军敕,几陷于危,乃举而归之梁公,不知写威武大将军敕者,梁公也,内阁有板书稿簿,撰者姓名于下,岂可诬也,无乃欲盖而弥彰乎?……

由于杨慎在明代学术史界的特殊地位,他的话为胡维霖《墨池浪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所引用。沈德符称:“杨升庵云《皇明通纪》为梁文康弟梁亿所撰,其言必有据,岂亿创之,而嫁名于陈建耶?况梁亦为广州之南海人。”^[1]清初青年史家吴炎也深信不疑,进而称“子虚乌有之陈建”。^[2]

这里要辨析的第一个问题是,杨慎的话是否可靠?由上面引文来看,杨慎是从“野史不可尽信”角度,举例时提到《通纪》的。杨慎讲此话的重点并不在于考辨《通纪》的作者问题。在杨慎看来,梁亿著《通纪》是常识,这是个简单的事实,并不存在陈建著《通纪》的事实。

第二个问题,杨慎何以关注《通纪》?杨慎是因为《通纪》涉及了杨慎父子的事迹,才关注《通纪》的。后来,杨慎孙子杨宗吾《检蠹随笔》“又有数条,乃驳陈耀文《正杨》之非及陈建《通纪》载杨廷和事之误”。^[9]可见,《通纪》记录了杨廷和两件不光彩的事,一直成为杨家子孙的心病,极力加以辩解。那么,杨慎所谓两件事是否成立?第一件事,见于《通纪》卷三十二,正德九年(1514)三月。据《通纪》正德十年(1515)一月,杨廷和丁忧。《别集》卷四十五《内阁辅臣年表》也作正德十年丁忧。前后相差近一年时间,如此说来,杨慎的辩解是不成立的。第二事有一些误解。杨慎的意见,草威武大将军敕的人是梁储,不是杨廷和。但据《通纪》卷三十二,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正德帝要求内阁草威武大将军敕,杨廷和称疾不出,只有梁储当面顶撞,结果,正德帝放弃了起草诏书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存在谁是草诏之人问题。这么说来,杨慎的辩解都是不成立的。《通纪》为何没有讲杨廷和善的一面?却讲到杨氏丑恶的一面。杨慎的猜测,与作者的个人偏好有关。因为作者梁亿是梁储的弟弟,所以,扬恶不及善。显然,这是杨慎的主观猜测。《通纪》对杨廷和的直录,对杨慎的批评,是杨慎有意诋毁《通纪》知识产权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三个问题,杨慎何以误题?《通纪》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出版的,杨慎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的,当时正是《通纪》热销的时代。从情理上说,杨慎应是读过《通纪》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错,最大的可能是,杨慎本人没有读过《通纪》,仅是从别人的转述中了解的。当时,杨慎身处云南,完全有可能没有读过《通纪》。

(二)梁亿没有作过《通纪》

梁亿是否作过《通纪》?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考梁亿,广东顺德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进士,官至广西参议。杨慎是正德六年榜的状元,梁亿与杨慎是同榜进士。梁亿兄梁储与杨慎父杨廷和“同年同官”,即同年进士,同在内阁任职。应该说,梁氏兄弟与杨氏父子是比较了解的。据陈建及王世贞的记录,梁亿有一部《皇明传信录》,简称《传信录》。《传信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由于梁亿的《皇明传信录》不传,所以,不知是编年体明史抑或杂史。《通纪》从《传信录》转述了5段引文,分别见至正二十年、洪武元年、洪武十年、洪武十五年、洪武二十一年。从引文来看,主要是洪武一朝。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二也引用了一段材料,称“《传信录》言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子也云云,不可笔之于书……大抵出梁亿宵人,语不足存也”。查《明史艺文志》卷九十七,梁亿有《洪武辑遗》二卷,没有《传信录》,是否《传信录》即《洪武辑遗》?惜没有直接的证据。从引文内容来分析,《传信录》应是一部笔记、杂史,不是系统的明史著作。何以会发生梁亿著《通纪》之事?晚明人沈德符的推

测是“岂亿创之，而嫁名于陈建耶”。这是不可能的事。有可能是，陈建关于杨氏父子的记录，信息来源于梁亿《传信录》。朝廷中发生的事，且涉及梁储的信息，只有梁氏兄弟有可能提供。

（三）陈建作《通纪》的依据

现存各种《通纪》本子，不管是原刻或续补之作，都署名陈建，从未有署名“梁亿”之例。当时及后来的明朝史家提到《通纪》时，也无一例外地署名陈建。特别是正文中按语及按语中偶尔出现的《治安要议》、《学菴通辨》字样，思想完全是陈建的。什么都可以模仿，就是思想无法模仿。明清个别学人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四）原刊本书名问题

陈建所撰史著，简称《通纪》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全称是什么？由于台湾所藏原刻本没有封面题名，所以，陈建原著全称也就成了问题。陈建自己用法就不统一：序及凡例，作《皇明通纪》；内文省称《通纪》；目录分别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正文，前编仍称《皇明启运录》，后编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再看一下同时代或后代人用法，也不统一。

现在所见《通纪》全称有三种：《皇明通纪》、《皇明资治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第一种称《皇明通纪》者，如时人邓元锡说“陈东莞建仿荀氏《汉纪》撰《皇明通纪》，于人才、风俗、政体、边防三致意焉，视宋李焘《长编》有过无不及矣”。^[10]万历《粤大记》卷二十四《陈建传》有“袁辑圣祖启运以来迄于正德，为《皇明通纪》，凡三十四卷”。高汝栻本称《皇明通纪法传录》，序称“是以陈东莞编其要为《皇明通纪》若干卷”。第二种作《皇明资治通纪》，如岳元声订本，就直接称《皇明资治通纪》。第三种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藏本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两个重刊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多“新刊”两字，中心题目仍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至于《明朝通纪》之类，则是清朝人的称呼，可以不必理会。《皇明通纪》、《皇明资治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这三个名称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有“资治”？是否有“历朝”？到底哪个合适些？考虑到陈建自编的目录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编》，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藏残本直接作《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两个重刊本《新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多“新刊”两字，中心题目仍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那么，《通纪》的全称应该是《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比较合适。著名版本专家王重民也倾向于认为陈建合前后编，总题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11]我一直来倾向于认为《皇明资治通纪》比较合适，没有“历朝”两字，现在看来，定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比较合适。

三、《通纪》史料的来源及价值

《通纪》的史料价值,曾受到部分人的怀疑。其书史料价值到底如何,今人有必要给一个说法。

(一)《通纪》史料来源的多样化

《通纪》史料来源的特点是,以政书、方志、编年史、传记、杂史笔记、文集、奏疏为主。陈建写历史,有“采据书目”117种书。这117种参考书,分为7大类。其中,以杂史笔记、文集、方志、奏疏为主,几乎搜集到了当时所能看到的图书。前人用“野史”来概括《通纪》是不合适的。

政书8种:

| | |
|--------|--------|
| 《五伦书》 | 《御制大诰》 |
| 《皇明祖训》 | 《皇明玉牒》 |
| 《皇明诏令》 | 《大明会典》 |

《皇明政要》上饶娄性辑

编年史3种:

| | |
|-----------|-------------|
| 《续资治通鉴纲目》 | 《龙飞纪略》诏安吴朴著 |
| 《历朝圣政记》 | |

传记5种:

| | |
|----------------|---------------|
| 《皇明开国功臣录》定远黄金著 | 《皇明名臣录赞》莆田彭韶著 |
| 《皇明名臣言行录》丰城杨廉 | 《理学名臣录》杨廉辑 |
| 《近代名臣言行录》海盐徐咸 | |

奏疏12种:

| | |
|----------------|-----------------|
| 《皇明经济录》 | 《莆阳大奏议》 |
| 《于肃愍奏议》钱塘于谦著 | 《商文毅奏议》淳安商辂著 |
| 《马端肃奏议》钧州马文升著 | 《胡瑞敏奏议》钱塘胡世宁著 |
| 《夏桂洲奏议》贵溪夏言著 | 《孙毅庵奏议》孙懋著 |
| 《渭厓疏要》南海霍韬著 | 《南官疏略》分宜严嵩著 |
| 《皇明群书题要》金陵李允植著 | 《皇明屡朝时务策要》常山詹涛著 |

杂史笔记47部:

| | |
|---------------|---------------|
| 《国初事迹》 | 《翊运录》青田刘基著 |
| 《三朝圣谕录》泰和杨士奇录 | 《殿阁词林记》蒲圻廖道南著 |

《殿阁词林续记》黄佐、廖道南同著

《革除遗事》岭南黄佐辑

《燕对录》长沙李东阳录

《密勿稿》东莱毛纪著

《草木子》浙江龙泉叶子奇著

《空同子》汴梁李梦阳著

《水东日记》昆山叶盛著

《可斋杂记》安福彭时著

《菽园杂记》昆山陆容著

《寓圃杂记》王诤著

《枝山野记》姑苏祝允明著

《双溪杂记》太原王琼著

《病逸漫记》昆山陆鉞著

《马端肃三记》马文升著

《困知记》泰和罗钦顺著

《北征录》新淦金幼孜著

《传信录》顺德梁亿著

《否泰录》永新刘定之著

《出使录》李实著

《琐缀录》泰和尹直著

《庚己编》姑苏陆粲著

《枫山语录》兰溪章懋著

方志11部：

《大明一统志》

《湖广通志》

《广西通志》

《江西通志》

《云南通志》

《广州志》

子部儒书1部：

《大学衍义补》琼山丘浚著

文集31部：

《革朝遗忠录》

《诚说录》昆山秦鏊著

《舆地图纪》安仁桂尊著

《九边图论》灵宝许论著

《群书类考》兰溪凌瀚著

《孤树哀谈》

《今献汇言》衢州应鸣凤辑

《灼艾集》万表辑

《双槐岁抄》香山黄瑜著

《余冬序录》郴何孟春

《天顺日录》南阳李贤著

《守溪长语》姑苏王鏊著

《震泽长语》王鏊著

《绿雪亭杂言》清江敖英著

《琅琊漫抄》姑苏文林著

《县笥琐探》姑苏刘昌著

《青溪暇笔》金陵姚福著

《古今识鉴》鄞袁忠彻著

《北狩事迹》金台杨铭著

《立斋闲录》莆田宋端仪著

《汪循日录》休宁汪循著

《山东通志》

《广东通志》

《四川通志》

《福建通志》

《中都志》

《皇明文衡》休宁程敏政辑
 《宋潜溪文集》浦江宋濂著
 《杨文敏集》建安杨荣著
 《陈琴轩集》东莞陈琏著
 《刘古直集》寿光刘珣著
 《何椒丘集》广昌何乔新著
 《琼台类稿》丘浚著
 《怀麓堂稿》李东阳著
 《石淙稿》巴陵杨一清著
 《程篁墩集》休宁程敏政著
 《张东白集》南昌张元祯著
 《罗一峰集》永丰罗伦著
 《杨文恪集》杨廉著
 《李空同集》李梦阳著
 《王阳明集》余姚王守仁著
 《霍文敏集》南海霍韬著

《高皇帝御制文集》
 《杨东里集》泰和杨士奇著
 《王抑庵集》泰和王直著
 《吴康斋集》崇仁吴与弼著
 《陈白沙集》新会陈献章著
 《彭从吾集》莆田彭韶著
 《杨文懿集》宁波杨守陈著
 《杨碧川集》宁波杨守址著
 《吴匏庵集》姑苏吴宽著
 《姚东泉集》慈溪姚镛著
 《林见素集》莆田林俊著
 《桃溪集》台州谢铎著
 《柴墟集》泰州储懔著
 《矩洲集》南海黄衷著
 《郑少谷集》闽郑善夫著

(二)间参《明实录》

《通纪》有否参考过《明实录》，这个问题有争议。孟森认为参考过《明实录》，称“明人节钞《实录》，即名为纪，盖自陈建之《皇明通纪》始。此书备科举场屋中对时务策之用。故陈建《通纪》以后，撰续通纪者甚多”。^[12]笔者持否定意见，认为“称陈建抄实录成《通纪》，绝对是无稽之谈”。^[13]我的理由是，在嘉靖时代，《明实录》尚是宫内秘物，外人根本不可能读到。明实录的传抄，始于嘉靖年间。当时仅个别权臣拥有《明实录》抄本。严嵩是嘉靖十五年（1536）入阁的，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败后，籍没财产名单，其中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14]这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嘉靖二十八年（1549），吕本人入阁，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得有机会，抄录实录中关于馆阁的资料。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守制时，类编成《馆阁类录》，隆庆三年（1569）修订成稿。^[15]万历初年（1573），王世贞曾在前首辅徐阶家阅读明实录，这表明徐阶家拥有实录抄本。严嵩家《明实录》显然为政府所没收，徐阶家实录抄本，虽可抄录，但正式出版却是万历中期的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刊于其万历十八年（1590），《馆阁类录》刊于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

这次，因有得机会阅读陈建《通纪》原著，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我注意到，“采据书目”中有《历朝圣政记》一书。明朝所谓《历朝圣政记》，就是《明实录》抄本的别称。再细读《通纪》，在内容上也有所体现。

一是直接提到“国史”。有四处。

《通纪》永乐二年，“按此《实录》所记洪武初，以东胜、兴和、开平、大宁为边”。

《通纪》永乐十三年正月，前交趾参议解缙死于锦衣卫狱，徙其家于边。国史本传称：“缙文学书礼，冠绝一时，其为人旷易无城府，喜荐引士，然少慎择，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辽东，洪熙初始赦还。”

《通纪》正统十一年杨溥条，也提到国史。“国史谓：三杨同为内相，士奇有相业，荣有相才，溥有相度。”据《英宗实录》卷一四三，正统十一年七月庚辰“溥在内阁，与士奇、荣皆杨姓，时号三杨。三人者，各有所长。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天下引领焉。溥尤谦小心，趋朝循墙而走，儒之淳谨者也”。这说明《通纪》是概括，不是全部引用。

《通纪》成化二十一年，“盖珣多谈论，不知者或目为狂躁。国史正为珣辨此诬云：然珣自论王直后数年，实鲜闻诤救。至是，始以仇孜省去，岂阳城之有待而然与？吕端之所谓‘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珣或其俦与？”

二是某些内容与实录同出一源。如：《通纪》龙凤六年许瑗见朱元璋一事，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五月丙辰一段对话相似，惟个别词不同而已，《通纪》作“予用英雄，有如饥渴”，而《明太祖实录》作“予思群贤，有如饥渴”。《通纪》不少对话非常生动，这些生动的对话，必定出自国史，否则，不可能那么详细。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通纪》参考过实录。问题是，到底参考了多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通纪》实际状况来看，某些年份的事迹记录十分简单，特别是后编，可以说，越到后来越简单，这应该不是参考实录才会发生的事。如有实录可参考，一定会详细，不会简单到如此程度。我以为，陈建所谓《历朝圣政记》，可能是《明实录》的节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仍有《永乐圣政记》、《文庙圣政记》（存9卷）、《宣宗圣政记》（存12卷）、《圣政记》（不分卷，清抄本）、《洪武圣政记》（12卷）、《新刊皇明圣政记》（10卷）。甚至可能仅洪武朝实录，如嘉靖时期的陆深给儿子的信中就提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可也”，^[16]说明《圣政记》即《太祖实录》。作为一个下层官员，又退休在广东，陈建要想看到完整的《历朝圣政记》抄本是比较困难的。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历朝圣政记》绝对不应是《通纪》的主要参考物，而仅是部分参考而已。如果是主要参考物，应该列为参考书目第一位。

如此说来，陈建撰写《通纪》过程中，搜集到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资料，既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修的作品，也有私人修的作品，并不完全是“野史”。所以，从材料来源来说，《通纪》是“不苟”的。

（三）关于《通纪》的史实错误

《通纪》作为第一部明朝历史著述，内容上当然可能出现差错，所要讨论的是差错率高

低问题。据笔者研究,前代学者批评《通纪》者并不多,就王世贞《史乘考误》有五处提到了《通纪》: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资治通纪》言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红罗浮来,遂取衣之。郑氏《征吾录》及故所居名红罗障。及高氏《鸿猷录》亦因之。《实录》载瑞兆多矣,独不载此,恐亦传闻之误。”《史乘考误》怀疑朱元璋早年一段经历,但没有直接证据,仅提出怀疑而已。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通纪》言擢监察御史韩雍为右金都御史,巡抚江西,非也。韩公还朝后,迁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岁,以陈芳洲荐迁。今记载于十四年土木之变前,亦非,乃景泰元年事。”据《明督抚年表》卷四尹直《韩公雍言行录》(见《明名臣琬琰录》)就有“己巳,少保陈先生循知公之才,特荐升右金都御史,巡抚江西。”也就是说,韩雍为右金都御史巡抚江西事在景泰二年十二月丙戌。于此可见,《通纪》也有来源,不能说错。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资治通纪》言五月上崩,九月李孜省有罪伏诛,僧继晓发原籍为民。按:孜省下狱谪戍矣,后复逃还京师,始复拷死于狱,原非论斩也。继晓先以取药诈还,为有司执送,斩于市。今纪似俱未真。”这条见成化二十三年(1487),转述略有误,“上崩”在八月,非五月。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资治通纪》弘治元年冬,礼部尚书周洪谟致仕。洪谟被论,与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同免,今不载。”这条属于补充。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通纪》言左副都御史邵宝罢,后起为礼部侍郎,以母老乞终养。按:宝再起为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始,乞终养。今言起为礼部及不出者,误。又言许尚书进卒于五年十二月,马尚书文升卒于七年,俱非也。二公俱卒于刘瑾未诛之先,马卒六月内,寿八十五,许卒七月内,寿七十六。又云:诏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按:秦所请者牧马草场地耳,非封壤也。”

笔者在标点时,也注意到《通纪》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至九月间“锦衣卫都指挥金事纪纲以卖权作威,伏诛”条,时间过于模糊。据《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八,纪纲伏诛时间在七月乙巳。《通纪》列在四月以后,让人误以为就是四月之事。

总体上看,《通纪》内容上的出入数量不多,在正常的误差率之内。《通纪》是一部可信的明史著作。

(四)《通纪》的史料价值

从今天眼光来看,《通纪》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的史料价值表现为:

历史评判价值。如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丁巳胡广卒,《太宗实录》卷二百讲到胡广,肯定多,但《通纪》却是批评多。这正是实录与史著不同之处。《实录》是政府场域的作品,《通纪》是历史场域的作品。前者体现的是现实评论,后者体现的是历史评价。

稀见史实记录。《通纪》写作时,参考了杂史,故而也不同于实录。如成化二十三年,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事丘浚进所著《大学衍义补》,得到皇帝的肯定,“仍命礼部发福建书坊刊行”。这里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大学衍义补》首刊于福建;二是当时明朝政府习惯将书籍发到福建书坊刊刻,从“仍”字来分析,应是常规。

书中某些特殊见识,也有可取之处。如理学家陈选这个人物,前人注意不多。陈建对陈选理学地位的评价相当高,后编卷十八,天顺二年(1458)称“我朝理学之士,薛文清瑄、陈克庵选为最”。这个判断基本准确,刘宗周接受了这个观点,称“愚按先生躬行粹洁,卓然圣人之徒无疑。其平生学力,尽见于张聚一疏,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通纪》评理学未必尽当,而推许先生也至矣”。^[17]陈建何以如此高估陈选?原来,陈选担任广东左布政使期间,有功於广东。后编卷二十四,成化二十二年(1486)条,“广民疲困,为除徭役,罢和买,备赈济,务为惠养计。……选立志以古圣贤自期,待自奉甚俭,操履诚恇。其居此官,必欲尽此职。其行此事,必欲尽此心。其视去就为甚轻,一在于生灵国家,余不恤也。宦辙所至,无不感动响应者,名重海内。士大夫无问识与不识,论一时正人,必金曰陈某。”如此言行一致的模范官僚,自然应该受到重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的地方官政绩,只有各地方上人才会如雷贯耳,其他地方一时难以体认到。广东士大夫陈建向大家推荐了这么一位优秀的理学家人选,其见识是合理的,自然应该受到重视。

陈建《通纪》是一部集叙事、致用、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优秀史学作品。^[18]笔者《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以陈建〈通纪〉为中心》将专门作讨论,此不详。

参考文献:

-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
- [3]陈建及其《皇明启运录》[J]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2,(1)《通纪》:一部富有时代色彩的史著[J],浙江学刊,1994,(1);陈建社会改革思想述略[J]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3,(2);陈建《通纪》及续补诸家略考[J]文献,1993,(3);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其影响[J]史学史研究,1993,(1).
- [4]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5]冯梦楨.通纪述遗序[A]见卜世昌,屠衡.通纪述遗(卷首)[C].
- [6]卜万祺.通纪述遗序[A]见卜世昌,屠衡.通纪述遗(卷首)[C].
- [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C]著述·焚通纪[A]
- [8]吴炎.吴赤溟先生文集·答陆丽京书[C].
- [9]四库全书总目(卷132)检藏随笔提要[A]
- [10]邓元锡.函史(下编卷13)[M]经籍记[A]

- [11]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6.
- [1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C].书明史钞略[A].
- [13]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28.
- [14]天水冰山录[A].武宗外纪(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C].上海:上海书店,1982.134.
- [15]吕本.馆阁类录序[A].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影印本.
- [16]陆深.俨山集(卷96)[C].江西家书[A].
- [17]黄宗羲.明儒学案(首卷)[C].师说·陈克庵选[A].
- [18]钱茂伟.皇明资治通纪[A].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334-343.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史学史研究所)

东海三司马的别业及其结社活动

——兼谈甬城的诗社与别业

袁 慧

【摘 要】 本文以史实为基础,论述、考证明嘉靖年间甬上“东海三司马”的别业及其结社活动的政治倾向,并兼谈自宋迄清初甬城名人结社与营造别业的鼎盛之风。

【关键词】 东海三司马;诗社;别业

一、东海三司马

明代嘉靖年间曾三位叱咤一时的人物,他们同时、同籍、同里,均为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年青科场得意,担任过同样的官职,到了五十几岁,都遭弹劾罢官同样命运;他们三人是好友,有的还是姻亲。这就是人称“东海三司马”的范钦、屠大山和张时彻。

屠大山(1500—1579),字国望,号竹墟。嘉靖二年登进士籍,累官至京兵部侍郎,有《竹墟集》、《司马集》等稿。

张时彻(1500—1577),字维静,号东沙。嘉靖二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和南京兵部尚书,著《芝园集》、《芝园定集》、《芝园外集》、《摄生众妙方》、《救急良方》等。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天一阁集》、《奏议》等。

关于范钦及屠、张两公的事略,可参阅拙作《范钦评传》(宁波出版社,2003年月12月第1版)及《评传》中的《东海三司马》篇,此处不再赘述。

三司马回里后,虽然都自称优游林泉,饮酒赋诗,颐养天年,但谁都未敢忘记国是和乡梓公益。他们热心推举贤吏,表彰抗倭将领,关心地方教育和农田水利事业等等,实是身在野而心仍在朝。

从南宋以来,月湖一直是浙东学术人士的活动中心,也是明州文人墨客进行学术交流和应酬唱和之处。东海“三司马”也未能例外,常常在此会友应酬。又因张时彻有一别墅在

东钱湖畔,名曰“茂屿山庄”,环境极佳,故诗社活动多移至山庄举办。

二、略谈甬城的诗社

唐宋以来,文人团体就有了结社吟咏之风气,最早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洛阳九老会”。文人诗友出于共同的爱好,互相唱和,既能表露心声,又可达到切磋琢磨、加深友情和扩大交往的目的,有时还将唱酬的诗篇,裱编成集,刻印成卷。然而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里,结社也可能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明清鼎革之际,某些诗社就成了反清复明的活动场所和掩护形式之一。

诗人结社的风尚在甬上也很盛行。据全谢山先生及当今学者考证,光是从北宋中后期至清乾隆前期,七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甬上知名诗社就不下数十家,多数集中于月湖(又称“西湖”)及其四周,其次则集中于日湖(又称“南湖”)。月湖在鄞县的城里,虽然面积不大,但湖水轻漾,风光绚丽,布局精巧,有许多拱桥、楼阁、亭榭和岛屿——月湖十洲,藏书楼也不少,是历代名宦和学人理想的择居和游憩之地,月湖因此成了甬上人文荟萃之处。

粗略统计,月湖及月湖周围文人结成的诗社(不包括僧人诗社)就有:

北宋元祐绍圣间丰稷、周师厚、舒亶、陈瓘、晁说之等人组织的诗社。

南宋初,高宗建炎至绍兴年间顾文、王珩、蒋璿、薛朋龟、汪思温等组织的“五老会”,“以孝友倡乡里淳庞之俗,唱酬亦日出”。未几,王珩、薛朋龟逝世,由参政王次翁出面号召,另组“八老会”,即在顾文、蒋璿、汪思温之外,增加了王次翁、高阅、吴秉信、徐彦与陈先五人。

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魏杞、史浩、张武子等组织诗社,名为“尊老会”,以史浩为核心,唱和颇勤,所谓“绿野平原,篇什极盛”。

与之基本上同时的有“真率会”,盟主为楼钥的舅父、刑部侍郎汪大猷,参加者有魏杞、史浩等十余人。

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杨简、袁燮、楼钥、吕祖俭、史守之等以道学为诗,结成诗社。因以义理入诗,不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而楼钥却不是这样的作风。稍后继之者有高似孙、史弥宁的诗坛,从事苦吟。此外还有史宅之、史定之、赵汝楨发起的诗会。

咸淳以后,高衡孙、陆合、汪之林等四十余人也有集会,一月一集。

宋末元初,王应麟、陈允平、舒闰风、刘正仲、陈子翬、郑奕夫、徐本原、章垒等遗老,自相唱酬,虽未定名,性质类似“遗老雅集”。

元泰定年间,袁桷、袁裒、蒋远静等共组诗社。

明成化时,洪常、严端、宗祐、金湜、邹闾、周颂、倪光、章珍、李端、张憬、宋恢等人,志趣

相投,布衣藜杖,携酒蔬散步林野,吟咏唱和。

明弘治年间,屠濬、李端、魏冉、金湜、倪光、杨守随等亦有诗社。

明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张时彻、屠大山、范钦三司马先后遭劾归里,结成东山诗社,投闲咏诗,时暗寓报国未伸之志,以及遭谗被黜的郁郁难平之意。

与此基本同时,杨茂清、董垓、戴鲸等共同发起“耆英雅集”,其集句刻成《耆英大雅集》。

明万历年间,全天叙、吴礼嘉、周应宾、汪礼约、屠本峻等组成林泉雅集(亦称“林泉诗会”),地点在木樨井全侍郎宅,推屠本峻(屠大山之子)为社长。

值得一提的,万历年间还有一位文学家兼戏剧作家屠隆,“在他的月湖之滨的家中,有一个别有情趣的家庭小诗社,他的夫人、女儿(屠瑶瑟,字湘灵)、儿媳(沈天孙,字七襄)均有诗才,常于家中举行诗会,彼唱此和,常常诗稿遍地,成为月湖诗坛的一段佳话。”(季学源、张如安《月湖的诗社》,载于2005.12.9海曙区政协《文史资料》)李邕嗣编撰的《甬上耆旧诗》中,收有这些才女们的诗,并有说明。

明末甲申后,有林荔堂、万泰、徐凤垣、李邕嗣、高斗枢、高斗魁、董守谕、沈士颖、梁以樟等结社,称为“九人之叙”。余生生、陆宇鼎、董剑铎、叶谦、陆昆、宗谊、范兆芝有“湖上七子”诗社。

此外,还有“南湖九子社”,参与者为“明州九子”,即徐振奇、王玉书、邱子章、林时跃、高斗权、钱光绣、高宇泰、徐凤垣、李邕嗣的九人诗社,郑梁、周斯盛、姜宸英、董道权、舒后村、胡鹿亭、张萼山等鹤浦诗社。

清乾隆十七年,余祖望、陈南皋、钱芍庭、李甘谷、胡君山、董钝轩、范絨翁、董逸田、李海若、张月性、徐宏度、董映泉、董梅圃、史雪汀竺共组□□诗社。

此外,较著称的有“西湖八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西湖八子社”以甬上望族砌街李氏“三李”之一的李文缵为主盟(“砌街三李”另二人为李文纯与李文胤),成员有董德称、沈时颖等。“西湖七子社”以董剑铎为主盟,成员有宗谊、范兆芝、陆宇燮等,以陆宇燮的诗歌成就与著名度较高。“南湖五子社”有林时对、周元初、高斗权等。

还有全美闲创办的“弃襦社”,李文胤的“鉴湖社”,林时跃的“鹤山七子社”,全美楠的“五子集”等,不一一细述。这些诗社社员,往往可以交错重复,一人兼人数社也是常见的。

当时的月湖又称西湖。另有一日湖,在月湖南不足二里处,靠近昔日吕祖殿、延庆寺的地方,又称南湖。这两个湖成了当时诗人经常活动的场所,尤以月湖为甚。

三、甬城缙绅营造别业之风

历代为官之人，发迹后除了营建宅邸外，往往还在风光宜人的地方谋建“别业”（别墅），尤其在致仕归里以后，这方面的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一边安享天年，一边用以读书、著述、藏书、宴会亲朋、交结同好、以文会友和吟咏唱酬，这些都属于文人雅事，是物质享受与精神生活的结合。至于别业的规模和设施，则量力而行，可俭可奢，不求一律。

宁波的官绅阶层，大都也有这种爱好，蔚成风气。自宋迄明，月湖及其周围，就有许多别业，举例如下：

宋舒亶“懒堂”。《延祐四明志》载：“舒中丞亶有园在西湖，归里后与丰清敏、周四休（铎）倡酬，陈忠肃、晁景迂咸与焉，所谓‘懒堂’者也。”

楼氏“锦照堂”。《宝庆四明志》称：“楼楚公异守乡郡，筑‘锦照堂’，刻御书‘锦照’于其上。”

史氏“真隐观”。宋丞相史忠定公（浩）读书处，实际上也是他的别业。乾道中，高宗御书“真隐”二字，遂以为观，其地在月湖竹洲，后又得御赐“四明洞天”四字，藏于宸奎阁，因此又改名为“四明洞天”。

楼氏“攻媿斋”。“在县南昼锦坊，楼宣献公（钥）所居。”（张时彻主纂《嘉靖宁波府志》）。别业内有“白醉阁”、“登封楼”、“仰嵩楼”，系宣献公读书和藏奇石（嵩山石）之处。

汪氏“友恭堂”。汪思温之子汪大猷所建之别业。

史氏“山石居”。史文卿别业，“史使君文卿自号‘石窗山樵’，好聚四方奇石，筑堂曰‘山石居’。”（《四明谈助》）

陈氏“南湖小筑”。南宋末年沿海制置使参议陈允平别业。

陈氏“遂初堂”。山西行太仆卿陈沂之别业，另有别业在大涵山，名“拘虚馆”。

王氏“竹林”。南宋末年王应麟之别业。全祖望《湖语》称：“深宁先生封鄞县伯，故所居亦别业称‘锦里’，竹林其别业。”

明丰氏别业。月湖畔虹桥巷有丰氏别第，丰清敏公（稷）置，后属别姓，至明嘉靖年间，丰学士熙买回，恢复故业，人称“丰榜眼宅”。

全官詹别业。“官詹公（全大叙，号元洲）归里，筑平淡斋于洲东（竹洲之东），构松窗于洲南，在月湖之滨。”（嘉靖《宁波府志》）

陆氏“拗花园”。在“竹屿西南，濒湖，面桃花堤。其初为孙秀才之业，后归孝廉陆起元。”（《四明谈助》）

施氏“清风阁”。施翰，明万历年间任云南神机营都督佥事。在月湖东岸菊花洲宝奎里，“种竹万竿，逍遥憩息。”（闻性道纂康熙《鄞县志》）

四、“东海三司马”的诗社与别业

屠大山、张时彻和范钦，他们三人也同样在家乡置有别业，并结成诗社。

“三司马”中以张时彻拥有别业最多，规格也较高。他的别墅有茂屿山庄、武陵庄、清溪别墅、燕翼堂、心远堂、望田楼、萧园、月湖精舍、宝纶堂等近十处。

在张时彻的别业中，茂屿山庄无疑是最主要的一所。据《槎湖张氏宗谱·第宅·茂屿山庄》载：“在县东南四十里，旁有龟山、蛇山、琴山，形象酷肖。东沙公构庄其上，为别墅，一时文学之士，多有陪侍。之章门左琴山上，有步虚亭；后圃寒涧，在门梁石而渡，小山幽艳，花木涓涓，亭曰‘品山’，沈嘉则所命名也。”张时彻自撰之《茂屿庄记》云：“一日，暮东钱湖之胜，与客游焉。沿回绝境，至云龙、龟山之间，水泽浩淼，旷野周遭，奥区奠于山麓，曲隈互于河干，恍若桃源之遗迹，问其名，客曰：‘此昔人所称茂屿者也。’引步而前，坐一村庄，蓬茨为户，四壁黝剥，上漏下湿，无布席之所。举首而望，则见碧巖横陈，角蹲虎伏，其净如洗，其平如斫，名曰‘偃秀’。其外，峭壁巖崿，摩切云间，其名曰‘翠屏’，盖睇瞩者久之。反步二十余为堂，坐庚而向申，题曰‘茂屿山房’。其左为厅事四楹，为宾燕之所；又左为场屋四楹，牛衣、农笠、耒耜、铲耨在焉；其右为仓四楹，以储纳穰稂；又右为屋四楹，守仓者居之。堂之后为楼，四面空旷，引睇无际，昼则清泉泄于石根，长虹栖于木末；夜则挂星斗于檐阿，丹霞彩线，皓月流光，乘户牖而入，交影床榻间，题曰‘聚奇楼’……而亭其中，其左则苍雪、飞凤、平麓、宝华诸山，其后则断峽、绣岭、横几、挂榜诸山，其右则席帽、鼓角、凌霄、绿城、虎啸诸山，其前即偃秀、翠屏诸山，而兔山、顿香、东吴、小白参差在望，因与客议亭名。而沈子嘉则题曰‘品山’，盖谓登斯亭也，诸山历历，皆可品题，又谓众山品列，献秀于此亭云耳。诸皆以为宜。”

由于茂屿山庄环境清幽，设施齐全，主人又好客，成为当时诗人墨客向往的佳处。“满浮春雨酒，高枕夜床书”；“不识尚书贵，山中幽事多”；“品山亭下品山人，日日山中不记春”。这些都是诗人们发自内心的赞美，难怪不少人要在此流连忘返了。

武陵庄。在甬城西，与茂屿山庄东西遥应。《四明谈助》称：“武陵庄在城西林村，亦东沙公别墅。”张时彻自撰《武陵庄记》云：“出郡城而西四十里，是为林村，其山则有武陵、圣公、庄溪、罍湖，大都川泽回互，冈岭盘旋，非渔师、野峻不习其处。余初得二庄，一曰‘花庄’，一曰‘小庄’。花庄以其华也而弃之，小庄以其陋也而弃之，不复止矣。近复得一庄，与前二庄鼎足而立，不华不陋，颇为雅饰。……余乃稍加修饰，题之曰‘武陵庄’，盖其地有武陵桥，则

以之名庄固宜。……庄之左则小庄在焉，限以清溪渡二桥，乃至陋，因其旧而新建一轩，名曰‘清溪别墅’，亦以供游衍耳。”

武陵庄的幽美自然环境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诚如李生容诗所称赞的：“人舟武陵曲，为访平泉庄。绿树临暗流，青莎绕路长。一花迎客棹，诸翠拥山房。咫尺名园在，应同泛碧觞。”从此，甬城的文人诗客又多了一处吟咏结社、休闲怡情的地方。

宝纶堂。在月湖内原湖心寺废址，东沙改建别墅，作为藏诰敕之所。这说明张时彻在月湖十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月湖精舍。《敬止录》称：“嘉靖三十二年，尚书张时彻改度湖心寺为已书院。”即月湖精舍。月湖精舍与宝纶堂可能是一处，宝纶堂是月湖精舍的一部分。

萧园。在日湖。《四明谈助》提到：“（萧园）在南湖滨，东沙公遗构，子台明加辟之。”屠本峻诗中有“见说南湖曲，张卿别馆齐”之句。

燕翼堂。在世卿坊内，亦称“新尚书房”，原为别墅，后成为东沙新宅。大门朝东向开，悬有一匾，曰“清朝宠命”。仪门向南，也悬有一匾，曰“永昌世祚”。正厅曰“含春堂”，东厅曰“停云”，西厅曰“游艺堂”。两边的楼房：左曰“燕翼左轩”、“宾暘”；右曰“望麓后堂”、“息游”。（据《张氏宗谱·第宅》）

望田楼。在燕翼堂之后。因旁连田陌，可以四时观稼，东沙自署曰“上农夫”，以志归田之乐。（据《张氏宗谱·第宅》）

“三司马”中，张时彻财大气粗，拥有别业最多，地位和文名也略高一些，因此无形中成了当时的文坛盟主。另外两位“司马”，别业为数不多。

屠大山别业名为二所，实际上只有一处，就是在其住宅内的遂初堂和霞爽阁。据董沛主纂的光绪《鄞县志·屠大山传》记载：归田之后，“大山居家二十年，清约如寒士，下键却扫不过他客。与里中父老会，辄曰‘老臣无状当死，赖主上恩以有今日，敢有他冀乎？’隆庆初复官，老而益壮。年八十卒。”

又据屠志恒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谱》（民国既勤堂木活字本）载：“屠侍郎宅，县治西北百余步，鉴桥东，在元为方元帅（方国珍）第二府，入明为万指挥衙，（明初）信国公（汤和）尝驻节焉。旧有二柏，元方氏盆中物，公移植于庭，盘曲夭矫。乾隆甲子（1744）秋飓风，坏其一。”

“遂初堂，在鉴桥，侍郎屠大山建于第之西。”但实际上的建造者并非竹墟本人，而是其子本峻。故《宗谱》又云：“嘉靖年间，辰州幽叟公（屠本峻）以司寇郎陈情归，建（遂初）堂于宅之东偏，以为父司马公娱老之所；后起一阁，名曰‘霞爽’，枕江而溪，制极宏敞。辰州读书其中，致足乐也。”

笔者为鉴桥袁氏，世居鉴桥，与屠尚书第毗邻。解放初期，尚书第仍在，门第古朴，置有

高大石鼓一对,俗称“屠家花园”。常听家父说起,他幼时就读于屠氏义庄(后改竞进小学),同班同学中有屠氏后裔,常去屠宅游玩,并邀至书房共读,园内景象,记忆犹新。他说,新中国成立前,苍水街半是河道,名曰“甘溪”,后因道路扩建,填河筑路。所谓“枕江而溪”,江即甬江,屠宅北首离甬江不过百公尺左右,登“霞爽阁”,如练甬江宛在目前;溪则甘溪是也。屠宅旧址就在今市府苍水街后门对面,屠园小区即是。

范钦的别业有两处或三处:一是“十洲阁”,系丰氏碧沚旧业,由丰坊出售给范司马。范钦将“十洲阁”一宅数用,濒湖之阁,用作燕会宾朋,吟咏唱酬;主屋则改作家祠,塑己像于其中。《四明谈助》里面记着:“少司马东明先生有别业在碧沚”。相传范司马美丰鬣,塑像其中,神气如生。高宇泰《敬止录》亦有记述:“碧沚亭,皇明以来未考属谁,正德间为丰考功坊所有,后售与兵部侍郎范钦,塑己像其中。”另一处别业,在城西望春山麓的溪隐庄,又名“望春庄”,系利用旧时坟庄,因陋就简稍加修葺,既是坟庄,兼作别墅。但碧沚与十洲阁又可能为一处,故曰二处或三处。

范钦本人亦有《过碧沚》诗:“草阁悬湖上,春来一漫游。露华浮小径,兰气袭芳洲。笑我便鱼鸟,从人呼马牛。渔郎亦何意,欵乃下中流。”(《天一阁集》卷八)又《秋日集十洲阁泛湖次池南韵》:“仙侣相将孤岛中,恰逢秋色上帘栊。城开树影千峰出,天落湖波一镜空。洗爵故当龙女窟,乘槎疑触广寒宫。清谈细酌何辞晚,华月应开此夜濛。天青湖白总堪披,不藉冰轮一举后。户外笙歌三岛路,水边鱼鸟隔年思。香生庭桂花齐发,晚入江云雁独知。莫讶幽襟持不得,满林风露夜阑滋。”(《天一阁集》卷十四)其他谈到“十洲阁”紧倚湖旁的诗还有几首。这些诗写得明明白白,“十洲阁”是挂靠于湖上,春来偶作漫游,与地处陆域的天一阁绝不是一处,不是已写得非常明确了吗?

其实“十洲阁”来历已久,原名“寿圣阁”,在归属丰氏之前,已经出名了。《四明谈助·南城诸迹二下·十洲阁》转引舒信道(真)《西湖记》记云:“元祐八年,刘纯父(推)守是邦,浚西湖,增卑培薄,环植松柳,复因其积土广为十洲,而敞寿圣之阁,以其名名之。”明沈嘉则《十洲阁》诗亦提到:“高阁俯平流,居然旧十洲”,可见“十洲阁”之由来。

关于“十洲阁”的记载,“三司马”的诗作中多次有出现,如范钦《夏日集“十洲阁”》:“坐里芳湖社,差池易隔年。凉飈催送酒,落日故停船。树影摇虚阁,渔歌杂采莲。时平捐物里,早已得真筌。”(《天一阁集》卷九)又《碧沚园屠、张二司马燕集用韵》中,亦有“草阁湖中央,依稀濠濮乡”之句(《天一阁集》卷八)《七月晦集诸彦于“十洲阁”》诗则曰:“此日暝全落,相看赏亦多。风砧停午籁,霜镜展秋波。不遣玄言尽,其如高会何?晚来暝色起,满地竹枝歌。”

“十洲阁”究竟在月湖的哪一洲?是否就在碧沚?从前的人已经不大搞得清楚,何况今人?笔者根据全祖望《鄞西湖十洲志》一文(载《鮑亭集·外编》卷四十九)做一些分析,原文较长,我只述其大意,并引用一些必要的语句。谢山先生说,关于月湖十洲的方位,由于宋

代以来的方志舆图有缺失,致使后来的《鄞县志》(主要指闻性道编纂的康熙《鄞县志》)有讲得对的,也有不对的。他只能据“当日十洲之诗,参以志乘,尚可仿佛其大概云。”他得出的大致结论是:“月湖十洲”,“在湖中有四,两岸各分其三。”又说是“寿圣院为十洲首,即花屿也。前辈张瑶芝以为芙蓉洲,谬也。”对于碧沚的确切所在,舒亶《芳草洲》诗有“屿花汀柳自相依”之句,“明范侍郎指为碧沚,其说是也。盖碧沚最居北,柳汀在其南,花屿又其南,自史氏构别业后,始改名碧沚。”至于“十洲阁”,原在花屿寿圣院,不知何时废,谁也没有提起过,何时何地复建,具体资料也找不到。到了明代嘉隆年间,我们只知道范钦拥有“十洲阁”,这方面的诗很多,其中沈明臣《十洲阁》诗最堪玩味,有“高阁俯平流,居然旧十洲”句,使我们可以形象地领会到这个“十洲阁”面临月湖,可以俯瞰大部分月湖景色,又是胜过旧十洲。可见此时此阁乃是新阁,仍以“十洲”命名,或将原有楼阁改名“十洲”。我是既找到一定根据,又不能完全肯定,特提出此问题与有关研究者共同商榷。谢山先生说得很对:“陵谷尚有变迁,何况湖上之区之者。”因此,笔者仅提出自己的观点,范侍郎在月湖的别业可能是两处,也有可能这两处可以合二为一,原是一处。这个“十洲阁”是后来重建或后来命名的,犹如宋时的超然亭在柳汀南岸,今之超然亭(更名为超然阁),已搬至偃月街、马街衙街口了,昔时尊经阁在府学(旧体育场)内,今日之尊经阁已迁至天一阁内一样。

范钦另一所别业叫溪隐庄(又称望春庄),在城西望春山麓,与桃源乡相去不远,范侍郎的祖上有好几辈都葬在那里。因其地清雅,山秀水美,近处可停舟舸,故稍加修缮,兼为别墅。

范钦《溪隐庄》一诗,描绘庄园幽静脱俗环境:“深溪藏迹地,名胜是桃源。老桧遥盘径,青山直对门。春来花竞发,雨过水初浑。邻父能相访,幽期欲共论。”(《天一阁集》卷七)另一首诗《溪隐山庄》,则叙在此的旷达心情:“山居异入境,忽漫杖藜来。林鸟随时换,庭花作意开。流年双短鬓,清世一凡材。月出舒长啸,幽心亦畅哉。”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范司马的两处别业,均是一庄两用:“十洲阁”是家祠为主,兼顾别业;“溪隐庄”则是坟庄兼别墅。如果要与张时彻在东钱湖的茂屿山庄和在鄞西的武陵庄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

五、“三司马”东山诗社名称的由来及其特色

三司马相继被劾致仕之后,建立东山诗社,这在三司马的作品中可以得到证实。如张时彻《村居贻赠三友·范东明少司马》诗云:“投劾归来海上洲,初从羽客问丹邱。青春每著闲居赋,白发难忘漆室忧。清世定应收楚璧,壮怀时自拂吴钩。东山正系苍生望,未许逍遥范蠡舟。”(《芝园定集》卷之十六)范钦《屠司马——病中奉怀同社诸公》一诗中说道:“功成

百战觅封侯，投劾归来半白头。触眼风波惊往事，放怀天地揽清游。赌棋晚结东山社，击剑时登沧海楼。只恐简书催物役，满林猿鹤不胜愁。”

“东山”是否实有其地，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商榷。我认为东山就是指茂屿山庄所在地，它既是泛指城东诸山，又是实地实称。所谓泛指，是综合东钱湖四周山峰的总称。湖开掘于唐天宝三年，号称三十六峰、七十二溪，山泉溪水汇注成湖，形成湖外有山，山外有湖，山重水复，气象万千。茂屿山庄一节中曾经提到过，它四周就有苍雪、飞凤、平麓、宝华、断峡、绣岭、横几、挂榜、席帽、鼓角、凌霄、绿城、虎啸、偃秀、翠屏诸山，故庄内山亭曰“品山”。所谓实指，据笔者所知，东钱湖东南，尚有一东山村，属管江乡，可见实有其地。不知此说是否能自圆其说，但我更倾向于泛指一说。

有学者说过，诗社的功能，不过是“游、宴、诗、酒”，从“三司马”的东山诗社来看，应当说还可加一个“议”字。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文人，而都是担任过朝廷要职的失落者，聚会时，免不了要“评议时政得失，月旦古今人物，抒发胸中郁结，忧心国是民情”，正应了《易·乾·人言》中的一句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类作品在他们三人的诗文集中俯拾即是。

如范钦诗作中为抗倭名将卢镗鸣不平的诗《送卢总戎解任》（《天一阁集》卷十二），无限同情地说道：“提师东伐树勋名，解印南归谢宠荣；正拟盟书颁幕府，翻令谤篋溷承明。眠鸥待月移江槛，战马嘶风恋野营；借问当年横海士，许身谁更请长缨？”写得慷慨悲凉！又如，范司马与另一个忘年之交，比他小三十六岁的东山社友屠隆的交往。当时屠隆仕途并不得意，有一次出任为颖上县令时，范钦就写了《长卿令颖上》一诗，勉励他千万不要灰心，来日必有建树。诗曰：“看君初得意，莽荡出尘埃。有鸟空中下，何花县里栽？饮冰存浚节，迎刃妙清裁。他日征奇绩，还应似汉才。”

屠、张、范三位司马，都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被某些御史以莫须有或捕风捉影的罪名弹劾下来的，他们回里以后，相濡以沫，互相同情、安慰、劝解，更加深了友谊。在“三司马”的集中，此类诗文以数十计，如范钦的《屠司马》诗，张时彻的《寿少司马东明范公七十叙》等均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被御史们根据个人喜怒好恶或宗派门户，“追求细故，罗织罪名”，直至假托民谣，以为佐证。三司马都遭同一命运被弹劾了下来。

明代的御史，真正“铁面无私”的寥若晨星，如海瑞、杨继盛、左光斗等，多数则揣摩君王旨意和好恶行事，有的干脆唯权相之命是从，故世人讥之为“劾鼠”。稍后，万历年间的名相张居正在死后还遭到他们的陷害。这三位司马最后还算幸运，固然在当时被参之后，立即停职待罪，并被贬回家，但经过多次讼冤以后，不实之词被相继推翻，获得不同程度的平反，准许冠带致仕，能享受到二品以上大臣致仕后的优厚待遇，并作为享有殊荣的荐绅，受地方官员和耆老们尊敬。

约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范钦得蒙昭雪。范钦在《春日述感》一诗中，流露着感恩和

欣慰之情：“诏下中朝日，逖分南国年。臣心元似水，帝德自同天。卧觉沧洲稳，名看白首全。春风殊有意，频见好音传。”（《天一阁集》卷八）还有一首《诏许致仕》：“解佩归来岁荐更，何缘恩诏出承明？伏波薏苡心仍见，陶令田园意始成。满眼苍山堪载酒，几人清世获逃名？交亲意气胡为者，却向风前叹未平。”

对国家大事和粉社民情，他们亦十分关注，特别对倭情、边警，更是时刻萦怀。

由此可见，“三司马”的结社，比起一般文人诗友的诗社来，更具有政治倾向色彩，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所赋予的必然性吧！

参考文献：

- [1]（明）张时彻等纂.嘉靖宁波府志[Z]，明嘉靖刻本，天一阁藏。
- [2]（明）范钦著.天一阁集[C]，明万历天一阁刻本，天一阁藏。
- [3]（明）屠隆著.由拳集[C]，明万历刻本，天一阁藏。
- [4]（清）闻性道等纂.鄞县志[Z]，清康熙刻本，天一阁藏。
- [5]（清）徐兆崙著.四明谈助[C]，清道光刻本，天一阁藏。
- [6]（清）董沛等纂.鄞县志[Z]，清光绪刻本，天一阁藏。
- [7]屠氏族人修.甬上屠氏宗谱[Z]，民国8年（1919）木活字印本，天一阁藏。
- [8]张氏族人修.槎湖张氏宗谱[Z]，民国木活字印本，天一阁藏。
- [9]范氏族人修.鄞城西范氏宗谱[Z]，民国钞本，天一阁藏。
- [10]马瀛等纂.鄞县通志[Z]，1927—1950铅字排印本。
- [11]冯贞群编.鄞范钦氏天一阁书目内编[C]，1940年钧和印刷公司出版，天一阁藏。
- [12]（清）张廷玉等编纂.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俞福海等编.宁波市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5。
- [14]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C]，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 [15]龚烈沸编著.宁波古今方志录要[C]，宁波出版社，2001。
- [16]袁慧著.范钦评传[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 [17]季学源，张如安著.月湖的诗社[A]，宁波：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资料[C]，2005。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序

骆兆平

宁波天一阁原是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当年碑帖收藏之富，不逊于明代著名的金石收藏之家。四百多年间，天一阁历经沧桑，碑帖由聚到散，散而复聚，其变动情况，记载在各时期的碑帖目录之中。碑帖目录和藏书目录一样，都是文献资源的信息库，《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全面反映了天一阁收藏碑帖的历史和现状。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后，在湖广、北京、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做官。宦迹所到之处，均留心收集典籍，寻访碑帖。他的侄儿范大澈在《碑帖纪证》一书中，就记载了一次两人共同寻访《唐云麾将军李秀碑》的事，文云：“嘉靖己酉，余随仲父入都。仲父转官东归，余送至良乡，往觅此碑，已分为二，作明伦堂柱础……余甚惜之。”同书中还记述了自己所藏《周易仙太子碑》，为“仲父左辖时拓得赐及”。见“仲父东明先生”收藏的碑帖，有《唐明州刺史裴公纪德颂》、《唐干禄字书》、《历代钟器款识》、《英光堂帖》、《宋高宗真草孝经》等数种。由于明代编制的天一阁碑帖目录失传，这五种碑帖在现存清代《天一阁碑目》中都不见著录，所以，范大澈的《碑帖纪证》成了天一阁早期收藏碑帖的唯一直接史料。

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范钦去官归里后又从事抄书、刻书、访碑、刻帖等文化活动20余年，继续丰富了天一阁的收藏。

万历十三年(1585)，范钦去世。在此后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天一阁所藏碑帖处于封闭状态，除范氏子孙外，几乎无人过问。清康熙年间，黄宗羲破例登阁，取流通未广的书编为书目，也未涉及到碑帖。直至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重登天一阁，才发现：“独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尝发视，询之，乃碑也。”有的拓片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拓本皆散乱，未及装为轴，如棼丝之难理。”于是他着手编订碑目，并撰《天一阁碑目记》。尽管全祖望记云：“予订之为目一通，附于其书目之后。”但因碑目没有流传下来，仍有人以为“记先成而目如何，不可知也。”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钱大昕再次访阁，适张燕昌以摹石鼓文寓范氏家，便与范钦八世孙范懋敏三人登阁，整理碑帖，“拂尘祛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碑目由范懋敏编次并

增补,因碑目中已著录了“乾隆癸丑重立”的汉《孔君碑》,可知此目完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或稍晚之时。

范懋敏编《天一阁碑目》一册,嘉庆十三年刻本,是现存天一阁最早的碑帖目录。卷首钱大昕序称:“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现经统计,实际著数包括续增九十四种,共计八百零四种。明碑以近不著录。

近读清道光刻本无锡秦瀛撰《小岵山人诗集》,卷九有咏天一阁诗,诗前小序云:“登天一阁观藏书,范氏后人复出碑目一册,索题,为全谢册、全辛楣两先生前后订定,赋此。”秦瀛字凌沧,嘉庆时任刑部右侍郎。他所见的碑目,应是范懋敏编的《天一阁碑目》,这里明确记述了范编碑目与全编碑目的继承关系。我们从全祖望《鲒埼亭集》中有关天一阁碑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与范氏后人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如《宋绍兴府学襍帖旧本记》云:“天一阁范氏有绍兴学客不损本……范君永恒乞予记其家藏,予乃途次旧闻以题于后。”又如《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云:“薛尚功钟鼎款识二十卷,藏于天一阁范氏……范氏尚有副本,予见之嗜之也,以其副为赠焉。”如此,全祖望留存碑目稿或部分碑帖著录资料于天一阁,也是合乎情理的。

咸丰十一年(1861),天一阁藏书和碑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这一年,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城,赵之谦《刘熊碑跋》云:“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洞烂以造纸。迨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此后,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主持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在书目卷末附《天一阁见存碑目》著录存碑拓本仅二十六种。

民国三年(1914)天一阁藏书又一次大量被窃,碑帖也不能幸免。民国二十二年(1933),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时查看,天一阁碑帖已“散失殆尽”。

天一阁遗存的明代丛帖刻石有薛晨《义瑞堂帖》,丰坊《万卷楼帖》,和范钦《天一阁帖》。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打拓了二百套,分别赠送捐款人及参与重修工作的有关人员。事后,尚留存一部分拓片,可以说这是天一阁新藏碑帖拓本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天一阁管理机构在征集、收购古籍的同时,也注意收集碑帖拓本。尤其是鄞县通志馆、杨氏清防阁、朱氏别宥斋等公私藏家的馈赠,使天一阁新入藏碑帖数量激增。如今,碑帖拓本又成为天一阁文献宝库中光彩夺目却鲜为人知的宝藏。

为加强碑帖藏品的管理和利用,我们从1997年开始,有计划地对拓本进行整理编目。由于藏品来源不一,裱装本虫蛀现象严重,多年来在翻晒过程中造成一定混乱,因此,要寻找散页,考证著录,分类编排,较为费时费力。再加上人手不足,历时八年,才先后完成《鄞县通志馆移赠碑帖目录》、《清防阁赠碑帖目录》、《别宥斋赠碑帖目录》、《天一阁新增碑帖目录》。以上四种碑帖目录除了收录石刻拓本外,还包括少量以金、木、竹、砖等为载体雕刻文字图像的拓片,共著录4077种(按条目计,丛刻子目不计,合订本只计一种),9789页

(册),又复本4806页(册)。近现代出版的碑帖印本虽不属于文物藏品,但系碑帖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故分别附于各家目录之后。共计552种,1040册,又复本309册,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天一阁收藏碑帖拓片的全貌。

编目工作遵循尊重历史、科学、系统的原则。各家目录又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或分编,并尽可能与原始记录相对应。例如《鄞县通志》中的碑碣目录,在单刻中插入了丛帖,因此我们在《鄞县通志馆移赠碑帖目录》中,也就不再区分单刻与丛刻。又如,杨氏购入的二铭书屋专藏,有《二铭书屋藏碑录》传世,我们在《清防阁赠碑帖目录》中,就以一编的篇幅作整体记载。至于著录项目则力求一致,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分赠的丛帖拓片称叶(页)而不称张,所以我们均以“页”计数。

天一阁新藏碑帖的整理编目工作多由谢典勋先生完成。我和谢先生是三十年前老同事。1993年2月,我得知他已经从宁波市文化局退休后,便请他到天一阁来,没有想到从此我们又共事了十多年。他不辞艰辛,不问寒暑,笔耕不辍,默默奉献,令人敬佩。我的老伴费迺棣也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整理、抄写等繁琐细致的工作。副馆长章国庆先生在馆务之余,挤出时间,为本书打印清稿,给予热情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从近代报刊看天一阁的藏书命运(1930-1949)

应方舟

【摘要】 本文主要依据宁波近代报刊所载关于天一阁的史料,充分运用新闻报刊第一时间具体深入报道的特性,来综述近代天一阁由私藏转为公藏的命运。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段时间与天一阁藏书命运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天一阁族人自身经济实力的不足,而国家和地方人士的适时帮助使天一阁族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和依靠增加;民国中后期天一阁几次鲜为人知的书厄,从客观上加速了天一阁化私为公的历史进程,以上这些因素最终导向天一阁成为一所公立国有的藏书单位。

【关键词】 天一阁;近代报刊;范氏族人;公藏

我在查阅宁波地区近代刊印的报刊时,注意到几件与天一阁有关的事情。特别是民国时期新闻记者报道的关于天一阁遭受风暴袭击面临坍塌危险,鄞人合力募集修缮;险遭或已遭书厄的经过;战后,从藏书迁回天一阁到渐次开放,再到范氏后裔把天一阁捐献给国家的事情,这些都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因为此前很多学者在关于天一阁的研究中几乎都忽略了近代报刊的史料价值。盖因为报海茫茫,非花大工夫是找不到有用的信息的。殊不知近代报刊里即载有很多史料价值丰富,又反映当时现状的实效性文章。

今援引第一手报刊资料,对与天一阁藏书命运相关的几个史事做一探讨,这几大史事构成了天一阁由私藏向公藏逐步演进的历史过程。

一、向公藏转变的契机

明清时期私家藏书楼在富庶的江南地区遍布林立,这既是经济重心、文化重地的必然产物,也是长三角区域一大批杰出人士传承文化的历史自觉性。在明清交替之际,天一阁仅仅是芸芸众楼里一座普通的封建藏书楼,其有一整套苛规严矩,封闭而又落后。1903年,曾有几名日本学者特地从上海坐船想来天一阁看书,尽管他们事先还准备好了道台惠树

滋(森)的介绍信,但是天一阁管门人以管书人不在为由一句话就打发了他们。^[1]

历史的车轮驶到了民国时代。这是一个新旧社会更替转型的时期,天一阁同样面临着去旧存新的历史抉择。如果说天一阁创设时期是靠一个家族的力量在独自支撑,那么,到了民国中期以后,天一阁的发展则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鼎力捐助。

1933年8月,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赵万里持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手书在天一阁编订目录时,因为“六房中子孙大半多已式微,故每日之火食,不得不由赵氏供给”。^[2]显而易见,范钦后嗣这时生活困顿不堪,而那时书楼是封闭的,不可能将其开放成景区来赚取参观费。所以,天一阁日常维修经费是无法落实的。同年9月18日,一次强台风吹倒了天一阁东墙,一部分藏书受损,整座书楼面临倾覆之虞。这次台风成为天一阁日后转为公藏的一次历史契机。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历史上的书厄,试举一例足矣。清末,陆树藩将晒宋楼珍藏全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这一世纪悲剧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无数藏书家的爱国、爱民族文化的情感。不久,丁氏“八千卷楼”将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一个典型。

天一阁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无论是清楼售书还是请求外援,对天一阁来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被动的。藏书楼全无经济效益,但祖规甚严,事实上范家子弟不敢贸然将传了367年的实物和精神合成一体的藏书楼转卖。如何是好?所幸的是,在鄞县文献委员会等帮助下,天一阁开始以“人世”的态度审视周遭的世界,从封闭到渐进开放这一变化来得很突然,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时候,以藏书家冯孟颀^[3]先生为委员长的鄞县文献委员会向范家伸出了援手,并于1933年10月1日专门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负责天一阁修缮事宜。该会为保存古迹,阐扬文化,特地组织发起重修,以修复旧观及扩大规模为宗旨。该委员会共有25名委员,鄞县文献委员会推举13人,聘任委员6人,范氏后裔推举6人。

为什么会选范氏子弟为委员呢?这是出于避免误会的考虑才邀请范氏六人为委员。“本会完全尊重范司马公当日建阁之苦心,使其不至中断,一方为保全吾国文化,使其不致淹没或流散国外,故除集合全邑地方士绅,筹集经费决计重修外,并已蒙海内名流,及本省教育厅长陈布雷,先后来函赞成,而本省政府,且有拨款补助之表示,可知保全文化,人同此心。”^[4]但是接到范氏房长的来信,产生了误会。范氏族人对重修天一阁当然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担心天一阁修理完毕之后将会被政府没收充公,所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决定让范氏后裔加入委员会,这样就可以打消他们的想法。因此,在委员会各股选举中,总务股、交际股、工程股、经济股各有范氏后裔1、1、3、1人当选委员。^[5]

该会的工作先是筹资修理紧急工程再重修全阁,今后工作还有编目和访归天一阁原

藏书籍入阁。^[6]为此,以冯孟颀先生为首的103人向京、津、沪等地热爱乡邦文化的人士呼吁募捐。

在一批热爱乡邦文化人士倾力帮助下,重修天一阁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33年11月19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宁波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者有张峰桐、杨菊庭、范多禄、陈如馨、范佑卿、陈宝麟、范吉卿、赵芝室、范庆祥、范盈汶、冯贞群、叶谦谅、倪维熊、汪焕章、冯莼瑄(杨菊庭代)、马涯民(冯贞群代),主席是陈宝麟。首先是报告,称蒋委员长自南昌行营来代电,允捐助本会洋两千元;张泳宽先生来函称在杭州晤陈布雷、周枕琴两先生,说省方可补助洋数千元,并谓旅沪同乡甚赞成此事。其次是讨论:1.推定范氏代表分任各股事务案。议决推定范佑卿为总务委员,范吉卿为交际委员,范多禄、范盈汶和另一范氏代表为工程委员,范庆祥为经济委员。2.常务委员会提请追认添记泰涵钱庄为本埠经费收管机关案,议决通过。3.叶友益委员提奉推拟定重修天一阁委员办事细则草案,请核议案,议决修正通过。4.陈如馨委员、倪维熊委员、林绍楷委员会提,拟定修理旧阁及建筑新阁计划请核议案,议决推杨菊庭、冯孟颀、王思诚、陈如馨、倪维熊五委员审查,由冯孟颀召集。5.陈叔谅先生来函请辞杭州通讯主任,并推陈肥怀先生担任案,决议通过。6.张于相委员来函,以旅居上海,难以兼顾,拟辞去委员一职应否允许案,议决允许辞职,并推范鹿其先生继任。7.林绍楷当务委员因事赴赣,推陈如馨委员暂代。8.本会捐款收据应如何制用案,议决用三联单式,交收管经费银行、钱庄掣用。

这样范氏族人共有7人在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中任委员以上职务,比第一次会议时多出了一个名额,这说明委员会充分考虑到了范氏的利益,以及范氏在重修中应起的作用。至于大会报告和大会讨论说明了该委员会办事较为公开,所有涉及委员会有关的大事均需大会议决后方能进行。

同时,还制订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办事细则,为重修活动指明了具体方向。1.本细则依据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简章第四条之规定订定。2.本会定每两星期开常会一次,遇必要时召开临时会。3.本会开会遇有主席缺席时,在到会的常务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4.本会各股掌管事如下:甲,总务股,关于文书会计庶务,及其他不属于各股事项。乙,交际股,关于各方接洽及特种文件往来事项。丙,工程股,关于工程上一切事项。丁,经济股,关于经费募集、保管及银钱收支等事项。5.本会重要文件,均以全体常务委员名义行之,次要文件,由主席及各该关系股主任连署行之,平常文件经由各股主任署名行之。6.本会向收管经费之银行、钱庄,支取款项费时,经常务委员三人以上会章;至本会日常经费之支付,由各该股主任会同总务股主任盖章行之。7.本会办公时间除假日外,定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8.本会职员,受主席及各股主任之指挥监督。9.本细则由大会通过后施行。^[7]

由于所定制度合理,选人规范,募集到的资金(计银一万四千余元)较为宽裕,最终书

楼修缮工作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底告成,几百年的书楼为之焕然一新。同时,新建“千晋斋”贮马廉所捐晋砖,移迁尊经阁一座、各类碑刻墓志74方。如果没有乡贤的帮助,天一阁早在民国时期就楼倒书散了。

据陈训慈先生记叙,鄞县文献委员会当年主持天一阁修复工程,是以公家之力修复故物。事成之后,所有权仍旧归于范氏族人,而把管理权收于公家,以方便学界人士观览藏书文献。这与当时范氏部分族人以阁书归公有的主张,尽管方法途径有异,但用意实同。^[8]这次天一阁落架维修,标志着天一阁开始了由私藏向公藏转变的历史进程,也宣告了天一阁的新生。

二、书厄加速向公藏转变

天一阁藏书命运艰辛。太平军攻打宁波城一役,兵灾之祸使天一阁散失很多书籍。民国初年,又被当地的教士捆载了许多回去。后来经过族人一番整治,将阁门严格封闭,在门边悬挂族中禁例牌,主要是“子孙无故开门入内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与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撵逐,不得与祭”。这些订例虽然比较严厉,可是窃书人技术甚精,在民国十九年(1930)族人发现楼板中有一穴虚盖,可容一个人上下。这样看来,是有人利用钻穴的本领,雍容进退盗窃。单是以《三才广志》一书为例,该书是类似《渊鉴类函》的一种类书,在阮元编的天一阁目录里有一千一百八十卷,计二百三十七册;薛福成编的天一阁书目里只存有一百三十二册;民国十九年,宁波市府检查只剩四十二册了,可见这是有人以渐进的策略谋夺此书。在前曾经缉获盗书贼,供出是受人雇佣专窃这书而来。可见封闭愈严,而愈易遭人觊觎,这是必然之理。^[9]

当然,将天一阁遭盗贼青睐的原因归于天一阁的封闭,这是有失偏颇的。相对来说,藏书楼只要内部管理恰当的话,越是封闭一般越能传之久远,况且天一阁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开放。从太平天国掠书、民初失书发生后,族人遂将禁牌悬之门外。我们知道这禁牌只是族内的罚规,并不对外姓构成任何心理上的震慑。所以,我认为族人或许把失书归于族内人员对天一阁保护的疏忽,甚至是族人已经意识到族内有人在窃书,所以拿出禁牌从心理上来阻遏本族人窃书的行径。后来果然出现范氏子弟率众登阁窃书的事情(详见下文),这应该不是偶然性。

民国初年,受上海书商所雇,薛继涓偷窃出一大批天一阁藏书。到民国中期,外姓依旧觊觎天一阁价值连城的古籍,甚至一度欲付诸行动。1930年10月24日,宁报称天一阁藏书几乎又遭失窃。今将该则报道移录如下,以飨读者。

本城范氏天一阁,藏书极富,名贵一时。日前,本市杨市长曾偕社会科长鲍思信、教育科员胡达夫,并带同又新街大酉山房书店主人林朝梁等至该处参观。当有随同杨市长之大酉山房主人林朝梁,曾阅过价值珍贵之古书多册,并用粉笔在书沿加圈为记。不料,林实系贩运古书之奸商。前日,竟密使其羽党李阿清,转寻能手窃贼,拟向天一阁偷取参观时留圈古书,以图贩卖。嗣李阿清奉林嘱后,遂转嘱稔友郑世瑞、洪阿华二人,代觅窃贼。詎郑洪二人,同往县前傅连升客栈,因争执林李发给之预需费不均,遂起冲突。旋被该栈主人杨宝福闻悉,乃密报侦探冯德富。该侦探以案关图窃古书,当将郑洪二人带队。经俞队长询问一过,因据该二人供指由林李二人主使,曾派探分头往捕。但林李二人已早闻风逃匿,该队遂将郑洪二犯呈送公安局核办。闻杨市长闻悉此事后,以林系随同往观之人,作此不法,恐于本人亦有名誉关系,已飭该队严缉到案惩究。附录侦缉队呈公安局原文云,呈为呈送图窃未遂犯郑世瑞洪阿华二名,□核办事,本月二十一日据探冯德富报称,转据人民杨宝福报告,近有由申来甬二人,想偷窃天一阁范家古书。未便任其发生,为此带同民人杨宝福在西门内,暗指拿郑世瑞洪阿华二名到队,请讯办等情。据此,即经队长讯据郑世瑞供,年三十一岁,本城象鼻漕人,在上海帮外国人为佣。阴历八月十四日同洪阿华,趁新北京十五日到甬,十六日同至小泥沙街李阿清家,过节吃饭。由李阿清说起,转由林朝梁所嘱托我二人,找寻好手窃贼,偷窃天一阁范家书籍。据说是项书籍值万元,苟能偷到,给洋五百元,由林朝梁李阿清陪我二人至天一阁看过二次,落地嘱我二人住宿傅连升客栈等候,林朝梁已发给另用洋五元,李阿清用一元。我二人用四元,现因好手贼寻不到,向林朝梁讨给损失川资回申,口角,被杨宝福得知,报告侦探冯先生等语。又据洪阿华供,年三十岁,奉化港口人,去年在宁绍轮船为带货,现在上海戈登路统益里香烟公司为伙。八月十四日与郑世瑞同道来甬,余供与郑世瑞无异。查该郑世瑞洪阿华二名,供认、结伙图窃本市天一阁古书未遂,殊属不法,理合将该二犯,备文呈送,仰祈钧长核办施行。^[10]

范氏历代祖先遗留下来的诸如山场、山林这些不动产等,原先都由范家各房(当时共有六个房长)共同所有。后来出现了不肖子孙经常盗砍山林树木、私自变卖不动产等种种行为。为此,范氏族人已诉诸法律,并郑重声明:嗣后如再有私相授受,无论何人,必当法律从事。^[11]可见这时期范氏族人的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宽裕,所以才出现了部分族人偷卖族里共有的树木等不动产来改善生活。由树木等不动产进而偷卖价值连城的古籍,这对族里懒惰的人来说是很有可能尝试的途径。1942年9月9日,宁波地方报刊登了题为《天一阁藏书被盗》的报道,今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今范氏有不肖子名敦耘者(绰号小癞头)流荡无业,屡窃阁内什物,犯案累累,难以指屈。近复纠集多人,于本月四日夜将管阁人蒋后昆幽闭别室,夺得管钥,率领十余人登阁,将藏书捆盗而去,并书厨板十余方、铅皮箱多种,宝钱化用。范氏族人闻讯,呈请当道通缉。□□会□族禁例,擅为藏书典押者,除□□外,永行撵逐,不得与祭云。^[12]

当时正值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天一阁大部分珍贵典籍均已运往龙泉,剩下的普通古籍依旧保存在天一阁内。据骆兆平先生统计,1937年8月至1958年9月,这21年间天一阁藏书实缺11种,其中明刻本6种,据范鹿其的调查系“运龙泉返阁经检已缺”。另外5种系清同治及同治以后的刊本,^[13]属普通古籍。范鹿其调查后认为这5种书乃“抗日时存甬所失”。^[14]由于1942年范敦耘盗书“于本月(9月)四日夜,将管阁人蒋后昆幽闭别室,夺得管钥,率领十余人登阁,将藏书捆盗而去,并书厨板十余方……”所以,范敦耘盗窃的书是藏于天一阁未迁龙泉的普通古籍。因此,我们可以怀疑天一阁在抗日时期存放在宁波所遗失的5种古籍全部或者部分是在1942年9月4日夜被范敦耘率众破门登阁所盗。

书厄不断,内外贼频频光顾,凸现范氏家族保存古籍的力量不足,这从客观上加速了天一阁向公藏的转变,唯有国家方能承担天一阁保存和整理古籍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

三、公藏的最终确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天一阁藏书恐遭炮火,于是下令浙江省教育厅抢运妥善保管。1940年4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拨款,在浙江图书馆和鄞县文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将藏书装成23大箱,用卡车运至浙南龙泉县山区。抗战胜利后,天一阁图书由省图书馆带往杭州。鄞县参议员汪焕章、冯菀馆等人认为该阁旧有藏书应予运回天一阁,以重文献,于是提议鄞县政府,请求拨款将之运回。后来,县府教育科长项泽耕致函范鹿其,要其1946年12月15日赴杭州将所有天一阁旧藏书籍运回。^[15]

时人都翘首期待着天一阁藏书能早日回到宁波。一个署名叫辱翁的人在得知“天一阁藏书业于日前运返甬上”的喜讯后,于1946年12月12日写了一篇《记天一阁》的文章,不无喜悦地说:“日今胜利已逾一年,交通亦次第恢复,范氏藏书,不久当可回归故土。”^[16]12月16日晨,项泽耕和范鹿其、范康龄等人搭车前往杭州办理运书事宜。^[17]范鹿其等人到了省图书馆之后花了将近十天工夫检点了天一阁在杭的所有书册,并将马上返运宁波。^[18]由于项泽耘公务繁忙,数日之后即已从上海乘轮船返回宁波,所以,从杭州押运天一阁旧藏书籍的具体工作由范鹿其负责。12月25日,天一阁藏书安全运抵宁波。

有学者称,“封建藏书楼在逐步衰落的过程中,正孕育着向社会公开的趋向”。^[19]实际上,在天一阁重修委员会和天一阁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时期,天一阁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了对外开放、服务社会的公共图书馆雏形。

1947年1月29日前,范氏族代表范鹿其主动邀请宁波地区专员、陈县长等人发起组建范氏天一阁委员会,“以冀恢复该阁,嗣后将公开展览藏书”。^[20]2月11日上午9时,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在公园路10号鄞县文献馆召开成立大会。俞济民主持会议,并报告书册整理经过状况良好。这里要指出的是书册整理是指在杭州点收时书籍尚好,没怎么损坏,书册数量也没有缺少,而不是指古籍整理修复。大会讨论拟定了八条要案:1.加推陈宝麟等14人为本会委员。2.修正通过本会章程。3.通过本会预算。4.本会房屋修理及应用物件添置等事宜,交常委会办理。5.推范其鹿任管理员,薪给依照预算支给。6.推冯孟颢起草捐启。7.结束重修天一阁委员会,^[21]推总务组与原经手人办理。8.推汪焕章、范其鹿等拟订开放办法。^[22]这第八条涉及天一阁藏书开放,在这里看来好像挺突然的,其实不然,因为范氏族入此前在一次大会上说及愿将全阁藏书公开。^[23]

为了使市民能一睹天一阁所藏古籍风采,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决定1947年3月1、2、3三天集中开放,并由四名以上的范氏族入负责布置和招待工作。^[24]3月1日至3日,天一阁藏书如期公开展览,招待社会各界参观,三天之中计有二千余名参观者。范鹿其及族人一一予以招待,商校童军担任纠察,参观秩序井然。阁下展品有平定回部得胜图、历代帝王名臣图、范文正公忠宣公遗像手卷,以及珍贵的经史子集。阁上所有书橱大开,极其整齐,任人观览,“观众都叹为海内孤本”。^[25]社会各界对天一阁厚爱有加,鉴于天一阁今后保护整理等尚需很多经费,所以参观者都纷纷认募,郑小隐专员认募一百万元,邬显章厅长^[26]认募十万元。

此时,天一阁的对外开放还表现在允许外界抄书方面。外埠纷纷请求抄录天一阁所藏地方志书,如四川《营山县志》、浙江《平湖县志》等等,天一阁管委会议决除发霉、严重破损未经修补完毕的书外,一律允许外界抄书。为此,管委会还特地订立了一个详细的抄书规则。^[27]从这里可以看出时人应该得闻天一阁渐趋开放的信息,方才会提出抄书的要求,而在1933年以前外人根本不敢提登天一阁看书的要求,更不要说是抄录书籍了。当时的抄书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北平图书馆赵万里将带最新式活动摄影机来天一阁拍摄古版书籍,文献委员会表示同意,至于具体拍摄再与天一阁保管委员会洽商办理。^[28]当时天一阁保管委员会中有很多人系出自鄞县文献委员会,所以赵万里来天一阁拍摄书籍的要求当无阻拦。

天一阁藏书日后能否向社会大众扩大开放,进而成为公有,这是很多人关心的。《时事公报》为此专门刊发了社评,大谈权利和义务关系,历史上宁波地方人士对天一阁的大加

保护,天一阁升为公有单位的好处等等。我们从下面这则社评中,可以看到里面的很多建议不无道理,它代表当时社会舆论对天一阁由私藏化为公藏的呼唤。

我们对于范氏天一阁藏书,曾发表意见,要求范氏后裔,予以公开。昨天报上,见到本埠官长以及地方人士也共发起此举,范氏后裔范鹿其君亦列名其间。此事关系地方文化前途,可谓非常重大,地方官绅在今日建设伊始,万端纷纭之间,而能主义及此,洵为吾甬之幸。由地方官绅的合力,又加以范氏后人的深明大义,自动赞助,自无不成之理,我们站在舆论机关立场,也愿竭尽绵力,从事鼓吹,俾其早日实现。

中国的四大藏书楼,天一阁亦为其一,这真是宁波人一种无上光荣。宁波人不特应该保守这光荣,而且应该努力把这光荣发扬光大,这的确不单是范氏后人地责任,而是宁波人的共同责任。可是从前范氏后人的保存方法,我们可以老实的说,是有些错误,而且简直不合理的,照他那样的深闭固藏,非特外人不能窥见,即范氏子孙,平时也和它很少接触,而又因为地点不适当,房屋的结构不合宜,年深日久,蠹侵蛀蚀,迟早必至荡为灰烬,化为乌有,范氏后人的一腔心血,岂非白费虚耗。倘使真到了这一日,非特范氏后人对不住他的先人,即宁波人也都于心有愧。

地方的文化事业,乃是地方的公产,人人有享受的权利,人人也有保存的义务。惟其人人能够享受,而后文化事业之影响,才能普遍,惟其人人皆能保存,而后文化事业之存在,才能永久。所以不论学校和图书馆,总以公立为主,即原有私人发起或设立者,后来亦必渐渐变为公有。因为由私人力量来保持和发展,决不如由公共的力量来发展和保持,为较易收效。这回天一阁的书籍,经过四五载的兵戈流离,居然能完璧归来,其间的抢救保藏,都并不是单靠着范氏后人的力量,而是靠着县参议会和省参议会等等的力量,可见这些藏书,在范氏后人,或视为私产,而在一般地方人士,则已视为公物,觉得无论何人,对它皆有保护之责,这就可见人类对于文化事业的心理,大都已消除了人我的见解和区域的观念,文化事业之所以能够有不断的进步,其得力就在于此。

中国人的喜欢藏书,这是最可珍视的一种美德,可是以前的藏书之家,大抵只将它当作家珍,贻之子孙,而从没有想到;倘使把它们作为公有,任人观览,其收效将更如何的宏大,而且亦必如此,才不负文化事业的本旨。然而这也无足深怪,因为时代关系,我们的数百年或是数千年祖宗,对于文化事业的观念的深广和明澈,当然不能和现在人相提并论,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加以批评,这是不公平的。惟在后世的子孙,能够推广先人之志,顺应时代潮流,变私有而为公有,给

一般人都能享受到他先人所创立的事业的利益,必须如此,才能算是善于继志,善于述事。现在范氏后人能认识这一点,而且决心实行,将来公开以后,凡是地方人士,以及四方之过而观者,无不称颂范氏之盛德,口碑流传,永久无穷,其所以纪念其先人不朽其先人者,岂不比之以前,仅作为一家族或一姓之传人者,更为远大者哉。^[29]

政府高层认为重返天一阁的书籍应该进行详细整理。国民政府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认为天一阁藏书经历抗战内迁,书籍多有凌乱,应该重新整理,而范其鹿一人力量有限。阮厅长建议让浙大史地系的同学在暑期里来宁波帮助整理。^[30]阮毅成的意思是应该引进外来因素来刺激天一阁的新生,因为范氏家族力量不足,来不及整理的图书只能日渐破损,任凭这样下去对文化是不利的。

蒋介石数次到过天一阁,并提议将天一阁改为公立。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遍游浙东山川名胜,对天一阁尤为关注。3月12日实地参观天一阁,“对储藏文物之古阁,即为关怀。谆谆指示范氏后人,妥为保管,俾垂久远”。^[31]蒋介石回到溪口后随即电令鄞县政府妥为保护天一阁。接令后,鄞县政府马上召集天一阁图书保管委员会沙孟海等人,举行谈话会,决定在天一阁设置管理员二人,其中一人必须为技术人员,经费由省里拨给。^[32]4月份的时候,蒋介石鉴于范氏家族保存文化之艰辛,拟议征求范氏族入同意改天一阁为公立,并筹募经费加以整理、扩充,以供学界研究。宁波教育界人士闻此事后都表赞同。^[33]后来蒋介石溃逃台湾,此事不了了之。

当时负责天一阁日常事物的范鹿其承认政府和民众对天一阁的帮助功劳:“查天一阁虽是明朝时候范氏所建,但自清初以来,名闻全国,所以每次修理,都由政府和群众协助,其性质已非完全私产。”^[34]在社会舆论和名人政要的督促下,加之范氏族入鉴于自身力量不足,比如1946年12月藏书运抵宁波后至1949年7月23日,限于人力,天一阁竟然没有对战前战后藏书书目进行核对,就连晒书也未曾进行一次,更加谈不上整理了。因为四百余年来,天一阁族人素来是“主保守毫无组织”,^[35]这样管理方式容易使藏书被窃散失和虫蛀鼠伤。由于社会变故无常和虫鼠风雨灾害不断,私家性质的天一阁藏书楼守护珍藏的能力极其有限,要想达到“慎重管理,勿使(藏书)损坏遗失”^[36]的最基本目的也不太容易,借助社会、国家的力量来保全藏书成为天一阁发展的必然。因此,天一阁尽快转为公有成为必然趋势。

虽然历史上天一阁的藏书命运多舛,但是得益于国家和当地文化人士的合力帮助,它还是比较幸运的。1949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天一阁。5月25日,宁波解放,66师二排副排长王观一带一个班12位战士日夜驻守天一阁,直到宁波社会秩序恢复。因为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天一阁藏书楼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因为战火而化为灰

烬,也没有一书籍散失。这使天一阁族人认识到人民政府是重视天一阁藏书保护的。新中国成立后,范氏族人化私为公,把天一阁藏书楼和所有古籍捐献给国家,使天一阁成了一所公立国有的藏书单位,这标志着天一阁正式完成了由私藏向公藏转变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0.
- [2]范氏天一阁藏书[N].上海宁波日报,1933-08-15(2).
- [3]冯孟颀(1886-1962),名贞群,号伏跼居士,以字行。原籍浙江慈溪,从先祖迁居宁波市区水岙桥畔。浙东现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1932年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曾主持维修天一阁,精心搜集明清以来宁波诸家私人藏书楼辗转流散之籍,是宁波文物事业的奠基人。1947年编纂《鄞县通志》中《文献志》人物、艺文两编。1962年病逝,其家属遵其遗愿,将全部藏书十万余卷捐献给国家,今存于天一阁。
- [4]重修天一阁有实现扩大讯[N].上海宁波日报,1933-10-27(1).
- [5]重修天一阁有实现扩大讯[N].上海宁波日报,1933-10-27(1).
- [6]鄞文献委员会代电募修天一阁先将紧急工程动工修理重修全阁部分尚待捐募[N].上海宁波日报,1933-10-12(1).
- [7]沪杭两地同乡表示赞成重修天一阁积极进行[N].上海宁波日报,1933-11-20(1).
- [8]陈训慈.鄞天一阁重修记[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15-16.
- [9]樊迪民纪.天一阁(三)[N].上海宁波日报,1933-11-12(3).
- [10]天一阁藏书几乎又失窃[N].时事公报,1930-10-24(2).
- [11]天一阁范氏声明[N].时事公报,1936-01-10(1).
- [12]天一阁藏书被盗[N].时事公报,1942-9-9(3).
- [13]这五种书是:清徐时栋撰,清同治袁氏进修堂絮斋集附刻本《袁正献公燮从祀录》六卷;黄群、刘景辰编,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活字版本《敬乡楼丛书》。全书共四集三十七种,缺如下四种:宋周行己撰《浮沚集》九卷补遗一卷(缺卷一至八),清黄体芳撰《江南征书文牋》一卷附一卷、明李维樾撰《谏垣奏议》补遗一卷,清方成珪撰《珞研斋吟草》一卷。
- [14]骆兆平.查检范氏天一阁藏书记[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196-198.
- [15]范氏天一阁藏书日内可运回原藏[N].时事公报,1946-12-11(5).
- [16]辱翁.记天一阁[N].时事公报,1947-01-05(4).
- [17]范氏天一阁藏书项泽耕等赴杭搬运[N].时事公报,1946-12-17(5).
- [18]天一阁藏书日内可运甬[N].时事公报,1946-12-25(5).
- [19]谢灼华.近代我国封建藏书楼之衰落[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21.
- [20]保管天一阁藏书将组委员会[N].宁波日报,1947-01-29(3).
- [21]骆兆平先生在《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始末》一文(载骆兆平.天一阁藏书史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5-04-12.)结尾时写道“至此,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虽未正式宣告结束,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误。

- [22]天一阁管委会昨召开成立会[N].时事公报,1947-02-12(3).
- [23]天一阁管理委员会组织成立筹募基金[N].宁波日报,1947-02-03(3).
- [24]天一阁藏书将招待各界参观定下月一二三日招待三天[N].时事公报,1947-02-22(3).
- [25]天一阁藏书参观者拥挤[N].时事公报,1947-03-04(3).
- [26]1947年3月4日《宁波晨报》之《天一阁藏书公展名流纷往参观》一文作“郑厅长显章”。
- [27]天一阁藏书准许钞录管委会订定钞书规则[N].宁波晚报,1947-08-29(1);天一阁藏书准许抄录[N].大报,1947-8-30(4).
- [28]文献委会议决访采抗战文献平图书馆派员摄天一阁藏书[N].大报,1947-10-13(4).
- [29]社评:希望天一阁藏书早些公开[N].时事公报,1947-02-02(2).
- [30]阮厅长参观天一阁[N].时事公报,1948-05-29(3).
- [31]轻裘缓带文物风流蒋总统昨曾莅甬驱车赴天一阁浏览藏书便道视察县中后即返溪[N].宁波晨报,1949-03-13(3).
- [32]天一阁设管理员保护藏书[N].宁波日报,1949-03-19(3).
- [33]范氏天一阁将改公立[N].宁波日报,1949-04-05(3).
- [34]范鹿其,声请准予免缴天一阁房地产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1.
- [35]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9~20.
- [36]原浙江省立图书馆长陈训慈对战时天一阁藏书内迁协助有功,调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后在一次参观天一阁藏书时对天一阁负责人说的话。见考选委员陈训慈参观天一阁藏书[N].宁波日报,1948-07-24(3).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闲谈范司马刻书

饶国庆

【摘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天一阁创始人范钦从官场走进刻书场的缘由做初步的分析,以便更多地了解范钦的其人其事。

【关键词】 天一阁;范钦;刻书

天一阁究竟刻了多少书?骆兆平的《天一阁藏书史志》及袁慧的《范钦评传》已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似乎已成定论。本文对此问题亦不作深究,然范钦以一个带戴之身返回故里,而家乡宁波却因倭寇作乱,人心不稳。他缘何没有积极参与到抗倭的各项活动中,却与屠大山、张时彻等人搞结社活动,建藏书楼,刻《范氏奇书》,忙得不亦乐乎,是什么促使范钦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刻书,本文从缘起方面略作探讨。

一、世人崇文好刻之风

明朝,特别是明嘉靖以后,中国雕版刻书业非常成熟和发达,政府重文轻武,许多武将都由文官担任,因而整个社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文弱书生,以文求名的风气非常流行。有了一定财力的缙绅士大夫给自己刻文集语录是很平常的事,就连商贾市贩流死后也请名士撰写墓志铭并模刻上石,以便让自己的事迹流传不朽。唐顺之^①嘲笑这种世风说:“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当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话虽说得刻薄了点,却也反映了世态人情及国人好刻的真实面目。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与当时全国四大刻书中心的杭州山水相连,仅数百里之遥。自南宋以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私人藏书家不断出现,如南宋楼钥之东楼,史守之之碧沚,有“南楼北史”之称。元朝袁桷“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入明之后,私人藏书楼遍地开

花。《中国印刷通史》称“人明之后，浙江一省就有私人藏书八十多家”，然据天一阁馆长虞浩旭先生在《宁波藏书家藏书楼》中作过统计，明一代宁波藏书楼就有六十家之多。如此按宁波藏书楼在浙江省的比例竟占四分之三。且不论《中国印刷通史》考证是否确切，但从两者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宁波的藏书是多么兴盛了。尤其在天一阁周围，形成了以丰坊万卷楼、袁忠彻瞻衮堂、范大澈西园、陆宝南轩等以月湖、日湖为中心的书楼群。因此，也难怪虞浩旭先生发出了“天一阁在宁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感慨。^[2]

刻书需要藏书，藏书是刻书的基础。甬上文人和藏书家在全国刻书风潮的影响下，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他们的藏书条件就比别人优越，因而也逃不了流于世俗的命。他们藏书、校书，继而刻书，还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理由：“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其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素志然也。”（据史料记载：宁波人石镜精舍楼主方孝孺曾刻《文粹》十卷、《蜀鉴》一卷等，如在《蜀鉴》言：“俾臣序之，将重锲而传于世。”闻人铨刻《旧唐书》200卷。范钦的两个好友丰坊和王世贞，他们与范钦一样是个藏书大家，在当时他们的名气远在范钦之上。这两人不仅刻书，而且表现极其活跃。荆非有言：“明州文人向有藏书、刻书之名，丰坊也算得上之中魁首人物。”他曾刻有《春秋战国文选》三十四卷；王世贞曾刻《乔庄简公集》、《皇明盛事》、《唐世说新语》、《弇州山人四部稿》，其中《弇州山人四部稿》达174卷，《续稿》更是高达207卷，不要说藏书家，就连达官贵人一般也难望其项背。范钦身为朝廷中人，宦游全国十多个省份，对世俗民情是非常了解的，由于他曾位居兵部右侍郎，应当说他比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更了解全国的刻书风气，而且他回故籍后，交往的都是乐于藏书和刻书的士子文人，谈论自然是多与读书、藏书、刻书有关的事。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氛围中，范钦投入到刻书的洪流中绝不是偶然的。

二、掠奇攀比之风

如果说，明人爱刻典籍是受世风影响的话，还情有可原。但明嘉靖年间的读书人刻书，还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点，就是掠奇攀比之风。这股风气范围主要局限在读书和藏书人家身上，范围虽小，影响却极为深远，而且完全是自发的。

所谓掠奇之风是指明中叶之后，士流好古爱奇，把收藏和刻书的目光锁定在别人所未有的古书上，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收藏。而攀比之风不只体现在掠奇上，还体现在刊刻的版式大小及网罗数量上。

这股风气最早源于小说稗乘之类，如嘉靖间华亭人陆楫纂《古今说海》142卷，收录了大量汉唐、宋、元离奇小说；明人马中锡收了大量的当代文言类小说《中山狼传》亦是世间

罕见之物。此后,此风越刮越盛,书的种类和数量越收越多,一些好事者索性以类书来命名此类著作,如司马泰的《广说郭》、《古今汇说》,何良俊的《语林》,张时彻的《说林》,袁炯的《前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汤显祖《续虞初志》,集中多含文言志怪、轶事小说。还有的人,如胡应麟雅好异书,博采冥搜汉魏六朝唐宋小说以“异”标题的书籍,如《灵异记》、《祥异记》、《述异记》、《采异记》、《集异记》、《独异志》、《博异志》等等,约得百种,“以类钞合,循名入事,各完本书”,“统命之曰《百家异苑》”。这类古代文言小说的搜集、编辑、刊刻,对提高小说的地位,推动小说创作,起了很大作用。明初宋元话本小说因不受文人雅士重视,亡佚甚多,民间也少有收藏。明末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留心访求,积存渐富,《古今小说序》云:“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并为一刻。”于是出了这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后又续编刊行《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此间亦有文人喜收戏曲的,部分藏书家也留心收藏古今剧本。李开先、何良俊、王世贞、王骥德、吕天成等,既是戏曲家,又是藏书家,家藏剧本甚富。其最著者当推山阴祁彪佳了,祁氏远山堂藏书楼收元明杂剧、南戏剧本约800种,并一一品评,作《曲品》与《剧品》。将杂剧汇成总集者,有臧懋循《元曲选》100种,署名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署名息机子《古今杂剧选》,沈泰《盛名杂剧》。集南戏之大成者,自然要数毛晋汇刻的《六十种曲》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开了正史之外,收藏和刊刻戏曲、杂剧的先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民国时期北大教授马廉和国学大家郭沫若对此都有很高的评价。

嘉靖年间,文坛名流大都酷爱民歌,李梦阳以为“真诗在民间”,文人创作“无以加矣”。杨慎则在“复古之志”的驱使下搜罗、编辑古谣谚。而冯梦龙则出于对俗文学的酷爱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憎恶,从书籍中,更多的是从市井中,采集民歌时调,编成《山歌》与《挂枝儿》两集。

从以上明人对小说、戏曲、民歌的收藏和出版热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和刊刻之风是如何之盛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出版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宁波藏书家亦如此,如范钦侄子范大澈就是典型的一例。

范大澈(1524—1610)字子宣,号讷庵,别号南海钓者、句章灌园叟。性喜藏书,郑梁《讷庵范公传》称:大澈游京师时“月俸所入,辄以聚书”。初,范钦弃官时归里,起天一阁,藏书极一生之盛。大澈曾几次去借书,均遭拒绝,心中颇为不悦,于是不惜重价购求海内异本秘书,每得天一阁所无之书,大澈必具酒备茗,把范钦邀至家中,并把所得之书置于几上,以刺激范钦。果然,范钦看了以后,默然而去。

这个事例,虽然只是一个家族藏书逸事,却也反映了时人的掠奇攀比之风。实际上也正是这股风气使大批古书、奇书、宝书被整理发掘出来,好事者取其所好加以编订翻印出版。

现在看来,《范氏奇书》的出现不只是范钦对侄子的回应,最主要的还是受世风影响较

深。范钦回籍后所刻的这些典籍,(包括《范氏奇书》)都是世人少见、难觅之物,如《竹书纪年》(又称《今本竹书纪年》)被后世学者公认为存世最早的版本,对研究上古帝王之事有重要的科学史料价值。

三、范钦的最后夙愿

范钦宦游三十年,从大红大紫到背负“貽祸地方”的罪名,可谓尝遍酸甜苦辣,历尽人间沧桑。即使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朝代更替,他“莫须有”的冤屈得以平反,而好友吕本有意想让他东山再起时,他本人已无意于仕途。他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诏许致仕作》中云:“臣心元似水,帝德自同天。”可见此时,范钦已不想东山再起,但对仕途小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仍愤愤不平,至死不忘。他在临终前的《自赞》中大声疾呼:“尔负尔躯,尔率尔趋;肮脏宦海,隐约里闾。将为之厉?抑为之愚乎?占称身不满七尺而气夺万夫,陆沉人代而名与天壤俱,盖有志焉而未之获图也。吁!”。此中虽痛骂了那些阿谀奉承小人,却也反映了他对官场明争暗斗的无奈。

古人云:人生在世,当立德、立行和立言。立德、立行和立言是所有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于德,范东明已通过与皇亲国戚权臣郭勋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这一点在丰坊《砥柱行》中得到全面佐证:“君不见,砥柱崇崇镇中流,撑柱天地分刚柔,日月星辰时吐纳,五气顺布元精浮。黄河西决昆仑顶,万里直触龙门蹂……赖有此柱屹不动,居然弹压神之州。……丈夫立身亦如此。”于行,范钦通过几十年的南征北战,至少自己是认同的。唯有立言一事,至老尚无归宿。在创立东山书社的“东海三司马”中,屠大山和张时彻(这两人比范钦先倒霉,早就赋闲在家)都早已刻印了自己的集子,唯有范钦因早年征战,四处奔走,一直无暇梳理自己的文稿。因此,他本人非常希望此时能通过整理和刻印自己的诗文集和其他书籍来得到大家的认可。范钦的诗句中:“心远久疏还阙梦,年丰初给买书钱”,“趋时勋伐从英达,投老心情只典坟”都表达了他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天一阁刻书主要都集中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原因。

四、范钦有刻书的经验

工欲利其器,必先善其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缘何范钦能在卸任之后能胜马上任刻书这一工作呢?据袁慧的《范钦评传》和戴光中的《范钦传》记载,范钦在进行大规模刻书之前,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刻书管理经验。据考证,范钦刻印的第一部书为《王彭衙诗》九卷,那还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事情。此书今藏南京图书馆,内有陈嘉言于嘉靖十四年跋

语：“王子关中人，名讴，字舜夫，别号彭衙山人。正德丁丑(1517)进士，为东宫主事，改秋官员外郎，转山西按察使僉事。所向以文章饰吏事，粲然为当世所重。逾三年，以疾归而亡，春秋才三十有六也。嘉言素善王子而爱其诗，因与乃兄青门子求所遗诗，得一十二卷，携以入楚，请于汉东之体别之，而托范钦刊诸木。”时年范钦任随州知州，刚到而立之年。

初试身手后，又陆续主持刊刻了《熊士选集》一卷、《阮嗣宗集》二卷、《海叟诗》三卷及《烟霞小说》、《汉书隽》、《杨右河侍御窗稿》(后三种卷数不详)。天一阁现存有一册《郭勋招供录》，据专家考证，多有可能为范钦私刻本。由上可见，在几十年的仕途之中，范钦对刻书这一行业并不陌生，应该说是掌握了一定管理经验的，这也为他在后来的“闲来寄情于刊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结 语

4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手捧这一块块天一阁留下的明代版片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当年范钦在精审细校，而一群群刻工在他面前来往穿梭忙碌的身影。也许这些刻工当时只不过为养家糊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却未曾想到今天的天一阁乃至宁波雕版印刷史上都留存了他们的名字：“刻工：戴锐、徐升、余堂……写工：范正祥、黄瑞……”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这700片明代版本，更多传递给我们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中华文明史。

宁波为沿海城市，商业兴旺，文化发达，藏书风气浓厚。它是浙江刻书重点地区之一，所刻典籍世人称之为“四明本”或“明州本”。而被后人尊称为奇书的，唯有范钦审订和刻印的这20种书，这在宁波乃至中国刻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006年初，国家图书馆与8个省级馆联合制订了《古籍的定级标准》。据此标准，它将嘉靖元年(1522)至隆庆六年(1572)出版的古籍定为二级乙等。天一阁的钞书和刻书大都属于此列。然我们不禁要问，范钦刻书留存下来的这批版片属于几级几等文物？

参考文献：

[1]唐顺之(1507-1560)，明代散文家。字应德，一字应修，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授庶吉士。学识渊博，于地理、历算、兵法等，均究极原委，又志在经世，喜论政谈兵，探究性理。有《荆川先生文集》。

[2]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C].宁波：宁波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关于天一阁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的思考

于美娜

【摘要】 天一阁在经历了440年的风雨考验之后,藏书依旧丰富,藏久不散。但是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侵蚀和损害下,许多珍贵的古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危害。本文就如何做好天一阁古籍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作一初步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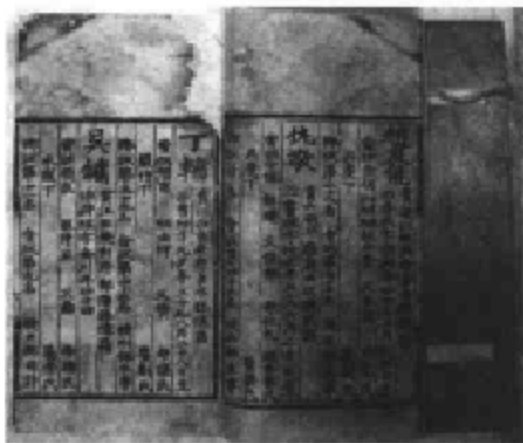
【关键词】 藏书地位;古籍破损;保护工作

一、天一阁的藏书及历史地位

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自明代嘉靖末年,兵部右侍郎范钦创阁以来,至今已经有440年了。历经风雨之后的天一阁,藏书依旧丰富,藏久不散。馆内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稀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的刻本和钞本为多,其中明代地方志和科学录最为著名,如地方志明代正德《姑苏志》孤本(图1)、明刻本《名马记》孤本、清影抄明汲古阁本《沧螺集》孤本等。地方志《弘治上海志》、科学录《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图2)等。



(图1)



(图2)

此外,明天一阁刻本《元包经传》、《竹书纪年》(图3)等被誉为“奇书”,更是稀世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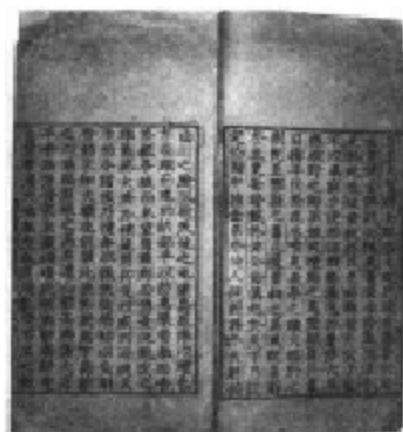


(图3)

不仅如此,馆内藏书版本多样,内容丰富。如明刻四色套印本《南华经》(图4)、明铜活字本《高常侍集》(图5),明嘉靖兵部刻本《营规》(图6),清嘉庆间摹绘《彩绘天象图》(图7),清影元抄本《隶续》(图8)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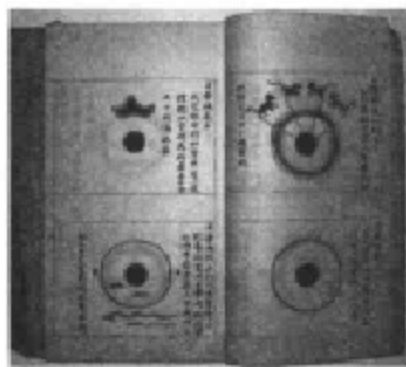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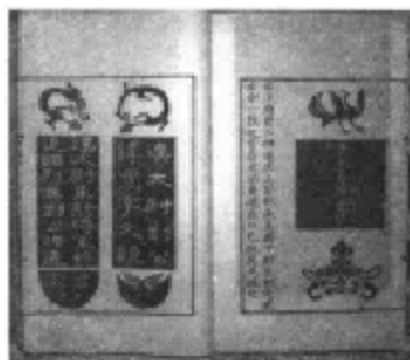
(图5)



(图6)



(图7)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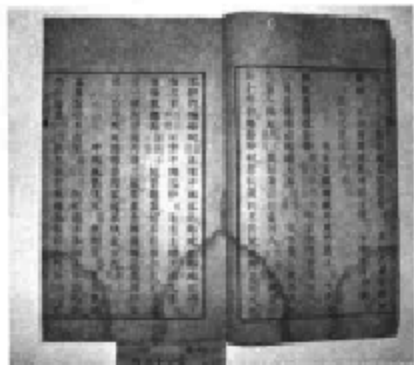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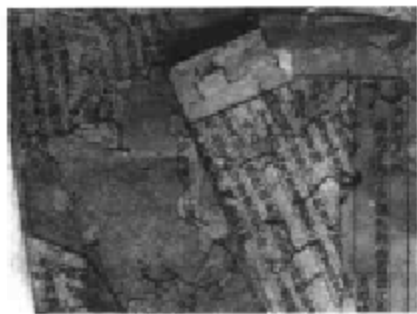
天一阁作为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自古至今,无数藏书家和学者对天一阁进行了多次研究,与这座古代藏书楼相关的论著刊载迭现。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余秋雨《风雨天一阁》、骆兆平《书城琐记》、袁慧《范钦评传》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天一阁进行了研究。

天一阁藏书楼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兼悲怆与艰难俱存的奇迹,既是我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又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一种象征。它不但收藏保存了丰富的善本典籍,而且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藏书文化。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传承了三千多年的藏书文化,孕育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甚至可以说,没有博大的藏书文化,便没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因此,天一阁的藏书及历史地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甚至世界文明,都有着重要意义的。

二、天一阁古籍破损的原因

(一)天一阁破损古籍数据

据统计,天一阁有善本30615册,其中虫蛀的6491册;水渍、霉变、粘连、焦脆、破碎的1303册;断线需换封面副页的1902册;合计破损书9696册,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科举文献421册中,不同程度的虫蛀383册,在此基础上伴有水渍、霉变、粘连现象的有31册。破损现状令人触目惊心,破损数据令人心痛。





(二)古籍破损原因

1.自然因素

影响古籍破损的自然因素主要有阳光、温湿度、水火、有害气体、微生物、生物等。

(1)阳光

阳光不仅可以抑制和消灭细菌,还可以去除潮湿。但是阳光中的紫外线长时间照射古籍,会使古籍纸张褪色、变色,甚至脆化。原因是:古籍纸质属植物纤维,受到阳光照射后,纸张会枯燥从而失去韧性。当纸张长久曝于阳光下时,纸张纤维断裂发生“光解作用”。另外,空气中的氧在阳光的作用下变成游离氧,与空气中的水分子结合,产生过氧化氢,发生“光氧化作用”产生氧化纤维素,从而使古纸褪色、变色、脆化,甚至一触即碎。

(2)温湿度

温湿度的变化是影响古籍的又一个自然因素。据化学分析,温度超过正常温度(23℃)10℃,纸张内含有的酸碱杂质对古籍的损伤会增加三倍。尤其是在温湿度变化频繁的气候下,纸张收缩膨胀剧烈,对古籍的损伤更为严重。此外,空气中的湿度过重,为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很好的繁殖环境,如此一来,加速了古籍的损伤。

(3)水、火

常言道水火无情。少量的水浸渍古籍,干后形成大小不一难看的水渍,还会使纸张起皱;大量的水浸渍古籍,使书页粘连形成板结难揭的书砖,为修复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我们伟大的祖先早在原始社会便能够熟练地运用火。火能够烤熟食物,还可以取暖。但是火,给古籍造成的危害确是无法弥补的。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焚毁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部分史料已无从考证,为后人了解研究秦朝以前文化历史,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加之战火硝烟的年代,同样给古籍造成了无情的毁灭。火,给古籍带来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完全烧毁的古籍无法复旧,就是半烧毁的古籍书页也是变得焦脆,一触即破。

(4)有害气体

笔者认为有害气体是古籍的“慢性杀手”。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氨、硫化氢、臭氧等,对古籍都有危害作用。由于全球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空气中的有害气体排放量逐年增长,造成臭氧空洞,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空气质量逐年下降。特别是二氧化硫,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形成硫酸,侵入古籍中,加速纸张纤维的酸化,使纸张纤维断裂,失去韧性。氨和臭氧还可使古纸变色。古人讲,纸寿千年,但是大量的古籍在这样的慢性损伤下,百年间便半路“夭折”,粉化在空气中了。

(5)微生物

破坏古籍的微生物,有细菌和真菌。细菌的繁殖对水分和温度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对古籍的影响不大。然而真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却十分强,在湿度60%以上,温度23℃以上的环境下,真菌便能够大量生长繁殖。它对古籍造成的危害是腐蚀性的,被真菌腐蚀后的古籍,往往纸张变湿粘连,纤维撕裂,酸度甚高,腐烂变质。

(6)生物

我们现在修复的古籍中,大多是在修补被生物(蠹鱼、蛀虫、苍蝇、老鼠等)蛀坏的书页。它们将古籍蛀食得千疮百孔,古籍中很多珍贵的文献记载被蛀食后,不仅修补困难,而且部分文字内容已经无法识别,甚至缺失,对后人的考证、鉴定无疑带来了很多的遗憾。明代文人张岱有《讨蠹鱼檄》,文中说:

惟此蠹鱼者,赋质轻微,存心残忍……恣蚕食以忘休,肆鼠伤而无忌。比火焚更惨,何异于坟典于秦坑;较土掩犹凶,谁复发周书于汲冢?罪真难挽,死有余辜。

可见,古人对书蠹鱼这种蛀虫危害古籍的愤恨是十分痛彻的。

2.人为因素

如果说,自然因素是造成古籍损伤的内因,那么人为因素则是造成古籍破损的外因——“杀手铜”。同自然因素一样,人为造成的古籍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有些古籍翻阅的次数多了,部分书页会被撕裂,偶有断线、掉页、中缝开裂、书口断裂等。有时由于阅读者的粗心大意,将书页抓伤,甚至使古籍受到汗渍、油渍、墨汁、羹汤、果汁、饮料等的污染。更有人为了截取古籍中的部分资料文字,将书页撕下或用刀割下,造成古籍书页的残缺,直接影响了古籍的版本价值和使用价值。

此外,由于展览、陈列的需要,在布展时,由于部分从业人员(保管员、修复人员、陈列人员、摄影师和相关管理人员)缺乏保护性操作常识,也给古籍造成了诸多不必要的破损,甚至是不可逆转性的破坏。因此,强调正确的操作常识和科学保护方法至关重要。

三、如何做好天一阁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

人们常把文物修复工作者称为医生,古籍修复工作者也不例外。之所以这样比喻,是因为如医生看病要了解病因、病症、制定治疗方案一样,修复古籍也应如此。有些古籍,往往不止患有一种病症,而是多种病状并存。甚至,有些病症潜伏于古籍内部,表面是观察不到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古籍医生们,不仅要了解多种病症的病情、病因、病理,而且还应对潜伏的病症具备一定的预见能力,从而制定多个治疗方案以备辨症施治,进而达到从容应对突发病症的目的。

(一)古籍修复工作应细致耐心,持之以恒

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要求修复工作者不仅要具备娴熟的修复技术,而且应对工作细致耐心,不厌其烦。由于我馆古籍破损程度之大,破损数量之多,往往年代越久远的古籍,越不加以修整,越难修整。如不修整,将造成更大的损坏。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里说,古籍书画类的珍贵文物,“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可见,若要修复古籍,必须是技艺精湛的从业人员方可进行修复。此外,由于我馆古籍破损数量甚多,一部书少则数册,多则几十册,每册的数量由几十页至几百页不等,修复工序与数量的繁多,容易使人感到厌烦。因此,作为一名古籍修复工作者,前提是要有有为古籍修复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细致耐心,不厌其烦,持之以恒,方可从事此项工作。

(二)古籍修复工作及从业人员应与时俱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文物、博物馆事业日渐重视。2001年,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一次研讨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的会议。此后,有关这样的会议在社会上频频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古籍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并做出了许多成绩。随着时代的进步,古籍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不断趋于严格化、规范化。《古籍定级制度》、《特藏古籍破损的定级标准》、《古籍修复人员任职资格标准》等古籍保护规定的出台,体现了新世纪、新时期对古籍修复工作及从业人员的新要求、新标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古人对从事古籍、书画修复工作者的要求是:“良工须具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充此任者,乃不负托。”([明]周嘉胄《装潢志》)可见,古人对修复工作者的要求是十分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样的标准仍然适用,并且仅作为从业人员的最根本素质。新时期的古籍修复保护人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和过硬的修复技术,而且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对新仪器、新设备的操作能力。新时期的古籍修复保护人员不仅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水平,广泛涉猎物理、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环境学、造纸学、美学、装帧学等相关的知识。随着

对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新时期的专业人员还要具备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本领。

(三)古籍保护工作应着眼于古籍保护环境

笔者认为,古籍的保护工作与古籍的保护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何改善古籍的环境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笔者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影响古籍破损的几点因素,在此不再进行说明。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因素影响着古籍的寿命。因此,我们要抓住问题的实质,从问题产生的根源着手,方能更好地做好古籍的保护工作。笔者有过这样的思考,即世间所有的文物无论我们用何种办法来保护,也只不过是延长其寿命罢了,我们今天所作的古籍保护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延长古籍寿命的工作。也许,随着未来科技的进步,人类可以将它们变为永恒。

总之,我们要高度重视前人遗留下来的这门专业技艺,将传统与现在的科学有效的方法、经验加以总结,使我馆的古籍修复保护技艺在新一代的修复人员手中进一步传承、发扬、提高。

结 论

宁波天一阁作为我国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历经440年的风雨考验,依旧巍然屹立在美丽的月湖西畔。在人们心中,它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藏书楼,而是作为一种藏书文化的载体传承着我国悠远的历史文化。天一阁作为国家AAAA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其藏书的丰富、藏书的独特,吸引着海内外众多游客、专家、学者驻足游览与研究。

笔者作为新一代的古籍、书画修复人员,任重而道远,有义务、有责任做好我馆的古籍、书画修复与保护工作,希望在学习积累过程中能够将我馆的古籍、书画修复保护事业继承发展下去。

近年,我馆将成立纸质类文物保护中心,决心抓好古籍、书画等纸质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在继承我国传统修复技艺的同时,争取在传统修复、科技保护、修复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恳盼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给予鼎力支持,提出宝贵意见,使我馆的纸质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跨向更高一层台阶。

参考文献:

- [1]潘美娣.古籍修复与装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2]李大东.关于对天一阁藏书破损及保护措施的分析[J].
- [3]骆兆平.书城琐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4]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年,(3).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魏晋南北朝著述繁富原因及传承方式初探

陈德弟 王宇英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社会大动荡,各种矛盾交汇在了一起。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需要和权利争夺,加之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传统主流意识——儒家学说遭到削弱和挑战,多元理念得到张扬,士人自觉意识空前强烈,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一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乃至高僧、道士、隐逸之人纷纷著书立说,或阐述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或扬榷古往今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或抨击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或讴歌祖国壮丽河山的景色,或传授揆天治病的技艺,从而治世、弘道、医人的佳作迭出,十分繁富。这些书籍经过书佣们传抄生产,官府、私人 and 寺观收藏保护,遂传承下来。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佣书业;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社会大动荡,各种矛盾交汇在了一起。在意识形态领域,传统主流意识——儒家学说遭到削弱和挑战,多元理念得到张扬,士人自觉意识空前强烈,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一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乃至高僧、道士、隐逸之人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从而佳作迭出,十分繁富,这一点在《隋书·经籍志》中颇有反映。^①从汉末黄巾大起义(184)至隋朝统一天下(589),400年间(除西晋取得短暂统一外),战争频繁,人们颠沛流离,生命朝不保夕,而此时在图书文化上却取得如此成就,很值得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及当时图书传承方式略作探讨,以就教方家。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时的政治生态是国家大分裂,社会大动荡,战争频繁,政权迭更,社会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各种矛盾交织在了一起。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那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烽火连绵，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龙争虎斗，割据称雄，四方扰攘；那确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那也确是一个最富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奇谋妙计，名篇佳作，频出屡见。那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英杰俊彦，各展风采：有谋略的，鞠躬尽瘁，投死为国；有思想的，奋笔疾书，鞭弊伐腐；有技艺（此处之“技艺”，指书法、绘画、音乐、医药、天文、科技等等）的，尽献才华，传艺弘道，正是风云际会，群雄辐辏。

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和权利争夺，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尤其广大士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天职，当社会、民族、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此时，他们的自觉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们中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乃至高僧、道士各骋胸臆，纷纷著书立说，针对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阐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即使避世隐士，也著书授徒，传播着各种学说和技艺）。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使各种学科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当时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图书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

封建政府为借鉴资治，巩固政权，宣扬自己以文德化天下，组织人员编写图书，并奖励优秀作品，这种政策导向，也刺激了士人的写作欲望。

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逐渐形成产业化规模。它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快速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3]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衰落。佣书业对于泽惠世人，传播中国典籍与文化的功德是无量的，毫不夸张地说，此前的一切文明（除口耳相传外），皆靠它才得以传播，佣书业和雕版印刷业是对中华文明先后做出巨大贡献的两大行业。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文字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¹⁵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纪录。又《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记录内容上看,早期佣书仅局限于封建政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走向市场,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随着纸写书的普及,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南史·张纘传》载:张纘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这个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是雇人所抄。如果说这里间接反映了佣书群体存在的话,那么,《北齐书·祖珽传》中则有直接的证明,该传称:“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700卷的类书,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由此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为了需要,当时政府设有负责抄书的胥吏。如《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闻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有时,政府临时召集一些学者和抄书人,抄撰急需书籍。如北魏孝文、宣武时,瘟疫频发,人多疾病,孝文帝“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¹⁶宣武帝也“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¹⁷另外,一些高官和贵族也雇养着抄书人。《北齐书·赵彦深传》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也备受青睐。

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果传》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由是而知,当时雇人抄一部《法华》佛经需花三千文。同书《释慧进传》云:慧进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

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魏书·刘芳传》又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芳因书法佳而获高酬,且为寺院抄书“数十年”。道籍《云笈七签》卷一〇七《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亦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南京附近)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又《陈书·徐孝克传》载:“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可见,当时雇人抄写佛、道经书极其普遍,且出资巨大。刘宋的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少有孝行,佣书以养”。^[8]《南齐书·周山图传》载:山图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梁书·王僧孺传》载:僧孺东海郟地(今山东、江苏交界处)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书《沈崇儒传》载:崇儒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及长,佣书以养母焉”。又《南史·朱异传》载:朱异吴郡钱塘(今浙江钱塘)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同书《庾震传》载:庾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佣书。

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亮徙于桑乾(今山西山阴东),“居家贫,佣书自业”。又《刘芳传》载:刘芳因战乱流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蒋少游传》亦载:少游“见俘入于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北史·房景伯传》载:景伯生于桑乾,“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

西部长安,也现佣书业。《高僧传·僧肇传》载: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窶,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

不仅如此,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佣书也有描述。东晋王嘉小说集《拾遗记》卷六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这是晋人王嘉借王溥事迹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情况。佣书业在此时已完全市场化,形成一种传播书籍与文化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提到佣书业,我们不能不讲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都是贫民,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凭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书佣们将最新信息,以最快速度进行传播。如《晋书·左思传》称:左思《三都赋》写就,“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陈书·徐陵传》亦载:

“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在此过程中，书佣们既获得了报酬，亦嘉惠了世人。同时，一些好学者，在佣书中也饱览了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满腹经纶，日后成为名儒硕学。如梁朝王僧孺，“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9]后为著名学者；北魏刘芳、蒋少游，早年贫困卑微，佣书自修，他年终于“博通洽识，为世儒宗”；^[10]东晋张肇，少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11]嗣后成为高僧，他们皆有著作流行于世。

此时，书佣们所以能够抄书迅速，除时代需要和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东汉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纸张得到丰产。由于纸易得易写，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写书在此时逐渐代替了简帛书。纸的广泛使用，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非常便利，它对于佣书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佣们传播书籍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自抄自卖。如《北史·阳俊之传》载：“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有些书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二是书商雇其抄写，自己出售。当时在洛阳、西安、大同、南京等大城市，经商的人很多，尤其江南，商业十分兴隆。《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在这些商业交换中，自然也有售书者。书商或设肆出售，或沿街贩卖。《晋书·葛洪传》载：洪“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又《魏书·崔玄伯传》载：“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同书《崔亮传》亦载：“自可观书于市。”《南史·萧锋传》又载：“（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梁书·傅昭传》还载：傅昭年“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前面提过的州客卖《华林遍略》，显然那是一个沿街叫卖的书商。三是书佣们被官府、私人、寺观雇养起来，专职抄写各类书籍，以为度藏、使用和流传，如前述蒋少游、张景仁、赵彦深、吴喜、刘芳等人一度的抄书活动，属于此类。

在当时战乱状态下，这些贫穷书佣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大多是由私学培养出来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因战乱时兴时废，不绝若线，而私学却昌盛发达。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史传中，文人、隐士、高僧开门授徒，屡见不鲜，且规模不逊官学。《晋书·刘兆传》载：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同书《杜夷传》载：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又

《魏书·高允传》载：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北齐书·张买奴传》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梁书·太史叔明传》载：叔明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高僧传·释道融传》亦载：道融“常讲说相续，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以上数例，足见其盛况。另外，史传中也频繁出现一些人“负笈从师”、“负笈游学”的记载，可见当时私学繁荣发达的景象。此时的私学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种类上、传授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私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中，既有从政者，也有治学者。正如罗佐才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但私学一直存在。尤其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儒家的私学，还出现了佛家私学、道家私学和儒、佛、道、玄各家兼综的私学。私学的昌盛，繁荣了学术思想，推动了儒、佛、道、玄各家思想的合流，扩大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汉族文化的传播，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和从政人员。”^[12]社会问题的产生，为精英们阐发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抒怀命笔，撰成著作，书佣、书商们进而传抄售卖，最后由官府、私人 and 寺观承担了皮藏和传承这些精神产品的任务。

三

我国古籍是靠古代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系统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流地位，传承着中华文明。我国有悠久的藏书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官、私藏书，至魏晋南北朝，官、私藏书不仅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且又出现了寺院和道观藏书。是时，封建政府、私人 and 寺观都十分积极地搜聚图书，精心储藏，用来借鉴资治、弘宣教道、学术研究和传经布道。政府方面，如曹魏代汉，建立秘书制度，“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西晋建立后，创置秘书省，全面负责官藏事务，“晋氏承之，文集尤广”（《隋书》卷四九《牛弘传》）；东晋大将刘裕平定姚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共四千卷（同前）；南朝梁武帝践祚后，立即诏求亡佚，迄武帝末，其官藏达8万余卷，^[13]“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梁元帝紧追其后，在江陵聚书14万卷；^[14]陈文帝和后主“又更鸠集”，^[15]使其秘藏逐年增加。前秦苻坚，也曾劝学聚书，“比年缀撰，正经粗集”；^[16]北凉沮渠蒙逊灭掉西凉后，从西凉宰臣宋繇处获书“数千卷”，^[17]并求书于宋，“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18]北魏道武帝在汉人李先启发下，布告天下，大索书籍，旋即“经籍稍集”；^[19]太武帝承继其业，继续征书，并奖赏献书多者^[20]；孝文帝“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21]迁都洛阳后又“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宣武帝即位不久，就“诏重求遗书于天下”；^[22]西魏文帝庶事草创，即命人“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23]北齐高氏，“颇更搜

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北周武帝平齐之后,“先封书府”(同前)。魏晋南北朝政府在图书搜集、典藏、整理、编目、利用、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4]广聚了书籍,完善了贮藏制度,发展了校讎学,创立了图书四分法,组织编纂了新型图籍,如类书、总集,等等。尽管当时官藏在朝代更替时,屡从兵火,损失严重,但它仍然传承了中华典籍。

此一时期,不仅官藏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而且私藏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藏书家人数众多,藏书量前所未有,藏书活动内容丰富,学术成果异彩纷呈。据范凤书先生在《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版)一书中统计,此期私人藏书家共有102人(这个数字并不准确,除史籍中有漏收的外,未将佛典、道籍、墓志中记录的藏书家统计在内),这只是见诸史书记载,实际人数恐怕还多。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萧统“有书儿三万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梁宗室萧劭“聚书至三万卷”(《南史》本传),沈约“聚书至二万卷”(《梁书》本传),萧纶有“书二万卷”(《陈书》卷一九《马枢传》),张缵有“书二万卷”(《南史》本传),其他如崔慰祖、陆澄、任昉、王僧孺、张缙、许亨、元延明、辛术、穆子容等人的藏书均逾万卷(见正史本传或他传),如果将梁元帝算在内,他藏书14万卷,居是时之冠。还有王弼藏书“几将万卷”(卢弼《三国志集解·钟会传》),李业兴“垂将万卷”(《魏书》本传),司马道子、崔祖思、刘善明有书“八千卷”^[25],范蔚“有书七千余卷”(《晋书》卷九一《范平传附范蔚传》),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梁书》本传),宋世良“有书五千卷”(《北史》卷八一《刘昼传》),李谧“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魏书》本传),葛洪、皇甫谧、萧子良、褚湛之、谢弘微、沈亮、陶弘景、阮孝绪、萧秀、王泰、柳世隆、沈麟士、刘慧斐、张盾、徐伯阳、江总、宋繇、李顺、江强、阳尼、元顺、陈元康、贺拔胜、陆爽、黎景熙、杨愔等人咸有上千卷藏书。有很多藏书家藏量很大,由于记载不明确,使我们无法知其准数,如三国蜀汉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三国志·蜀书》本传),西晋张华搬家时“载书三十乘”(《晋书》本传),北魏宗室元晏“家书多秘阁”(《北史》本传),高闾“家富典籍”(《魏书》卷六二《李彪传》),李冲“家饶书”(《魏书》卷六六《崔亮传》),梁萧机“家既多书,博学强记”(《梁书》本传),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梁书》本传),萧循“广集坟籍”(《陈书》卷三〇《傅縡传》),东晋殷允、张敞、郗俭之、桓石秀,北齐邢邵、魏收、辛术、穆子容、司马子瑞、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等等。^[26]另外,在魏晋南北朝人物传记中屡见这样的记述,云某人“耽玩典籍,以琴书自娱”,“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这些文字背后透出了他们藏书的情况,那些经学大师、私人教育家肯定也有一定的藏书。《隋书·经籍志序》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这进一步证明,此期藏书家很多,真是藏家辈出。

此时还出现了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六世家传书法、文

字之学,故其家多藏“古篆八体之法”。《南齐书·贾渊传》载:“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其家专藏谱系之书。又《陈书·徐伯阳传》载:“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只有在图书极其繁富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藏书家们为保存和繁衍图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不仅藏书,而且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写本书籍,一经抄录,极易出现鲁鱼虚虎之误,这就需要不断校勘。藏书家们不畏艰辛,乐此不疲地躬行其事。《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魏书·李谧传》载:李谧羸弱多病,犹“鸠集诸经,广校同异”,终致英年早逝。又《宋书·刘穆之传》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还有刘宋的傅隆,萧梁的孔休源、萧静,元魏的张充等人也都曾整理过自己的藏书。

他们利用所藏进行著述和讲学,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他们学术成果卓著,桃李满天下,这些成果或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或总结、发展某一学科,如王弼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葛洪的《抱朴子》和《金匮药方》、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萧子良的《四部要略》、陆澄的《地理书》、崔慰祖的《海岱志》、王俭的《百家集谱》、萧秀的《寿光类苑》、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任昉的《地记》、王僧孺的《百家谱》、萧统的《文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徐勉的《流别起居注》、阮孝绪的《七录》和《高隐传》、明山宾的《吉礼仪注》、元暉的《科录》、元延明的《器准》、阳尼的《字释》、李谧的《春秋丛林》等等,这些新著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具影响。他们还编了许多个人文集(见《隋志·集部》别集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藏书质量,推动了学术发展,传播了典籍文化。

许多藏书家将己所藏对外借阅,愿为人用。在史书中,此期私藏外借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过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又《北史·元晏传》载称:元晏好集图籍,“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魏书·李彪传》亦载:“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李彪后来成为藏书家,也借书与人。《南史·张率传》又载:“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北齐书·裴诩之传》亦载称:“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有的藏书家十分关爱读者,不仅热情出借,而且还为贫者提供住宿,筹办衣食。《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载: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北史·刘昼传》载:刘昼“知邳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南齐书·崔慰祖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向朗、范蔚、元晏、宋世良、崔慰祖等人以己所藏嘉惠他人之义举,也起到了传播典籍与文化的作用。当时,许多人是靠

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

更有藏书家将自己多年心血未狭隘地传与子孙,而传给了可传之人,使书逢其人,免遭散佚,充分发挥作用,如徐勉将自己上万卷藏书赠与蔡大保(《周书》卷四八《蔡大宝传》),沈约、刘显也将自己所藏分别赠与王筠和孔奂(《梁书》卷三三《王筠传》和《陈书》卷二一《孔奂传》),萧纶将二万卷藏书赠与马枢(《陈书》卷一九《马枢传》)等等,许多图书赖此得以流传下来。

纸质卷轴时代,书籍反复开闭,极易损坏,藏书家们不仅倍加爱护,且每见有损,必躬亲补治。《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王隐《晋书》载: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魏书·刘昞传》载:“昞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炳时侍侧,前请代焉。昞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同书《李业兴传》载:“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南史·刘苞传》亦载:刘苞“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有的藏书家对图书感情十分浓烈,他们不惜一切,呵护自己的珍爱。如《南史·虞和传》载:“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其情其景,令人赞叹。又如《南齐书·沈麟士传》载:麟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当时,人们已把爱护书籍看做是一种美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古籍全恃这些藏书家整理、保护而得以流传。

我国古籍生生不息,代代传承,最根本的原因是私藏与官藏的互补互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屡现,每及于此,官藏首遭厄运。如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东晋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齐末兵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梁书》卷二一《王泰传》);梁朝侯景之乱,梁室藏书,多从兵火;北周攻破江陵,元帝尽焚其书;元魏尔朱氏作乱,秘阁所藏,“并皆散亡”(《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官藏的散出,有些被毁,有些则流入私藏家之手。官藏流入私家的另一种方式,是皇帝赐书^[27],每次赏赐数千卷,不仅成为私家藏书的来源之一,而且分流了官藏,使之免遭覆灭之灾。另外,官藏目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28]这为私家聚书提供了参考信息,大有裨益,这是官藏对私藏的补充。而私藏回补官藏,则往往是在朝代更替、新朝甫立之时。一般规律,新政权建立后,总要搜求遗书,所得书籍,基本上来自私藏。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有时政府还派人到私藏家中或借用,或强取,以补充官藏。《晋书·张华传》载:张华“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篋……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檀道鸾《续晋阳秋》载:“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舍率郗愨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29]《梁书·任昉传》亦载:任昉家虽贫,

“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另外，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官藏时，也常向藏书家借书，以作参考。《北齐书·樊逊传》载：樊逊整理官藏时，曾建议秘书省“即欲刊定，必借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结果，“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官、私藏书的互补互动，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根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主流意识——儒家学说遭到削弱和挑战，佛教、道教借人们迫切需要精神支柱和心灵慰藉之际，乘机快速发展。为得到官方承认和支持，为争取更多的信徒，传教者们一方面拉拢统治者，一方面广译佛经，大造道籍。他们不惜重金，雇人缮写，四处流播。在统治者（尤其梁武帝）支持下，佛、道二教及其典籍如洪水泛滥。时人僧祐说：“经藏浩瀚，记传纷纶。”^[1]据《魏书·释老志》载：当时全国“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保守估计，道士亦有百万，宫观林立。北齐文宣帝谓：今“馆舍盈于山藪，伽蓝遍于州郡”。^[2]这些寺观都设藏经阁，以藏佛经、道籍及其他图书，供僧人、道士及他人诵读。（《梁书·刘勰传》载：勰“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寺观有经济来源，故可雇人抄经。前云刘芳“为诸僧备写经论……卷直以一缣”，陶贞宝以写经（指道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便是例证。有些贵族，信教虔诚，自出家财，雇人写经。《魏书·冯熙传》载：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僧尼、道士平日也有抄经教规，他们的这项宗教活动，也传承了宗教典籍。

魏晋南北朝之所以产生如此丰富的图书文献并流传下来，是因为有当时时代的需要，有传统理念（立德著书，可以不朽）的影响，有私学教育的因素，有方便的信息载体，有繁荣发达的佣书业，有众多的书佣，有官府、私人 and 寺观不断的收藏、整理和繁衍，这些因素，熔铸了它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 [1]《隋志》著录三代至唐前见存著作共6520部56881卷，其中约有4/5为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
-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77。
- [3]大略统计，此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约500余次。见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 [4]按：应该说，自简帛图书产生之后，就有抄书者，但出资雇人抄书或以盈利为目的的为人抄书，此前不见记载。
- [5]（东汉）班固，汉书（卷三〇）[C]艺文志[A]，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 [6](北齐)魏收.魏书(卷九一)[C]李修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下引此书版本皆同),1966.
- [7]魏书(卷八)[C]世宗宣武帝纪[A]210.
- [8]江南通志·人物志[A].四库全书[C]
- [9](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三)[C]王僧孺传[A].中华书局,1973.(下引此书版本皆同)470.
- [10]魏书(卷五五)[C]刘芳传·史臣曰[A]1233.
- [11](梁)释慧皎.高僧传[C].中华书局,1992.249.
- [12]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350.
- [13](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A].中华书局,1972.(下引此书版本皆同)622.
- [1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五)[C]梁纪二一[A].中华书局,1956.5121.
- [15]同[1].
- [1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六)[C]韦逞母宋氏传[A].中华书局,1974.(下引此书版本皆同).2522.
- [17]魏书(卷五二)[C].宋繇传[A].1153.
- [18](梁)沈约.宋书(卷九八)[C].氏胡传[A].中华书局,1974.2415.
- [19]魏书(卷三三)[C]李先传[A].789.
- [20]《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序》称:“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又《魏书》卷九一《江式传》载:祖江强“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
- [21]魏书(卷七下)[C]高祖孝文帝纪[A].178.
- [22]魏书(卷八)[C].世宗宣武帝纪[A].204.
- [2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七)[C]寇俊传[A].中华书局,1971.659.
- [24]陈德弟.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事业述略[A].中国中古史论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84-210.
- [25](清)汤球黄奭辑.众家编年体晋史[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下引此书版本皆同)263、291;(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C]刘善明传[A].中华书局,1972.527.
- [26]众家编年体晋史[C].276;(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C]樊逊传[A].614.
- [27]《宋书》卷一〇〇《自序》载:沈家有“赐书二千卷”。《梁书·王暕传》载:“居无尘杂,家有赐书。”又《陈书》卷二七《江总传》载:“家传赐书数千卷。”
- [28]《宋书》卷五九《殷淳传》载:“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又《梁书》卷五〇《臧严传》:“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
- [29]众家编年体晋史[C].276.
- [3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4)[C].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3385.
- [3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4)[C].3828.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

宋代馆阁藏书述略

黄建国

【摘要】 在宋代,朝廷就重视馆阁的建设,宋代的馆阁就是国家藏书的机构,兼有国家典籍的编校和收藏两种职能。重臣加以执掌,隆遇各种馆职人员,使得馆阁成为宋代重要的文化设施之一。文章主要阐述了馆阁机构的设置,馆职的设置,藏书的建立与管理。

【关键词】 皇家图书馆;图书馆历史;中国图书馆事业

一、馆阁制度

宋代馆阁是国家藏书机构,兼有国家典籍的编校和收藏两种职能,宋人不但注重书籍的编撰、校勘与雕印,同时朝廷亦重视馆阁建设,委重臣加以执掌,并隆遇各种馆职人员,使得馆阁成为宋代重要文化设施之一。

(一)馆阁机构

馆阁,即三馆和秘阁。三馆是指昭文、史馆、集贤院三个单位。三馆在唐、五代就有设置。宋初在后梁旧馆地址上,即在汴京右长庆门东北,仍设三馆建制,当时仅有小屋数十间,亦称西馆。太宗即位时,到三馆巡视,看到馆址“湫隘卑瘳,仅庇风雨。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常感慨,对左右说:若此之陋,“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耶!”当日下令,在左升龙门东北旧东各院另建三馆,并提出设计要求,“其栋宇之制,皆帝所亲授”。施工之时,还临现场视察,“命内侍督工徒,晨夜兼作”。^[1]一年工夫,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便告完。太宗赐三馆一个统称:崇文院。

太宗端拱元年(988)五月,又下令在崇文院中堂,建国家藏书的特藏书库:秘阁。以后,秘阁建筑于太宗淳化三年(992),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曾分别下令扩建,从此,崇文院内,馆加上秘阁合称为四馆。崇文院在宋代朝廷建筑中颇为突出。它“敞园苑,植花木,引沟水溉之”,^[2]环境优美,而且房舍“轮奂壮丽,冠于内庭,近世鲜比”,^[3]在内诸司官舍中“唯秘

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4]

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三馆与秘阁一度分开。原因是荣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为此,翰林学士陈彭年建议将秘阁旧屋重修为“内院”,另在“外院”“别置三馆书库”,^[5]以供校编书籍、雕造印版之用。天圣九年(1031),“仁宗以逼近市器,非多士讨论之所”,又令恢太宗时旧制,“徙三馆于崇文院”。^[6]

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废崇文院为秘书省,“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7]原崇文院有关图书、著作的职事,皆归秘书省。宋室南渡,初期曾一度罢设秘书省。时局稍定后,高宗于绍兴元年(1131)复置秘书省,当时以绍兴府为临时首都。第二年定都临安时,秘书省权寓宋氏宅,后迁法惠寺。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才正式迁到清河坊糯米仓巷的新建省址办公。秘书省下设四个部门:一为知杂案,掌本省官吏迁补轮差诸事;二为经籍案,掌管图书并朝廷检阅典故,以及修撰祠祭乐章;三为祝版案,掌祭祀祝版,分撰祝辞及辄祭文诸事;四为太史案,掌太史局、文德殿、钟鼓院、测验混仪刻漏所官生迁补事。^[8]秘书省总的职责范是“掌凡邦国,经籍图书、常祭祝版之事”,^[9]其权限显然比宋初三馆、秘阁要扩大一些。

三馆、秘阁之外,宋代还有各种有关宫廷殿阁。太宗建太清楼,真宗为太宗建龙图阁,仁宗为真宗建天章阁,英宗为仁宗建宝文阁,哲宗为神宗建显谟阁,徽宗为哲宗建徽猷阁,高宗为孝宗建敷文阁,孝宗为高宗建焕章阁,光宗为孝宗建华文阁,宁宗为光宗建宝谟阁,理宗为宁宗建宝章阁,度宗为理宗建显文阁。此外,还有玉宸殿、四门殿、宣和殿等。这些殿阁均为宫廷藏书之所。其目的一是供皇帝经常使用,即所谓“退朝之馀,聚图书以自娱”;二是保存前朝皇帝的档案和遗物;三是为了表示纪念。

(二) 馆职设置

汉魏以来,朝廷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务,其地位突出,待遇隆厚。由唐至宋,因三馆和秘阁均另有配置官员分司其事,秘书监在一般情况下,只是徒有其名而已。而馆阁职务却是个肥缺,不仅声名显要,而且是擢升高级官僚的重要途径。因此,从北宋到南宋,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如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大都曾厕身于馆阁。

馆阁人员有兼职和专职两种。兼职的称之为贴职,专职的称之为馆职,各级馆职通称为学士。馆阁最高负责人,昭文馆和集贤院为大学士,史馆为监修国史,均由宰相兼职。神宗元丰改制以前,馆职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为集贤院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即修撰、直馆、阁、院一级;第二等,为集贤、秘阁校理一级;第三等,为馆阁校勘、史馆检讨一级。第一等为各馆阁具体负责人,直接管理馆阁事务;第二等负责图书编纂、勘阅;第三等负责正字、检阅等事宜。馆职人员的升迁,一般按等递进。馆职的工作主要是编校三馆、秘阁的藏书,担任官修书籍的编纂,参与朝廷大典及政事讨

论。元丰改制以后,秘书省设秘书监、少监、丞、郎等职。具体分工是:秘书监与原馆阁学士相当,统管朝廷图书典籍事务;秘书省监及秘书丞,与原馆阁直学士相当,参与主持省务,掌领书籍国史历数之事;秘书郎与原馆阁校理相当,掌校图书分贮;校书郎或正字,掌校典籍,刊正说谬,从事具体的图书勘对。

宋代皇帝对馆职人员优礼有加。太宗在淳化元年(990)所下的诏书中,就曾特别关照:“自今游宴”除直馆负责人参加外,秘阁校理必须“预会”;皇帝呼由召名登第进士时,馆职人员须“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10]而且还规定:今后朝廷凡“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三馆之士必令预议”。^[11]淳化四年张洎充任翰林学士时,为了表明馆职不同一般,太宗煞有介事地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夫常恨不得为之。”^[12]

在官阶升迁方面,馆职人员也有特殊照顾。宋代文官,无出身不带职的,三四年不犯错误才只能提升一级;若带职的,则可以破格越级提升,甚至有提升五级的。特别是中央高级官员,大多从馆阁中挑选任用。馆职人员在中央,可升到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两府(政事堂、枢密院),攀登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养材之地也”、“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八九也”。^[13]欧阳修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上疏“臣见比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多以馆职授之”,^[14]可见一为馆职,便得为一路一州的大员。从馆阁选拔官员的原因是“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15]仁宗皇帝就曾说过“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16]可见馆阁本身就是宋代培养和储备高级人才的地方。由于馆阁职位优越,因而当时士大夫皆以馆职为荣,凡为官者,在交往应酬之中,还要加上担任过的馆职名,以显示其身份。当范镇被任命为直秘阁时,司马光特写诗祝贺:“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国士比为仙。玉槛勾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定翰照星厘。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可见馆阁之职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尊贵!

担任馆职非同小可,“一经此职,遂为名流”,^[17]但不是可以容易得到的。宋代前期,授予馆职要经过考试。就是进士及第、高中状元,也必须担任一段时间官职后,才能应试入馆。至于一般官员,须经大臣推荐后才准考试。应试科目,元丰以前“试诗赋各一”,^[18]神宗即位后曾下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道,策一道”。^[19]韩维和王安石未经考试而入馆阁,在当时是个例外。朝廷为授予馆职,曾召两人赴京考试。这两人清高的很,王安石辞以“家贫养老,且文官之职,士人多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20]韩维则“好古嗜学,安于退静”,^[21]不肯前来。最后仁宗于至和二年(1055)任韩维为史馆检讨,于嘉祐四年(1059)任王安石为直学士院。

馆职的授予,真宗以前比较严格。程俱在《麟台故事》记载:真宗咸平(998-1003)“王曾为进士第一,通判济州,代还,当试学士院。时寇准作相,素闻其名,特试于政事堂,除著作

佐郎,直史馆”。^[22]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二月,王钦若、陈彭年等抄校崇文院书籍,朝廷为补充馆阁人员,命吏部从京官和地方官有才学的人中选送,然后先初试挑选,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合格后才能担任馆阁低级官员。授予馆职后,还要接受考核,成绩优秀者才得以升迁。但真正担任要职的究属少数,多数另行派往地方任职。然而仁宗以后,却越来越宽松。大臣们往往为树私恩而滥事推荐,以至“馆阁之中,大半膏粱之子”。结果造成“材臣千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者”。^[23]尤其是神宗元丰改制以后,虽然馆阁职名仍然保存,但已经用不着考试,只要皇帝“恩赐”就行了。直至徽宗之时,馆职已“滥及于钱谷文俗吏”,^[24]“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25]馆职名声也越来越轻了。南宋早期,虽然考试时有时无,但已不那么随便授予,而是从进士高科中选取,或由大臣举荐入馆。在《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馆阁续录》中记载的九百多名馆职中,绝大部分是进士及第、进士、同进士出身,至于大臣举荐的馆职人员却是不多的。但到了宁宗以后,馆职又泛滥起来,馆阁制度逐渐徒有虚名,其显赫名望亦一去不复返了。

二、馆阁藏书的建立与管理

雕版印刷业的繁荣,馆阁的兴盛,为宋代图书的收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得宋代官私藏书超越前代,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一)典籍的积聚

五代十国的动乱,造成图书散佚严重。宋朝开国初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藏书,仅有数柜,“计万三千余卷”。^[26]因而宋太祖、太宗二朝,在削平诸国的征战中,很注意收集割据政权的图籍,用以充实政府的藏书。太祖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乾德三年平后蜀,派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后蜀“图书付史馆”,^[27]共1.3万卷。开宝九年(976)平南唐,令太子洗马吕龟祥至南唐京城金陵收图书“得二万余卷,送史馆”。^[28]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由左赞善大夫雷德源至太原,“入城点检书籍图画”。^[29]与此同时,还鼓励民间广泛献书。乾德四年闰八月,太祖“诏购亡书”。^[30]当时规定,凡有书来献者,先令史馆点检,如为馆阁所无,即以收纳;同时将献书人送翰林院考试,赐以相应的官职科名。如这一年《三礼》涉粥、《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曾共献书1228卷,“命分置书府,赐粥等科名”。^[31]太宗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与兴建崇文院差不多同时,下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以献”。^[32]在崇文院建成后,又公布缺书目录,下诏征集图书。太宗制定的奖励献书政策颇为具体。凡献书者,“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33]规定:“三馆所少书,有进纳者,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材录用。”^[34]于是,长沙人孟瑜所著《野史》30卷,被任命为光州因始县主簿;著作佐郎乐史因献上所著《贡举事》等6种152卷,加官晋爵,

“太宗嘉其功,迁著作郎、直史馆”。^[35]真宗太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36]奖励一落实,收书效果更佳。“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又募得者数倍”。^[37]其他皇帝,如仁宗、徽宗等,亦曾先后多次诏求四方遗书,并派官至各地访求、抄写,是收集图书的又一重要举措。至道元年(995)六月,太宗特地派裴育“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纳入官,优给价值;如不愿进纳者,就所在差能书吏借本抄写,即时发还”,结果收获不错,“凡得古书六十余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王羲之、怀素等墨迹共八本,藏于秘阁”。^[38]真宗时曾组织人成批抄写图书。他于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命令三馆将所藏四部书,各抄一部“置禁中太清楼以便观览”。^[39]徽宗于宣和五年(1123)二月,令秘书省“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40]

经多年积聚,北宋朝廷藏书颇具规模。至崇文院建成时的太平兴国三年(978),距离立国才十多年,就由原有藏书万余卷,增至八万卷(包括复本)。15年后,太宗到秘阁巡视,“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对侍臣们说:“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以后,多次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41]总计在北宋国家藏书《宋史·艺文志》总序中曾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卷;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最其当时之目,为千七百有五,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42]但这个统计未将复本包括在内。有人曾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中有关资料,包括复本,估计北宋国家藏书当有16万卷。

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破汴京,不仅俘虏了徽、钦二帝,而且将三馆、秘阁藏书掳掠而去。《宋史·艺文志》载及:“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南宋定都临安,开始曾下诏访求天下图书,恢复三馆。规定:献书的人给赏或补官;家有藏书的,派人去抄录;出卖书籍的,全部收购。为广搜各种遗书,曾编成《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两种,绍兴十四年(1144)还专门设立补写所,对朝廷缺少的图书进行补写。宋高宗嘉定十三年(1220),由于“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43]以当时所编书目计算,南宋藏书已达近6万卷(不计复本),而且还不包括“太常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版而未及献者”。^[44]

(二) 藏书的管理

三馆和秘阁所在崇文院的藏书布局,据《玉海》记载:“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六库书籍皆“用雕木为架,以青纹帕幕之”,^[45]设备相当考究。馆内编定图书,有“印记”作为志号,并一律用黄纸写成大字本册。沈括曾说,这是为了防止人们借书不还,因为黄纸大册本私人不敢收藏。

秘阁收藏的是从三馆中分出来的特种图书。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原三馆经过校定的真本；二类是皇宫内库所藏的王羲之父子、唐太宗、颜真卿、柳公权等名人的书画真迹；三类是天文、占卜等方术方面的朝廷禁书。秘阁建立之初，即太宗端拱元年（988），有一类书万余卷，二类书140轴，三类书3012卷，均为原三馆藏书中调拨给秘阁的。据《南宋馆阁录》记载：“旧制，秘阁书用集黄纸栏界书字，用绞一样装背，碧绞面签，及用黄罗夹复字号牌子，入柜安顿。”^[46]用集黄是为了防蛀，用黄罗夹复字号牌子，是为了确定书的类别及其在书柜中的位置，以使藏书井然有序。

至于宫廷殿阁藏书，亦为数不少。据《宋史·艺文志》记述：“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各有书万余卷。”据史料记载，真宗时龙图阁有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5115卷、轴、册；太清楼有书25192卷，又太宗御制诗墨迹30075卷，又文章92卷；玉宸殿聚书8000多卷。总之，殿阁收集的藏品主要是：前朝皇帝的诗文、诏令等集子，正经、正史等常用书，古画书法真品等。

藏书管理比较严格：三馆藏书各设类似总管的孔目官主管，每馆经史子集四部又分设书库官、守当官分别管理，每一藏书房又由书直官负责书房内的检点、保护工作，另由两名“库子”负责接待、办理取书借阅手续。崇文院藏书原可借出使用，但在哲宗元祐后，规定只准集贤院藏书可以出借。借书有一定的手续，须有主管官员“批簿”为凭证；书籍出入书库有检查制度，出大门时，须经“监门”根据“单子”检查验证，方准放行。如徽宗政和四年（1114）蔡攸奏章中说：“令未已降指挥，书籍出入，并监门具单子搜捡出入等。”^[47]对借阅中存在的问题，皇帝还亲自过问。咸平年间，真宗曾说：“近闻图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48]他听了朝臣朱昂等反映：四部书已被借出460卷，立即要求主管官员“严行约束，杜绝因循”，^[49]并督促归还馆内。

馆阁的读者主要是：皇帝及近臣、馆臣、特许在馆读书的人、政府高级官僚等。这些人除日常查考资料和浏览外，主要是为了编纂著述和进修学业而来。如四大类书的编写，就是利用崇文院的藏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经宋英宗特许，曾在崇文院设馆利用该院藏书，并借阅龙图阁、天章阁的书籍；欧阳修、沈括从事史学、科技研究，也曾充分应用馆阁所藏。由于馆阁藏书经多次校勘整理，错误较少，因此官方雕印图书，往往亦以馆阁本作为刻印的底本。宋代皇帝对保护图籍相当重视，把守卫图书机构的人员纳入皇宫警卫之列。崇文院大门由掌管皇宫保卫的皇城司派兵士20人（后增为30人）站岗守卫。据《麟台故事·禄廩》所记，这些人还负责“洒扫”等环境清洁工作，其中有亲司官5人、节级2人为负责官员。吸取策王宫失火教训，崇文院的防火器具比较齐全，平时对炉火的管理颇为严格，特设潜火司专门防火机构，有军士数十人，司内添置大小水桶数十只，栲栳钩百余柄，以及铁搭钩、麻索等救火器具，并制定《火禁法》从严管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有关记载，规定：下班时，

每日必须由亲事官四处检查监督“洒熄”，并记录每天用火情况。“如不应留(火烛)而撤存留者”^[10]，判刑2年；因遗漏者、该灭火而未灭者，流三千里；虽应存留而提防不严致遗漏者，亦与打火掌管人同罪，当宿(值班)官吏、专副巡防人减二等“惩罚”。为了使图书能长久保存，除图书采用椒水(胡椒、花椒浸渍汁)渗透的防蛀纸外，还健全了一年一度的曝晒制度。每逢五月至七月阳光猛烈之时，把全部图书分批取出屋外曝晒，以防霉防蛀，晒完书籍之后，朝廷在馆内举行宴请，以示慰劳。

注释：

- [1]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C].
 [2]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C].
 [3]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十五)[C].
 [4]梦溪笔谈(卷二十四,第四百三十四条)[C]校证本下册,764.
 [5]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二[C].
 [6]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二[C].
 [7]洪迈·容斋随笔(卷一)[C].
 [8]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十)[C].
 [9]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一[C].
 [10]麟台故事(卷五十)[C].
 [11]麟台故事(卷三)[C].
 [12]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五月丙午条)[C]点校本(四),749.
 [13]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十八)[C].
 [14]长编(卷一百四十五,庆历三年十一月欧阳修上言)[C]点校本(十一),5301.
 [15]容斋随笔(卷十六)[C].
 [16]麟台故事(卷三)[C].
 [17]容斋随笔(卷十六)[C].
 [18]宋史(卷一百六十二)[C]职官志二·直秘阁[A].点校本(十二),3822.
 [19]宋会要·职官八之三[C].
 [20]麟台故事(卷三)[C]选任[A].
 [21]麟台故事(卷三)[C]选任[A].
 [22]麟台故事(卷三)[C]选任[A].
 [23]欧阳文忠公全集·奏议集(卷五)[C].
 [24]容斋随笔(卷一)[C].
 [25]容斋随笔(卷十六)[C].
 [26]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 [27]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 [28]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 [29]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 [30]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 [31]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条)[C].点校本(二),178.
- [32]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 [33]麟台故事(卷一)[C].
- [34]麟台故事(卷一)[C].
- [35]宋会要.崇儒五之十九[C].
- [36]宋会要.崇儒四之十八[C].
- [37]麟台故事(卷一)[C].
- [38]麟台故事(卷一)[C].
- [39]宋会要.崇儒四之一[C].
- [40]宋会要.崇儒四之二十[C].
- [41]麟台故事(卷一)[C].
- [42]宋史(卷二十二)[C]艺文志一·总序[A].点校本(十五),5033.
- [43]文献通考[C].
- [44]文献通考[C].
- [45]玉海[C].
- [46]南宋馆阁录(卷三十)[C].
- [47]宋会要(十八之五)[C].
- [48]南宋馆阁录(卷三)[C].
- [49]宋会要(十八之五)[C].
- [50]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C].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

宋代市井乡野士民藏书风气及其思想诱因浅析

刘 云

【摘 要】 本文对宋代寄身于野的藏书家进行了简单分类,并具体探讨了他们不同的藏书目的和思想诱因,并探讨了他们的藏书活动对宋代乡野社会的贡献。

【关键词】 宋代;乡野;藏书;原因

藏书之风从一些公卿大夫扩展到市井乡野之民,是宋代私人藏书不同于前世的一个显著特点。市井乡野士民藏书家,主要指一些散布于城镇乡野没有官宦身份的普通藏书家。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阶层,既有一些贫富不等的布衣平民百姓,还有一些历经宦海沉浮或不苟时政而归于乡野的隐者逸民类藏书家和科举落第的白衣卿士类藏书家。这三类藏书家的文化层次、家世出身虽有很大差别,但由于他们都寄身于野,故以市井乡野士民藏书家笼而统之。这个阶层接触民众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尤其对民间文化风尚的导向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遗憾的是却从未引起关注过,下面笔者拟从其藏书的规模、缘起,以及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逐一探讨,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宋代私家藏书的概况。

市井乡野士民由于家资不等,故藏书多少不一。有的仅记为“构屋买书”、“忍饥寒以买书”或“聚书教子”;有的则记为“买书数千卷”;也有一些家资颇丰的则聚书上万卷,如少孤能自树立,喜读书属文,以资长雄其乡的婺源人胡霖“晚不乐试吏居家,筑亭馆溪山之间。藏书万卷,以课子弟”,^[1]两经荐辟,以母老力辞,筑甬州书庄的张瑞“聚书万卷,与子孙耕习其中”,^[2]布衣李畸实“购求群书,积万余卷”;崇宁间的陈恢“藏书万余卷”。^[3]而以藏书巨丰见称于时人的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其目皆多至四万许卷。

一、布衣平民藏书家

市井乡野士民由于成分复杂,藏书的目的是功用有很大不同。就一般布衣平民来说,藏

书有着更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内涵。

1. 聚书为得到一些现成的实惠。北宋一百六十年间,屡下诏征求遗书,凡献书者,或支绢或给钱或补官莫不以利诱之,史载“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赐出身,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闾、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百,凡六百五十八部,四千二百一十七卷,闾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14]徐州张成象家多藏医书,太平兴国年间献书,补翰林医官;^[15]布衣诸葛行仁于绍兴五年六月,进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赏以官实;^[16]莆田方于宝“家有三余斋,聚书数万卷。绍兴十六年,应诏进《风骚大全集》一百卷,补迪功郎。”^[17]受此种政策的诱导,小民相聚书是很正常的。

2. 布衣藏书在宋代还有一个思想渊源是把藏书看成光宗耀祖、光大门楣的一个间接途径,也就是为了教育子孙,希望他们读书为官。善治家的李平“吾子苟力学,他日能大吾门,其得失岂润屋比耶?”^[18]便一语道破人间事。更有一宋氏妇人,其夫好黄白术,伺其夫出,取其书并烧炼之具悉焚之。夫归,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夫感其言而止。于是宋氏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19]其他平民藏书家为子孙延师教子的也很多,大多为了以后读书做官的功名和荣耀。当时人称赞子孙好学能文都是最好的表扬,有的甚至以能与文士攀亲而自豪。

3. 还有的布衣平民聚书则把书看成遗留后代的财富,书是财富的源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得到市井小民的广泛认可。从史料看,藏书被看成为子孙治良产的思想很盛行。试吏部不中,父亡,而尽舍其科举之学的济州钜野人张仲元“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掇拾数千卷。指以示诸子曰:吾为汝曹得良产”;^[20]济州金乡人黄京“幼颇有意于读书,顾父老,劳于家事,以其身衣食百口,而买书数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儿”。^[21]这儿的良产还很难说是单纯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宋代重文,读书进官,有官便有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想法是黔首小民的直接推理也未可知。故不能高估了他们为子孙追求的是简单的精神财富,但也不可就武断地把他们斥为庸俗的功利主义者,如布衣李畸实就说:“遗子孙黄金满篋,不如一经,我之富在此不在彼。”^[22]傅思斋也说:“门无俗吏尽清阴,家有藏书抵万金。”^[23]中国文化正如钱穆先生言:“每种生活都是具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同时也正由于追求物质生活的一面,使乡下士民藏书的内容更为丰富,颇具一些民间风味,除经、史外,也有一些方书、医书、道书等,为民间文化的保存作出贡献。如孙大成“少多病,病玷至三月不差,遇术士授以丹药,一服而愈,故好聚方书”。^[24]金水人古世淳则家藏道书五千卷。^[25]家世医的庞安时,藏书至万余卷,然皆以考医方之事。^[26]

不管怎样,宋代士民乡人在宋王朝的右文政策影响下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认同,洪迈在

《容斋四笔·饶州风俗》中引用吴考宗《余干县学记》之言：“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便很好地反映了此种现实。事实表明平民百姓的这种想法也并非不切实际，读书做官也并非挂在毛驴前的一根胡萝卜，永远吃不到。宋代的当官者很多是穷书生读书入仕的，这与赵宋王朝统治者独具匠心、别有用意的取士理念分不开。唐末五代以来的社会动乱，使隋唐时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此基础上宋朝统治者对科举取士的制度及程式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如废除公荐，并使门生故吏的局面为天子门生所取代；又实行诸如糊名、弥封、誉录、锁院等制度；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提倡不限门第选拔人才，多次声称“贡举当选擢寒俊”，“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为朕有私”，^[17]“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等。^[18]这样就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使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了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踏入仕途。这对于广大平民布衣读书求仕是很好的诱导，从而有很多百姓藏书教子，以求功名。宋王朝统治下的天下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重学与读书的氛围与风尚，即使不识字的亦以藏书为荣，开封祥符人丁颀“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曰：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19]

总之，宋代布衣小民的藏书虽有着功利主义的成分，但他们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雅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一枝独秀的面貌，中国的俗文化兴起使乡野民间不再是文化的沙漠，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文化平民化的更重要表现之一。钱穆先生以五代到宋为中国文化的分水岭，认为宋代中国的文化走向平民化、日常生活化。笔者认为这种平民化不仅仅表现为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小民百姓参与真正的文化生活与创造，同时宋代社会文化产品的丰饶，书价的相对低廉，也为广大的布衣阶层藏书提供了条件。此外，钱穆先生把宋代科举社会看成是一个平等化的社会，是以耕读传家、没有组织、平铺散漫的社会，笔者以为也正是这种平铺散漫为宋代知识相对下移和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小民文化也只有在散漫中才能取得生存与发展，好比乱石丛中挤出的星星点点的闲花野草，在坚硬的石壁中，沉睡的种子是很难破岩而出的。

二、隐者逸民和白衣卿士类藏书家

在乡野士民中尚有一些特别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则完全脱却了功利主义的内核。他们栖于田园，诗书自娱，有较多精神方面的内涵，根据其思想行迹、藏书目的的不同，又有隐者逸行和白衣卿士的区别。

隐者逸民类藏书家：指不慕科场，或厌倦官场，因而归隐林下，辞归田里，藏书耕读，娱情或教子以自遣。这类藏书家出现于宋代的竹帛上颇引人注目，虽然他们选择归隐的原因

各不相同，但从这些片语零篇的记载中也可约略看出宋代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残鳞片甲，由此可更深入理解宋代私人藏书与社会背景的某种关系。

其一，有一部分藏书家本为朝中大臣，因不满官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归隐或由于党争而被排挤在外。如以“南楼北史”著称的史守之藏书源于其“中年不满其叔史弥远所为，退居月湖，搜罗甚富”；^[20]藏千卷书的师民瞻则由于“拂秦桧意，罢成都，奉余市书数千卷以归”；^[21]少抱奇志的方审叔“慨然罢举”大约也并非没有原因；洪咨夔自考功郎言事罢归於潜，合新故书得万有三千卷，藏之于天目山下宝福僧寺，如李氏庐山故事；李光罢政归乡是因秦桧的擅权蛮横，宰相马廷鸾九度上表力辞求去亦是因为贾似道的专横跋扈。更有的人考取功名而不就更说明问题，如黄晞、石待旦、李湊等藏书家，否则，在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时代里，很难解释为何如此多的人寄身于野，不思报国。

其二，还有一些人归隐为不肯为新学，如藏书数万卷，朝夕校雠的庐陵人段冲因“不肯为新学，退筑云斋，自号潜叟，郡以遗逸八行荐，不就”。^[22]彭城人魏衍也因不为王氏学，而不事举业。^[23]从中可看出围绕王安石的科举变法在士人中所存在的一些不满情绪，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有宋一代，儒、释、道三教合流，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已有二元倾向。特别是禅宗的创立，把佛教中国化，中国人把出世的思想溶化于日常生活中，再加上宋代纷乱的社会现实，“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思想更为流行，一些人不以仕进为念，安贫乐道，藏书自娱。

白衣卿士类藏书家：与隐者逸夫不同的是此类藏书家曾汲汲于科举，屡试不中或又生逢乱世，从此心灰意冷，冷淡名利，退而求志，从而以藏书著称乡里。如南北宋之交的王翊“射科未有就而生逢靖康之乱，遂归隐故山，倾其家市万卷书，辟馆百楹，爱诲子弟”；^[24]南宋吉州庐陵人王伯白亦“再游场屋不利，遂弃去。喜藏书，六经诸史，日夜校雠，笺札古今文集”；^[25]莆田著名词人刘克庄之弟刘克永“拥书如山，卧起枕籍之间。然郡试辄不利，因慨然废举，退而求志”；^[26]遂宁人苏振文“落落不偶，聚书数万卷，圣经贤传、山经地志、私乘野史以及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书，靡不搜罗”；^[27]不计所偿，掇拾数千卷以为诸子聚良产的钜野人张仲原也是“试吏部不中，父亡，尽舍其科举之学。即其居东南辟地种松，中为大堂，环壁架书，邀至俦好，论说终日，诗话相娱”；^[28]新喻人胡尧卿“年二五，再试吏部不中。年四十，筑草堂于高安之鲁公岭，捐十万钱买官书，无所不读”；^[29]人称万竹先生的高元之五上礼部，卒不第，于是家藏书千卷，手自点勘，宝之如珠玉，遇所未见，解衣辍餐，不计其值；^[30]分宁人黄庭坚的叔父黄育“试有司不利，不复出，为田治生守先人之业，家有藏书，使人多闻”；^[31]零陵人蒋沔少辞家人太学，既无遇于有司，则叹曰：士必富贵而后得志耶？弃而归，市书数千卷，阁以藏焉。^[32]此外就更不必说江西著名的藏书家温革了。这类藏书家在宋代出现也并不偶然，也可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宋代科举取士的一些现实问题。宋初统治者逐

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广求俊义于科场,鼓励寒庶布衣读书仕进,以补益吏。据王禹偁在至道三年(995)统计,太宗朝20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之多,真宗继位第一次贡举增至两万人。而从这些人的生平中可看出,他们基本处于宋朝建立50年以上的时间。此时,宋代科举取士已进行了几十年,网于野的士人不少,为宋代选拔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但后来就僧多粥少,职位毕竟有限,流于野的士人也必然多起来,这也从中反映了宋代科举取士的一个矛盾,这些落第的人也只做读书的白衣卿士了。

总之,宋代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特别,使一部分士人倾向于在乡间读书自遣,客观上促进了宋代乡下士民藏书的盛行,兴盛的背后却有太多的萧索与无奈。然以上这些隐者逸夫或白衣卿士类藏书家大多是读书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布衣平民,即便是,也是乡绅之类的有钱人家。相对于一般小民而言,他们有着一种文化使命感,故他们虽隐居乡下,或聚书研习,或束脩自养,亦为乡间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贡献,使学问下及于山陬野隅,使宋代私学呈现空前之盛,打破长期以来官学独尊、私学黯然的局面,为宋代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如应举不第的孙复“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1]新昌人石待旦“天禧三年进士,隐居石溪,创堂贮书,号万卷堂。又为义学三区,号上、中、下书堂,使学者迭升之人从此勉励,成名者众。”^[2]叶适《石庵藏书自序》说到的蔡瑞“念族人多贫,不尽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还有吉州人董亿“世儒家,即先庐竹林,辟观过斋,聚书万卷,日延师友讲贯道艺,创潜乐书院。”^[3]东阳人郭欽止“绍兴中作书院于石洞之下,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食,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4]他们使藏书的功用得以很好的发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藏书家的此类事迹多有记载,除藏书家的自发行为外,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宋太祖曾赐给宋初著名的族塾义学胡氏华林书院、陈氏东佳学堂等大量御书。江西藏书家温革,屡试不第,慨然自谓“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遂立志办学。仁宗宝元年间,他赴京上书朝廷,辍捐家资以兴义学。朝廷准其所请。凡国子监所藏之书,市上有售者,革均购以还,并于山泉美好的柏林中兴建藏书楼及义馆数十楹,开办讲学堂。^[5]这与宋代宗族主义的异峰突起有密切关系。自从范仲淹大兴义庄以来许多官僚士绅竞相效仿,置办义田,周济族人,成为当时令人夸赞的义举。笔者认为这是和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互为表里的运动,其兴办义学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实践,是宋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生发的一种历史使命感的表现。同时,这种历史使命感在朝廷的支持鼓励下得到发扬光大,而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注释:

[1](宋)汪藻.浮溪集(卷二七)[C].主簿胡君墓志铭[A].乾隆四十六年刊,武英殿聚珍本。

[2](宋)高似孙.史略[C].67.引鄞县志(卷三)[Z].张文英传[A].

- [3] 永乐大典(卷三—四七)[C]赤城续志[Z].中华书局,1986.
- [4] (宋)袁颐.枫窗小牍(卷下)[C].二,宝颜堂秘笈本.
- [5]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C].
- [6] 嘉泰会稽志[C].
- [7] 莆阳比事(卷六)[C].
- [8] (宋)吕陶.净德集(卷二六)[C].陇西李君墓志铭[A].丛书集成本.
- [9]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C].中华书局,1989.
- [10] 乐静集(卷二九)[C].张纯臣墓志铭[A].
- [11] 鸡肋集(卷六六)[C].黄君墓志铭[A].
- [12] (宋)邹浩.道乡集(卷三六)[C].李季侔墓志铭[A].道光十三年邹禾木刻本.
- [13] (宋)李昭.乐静集(卷二九)[C].傅主簿墓志铭[A].四库珍本.
- [14] 漫塘文集(卷三三)[C].孙府君行述[A].
- [15] (宋)吕陶.净德集(卷二六)[C].医博古府君墓志铭[A].丛书集成本.
- [16] 张右史文集(卷五七)[C].庞安常墓志[A].
- [1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C].中华书局,1979.
- [18] (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五)[C].选举志(一)[A].中华书局标点本.
- [19] 转引自金步瀛,杨立诚编.中国藏书家考略[M].
- [20] 鄞县志(卷三十)[Z].
- [21] (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九)[C].
- [22] (宋)廖行之.省斋集(卷三五)[C].段元恺墓志铭[A].四库全书本.
- [23] (宋)徐度.却扫篇[C].
- [24]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八)[C].王南鹏墓志铭[A].
- [25] 平园续稿(卷三三)[C].率斋王居士墓志铭[A].
- [26]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〇)[C].六二弟墓志铭(卷九六).刻楮集·序[A].
- [27] (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C].苏伯起振文墓志铭[A].四部丛刊本.
- [28] (宋)李昭.乐静集(卷二九)[C].张纯臣墓志铭[A].四库珍本.
- [29] (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三)[C].胡宗元墓志铭[A].
- [30] (宋)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三)[C].高端叔墓志铭[A].四部丛刊.
- [31] (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四)[C].叔父和叔墓碣[A].
- [32]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七)[C].蒋彦回传[A].
- [33]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C].
- [34] 嘉泰会稽志(卷一八)[Z].
- [35] 平园续稿(卷三五)[C].董君墓志铭[A].
- [36] (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九)[C].四部丛刊本.
- [37] (宋)王象之.輿地记胜(卷三)[C].咸丰五年粤雅堂刻本.

参考文献:

- [1]徐雁.历史藏书与中国文化[A].中国文化史丛书[C]选之一.
- [2]尹德新.历代教育笔记资料(第二册)[C],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
- [3]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M].台湾学海出版社1980.
- [4]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J].文献,1988,(1),(2).
- [5]方建新.北宋私家藏书再补录[A].古文献研究[C].《北方论丛》1989年丛书.
- [6]方建新.南宋私家藏书再补录[A].宋史研究集刊[C]1988.12.
- [7]刘汉忠.宋代私家藏书拾遗[J].四川图书馆学报,18989,(3).
- [8]林平.宋代私人藏书家补遗[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1).
- [9]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A].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C].
- [10]文毅.宋代图书事业兴盛原因及特征[J].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8,(1).
- [11]江向东.宋代私家藏书事业特点考述[J].文献情报学刊,1989,(1).
- [12]葛光.简论宋、明、清时代的私家藏书[J].云南图书馆,1983,(1).
- [13]黄运兴.北宋江西著名藏书家温革[J].江西图书馆学刊,1992,(1).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的递藏源流

李 坚

【提 要】 本文完整、详细地介绍了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的递藏线索和递藏情况,对人们了解两者的流传大有裨益。

【关键词】 《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在国家图书馆藏琳琅满目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两书历经名家递藏,终于双归于国家图书馆。对于藏书史上这两种著名的宋刻陶集,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藏书家周春购买汤注陶诗的曲折经历,以及黄丕烈“陶陶室”的典故,对两书的整个递藏源流,却提及不多。焦从海先生《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载《文献》1985年3期)介绍了这两部宋刻本在黄丕烈以后的收藏情况,但未提及黄丕烈以前两书的所属,而且焦从海先生对其所援引的资料出处并未详加说明。陈杏珍先生《宋刻陶渊明集两种》(载《文献》1987年4期)在着重考证版本的同时,简介了两书的递藏情况,但因不是文章的重点,故陈先生只作简略陈述,并未涉及细节,也未列举相应的资料。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向读者展现一条尽量完整、详细的递藏线索和递藏情况。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风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南宋刻递修本,¹二册。半叶10行16字,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20.4厘米,宽14.6厘米。卷首有汪骏昌跋。卷一后有墨笔题“正德己卯仲冬廿日”一行,书末又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书中盖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毛晋之印”、“汲古主人”、“黄丕烈”、“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阆源父”、“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海源阁”等印。《直斋书录解題》、《郡斋读书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门均

有著录。

《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晋陶潜撰，宋汤汉等注，南宋刻本，二册。半叶7行15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19.3厘米，宽13.6厘米。有清乾隆四十六年周春跋，乾隆五十二年顾自修跋，嘉庆十四年黄丕烈跋。书末有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书中铃印很多，有“秀石”、“景仁”、“董宜阳”、“向禹揆印”、“周春”、“松篁藏书”、“黄丕烈”、“士礼居”、“陶南布衣”、“陶陶室”、“汪印士钟”、“闽源真赏”、“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周暹”等印。此本《文献通考》经籍门著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书首有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序。据研究，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宋史》说汤汉做过真德秀的门客，曾官信州教授、国史实录院校勘等职。景定年以后，他曾到福建为官。本书刊刻的时间，应该在咸淳元年左右。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

据印章看，《陶渊明集》较早的收藏者是文徵明的长子文彭（1498—1573）。文徵明以书画著称于世，同时也是明中期小有名气的藏书家，在藏书方面，他的两个儿子文彭（字寿承）、文嘉（字休承）比他更胜一筹，《读书敏求记》称“墨林项氏（项元汴），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2]《陶渊明集》铃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此书应该曾经文彭之手。以后，《陶渊明集》成为毛氏汲古阁的插架之物，毛扆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该书说：“宋版《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夔然不同。如《桃花源记》中‘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五柳先生赞》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传》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即《四八目》注比时本多八十余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时本多千余字，真奇书也。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之后，还注明当时待售的价格是十六两）这大概是对此书最早的研究和评价，以后不断被黄丕烈、汪骏昌、杨绍和引用或抄录。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书被黄丕烈收藏。^[3]嘉庆八年（1803）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著录《陶渊明集》曰：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云：“宋板《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夔然不同……”今余所得即此本也。每册皆以宋锦装面，卷端有“宋本”、“甲”、“毛晋之印”三图记，其为汲古阁物无疑。书分十卷，卷末附《北齐杨仆射休之序》，录《本朝宋丞相私记》、《曾絃说》三通，《曾》云：“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想见好古博雅之意，撤书以遗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絃书刊。”盖此北宋曾氏刊本也。余又见有影写宋本但有杨之序录、宋之私记而曾说不传，可知此刊之秘矣。……

嘉庆九年（1804），顾广圻将《陶集》撰入《百宋一廛赋》：“尔其陶诚夔世签题元笔规往之外儿尘屡拂”，黄丕烈注曰：“《陶渊明集》十卷，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阁珍藏秘本目云‘与时本夔然不同……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最后附《曾絃说》一首云：‘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末署宣和六年，是北宋槧矣。宋宣献言校

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即此说中语也。”

该书又经汪士钟、汪骏昌之手。道光二十八年(1848)，汪骏昌录毛扆《书目》语于卷首并跋曰：“此宋板渊明集，汲古阁故物，其藏书目谓……^[4]盖所贵乎宋板者为其可以正时俗之谬误，而好古者得开卷之益也。因摘汲古书目中语录诸卷端，后之藏是集者庶几知其所以可宝欤。”两年后，山东聊城海源阁杨以增收得此书，1931年，书归周叔弢先生。

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的经历以及陶陶的分分合合就显得更曲折，更具戏剧性了。该书较早的收藏者应该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董宜阳，书首尾皆有“董宜阳”印。董宜阳，字子元，自号紫冈山樵，明嘉靖时华亭人，上海诸生，工诗文，善书法，与何良俊、徐献忠、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名，时称“四贤”。明末项禹揆也曾收藏此书，项禹揆，字子毗，秀水诸生，顺治时在南京遇难。项禹揆是大藏书家项元汴的后人，《藏书纪事诗》说“士礼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以后，汤汉注《陶诗》曾归藏书家鲍廷博(鲍以文)，但他不知道汤汉是什么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他与吴騫(葵里)一起过访另一藏书家周春，^[5]提到此书，周听后连称好书，并问在哪里，鲍说已卖给张燕昌^[6]了，周即从张处借看。张显然也不知道此书的好处，但见书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经笈(张著有《金粟笈考》，当然懂得它的价值)，疑心可能是部好书，所以急于要回去。周要他出让，张不肯，友人张载华^[7]从中调停，仍僵持不下。周春以书画、铜瓷端砚交换，张燕昌皆不答应。此时正值张燕昌需用古墨，周春遂用重达一斤的明朝叶玄卿的“梦笔生花”大墨与他交换。^[8]周春得了此书，“不胜狂喜，手自补缀亟，命工重加装钉，分为两册，完好如新”，并把它和一部宋版礼书放在一起，将书斋命名为“礼陶斋”，非常珍爱，跋其书曰：“是书乃世间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传日久，纸墨未渝。”又说：“此本大字端楷，作欧阳率更体，颇便老眼。且校雠亦鲜‘形夭’、‘庚钩’之讹。装竟复阅数过，诚可宝爱。”^[9]后来鲍廷博也意识到汤汉注《陶诗》的价值，多方觅购，乾隆五十一年(1786)始得一抄本，张燕昌便怂恿吴騫重行开雕，“共忏悔靦面失宋刻”。^[10]

周春为得书近于巧取豪夺，得到之后更是秘不示人，并打算以这部书殉葬。后来礼书先卖去，斋名改为“宝陶室”；最后于嘉庆十三年(1808)又将陶集卖去，斋名再改为“梦陶室”。^[11]有趣的是，当初周春以耍赖的手段得书(先把书压在手心里再讲价)，最终也因缺乏警惕的一句狂言而与书痛别，汤汉注《陶诗》落入苕估吴东白手中。“吴贾(吴东白)往购此书，怀数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与论直。周素州二番云：身边立有，决少悔言。吴即如数与之，竟不能反。去书之日，泣下数行。”^[12]周春几易斋名，洒泪别书，他对陶诗的这片痴情，让黄丕烈也颇为动容。

黄丕烈原已购得《陶渊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书从周家卖出后他就追踪购买，先出40两银子，没想到吴东白携书未至吴门即已售与硖石蒋梦华，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久经磋商，嘉庆十四年(1809)才以100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

“银居太半，文玩副之”。他感慨地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13]黄丕烈将汤注陶诗和他藏的宋本《陶渊明集》放在一起，算“陶陶室”以贮之，《陶渊明集》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此事成为藏书史上的一大故事。两年后，嘉庆十六年（1811）立冬日，黄丕烈随吴县潘榕皋游太平山观红叶，顺访香岩主人周锡瓚，又得南宋本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使之同处“陶陶室”。^[14]黄丕烈如此看重两陶集，除了二书均是珍贵宋版之外，还与他酷爱陶诗有关。场屋失意，终生不仕的经历，正与陶渊明有某些相似之处，与历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蕺圃对陶渊明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的同年好友、儿女亲家王芑孙在为陶陶室作记时还将他与陶渊明作了比较。

今者托趣于陶陶，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盖蕺圃宜为县而不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者，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然陶公处衰季，求官于贵族，濡足焉而后去之；蕺圃遭逢盛际，以高才久次，随辈获选，不由求请，顾且洒然脱屣，归卧不出，斯其遇远胜陶公。又陶公读书不求甚解，蕺圃则实事求是，搜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佳惠方来。蕺圃读书之专且博，亦非陶公所及也。^[15]

黄蕺圃之后，两陶集均归汪士钟（闽源）艺芸书舍，《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有著录。后来，山东聊城的杨以增（海源阁藏书的创始人）听到“陶陶”的故事，于道光二十九、三十年出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把两部陶集先后收到海源阁里，欣喜万分。多年以后，其子杨绍和仍对此感叹不已：

此宋板《陶渊明集》系汲古阁故物，……后与南宋槧汤东涧注陶靖节诗并为吴门黄蕺圃所得，颜其室曰陶陶，而以施氏、顾氏注《东坡先生诗》之《和陶》二卷媵之，倩惕甫王先生（王芑孙）为之记，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笈也。汤注本，先公于道光己酉获之袁江，又明年，此本及东坡和陶复来归予斋，距蕺圃之藏已花甲一周，不知几经转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数存乎其间者，果天生神物终当合耶？昔子晋（毛晋）藏《东坡书》、《渊明集》，斧季（毛焘）诧为隋珠赵璧，似此岂多让哉！我子孙永宝用之。^[16]

（先公）向闻黄蕺圃陶陶故事，心艳羨之，而不可得也。自道光己酉、庚戌来帅南河，访之吴门，于是两陶集先后收弃之。不胜狂喜，以为合璧重光，莫是过也。^[17]

遗憾的是，身后事难料。约80年后，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将其宋元秘本捆载至天津出售，从此，海源阁藏书星散人间。幸运的是，“陶陶”为爱书如护头目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所得。1931年，周叔弢先生先买到《陶渊明集》，而汤汉注《陶诗》被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王雨）买去。他知道周先生历来不愿好书失群，所以居奇抬价，丝毫不让，磋商很长时

间,1933年4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叔弢先生还是以4000元的高价将书买回,使“陶陶”分而复合,安然为自庄严堪所收藏。不但如此,弢翁还因为当年黄丕烈曾把宋刻施注《苏东坡集》中《和陶诗》二卷,放在陶陶室内,所以又向杨敬夫买下这两卷《和陶诗》,使它珠联璧合,恢复陶陶室的旧貌。

黄丕烈、周叔弢不惜高价以保全“陶陶”,苏州悬桥巷黄丕烈筑专室藏书,周春为得此书不惜耍赖;杨以增父子以之为“天生神物”,希望“子孙永宝用之”;毛扆的啧啧称奇,周春“礼陶斋”中的“不胜狂喜”,“梦陶室”里的扼腕痛惜;顾用修感慨“先生(周春)嗜书之笃,赏鉴之精,而吴鲍张三君子之好像,亦流俗中所罕觐”……所有这些,无一不显示出陶陶的珍贵价值。几百年来,“陶陶”就像一对熠熠生辉的明珠,牵动了多少藏书家的心,寄托了无数的喜怒哀乐。薄薄四册书,凝结了多少藏书大家的心血。“陶陶”的价值,早已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了。无数藏书者梦寐以求,无非希望据为私有,传之子孙,但胸怀广大,关心古籍命运重于个人得失的周叔弢先生从历代私家藏书聚散无常、甚至顷刻化为乌有的教训中,意识到只有由国家政府统一管理、珍藏,古籍善本才能得到妥善保管,传之久远。1942年,周叔弢先生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再收善本书恐怕不易,开始计划将所藏古籍善本捐赠国立图书馆,他在手定的书目上写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至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18]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将他藏书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书,共计715种,2672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陶陶”和两卷施注东坡《和陶诗》。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满腔热情地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周叔弢先生选择北京图书馆作为捐书的所在,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对儿子周珏良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手下又有他培养出来的如冀淑英同志等,书捐到那里可谓得所,我是放心的。”^[19]

竭尽多半生精力搜求古籍善本的周叔弢先生,他的藏书都是经过严格的“五好”标准挑选出来的,悬格极高,可以说他对每一册书都意笃情深。1942年因家用不足,他忍痛割爱明版书一百数十种,“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20]但他最终却能毫无保留,慨然赠书予国家,尤显其难能可贵的精神。现在,周先生等藏书家捐赠的古籍善本,与馆藏的其他善本书一样,都安居在国家图书馆的恒温恒湿的善本书库里,在周密的安全保卫措施和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下,由具有古籍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对善本书

进行保护、修复、研究整理、出版,为科研读者提供必要的阅览服务。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正焕发出新的青春,当年为收书、藏书、护书倾尽心力的藏书家们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注释:

[1]黄丕烈、杨以增等均认为此书是北宋刻本,误。书中的“构”字已避讳,加上书中刻工方成、施章、洪茂、王伸等,绍兴年间曾参与明州本《文选》和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唐书》的刊刻,因此,此书为南宋刻本,当属无疑。因版有漫漶,模糊不清,存有修版印刷之迹,故国家图书馆定为宋刻递修本。详见陈杏珍先生《宋刻陶渊明集两种》。

[2](清)钱曾撰,丁瑜点校,读书敏求记(卷四)[C]诗文评(“刘勰文心雕龙十卷”条)[A].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3]焦从海,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Z]但未知其出处.

[4]此为汪骏昌录毛泉语,与《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原文略有出入。汪骏昌录文为:“与时本全然不同。如《桃花源记》中‘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往’。《五柳先生赞》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传》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类,不可枚举。即《四八目》注比时本多八十余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时本多千余字,真奇书也。又云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

[5]周春(1729—1815),字范兮,号松霭,晚号黍谷居士。浙江海宁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广西岑溪知县。既归,杜门著书,老而弥笃。家多藏书,所居“著书斋”,终岁不扫除,凝尘满室,插架环列,卧起其中三十余年,四部七略,靡不浏览。与兄莲,并以博学有名于时。著作颇多,有《十三经音略》、《海昌胜览》、《代北姓谱》、《辽金元姓谱》等。

[6]张燕昌(1738—1814),字莒堂,号文鱼,又号金粟山人。清海盐人,性嗜古,所见古书甚多。其藏书室曰石鼓亭。

[7]张载华,海盐人,字佩兼,号芷斋,室名观乐堂、研古楼、初白庵。

[8]乾隆五十二年(1787)顾自修跋。

[9]乾隆四十六年(1781)周春跋。

[10]乾隆五十二年(1787)顾自修跋。

[11]嘉庆十四年(1809)黄丕烈跋。

[12]同上

[13]同上

[14]菴圃藏书题识(卷八)[C]注东坡先生诗二卷[A].

[15]王芑孙,渊雅堂全集(卷七)[C]黄菴圃陶陶室记[A].

[16]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卷四)[C].

[17]同上

[18]周珏良,我父亲和书[J]文献,第二十一辑,1984.

[19]同上

[20]周叔弢.齐乘.题识[C].

参考文献:

[1]焦从海.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J]文献,1985,(3).

[2]陈杏珍.宋刻陶渊明集两种[J]文献,1987,(4).

[3]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姚伯岳.黄丕烈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芜圃藏书题识[C].

[7](清)江标.黄丕烈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A]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一种)[C]民国19年(1930)四月.

[9]王绍曾.周叔弢与海源阁遗书[J]文献,1996,(4).

[10]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订.弢翁藏书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00.

[11]周慰曾.周叔弢传(第四章)[M]爱书·藏书·献书[A].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元代四明私家藏书探析

张如安

【摘要】 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经历了易代之际的严重损耗之后,很快得到了恢复,并呈现为丰富多彩的格局。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以“士大夫之藏”为主流,有卓识远见的商贾、富户、医家、军人、释子亦跻身于藏书家之列,引起了四明私家藏书类型的新变化。四明私家藏书致用的倾向比较突出,大致可以归纳为藏而重读、藏而为教、藏而为研三大类。特别是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引人注目,在编目、著述、充实国藏等方面均有骄人的业绩。

【关键词】 四明私家藏书;士大夫之藏;文化贡献

南宋时期,四明的藏书风气已经形成,私家藏书已经有了相当良好的基础。然而宋末元初的战乱,使整个浙江藏书的损耗极为严重,四明亦不例外。南宋四明藏书家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图书,其生命的脆弱性在易代的天灾人祸面前暴露无遗。浙东在元兵搜山的时日里,随处可见的是“书籍罹殃咎”^[1],以致袁桷发出了“不幸数十年诗书废坠,望尘执隶”^[2]的浩叹,郑觉民也慨叹:“明州称多贤,文献聚如积。须臾见海桑,晨汉星历历。”^[3]从南宋的“聚如积”到易代之际的“星历历”,这无疑是四明私家藏书的一次浩劫,也是四明藏书事业的一次重大的顿挫。仅有据可查的就有王应麟家藏累世之书、袁韶和袁甫数代之藏(仅名人书牋无虑数百)^[4],均毁于火。宁海舒岳祥为躲避战乱,将藏书寄存在崇安,幸而保存下来,但也有“蹂践污损”^[5]之叹。四明私家藏书的不幸遭遇,折射出了元初浙江藏书事业的磨难历程。幸而由于浙地文化渊源的深厚,元代浙江的藏书事业尽管元气大伤,但复苏很快。据方建新先生统计,元代藏书数千卷以上且有事迹记载的藏书家有127人,主要分布在江浙与京城大都一带,其中江浙二省的藏书家占总数的47%,浙江达35人,名列第一,其次为江苏,有25人。^[6]不过,我以为这一统计数字还是很保守的。仅四明一隅,元代藏书数千卷以上的就有王昌世、乐大原、舒岳祥、李忠、袁桷、倪可与、应伯震、镜川杨氏、余姚李氏、陈樾、释古鼎等10余家,以鄞县分布最多。此外,如奉化之戴表元、陈嵩伯、赵与葺、王子兼、袁仲素,宁海之胡三省、郑邦彦、胡哲、邬义翁,鄞县之胡珙、袁士元、陈仲模、程端礼、蒋宗

简、胡公鼎等也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天台人丁复曾说奉化“故家富积书，往借手自纂”^[7]，足见他对奉化故家藏书的推崇，只不过那些“富积书”的“故家”已经难以完全指实。总而观之，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比想象中更为丰富多彩，堪与杭州匹敌，即使放在全国也属先进行列，在四明藏书史的研究中不应被忽视。

一、元代宁波私家藏书的类型

鄞人程端礼曾精辟地将藏书类型划分为四种，他说：“古今藏书者多矣，金匱石室，朝廷之藏也；壁经冢记，季世之藏也；牙签玉轴，富贵之藏也。朝廷之藏与国久近，季世之藏与时盛衰，富贵之藏徒为珍玩。若欧阳之万卷，子朱子拟之，则士大夫之藏也。”^[8]考察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仍以“士大夫之藏”为主流，他们的先世往往有着浓厚的藏书风气，即使家遭天灾人祸，藏书散失，他们仍不折不挠地为了恢复旧藏而努力。他们不辞艰辛，或继承，或搜购，或抄写，开辟了藏书来源的多种渠道。如鄞县王昌世为王应麟之子，荫补承务郎，未及禄而宋亡。时王应麟已辞官家居，杜门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经史诸书讲解论辩，昌世听受不倦。家藏累世之书万余卷，不幸毁于火，王昌世发愤握管，“露抄雪纂，至忘寝食，书复以完”^[9]。另如奉化的赵敏求贫而好书，家里“抄书满架笔无尘”^[10]。如果说王昌世、赵敏求等是以抄录纂辑为主要手段积蓄图书的藏书家，那么同邑的袁桷则是以继承为主而兼有搜购的藏书家。袁桷出身于书香浓郁的世家大族，曾祖父袁韶举进士，官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从秘阁及故家中传录大量书籍，在绍定四年（1231）构筑了藏书楼。袁韶之子袁似道又续有增益，聚书至数万卷。到了袁洪、袁桷父子，旧书之传已有四世。元初，袁桷预感到浙东形势紧张，乃将旧书全部度藏于山中。至元二十六年（1289），浙东爆发了杨镇龙起义，诸袁之旧藏“一夕而烬”，只有袁桷预先转移的那批图书才得以幸存下来。后袁洪从杭州“复购遗阙篋载以归”，袁桷又“旁搜远录”，曾先后收得陈振孙散出的藏书数十种，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侔夫昔日之藏”。^[11]故孔克齐在《至正直记》中说：“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至于袁镛以德祐忠臣而遇害后，“书籍赏玩悉为族人天锡父子所得”。其后裔袁士元又亲自搜书蓄书，以接续先世的书香一脉，惜乎其藏书及手稿后为孙袁忠教携至学舍而大部散失。^[12]程端礼曾总结出士大夫之藏有二病：“常病其无力聚之，力能聚之，又常病其传之不久，其身仅读而其子若孙懵不识所以，至为鼯鼠之穴，窗壁甃缶覆盖之需者众矣。”^[13]这差不多是总结了私家藏书的演变规律。元代四明的士大夫如王氏、袁氏等，能于书籍世藏克守，呈现为浓郁的家族传承的色彩。袁士元生前考虑将藏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将以遗吾子孙”，有遗训云：“脱有不具，诸物可货，书不可去也。即去之，当论以不孝。”^[14]他企图以伦理观维系藏书之泽以不坠，着实用心良苦。然而，以袁氏的

微薄之力,又如何能逃脱士大夫藏书之病的制约呢?哪怕是立下了祖训,两袁的藏书最后仍败在不肖的子孙手里,不免令人唏嘘再三。

在主流的“士大夫之藏”外,有卓识远见的商贾、富户、医家、军人、释子亦跻身于藏书家之列,这是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类型的新变化,也是元代四明藏书风气得到恢复的有力表征。像胡珙和乐大原就其身份而论,并非出身于世儒之家,而是商贾和富户,由于家庭与职业的关系,本人并无多大学问,但却希望子孙通过读书求取功名富贵,光耀门庭。胡珙自曾祖至父皆未有仕籍,至珙始以才推择为郡曹掾,但他不愿为小吏,归家务农。胡珙平生没有什么玩好,独好藏书,有人持古书向他兜售,即使出价高昂他也买下,晚年在鄞县小溪构建精舍储书,并聘请师儒教诸生为举子业。^[15]乐大原是镇海的贩粮大户,有持旧书向他换米济饥者,他都乐于接受,因此而聚书数千卷。他充满自信地说:“吾子孙必有能读是者。”后其孙乐良果然读其祖上藏书,又从程端礼学,成为地方上的儒学名流。^[16]镜川杨氏族擅富豪,但亦多尚文雅,“累世所蓄之书殆充栋矣”。^[17]这几则事例说明,元代自科举恢复以来,儒士的地位有所恢复,至少在浙东一隅,社会上比较尊崇儒吏,这才有人愿意薰沐书香,力求跻身于儒士门庭。元代浙东儒而为医者不少,儒医在四明享受很高地位。儒医的形成,也得益于浓郁的藏书风气。元后期甬上著名的医家滑寿、吕复等人都爱好读书,家中亦多藏书,所藏则以历代医籍为主,滑寿对历代《难经》的版本收罗全备,吕复则对医门群籍颇为留心。至于李忠为河北唐县人,出身行伍,元初仕至鄞县尹,性喜学,不断积书,至元十六年(1276)从四明归家时,竟运走书籍七巨箱几千卷,为子孙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18]李忠的藏书在甬上虽仅昙花一现,随着其离职而转移至他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忠的藏书是受甬上浓郁书风熏陶的产物,他是在甬上完成了由武人向文官角色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元代四明寺院藏书竟出现了向士大夫之藏靠拢的新变,耸起了为释家学者所拥有的书楼,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余姚灵源寺时阜上人的西阁和鄞县东钱湖青山寺祖铭和尚的古鼎书楼,藏书均达万卷。刘仁本题《灵源藏书西阁为阜上人赋》诗云:“松竹林边寺,西山爽气浮。昔开千佛阁,今见万卷书。老墨明宗旨,研朱自校雠。本来无一字,宁羨邨家侯。”其题古鼎书楼亦云:“青山湖上老僧居,百尺危楼万卷书。架插牙签朝旭上,香消古鼎夜窗虚。栏干竹色浮蝌蚪,枕簟芸香落蠹鱼。近忆校雠人未远,雨花零乱独踟躇。”^[19]这些都说明时阜、祖铭两个和尚学者抛弃了“教外别传”的祖训,嗜书成癖,他们除了探明书旨外,还亲加校雠,其所做的工作与一般学者没有多大差别。他们的书楼有别于一般寺院的经藏(带有公藏色彩),其藏书处又为个人专用专享,实际与私家藏书楼无异,只不过其藏品带有鲜明的佛教色彩罢了。释子的加盟,无疑为甬上的私家藏书增添了一道异彩。

二、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目的

中国古代藏书传统一般是以藏为主,藏用结合。但在元代四明一隅,书籍的藏而为用的倾向比较突出一些。书籍如何藏而为用?不同类型的藏书者各有自己的实践方式,从而出现了不同的藏书目的和动机,丰富了传统的藏书文化。从致用的角度分析,元代四明私家藏书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目的:

首先是藏而重读。由以“士大夫之藏”为主流的藏书结构所决定,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主人的读书自娱和求知励学的需要。程端礼说得好:“夫穷乡晚学无书可读,无师可质,见闻褊狭,识趣污下,虽良才不能有成,故书不可以不藏,藏不可以不博。藏之博,读之博,又自博而约诸己,斯可以弗畔己。所贵乎士大夫藏者,良以此也。”^[20]程端礼以博藏博读为士大夫藏书的理想境界,这自然难以做到,但浙东士大夫藏而重读的风气确实非常浓厚。奉化赵与萇为燕懿王赵德昭十世孙,落为田农,但他在耕种之余,独好聚书,一见奇书,即倾囊收买而不吝惜,昼阅夜讽,务欲蒐揽。戴表元也不惜在狭小的居处中辟出“充安阁”,“家无浹晨之储,兼金之值,而有书一车,悉取而陈诸阁之四旁,坐阅而卧讽之,左右纵横,充然无不满之处”。^[21]但是戴表元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家庭藏书量不大,为满足自己的阅读愿望,有必要借助别家的藏书。后来戴表元与同邑的胡山甫相交往,“端为此家多贮书”是一个重要的诱因。^[22]剡源乡陈桎的藏修之所“静深斋”,冯必达赋诗云:“陈子家号藏书窟,婆婆枕席忘岁月。……何如坐拥过万卷,左几右架罗奇珍。”^[23]元末胡公鼎在月湖边营构“栖碧轩”,“蓄经史、彝鼎、图画,日以自适”。^[24]他们置身书斋,坐阅卧讽,几忘岁月,在书熏香沐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即使是在动乱的岁月中,四明的上人只要有书可读,就会忘记环境的险恶。如奉化棠溪袁氏藏书未经兵火,舒岳祥避乱至此,入袁氏藏书屋阅读不休,有诗云:“我来不问主,竟造藏书屋。主人不我苛,终岁取书读。”^[25]他还听说陈贵白的畚斋藏书“插架富名都”,又有了“读书借其居”的愿望。^[26]从戴表元、舒岳祥的经历可见,至少元代奉化的私家藏书是不那么封闭的,他们乐于满足士大夫的阅读需求。至于奉化人陈子翠见国事日蹙,独守其父陈仲模藏书而读之,则其藏书而读又别有时代原因了,他是因为对黑暗时代的不满而从读书中寻找一方净土。而宁海陈梦辰则藏书以怡亲,其藏书虽经宋末兵火之乱而完好无损,为其父读书娱老创造条件。^[27]陈梦辰让父亲在书籍中得到精神上的乐趣,比起单纯地满足老人的口腹之欲来要高明得多,可以说达到了孝亲的最高境界。总之,私家藏书不管是供自家阅读还是供他人阅读,而士人又不管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寻求读书之乐,客观上都营造了浓郁的读书风气,延续了甬上自宋以来的文脉,同时浓郁的读书风气反过来也促进了本区私家藏书的发展。

其次是藏而为教。藏书与教育相结合,凭借藏书以培养人才,这是中国藏书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元代的甬上藏书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他们为自家的后代着想,有的以书教了孙,以维持诗书之泽,有的作为财产传留给子孙,希望他们好学上进,维持或转换成书香门庭,有的希望子孙借此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如鄞县应伯震(1217—1291)在蜜岩筑花厓书院,藏书达五千卷,延请良师教子侄辈读书,并接待远游学子的查阅,其藏书观比较开放。^[28]胡珙在鄞县小溪构建精舍,储书之外,还聘请师儒教诸孙读书为举子业。奉化戴表元也声称:“穷未卖书留教子。”^[29]即使再穷,藏书是舍不得卖掉的,至少教子时还需要它。慈溪叶至翁“好图书图画,有售者辄不吝,于名公巨卿文章关世教者手抄成卷帙”,遗诫数百言,“将建屋置田延师以教”,以维持“叶氏诗书之泽”,^[30]而与为教的目的相适应,他有意地选择那些“有关世教”的文献作为入藏的主要对象。至于粮商乐大原和军人李忠的藏书,则都是为了留给子孙,带有教育投资的性质,欲借此弥补自己非儒出身的文化上的缺憾。大致而论,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在教育上的表现,主要是为家族教育服务的,为家族中的学子创造必要的读书条件。当然,像宁海邬义翁“开馆日千屢,藏书山四邻”,^[31]其藏书供开馆教育之用,其所开之“馆”已具有乡塾的色彩。即使如此,私家藏书为教而面向乡里毕竟不是普遍的现象,尽管私家藏而为教的受教面是很狭窄的,但客观地说,这对于维持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社会声誉都是相当重要的。

再次是藏而为研。研究是在受教、阅读基础上更高级的创造性行为。元代四明不乏学者型的藏书家,如袁桷、胡三省、吕复等,他们藏书阅书,颇有心得,故能利用自家或他人的丰富藏书,在文化研究上做出出色的成绩,从而也奠定了四明藏书家的文化贡献。这些读者可以从下节的叙述分析中得到具体的印证。

三、元代四明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

元代宁波藏书家非常注意对典籍的整理,包括编目、校雠和刻印。如鄞县倪可与雅志读书,其履斋拥书万卷,“手校雠不倦”。^[32]宁海郑邦彦喜好蓄书,手自校雠,奥旨疑义,无不晓析。^[33]即使释家学者古鼎也以校雠书籍为乐。不过在这方面成绩最大的是袁桷,他在《七观》附注(延祐三年)中说:“桷不佞遗谋守儒,号东南故家。志学之岁,先子命缮治书录,观史志略录部第,时见外杂。稍长,得博考先贤藏书总目,屹屹三十年,合传短长,乃成一家。”^[34]这就是说袁桷的治学是从“缮治书录”开始的,通过博考先贤书目的得失,从而形成了独到之见。袁桷深知书目的重要性,继王正己之后编出了私藏目录——《袁氏旧书目》和《袁氏新书目》。他将私藏的新、旧图书分开来编目,已经注意到了私家藏书的历史演变性,并将旧藏陆淳《春秋纂例》作为劫后遗珍而倍加呵护之,这种编目方法曾为后代藏书家所继承。

他还打算“合诸父之藏分第为目录”，即编制一种家族图书联合目录，这也是很有新意的设想，尽管这部联合目录最终未能完成，但却启发了“联合目录”的思想方法。袁桷除了编目校雠外，还将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付于梓刻，曾刻过宋人林越的《汉雋》10卷。

元末鄞县著名的医家吕复利用丰富的藏书，在目录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吕复医技之高巧，与其“博考载籍，参取化源”密切相关。吕复学问赅博，辩论医门群经，评鹭古今医家，见解极为精当。吕复对《内经》、《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源》、《太史天元玉册元诰》、《玄珠密语》等11部重要典籍均进行了评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径引为《吕复医门群经辩论》。论中对上述医籍，皆叙其作者，陈其源流，别白是非，甄论得失，辨章学术，剖析条流，实为中医文献不可多得的典籍提要。中医目录古无专书，自汉代刘向父子《别录》和《七略》始，历代医学书目均附于综合目录之中，《别录》和《七略》之医书叙录已不可得见，历代官修及史志目录又几无叙录，间有私家解题，或失之简略，或泛泛而论，未能较为准确全面地反映各医学书籍的学术概貌。至南宋时始有中医专门目录出现，但也仅见其名，影响甚微。元明时期，在对各家医学思想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对医学文献进行了一些总结，其中吕复所做的工作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医学术发展至此，对中医目录专书产生了急切的需求，吕复顺应了这一学术需求，对前代中医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他对医门群经的评述，体例上虽不是中医目录专书，但因其以历代医学书籍为对象，较为集中地分别论述了各书的作者、源流、内容、学术价值及版本流传情况，以及后世的注释、整理及研究等，不但提供了各书的重要信息，而且还可借此以鉴别其真伪，确认其实用价值。他对历代名医，上自扁鹊、仓公、仲景、华佗，下至严子礼、张公度、王德肤等16位医家评议公允，明其醇疵，以示后人；在金元医家中，特别推出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东垣四家，可见其对元人葛应雷“四子”观点的推崇。因而具有解题目录的功能，为后世中医书籍提要的撰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元代以吕复为代表的对医籍的总结性评述，在中医目录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出现不但促进了中医目录学的发展，使中医目录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明清医家在其著作中不但引述其内容，而且仿效吕复的体例，或综群籍，述医书之源流，或品题得失，辩各家之短长，或推荐必读和应读书目，示治学之门径。如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中凡有提要，基本照录吕论而稍加增删。此外，如《颐生微论·医宗说》、《医话》、《橘旁杂论·古今医书大意》、《知医必辨·合论诸书得失以示初学之违从》、《冷庐医话·古书》等，均带有受吕著影响的痕迹。所有这些，成为中医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中医目录的一大特点。^[35]而吕复之所以能“博考载籍”，如果没有丰富的私家藏书作为依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元代四明的私家藏书还滋养了一代学人，而学者们依据藏书进行研究著述活动，成果丰硕，令人瞩目。如袁桷利用家藏典籍广记博闻，精于史学，且熟悉乡邦文献，其所

著述,造诣精深。宁海胡三省避地甬上时,恰好寓居在袁桷故居东轩,至正二十年(1360)甬上兵乱,胡三省将书藏于东轩石窖中始得幸存。胡三省石窖藏书的规模不得而知,除了《资治通鉴》及注释手稿外,还有不少必要的参考用书,用以保证学术研究的进行。赵与葺研猎奇异,广蓄精取,农圃之外,卷帙不离手,又常往寻古碑以证读书之误,故其所著,得益于藏书实多。王厚孙利用家族藏书对王应麟的《玉海》进行校对工作,至正九年(1349)庆元路总管阿殷图发现郡学所藏新刻《玉海》仍有遗误存在,又在至正十一年(1351)命王厚孙及儒学正王介重加校对,查出漏误6万多字,再行招工修补,从而保证了一代巨著的刊行质量。奉化陈嵩伯(1238—1314)也是“聚群经师说商略雠证”。^[36]陈桱坐拥静深斋万卷藏书,孜孜不倦地阅读爬梳,终成浙东史学名家。元代四明的经学较为发达,丰富的藏书为经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鄞县蒋宗简出游江淮间,在金陵购买未见书数百卷而归,^[37]为他聚《易》、《诗》、《春秋》诸家之说而折中之打下了基础。程端学一生致力于《春秋》研究,折中异同,湛思二十余年,作《春秋本义》30卷、《三传辨疑》20卷、《春秋或问》10卷。其中《春秋本义》是一部集解,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176家,卷首具列其目,其所引书现存者约十之二,佚失者约十之八。程端学的著述除了有条件充分利用公藏图书外,私家藏书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余姚医家滑寿注《难经本义》,博引元以上医家有关论述,先后计有20余家,前述周与权、王宗正等宋代注本,纪天锡、张元素等金代注本,袁坤厚、谢绪孙、陈瑞孙等元代注本,今大多佚亡,而其部分内容为滑氏所援引,得以保存下来。如果滑寿没有自己丰富的专业藏书作基础,要完成《难经本义》的写作是难以想象的。

再次,四明私家藏书还为充实国家图书馆及修纂国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宋禧曾说:“宋之叔世,其人才出于四明者为盛,至今文献犹有足征者。”^[38]危素也说:“鄞故文献之邦,距宋行都不远,往往能言前代故实。”^[39]因此出于编纂《宋史》的需要,危素于至正四年(1344)奉诏周游楚、吴、越之疆搜购故书。危素深知“鄞故文献之邦”,^[40]故特意在四明逗留四十余日,足见其对四明私家藏书的特别重视。他如愿以偿地得到故家袁桷藏书数千卷,足备典实;^[41]又检阅了程端礼家藏图书,得到宋人林勋所著《本政书序》的残页,奉为至宝;在句章史塾孙处征集到史季敷《夏小正经传考》一书。危素最后在四明得书七千卷而归,还不满足,又通过大瀛海道士吕虚夷等友人征集到南宋四明儒学者沈焕、舒璘的遗书。可见,四明大批私家藏书因危素关系而流入国都,其中特多乡献资料。这可以说是四明私家藏书第一次大规模地流入国都,充实国藏,其数量比后来清代修《四库全书》时范懋柱的进呈书要多出近2000卷。危素在四明征集到的这批图书,不但为《宋史》的编纂提供了极好的文献储备,而且化私为公,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 [1]舒岳祥.闽风集(卷一)[C].次韵袁伯长奇赠之作[A].
- [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任隐君墓志铭[A].
- [3]而上耆旧集(卷三)[C].郑觉民.送王叔毅教谕象山[A].
- [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C].书进修堂往还尺牋[A].卷50.跋正肃公手泽[A].
- [5]舒岳祥.闽风集(卷九)[C].题萧照山水[A].
- [6]方建新.元代私家藏书考析[J].文献,1996,(4).
- [7]丁复.桧亭集·送张志可侍父之奉化幕官[A].
- [8]程端礼.畏斋集(卷六)[C].跋陈象贤竹素图[A].
- [9]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一)[C].王公墓志铭[A].
- [10]舒岳祥.闽风集(卷七)[C].赠敏求[A].
- [1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C].袁氏旧书目序[A].袁氏新书目序[A].
- [12]袁忠彻.符台外集(卷下)[C].敬跋检阅先祖诗集后[A].
- [13]程端礼.畏斋集(卷六)[C].跋陈象贤竹素图[A].
- [14]袁忠彻.符台外集(卷下)[C].敬跋检阅先祖诗集后[A].
- [15]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C].胡君墓志铭[A].
- [16](雍正)宁波府志(卷二十七)[Z].
- [17]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一)[C].家藏书目序[A].
- [1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二十八)[C].
- [19](光绪)鄞县志·祖铭传》、刘仁本《羽庭集》卷三。
- [20]程端礼.畏斋集(卷6)[C].跋陈象贤竹素图[A].
- [21]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三)[C].充安阁记[A].
- [22]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C].次韵答胡山甫兼汪日宾[A].
- [23](光绪)奉化县志·古迹[A].
- [24]乌斯道.春草斋集(文之卷一)[C].栖碧轩记[A].
- [25]舒岳祥.闽风集(卷一)[C].村庄麦饭……[A].
- [26]舒岳祥.闽风集(卷一)[C].次达善送赵君理……[A].
- [27]舒岳祥.闽风集(卷十)[C].陈仪仲诗序[A].
- [28]陈著.本堂集(卷九十)[C].应长卿墓志铭[A].
- [29]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C].己卯岁初葺剡居[A].
- [30]郑真.荜阳外史集(卷二十九)[C].故叶君行状[A].
- [31]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C].紫溪邬义翁挽诗[A].
- [32]刘仁本.羽庭集(卷六)[C].乌思道.春草斋文集·倪仲权墓表[A].
- [3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二)[C].郑处士墓碣铭[A].
-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C].

- [35]李继明.元代医家吕复及其在中医目录学上的贡献[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1).
- [3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九)[C].海阴陈处士墓志铭[A].
- [37]光绪.鄞县志(卷三十二)[Z].
- [38]宋禧.庸庵集(卷十二)[C].代刘同知送危检讨还京师序[A].
- [39]危素.说学斋稿(卷三)[C].鄞江送别图序[A].
- [40]危素.鄞江送别图序[A].
- [41]苏天爵.袁文清墓志铭[A].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

清代宁波藏书业的发展及其贡献

乐承耀

【摘要】 清代宁波藏书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并且形成藏书特色,对清代浙江乃至全国的藏书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清代;宁波;藏书业;贡献

宁波清代藏书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对清代的浙江乃至全国的藏书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私家藏书与著名藏书楼

宁波在清代是藏书家集中的地方,出现过在清代藏书史上富有一定影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1. 清初的宁波藏书家与藏书楼

清初宁波的藏书家与藏书楼是不少的,有黄宗羲的续钞堂、李邕嗣的东皋草堂、胡德迈的宝墨斋、张宗瀚的瞿瞿堂、张天因的西郊草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郑性的二老阁、董道权之缶堂、高士奇的清吟堂、钱光绣的归来阁等,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是黄宗羲的续钞堂与郑性的二老阁。

黄宗羲之续钞堂。黄宗羲,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也是藏书家。其“于书无所不窥”,一面阅读家中的藏书,一面不断抄书来增加家里的藏书。不足,他“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1]比如,1641年,黄宗羲曾数度寓居南京黄居中家,将其千顷堂之藏书翻阅殆遍。^[2]1650年,他曾到常熟访问钱氏(牧斋)书房,“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3]。黄宗羲的一生足迹所至,无不访书、抄书、购书、读书,这从其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可见一斑。今摘

录如下：“崇祯庚午(1630)间，其(指钮石溪)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1641)，余在南中，闻焦氏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邨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邨仙，犹归我也。邨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1650)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溪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1661)，在武林拮据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1664)，馆浯溪，携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浯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祁氏旷园之书，初度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1666)，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1706)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4]

黄宗羲的藏书楼称“续钞堂”。为什么称“续钞堂”？由于黄宗羲曾经与许元溥、刘诚诸人原约建“钞书堂”，此楼藏书，又是黄宗羲一生辛勤劳动所抄录者，故名。“续钞堂”的藏书总数在10万卷以上。

到了晚年，黄宗羲则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由于黄宗羲的旁搜遍采，他家所藏之书非常丰富，“野史遗集，绝学奇绝，殆不胜数”，尤其是所藏宋元文集特别多，明代文集也约有五六千本，而且收藏之书十分精，尤其薛居正《旧五代史》最为珍贵。元明以来旧本儿至湮没，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大搜天下遗书，但仍未所见，邵晋涵只得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照原篇编排成书，收入《四库全书》已经不明其原来的面目。可是黄宗羲却有收藏。清人吴任臣写作《十国春秋》时曾经向黄宗羲借阅过。吴任臣曾经说：“窃谓古学至今，几称绝响，不惟调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龙。有志读书，动多穷困。故时辈反有以此为戒者。得虎座倡学东南，真不啻今日之《广陵散》矣”，“拙著《十国春秋》专俟薛居正《旧五代史》略为校佳谁，遂尔卒业。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沧兄之便，希慨寄敝斋，一月为期，仍从沧处壁上，断不敢浮沉片纸只字，切祷！切祷！”^[5]

但续钞堂在黄宗羲的晚年遭到了大的损失，1710年冬徙于老柳。1722年，山堂焚，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复徙归于老柳，秋徙于兰溪，其间鼠残蠹啮，雨浸梅蒸，而又经兵火之余，留余的仅十分之四五，康熙五十六年(1717)仅存3万卷书。黄氏续钞堂之书于水余、火余之后，归浙东又一藏书名楼郑氏二老阁。

郑性与二老阁。郑性，字义门，号南溪，慈溪鹤浦人(今属宁波市江北区)。郑性的二老阁建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竣工于雍正元年(1723)，是清初浙东的著名藏书楼。建二老阁本来是他的父亲郑梁的夙愿。郑梁是黄宗羲的高足，他对恩师黄宗羲十分崇敬，他去世

前,特意嘱咐儿子郑性,建一阁,立二先生主,岁时致祭惟谨,希望能永远侍奉在父亲和恩师的左右,二老阁之名由此而来。对此,全祖望在他的《二老阁藏书记》中曾经说过:“郑氏自平子先生以来,家藏亦及其半,南溪乃于所居之旁筑二老阁以贮之。二老阁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为父,以太冲先生为师,因念当年二老交契之厚中,遗言欲还阁以并祀之。”^[57]

郑性遵循父志,在郑宅东侧修建了一座两层三开间的小楼,楼上中间供奉黄宗羲及其祖父郑濬、父亲郑梁的神位,其余的辟为藏书之用。二老阁的藏书由两部分组成:黄宗羲遗存藏书,约3万卷,庋藏在二楼左右两间;郑氏家传藏书,约2万卷,贮藏于楼下三间。二老阁总计藏书5万余卷。郑性不仅保存了黄宗羲的遗书,而且还对其进行整理和勘误。据全祖望《五岳游人穿中柱文》记载,郑性“于黄氏之学,表彰不遗余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后,卷籍散乱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之次第,正其误而重刊之。”^[6]郑性以二老阁藏书为底本,刻印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62卷、《南溪偶刊》4卷和《寒村集》36卷。

二老阁藏书由郑性开创,后来得到不断的发扬和光大。郑性之长子大节曾悉心校订黄宗羲遗著;次子中节将二老阁藏书“发而刊之”,与杭世骏、全祖望等悉心研究;其曾孙郑勋(郑简香)对二老阁遗书也“藏口刻播,一书一画,宝若晴髓”。乾隆年间,郑勋章。因其高祖郑梁与朱彝尊关系甚深,曾经打算拟建“二老堂”,来祀郑梁和朱彝尊,阮元为之题写了匾额,并且作诗云:“别拟建堂尊二老,竹口经义晓行诗”^[7],可是后来并没有建成。经过郑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二老阁成为浙东著名藏书楼,黄宗羲许多重要的著作,最早大多由二老阁刊印发行,编成“二老阁丛书”,在学术界、出版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2. 乾嘉年间的宁波著名藏书家和藏书楼

乾嘉年间,宁波也有不少藏书家和藏书楼,较有影响的是全祖望与双韭山房藏书楼,卢文弨与卢址的东西“抱经”藏书楼。

全祖望与双韭山房。进乾嘉年间的宁波藏书家中,全祖望应该值得大书一笔。全祖望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藏书家。他不但在经史、文学诸方面富有卓越成就,而且作为一个藏书家,全祖望的贡献也当之无愧。藏书丰富且不论,更重要的是,他的《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小山堂藏书记》、《二老阁藏书记》、《天一阁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胡梅涧藏书记》等,对于江浙藏书家的介绍及藏书楼兴建之由的叙述,为中国藏书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全祖望的藏书楼名为“双韭山房”。双韭山房本是全祖望六世祖全元立别墅之名,在鄞县大雷群山中大皎和小皎双溪间。因山溪多野韭,故名双韭山房,早毁。全祖望之祖父全大程沿用此名为其书斋,到全祖望时仍沿用此名。作为藏书家,全祖望所经营的藏书业是十分艰辛的。他在《双韭山房藏书记》中称他的祖先藏书很多,“其中大半抄自城西丰氏”,即

所谓“阿育山房藏本”^[8]，后书归宗人公，全祖望辈仅得十分之一。全祖望一家经过数代的努力几复阿育山房之旧。其祖父无力购书，则手抄之，其父购书、抄书亦不少，其本人也从小抄书，至全祖望时藏书达五万卷。

乾隆二十年(1755)，51岁的全祖望家境已十分困窘，他逝世后，竟无钱安葬，其家人只得将剩余的万余卷典籍出售，为全祖望办理后事。这万余卷典籍后来以二百两白银尽归卢址抱经楼所有。

全祖望藏书中有南宋宝庆至明嘉靖间七种四明方志，以宋刊本开禧、宝庆《四明志》两部最为珍贵，在当时，可属世间仅有之书，是全祖望的镇库之宝。全祖望爱书到了极点，据载，每次外出，他必从家中五万卷藏书中带二万卷为伴。

东西“抱经”藏书楼。乾隆年间，在浙江较有影响的藏书楼还有东西抱经藏书楼。一是原籍余姚，后迁杭州的卢文“抱经堂”，另一个是鄞县的卢址的抱经楼。

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一作召弓，号矾鱼，又号槩斋，晚年更号弓父，余姚人，迁居钱塘。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后因条陈学政事宜，被部议降三级使用。这一挫折，对他打击很大，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乞归故里。晚年任江浙崇文、钟山、龙城等书院讲席，以经术指导学生，桃李满天下，著有《抱经堂文集》、《仪礼注疏详校》、《钟山札记》、《龙城札记》等。

卢文弨性爱藏书，他从童年时就喜欢抄书，一直至老从不停止。为增购书籍，不惜将官俸所入全用以购书。钱大昕为其《卢氏群书拾补》作序云：卢文爱蓄书，“俸廩口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抄、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籍数万卷，手自校勘，精审无误。”^[10]吴騫《抱经堂集序》也云：“尤癖典籍，几忘寝食。闻人有异书，必宛转借录，遇亥豕则为校正而归焉，人也乐以借之。”^[11]通过购买与借抄，卢氏成为乾隆年间浙江一大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名“抱经堂”，一时与鄞县的卢址抱经楼有“浙东西抱经”之称。藏书印极富，达四十余方。

卢文弨去世后，其子卢庆钟、卢庆录曾经说：“先人手泽存焉，虽贫，安忍一日离也。”^[12]可是，最终还是“藏书星散，尽落估人手”。^[13]他的藏书多归南浔刘承干的嘉业堂。

乾隆年间与杭州卢文弨“抱经堂”交相辉映，是鄞县的卢址的“抱经楼”。

卢址(1725—1744)，字青厓，鄞县人，卢氏世代诗礼之家。卢址因科举连试不中，绝意进取。他一生博学嗜古，尤喜聚书。以其先祖遗藏数千卷作为基础，不惜重金悬求古籍。每得一书，一定细心校阅，往往至废寝食。遇有善本、秘本，总是出重价购买，或者辗转借抄，历三十余年积聚，“藏书楼巨万卷，几出天一阁上”。1777年建“抱经楼”贮之。藏书楼的名取自唐韩愈《寄卢仝诗》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救始终”之句，意在表明他有独抱遗经之志。有《抱经楼藏书目录》12卷，47册，著录90144卷。无解题，间有注，撮要举纲，简而不

陋。有藏书印“抱经楼”、“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

卢址对天一阁极为推重,因而在建造“抱经楼”时,式样完全模仿天一阁。楼分上下两层,朝南共六间房。楼下中间为大厅,靠西边一间有步梯可登楼,与天一阁略微不同的是,步梯为横装。楼上贮书,以书橱分间。东西两面靠墙处,各放单面大橱两只,当中是五排十只大橱,前后可开门,朝南空隙的地方分别放置十只小橱。楼中布置朴素。

“抱经楼”的藏书中,有许多得自故家散出。除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外,还有叶氏竹堂、黄氏千顷堂、丰氏万卷楼、毛氏汲古阁、祁氏澹生堂、曹氏倦圃、汪氏古香楼、金氏文端楼等故家藏书。卢址将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依类排列,并自编书目四卷,藏书上印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白文方印。计书47橱,可以与范氏天一阁和郑氏二老阁相比。

卢址藏书中宁波家乡文献极为丰富,这是他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四明文献的保护和承传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国藏书家考略》对他做过这样的评述:“至清继范氏而起者,首推卢址,诗礼旧门,自小博雅嗜古,尤喜聚书,遇善本,不惜重价购之。闻明旧得异书,宛转借抄,晨夕雠校,搜罗三十年,得书十万卷,仿天一阁,为楼以贮之,名曰抱经。”^[10]

卢址的后人亦喜欢藏书,对抱经楼的藏书有所增益。到乾隆年间,浙东的藏书家不少破败,在宁波市内,唯有卢址的抱经堂与范氏天一阁依然。

黄澄量与五桂楼。浙东藏书楼中,留存时间最长的,除了宁波范氏天一阁以外,首推余姚梁弄黄澄量之“五桂楼”,为此被誉为“浙东第二藏书楼”。

黄澄量,字式峯,号石泉,余姚梁弄人。平生不置产业,嗜求藏书,因梁弄地处山峦重叠的浙东偏僻山区,远离城邑,兵戈罕至,故选择在此筑楼藏书。嘉庆十二年(1807)动工兴建,二年落成,取名“五桂楼”。民间传说是因为楼前五株桂树而得名,事实上,黄氏在宋代有一远祖,兄弟五人皆学识渊博,同科中举,在当时很有名望,世称“五桂”。黄澄量为纪念他们,就把书楼改名“五桂楼”。

作为藏书家的黄澄量,很注意藏书目录的整理、编目。据胡芹《五桂楼藏书目录记》记载:黄澄量“得一书,添一目,即读一书,而十而百而千而万,记于目者记于心,是亦博闻强识之一助也”。他将收藏的5万余卷藏书编录成《五桂楼书目》四卷。

黄澄量死后,他的儿子黄肇震(字伯器,号药溪),继续搜集图书,使五桂楼的藏书在原藏5万卷的基础上,又陆续增添了1万余卷图书。

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五桂楼部分藏书散失。黄澄量的曾孙黄安澜用5年的时间对原有藏书按照经、史、子、集进行整理,并且重新搜集散失了了的图书,致使五桂楼的藏书恢复原来的规模,并出版《五桂楼书目》。

3.晚清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宁波的藏书业在晚清与清代初、中期相比有所衰落,但也有一些藏书家,诸如沈德寿、

陈邦瑞、陈励、徐时栋、董沛、曹辛、蔡鸿鉴等十多位,较有影响的是徐时栋的烟屿楼与董沛的六一山房。

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鄞县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两次考进士不第,即不复应试。徐时栋自幼喜读书,也嗜藏书,自称“吾十龄外即喜聚书”。^[14]

徐时栋藏书处称“烟屿楼”、“城西草堂”或“水北阁”。“烟屿楼”因徐时栋寓居于月湖西畔烟屿洲,“君家月湖之烟屿,因以烟屿名其楼”。他的藏书楼因而取名为烟屿楼。徐家原有藏书千卷,徐时栋读完后犹嫌不足,又陆续增添许多新的图书。在其21岁所编的《新故书目录》中共著录书378部,12881卷,这反映了徐时栋早期的藏书情况。经过20余年的广采博览,孜孜以求,积书达6万卷,大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鄞县范峨亭及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藏书来之不易,徐时栋倍加珍惜,亲订烟屿楼藏书记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规矩十分严格,印于每册藏书扉页。徐时栋爱书如命,书籍稍有残损,即命工人修补装订,甚至亲自整理补缺。《烟屿楼文集》中曾有生动的记载:“余以廉值得之贾人,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蠹蚀,又装订错乱不可读,道光己亥五月始为排比补缀重装之,涣然改观,足珍贵矣。”^[15]

徐时栋于咸丰十年(1860)受到了打击。太平军进攻宁波城时,烟屿楼未能幸免于难,所藏之书“尽为人窃掠”,所存无几。但是,这次打击并没有使徐时栋灰心丧气。第二年,他迁居西门外的城西草堂,继续他的藏书事业,整理旧编,访求散佚,终至五六万卷。同治二年(1863)又遭大火,数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徐时栋在《烟屿楼》笔记中曾经记述过这件事。他说:“余自弱冠即好购书,二十余年亦将十万卷。咸丰十年遭乱,在烟屿楼者尽为人窃。其在城西草堂者尚五六万卷。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草堂焚如,皆灰烬矣。”^[16]沉重的打击并没有击垮徐时栋,同治三年六月,他在城西草堂故址重建新宅,书楼在河之北,取名“水北阁”,重新搜求藏书。经过几年的苦心收聚,藏书30大橱,计3164种,9815册,44205卷。编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渐渐恢复旧观。

徐时栋死后不到四十年,即宣统三年(1911),水北阁遗书尽售予上海书贾,少量流入近代宁波藏书家。徐氏烟屿楼在今宁波市共青路48号,尚存。水北阁因旧城改造,今已迁入天一阁。

董沛(1828—1895),字孟如,号觉轩。出身于世儒家庭,喜好读书。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西,历署清江、东乡、建昌、上饶等县及江西通志馆协辑官。光绪十一年(1885)以疾辞官归故里,筑“六一山房”,聚书5万卷,坐卧其中,从此过起日日与书为伴的生活。

董沛在年轻时就喜欢读书、藏书。他登遍浙江的著名藏书楼,“遍读家藏书,复求之同

县烟屿楼徐氏、抱经楼卢氏、天一阁范氏,继之杭州借文澜阁书阅之”^[17]。其藏书处除六一山房外,还有正谊堂、晦暗斋,藏书印有“六一山房藏书”、“鄞六一山房董氏藏书”等。

正是由于博览综籍,致使他学识丰富,知识渊博,著作丰盛。著有《明州系年录》、《两浙令长考》、《甲丁乡试同年录》、《周官职方解》、《竹书记年拾遗》、《甬上宋元诗略》、《正谊堂文集》等数十余部。同治七年(1868)徐时栋主纂《鄞县志》,未竟而卒,临歿执董沛手相托,由董沛踵成光绪《鄞县志》是书。

二、藏书的特色

由于清廷的提倡和藏书家的努力,清代宁波藏书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形成藏书特色。

1. 藏书多、规模大而版本精

清代宁波藏书一个重要特色是私家藏书多而且规模大。孙从添的《藏书纪要·鉴别》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多,惟吴中苏群、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从文献看,清代宁波私人藏书业发达,涌现出不少藏书家。《中国藏书通史》中除提到范氏天一阁外,提到清初藏书家的还有黄宗羲、陈自舜、郑性和万斯同;清中期的著名藏书家有全祖望、卢址、卢文弨、黄澄量;清末有沈德寿、陈励、董沛和徐时栋。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中记述了清代浙江藏书家35人,宁波为9人,约占25%。尤其在清初,顾志兴提到11位藏书家,宁波人占6个,超过50%以上。^[18]

今人虞浩旭所著的《智者之香》,对清一代宁波藏书家做了梳理,明确提出了92位藏书家,其中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黄宗羲、万斯同、郑性、全祖望、卢文弨、卢址、黄澄量、姚燮、葛朝、冯云濠、景辉、沈德寿、徐时栋、陈鉴、张寿荣、邓蔚斋、蔡鸿鉴、董沛、叶元培等19人。^[19]

宁波藏书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藏书有相当规模,藏书数量丰富。比如,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总量在10万卷以上,卢址的抱经楼藏书90144卷,郑性的二老阁藏书5万卷,全祖望双韭山房藏书5万卷,黄澄量的五桂楼藏书55006卷,万斯同在京都也有书10万卷。

清代宁波藏书家的藏书除了规模大以外,而且版本精,不少藏书家的版本都是世上所罕见。黄宗羲就收藏不少宋元版本,明文集也有五六千本,尤其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更为珍贵,号称“天壤间罕遇者”。

2. 注意对明代文献的收藏和编纂

清初,宁波的不少志上有反清复明的情绪,不少人参加过反清斗争,如黄宗羲及其弟弟曾组织过抗清义军“世忠营”。全祖望曾说:“公纠合黄竹浦弟子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堂。”^[20]李业嗣曾亲身参加过抗清复明活动。南明政权灭亡后,他被捕,

饱受囹圄之苦。出狱后,以布衣终生,从事著述,拒不与清政府合作。万泰富有民族气节,与黄宗羲一起举义旗反清,兵败后隐居不仕,少年万斯同深受其影响。

从以上背景看,宁波清初的藏书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就决定他们注意对明代文献的收藏和编纂。黄宗羲、万斯同、郑性等都是如此,他们收藏了不少明代的史事,对明史纂修起了不少作用。黄宗羲谙熟明史,极意搜求明代,尤其是南明历朝书籍。李逊之给他的书信中已提到:“因知老翁兄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21]他除著《明儒学案》外,又历时8年选辑《明文案》217卷,继而花18年时间,完成《明文海》482卷。所著《行朝录》、《思旧录》、《海外恸哭记》等书堪称南明实录。尽管他拒绝编修《明史》,但他支持学生万斯同参史局,以黄尊素所著的《大事记》和《三史钞》等重要史料送明馆参考,派其子黄百家随带家藏明史资料赴史馆修史,并对史馆遇到的疑难问题加以指点。“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22]万斯同其家有明列朝实录,他还辄就耆宿求明遗书,考问往事,旁及地主志乘,“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23]。康熙十八年(1679)起,他几乎竭尽全力参加明史的修纂,携书10万卷,为编明史提供大量材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一再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借手以报先朝矣。”当时史臣所撰的文稿,都送他审阅裁定,虽然没有担任总裁的名义,实际上做的是总裁的工作。《明史稿》500卷,皆为万斯同所手定,梁启超说:“《明史》之成,距万氏之死,已四十年,史馆废弛已久,然《明史》之有相当价值,万氏力也。”^[24]这一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3. 崇尚抄书,注重积累

从一些文献看,宁波藏书又一个特色是藏书家崇尚抄书,注重长期的积累。在清代,书籍流通地相对集中,交通不便,给藏书家购书带来困难。加之,一些珍本、异本,既没有刊本,购买也不很容易,只能通过抄书来增益藏书。这也就成为宁波藏书家抄书的重要原因。清初的鄞县人李文纯尤喜抄书。其堂弟李业嗣为其所作的《铭》中就说他“日抄三分,月积一咫,葬笔成丘,漏砚如雨”^[25]。他所抄的内容是汉魏以来的“诸大家集,下至稗篇野乘,无不手写;若唐人诗,分家别体,并录数遍,岁积满十余筐。”^[26]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李文纯的耕石堂的藏书多为抄本。

藏书家全祖望,一生勤于搜书、抄书,注重长期积累。全氏祖先,世代藏书。先祖“阿育山房”藏书甚多,但全祖望祖父全大望仅得十分之一。祖父教书之余,稍有节余即购书,无钱购书则抄书,或难以找到刻印的书,也只得手抄,把抄书作为聚书的重要手段。其祖先的藏书大半抄自城西丰氏。全祖望的父亲、叔父都曾经以抄书作为练字课。全祖望小时刚能提笔写字,父亲就命他抄书。及弱冠之年,全祖望遍访宁波著名的藏书家,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博雅堂、陈氏云在楼、陆氏南轩书屋,读书、抄书不辍,还曾经到杭州赵氏小山堂借书抄书。经过祖孙三代的全心经营,日积月累,到全祖望时,家藏图书累计达5万卷,多为抄

本,为同年代藏书楼之冠。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从而使他有幸读到皇家所藏的《永乐大典》,他除了每日必读20卷古籍外,还手抄和雇人抄录了高氏《春秋义宗》、荆公《周礼新义》、曹放斋《诗说》、刘公是《文抄》、唐说斋《文抄》、史真隐《尚书周礼论语解》、袁正献《正肃文抄》、《永乐宁波府志》等书。得到这些世所稀见之书,全祖望十分高兴。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曾有“如此长安居不易,就分清俸苦抄胥”之句,这是全祖望北京抄书的真实记述。

余姚人卢文弨的抱经堂的不少藏书,也是他亲自抄写的。他自己曾说“童时喜抄书”,而且至老不辍。在他72岁的时候,写了《二酉斋记》说:“颓然老矣,然见一异书,眼犹为之明。杨仪部曰:‘自知身有病,不作长久计,偏好固莫捐,聊尔从吾意。’余今向首抄书,矻矻朝夕,亦正有自不可解者。”^[27]段玉裁的《卢公墓志铭》也说:“官俸口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闻有旧本,必借抄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28]正是由于卢文弨的崇尚抄书,注重积累,终成浙东的著名藏书家。嘉庆年间的周永年还利用在四库馆工作的有利时机,雇人抄书,“佣书工十人,日抄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29]

三、藏书家、藏书楼的社会贡献

清代宁波藏书家在清代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保存、传播古籍及护藏家乡文献中作出了贡献,而且为编纂大型丛书及各类史书提供了方便,也为造就浙东有清一代学人和浙东学派的形成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1. 为保存、传播我国古籍及家乡文献作出贡献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宁波藏书家编辑和刊刻的古籍来看。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而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杜诗富有人民性,艺术成就极高,历代有很多学者加以注释,到宋代已有“千家注杜”。这些注释能系统地保存下来,而且整理出版,鄞县人仇兆鳌是功不可没的。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曾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他花费20年时间,尽力搜集前文的杜诗注释,不下数百家,汇集历代各家注本,辑为《杜诗详注》。这是一部对杜诗详加注释与考订的集大成的著作。而这本《杜诗详注》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仇兆鳌收藏大量有关历代注家的书籍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从《杜诗详注》看,有多种关于杜诗的前人著作,原书已佚,而正是仇兆鳌引录,得以保留至今。正如孙微《清代杜诗学史》所称:“仇兆鳌等的《杜诗详注》得以‘援据繁富’著称,这正得益于其藏书的丰富,人称其‘甬上仇先生,拥书胜百城’,可见其藏书之丰富。”^[30]

另有黄澄量所编的《今文类体》一书(又名《明文类体》),被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谢国

被誉为“稀有的好书”。《今文类体》仿黄宗羲《明文海》体例而编纂,全书不分卷,共138册,全部采用明刻本原书为材料,选辑明代诗文集、奏议等,分门别类,编辑汇录成册。全书分为:原书目录6册,墓志铭17册,行状5册,祭文6册,传5册,赞1册,解附杂解1册,策3册,记8册,议附公移3册,书14册,诗35册,题跋1册,墓表3册,碑3册,考附杂考1册,说1册。其中保留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2]该书所收明人文集,大部分为《四库全书》未收本,部分收入存目也多为罕见本,其中有30种是当时禁书,有的还是全毁本。在乾嘉年间,黄澄量冒着杀身甚至灭族的危险,收录、编辑这些文集奏议,保存了这些重要文献,为后人研究明代文献、研究明代版本目录学提供了宝贵史料。黄澄量为保存我国古代文献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卢址的藏书中保存了多种珍本秘籍,如宋刻本《开庆四明续志》12卷,宋乾道刻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金刻本《经史类证大本本草》存23卷;抄本有《修文殿御览》360卷,《册府元龟》1000卷,以及洪武、永乐、宣德、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十四朝实录;又有明丰坊《鲁诗世学》,文徵明稿本《宋儒粹语》等。

书籍生产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主要靠手工抄写,即使在清代。鉴于所需复制量不大,或者由于印刷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为此,抄录依然是保存和传播文献最好的办法。这表明书籍的传抄是古籍传播的重要方式。上面我们已经提到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藏书大家通过抄书的方式,均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古籍。

清代宁波的藏书家,对于家乡文献的护藏也是十分认真的。全祖望就是例证。虞浩旭在他的《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一文中曾指出:“宁波的历代藏书家,尤好留意桑梓,集刊文献。史学大师全祖望‘千里中掌故考索尤勤’,其藏书楼双韭山房‘所藏典籍也以是类为备’。”他收藏的宁波方志很完备,无论是宋代的《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还是元代的《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以及明代的永乐、成化、嘉靖等志都有收藏。《宁波府志》是全祖望入京中进士后,入庶常馆,以翰林身份借读皇家藏书《永乐大典》时所抄。他还从天一阁所藏《四明文献录》中抄得四明最早的方志《乾道四明阁所藏志》。这些宁波地方文献的收藏已经成为双韭山房的镇库之宝。

鄞县的卢址注重地方文献的收藏,先后收藏《开庆四明续志》12卷及全祖望的《四明文献》32册140卷。还有其他的四明地方文献,计数百种。对编纂宁波地方志出力不少。乾隆年间,鄞县令钱维乔修纂县志,内容多从抱经楼藏书中采集,得益于抱经楼藏收颇多。卢址“尽出其家藏书宋元旧志及四明人诗文写本”,学者钱大昕承认抱经楼藏书“于志事多益余者”。同治十一年(1872),鄞县再次纂修县志,抱经楼中收藏的地方志“几六百种”,为鄞县志选举表和人物传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补益甚多。董沛做诗云:“劫后犹存万册书,浙河遗籍此楼孤。……两宋麻沙多旧制,上明石库本仙区”,“县中近日纂图经,屡拟

登楼借榻停。……衣冠鼎盛搜人物，架阁书多载地形。却为乡邦添故实，传抄长对夜灯青”。

就藏书种类而言，晚清的徐时栋也注重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用力尤深。他曾求得六本宋元时期的宁波方志，即《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堪称善本。徐时栋对其进行了考订、校勘、补遗，合称《宋元四明六志》，于咸丰四年重新刊刻，同时附刻宋人旧帙《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根据上述六书，徐时栋还著有《四明六志校勘记》一文，被董沛誉为“宏雅好古，留意桑梓”，使珍贵的文献史料得以流传。

2. 在编纂丛书及史书中的贡献

宁波清代藏书家对我国丛书及史书编纂中的贡献是不小的，主要是为《四库全书》修编捐书和直接参与编修。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了弘扬文治，扩充政府藏书，乾隆皇帝决定设立四库全书馆，修纂《四库全书》。为此他下旨令全国各省加意采访遗书，进呈备用。有清一代，文字之狱惨烈，乾隆此举，未始没有全国图书大清查的意味，因此各地疑虑重重。为了打消藏书家们的顾虑，乾隆皇帝在谕旨中信誓旦旦，并多次表明即使有点问题，“亦不过下诏访求遗籍”，与藏书之人无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而且，乾隆还向各地藏书家保证：“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并在上谕中特别点了浙江的藏书名楼，“遗籍珍藏，固随地均有；而江浙人文渊藪，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琐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2]范氏天一阁赫然在列。

此时的天一阁，已经悄然走过了二百一十余年的漫长岁月，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当家。圣命难违，范懋柱倾楼奉献了当世罕见的大量旧藏珍本638种。这之中清初人的著作只有7部，其得益颇多，贡献巨大，后来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里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有374种。当年向《四库全书》进献藏书超过500种以上的藏书楼全国仅四家。毫无疑问，在《四库全书》的修纂过程中，天一阁向朝廷献书最多，总体品质也最高，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也就在情理之中。

为奖励范氏进呈之功，乾隆皇帝特颁旨赏给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平定回部得胜图》16幅、《平定两金川战图》12幅，另外还嘉赐其亲笔题诗的珍藏宋魏了翁《周易要义》5卷及唐马总《意林》5卷。他在《周易要义》上题诗曰：“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次年，乾隆再次派杭州织造寅著查明天一阁建筑格式，给出图样。接着，宫廷、官府藏书阁按天一阁式样仿造。

不少宁波藏书家还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余姚藏书家邵晋涵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征进四库全书馆，参与编纂《四库全书》。钱大昕曾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

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邵晋涵)。”^[32]阮元也说:“(邵晋涵)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33]。《南江文钞》卷三载有邵晋涵为57种书籍撰写的提要,除其中《赵端肃奏议》21种没有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外,其余的36种都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在这36种中,其中经部4种,史部27种,子部1种,集部4种。正史是史部书中最重要的书籍,而正史中的大部分正史提要由邵晋涵起草,仅《三国志》和《旧五代史》不是他起草。上述史料已充分表明,作为浙东藏书家邵晋涵在四库全书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如此,清代宁波藏书家对一些重要史书的编纂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比如,万斯同带10万卷书去北京编纂《明史》,《明史稿》500卷皆由他定。其他的宁波藏书家,诸如黄百家、万贞一等也以布衣不食朝廷俸禄而参加修史工作。邵晋涵被征四库全书馆后,发现《永乐大典》收录有《旧五代史》的文字,于是逐一辑出,加以编次,使淹没数百年之久的《旧五代史》晦而复彰,列为正史之一。

此外,在地方志的编纂方面,宁波藏书家的贡献是不小的。邵晋涵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参与《杭州府志》的编纂,第二年又修《余姚县志》;徐时栋、董沛编纂光绪《鄞县志》也不惜辛劳,全力以赴。

3. 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

在清代的藏书家中,以浙东学术而闻名于世的人数众多,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明显地得益于私家藏书。

从事学术研究,谁都离不开书,一代学派的形成也与书紧密关联。宁波在清代之所以人才辈出,涌现出在全国有重量级的杰出人才,诸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等,形成清代富有影响的浙东学派,藏书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浙东学派的开山祖黄宗羲,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清初最著名的三大学者之一,与顾炎武、王夫之并列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代巨匠。但黄宗羲之所以成为我国清代的著名学者也离不开藏书,他不但阅读自己藏书楼续钞堂中的书,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氏。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登天一阁看书。黄宗羲在他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曾经说:“癸导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34]

正是由于黄宗羲利用宁波的天一阁等藏书楼,从而使他视野开阔,成为清代的大学问家。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史要论》的增订本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活老师说,图书馆可算是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前述马克思著《资本论》和他在大英帝国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分不开的;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藏书的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

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35]这里明确指出黄宗羲之所以成为大学问家,与藏书有密切的关系。天一阁等藏书楼为黄宗羲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他成为清初的著名学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蔡尚思所说的“清初黄宗羲等人”,不单单是指黄宗羲一个人,应该是指整个浙东学派,包括黄宗羲及其高足万斯大、万斯同,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和后来的邵廷采、邵晋涵等人。上述这些大家,研究成就卓著,这和宁波的藏书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而他们本身就是藏书家,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都是这样。

参考文献:

- [1][17]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A].鮑琦亭集(卷十一)[C].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4.
- [2][3][4][34]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M].
- [5]南雷文定(三集附录)[C].
- [6]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A].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七)[C].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64.
- [7][10]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57.192.
- [8]全祖望.双韭山房藏书记[A].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七)[C].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64.
- [11][12]转引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73.92.
- [13]金步瀛,杨立诚.中国藏书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13.
- [14]葛祥熊.烟屿楼文集序[A].
- [15]烟屿楼文集(卷三)[C].
- [16]正谊堂文集(卷二十四)[C](附)知州衔封朝议大夫江西建昌知县董府君行状[A].
- [18][35]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48-215、203.
- [19][25][26][27][28][29][30]虞浩旭.智者之香[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50-51、5、56、73、73、78、60
- [20][22]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A].鮑亭集内编(卷十一)[C].全祖望集汇校集注[C]216.
- [23]清史稿(卷四八四)[C].万斯同传[A].
- [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31]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A].纂修四库全书档案[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0.
- [32]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三)[C].日讲起居注官翰林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A].
- [33]南江札记(卷首)[C].南江邵氏遗书序[A].
- [34]梁启超.清代学者在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行政学院)

新时期公私藏书的使命与和谐发展

鲍国强

【摘要】 经过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观念和经济建设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很大发展,法制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当中,公私藏书将进一步发展,长期共存,其共同使命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推动社会文明建设。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全国持续加强法制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上,在采选、编目、典藏、保护和利用诸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共同和谐发展。全文分:收藏长期共存、保护传承文明、采选取长补短、编目信息交流、典藏尊重个性、真诚投入保护、分工合作利用七个部分。

【关键词】 藏书;文化遗产;使命;和谐发展

2006年5月至6月,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一组明清私人藏书楼现状的照片,是由一位私人藏书者无偿提供的。一项纯粹展示公藏古籍珍品、宣传公藏古籍保护的公益活动,融入了一位私人藏书者的无私奉献,不禁使人想到了“公私藏书的使命与和谐发展”的命题。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公私藏书之间的交流还存在着许多欠和谐的音符,缺乏应有的直接的交流、互补和合作。

经过近30年来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观念和经济建设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很大发展,法制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当中,我们有必要认真探索“公私藏书的使命与和谐发展”这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并勇于实践,使公藏事业锦上添花,蒸蒸日上,使私人藏书事业稳步开拓,理直气壮,进而开创公私藏书事业优势互补、共存共荣、携手合作、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共同保护、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一、收藏长期共存

我国古代,公藏以各级官府、书院、官书局、寺观等为代表,私藏有藩府、民间藏书楼及书坊等。在现今社会,各类图书馆是公藏的主体,私藏则往往是指收藏有一定规模的藏书者。但本文所说的私藏还包括只收藏三五本古籍的藏书者,如只收藏一部本家家谱的个人。至于现代公司企业等单位藏书可按其所有权性质区分为公藏(国有和集体所有)和私藏(私营)。

自先秦以来,历代的公私藏书随着朝代的更替和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发展,长期共存。总体规律是“乱世散亡,盛世收藏”。其详情,众多典籍记载凿凿,毋庸赘述。

但历代公藏和私藏之间的互相影响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藏书来源方面,公藏与私藏各自从对方获得补充或支持。如清乾隆因修《四库全书》征集各地藏书,范氏天一阁进呈641种,是全国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为充实四库典籍文化体系贡献良多。^[1]1949年建国后,以双鉴楼傅增湘、天津周叔弢、上海张元济和文学家郑振铎为代表的藏书家慷慨地将私藏珍稀善本捐赠给国家,化私为公,服务社会,留名青史。^[2]旧时藏书家则通过获得朝廷赐书或借抄官府秘阁藏书充实自家藏书。在藏书制度和技术等方面,历代藏书家从官府藏书中学习、借鉴藏书分类、鉴定等方法,又对官府藏书产生影响,如清乾隆四库七阁建筑,均以范氏天一阁为样板仿造,即是明证。^[3]

在当今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时期,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公藏继续稳步完善,藏书量持续上升;私藏则是遍地开花,大家不乏其人,所藏珍善之本也各具规模。目前,以古旧书交易为主体的孔夫子网非常活跃,聚集了近两万多名古旧书爱好者。^[4]这一点从各地历年古籍善本拍卖会上也可看出端倪。笔者初步估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者,大约十分之一是公藏代表,十分之二是古籍买卖经营者(含个体书商和拍卖公司等),而私人收藏者则占十分之七,是竞买队伍的主体。当然,竞买者中有些是具有经营者和收藏者的双重身份,还有个别的是与其他拍卖公司有关的拍卖行情观察者。当前,古籍善本拍卖行情的持续火爆与各地收藏者队伍不断扩大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盛世收藏”的最好例证。

这些拍卖会拍品的提供者都是私人所有者。拍卖会是私藏向公藏转移的主要渠道之一。笔者还遇上一个很少见的例子:2005年初,笔者见到一幅已经从拍卖会购人,民国印制的《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图》,经多方求证,原来就是国家图书馆舆图库现藏一本地图册所附的彩印插图,民国年间已经散出。^[5]这幅地图当时如何出馆暂且不论,事隔半个多世纪通过拍卖会竞买又成完璧亦不幸中的大幸。天一阁在建国以后访归的散出旧藏也达185种,其中一半由天一阁工作人员购回,另一半由地方藏书家馈赠。^[6]假设上述地图和阁书

散出后毁损,没有被保存下来,我们就是出再高的价钱也无法将它们访归了。

由上可见,我国的公私藏书不但能够长期共存下去,而且还将不断地互相作用,共同发展。

二、保护传承文明

古籍特藏文献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公藏和私藏都包含了数以百万、千万册件计的古籍特藏文献。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说公藏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承者,不会有异议;说私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就不见得都能认同。

据了解,北京一藏书家有数百种明刻本,天津一藏书家有不少可印证我国古代印刷史的罕见善本,西安一藏书家有数十种宋元孤本。全国范围内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珍稀善本在公藏图书馆的古籍库里是找不到的。

范氏天一阁所藏明抄本有据可查的有1147种,约占其藏书总数的五分之一,多为该著作世间仅传或最古之本。后散出708种(不含已访归的42种),约占原藏明抄本十分之六强。其中有不少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西北大学图书馆等公藏单位的善本书库里,并成为该著作的祖本。^[7]此例说明私藏散出最终成为各公藏图书馆的镇库之宝。

范氏天一阁原藏明弘治十三年(1500)刻本《黄州府志》十卷。这是现存最早的黄州府志。现天一阁只存其卷一至五,卷六至十藏上海图书馆。1965年两处藏书合成完璧影印出版。^[8]此例说明尽管后来一书分藏两地,假设范氏天一阁当时不收此书,1965年的影印本就无从谈起,我们何以嘉惠学界,传承典籍?

笔者在前文提到私藏还包括只收藏三五本古籍的藏书者,这是有所指的。第一,这些藏家分布广泛,人数众多,集滴水而成大海,公藏不能小看他们。第二,尽管他们各自手上只有三五本古籍,但极有可能是海内孤本。以家谱为例:国外以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收藏为多,国内则是上海图书馆收藏首屈一指。然众所周知,家谱印数少,轻易不散出,故公藏家谱仅是存世总量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家谱收存在相关族人手中,且孤本居多。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宗亲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就必须把私藏的家谱包括进去。近年,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就注意了这个问题。^[9]

上海图书馆想搜集民间家谱信息并不难,部分人士还会踊跃参加,但要搜集齐全却不容易了。因为相对于公藏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现阶段,私藏整体上还属于隐性收藏和传承,其实际信息外界难以全面把握。据比较保守的估算,我国私人收藏的古文献约有

四五百万册件之巨,其间不乏珍善孤本。我们的政府机构和图书馆一定要把私人藏书事业看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承者,持续加强法制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推动公私藏书的和谐发展,使私藏也演变为显性收藏。只有在认识到公私藏书的共同使命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两者才能真正进入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会发现国家的强盛与衰落、发达与落后固然与它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策略有关,但也不能不注意到与它所拥有的典籍文献、掌握的资料信息、积累的精神财富以及对这些典籍的态度、策略,还有它的积累方式、速度和取向有关。即国力、国运直接影响公私藏书,和谐发展的公私藏书也同样会对国力、国运乃至社会文明产生很大的推进作用。^[10]

三、采取取长补短

在现阶段的藏书采选环节,与公藏比较,私藏总体上是处于弱势状态。但这也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究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私藏的补充触角比公藏广泛和深入得多。他们或承自祖上,或与民间息息相关,或因工作研究需要极力搜采,往往能够形成自己的特点,也能够根据有效信息及时选购入藏。二是有不少时候,私藏的敬业精神要优于公藏,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当公藏业务工作还处于“大锅饭”或“多干一出错就挨批,不干不出错不挨罚”状态的时候,公藏就会出现不买或少买的现象。三是由于各自的采选经费运作机制不同。如果公藏的购书经费不足,就会不买或少买。若在拍卖会上竞买古籍,图书馆为避免操作差错和价格虚高往往内部先定一个最高限价,规定成交价不能逾越限额。这也就限制了现场工作人员的临场应变能力,无法临时按需提高限价。私藏如果认为某书有价值,在临场应变能力方面就灵活得多。当公藏出现上述问题时,则是私藏大显身手、发挥作用的好时机。

记得2002年11月嘉德公司秋季拍卖会有一种善本古籍《中庸章句或问》,宋朱熹撰,元延祐元年福建麻沙万卷堂刻本,2册,黄麻纸。福建坊刻最著名的是余氏万卷堂,其最兴盛时期是南宋,此前未见有元代刻本,此书可谓填补空白的孤本。另,全书刻印精湛,字取颜体,卷首朱熹序后牌记有“延祐甲寅良月麻沙万卷堂刊”字样,时间、地点和刻书者记载齐全,甚为可贵。当时,笔者是代表国家图书馆到现场的竞买者之一。后因落槌价高于馆内原定最高限价,国家图书馆竞买失利,此书被一位私人藏书者拥有。因为是图书馆竞买的当事人,当时的心情很是凝重。事后一想,公藏和私藏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心里也就释然。当然其前提最好是公藏和私藏处于和谐发展状态。

交换多余复本应该成为公藏和私藏的重要采选途径。古籍的总数是有限的,不可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至多是某一阶段市面上涌现的数量在某一幅度内增减,所以有些古籍可以用钱购买,有些古籍拿钱很难买到。至于图书馆已经入藏的古籍,如果是属于多余的复本,以此去交换缺藏的古籍是可能的,若想卖钱则是绝对不允许的。笔者在1989年提出过国家图书馆多余复本的交换方案,获得了批准,并实际操作过用馆藏1958年文学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一部多余复本同北京市中国书店交换本馆缺藏古籍的项目。当时提出的多余复本交换方案是局限在图书馆等公有单位之间。其原则为“以我所余,换我所需;各自标价,等价交换”。对双方来说,交换多余复本可以:人藏用钱买不来的缺藏古籍;让死书重新发挥作用;节约藏书空间。实际上,多余复本问题并非图书馆独有,私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与“图书馆若只有一部藏本肯定不会用于交换”这个特点不同的是,私藏只要愿意也可以用只有一部的藏本去交换更需要的藏本。这样私藏可供交换的古籍品种数量可能更多一些,交换选择的余地也就更大一些。需要注意的是交换品的标价问题。对于私藏来说,其标价由个人自主决定;在图书馆方面问题就复杂一些,为保证国有资产安全,除了要履行一系列审批手续以外,为免除暗箱操作的嫌疑,交换品的标价应由社会评估机构确定。但是,交换多余复本确实是公藏和私藏之间取长补短的好办法。政府和图书馆机构应该在公藏之间及公藏和私藏之间研究和建设这样的交换平台,使公藏和私藏之间的古籍所有权转移由现在只是从私藏到公藏的单一走向发展为双向交流通道,使古籍的流通渠道在现在的竞买、捐赠、选购、拨交等基础上,再增加一条“交换”的渠道。这种“交换”的渠道将会极大地改善公藏和私藏之间的关系。

四、编目信息交流

藏书需要整理。整理的首要手段是编目,公藏私藏概莫能外。目前,公藏目录还在继续完善。私藏方面,估计不少个人手中是有自己藏书目录的,但稀见公布,藏书信息交流严重堵塞。在古代,还可时常见到刊布的私藏目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此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有编目能力不足的问题,有藏书环境不宽松的问题等。

现在,新闻出版总署正在主持进行《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项目。所谓《中国古籍总目》,如果要反映我国古籍全貌,其理想的收录范围应包括:公藏现存、私藏现存、国外现存、历代亡佚四个部分。目前《中国古籍总目》的收录范围仅包括公藏现存和国外现存的主要部分。如果说编辑《历代亡佚古籍总目》比较费工夫的话,那么,只要政策完善,环境改善,编辑《中国私藏古籍总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应该逐步为编辑《中国私藏古籍总目》创造条件。现阶段可以通过中国收藏家协会在有关刊物上逐渐公布私藏书刊信息,进

一步发展到编辑出版私家藏书目录,最后把私藏书目信息汇集到《中国古籍总目》。不包括私藏书目信息的《中国古籍总目》始终是一部瘸腿的古籍总目,无法据此了解我们古籍的全部家底,也无法达到全国古籍书目信息共享的目的。

私藏目录匮乏的原因之一是编目能力不足。编目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古籍版本鉴定知识欠缺。古籍版本鉴定知识不足的问题不但存在于私藏,图书馆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图书馆一般还有业务培训机制,在私藏当中除了自学、求学,就只能是自生自灭了。笔者在担任《文明的守望》展览的讲解工作中就遇到不止一个私人藏书者来咨询古籍版本问题,说明有不少私人藏书者需要充实古籍版本知识。当然私人藏书者中也有不少版本鉴定高手。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和支持各地多多地开设古籍版本知识讲座。这些讲座可以是图书馆或收藏家协会主办,可以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者合办,也可以由私人藏书者承办,以便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已经出版的古籍版本书籍,各类讲座加上古籍原件的实地观摩,当可有效地提高私人藏书者的古籍版本鉴定水平,既能强化私人藏书者的自身编目能力,也可使其避免选购时受骗上当。如果把应该珍爱的善本当做普通本卖了出去,或是把造假的当作真本买了进来,都会使私人藏书者蒙受损失。私人藏书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我们的政府机构理应尽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损失就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此项保护工作除打假和惩治犯罪活动以外,还应包括提高私人藏书者的古籍版本鉴定能力。图书馆在此中要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借此改善公藏和私藏的关系。

国家图书馆承办的《文明的守望》展览展出了200多种汉唐以来罕见的古籍善本原件。许多图书馆、高等院校、古籍书店、拍卖公司和个人藏书者把展览当做古籍版本教学绝好的实习课堂。据说有个古籍收藏者前后一共来看了8次展览。应该说这个展览也为向全国的古籍收藏个人普及版本知识作出了贡献。

五、典藏尊重个性

目前,在全国图书馆范围内私人捐赠藏书的数量不在少数,甚至不少馆藏珍品就是私人捐赠之物,有些私人捐赠之书还动辄以数万册或十几万册计算。在国家图书馆,前者如傅增湘双鉴楼宋刻本《资治通鉴》和宋内府抄本《洪范政鉴》,后者有史学家陈垣赠书和文学家郑振铎西谛藏书。这些捐赠书除了古籍本身以外,作为一个整体携带有丰富的原藏书家个人历史和学术信息。如陈垣赠书中有不少写有先生的批注文字,西谛藏书则有许多写有先生的藏书题跋。这些都是一座座富有研究价值的文献宝库。我们在典藏这些捐赠藏书时应尽量采取集中保存的方式,以免割裂或散失其中蕴涵的整体信息。如香港大学图书馆

分馆——冯平山图书馆就是由冯平山先生捐赠藏书建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如能够按捐赠者为单位集中保存捐赠藏书也意味着对捐赠者个性的高度尊重，使捐赠者作为一个个体能够在世上长期显性存在，符合捐赠者个人价值追求的需求。当然这样做会使图书馆提高管理成本，但这正是公藏对原私藏捐赠者表示诚意的关键，而且能够继续吸引其他私藏继续捐赠给图书馆，也与向社会公众完整提供捐赠藏书信息的要求相吻合。

几十年来，内地有许多图书馆把捐赠之书按本馆原有的藏书体系打散了。其原因不外乎当时不甚重视个人价值，不愿更多地增加管理成本。实际上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这样将无法向社会公众完整提供捐赠者藏书信息，也会削弱藏书家的捐赠意愿。笔者认为，只要有可能应尽量将已经打散的捐赠藏书改为集中保存，尽可能地恢复捐赠前藏书的排架原貌。

对于捐赠藏书的集中保存也应该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接受捐赠藏书的图书馆可以根据图书的珍贵程度和整体数量分别按库内集中保存、开辟专室或建立专馆等形式进行保存，不能一概而论。这样，有藏书和经济实力者不但会很愿意地捐赠私藏，而且还会继续出资维护有关专室或专馆的完好状态。

相对于图书馆有专门的书库来说，私藏安全的脆弱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大概也是许多私藏目前不愿公开收藏信息的原因之一。私藏安全确实是当今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公藏和私藏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寄存私人藏书。这个形式早已有之，只不过已经有几十年很少采纳罢了。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一册民国铅印本《国立北平图书馆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四卷。^[1]当然，我们不能存着存着就无端把寄存书据为图书馆所有。私藏需要寄存到图书馆，双方必须履行一整套法律手续，公证和保险部门都要介入。藏书如何使用？出现风险怎么办？需要修复怎么办？书主及家人后人要看这部分书怎么办？日后要变更所有权怎么办？最后书主要拿回去怎么办？一切事宜都要写入《寄存合同》，以免事后产生纠纷官司。其中的经费问题也十分关键：采用何种寄存方式会决定寄存者交纳代管费、图书馆给付使用费和双方持平不付不交。一般情况下，藏书与钱币一样，钱存银行（它去投资放贷）便有利息，书存图书馆（它去提供无偿服务或产生经济效益）书主理应得到一定的回报。当然，这种寄存方式的实施是需要公藏图书馆付出努力的，因为它自身的库房等条件也不宽余。

私藏的最终归宿，除本家继续收藏、出售或散亡外，在图书馆寄存或建立专藏应该是两种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两种形式符合藏书者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而这些形式的实现主要需要政府部门和公藏机构的进一步努力，也是社会及公私藏书进一步和谐化的组成部分。

六、真诚投入保护

无论何时何地,私藏的保护需求总是存在的。古籍的保护可以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种。原生性保护就是修复已经受到损害的古籍。现在全国古籍修复的形势十分严峻。公藏古文献约3000万册件,急需修复的就有1000万册件以上。而目前全国公藏修复人员不足100名。公藏修复尚且如此,那私藏修复更是难以为继了。可是,公藏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私藏也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难道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姓“私”就置之度外吗?我们国家财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不是也在拨资金对街头无业者进行人道救助吗?我们应该呼吁政府部门在加大对公藏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私藏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笔者希望现在正在实施的“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能够有计划、有标准、有步骤地包含私藏善本古籍,也希望公藏图书馆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挤出力量帮助私藏进行一定范围的原生性保护。

公藏图书馆可用代培修复人员和代修古籍的方式帮助私藏进行原生性保护,并按有关标准收取合理的费用。如果今天的“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能够覆盖公藏和私藏,我们的子孙必将感谢我们当今对全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真诚投入。

再生性保护是指将善本古籍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嘉惠学林,从而减少原本使用次数,达到保护原本的目的。其中使原来深藏高阁的珍稀善本变得容易被拿在手中进行阅读研究,是再生性保护的主要目的。善本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代表项目是正在编辑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此丛书分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和少数民族编五编,其底本全都是公藏善本。《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有必要包括私藏善本吗?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私藏珍稀善本的数量也足以出第六编:私人藏书编。关键是政府部门和公藏图书馆的如何决策,能否吸引私藏愿意拿出珍稀善本来供国家影印。当然,若由出版社影印出版《私藏善本古籍丛刊》,其意义和作用也是一样的。如果此举能够实现,除可能要对底本来源实行保密外,如何对藏家的慷慨之举进行补偿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珍稀善本一旦影印,它的珍稀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目前私藏珍稀善本很少影印出版的主要原因。但私藏珍稀善本一旦影印出版确实能够对学界的科学研究产生极大的作用,作为政府部门是应该给予足够的补偿,否则受损失的是整个学术界,整个中华民族。

《中华再造善本》实际上是纸本的再生。再生性保护还应包括数字化再生。私藏珍稀善本如果能够实现数字化,并进入网络共享,那就是化身亿万,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了。这种保护第一有赖于全国文献数字化计划工程的实施,更是有待于私人藏家的慧眼相识。其中有关网站的问题在下一部分论述。

七、分工合作利用

私藏的最终归宿之一是本家继续收藏。本家的继续收藏方式,除个别的秘不示人,只要条件许可,许多有识之士往往选择开设私人图书馆的形式,以达到既保证私人性质又回报社会的目的,如古越藏书楼就是浙江绍兴人徐树兰在徐氏家藏基础上新购图书创办于1900年的私人图书馆。^[12]但开设和维持私人图书馆需要比较大的资金投入,政府部门应该对公益性的私人图书馆予以切实的支持和保护,如在税收方面实行全免或减免的政策。公藏图书馆则应把私人图书馆看成是自己服务社会公众的同盟军。它可以有效地减轻公藏图书馆的服务压力,可以填补公藏图书馆服务领域的空缺,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用户的需要。所以,公藏图书馆应该在管理、服务等方面向私人图书馆提供无私的扶持和帮助。私人图书馆的倒闭,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社会管理的失败,使公藏图书馆失去了左膀右臂。

在私人网站提供珍稀善本数字化资源,是现阶段私藏回报社会较佳形式。首先,这种形式的用户数量能够达到最大化,这是其他服务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其次,如果网站经营有方,不但可以收回投资,还可赢利,这是私藏珍稀善本数字化网站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这种网站同样是公藏数字图书馆的有力助手,政府部门应该对公益性的私藏珍稀善本数字化网站给予切实的培植和保护。

政府机关的服务职责要求明确公与私的界限,要改变过去那种公私不分的混乱状态。有人指出,政府行为只能发生在公共领域,而不能发生在私人领域,其实是指要扭转“随意侵占私有财产”做法。事实上,公与私,并不都是矛盾的、对立的,如果政府行为旨在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正当权益,肯定会受到欢迎。公私藏书关系达到和谐状态,就能有利于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发展的目标。2006年6月9日,国家图书馆研究员丁瑜先生在文化遗产保护座谈会上说:“保护善本,保护的不仅是遗产,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个观念也适用于保护私人藏书。宋代大儒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古文献方面,如果说公藏是“渠”,那私藏就是“源头”;要使渠中清如许,就要让源头活起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在建设法制社会的同时,推动公私藏书的和谐发展,共同保护、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

注释:

[1] 骆兆平编著.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C].北京:中华书局,1996.181—263.

[2] 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43—145.

- [3]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29—30页.
- [4]鲍晓倩撰.关于藏书现状的调查与思考[N].中华读书报,2006-02-20.
- [5]鲍国强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图》版本解析[J].地图,2006,(3):108—111.
- [6]骆兆平编著.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访归书目[C].北京:中华书局,1996.153—178.
- [7]骆兆平编著.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C].北京:中华书局,1996.267—337.
- [8]骆兆平编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31—132.
- [9]王鹤鸣主编.解冻家谱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5—257.
- [10]梁衡(演讲).读高层次的书才能改变人生[N].北京青年报,2006-07-05.
- [11]朱福荣等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四卷)[C].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二十三年(1934).
- [12]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630—1631.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康熙时期有关浙江天主教文献考释

龚纓晏

【摘要】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史。本文通过对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两份中文文献的考释,考证我国清康熙时期对外交流的一些史实。

【关键词】 康熙;传教士;梵蒂冈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皇帝以思想开明而著称。他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善待欧洲来华传教士,对天主教采取包容的态度。对此,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许多研究。但有些历史事实,则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中,尚不为人所知,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

在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中,有一册编号为Borg. Cinese 376的文献,里面收录的是中文、拉丁文和法文手稿,内容十分芜杂。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来华耶稣会教士傅圣泽(Jean-Fran cois Foucquet, 1665—1471)所写的西文笔记,还有几份中文手抄件,例如“鸡蛋饼”的做法等。伯希和曾对这册文献作过简单的介绍,^[1]而《梵蒂冈图书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则称其为“1701—1720年传教士文件集”,并以中文注明是“旧写本”。^[2]在Borg. Cinese 376中,有两份中文文献涉及康熙时期宁波天主教史,在此特作探讨。

为了便于讨论,先将这两份文献抄录如下。

第一份抄件:

礼部为具明来历等事。浙江严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梁弘任等抱呈周元具呈,为具明来历,叩咨浙抚事切。弘任本系西洋福朗祭亚国人,伏念圣明德化远播,海外向风,故不远九万余里,弃家航海,来至中国。又奉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上谕,内开: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制造军器,随征阿罗素,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抄呈电致。弘任等向在浙江严州府价买郡民俞万钰房屋,供奉天主居住;詎料府县

不知来历,不容居住,要追房价,情极具控。浙抚移咨宪案转行钦天监,查讯来历。其柰治理历法闵明我云:不认得。又经覆咨浙抚在案在。弘任虽系海外,实有来历。钦天监闵明我与弘任等不同国,若不认识,其皇城内天主堂西洋进士张诚等与弘任同国,则皆认识。且皇城内外俱有天主堂,岂严州府独不容一供奉天主之地乎?煌煌上谕,墨迹未干。号叩部堂大老爷,讯明皇城天主堂,查问来历,并将三十一年二月上谕,咨明浙抚,存留远人所盖天主堂,普被皇上鸿恩,海外戴德,奕世无疆。上呈亟原呈全写。等因前来。查此案,先准浙抚咨,查西洋学士梁弘任是否西洋人,果否听其在严州买屋,往来行寓。等因到部。已经咨覆在案。今据梁弘任等具呈到部。随传问皇城内天主堂西洋进士张诚等:梁弘任果否西洋人,你认得他么?回称:梁弘任委系诚等平素认识,并无来历不明之处,向在浙江严州府往来居住等语。又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本部等衙门题为钦奉上谕事,内开: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伊阿奉呈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该本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行文直隶各省在案,相应再行咨明该抚,照后案奉旨内事理遵行可也。

抄件中“仰慕圣化”之“墓”,当为“慕”字之误。文中所说的该抄件中所说的闵明我,又称小闵明我,或假闵明我,^[1]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原名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字德先。1638年出生,1666年启程赴华。1669年,西班牙人、多明我会神父闵明我(Dominique Navarrete,又称老闵明我或真闵明我)在广州被监禁。小闵明我不仅协助真闵明我成功出逃,而且还冒名顶替。1671年,闵明我到北京任职,颇获康熙赏识。1690年返回西欧,1694年重新回到北京。1712年在北京去世。^[4]张诚(Jean Fran cois Gerbillon, 1654—1707)也是法国传教士。^[5]文中的“阿罗素”,现代译作“俄罗斯”,即指张诚等欧洲传教士协助清政府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文中多次引述的“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上谕”,指的是康熙该年(1692)所批准的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议奏,在欧洲被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6]

第二份抄件:

礼部为报明事。准浙江巡抚赵咨称宁波府鄞县地方有西洋人习圣学、郭中传买地盖造天主堂案。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钦奉上谕，案内只有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并无议及创造之处。今习圣学在鄞创造，是否可行，应照西洋人梁弘任在严州盖造之例，请部示。等因到部。查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内，前任浙江巡抚张敏咨称：西天梁弘任在严州府地方买房屋，供奉天主，往来居住。梁弘任是否西洋人，乞部查裁夺，赐覆到日遵行。等因前来本部。随传问皇城內西洋进士张诚等：梁弘任果否西洋人、你认得他么？回称：西洋人梁弘任委系诚等平素认识，并无来历不明之处，向在浙江严州府往来居住等语。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本部等衙门题。为钦奉上谕事。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伊阿奉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该本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遵行文在案。应将西洋人习圣学、郭中传既称在鄞县买地居住，相应准其存留居住，移咨该抚可也。须至咨者。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有两位同时代的梁弘仁，而且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员。一个原名为Artus de Lionne，另一个名为de La Balluère。^[7]上述两份抄件中所说的梁弘任，即梁弘仁，就是Artus de Lionne，因为第一份抄件上有法文小字注曰：“这是礼部关于de Lionne在严州购买教堂的抄件”。抄件中的“西洋福朗祭亚国”，即现在所译法国。

该梁弘仁(Artus de Lionne)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格·德·里昂纳(Hugues de Lionne, 1611—1671)是个职业外交官，从1663年起，一直任法国外交大臣，^[8]参与了法国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梁弘任是格·德·里昂纳的第三个儿子，1655年出生于罗马。他本来打算从政，并获得了骑士的头衔，但后来改变初衷，致力于海外传教事业，到过暹罗、印度。从1689年开始，他到中国传教，在广东、福建等地活动过。1696年，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罗萨里主教、四川宗座代牧。此人坚决反对耶稣会士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反对中国教徒参加尊孔祭祖活动。1702年初，他乘船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汇报中国“礼仪之争”，同年年底抵达欧洲。与他一起到达欧洲的还有中国教徒黄嘉略。^[9]梁弘仁回到欧洲后，积极参加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艾蒙(Aymon)等人就是根据梁弘仁所

提供的材料,指责耶稣会严重歪曲了儒家学说。^[10]梁弘仁本想再次赴华,但由于健康原因而无法成行,并于1713年在巴黎去世。

第一份抄件,没有时间,相关背景也不清楚。幸好第二份抄件中有这样的话:“查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内,前任浙江巡抚张敏咨称:西天梁弘任在严州府地方买房屋,供奉天主往来居住。”由此可知,此事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即公元1699年2月。将此事上奏的是浙江巡抚张敏。张敏,《雍正浙江通志》作“张勳”,并有如下记载:“张勳,字敬止,奉天辽阳人。正黄旗。荫生。康熙三十七年任。”^[11]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康熙三十九年十月。^[12]不过,也有把“张勳”写作“张敏”的,例如,康熙三十八年,康熙造访杭州云栖寺,并题字作诗,“巡抚张敏恭摹勒石,建御书亭”。^[13]

根据第一份抄件,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梁弘仁到浙江严州府后,购买了当地居民俞万钰的房屋,用作天主堂,遭到当地官员的反对;梁弘仁依据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提出抗议,官司打到浙江巡抚张敏那儿;1699年2月,张敏将此事上奏朝廷;礼部官员向在钦天监任职的闵明我询问梁弘仁的来历,闵明我说他与梁弘仁来自不同的国家,不认识梁弘仁;后来又询问法国传教士张诚,张诚证明了梁弘仁“并无来历不明之处”;最后,礼部据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允许梁弘仁在严州购买房屋建立教堂。

遗憾的是,在其他中文文献中,还找不到关于梁弘仁在严州传教的材料。但据西文资料,他在严州所建的教堂一度名扬欧洲。出于各自的利益,当时耶稣会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在中国传教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冲突,许多人指控耶稣会排斥、打击在中国的其他修会。在巴黎,出现了这样一种谣言,说耶稣会已经推倒了梁弘仁在严州所建的教堂。^[14]这样,梁弘仁在严州所建的教堂,随着此类传说而名扬欧洲。

第二份抄件中所说的“习圣学”,又名“利圣学”,字述古,原名Charles de Broissia,法国人,贵族后裔,1660年出生,1681年加入耶稣会,1698年,随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搭乘昂菲特利特(L'Amphitrite)号抵中国,^[15]先在广州学习中国语文,然后与孟正气(Jean Domenge, 1666—1735)一起到江西传教,^[16]1701年到宁波。后山西主教张安当召他去,他沿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时,发病去世,时为1704年9月。灵柩运到北京,被埋葬在北京栅栏墓地。^[17]

该抄件中的郭中传也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字怀义,原名Jean-Alexis de Gollet, 1666年出生于圣马洛,1670年抵达中国,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活动过,1741年在澳门去世。^[18]他也是索隐派的重要人物。^[19]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康熙南巡到杭州时,还召见了郭中传等欧洲传教士。^[20]

第二份抄件没有时间,但在两位来华传教士的书信中,却保留了相关内容,而且还比

较详细。它们是傅圣泽于1702年11月26日在南昌写给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福尔斯(de la Force)的信,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于1704年1月15日在伦敦写给法国国王忏悔师拉雪兹(La Chaise)神父的信。^[21]这两封信为我们勾勒出了整个事件的大致过程:

利圣学在江西九江成功地购得房子建起教堂后,于1701年7月与郭中传一起来到宁波传教。由于“他们在宫廷方面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当地的官员对他们非常友好,并允许他们购买房子用作传教。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现成的房子,于是就用较低的价钱买下了一块地皮,随即开始建造教堂等房子。房子还没有造好,他们“突然失去了其最靠得住的三位官员。第一位官员因失宠被革职;第二位官员因母亲去世,被迫回家乡守丧,此乃中国的习俗;第三位则被皇帝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新来的官员询问了他们的来历,还禁止他们建造房屋,并将此事报告给巡抚。“这位巡抚是一位贤人,也就是说是一位一字不差地坚持法律条文,并要人们严格遵守的严肃的官员。”利圣学他们以礼部刚刚批准传教士们在严州建立教堂为依据,要求在宁波也建立教堂,而这位巡抚则反驳说:“礼部已批准了严州的教堂,但是这一批准并未涉及宁波。因此,我要就你们建造教堂之事请示礼部,并把我已获得的有关材料寄送给礼部。”最后,通过张诚等人在朝廷中的活动,礼部答复浙江巡抚,可以允许传教士在宁波建造教堂,“礼部下达此文日期是在1702年9月初”。在洪若翰写给拉雪兹神父的信中,还保留了礼部批文的法文译文。但礼部批文的中文原文一直没有找到过。通过对照文件内容,梵蒂冈所藏Borg. Cinese 376中的第五件文献,即礼部批文的抄件,其公布的时间当在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即公元1702年9月初)。

利圣学等人到达宁波时,闽浙总督是郭世隆,此人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开始到四十一年(1702)十月一直担任该职。^[22]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开始,张志栋任浙江巡抚,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张志栋改任江西巡抚,浙江巡抚由赵申乔接任。^[23]这样,傅圣泽和洪若翰在上述通信中所说的那位严守法律的浙江巡抚,无疑是指赵申乔,也就是Borg. Cinese 376第二份抄件中的“巡抚赵”。他是“江南武进人。康熙庚戌进士。四十一年,以浙江布政使升任。”^[24]但他在浙江做巡抚的时间并不长,四十一年(1702)十二月就被调到偏沅做巡抚去了。在此短短的任期内,他“奏筑钱塘江口堤,修葺禹陵及增浙江举人中额”,康熙“并从之”。康熙还曾称赞他“人甚敬慎”,“居官甚洁”。^[25]

在宁波,从康熙三十九年开始,宁波知府由山东人孙兴范担任,到了康熙四十一年,由甘国璧继任。^[26]甘国璧,字东屏,号立轩,来宁波前,曾任陕州知州等职,后做过云南巡抚,深得赵申乔的赏识,也受到过康熙的赞扬。^[27]

洪若翰在信中说,利圣学等人到了宁波后不久,“突然失去了其最靠得住的三位官员”。我们现在无法确定这三个人的身份,只有第三个人有点像张志栋,但他不是“被皇帝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而是调到江西去了。

利圣学等人所建的天主教堂在何处呢?洪若翰等人没有讲清楚。《民国鄞县志》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康熙]五十二年(西历一七一三年),法兰西人郭中传至鄞传教(郭,字怀义,一作高尚德,乾隆五年即西历一七一四年卒于澳门),且在药行街购地建立天主堂。”^[28]短短的几句话,错误却不少。郭中传的字是怀义,这固然没有错,但是,他与高尚德却非同一人。高尚德,又作高嘉乐,葡萄牙人,本名为Carlos de Resende, 1664年出生于里斯本,1696年到达中国,在正定府活动了28年,后又在北京生活了22年,1746年在北京去世。不过,高尚德的中文字号也是“怀义”,所以《民国鄞县通志》的编撰者将他与郭中传混在一起了。^[29]

1705年,罗马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派遣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作为特使,到达中国,传达教皇关于禁止中国教徒敬祖祭孔的决定,结果,引起康熙皇帝的极度不满。他下令,凡不愿遵守中国礼仪的欧洲传教士,驱逐回国;凡想留在中国继续传教的传教士,必须领取印票,并可得到清政府的保护。^[30]这种印票由内务府统一发放,上面填写传教士的姓名、国籍、年龄等。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政府对是否领取印票的传教士作了一次核查,在已经领取印票的名单中,有“西洋佛朗西亚国人郭忠川,年四十三岁,耶稣会士,现住宁波府。”这里的郭中川,当为郭中传之异写。此外,在领票者名单中,还有“西洋博尔都噶尔国人高尚德,年四十二岁,耶稣会士,现住在正定府。”^[31]郭中传与高尚德明明白白是两个人。而且,由此可知,至少在1708年,郭中传还在宁波传教。

由于《民国鄞县通志》关于此事的内容错误不少,所以,我们无法肯定关于郭中传在“药行街购地建立天主堂”的说法是否可信。

倒是徐兆曷在1823年完成的《四明谈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点信息。他说,沿着三法卿街,“自西至东黄南山宅、四友亭、静远轩王氏、天主堂,东至车桥北巷、小江桥界河止,为锡山脉东行尽处。”并详细地说:“泥桥巷口大街,旧有天主堂。明万历年,欧逻巴人以天主教入中国,遇民习教者,多奉祠以祀,此其一也。”^[32]笔者认为,这个泥桥巷口大街边的天主堂,应是利圣学、郭中传所建的教堂。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悠久的海上文化交流史。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这两份中文文献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只有通过发掘珍藏在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中的历史文献,才能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宁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

注释:

[1] 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revised and edited by Takata Tokio, Kyoto, 1995, p. 40.

[2] Yu Dong, *Catalogo delle Opera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i-xvii

sec.),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96, p. 39.

[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C],中华书局,1988.257.

[4]关于闵明我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369—374;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年.293—295.

[5]关于张诚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年.444—453;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264—265.

[6]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11.

[7]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13.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86—187.

[8]关于格·德·里昂纳的生平简介,可见以下两个网址:

<http://www.britannica.com/ebi/article-9048429>, http://www.tocatch.info/fr/Hugues_de_Lionne.htm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87页说梁弘仁“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有误,应是路易十四。

[9]关于梁弘仁的生平,主要依据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8—10.外文的也可参见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S. J. (1665-1741)*,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82.p. 157注29。有些中译本将梁弘仁音译为阿尔图斯·德·里奥纳,例如艾田蒲著《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册第334页。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第305页所说的“罗萨里主教”,以及第307页所说的“德·里昂纳神父”,都是指这位梁弘仁。耶稣会司铎萧静山在其所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也不太清楚梁弘仁的中文名字,他写道:“四川李主教,西名利勇,为法兰西大帝路易第十四宰相之子,出身贵显,自幼弃俗,来远东传教。”(该书收入《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所谓“利勇”,即Lionne之音译。

[10]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商务印书馆,2000.第23、24章.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p.294—296。马勒布郎士据梁弘仁提供的资料而写的“告读者书”有中译本,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三、四期,收入庞景仁著《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3—236页。

[11]雍正浙江通志(第一百二十一卷)[Z].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第2956页。

[12]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0.1561.

[13]李卫.西湖志(第十一卷)[Z].杭州出版社,2004年影印,西湖文献集成(第四册)[C].第879页。此记载又见倪涛.武林石刻记(卷一)[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9.

[14]参见洪若翰1704年于伦敦所写的信件,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第307页。

[15]关于白晋的生平,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434—440.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78—79.

[16]孟正气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505—508.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189—191.

[17]关于利圣学的生平,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503—505.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90—91.在北京栅栏墓地中,有“耶稣会士习公之墓”,上面写道:“耶稣会士习先生,讳圣学,号述古,泰西佛朗济亚国人。”并用拉丁文标明其西文名字Carol de Broissia。参见林华等.历史遗痕: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4—45.前文讲到的苏霖,也埋在这个墓地中。

[18]关于郭中传的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570—571.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273—274.

[19]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M].251.

[20]黄伯禄.正教奉褒[M].127页.

[21]这两封信中的相关内容,可见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C]204、313—316.此外,关于洪若翰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423—434.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235—237.

[22]清史稿(第二百七十五卷)[C].郭世隆传[A].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C].1375.

[23]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C].1561—1563.

[24]雍正浙江通志(第一百二十一卷)[C].2956.

[25]清史列传(第十二卷)[C].清史稿(第二百六十三卷)[C].

[26]雍正宁波府志(第十六卷)[C].影印第617页.中国地方志集成[C].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

[27]甘国璧的传记可见钱仪吉.碑传集(第六十八卷)[C].清史列传(第十五卷)[C].清史稿(第二百五十二卷)[C].

[28]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天主教”[A].中国方志丛书[C].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原书第1361页,影印第869页.

[29]关于高尚德的生平简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C].中华书局,1995.490—491.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C].中华书局,1995.532—533.

[30]陈恒.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Z].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四件.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0.

[32]徐兆昂.四明谈助(下册,卷二十七)[C].宁波出版社,2000.917、926.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

陈东辉

【摘要】 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三年期间多次访书、购书的切身体会,论述了日本与汉学研究相关的各类书店之特色,以及汉学研究的有关情况。

【关键词】 日本汉学;古文献学;海外中文书店;中日文化交流史

从1985年初秋进入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学习至今,我一直与古文献学打交道,乐在其中。古文献学与古代汉语一样,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之学,同时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中国本土之外,日本的中国古文献学^①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多的,其研究的内容几乎涉及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成果极为丰硕,乃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日本学术界的地位也很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川濑一马、神田喜一郎等日本古文献学大师的皇皇巨著令人叹服!

在1999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应聘赴日任教后,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日本学者关于古文献学的论著。虽然教学任务繁重,但我还是抓紧点滴时间拜读了多达十卷的《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等书,大大开阔了视野,深感受益匪浅。异国独居的生活有时虽颇觉孤寂,但此地的书店却着实令人神往。日本的书店以东京神田书店街最为有名,仅古书店就达一百多家,远远超过北京琉璃厂和上海福州路的书店街。这些书店汇集了大量汉学论著,既有近现代出版的旧著,也有刚刚问世的新作;既有日本版的,也有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版的,还有韩国及欧美版的,使我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有时遇上一本向往已久的好书,简直比看到富士山或东京塔还高兴。无奈此类书籍价格一般都十分昂贵,常常只能望书兴叹。但即便随手翻翻、看看目录,也还是挺有收获的,因为其中的许多书我以前从未寓目,或仅知书名而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日本的大学讲学和研究三年,我在学术上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内地学者对日本及欧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的研究成果)关注甚少,与台湾、香港同行交流稍多,但仍远远不够。如兴膳宏、川合康三的《隋书经

籍志详考》^[2]洋洋八十余万言,详尽而严密地考证了《隋书经籍志》及中国目录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价值很高,但中国内地近年出版的占文献学论著中却很少提及。同时,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森立之等的《经籍访古志》、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3]、桂五十郎的《汉籍解题》^[4]、服部宇之吉的《佚存书目》^[5]、长泽规矩也的《书志学序说》^[6]、《图书学略说》^[7]、《图解图书学》^[8]、《图解古书目录法》^[9]、《图解和汉印刷史》^[10]、《图解书志学入门》^[11]、《图书学参考图录》(第1-5辑)^[12]、《汉籍整理法》^[13]、《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14]、川濑一马的《(增补)古活字版の研究》^[15]、《五山版の研究》^[16]、《日本书志学概说》^[17]、《日本书志学之研究》^[18]、《续日本书志学之研究》^[19]、神田喜一郎的《东洋学文献丛说》^[20]、大内白月的《支那典籍史谈》^[21]、内藤湖南的《支那目录学》^[22]、仓石武四郎的《目录学》^[23]、清水茂的《中国目录学》^[24]、植松安的《本邦书志学概要》^[25]、山岸德平的《书志学序说》^[26]、藤井隆的《日本古典书志学总说》^[27]、和田万吉的《日本书志学概说》^[28]和《古活字本研究资料》^[29]、橘井清五郎的《古版书志论考》^[30]、尾崎康的《正史宋元版の研究》^[31]、大庭修的《江戸时代唐船持渡书の研究》^[32]、冈本さえ的《清代禁书の研究》^[33]、矢作胜美的《明朝活字》^[34]、樱井良策的《日本图书文化源流考》^[35]、中根肃治的《日本印书考》^[36]、木宫泰彦的《日本古印刷文化史》^[37]、秃氏佑祥的《东洋印刷史研究》^[38]、川田久长的《活版印刷史》^[39]、中山久四郎的《世界印刷通史》^[40]、庄司浅水的《世界印刷文化史》^[41]和《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42]、井上宗雄等编的《日本古典籍书志学辞典》^[43]、以及《阿部隆一遗稿集》^[44]、《书志学论集——神田博士还历记念》^[45]、《图书学论集——长泽先生古稀记念》^[46]、《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47]、《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古活字版图录》^[48]、《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49]、《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50]等,均有助于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但在中国内地一般很难见到。

又如森本竹城的《清朝儒学史研究》^[51]、近藤光男的《清朝考证学の研究》^[52]、滨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据学思想史の研究》^[53]、木下铁矢的《“清朝考证学”とその时代——清代の思想》^[54]、大谷敏夫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55]、胡楚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56]和《清代学术史研究续编》^[57]等日本、中国台湾学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专著,以及中国台湾出版的第1至5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清代学术研究通讯》(第1,2期)等,我在日本时均已问世多年,但在中国内地极难找到,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地清代学术史研究者的视野。

笔者对清代大学者阮元之学术成就研究有年,已出版专著《阮元与小学》^[58],并准备继续撰写有关阮元学术的论著,对相关文献资料尽力做到竭泽而渔,有时也曾自信几乎没有漏网的了。到日本后,有幸拜读到在香港执教的魏白蒂教授发表的论文——《〈四库全书〉纂修外一章:阮元(1764—1849)如何提契与促进嘉道时代的学术研究》^[59],感到我的自信

就中国内地文献资料而言尚可，因为魏教授论文引文和参考资料中提及的中国内地出版的论著我全部读过，台湾出版的亦大多寓目，但美、英等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论著^[60]，用德、英、法、日文撰写的阮元传记各1篇，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史馆手抄本《阮元列传》1份和《阮元列传稿》4份，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库所藏的《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均因客观条件所限而无缘亲睹。魏教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亦很有特色，对我颇有启示。最近从《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61]上获悉魏教授的英文著作《阮元：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典型的中国大臣学者》将于2006年出版，不知今后能否有幸寓目？我非常盼望今后有机缘结识魏教授，并向她请教。此外，我在十余年前就了解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在1977年曾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以阮元研究为题旨，虽经多方查询，但至今仍未见到此文，深感遗憾！

再有，笔者曾从有关书目上得知台湾汉美图书公司1991年刊行的《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论文丛刊》第2辑中，收有的蓝文钦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研究》、张碧惠的《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蔡佩玲的《范氏天一阁研究》、汤绚的《清初藏书家钱曾研究》、严倚帆的《祁承口及澹生堂藏书研究》、简秀娟的《钱谦益藏书研究》、赵飞鹏的《观海堂藏书研究》、沈新民的《清丁丙及其善本书室藏书记研究》等书，但在上海、杭州的各大图书馆中均未找到。1997年12月，我乘参加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古代藏书研究专家咨询，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未曾见到。

相反，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内地、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欧美等地出版的汉学论著十分关注，信息灵通，加上经济条件远较中国内地学者优裕，所以有条件大量购买此类书籍，与自己专业研究相关的论著几乎竭泽而渔。笔者参观过好几位日本友人的书斋，收藏均十分丰富，即就中国内地出版物而言，似乎也不比中国内地同行逊色。他们插架琳琅，坐拥书城，令人羡慕不已！我在日本国立福井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与挚友永井崇弘先生，虽然当时刚过而立之年，但却已经拥有藏书5千余册，包括不少线装书和古旧书，其中有一些较为珍贵的书籍。他每次去中国，总想买几大箱图书，而很少带回其他东西。说起来也许别人难以置信，在号称“电器王国”的日本，当时他的住所只有一台9吋小电视机，而有时为了买一本心爱的旧书，^[62]却要花去五六万日元，同样的钱，在日本可以买一台名牌大彩电。永井先生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尊敬！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东方、内山、中华、中国、朋友、燎原、亚东、鹤本、琳琅阁、通志堂等专营中文图书及日文、韩文、西文汉学出版物的书店，及中文出版社、汲古书院等均编有详细的订书目录，一般每月出一册（有几十页甚至一二百页），寄赠日本各地的相关研究者和单位，使他们即便不去东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的书店，也可以通过邮购等方式及时买到自己需要的书籍。这些书店从中国进口图书的速度很快，可以做到与中国差不多同时上

柜。笔者于1999年10月2日、3日在大阪关西大学参加日本中国学会第51届大会时,近20家经销中文及日文汉学图书的书店、出版社到会场设摊售书,^[6]品种十分丰富,绝大多数都是前一两年出版的。《辞海》(1999年版)在中国内地是从当年10月初陆续上市的,而在那次会议会场的书摊上就可以买到了。同时,我还见到了《中国丛书广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两岸四库学》、《乾嘉考据学》、《清代义理学新貌》、《日本汉学思想史论考》等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些书早已放进日本有关学者的书斋,有的书已在次年上半年发表的论文中作为引文来源或参考文献出现。

在日本,不但买新书容易,买旧书也较方便。在上面提到的专营中文图书及日文、韩文、西文汉学出版物的书店中,不但有大量20世纪70~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间世的图书,还有不少50~60年代甚至20~30年代的出版物,而其中的一些书在中国内地的有关图书馆中也已很难找到了。琳琅阁书店以经营此类旧书为主,品种尤为丰富,上面提到的《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论文从刊》第2辑即有出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东京JR山手线佐佐木车站附近的东丰书店,是我至今到过的所有经营汉学图书的书店中品种最为丰富的。该书店新旧兼备,店面虽然不算大,但店中每一处可以利用的空间都顶天立地、密密麻麻而又井然有序地堆满了各种汉学图书,其中有些书在收藏汉学图书十分丰富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难以找到。在日本的一些汉学研究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凡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就去东丰书店找。笔者久仰其名,上次到东京时,一下火车,就直奔该店,果然名不虚传,令人惊喜。该书店的营业员仅有一人,既是店主又是员工,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据说早年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大学法学部。虽然他不善言谈,对顾客也不如一般日本书店的店员客气,但他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却倾尽心力地经营该书店已达数十年,千方百计为顾客找书。他和他所经营并为之献身的东丰书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这样的汉学书店,在全世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当属凤毛麟角了吧。闲暇时逛逛这些书店或翻翻书店寄来的书目,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

此外,日本学者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上述书店订阅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出版的学术性期刊。日本的书志学研究者一般都订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和台湾学生书局主办的《中国书目季刊》,而中国内地的古文献学研究者却较难读到日本汲古书院主办的《汲古》杂志^[6]、日本书志学会主办的《书志学》杂志(已停刊)、日本汉籍研究会主办的《汉籍:整理と研究》以及台湾的《中国书目季刊》等。至于同古文献学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东洋文库主办的《东洋文库书报》和《东洋学报》、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主办的《斯道文库论集》、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出土资料研究》、日本中国学会主办的《日本中国学会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东方学报》、日本斯文会主办的《斯文》、日本东洋史研究会主办的《东洋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主办的

《东洋文化》、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古典研究》、日本东北大学中国文史哲研究会主办的《集刊东洋学》、广岛大学东洋古典学研究会主办的《东洋古典学研究》、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主办的《汉学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等刊物,也很难见到。

再则,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学术著作的出版周期较短,从交稿到出书,一般为三四个月,论文则往往更快。而中国内地学者在这方面很吃亏,像古文献学之类的论著出版周期远较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为长。上述种种,为日本学者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笔者认为,中国的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和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同属汉字文化圈,都有不少学者研究古文献学,并且在研究成果、方法及资料等方面各有所长。近年来,上述各地的古文献学研究者虽然也有一些交流,但还远远不够,今后亟宜进一步加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对各方学者均有益处。近年来,我在与一些韩国学者交流中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研究汉学的论著往往引用台湾地区的出版物较多,而对中国内地学者的成果相对参考较少。1998年末,我在参加中韩人文科学研讨会时,有一位韩国学者研究《四库全书》有年,与我谈到很想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编纂《四库全书》时的有关原始档案。我告诉他该档案馆所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已于1997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并且附近的书店即有售。他买到此书后如获至宝,十分高兴。

鉴于中国内地对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甚少的状况,我很想在我所任教的浙江大学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及本科生开设一门名为“日本汉学概论”的课程,先从宏观方面概述日本汉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展望日本汉学的未来;再分别论述日本学者在中国思想、历史、文学、语言、文献、科技史等领域的主要成就;然后介绍日本的汉学研究机构、汉学人才培养、收藏汉籍的文库(图书馆)以及与汉学有关的出版社、期刊、书店等方面的情况。我准备边讲课边写讲稿,最后形成一本书。笔者深知完成这一计划的难度较大,会遇到诸多困难,也许是不自量力,但此项工作极富意义、很有魅力,我仍想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注释:

[1]在日本,古文献学一般被称为书志学,有时也被称为图书学。

[2]日本汲古书院,1995.

[3]日本民友社,1905.

[4]日本明治书院,1906.

[5]日本文求堂书店等,1933.

- [6]日本吉川弘文馆,1970.
- [7]日本明治书院,1979.
- [8]日本汲古书院,1974.
- [9]日本汲古书院,1974.
- [10]日本汲古书院,1976.
- [11]日本汲古书院,1976.
- [12]日本汲古书院,1973-1977.
- [13]日本汲古书院,1974.
- [14]日本汲古书院,1976.
- [15]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
- [16]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
- [17]日本讲谈社,1950.
- [18]日本讲谈社,1971.
- [19]日本雄松堂书店,1980.
- [20]日本二玄社,1969.
- [21]日本昭森社,1944.
- [22]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
- [23]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1973.
- [24]日本筑摩书房,1991.
- [25]日本图书馆事业研究会,1929.
- [26]日本岩波书店,1977.
- [27]日本和泉书院,1991.
- [28]日本有光社,1944.
- [29]日本青闲社,1944.
- [30]日本青裳堂书店,1982.
- [31]日本汲古书院,1988.
- [32]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
- [33]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
- [34]日本平凡社,1976.
- [35]日本岩南堂书店,1978.
- [36]日本青裳堂书店,1982.
- [37]日本富山房,1932.
- [38]日本青裳堂书店,1981.
- [39]日本印刷学会出版部,1949.
- [40]日本三秀舍,1930.

- [41]日本ラックドム社,1936.
- [42]日本ラックドム社,1936.
- [43]日本岩波书店,1999.
- [44]日本汲古书院,1985-1993.包括《宋元版篇》、《解题篇一》、《解题篇二》、《人物篇》等四卷。
- [45]日本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会,1957.
- [46]日本三省堂,1973.
- [47]日本汲古书院,1992.
- [48]日本汲古书院,1990.
- [49]日本同朋舍,1981.
- [50]日本东京堂,1995.
- [51]日本文书堂,1930.
- [52]日本研文出版社,1987.
- [53]日本国书刊行会,1994.
- [54]日本创文社,1996.
- [55]日本汲古书院,1991.
- [56]台湾学生书局,1988.
- [57]台湾学生书局,1994.
- [58]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 [59]载浙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学生书局,1998.
- [60]大部分并非专门研究阮元,而是其中有所论及.
- [61]大象出版社,2006.
- [62]在日本,有价值的旧书往往比新书还贵许多.
- [63]日本召开大型学术会议时均如此.
- [64]以刊登书志学论文为主,有点像中国的《文献》.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常熟藏书大家

曹培根

【摘要】 常熟私家藏书源远流长,明代嘉靖以后常熟涌现了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其中赵氏脉望馆、钱氏绛云楼、钱氏也是园、毛氏汲古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是全国一流水准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关键词】 藏书文化;藏书史;常熟

常熟私家藏书源远流长,崛起于明嘉靖后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藏书流派成为具有辐射和影响力的独特流派。常熟也就成为全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出现了众多在中国藏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藏书大家和藏书楼,略述八家以见一斑。

一、脉望馆藏书

脉望馆为赵用贤子琦美的藏书楼。楼址在常熟城区南赵弄10号。赵氏藏书从赵用贤(1535—1596)算起,可与距今430多年誉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宁波范氏天一阁媲美。用贤父承谦,官广东布政司参议,家多藏书。用贤从小爱读书藏书,明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吏部左侍郎,有机会得见国库秘本,因勤于抄写购藏,成为远近闻名的藏书家。其子琦美(1563—1624)以父荫补官太仆丞,迁刑部郎中,授奉政大夫,曾在京都任都察院都事。琦美受父辈熏陶,绰有文风,尤其是在搜访和校雠刊刻典籍方面胜过其父,他所收藏的图书近5000种20000余册,他所刊书达36种126卷,还抄校了大量秘本。赵氏父子的收藏志趣不只重视传统的经史,而是广泛搜罗古今典籍,甚至把眼光投向民间俗文学。赵琦美抄校辑集的元明两代稀见杂剧剧本《古今杂剧》,今存国库,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宝库。赵氏父子不是守奴式的收藏家,而是通过精校刊刻、编目作跋、提供阅抄等途径交流私藏。赵用贤所刻书以校雠精善著称,《五经》等版刻纸墨上乘,可与宋版乱真。赵琦美校刊的《仲景全书》,被誉为研究伤寒的最好版本。赵用贤编有《赵定宇书目》,定宇为赵用贤号,著录图书3300多种4900多册,其中有为世人罕见之书。宋版书有

《史记》、前后《汉书》、《东坡集》等50余种,元版书有麻沙版《五代史》、《南唐书》、《通鉴纪事本末》等30余种。所附录《稗统》(原题下标注“黄葵阳家藏”)244册子目,以及《稗统后编》、《稗统续编》,可知《稗统》为晚明以前的大型笔记小说丛集,后世不见著录。《大同嫖院新录》等也为其他书目未载,书目所作附注多有参考价值。

赵琦美编有《脉望馆书目》,基本按四部分类,但有所突破,如将奏议、经济以个人著作归入集部等,子目设置细密,共设近200个子目。书目著录“不全旧宋之版书”,得经部11种,史部以下近百种,首开后世藏书家著录宋元残本的先例。书目注意收集小说等俗文学图书,收录小说186种,并手校《古今杂剧》200多种。书目以《千字文》为序,分类排列书橱,并在类名下用小字标明度藏处所。

二、绛云楼藏书

绛云楼为钱谦益(1582—1664)的藏书楼。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东涧遗老等。钱世扬子,清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入清,任礼部右侍郎。交游极广,好收藏图书,常不惜重金购求古书,曾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遗书,何焯记其藏书3900部,多宋元本、孤本,当时大江南北藏书之富推绛云楼为第一,钱氏成为虞山藏书流派的代表,钱曾称之为“读书者之藏书”。所藏书必取宋元版,不收近人所刻及抄本。其藏书为读书,于书无所不读,每种书能说出旧版、新版及其差别,与原书丝毫不错。利用藏书,曾撰《明史》250卷、《诤史》、《列朝诗集》、《明诗选》、《明五七言律诗选》、《笺注杜工部集》等。所藏多经校读,所撰藏书题跋之作甚多。其藏书处先后有崇祯三年常熟城西廓锦峰之麓所构拂水山庄,崇祯十三年移居城北廓梧树弄口之半野堂,崇祯十六年所构绛云楼,顺治十一年于常熟白茆顾氏别业所筑芙蓉庄,又名红豆山庄、碧梧红豆庄。顺治七年绛云楼失火,所积图书毁灭殆尽,遗书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钱谦益所刻书有《列朝诗集》77卷、姚广孝《道余录》1卷、沈周《石田诗选》10卷、自辑《义勇武安王集》8卷等。其抄本受到藏家重视,抄有陶宏景《真诰》20卷、唐彦谦《鹿门集》2卷、元稹《元氏长庆集》60卷集外文1卷、李商隐《李商隐诗集》3卷、陈傅良《春秋后传》12卷、释德弘《石门文字禅诗抄》1卷、陈与义《简斋诗集》15卷、顾瑛《草堂雅集》13卷、释适之《金壶记》3卷、《天文玉历森罗记》12卷、《双陆谱》1卷、《玄玄棋经》1卷、《楞严蒙抄》60卷、陶宗仪《草莽私承》1卷等。崇祯十四年,钱谦益60岁,与柳如是(1618—1664)定情结百年之好,柳如是成为钱氏藏书、读书、校勘书的得力助手,绛云楼也就成为钱、柳生活和读书、校书场所。元刻本《阳春白雪》等即为柳如是校藏本,柳如是还参与了《李商隐诗集》的校写,并襄助钱氏编纂《列朝诗集》,勘定闺秀部分。钱谦益、柳如是为夫妇藏书家。钱氏卒后,生前图书除相赠钱曾外尚

有所遗,被钱曾及族人逼迫豪夺去,柳如是也不得不自刎亡。钱谦益所藏书有“如来真子天子门生”、“牧斋”、“惜玉怜香”、“钱谦益”、“牧斋蒙叟”、“蒙叟谦益”、“牧翁”、“鸿朗钱龄”、“白头蒙叟”、“牧斋藏书”、“青藜阁”、“家在万岁楼前”、“政和”、“钱受之”、“东涧”、“钱后人谦益读书记”、“宗伯学士”、“绛云楼”、“海虞”、“绛云楼书画印”等钤记。柳如是藏印有“女史”、“柳如是”、“惠香阁”等。钱谦益编有《绛云楼书目》,收录图书近3000种,其中宋元本约50种,宋本约36种。书目著录十分简单,大多数图书只著录书名,少数书名下注明册数,书名前注作者姓名,又大多数书不知为何版本,呈现前明私家藏书目录著录的一般特征。书目的分类采用非四部的一级分类法,共设73类,其中将明代文献别出一部,又最早将天主教图书列为一部,这些方面设类多有己见。另有《绛云楼书目补遗》,叶德辉辑,仅存抄本,原藏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后转入丁日昌持静斋,叶德辉刊入《观古堂书目丛刊》,补遗正文不细分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间或补充说明版本流传情况,解释书中之内容,简评书之得失,简介著者生平。钱谦益撰《绛云楼题跋》,潘景郑辑集265篇,钱氏题跋或臧否人物,或评论得失,或纠谬正误,学术价值很高。

三、也是园藏书

也是园为钱曾(1629—1701)的藏书楼。曾,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别署钱后人。钱裔肃第三子、钱谦益族曾孙,清康熙间常熟人。好学工诗,从钱谦益学,有诗集7种,即《怀园小集》、《交芦言怨集》、《莺花集》、《夙兴草堂集》、《今吾集》、《判春集》、《奚囊集》,谢正光据原盛宣怀藏本《虞山钱遵王诗稿》抄本辑校成《钱遵王诗集笺校》(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收诗513首。另有《牧斋初学集诗注》20卷、《有学集诗注》14卷、《投笔集注》1卷等。钱曾爱好藏书,不亚其父,得到钱谦益绛云楼焚余的古籍,筑述古堂贮藏,又增辟也是园、莪匪楼藏书处,在常熟城西虹桥。康熙八年自述竭尽二十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生平所酷嗜者,宋槧本为最”,被冯班等戏称为“佞宋刻”。藏书3800余种,所藏书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钱后人”、“述古堂图书记”等钤记,所抄书格外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字样。钱曾编有《也是园藏书目》,共著录图书3800余种,超过了《四库全书》收书数字。书目仅记书名、卷数,极其简单,为登账簿册之用,是钱曾早期编制的书目。书目分类采用非四部的二级分类法,共设8部:经部、史部、明史部、子部、集部、三藏、道藏、戏曲小说,下列145类,划分极为详细。对于戏曲小说单独设部,体现收藏特色,有益于其他书目几乎不载的戏曲小说书流传后世。其中特别是著录《古今杂剧》342种,极为珍贵。钱曾编《述古堂藏书目》,与《也是园藏书目》相比,著录加详,每一书名下附卷数、册数,有的还注明版本、出处,共著录图书2295种,其中宋版114种,

虽不及《也是园藏书目》量多,但也有《也是园藏书目》未见之书,说明书目编成时康熙八年(1669)钱曾藏书有收入和流出。书目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表明是钱曾有代表性的藏书总目。书目也采用非四部的一级分类,共分78类,所列门类有琐碎冗杂之弊,但因其恢复并发展了书目版本著录,在清代目录学史上颇有学术意义。钱曾编《述古堂宋版书目》,附于《述古堂藏书目》,共收宋版书98种,分34类。这些宋版书散见《述古堂藏书目》各类中,宋版诗文24种。其中个别宋版书与《述古堂藏书目》著录不一样,《述古堂藏书目》注记的宋版书也没有全部收入《述古堂宋版书目》之中,因而此目并非钱曾所藏宋版书的全部。此书将宋版书集中、单独编目,为钱曾所藏善本的书目,同时作为版本书目,在清代目录中具有一定地位。钱曾撰《读书敏求记》,是作者在编成《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藏书目》后,遴选藏书中之精粹撰写提要而编成,原稿初名《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辞》,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版本目录。书目按四部排列,著录图书634种。每种书均著录书名、作者、卷数,并撰写提要。其提要注重版本记录和考订,标明书之次第完缺、古今异同、成书情况、传递源流,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书中提出了较为科学的鉴定版本的方法,即从版式、行款、字体、刻工以及纸墨颜色来确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还记载了大量宝贵的书史资料。书成之后仅有抄本流传,最早由赵孟升于雍正四年(1726)刊行,1926年章钰刻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1932年又增刻《续补遗》,以校正精详著称。瞿凤起编有《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以《也是园藏书目》为纲,按其原次排目,《述古堂藏书目》、《读书敏求记》著录的同书附列其下,未见《也是园藏书目》的增补各类之后,并注明所出,共收书4180种。

四、汲古阁藏书

汲古阁为毛晋(1599—1659)的藏书楼。晋,原名凤苞,字子久,一作子九,晚年改名晋,字子晋,号潜在,一号隐湖、戊戌生、汲古阁主人、笃素居士等。清常熟人,诸生,游钱谦益门。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4卷、《永思录》、《救荒四说》、《方輿胜览》、《虞乡杂记》3卷、《和古人诗》1卷、《和今人诗》1卷、《和友人诗》1卷、《野外诗》1卷、《海虞古今文苑》等。汲古阁为毛晋藏书、读书、校书之处,另有绿君亭、目耕楼、读礼斋、载德堂、笃素居、宝月堂、追云舫、续古草庐等室名,以汲古阁最为著名。楼在常熟昆承湖七星桥,今常熟沙家浜镇毛家宅基(原址已无存)。汲古阁楼建制,据陈湖《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载:“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讷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崇祯十五年(1642)王咸曾绘《虞山毛氏汲古阁图》,作诗并题辞称:汲古阁在隐湖之滨,“次以甲乙,分以四库,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据郑德懋《汲古阁主人小传》称,毛晋藏书有84000册,藏书来源为购买、自抄和赠

送。当时常熟一带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谚语,又有诗称:“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童仆尽抄书”。所藏宋刻本有《群经音辨》、《本朝蒙求》、《文公家礼》、《吴志》、《江阴志》、《旧闻证误》、《东京梦华录》、《容斋三笔》、《博物志》、《册府元龟》、《孔子家语》、《类说》、《东坡志林》、《南华真经》、《韦苏州集》、《刘宾客外集》、《骆宾王集》、《孟东野集》、《韩昌黎外集》、《津阳门诗》、《陶渊明集》、《秦淮海集》、《白公讽谏》、《四灵集》、《石屏词》、《花间集》、《诗律武库》等。毛晋藏书乐于开放,吴伟业称赞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毛晋所抄所刻之书风行天下,藏书多有题跋,所藏书并有“汲古阁”、“汲古主人”等数十个铃记。毛晋子襄、褒、袞、表、宸,襄早卒,余均承父业。褒(约1631~1677),字华伯,号质庵,著有《先府君行实》1卷、《西爽斋唱和集》,所藏书有“华伯氏”、“毛褒字华伯号质庵”等铃记。袞(约1633~1652),字补仲,室名看山书屋,陈瑚《从游集》收其诗作12首。表(1638~1700),字奏叔,号正庵,早期继承父志刻书,所藏书有“毛奏叔氏”、“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记”、“毛表之印”等铃记。宸(1640~1713),字斧季,号省庵,终年74岁,克承父志,从事藏书、校书、刻书活动50多年,所藏书有“海虞毛宸手校”、“叔郑后裔”、“汲古后人”等铃记。毛宸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此目为毛宸在生活困顿情况下为售书给吴江潘耒稼堂而编撰的书目清单,据书目附言所识日期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共收录图书481种,略依四部著录,经史不分,集部为一大类,子部分若干小类,其中经史书139种,子书202种,集部书124种,附录书目16种。书目非汲古阁藏书总目,而是待沽的部分善本简目,宋元刊本抄本有112种,明万历前刊本抄本369种。每种书著录书名、卷册数外,注记版本情况特别详细,为突出宋元版本,书名前均冠以版刻时代,注记抄本特点、版本文字内容特点、纸张,附注插图、题记,标有价格,成为一部完整意义的善本书目。另有《汲古阁校刻书目》,原书题隐湖毛氏原本、同里后学顾湘校,《中国丛书综录》题郑德懋辑。书目著录毛氏汲古阁所刻书560种,以丛书居多。各书注记书名、卷数、页数。同治十三年(1874)顾湘从书肆得铃有汲古阁朱印之此目旧抄本,与郑德懋(书题荃阳悔道人)手辑本互校后刊入《小石山房丛书》。后附郑德懋辑《补遗》辑补44种及汲古阁主人自著未刊者17种,以及《汲古阁刻板存亡考》,考明24种。陶湘编《汲古阁刻书目录》,共收录540余种,略依四库分类,每种著录书名、卷数,详注著者、校订者、序跋、凡例、附录等,间加按语,丛书列出子目。书目依藏书著录,详细可靠。后有知而未得者之目75种,大多为《汲古阁校刻书目》及《补遗》著录。毛晋撰《隐湖题跋》,并自刻《题跋》2卷,收题跋152篇,每篇题跋言作者著书大旨,述版本流传渊源。潘景邦辑《汲古阁书跋》,共载毛氏题跋249篇,所跋多为唐宋元名人诗词集。潘天祯辑《毛宸书跋》,共百篇,载《潘天祯文集》。

五、爱日精庐藏书

爱日精庐为张金吾(1787—1829)的藏书楼。金吾,字慎旃,号月霄。张光基子,海鹏侄。父母相继去世,年仅15岁,由叔父张海鹏抚养。22年补为博士弟子员,省试不利而弃举业,潜心藏书、校书、纂辑刻印图书。嘉庆十六年(1811)金吾25岁开始收书,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编《爱日精庐书目》20卷,其间购书七、八万卷,至晚年藏书被债家同族侄子张承涣取去达十万四千卷。其书多经部之书、宋元旧槧以及金元两代遗集。藏书分贮多处,据其《爱日精庐文稿》载《诒经堂记》,有诒经堂三楹专藏古今诂经之书,西有爱日精庐为读书处兼藏先君子手译,南有世德斋藏其曾大父、大父诗集及十世祖瑞岩公、从父若云公校刊各书,又南有青藜仙馆藏毛晋、何义门、陆敕先诸先辈手校书,西有诗史阁藏元刊《中州集》及金人著述、碑版等,阁南有巽轩藏10万多活字排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200部,堂东有求旧书庄藏宋元明初刊本,庄南有墨香小艇藏元明旧写本,庄北有积书精舍三楹藏史、子、集三部通行之本。可见其藏书处规模之大。其藏书并不秘藏,而是“乐与人共,叩必应”,并且强调藏书为了读书。金吾利用藏书,著述甚丰,有《尚书义粹》12卷、《释冕》1卷、《释弁》1卷、《十七史经说》12卷、《广释名》2卷、《切韵指掌图音释》1卷、《双声表》、《言旧录》1卷、《两汉五经博士考》3卷、《风俗通姓氏篇》1卷、《两宋新记补遗》1卷、《邨中记补遗》1卷、《白虎通注》、《释龟》2卷、《贩馱质疑》1卷、《丝积闻》不分卷、《爱日精庐文稿》6卷、《爱日精庐诗稿》2卷、《金文最》120卷、《诒经堂续经解》1436卷等。金吾自嘉庆至道光间,以爱日精庐名义刊刻了自己的大量著作以及宋李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还与叔父张海鹏所刻大型类书。所抄书有宋钱若水等《宋太宗实录》残本8卷、宋卢宪《嘉定镇江志》22卷、元卢镇《重修琴川志》15卷等。所藏书有“张印月霄”、“张金吾藏”、“爱日精庐藏书”、“诒经堂张氏珍藏”等铃记。金吾妻季景和(1788—1827),字静芬,支持金吾购求善本,亦工鉴别,与金吾相对鉴赏,书志去取颇资商榷。金吾夫妇为夫妇藏书家。张金吾撰《爱日精庐藏书志》,只收录所藏宋元旧槧及有关实学罕见抄本,共765部,其中宋本约26种,抄本中文澜阁传抄本80种,余为汲古阁、文瑞楼、澹生堂、述古堂等名抄。此目创制了藏书志新体制,著录详细,每种书著录书名、卷数、版本(包括收藏情况)、作者、解题(包括考订刊刻源流、比勘版本异同优劣和内容评价)、历代书目著录、原书序跋、后人题识等。因体例最善,后来藏书志多仿效。

六、稽瑞楼藏书

稽瑞楼为陈揆(1780—1825)的藏书楼。陈揆曾从吴兴书商处偶然购得唐代刘昫《稽瑞》1卷,遍查书目未见著录,即名其藏书楼为“稽瑞楼”。陈揆,字子准,居尚湖之滨九万圩,一说居南门内小石桥,世称子游巷陈氏。弱冠补博士弟子员,绝意仕途,潜心购访古籍,日夜勤读。每得一书,亲自校雠,遇到前人校本必千方百计搜罗。当时吴中周锡瓚、袁廷枬、顾之逵、黄丕烈四家宋元旧槧及秘不经见之书陆续散出,陈揆与同邑张金吾各择优者收藏之。陈揆之妻张昭容,是张金吾胞妹,支持陈揆收藏,“每减衣节食以佐其费”,五六年中,所得2300多部藏书中,宋元明刻善本220种,计2万卷,并藏有明代方志130多部,清代方志(迄嘉庆间)267部。陈揆藏书专于史志而旁嗜说部,以收藏旧抄本、名人校本著称于世。他的书目著录旧抄本573种,名人校本130种。陈揆还注重乡邦文献的收藏,自宋元后有关虞邑文献都搜罗迨遍,捐藏于兴福破山寺,不下800余种。陈揆还撰有《兴福寺书目》,据统计,陈揆的藏书总数约10余万卷,其中精华部分亦有一二万卷。陈揆无子,歿后,书遂四散,其中一部分被翁心存重价购去,一部分被铁琴铜剑楼收藏。陈揆著有《琴川志注》,比原书内容增一倍以上。还著有《琴川续志》10卷、《别撰》10卷、《虞邑遗文录》10卷、《补集》5卷(现藏北京图书馆)、《稽瑞文草》1卷、辑宋躬萧《广济孝子传》;曾拟作《六朝水道疏》、《虞阳金石录》、《稽瑞楼丛书》,均未成而卒。他的抄本有刘禹锡《刘宾客文集》30卷《外集》10卷等唐、宋、明人集10余种。其藏书印有“文乡儒子”、“稽瑞楼藏”等朱文方印,“稽瑞楼”白文长方印等。陈揆编有《稽瑞楼书目》,著录其所藏善本书2300余种,略以储藏地点为序,分为“邑中著述”、“附记各榭”、“近代地志”、“小榭丛书”4部分编次。邑中著述收乡人著述500余种,附记各榭为经史类普通书籍460部,近代地志明代方志130部、清代方志267部,小榭丛书共891部,包括音训、史籍、传记、宋元地志、诸子杂说、杂家、古集、杂集、谱录等9类。书目著录简略,而详于版本。光绪三年(1877)潘祖荫从翁同龢家藏本借出刊入《滂喜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排印。

七、翁氏藏书

翁同龢在京寓藏书处名“均斋”、“宝匏斋”、“一经堂”。晚年在常熟又有瓶庐等处。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一字声甫,又作笙甫。回籍后,归隐万松寺旧址,自号松禅老人。又常自悔失言,不能守口如瓶,因号瓶庵,瓶生,瓶居士。晚年得宋刻本《集韵》,又自号韵斋。咸丰六年状元,历官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两度入军机,

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卒谥文恭公。翁同龢藏书除父兄传给的外,大部分是为官以后积累的。所藏典籍多珍秘,书画、经籍、金石拓片搜罗极精,郑振铎称其“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当时与德州徐氏、湘潭袁氏等被称为清末九大藏书家之一。翁同龢归里后,由其侄孙翁斌孙于第二年便将翁同龢存在宣武门外南横街京寓的典籍字画手稿等,一部分移存天津,一部分运回常熟,伴随翁同龢度过晚年。藏书后来传到翁之廉,最后归翁兴庆所有。1950年翁之熹将翁氏遗书3379册捐献北京图书馆,另一批遗书7924册捐献南京图书馆,2000年翁兴庆将所藏百年遗书80种542册转让给上海图书馆。翁同龢的藏书印有“常熟同龢藏本”虎形印,“叔平得金石文字”、“国卿图书”、“均斋秘篋”、“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朱方等等,“翁同龢校定经籍记”、“常熟翁氏一经堂藏书”白方等等。翁同龢撰有《翁同龢书跋》,其题跋常常借所题写的图书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对时事的感慨,同时对图书的收藏经过也有具体的叙述,成为后人了解翁同龢人生态度和藏书观念的重要史料。翁同龢书跋记录一书的内容、价值、流传概况以及版本鉴定,从中可以获得可靠的证据和进一步考索的重要线索。翁同龢经历丰富,见识广博,在其书跋中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翁同龢书法不拘一格,称为乾隆后第一人,其书跋真迹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八、铁琴铜剑楼藏书

人们将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合称为清代后期四大著名藏书楼,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又是其中唯一楼与书保存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藏书楼。瞿氏藏书始于瞿绍基(1772—1836),绍基字荫棠,江苏常熟人,以贡生选授县学教谕,旋即隐居昭文县罢里村,致力于藏书。历10年,积10万余卷,多宋、元善本。继又得同邑陈氏稽瑞楼、张氏爱日精庐散出诸书,藏书之名更著。其书室名恬裕斋,有《恬裕斋藏书记》。瞿绍基之子瞿镛(1794—1846),字子雍,岁贡生,继承先志,搜求益勤,曾据所藏编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咸丰十年(1860)战乱,瞿镛之子瞿秉渊(1821—1887)、秉濬(1828—1877)携书外出避难,辗转分藏,颇多损失。其后经历多年访求补购,又延请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等学者校补重订藏书目,于光绪二十四年印成《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收书1300余种。清代以后,因战事频仍,秉濬之子启甲(1873—1940)等曾将藏书运至上海。瞿氏藏书累经散失,新中国成立后,其所余部分,皆入藏北京图书馆等。瞿氏自瞿绍基至瞿启甲之子瞿凤起(1908—1987)兄弟,5世藏书,艰辛护书,新中国成立后又献书归公,事迹感人。

瞿镛撰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共收录图书1194种,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所收止于元人著述。按四部分类排

次,每书之下记卷帙存缺、行幅字数、序跋印记,并校讎异本文字。读此一书可得数书之功用,在近世藏书志中,尚没有超过此目的。此目初名《恬裕斋藏书目录》,有抄本传世。瞿镛子秉渊、秉濬先后聘季锡畴、王振声、王颂蔚、叶昌炽、管礼耕等人校勘。至瞿启甲又正其阙失,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瞿氏家塾刻本刊行定今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董康传录副本以诵芬室名义先行刊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瞿果行标点、瞿凤起复校本。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4卷,丁祖荫撰《识语》,民国十一年(1922)常熟瞿氏影印本。取所藏宋元本,择其中较为罕见的一二叶,仿杨守敬《留真谱》例,影印成编,按四部分类,每部按宋、金、元本顺序辑录排次。每种版本附以识语,着重于版本特征的各项著录,间或有所考证。收录160种宋本、4种金本、106种元本。瞿启甲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收书380余种,按经史子集分为4卷,经部35种,史部72种,子部116种,集部163种。其中宋刻本(包括残本、抄补本)近40种,元刻本20多种,另有影宋、影元钞本、校宋本和旧钞本等。收录元明清名家题跋甚多,尤以黄丕烈、顾广圻题跋为多。此书集诸家题跋于一处,又堪称瞿氏善本藏书目录,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可相互印证。瞿凤起珍藏原稿40余年,后经整理校订,1985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铁琴铜剑楼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翘楚,常熟藏书家之近代鲁灵光。瞿氏又是常熟派藏书家的集大成者,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反映出不同区域历史藏书和文化特色。首先是收藏志趣上的差别。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条中称:“国朝藏书尚宋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瞿氏铁琴铜剑楼继承了常熟派藏书家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的传统。瞿镛在《子雍先生乔梓画像》跋文中自称:“余有爱古之癖。”李芝绶《虹月归来图》序云:“海内藏书之聚而且久者,首推天一阁范氏……抑吾闻天一阁所藏多罕觐之笈,然大半写本,不专求宋元精槧,而讲宋元者,惟吾乡绛云楼钱氏,最聚而悉毁于火,踵而聚之者有汲古阁毛氏……瞿镜之、濬之……见所谓宋元精槧者以厚值收之。”宋翔凤《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序称:“其所收藏皆宋元旧刻暨旧抄之本,至明而止。”瞿启甲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跋中说道:“吾家藏书之富权舆于曾祖、祖考两世,凡宋之暨前明善本不惜重价收购,储积至十万余卷,遂成巨观。”而范氏天一阁比较重视收集当代人的著作。赵万里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中称,范氏选书的标准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书籍,很少受他收容,除了吴兴张氏藏的宋小字本《欧阳文忠公集》是天一阁旧藏外,很少有此例外。惟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古籍,因他保存了不少”。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撰《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曾指出:“此阁所藏五万三千余卷,皆明天启以前旧本。”他还希望范氏后人继藏后出之书。金涛在《新编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谈道:“范钦不像一些藏书家以搜求珍稀古本为己任,而主要致力于收集当代的著作和文献,从而形成了天一阁独具一格的藏书特色。天一阁藏书中最多的明代地方志、科

举录、政书、实录和诗文集,这些当时通行书乃至内部资料,由于搜罗齐备,保存完好,随着岁月的推移,就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范钦的这一收藏经验,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对于这种收藏,常熟派藏书家的瞿氏也许是不屑一顾,而从今世来看,这种收藏的史料价值和特色自然是不可低估的。其次是收藏内容上的不同。常熟派藏书家收藏的图书偏重正经正史,尤其尊经。孙庆增在《藏书记要》里总结常熟派藏书家收藏经验说:“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所以书籍首重经史,其次子集。”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精华就在于经部。翁同龢《虹月归来图》记称:“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槧,其精者尤在经部。”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苏州,瞿秉渊、秉濬兄弟将图书藏于乡间,又将自以为最重要的经部书荟萃入箱,秘藏周泾口张氏家,可见其尊经之一斑。范氏天一阁比较重视收藏史部、集部图书,史部也不限正史。现存天一阁藏书中可见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和诗文集特别多。天一阁原藏各种省、府、州县志435种,超过《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方志,今存271种,《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及续编影印了其中的218种。天一阁藏进士登科录68册、会试录62册、乡试录297册、武举录33册,至今尚存明科举录370种,多为海内孤本。此外,还藏有大量家谱,今存403种1982册以及大量碑碣拓本等。据《天一阁遗存书目》统计,天一阁共有图书1676部,8472册,21245卷,其中经部64部,子部242部,集部243部,史部1127部,占百分之67%。赵万里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中说:“天一阁现存的,以史部占大多数……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部。”再次是藏用原则上的区别。中国私家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是以藏为主、藏用结合,对于范氏天一阁来说,更偏重于藏。诚然,其注重收藏当代图书,也是从实用出发,但在图书流通使用方面显得十分保守。天一阁自1566年左右到1909年间主要是封闭式的,封闭保存的制度十分严格。康熙十八年(1679)黄宗羲撰《天一阁藏书记》中也谈到“封闭甚严”,1673年“至甬上”,范友仲才“破戒引余登楼”,抄为书目,黄氏仍称赞其“久而不散”之可贵。清乾隆后,禁例才稍懈,但只有全祖望、袁枚、阮元、钱大昕、薛福成、缪荃孙等少数著名学者才得以先后登楼观书,其“束之高阁,秘不示人”可见一斑。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记:“司马没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人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摒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封闭,也是范氏天一阁藏书所以久而不散的原因之一。常熟派藏书家虽然也有秘守己藏不以示人的吝书守籍奴,但流通古籍、藏书致用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通过传抄、编目、刻书、借用等来传播典籍,提供利用,瞿氏铁琴铜剑楼便是代表。瞿氏不把私家藏书仅看做私有秘产,而是公开其藏书,供读书人士前往浏览、校勘、转抄、参观,让图书得其所用。不仅许人人楼参阅,还别辟专室,供人坐读,备茶水膳食。瞿氏编印藏书

目录,精印《宋元善本书影》以飨海内外人士。商务印书馆等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瞿启甲不仅为发起人之一,且为丛书编刊提供所藏善本不少。其中,《四部丛刊》初编收瞿氏书25种,续编收40种,三编收16种,让珍贵的典籍化身百千。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启甲子济苍、旭初、风起秉承遗志,将私家藏书捐献国家。其中,精品藏书595种4000多册捐献给北京图书馆,242种2501册列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瞿氏所藏另一部分993种3366册捐献给常熟市图书馆,一部分捐赠上海图书馆,部分名人书札、文物拓片、拓本等捐赠给常熟博物馆。可见,瞿氏确非秘藏高度之辈。瞿氏藏书文化和精神,至今仍有启迪意义,值得继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 [1]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 [2]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M].大家出版社,2001.
- [3]曹培根著.书乡漫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4]缪咏禾著.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5]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编著.江苏刻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6]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著.江苏艺文志·苏州卷[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7]曹培根等著.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作者工作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徽州宗族藏书文化试析

薛贞芳 鲁燕

【摘要】 徽州是中国古代宗族社会最为典型的地区,徽州的宗族藏书文化也最值得研究。本文以大量的史料论证了徽州宗族藏书的处所、内容、来源和特征,分析了徽州强固的宗族制度对宗族藏书事业的影响,同时也剖析了徽州宗族藏书文化对徽文化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徽州;宗族;藏书文化

学术界通常认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整体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而对于客观存在的宗族藏书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目前关于宗族藏书的研究,仅见刘尚恒先生《宗族藏书重教与宗族人才成长——清代中期安徽泾县朱氏培凤阁藏书》一文。该文首次提出:“所谓宗族藏书,乃指某一家族共同集资购书,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藏书行为。它包括某一藏书家将自藏书籍置于祠堂、义塾,供族人利用,明显地区别于官府、私家、书院、寺院藏书,它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简言之,宗族藏书具有公有共用的特点。笔者认为,徽州是中国古代宗族社会最为典型的地区,徽州的宗族藏书也最为典型。因此,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与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徽州宗法制度对宗族藏书事业的影响

徽州,乃指历史上皖南地区及其下属的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婺源一府六县,是中国宗族制度最为完备、宗族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

徽州的宗族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土著的山越人;另一个是外来移民,徽州的大姓几乎都是从外地迁移而来。迁移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为被朝廷派往徽州出任地方官员,爱上此地的山清水秀、风景绮丽而留居于此;另一种是因为逃避中原战乱迁徙于此。徽州大姓避乱入迁时期主要是汉末建安之乱、晋末永嘉之乱和唐末黄巢之乱三个阶段。据

明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载,从汉至宋,相继迁入徽州的名族有88个宗族,这些迁入徽州的中原“衣冠巨族”经过和土著越人长期的争斗和融合,逐渐取而代之,反客为主,带来了浸透着宗法思想的中原正统文化和先进技术,从而使徽州宗族社会风俗“益向文雅”。加之徽州地区山重水复的自然阻隔,受外界战乱的影响较少,社会较为安定,中原文化在此得到充分发育,宗族制度也得到充分发展。

宋代以降,程朱理学在其故乡徽州影响至大,宗族伦理被提到“天理”的高度。朱熹亲订的《家礼》等书,被徽州人奉为宗族行为的指南,徽州的宗族组织发展更加严密,宗法制度更加发达。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族谱、祠墓和族产,成为宗族尊祖、敬宗、睦族的三大要素。按照朱子伦理思想制定的族规宗法成为至高无上的规范。各宗族大姓人丁繁衍,日渐形成“聚族成村,尊卑有序”的制度。

尤为重要的是,移住徽州的中原大族一直秉承诗礼治家的传统,重文重仕,自宋代起抓住了朝廷科举改革的机遇,纷纷培养宗族子弟获取科举成功,从而使宗族势力得以长期扩张,“尚文重教”成为徽州宗族的优良传统。赵汭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指出:“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明清时期,徽州大族“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越来越多,出现一派“人文郁起”的兴盛局面。

自明代中叶起,徽州宗族又抓住第二次机遇,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商致富,徽商崛起。入清以后,徽商更是雄霸天下,这些致富后的宗族商人和科举入仕的宗族官宦,在“亢宗”、“大族”的宗法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对建祠堂、修宗谱、办学校等公益事业的投入,从不吝啬,因而使徽州宗族日益繁荣发达,徽人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以振兴宗族为宗旨的宗族教育(含宗族教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大地促进了徽州宗族藏书文化的发展。

二、徽州宗族的藏书之所

徽州宗族藏书最早有文可征的是在宋代。藏书处所最普遍的是族塾(即家塾、义学、学馆、书屋、社学等)。据翼霖《义学记》记载:“义学始于有宋,若衡阳侯氏、建昌洪氏、婺源王氏、莆田林氏,而范文正公特建于姑苏之太平山,立斋庙,祀孔子,由是兴起,四方学者归焉。”^[1]可见宋代徽州“婺源王氏”已经有了义学。另据康熙《徽州府志·隐逸传》载:北宋婺源人汪绍“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名曰四友堂,割田三百亩以充膳费,四方学者踵至。”这两

条材料说明宋代徽州义学的存在。有义学便有藏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元代,徽州族塾的设置更为普遍,如婺源程本中于松山建遗安义学,祝寿明于中山建中山书塾,汪同于大畈建知本堂;祁门汪应构中山书堂于桃墅;元末休宁回溪人朱升建枫林书屋于歙县石门,休宁万安人汪德懋于元末创建万川家塾等。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更加重视教育,“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学校》记载,明初徽州建有社学462所。明景泰七年(1456),祁门柏溪人程叙建钟山书堂;景泰年间(1450~1456)祁门人汪思诰、汪思敬建查山书堂;成化年间(1465~1487),祁门人祝孟节等人重建中山书塾;嘉靖年间(1522~1566),绩溪龙川人胡宗宪建梅林书屋等。清代塾学更多,仅婺源县的馆塾就有50余所,书屋60余所。^[2]一个较大的宗族往往多达一二十所。如《济阳江氏金鳌派家谱》云:“吾族书舍大都建于山麓,四无居人,专界授经者设账。如传恭堂、梅杏居、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双凤书屋、梅郇西麓雪堂……”又如歙县东门许氏宗族之《许氏家规》记载说:“吾宗童蒙颇多,而设馆非一,随地有馆,以迓塾师。”^[3]可见徽州族塾是遍地开花,有学必有师,有师则必然有书,各族塾藏书不论多少,总数应该也是可观的。

徽州宗族藏书的另一重要处所是宗族祠堂。文献记载徽州最早修祠,是唐末黟县济阳士大夫江时修的江氏家庙,当时庶民是不许随便建家庙的。至宋代,由于朱熹创立了修建祠堂的制度,从此全国都可以修宗祠,徽州一些普通宗族也开始修祠。明代中叶,徽商雄飞全国,将大量金钱输往故里,徽州各族大兴土木修建祠宇,建祠活动在明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形成热潮,清初更是达到了巅峰。据有的学者推算,明清时期徽州仅歙县就有6000座祠堂。一般世家大族少则几座,多则数十座。如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有祠堂26座,南屏叶氏宗族有祠堂21座,歙县江村江氏宗族有祠堂31座,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有祠堂15座。徽州宗族祠堂的主要用途是族人议事、处事和祭祀祖先的场所,但其中有的也用作修谱、刻谱、藏谱、刻书藏书的场所。如婺源《清华胡氏族谱·家庙记》记有:“为门三间,藏祭品于东,藏家谱于西,饰以苍黝,皆制也”。又如呈坎罗氏文献家庙就是专门用来收藏宗族文献的。还有的不少宗族将祠堂用作校舍,如歙县澄渡吴氏宗族设家塾于吴氏祠堂,祁门程氏的窠山书屋也建在祠堂内。这类设于祠堂内的学校,无疑也是拥有藏书的。

明清时期徽州各地普遍设有书院,其中相当一部分书院也是由宗族兴办的。如婺源的太白精舍、绩溪的濂溪书院和萃升文会,分别为潘氏、周氏和曹氏宗族合族公建。其他著名的宗族书院还有:歙县西畴书院、竹山书院、松鳞别墅;休宁明善书院;婺源明经书院、桂岩书院、双衫书院、骐阳书院、开文书院、西乡书院、玉林书院;祁门李源书院、窠山书院;黟县莲塘精舍等。这些宗族书院大多由宗族直接输资或组织族人捐资建成,也有一些是由族中富户或官僚捐资兴建。书院教育必重视藏书,所以这类宗族书院也是宗族藏书之所。

徽州宗族中的私人藏书楼亦大多为族人所利用,兼有书院研讨、讲学藏书之功用。如

歙县岩镇，“镇中之大盛者，则有尊经阁，为闵氏贮书处。故名尊圣，岿然屹立于岩溪之上，……旁建石塔一座，以象文笔峰，……贮书万卷”。这条材料是指宋代闵景芬建尊圣阁，贮书万余卷，与宗族子弟和求学者经常研讨于其中。再如宋代吴豫建延芬堂，储书万卷，并允许乡里俊彦观摩研习，可见是一个开放性的私家藏书楼。又如元代汪泰初的遗经楼，也向族人和四方学者开放。再如清道光年间，西递胡积堂建笔啸轩，藏书数千卷，书画以千计，一年四季，胡氏“或抚琴而鉴古，或饮酒而赋诗，子弟颂书声相与和答，其喜可知也”。^[4]清乾隆年间，西递村最富有的大徽商、曹振鏞的亲家胡学梓建有万印轩，也供族中子弟读书之用。此外，歙县瞻淇汪适栋的补过轩书楼、歙县西溪汪梧凤的不疏园、祁门渚口倪望重的藏书楼等，都是藏书丰富、文人聚集并兼供族中弟子读书之所。

徽州宗族中也不乏建有宗族藏书楼的，如婺源考川胡氏建有藏书楼。其族谱之《藏云楼记》曰：“藏云楼者婺之考川胡氏先世之楼也……广倍于崇焉。竹木环植，喧嚣不侵，取先世所遗经书，又益市子史传记度于其上。”再如宣溪程氏建保训楼，主要收藏族人著作，“凡唐宋以来文书别集与夫官宦手泽宛然在目。”^[5]又如歙县潭渡黄氏建有黄山楼，族人黄修溥贮书数万卷。^[6]还有歙县槐塘程氏建有御书楼，呈坎罗氏建有宝纶阁和罗氏文献家庙、金紫胡氏的世泽楼等，都是宗族藏书楼。可以说，当时的徽州，每个聚族而居的村落都拥有本族的藏书之所。

三、徽州宗族藏书的内容和来源

徽州宗族藏书的内容主要为宗族文献和传统书籍。宗族文献主要有族谱、文书、方志、族人著述。(一)族谱的收藏。徽州宗族对修谱极为重视，认为“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7]明清时期更是修谱成风，一般二三十年修一次。如婺源《董氏续修宗谱序》记载，游山董氏宗族的宗谱，“自元大德以来而明而清而民国，凡九修矣”。各宗族对谱牒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宗族在谱牒印制完毕后将谱版焚毁，然后将谱编号分颁给各家和支派。如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验谱规例》规定：“查旧谱各家所领多有遗失，因年久未验，不能深究。旧谱存者则给新谱，失者不给，仍将存失开明于后。自今各领新谱并所存旧谱及和溪公谱，递年腊祭之日，同赉至祠，照号众验。倘有遗失，务必追究。如系失于收藏，至风雨、虫鼠损坏等情，定行议罚。若属盗卖，则照和溪公所立《凡例》认黜，断不轻恕。倘遇兵火大故，致失落者，不在罚例。”又如婺源《湖溪孙氏宗谱》也记有“记各派分领，宜谨收藏，以备查考”。值得注意的是家训族规也大多为宗谱所收入，但也有单独刻印成册的。如著名的《窦山公家议》、《商山吴氏宗法规条》等，和族谱一样，它们不仅被收藏在宗祠里，还要发放到每一个宗族家庭。(二)宗族文书收藏。徽州的宗族都

有严格的内部管理,历年买进土地的契约、族田出租的租约、宗族的收支账目、宗祠簿、分家书、寿诞及婚丧礼帐等等,都辟有地方专藏,有专人悉心管理,即使遇到战乱也会随身携带逃亡。现存的近30万件契约文书中以宗族文书为多,正反映了当时宗族对此类文书收藏管理的重视。(三)族人著作、手稿收藏。徽州宗族对先贤极为尊崇,对先贤的事迹和著作必竭力刊刻成书,一为保存,一为流传。即使不能付梓,也必千方百计收藏,借以教育族中子弟。如绩溪槐塘程氏盖御书楼收藏程元凤的遗墨、古咏、遗书;又如朱熹后人多次刊刻朱子著作;歙县左台吴钦仪为了拯救吴氏先贤遗稿,不仅自己竭尽全力,甚至还勒石以告后人重视征集补遗。自宋以降,徽州私人撰述成风,世家大族不乏名臣大儒,著述繁富。如绩溪金紫胡氏“一门著述之富,独冠我邑”。^[8]据其族谱记载,明清二朝子弟著书达104种。^[9]又如《岩镇志草》记有:“吾里人文之盛甲于乡邦,先世多有专集,乃好为名山之藏。”^[10]再如歙县江村,有70余人著书150多部,其体裁题材涉及经史子集诸门,甚至一些淑女名媛也有著作。此外,我们从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苏景元之《新安文粹》等作品中也能窥见一斑。(四)方志收藏。徽州历代府县志书修纂甚多,有的名宗右族仿照府县方志也修撰宗族志。如休宁许氏于雍正元年(1723)修撰有《孚潭志》四卷;歙县岩镇于雍正三年(1725)修撰有《岩镇志草》四卷;歙县凌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修撰有《沙溪集略》八卷;歙县江村于乾隆四十年(1775)修撰有《橙阳散志》。另外,还有祁门程氏的《善和乡志》、许承尧纂修的《西干志》,吴吉祐纂修的《丰南志》等。这些宗族志分门别类,内容丰富,也是徽州宗族收藏的重要文献。

除上述几类宗族文献的收藏之外,徽州宗族一般还收藏有:(一)蒙学教材和科举用书。出于“亢宗”、“大族”的目的,一些理学名儒在训蒙的过程中,亲自编写蒙学教材。如元陈栎编写出《论语训蒙》、《中庸口义》、《性理字义》、《历代通略》、《增广通略》、《小学字训注》等多种;胡炳文编成《纯正蒙求》。再如朱升的《小四书》影响很大,直到清代还在流传使用。又如吴瞻泰、吴瞻淇编辑、洪力行校的《紫阳书院四书讲义》,也是私人书院的教材,这些教材当然是宗族藏书的重要内容。有的宗族为了更好地发挥族塾的教育功能,还自编族塾教材。如金紫胡氏族人瑞临公曾“经名师友之授受,又加之平生之笃嗜,本之左传以求其端,参之公谷以博其趣……汇而集之”,著成《春秋约读》。“以之藏之笥篋中,时而检阅,以为家塾之读本。”^[11]宗族子弟一般经蒙学教育后,合格者被送入宗族经学,以授受专门的科举考试内容并进行相关训练,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经史类书籍也是宗族必须收藏的。(二)金石书画之收藏。徽州大族既有财富,又尚风雅,多喜公藏名人字画,一来可供子弟观摩;二来在宗族活动时展示,借以抬高地位;三可以作族产保存。如黟县西递胡氏道光五年(1825)修谱,在祭谱期间唱了12天戏,看戏的有4万人。本始堂堂中“设祭桌,张以盆架,内设宗谱及古玩器。……堂画四幅,皆金笺,为明人手笔。四廊挂大条幅二幅,长一丈有奇,一

为唐子畏画；一为文衡山字。”^[12]这条材料一方面记述了胡氏修谱的隆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胡氏宗族挂出的明人字画及摆设的古玩等为宗族公藏。宗族中收藏名人字画有时还可用作礼品，以交通官府。如清人黄次荪在《草心楼读画集》中云：“吾族承德堂藏有王叔明山水，鸾绫象匣，盖当时以备进御者。又藏有坡公墨竹。……沈启南（周）曾以讼累避地新安，馆于吾宗燕翼堂。濒行，为作松、柏、桐、椿四大幅。”据一些文献记载，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祝枝山、文征明以及清代的邓石如等都曾在徽州留下了诸多墨宝，其中不少为宗族收藏。而且，徽州更出现过上千位画家、书家，他们的书画作品，宗族也应多有收藏。又据许承尧《歙事闲谭》记载：“而是时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墨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可见徽州宗族收藏金石书画的风尚。

此外，徽州宗族除了以科举为教育目的之外，还竭力鼓励宗族子弟学习治生和经商的技能。因此，宗族还收藏有商业类书籍。徽州宗族又特别重视风水，故而也可能藏有风水之类的杂书。

徽州宗族藏书的来源主要是用公共资金购买，而公共资金大多由族人捐赠。如《（光绪）绩溪金紫胡氏家谱》之《特祭祠世泽楼藏书碑记》记载：“族中好义之士，踊跃捐输……建特祭祠并建楼其上为藏书之所，颜曰世泽楼。旁构小屋二区，居司书阅书者，越二载告成，其用钱一千余缗，其余钱则议置并口捐田以供岁修贮书之用。……于是金议藏书之约附刻于石碑遵守焉。”这则材料说明胡氏宗族用“好义之士”所捐之资建了藏书楼，还派有专门“司书”者管理，又留有专款每岁增置图书，并且还制定了藏书之约共同遵守，这简直就是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徽州宗族藏书的资金还有来自于颁赐的，如绩溪余川汪氏宗族。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后裔，徽州首屈一指的大姓，其《余川汪氏文会记》云：“卓侯尝谓予将大集图书实其中。”余川汪氏建有藏书楼，名“监书阁”，其中“大集图书”究竟是多少呢？《余川越国汪氏族谱·监书阁》记载，宋天禧五年（1021）汪氏向朝廷进贡特产，朝廷赐给白金数倍于物价，汪氏族议，用赐金一半从国子监购书以归，建阁专藏。在该谱的《监书阁补记》中又记载：“迄今监书阁久废，其书目不可得而详。然以古籍存亡篇《宋史·艺文志》观之，犹可按其时所有书目约略而记也。……于斯时也，天下英俊群萃于馆阁，自太平兴国七年（982），诏求李防、扈蒙、宋白、徐铉等阅前代文学，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文苑类华》一千卷；又诏李防等辑经史故事分门撰《太平御览》一千卷；诏王钦若、杨億修君臣事迹，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成《册府元龟》一千卷；王著修《阁帖》十卷；张君房修《云笈七籤》一百二十卷。而平蜀所收九经四书及英华、御览、册府诸大部及淳化阁帖，人间所绝无而仅有者皆得之，岂非德义之

府,琬琰之珍,不匱之经畚,不炫之秘实也哉!”从这则材料来看,余川汪氏从国子监购回数千卷图书,当与上述当时官修的著作有关,皆国之珍籍。

徽州宗族藏书的另一来源是族人的捐赠,这类文字记载俯拾皆是,不必赘言。

四、徽州宗族藏书对徽文化的贡献

徽州宗族藏书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撮其要者:

其一,有助于宗族培养人才。

就科举而言,徽州宋代中进士者860人,明代中进士者492人,清代中进士者782人。其中状元17人(休宁13人,以县计全国第一)。有的世家大族科第蝉联,人才辈出。如歙县洪氏宗族“子孙蕃登数千指,咸习诗书,敦礼让,登名仕版者相望。”^[13]歙县沙溪凌氏一族,有明一代就出了21名进士、57名举人;至清代仅乾隆以前,该族便产生了7名进士、18名举人。^[14]在徽州宗族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科举故事。例如歙县的“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婺源县的考川明经胡氏宗族“父子四进士”、中云王氏宗族“三代四进士”、桃溪潘氏宗族“一门十一进士”等等举不胜举。正如《余川越国汪氏族谱》中说的那样:“汪氏能以家闻于朝廷、名附之史后,世赖其藏书,继踵得仕,可谓荣矣!”名臣辈出,累世簪缨,也是徽州一些名宗右族的显著现象。如绩溪龙川胡氏宗族共出现大小官员70多人,歙县西溪南吴氏宗族出现大小官员402多人,其他如汪、程、潘、罗等大族无不如此。徽州历史上有17人位至宰相,名臣能吏代不乏人。此外,学者名儒、文坛才俊、富商大贾、书画名家、能工巧匠等等,繁若群星。这些都与他们生长的宗族教育环境(包括得益于宗族藏书)是分不开的。

其二,有神于徽州学术的发展繁荣

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流传于徽州一带。该学派崛起于南宋,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明·程瞳《新安学系录》收集了自宋至明徽州112位理学名家的传记,这批人全都是著名学者。他们从事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书籍的积累,如朱升、赵访、郑玉、程敏政等理学家同时也是藏书家。他们的成长也离不开宗族的教育环境,他们中有人从小在族塾中学习,成才后又担任塾师,编写蒙学教材;有的创办私家书院,授徒讲学,因此,朱子学才得以在徽州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藏书也得到丰富。

在清初学术主流的影响下,徽州的学术也随之发生了流变。休宁人戴震开创了徽派朴学,很快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著名学派。徽派朴学的形成与汪梧凤不疏园的藏书是分不开的。民国《歙县志》卷七记载:“不疏园在西溪,汪梧凤故宅。梧凤藏书甚富。江慎修于此著《乡党图考》并讲学。戴东原辈时来就学。郑虎文、刘大櫟、汪容甫、黄仲则等均尝集于此。”

上述江永被誉为徽派朴学的奠基人。郑牧、汪肇龙、戴震、程瑶田、汪榕凤、方矩、金榜则被称之为“江门七子”，其中戴震更是被公认为主帅。不疏园向被誉为徽派朴学的摇篮，可见是当之无愧的。

徽州朴学的研究传承时间前后计有百年，活跃在戴震周围的重要学者计有40余人，朴学家治学，“尤需博览载籍，腹富五车，而后可以扬摧是非，参稽异同。有朴学之提倡，而藏书之需要亟；有藏书供其需要，而朴学乃益发扬光大”。^[15]总之，藏书促进了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两大学术流派的发展繁荣，学术研究和成果也大大增益了宗族和私家藏书，二者实为互动之关系。

其三，有利于徽州宗族文献的大量保存。

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存世的徽州文书总数约有30万件，种类不下300余种，其中宗族文书居多，分藏于国内数十家收藏机构，美、英、日、法、东南亚及港台的一些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也有收藏。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学术界将之视为继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徽州宗谱的修撰历代相承，蔚为大观，目前现存于国内外收藏机构的徽州宗谱估计有1000余种，其中一些大部头的统宗谱只有徽州才有，非常珍稀。徽州学者众多，徽人著述目前虽无确切数字，但有学者初步估计有4000余种之多，其中朱熹、戴震、胡适等人的作品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徽州还为我们保存了一批地方志，其中不乏善本。

综上所述，徽州宗族文献因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资料宝库。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学者对其发掘利用，亦有学者对分散的资料进行了一些抢救和整理，祈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快对徽州宗族文献的抢救和整理，促进徽学研究的深入，使藏学、敦煌学、徽学这三大地方显学的研究同放异彩！

注释：

[1]翼霖.义学记[A].(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六)书院[C].

[2](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七)[Z]建置·宫室[Z].

[3]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宗规[C].

[4]胡积堂.五世传知录[C].

[5]篁墩文集(卷十七)[C].保训楼记[A].

[6]歙县志(卷七)[C].人物志·文苑[A].

[7]盘川王氏宗谱·凡例[C].

[8]金紫胡氏家谱(卷首上)[C].匡宪公传[A].

[9]绩溪金紫胡氏宗谱(卷首上)[C].艺文·书目[A].

[10]岩镇志草·发凡[C].

- [11]绩溪金紫胡氏宗谱(卷首下)[C].艺文·书序[A].
- [12]胡元熙.修壬派胡姓谱纪事[C].
- [13]白云集(卷五)洪氏宗谱序[C].
- [14]沙溪集略(卷三)[C].
- [15]洪有丰.清代藏书家考·引言[J].图书馆学季刊,1926,1(1).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

南浔沦陷时期的嘉业藏书楼

李性忠

【摘要】 有关南浔嘉业藏书楼在日本人占领期间的命运,有种种传说,文章通过对嘉业藏书楼留存档案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结合新披露的史料,对历史真相作一探讨。

【关键词】 嘉业藏书楼;藏书史;

1937年11月19日,日军十八师团侵入南浔镇,南浔沦陷。^[1]关于沦陷时期嘉业藏书楼的命运,有种种传说:一曰得益于楼主刘承干的日本友人松崎鹤雄的关照;二曰溥仪赏赐的“九龙金匾”镇住了日伪人员,他们肃立脱帽,不敢胡作非为;三曰嘉业堂事先将藏书的首册或末册转移到南浔镇上的刘氏另一处住宅的阁楼上,造成楼中藏书残缺不全的假象,骗过了日本人。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本文根据嘉业藏书楼留存档案及有关资料,作一探讨。

1924年底嘉业藏书楼落成时,聘有“职员四人,工友四人”。^[2]南浔沦陷前夕,曾有过一次户口登记,根据留存档案的记录,当时有职员5人,工友5人。户主施维蕃(韵秋),40岁,江苏海门人,已居住13年。同事有:崔聿成(叔荣),38岁,江苏吴江人,居住13年;张凤翔(仲翱),25岁,江苏海门人,居住6年;梁体泉(沅左),48岁;沈锺,66岁,浙江崇德人,居住13年。工友分别是:褚和尚,32岁,浙江吴兴人,居住2年;黄祥林,52岁,浙江吴兴人,居住8年;黄元春,35岁,浙江吴兴人,居住13年;丁金宝,38岁,浙江吴兴人,居住1年;顾阿金,53岁,江苏吴江人,居住2年。所谓居住的年份就是在嘉业藏书楼工作的年份。此外,住在楼内的还有从事嘉业堂自印书的刻友、印友,其中有呼宗华、王存葵、顾克武、蔡绍祥、沈文良。^[3]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日本飞机经常到南浔上空侦察,轰炸扫射;11月12日,来自平望的声声炮火使南浔居民惊惶失措,纷纷逃避乡里;日军占领南浔后,“见人就杀,见屋

就烧,被害有400余人,沿街电线杆上挂满人头,全镇烧毁房屋4993间。”^[4]混乱之中,顾克武、蔡绍祥遭日军枪杀,施韵秋率书楼人员加入难民行列,但安排了褚和尚、顾阿金留守书楼。逃难中,施韵秋时刻以书楼为念,在一个夜晚冒险从书楼和小莲庄抢救出一批书和书籍,最后转移到乌镇暂存。1937年底,镇上稍为安定,施韵秋即安排人员轮流回书楼值班。1938年2月,暂存乌镇的书和书籍运回书楼和小莲庄,全体人员也回到南浔。

日军侵华罪恶滔天,对我国文化和藏书事业的摧残也罄竹难书。例如:在浙江,毗邻湖州的嘉兴图书馆馆藏元刻1部29册、明刻177部2759册、稿本22种377册、抄本38种122册被日寇汉奸全部劫盗;^[5]与嘉业藏书楼同属湖州的长兴金涛的花近楼,藏书10万余卷,毁于日军之手;^[6]南浔镇上与嘉业藏书楼咫尺之遥的张氏适园被毁,几成一片废墟;而宁波天一阁珍藏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鄞县范氏墓庄、丽水龙泉等地,才得以保全。相比之下,南浔嘉业藏书楼幸免于难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二

在嘉业藏书楼留存的档案中,抄录有多张日伪时期“保护”书楼及其藏书的布告。^[7]

(1) 猥リニ侵入スル者ハ軍法ニ依リ処罪ス日本军暂管军特务部

(擅自侵入者照军法惩罚。)

(2) 此ノ家ハ良民ノ住居エ付キ家人以外ノ者ハ本鎮警備隊ノ許可無クシテ猥ニ出入スル事ヲ禁ス南浔警备队长庄司正(印)

(此家系良民,除主人及家人以外,未经本镇警备队许可,严禁外人出入。)

(3) 憲兵隊ノ許可ナク搬出及出入スルモノハ軍律ニ依リ嚴罰ニ処ス昭和十三年月日大日本帝国宪兵队(大日本帝国宪兵队之印)

(未经宪兵队许可,搬出货物及出入者,依军律严加惩处。)

(4) 无宪兵队的许可搬出货物并出入者依照军律处严罚昭和十三年四月日湖州宪兵分队(湖州宪兵分队之印)

(5) 将校引口外军独见学最禁南浔警备队长铃木中尉(南浔警备队长铃木中尉印)

(须少尉以上带领,严禁单独参观)

以上5张布告抄录的日期为1938年10月10日,其中除第4张为中文外,其他的原文皆为日文。

(6) 告示该藏书楼禁止游览并不得任意取阅图书,违者严罚。大日本陆军杭州特务机关南浔事务所(印)昭和十五年十月日

该条抄录于1940年10月14日,并注明告示是由日军来楼在大门上粘贴的。

(7)浙江省吴兴县保安大队派驻南浔指挥部布告(字第廿六号)

为布告事查刘家花园藏书楼案牍累累,藏书甚富,名教人士宜保存国粹,以博参览,倘有擅自窃运,不惟暴殄精华,仰且有失斯文。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定予究办不贷。切切此布。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廿九日指挥伍志才副指挥詹森

此告示是书楼向保安队要求来的,悬于藜光阁;藜光阁系进二楼的必经之处,悬于此处大概意在保护楼上的所有藏书吧。

(8)吴兴县政府民字第一五五四号训令,内开:“案奉浙江省政府密字第三〇号训令,内开:‘兹接该县刘绅承干自沪来函,略以夙耽缥緲,寄情铅槧,于故乡南浔镇筑有嘉业藏书楼,积四十年之搜求,典籍甚富。曩昔友军抵浔,亦以文化所萃,揭示保护。近闻有人假借名义,意图私自移运,诚虑插架盈箱一旦散佚,则于乡邦文献,国家文化,损失甚巨,请求飭令所属官署严密保护等语。事关保存国粹,自当照办。合行令仰该县长转飭该管警察局严禁移运,随时保护为要。此令’等因。奉此自应遵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对于嘉业藏书楼藏书严禁移运随时保护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此令”等因。奉此,除令知该管保甲长随时注意,加以保护,并严禁私运外,合再出示布告,对于此种藏书毋得稍涉覬覦,私行移运,以重文献。仰各一体遵照为要。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廿九日区长吉佑民

此布告由区公所送来,亦悬于藜光阁。

(9)吴兴县南浔警察所示,案查嘉业藏书楼所藏书籍系刘氏经数十年苦心搜罗而成,志在保存国粹,嘉惠士林,自应刻意保护。近有不肖之徒,假借名义,私图搬运,实属不法,如经查觉,定予严惩。仰毋玩法,切切此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廿四日所长钱云轩

此条抄录于1943年10月24日。

(10)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团本部告谕(法字第贰号)为晓谕事照得小莲庄藏书楼为刘氏费数十年之苦心,搜罗古今书籍,荟萃一室,致有今日之插架盈箱,琳琅满目,不特嘉惠士林,仰且保存文粹,攸关国家文化甚深且钜。乃闻近有不肖之徒,时存覬覦,意图搬运,辱没斯文,有干法纪。本团长有鉴于斯,岂能缄默,为特恺切晓谕,嗣凡军民人等,一概不得任意借阅,以防散佚而保国粹。如敢有违,严惩不贷,切切此谕。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告谕1944年7月14日由驻镇步兵第二团送来。

三

日本侵略者真的对嘉业藏书楼大发慈悲之心,予以保护吗?其实,布告背后有玄机。前几份布告,说明日本人对嘉业藏书楼虎视眈眈,正策划着阴谋,妄图独占独吞之;后几份布

告,似与刘承干1942年的一次售书纠葛有关,意在阻止张叔平从南浔运走藏书。

(1)南浔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已视嘉业藏书楼为囊中物。他们将书楼四栅小河钉断,威逼书楼管理人员交出钥匙,多次闯入书楼,出言恫吓,抢书夺物。如:1940年3月20日,强夺楼藏赵之谦等名家碑帖和墓志铭数份;1941年4月16日,掠走《嘉泰吴兴志》等嘉业堂自印书9种;1941年5月8日,抢去浙江湖州府志3部(顺治、乾隆、同治刊各一部);至于桌椅等物,更不在话下,就连消防设备也不放过,统统被自治会“借走”。对此,刘承干非常不满,又无可奈何,“近日又有军人至敝楼取去碑帖数种,彼久已视为囊中物,何尝有公理之可言耶?”^[8]

(2)妄图以设立图书馆为名,劫夺藏书。日本“军部因保卫此宗藏书太觉麻烦,故拟劝书主人捐出,设一图书馆……不日即有人与刘君开谈。”^[9]松崎鹤雄在给罗振玉、王季烈的信中也透露,日本人准备将南浔嘉业藏书没收,移运杭州。^[10]或是由汪伪政权买收,“开图书馆以嘉惠学人。”^[11]

(3)软硬兼施,收购楼藏,制造第二个甬宋楼事件。满铁大连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都觊觎嘉业藏书楼的藏书,满铁出价40万,并于1940年初计划派员到南浔实地查看;同文有军方做靠山,在交涉过程中不惜对刘承干诉诸暴力。也许正是由于日方两个机构的“自相残杀”,收购之举最终不了了之,使嘉业藏书楼最终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4)日本人将会使嘉业堂书去楼空,精明的书商、蟬隐庐主、罗振玉之弟罗振常甚至从中觅得了商机,“嘉业全部售出以后,其邨架必不任其空,如另购应用之籍,以备检查,以课哲嗣,此实意中之事。”他希望友人“介绍此项生意,让与蟬隐承办,价目必不视他家为昂”。^[12]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沦陷时期的嘉业藏书楼,实在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5)1942年秋,刘承干曾与张叔平订立合同,将沪寓及南浔嘉业藏书楼的全部藏书13.2万册以中储券200万元让售,其中沪寓书籍作价160万元,南浔藏书楼书籍作价40万元,合同中还明确规定,“南浔书籍由张氏负责设法运沪”。但后来风波迭起,一直闹到1946年。刘承干以张叔平所付支票延期,而物价飞涨,损失过重,南浔运书事又遥遥无期为由,于1942年底提出解约。张叔平反对,他以为付给刘承干的书款140万,已逾总数一半以上,而实收之书,尚未及全数(13.2万册)之半,张氏并派人至南浔,宣布嘉业藏书楼内一切书籍均已属己所有。刘承干则认为,书价并非依册数确定,其藏书精华,已归张氏,但南浔之书,既未交接,主权仍属嘉业堂。^[13]正因为有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对1943年至1944年张贴在嘉业堂的布告中斥责的“不肖之徒”之所指就不难理解了,所谓“假借名义,私图搬运,实属不法”,所谓“意图搬运,辱没斯文,有干法纪”,都是针对张叔平的。刘承干以满清遗老自居,有一批亲日分子乃至汉奸的朋友毫不奇怪。据其日记记载,为助朱祖谋遗孀解生活之困,他曾托褚民谊并经过梁鸿志,让汪精卫个人出资,购买了朱氏的《彊邨丛书》。^[14]湖州沦陷后,担任吴兴县自治委员会委员的莫叔未也与刘承干相识。^[15]他通过各种关系,让当地

当权者阻止张叔平擅自取运留在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

1924年南浔嘉业藏书楼落成后,已定居沪上的刘承干每年都会携眷回故乡在楼中小住。南浔沦陷后,刘承干有故园而不得归,楼中一切交由施韵秋管理。施韵秋1924年即来楼工作,忠于职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书楼及藏书作出了努力。

(1)南浔沦陷前夕,日军飞机常常飞临南浔上空,为了防止书楼万一被炸后藏书灰飞烟灭的惨剧发生,施韵秋将楼中多种珍藏的首册或末册装进百余只麻袋里,秘密转移到刘承干在南浔镇南西街203号住宅的阁楼上。1951年浙江图书馆与嘉兴图书馆联合接管时,刘承干告知了这一秘密,才将这批书回归书楼,经当时清点尚有1300余册。^[6]传说日本人因嘉业藏书楼的书残缺不全而对之失去兴趣,终使书楼幸免遭劫,保存下来,即是基于这一背景。

(2)南浔沦陷后,嘉业藏书楼实际上已为日本人所掌控,如何将藏书偷运到上海成了刘承干日思夜想的心病。施韵秋频繁来往于南浔和上海之间,为组织实施偷运不辞辛劳。抗战前,嘉业堂的少量精品已易主,若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抄本《明实录》等,但绝大部分仍贮藏在书楼。当时,书楼经常将自印书装在麻袋里托开往上海的客船带沪,从未发生意外。这大概启发了刘承干,后来,南浔嘉业藏书楼的精品收藏正是利用这种方法分批偷运出去的。从1939年6月至1942年12月,共计抢救出古籍精品6万余册。

辛亥革命,新旧交替,风起云涌,为刘承干崛起藏书界提供了天时之利,1924年他将收藏的近20万册图书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回故乡;日军侵华,南浔沦陷,书楼危殆,中华民族危难之秋,刘承干又悄悄将珍藏从南浔运到上海,后来,这些书全都售于他人。刘氏藏书从上海到南浔,又从南浔到上海,三四十年间,聚散何匆匆!

注释:

[1]王克文主编.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志[Z].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995年12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南浔镇志》则谓:“18日下午4时日军从震泽分2路占领南浔。”)

[2]周子美.周子美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嘉业藏书楼杂务记录(第三册)[Z].原件存浙江图书馆档案室.

[4]王克文主编.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志[Z].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5]崔泉森.嘉兴市图书馆百年历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4,(4).

[6]乐敏,赵建民.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劫掠[A].见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一辑)[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

- [7]嘉业藏书楼杂务记录(第三册)[Z].
- [8]刘承干1940年4月3日致王季烈的信.见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中)[J].文献,2003,(1)
- [9]罗振玉致王季烈信.见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下)[J].文献,2003,(2)
- [10]松崎鹤雄2月18日致罗振玉信.见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下)[J].文献,2003,(2)
- [11]松崎鹤雄致王季烈信.见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下)[J].文献,2003,(2)
- [12]许汝棻10月初2致王季烈信.见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中)[J].文献,2003,(1)
- [13]吴格.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聚散考略[J].台湾书目季刊,2004,(4)
- [14]张廷银.嘉业堂藏书流散过程中的动态文化内容—也谈书信的文献价值[J].台湾书目季刊,2004,(4)
- [15]嘉业堂杂务第三册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四日。楼主来信囑送莫叔未书三种—续通考、晋书校注、旧五代史各一部,因装一竹箱交招商局寄湖州马军巷八号。”
- [16]刘承干1951年7月26日致张宗祥的信.原件存浙江图书馆

参考文献:

- [1]嘉业藏书楼杂务记录(第三册)[Z].原件存浙江图书馆档案室.
- [2]王克文主编.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志[Z].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 [3]周子美.周子美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4]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上)(中)(下)[J].文献,2002,(4)—2003(2)
- [5]吴格.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聚散考略[J].台湾书目季刊,2004,(4).
- [6]张廷银.嘉业堂藏书流散过程中的动态文化内容—也谈书信的文献价值[J].台湾书目季刊,2004,(4).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图书馆)

孙中山读书生活的文化价值

沈春樵 张 真

【摘要】 孙中山先生一生酷爱读书。他为追求革命真理勤奋读书,取得了渊博知识和高深学问。他推翻了封建帝制,为创建民国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的读书方法和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关键词】 孙中山;读书生活;文化价值

一代伟人孙中山,毛泽东主席称他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江泽民总书记称他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创建了共和国;并能与时俱进,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新三民主义,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孙中山毕生酷爱读书,从他读书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为革命获得的渊博学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除源于他艰苦卓绝的实地考察外,无疑来自于他孜孜不倦的读书学习。

一、读书树立革命大志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中。由于家贫,6岁起就参加农业劳动,有时还跟外祖父驾船出海。他9岁开始入村塾读书,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等启蒙读物。稍后便是《古文评注》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孙中山小时读书,不但用功,而且悟性高。他的提问往往使老师非常震惊,得到老师的称赞。

孙中山在村塾读书时,就听到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的革命英雄形象,逐渐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下决心,要学习洪秀全,做洪秀全第二。他看到香山一带的差役到翠亨村来,不是催粮,就是逼税,要么就是蛮不讲理地抓人、派差。翠亨村有座花园,主人被押走,花园被官吏霸占。孙中山忍不住说:“这花园是我爸爸朋友的,你们为什么把他们加上镣铐捉走?为什么把他们杀的杀,关的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有一天,孙中山眼看着水盗冲进一位侨商的家,扛走了几个箱子、包袱及其他东西欢呼着跑掉了。侨商从碎砖破瓦堆中爬了起来,绝望地哭喊道:“我完了,水盗把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去了。多少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洋人的地方做苦工,积攒的金钱全部被强盗抢去了。我假如留在洋人地方,那边有真实的首领,有法律的保护,而在中国地方却只有禁令没有保护!”幼年的孙中山目睹了这一情景,听了这位侨商的哭诉,心想:“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法律?为什么这个侨商冒了生命危险挣到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思考的结论,是洋人那里有惩治水盗的权力。于是他决心去外国看看洋人治理方法。

对于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和贪官污吏欺压人民的种种黑暗现象,使少年孙中山对旧中国这种制度和政府产生怀疑和不满,萌发了向往外界的念头,促使他为追求真理而勤奋读书。

1879年6月,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他的出洋之志实现了。当年9月,孙中山进入夏威夷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刚进校时,孙中山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认识,更听不懂用英语讲的课。开头几天,孙中山觉得学英语太难了,心中非常着急。十几天后,孙中山渐渐发现,英文每个单词都可以分成若干个字母,这些字母重新组合又成为另一个单词。英语千变万化,总不过是26个字母的不同组合而已。有了这个发现,孙中山突然觉得英文其实比学汉字还要容易。为了在功课上赶超其他同学,孙中山在上课与参加劳动外,抓紧自修。孙中山好读史传,对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等伟人勋业,尤其景仰。因所读传记皆为英文,所以孙中山英文进步甚速,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毕业典礼上,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为他颁了奖。

从1879年9月到1883年7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接受近5年的英美式教育,这对他一生的生活道路、社会交往、思想价值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的美国友人林百克,在其《孙逸仙传记》中说:孙中山“终身应用英语,非常流利,非常正确,发音是美国式的……他在数十年中,尽力于建造民国,所用的大半是粤语国语,但是他的英语没有一点儿错误。”除英语外,孙中山在这里,还学到以前在故乡村塾中无法学到的新鲜知识,知道了世界上学问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另一类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军事学等等。从老师那里获得了对英美历史和现状的初步了解,加上他自己在檀香山的亲见亲闻,为日后孙中山以英美为范型构筑中国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取向打下了思想基础。

1883年11月,孙中山在香港就读于拔萃书室。该校在教读英文的同时,也开设有西学知识的课程。此时的孙中山已成年,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没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是不行的。为弥补自己这方面的欠缺,在课余时间,他开始跟中国籍

基督教牧师区凤墀学习中国文史。当年12月退学。

1884年4月,入香港中央书院。

1886年秋天,孙中山由香港中央书院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作出这个选择,是孙中山长时间反复权衡的结果。他决定学西医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广州的《述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些关于“选医从军”、“创设营医”、“西医从军”的报道,说明西医在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这使孙中山认识到,学西医亦可充军为国效力。第二,是孙中山“以医亦救人苦难术”,既能济世活人,亦是谋生之道。第三,是西医学堂容易进。他认为:一方面致力于政治,一方面致力于医术,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同时争取,也许会有收获。

关于孙中山在南华学堂读书期间的的生活情景及给人们印象,据同学回忆,说他:“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他在认真学好学堂规定的这些医学课程的同时,继续跟人研读中国经史文集。为适应诵习古典文史的需要,孙中山节衣缩食,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当时学堂功课繁重,学好已属不易,孙中山购买的二十四史这在其他同学看来,不过是徒供陈列以炫博学而已。一次,有位同学想考孙中山,随意从书架上二十四史中抽出一册,提问,孙中山马上作了圆满的回答。接着又考问了几册,孙中山均回答无误。同学们感到十分惊奇。加上孙中山在与人谈论时,广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们都戏称他“通天晓”。孙中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课下常与同学纵论时事,商讨救国之策,声称:“以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听者多倾心折服。

1887年秋,孙中山投考香港西医书院,一去就是5年,他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不仅是同班同学中最优秀的,同时也是该院历届毕业生中最杰出的。

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和广东求学时,是一个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的学生,但他并未因此而淡忘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甚至可以说,正是后者为他发愤苦学,博览群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檀香山接受近5年的英美式教育和香港学医期间,孙中山已经萌发了朦胧的反清念头。在第一次出洋檀香山在回国途中,遭到清政府海关的稽查人的敲诈勒索时,他义愤填膺地向同船旅客讲解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鼓动说:“中国在这帮腐败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在港穗两地读书近9年,这对孙中山来说,无论在文化科学知识的增长上,还是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都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在香港读书8年,给孙中山的影响最大,所以,香港被孙中山称作他知识的诞生地和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孙中山在香港、广州读书时以喜欢购书著称,他将书保存在同学关景良家中。据关景良追忆,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专心致志于学业,勤恳非常,白天习读医学,夜间研究中文,常见其半夜起燃灯诵读,其最爱读的是《法国革命史》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孙中山虽然对达尔文相当

推崇,但他对西方学者将达尔文学说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多有批评。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课下常与同学谈天说地论革命话题。同学关景良的母亲黎氏,因孙中山是儿子同窗好友,常邀孙中山到家作客。她见孙中山言论激烈,就问孙中山:“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答:“不。”又问:“想做钦差吗?”孙又答:“不。”“那么,你想做皇帝吗?”孙中山说:“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皇帝更高大了。”孙中山也认定:“大学毕业之后,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以上充分表明了除当时社会现状对孙中山的影响外,勤奋读书使他树立了革命大志。

二、读书积累高深学问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包括民族、民权及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案,用以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三大问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三民主义”形成,与他读书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在他演讲“三民主义”表达民族主义对文化的态度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十分丰富,其中有不少是外国不曾认识的。他声称,他的民族主义就是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其优点,改正其缺点的结果。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孙中山认为,近年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都是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如中国古代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说到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来的事。在数百年以前,欧洲还是不及中国,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在讲民族主义道德忠孝时,讲到孝字,孙中山认为中国尤为特长,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里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在讲到仁爱时,他说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代讲爱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除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外,孙中山认为,固有的智力和能力也要恢复起来。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还主张恢复固有的能力。他说,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

认为中国人的能力不及外国人,殊不知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却比外国人的能力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如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人类衣食住行的许多东西,如茶叶、丝织品、拱门、吊桥等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孙中山十分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尽力发掘其中有用资源,用作培养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宣传材料。但他并不是那种深闭固拒、嗜旧成癖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国粹主义者,而是对中西文化采取冷静分析取长补短的态度,主张对中外文化要防止其弊端,汲取其精华,重新构筑中西合璧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政体。

孙中山在长期实地考察欧美民主共和制度下的社会状况的同时,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书本上研究其民主共和理论,阅读过大量有关著作。他在宣讲民权主义时,批驳外国人说中国不宜用民权的谬论。并指出:中国的进化比欧美还要在先,民权思想甚至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孔子孟子就主张民权。只不过那时候不能实现。孙中山的这些见解很可能与他早年流亡国外时随带黄宗羲的《原君》《原臣》有关。他所举的孔孟言论,是中国古代民为邦本、大同理想的表现,其中包含着古朴的民主平等观念,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他又引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用《民约论》中说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的立论,来形容民权的潮流。孙中山说:“……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中国革命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战争。

在讲到平等时,他说:什么叫做平等?平等从哪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譬如美国在革命时候的《独立宣言》、法国在革命时候的《人权宣言》,都是大书特书说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他人不能侵夺的。

在演讲到用什么方法解决民权的实施问题时,孙中山自称他发明了欧美学者没有发明过的新理论,这就是权与能分开的理论。他举《三国演义》中蜀国的诸葛亮辅佐阿斗的历史故事说: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托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立。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从理论上讲权能可以分开,那么,从具体制度来说,人民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政府应该拥有哪些权力?孙中山提出,办法就是从间接民权改变为直接民权。即人民在县以下政区拥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四权就是孙中山要达到的民权,是保证人民管理政府这架机器的关键。在政府方面,要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督权。人民的四权和政府的五权相互制衡协调,才能既扩充人民的权力,又发挥政府的威力,中国就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在讲到民生主义时,孙中山说,什么叫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

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大同主义。既然如此,孙中山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叫社会主义,而用民生这个中国古老名词呢?这就需把社会主义一词的来源、性质、和定义分辨清楚。由于孙中山能直接阅读英文书籍,他一直留心研究关于西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的学说,所以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了如指掌。他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现代在外国是一样并称的,其中办法虽各有不同,但通称都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有人将社会主义同社会学一样看待,这实在是一种混乱。英文社会这个名词为Society,社会学是Sociology,社会主义是Socialism,这三个英文名词前一半的字母都是相同的,所以许多人便产生混乱。其实,社会主义的英文单词Socialism,是从希腊文演变而来的,希腊文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国俗话说伙计一样。社会学则是研究社会情状、社会进化和群众结合的现象;社会主义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即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本意就在正本清源,把这个问题的真实性质表达清楚。

孙中山认为,几十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书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种,各种学说之多,真是聚讼纷纷。在马克思学说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陈义甚高的理论,脱离实际很远,这一派被称为乌托邦派。乌托邦和中国古代黄老所说的华胥氏之国意思相同。乌托邦派之所以出现,是由于那些极有道德、悲天悯人之士,见人类受了很多痛苦,于心不忍,却又无力改良,所以只好说理想上的空话,作一种希望寄托。至于怎样具体实践,却丝毫没有想到。马克思出世之后,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社会问题作一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马克思的发明是全凭经济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马克思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全凭事实,不尚理想。所以孙中山称赞说: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马克思。马克思对于社会问题,好像卢梭对于民权问题一样,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的圣人。他又说: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许多重要观点,都作了介绍评判,表明他对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从中当无疑问孙中山阅读过马克思著作以及西方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也表现了孙中山宽广的知识视野。

为三民主义的演讲,孙中山事先事后,参阅引证了中外古今大量的书籍,仅在民权主义部分,所举书目就有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曾孝谷《黑奴吁天录》,柏拉图《理想国》,罗贯中《三国演义》,廖仲恺译《全民政治》等等。将深奥的三民

主义演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听众保持浓厚兴趣。

孙中山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水平和言谈风度令人倾倒。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对孙中山的演讲情景作了如下的描述:中山有一次演说,环聚而听者无数,中外人都有。在一个大厅里面,声音是很不容易传达到四处的。中山说了几句开场话之后,向前面走几步,听众掌声雷动。他静默移时,再前进一步,掌声又起,夹杂一片欢呼声。他等了等,将手举起,听众肃然,寂静无声。中山仍举手静默,屹立不动,乃开始演说。他演说时,差不多换了个样子,骤然响朗的声音,人中如有电力。他的话句句真实,字字迅疾。他的声音,准确锋利像机关枪,高下疾徐,如合音节。他的演词平稳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然静立在讲厅回声中间,而他的话已经深入听众脑筋里了。听众的欢呼声鼓掌声又起,中山如立在海岸上,看海里的波浪,很是静。他再举手,喧闹之声立静,他又雄辩滔滔地演讲一回。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博大精深学问的形成,是他对中外社会考察和勤奋读书的结果。据研究者统计,在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中,提到70余个国家、地区近2000个地名,古今中外人物1万多名,重要事件100余件,提及各种主义、思想学说约150多种。这进一步说明孙中山不仅对于欧美各国各种主义、思想学说和宪法等有关书籍进行精心阅读,并且加以综合,详细比较分析,了解其理论与实际的演变及得失利弊。由于孙中山读书的广度和深度,使他积累了高深的学问。

三、宝贵财富

孙中山的读书不但成为其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他的读书方法与经验也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

第一是不怕困苦,勤奋读书。孙中山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困苦颠连的国外流亡岁月里,还是在日理万机国内军政活动中,无论是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发展之际,还是在屡起屡仆的挫折失败之时,他如饥似渴的读书热情,丝毫没有衰减过。经济窘迫时,他可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工作繁忙时,他可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危难面前,他可以镇静自常,置生死于度外,他唯一不能忘怀的是读书。

1896年9月底,孙中山赴英国,被清朝驻英公使馆的密探监视,于10月11日上午被绑架囚禁,经各方营救被羁押了12天的孙中山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孙中山获得自由后,继续留在伦敦。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去得最多的是大英博物馆,并在那里获得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据清公使馆所雇司赖特侦探报告孙中山获释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度过的。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孙中山几乎每天都在大英博物馆读书。

例如,1896年12月5日,孙中山于上午11点去霍尔庞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然后去附近邮局书店选书,接着又乘车前往大英博物馆。又如1897年4月9日,孙中山于上午10点半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下午2点去金谷面包公司午餐,之后仍回到图书馆,直到下午7点离开。所以侦探在4月18日的报告中称:“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变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地方,孙中山来到伦敦时,马克思的学说已经在欧洲广泛流传。对于正热衷于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了解和比较研究的孙中山,研读了《资本论》,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英译本)及大量有关书刊。

孙中山在伦敦从事写作的同时,抓紧一切时机读书。据康德黎说,此次在伦敦居留期间,孙中山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矿产与矿物、农业、工程、牲畜饲养、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都引起他的注意并且坚持不懈地加以细心和耐心地研究。孙中山除借阅康德黎的藏书外,还用他并不宽裕的旅费来买书。根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1897年前出版的书目共有106种,从科学分类看:政治8种、经济6种、社会8种、军事5种、法律7种、哲学2种、文学11种、传记5种、宗教3种、历史26种、铁道5种、天文地理6种、医学2种、其他2种。在这藏书中可能包括有这次在伦敦期间购买并保存下来的书籍。为了买书读书,孙中山宁肯省吃俭用,有时一连多天每顿只吃几块面包。1908年,孙中山到达伦敦后,湖北留学生曹亚伯见他旅费告罄,连食宿也有困难,便在同学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镑交给他,可两三天后,当曹亚伯再去看他时,见他已将钱全部买了书。1913年8月,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东京,当时他囊空如洗,不名一文,日本政府又逼他离境,同时还要提防袁世凯所派杀手的跟踪,在这种穷困险恶的处境下,孙中山行装甫卸,便开始了读书。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孙中山在永丰军舰上与叛军对峙50多天。时值南国酷暑季节,船舱内闷热如蒸笼,甲板晒得似烙铁,人们终日大汗淋漓。孙中山来永丰舰时,只穿夏布长衫,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要随时防备叛军的袭击轰炸,困苦是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孙中山每日除商议进止及接待来舰的人士和手草函电促各路讨贼军进攻叛逆外,其他时间仍危坐读书一如平时。当永丰舰驶向白鹅潭,叛军以永丰舰为主要目标发炮轰击,叛军密集的炮火使舰身几处被击中,舰上多名士兵伤亡,形势非常危急,孙中山依然站在甲板上指挥。为了安全,孙中山被官兵们劝下到舱房里去。在舰队冲过车歪炮台后,卫士马湘下舱去看孙中山,发现他正端坐在那里看拿破仑传。

孙中山嗜书如命,源于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孙中山提出,人类为什么要求知识?因为世

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人类不知道的,又因为世界文明,要有知识才能进步,才能进步得快,人类要追求世界文明进步,所以就要求知识。对于个人来说,求知识还是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孙中山表示:“人生就是战斗,战斗必要有枪,人好比是一支枪。但光有枪还不行,还要有充足的子弹,广博的知识就是子弹。空枪上阵,仗是打不得的。”读书对于孙中山既积累了知识,又提高了革命本领。

第二是书为我所用,不被书奴役。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曾谈到自己读书的方法与经验,他说:“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可见他是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主张不做古书的奴隶,而要做主人。他读书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为了革命,学而致用。例如,孙中山认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但不是今天的科学家,而且当时科学尚不发达,所以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这在当时动辄以孔孟为立言根据,特别对几千年顶礼膜拜孔子,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崇古观念,是公开的挑战。

1904年1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一文中,针对《新中国报》将达尔文误作法国人,并称达尔文有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孙中山运用自己早年熟读达尔文之书,了解达尔文生平的优势,指出,达尔文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时,他还未出生,当第二次革命时,他还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时,他尚未出名。孙中山用确凿的史实批驳了保皇派的论据。针对该报文章用“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以恐吓人们不要进行革命的企图,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作者既然知道法国三次革命都发生在巴黎,此外无死于革命者,那么巴黎当时总共有多少人口?……即使巴黎全城人口全部死于革命,三次统计起来,也不到一千二百万之数,难道该主笔以一人重复计算几十次得出的统计数字吗?孙中山运用公认的历史事实,严密的逻辑推理,将保皇派谬论批得体无完肤。

孙中山从很早起,就对西方人鼓吹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是一种野蛮的学问。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他对那些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外国列强,更是不遗余力地谴责。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立场出发,孙中山申明,即使中国将来强盛,也不称霸。

孙中山在读书学习上,既不为中国古人所役,也不为外国洋人所惑。尽管孙中山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虚心学习别人长处,为己所用,先要学习欧美,然后才能赶超欧美。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学习外国,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迷信盲从,照誉照搬,而是要取长补短,迎头赶上。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民情风俗习惯与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 and 欧美不同,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我们只能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

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遭受危险。

由于具有上述正确的学习态度,孙中山才能做到融汇古今,沟通中西,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中国国情的需要进行新的创造。正如孙中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者,有吾所独创者。”

第三是不耻下问,虚心读书。读书既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声名利禄、飞黄腾达,而是为了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安乐,所以读书一定不能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孙中山告诫同志说:“一般人读书不认真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孙中山不但这样告诫同志,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实业计划》要出版中文单行本,他请人提出修改意见,并在序言郑重声明,这份计划只是一个粗疏的大纲,不能作为具体建设的根据,“非待专门家加以科学之考查与实测,不可遽臻实用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建设计划是这样,对某些细节问题,孙中山也不马虎。《孙文学说》第四章提到他的朋友李石曾从前曾在法国微生物学专家巴斯德门下求学。书出版后,孙中山特送李石曾一本,问记载有无错误。李石曾指出:“我虽然曾经入巴斯德学院学习,但当我入学时,巴斯德已经去世。所以您在书里说我曾游于巴斯门下,是不准确的。”孙中山听了,表示要在再版时改正过来。有一次在广州演讲,讲到修身时,孙中山说,西洋人修身,出门则衣履整洁,纽扣必结,剃须修面,指甲剔除污垢,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现在中国人在修身方面反不如外国人。演讲后回到大本营,孙中山向刘成禺及但焘介绍他在会上所讲上述内容,刘和但都表示:“恐怕先生讲错了。中国的修身,是指品性的修炼。所以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以身作则乃为士民之范,在内行也。先生标举西洋的修身,属于个人卫生,在中国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亦即外表的修饰,而不是内行也。”孙中山听后,沉吟良久,忽从椅子上起身,说:“那不是我错了吗?”刘成禺和但焘说:“可能是不准确。”孙中山说:“演讲速记稿已经送往各报馆付印了,怎么办?”身边工作人员建议:“马上派人取回原稿,就说速记稿错了,需进行更正。”于是,派守桥队长邓演达连夜骑马往各报馆把演讲稿取回来,由孙中山重新作了修改。又如,孙中山在做学问时,询问邵元冲有关中国制造舟车及发明火药之起源,有何参考书。邵答,有《格致镜原》、《事物纪始》等书可供参阅。又询问有何书备陈中国周秦学术源流,而列举出处,无割剽袭之弊?即当举马驥《绎史》对曰。又有一次,撰写《孙文学说》时,欲详知明代郑和遍历南洋故实及当时海舶的构造,邵举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孙中山嘱其都予购置,以备参阅。

这就是孙中山的读书生活。从中就可看到读书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读书,使孙中山具有高深的学问,读书,使孙中山增长了革命的本领,读书,成就了孙中山一

生的伟业。

孙中山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首先是他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而他一生酷爱读书及其追求真知、学以致用科学态度,也是我们的宝贵范例,值得发扬与学习。

参考文献:

- [1]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册)[C].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 [2]张白影.努力读书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J].图书馆论坛,2000,(3)
- [3]张兰英,武夷樵.孙中山的文化思想及现代启示[J].前沿,2004,(5)
- [4]廖大伟.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 [5]沈道初.略论孙中山读书生涯[J].学海,1996.
- [6]曾成贵.三民主义:共产国际的解释与孙中山的理论创造[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 [7]张笃勤.孙中山的读书生涯[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 [8]张新洲.如何让读书成为习惯[J].人民教育,2006.

(作者工作单位:沈春樵,浙江图书馆;张真,中国美术学院)

曾国藩的藏书思想及读书理念形成略述

刘日升

【摘要】 本文详尽讲述了曾国藩丰富的藏书思想以及其读书治学的理念。

【关键词】 曾国藩;藏书思想;读书治学

曾国藩(1811-1872),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原湘乡荷塘二十四都)人。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人们对曾国藩的了解,因为他的政治、军事名声太威,而淹没了他的文化藏书形象。因而世人对他的藏书贡献知之甚少。曾国藩的藏书思想,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刻意寻求原版珍本,以实用为主,广搜博采,特别连家信、奏稿都逐年装订成册,重视保存,不弃零星资料,又重视编目,设专人管理,这在私家藏书中也极为少见。对时下正值全国倡导建设学习型、终身学习型社会,此文试图使人们清楚地了解曾氏家族藏书、藏书楼,为提倡读书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作此探讨。

一、为读书而藏书,为经世致用而藏书

曾国藩是一个为读书和经世致用而收藏的藏书家。经初步考证得知,他的藏书活动始于道光十六年(1834),《四库全书》之富,诱发了曾国藩对书籍的嗜好。而参与文渊阁藏书的管理,对其一生酷爱藏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曾国藩的藏书形成了浓郁的为我所用、经世致用的体系。除经史子集等大部头的藏书以外,还兼收天文地理方志。收藏碑帖也是曾国藩藏书体系中的一大特色。概言之,其体系之完善、内容之丰富,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绝。曾国藩的藏书意识、藏书收集到最终形成藏书思想和藏书体系,是他在京师期间生活的14年逐渐形成的。

当时的京城有一条有名的文化街角琉璃厂,位于京城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故得名。旧书肆在此形成后,读书人好到此购书,俗称“逛厂”或说

“浏览场肆”。至清乾隆间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设有书铺30余家,当时曾国藩供职于文渊阁,管理的是国家藏书,他去那里购书,一是书籍颇多,门类广泛,对他这个读书人来说,是个难得的好场所;二是此处多为旧书,也可以省些钱多购书。曾国藩逛书市,常常流连忘返,穷日不倦。其访书购书至此已小有名气。因而和书铺老板往来甚密,有些老板有时也早晚来会曾国藩,多为呈送样书或通报书籍信息。与袁漱六(是儿女亲家)在京相处八年,京师访书购书穷日不倦,曾自称为“书痴”,袁自称为“书迷”。有时两人终日泡在书肆。每觅得佳书,即互为出示,认真考证,共同欣赏或赠之对方,“书痴”与“书迷”购书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曾国藩的藏石也就是遍访琉璃厂而初具规模的。为了更加丰富、充实其藏书体系,道光咸丰年间,在京师的曾国藩向做外官的师友求书是常有的事。如袁漱六出京到了松江府,曾国藩多次开列清单,托其买书,上求天文星象,下求舆地图册,经史子集、百科全书,无所不包。“似欲操之一切”。他以吏部侍郎先后兼署兵工刑吏五部,凡需用之书,便具函求取。充分说明他为读书而藏书,“不惟书”而讲求经世致用而藏书的指导思想。

二、藏书不受价格限制

曾国藩收集藏书,只要其喜爱是不受价格限制的。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恩科”试罢,沿大运河而下,作江南之游。此时的曾国藩本系借债赴京赶考,此时已囊中羞涩。船过金陵,曾国藩上岸游览这六朝古都。在书肆,他看中一部《二十三史》,为之心动,遂向同乡知县易作梅借得银两,并典当衣物购得《二十三史》。从读曾国藩家史中得知,从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开始兴家,但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光宗耀祖。曾国藩其父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只捞到一个秀才,此时见曾国藩典衣买书且喜且诚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尽力想法替你偿还,如你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可见,曾国藩家族对读书人,特别对喜欢读书的人的厚爱。关于曾国藩及其一家特别是曾国藩本人,爱书、嗜书、买书、收书、藏书的故事很多,能充分说明曾国藩藏书思想不论在何时都是系统、完整的。

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些书已相当昂贵,如宋版书,有的竟以页论价。曾国藩在京期间,京城的旧书籍大部分从外地贩进,相对来说,书价还是昂贵的。穷翰林院不如外官富裕。曾国藩也不例外,有些书的书价贵,但又喜欢买书、藏书,有人说曾国藩嗜书一生,一点不假。因此他常托在外地做官的好友购当地新出之书。特别是添置大部头的旧书,这样不但能够节省不少钱,节省下来的钱还能买不少的书。同时,我们还看到他和许多友人的书信中,就有很多他不遗余力收藏图书的事例。他在《致陈岱芸》的信中写道: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

三、收藏图书特别讲求质量,不遗余力

由于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觅书已久并自称“书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版本鉴别能力和书籍真伪的识别能力。因此,曾国藩购书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喜欢自己或请人“逐页翻查”,要经过一番查考,发现错误比较少的书才买。曾国藩藏书的质量,可从他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时随身所带的书籍清单即可反映出来,既有数量,质量也很高。宋元旧书籍,亦有见之编录。

曾国藩逛书肆,常常流连忘返。见到好书还免不了与人争购。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日的日记中写道:“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家,倘所谓喻利者乎?”不为名利争,只为书籍争,因而他的一生是充满了爱书、求书、藏书的生涯。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给他的诸弟的信中说:“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唯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也,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有的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存一物以为官囊,一禄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卷第117页)以后,他从政、治军也没有丢掉“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这一宗旨。

四、曾国藩的读书、治学理念

曾国藩的一生能成就大业,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和他的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治学观上,曾国藩继承了儒家学者的传统,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他的眼里,经世之学亦即礼学,“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经世致用思想具体到治学观上就是治学要落到实处,既要明白义理所在,更要讲究“格物”、“诚意”的效果。曾国藩还总结出自己一套治学方法。其一是“强调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其二“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他曾告诫子弟:“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不可兼营并骛,兼营必一无所能矣。”据资料记载,曾国藩青少年时期的文章就能“句子顺理成章,偏偏露大志”。在他购得《二十三史》以后,就下决心按其父的心愿圈点一遍,并读“间断不孝”,从此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翰林院以后,他就拟订了“日课”:每日早起,习大字一百;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酉课至亥课读集;学习心得载《茶余偶谈》。拜唐鉴为师后,曾国藩于1841年3月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读书

之法”和“修身之要”。唐鉴告诉他：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他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地全部经书都要弄通，那就会一种经书也弄不通。关于修身之法，唐鉴告诉他：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曾国藩遵循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每日读书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检验所学的知识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一生甚勤，不仅在京任职时严于律己，刻苦钻研，作战及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不愿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习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他觉得义理、经济、辞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摒弃门户之见，博采众长，无疑是他明智之处。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学者，变成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渊博的学识以及用心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五、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前面已谈到，曾国藩的学习不论是或行军或作战或政务繁忙，都不曾忘记或停止过学习。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首次得差，奉旨典试四川，充乡试正考官。七月初八由京赴蜀，十一月二十日回到京，时间只有四个半月，但他所带书籍却有一万余卷。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七》上有一份曾国藩亲笔著录的《书目》，共八页。它虽然只著录了各种图书100余部，如论卷数却万卷有余。其中的《二十三史》、《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子史精华》等四部书，就有四千余卷。经考证：此书目与曾国藩去四川典试时所带衣物装箱清单等排列在一起。这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份书目不是曾国藩在京师初期藏书的目录，而是当时一份“装箱书记”的清单。从京师到成都路程万里，写书近万卷，证明他的学习是不间断的、刻苦的。

曾国藩一生的62年里，其在仕途上发展是一帆风顺的。“服官三十余年”政务繁忙；又带了二十年的兵，打了十余年的仗，戎马倥偬。尽管这样，他在学术研究上留下的著作却特别多，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他的诗歌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他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同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一样，对曾国藩家族，对湖南，对近代中国都是特别强烈和深刻的。

六、曾国藩读书精神为世人之楷模

曾国藩不但爱藏书、爱读书,还要求其弟子做学问者一定要辨清学术,考证源流。曾国藩提倡认真读书并深得要领,强调要读“四书”,在他的家书中多次提出自己的读书观:只要自己肯发奋、下工夫,什么地方都可以学。“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若不能发奋自主,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曾国藩家书》上卷第8页)。他自己读书修炼之余,还勉励其弟发奋读书。“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读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读,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主课程,必定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需要带在身边,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从之。从此处可以看出,做学问者,不必择时择地,但必须具有恒心,恒心则学业成,则学识深。(《曾国藩家书》上卷第15页)

曾国藩读书很注意持久精读。他自创立的人生“四法”,几乎都是在谈读书习作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书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曾国藩家书》上卷第22页)

纵观曾国藩人生,他做官不嗜钱,但爱书。曾国藩读书、爱书还见于他建造了一座长42米、宽9米的三层建筑物,面积1100余平方米,人们称为“公记”的藏书楼。他一生除从政、治兵外,读书买书看书编著图书是他唯一的嗜好。“公记”藏书楼经其广泛搜罗图书,积累资料,充作藏书,力行不怠。据有关资料记载,总计藏有10万册之多(《曾国藩故园》第123页)。在曾国藩的影响下,读书成风,收藏甚丰,富厚堂的四座藏书楼藏书约30万卷,珍贵字画近千幅(《曾国藩的故园》第119页)。

曾氏家族从曾麟书的利见斋、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及郭筠的艺芳馆、曾广钧的环天室到曾宝荪的思云馆,一家五代7个藏书家,建有五类藏书楼,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罕见的。据有关学者介绍,其规模之大,藏书之多,在晋、鲁、豫、江、浙、皖、鄂、赣、湘九省及京、津、沪三市近百座私家藏书楼中,没有几家可以与之相比。曾氏家族藏书,其外文、医卜、星相、数学,以及太平天国史料的专藏,其文献价值更是其他藏书家难以追比。这些,更加充分肯定了曾氏藏书楼在晚清藏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工作单位:湖南《曾国藩研究导报》提供)

析朱希祖藏书

匡淑红

【摘要】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先生在藏以致用的藏书观指导下,斥巨资聚书,藏书种类齐备,重点突出,注重对藏书内容的研究。朱希祖先生的藏书实践是学术研究与藏书整理紧密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其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体现了朱氏父子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轻财重义的高贵品德。

【关键词】朱希祖;郾亭藏书;藏书史;近代

自明代胡应麟至今人唐弢,人们把藏书家分成各种类型。综而述之,不外乎三种,即读书的藏书家,鉴赏的藏书家和蓄财的藏书家。第一种是为读书治学而藏书者,我们又称之为学者型藏书家。他们将所藏之书的功用充分发挥,于此基础上研习学术,贡献社会,功其大焉。近人朱希祖即为一代表。

朱希祖先生(1879—1944),字述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著名史学家。在藏以致用藏书观指导下的藏书活动显现出聚书力度大,种类齐备,重点突出,注重对藏书内容研究等特征,被台湾学者苏精列为近代藏书三十家之一。

本文欲就朱希祖先生藏书的上述特点加以论述,并考究清楚其书藏的最终归宿。

朱希祖先生开始收书藏书活动的具体时间,于文献中无明确记载。苏精在论述朱希祖先生治晚明史时云:“朱希祖留学日本时,因为受章太炎影响的缘故,已经有意从事这方面的蒐集研究,民国二年后他执教北京大学,便开始肆力收藏有关南明史料……”^[1]朱元曙先生的回忆文章讲:“他开始藏书大致始于日本求学时代,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2]两种说法大体相似,后者更为明确,作为朱希祖先生的后代,朱元曙先生的表述则应更为可靠。于是李培文先生认为:在日本留学时,朱希祖先生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1913年进入北大后由于经济上转为实足,朱希祖开始全力聚书。”^[3]

1924年,朱希祖先生购得一部明抄本郾道元《水经注》,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

出,而宋本现存均已残缺不全,故不得不推此书为第一。朱先生大喜,遂以“酈亭”名其书室。且请恩师章太炎题署,从此踏入藏书家行列。

综其文献记载,朱希祖先生的聚书活动显现如下特点:

其一,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朱希祖先生聚书往来奔波不惜力气,其于购书之执著态度实令人敬佩。检其未刊日记,此类情景多有记述。1929年2月21日记:李清《南渡录》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为此书,访求十余年,多方求购不得。是日,某书店来电话说有此书,于是急驱车前往,至则大失所望,原来只是南宋辛弃疾的《南渡录》。该书一直为朱希祖先生所记挂,后分别从北平图书馆和朋友处抄录两部,然又互有出入。直到1937年2月,朱希祖先生才从平湖葛小严家见到原稿,喜出望外,且欣然为之作跋。凭着这种不懈的精神,及对版本的鉴别能力,不但其藏书日渐增多,且其知名度于旧书业中亦得以不断提高。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有一段描述朱希祖购书情形,“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希祖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其二,朱希祖先生聚书除不惜精力与体力外,亦不吝惜钱财。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中称:“书坊谁不颂朱胡,秩简孤编出毁余。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诗注云:“海盐朱逊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朱元曙先生曾检出一份朱希祖先生附在日记中的账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朱希祖先生于2月9日日记中写道:“(今日)除夕,上午八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二十余家,一一付给。”由此不难看出,朱希祖先生聚书的方式可谓是“豪购”,且多建立在赊账的基础上。在南京图书馆存有朱希祖先生的一些手稿,其有《南京出纳记》一篇,“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日收中央大学二月份薪金326元,付萃古局洋140元,保古山房13.4元”。由此可见,朱希祖先生每月收入,有近一半用于购书。谢国桢先生曾记当年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的经费支出情况:民国七八年间,每月只有200元,公开阅览后,才加到490元;直到民国十六七年间,始增加到每年22000元。^[4]此经费似不仅是购书款,还应包括其他日常开销,由此,将国立图书馆与私人用于聚书的财力相比,伦明谓朱希祖先生“购书力最豪”是名副其实的。

其三,兼顾充实公藏。在全力扩充私家藏书的同时,朱希祖先生对国家公藏亦高度重视,且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朱希祖也很重视公藏,他不论人在何处,必致力于当地古物、史迹,或文献的整理维护。”^[5]民国初年,清廷内阁的大量档案流出,1921年接收档案的历

史博物馆准备将其部分运往造纸厂,罗振玉得知后先收购了一部分归己所有,尚有一千五百余麻袋,经朱希祖先生出面联合北大教授向教育部力争,将这批档案拨给北大。1924年,朱希祖先生在北京汇记书店购得清代升平署几乎完整的档案共557册,戏曲抄本约七百余种,后以廉价让给北平图书馆以供有志于戏曲史研究者所共享,“为公保存珍贵的近代戏曲、名伶,及宫廷礼乐史料。”^[6]30年代中期,他听说在西北地方发现了约百册西夏文佛经,有流出国外的可能,便立即通过中央古物保管会和地方当局,再次促成由北平图书馆将其全部购藏。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学者,朱希祖先生有着不同于其他藏书家的收藏理念,即将对民族对国家的历史责任感融于自己的藏书实践之中。

考其所藏品种,可以用四部皆备、重点突出来概括。

朱希祖先生生前未来得及给藏书编制总的目录,其子朱偁教授曾编有《邨亭藏书目录》,60年代初与手中尚存的朱希祖先生藏书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南京图书馆。该目至今尚未刊行,笔者曾多方努力欲阅此目,然最终无果。在此只能利用二次文献加以论述。李培文在其所撰《朱希祖与邨亭藏书》一文中介绍了书藏的基本情况,由此不难看出邨亭藏书另一个特点就是四部皆备。

朱希祖先生藏书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文献五个部分,共计5000余部,在此有两点需加明确,首先《邨亭藏书目录》中的海盐地方文献是从其他四部中辑出的海盐地区作者书目,种数不计在内;另外,史部方志的善本目录丢失,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称,朱希祖先生生前编有所藏方志目录一部,总数达千余种。据此邨亭书藏应在6000种左右。

从总体上看,李培文认为“经、子二部收书较少,但注重版本的收藏;史、集二部收书量大,注重种类的收藏。”

史部书达2300余种,占总藏书量的近40%,是四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且明清两代史籍占2/3。这当中共有明代刻本(少量的抄本、稿本)300余种,清初顺治康熙期间刻本达一百余种。善本量居四部之首。其中稀世珍本有明抄本《明熹宗实录》,此为现存诸本中最完整的一部,又有王鸣盛稿本《乾隆起居注册》与稿本《嘉庆二十年起居注册》以及宋刻明修补本《眉山四史》、明抄宋本《水经注》等。

集部共收书1800余种,其中明清两代别集达1300种,占该部总数量的80%。文人别集包罗万象,被认为是历史研究者不能忽视的史料库。该部分藏书的作者时代多集中在明嘉靖至清乾隆之间,其特点为稀见本多、禁书多。

经部、子部合计收书462种,其中善本达156种,占1/3,善本书比例之大为史部和集部所不及。且仅经部宋版书就达14种,据李培文统计这当中有宋乾道淳熙间建安钱塘王朋甫刻本《尚书孔传》13卷、宋淳祐平江磻砂延圣禅院、刻大藏经本弘明集等八种佛经,以及宋刻本《周易》、《毛诗》、《尚书》、《尔雅》、《左传》等。

观朱希祖先生藏书,就内容而言,其主要特色是有关南明史料的文献成为收藏重点。顾颉刚认为其所藏南明史籍数量已成巨擘,不论质、量都公认与他对南明史的研究一样,名列全国公私第一。^[7] 邨亭藏书的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史部和集部。

据李培文对《邨亭藏书目录》的统计,在史部“南明史类”下共收野史、杂著四百余种,“年谱类”收南明年谱46种。集部中南明人别集达300余种,又有地方志、政书等类中包含南明资料的史籍。李培文认为: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是谢先生在走访全国公私藏家后编定的晚明史籍知见书目,《邨亭藏书目录》所收比例高达80%。这当中不乏独家收藏的孤本或稀见之本,如清人李聿求的《鲁之春秋》,据称只有稿本和抄本两部,谢国桢先生称在走访南北公私藏家后并未见到有抄本。于是朱希祖先生所藏的稿本则是学界至今能见到的唯一本子。又如集部有《十愿斋全集》,为自焚殉国的南明礼部尚书吴钟峦所著,此书刻于清康熙初年,因书中有大量诋毁清朝的词句,后被列为禁书,目前国内只有朱希祖所藏一部。另,《邨亭藏书目录》中集部共收明清别集禁书达99部,均为原刻或传抄本。

1931年,朱希祖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二卷第七期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时统计他收藏的资料已有400多种,包括史料数十种,诗文集156种,笔记杂著数十种;到1937年,他准备着手写南明史时再次统计,则达到700多种。

由此可以看出,朱希祖先生藏书完全是为治学所备。他“藏以致用”的学者型藏书观同其研究方向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邨亭藏书四部皆备、重点突出的实用性特征。

注重对所藏文献内容的学术研究。检阅文献,未曾发现朱希祖先生对所藏典籍做过千藏书家通常意义上的整理记载,既无藏书目又无访书记。苏精在论述此点时讲:“朱希祖是史学家,因此邨亭藏书既非供鉴赏,也不徒供校雠,而是取以读书治学用的,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他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之处,后两者往往只娓娓于一书的递藏授受源流,与自己的收藏的经过,或是断断于字词同异的争辩、与版本甲乙的校勘;而读书的藏书家所注重的则是一书内容的考订论证,本旨要义的发明阐述,以近代学人而言,王国维、胡玉缙等人如此,朱希祖同样是如此。”^[8] 此语说明朱希祖先生将学术研究的方法用于对藏书整理,即从以往注重对藏书的递藏源流和版本异同的记录与鉴别转而注重对所藏典籍内容的学术考订。其成果多为题跋,现可见成书有《明季史籍跋》六卷、《邨亭藏书题跋记》四卷,1961年朱偁教授搜集朱希祖先生曾发表于杂志、日记、未刊稿中的题跋文章82篇,编成《明季史料题跋》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该书被辽宁教育出版社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再版。书中有《弘光实录抄跋》一文,朱先生云:“余于南明史事,凡东林、复社中人所撰著,必当推察至隐,不敢轻于置信。读史者当以至公至大之见,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鸿儒硕学而有所蔽焉。”由此可见,朱希祖先生深知南明史籍在清代屡经禁毁和窜改,经多方搜求,每得一书,深加校考,辨别真伪,探幽发微,以求历史真相,其表

现在题跋中不仅精于版本,且更具史识。于是朱希祖先生的史学研究又以藏书题跋的形式出现,此应为学者型藏书家对藏书进行学术整理的最高形式。

检《明季史料题跋》中的82篇文章,内容涉及对所收书的内容大略介绍,版本流传的梳理、内容真伪的考辨、作者真伪的识别,以及文字脱落的补正等。

书中有《跋旧抄本幸存录》《再跋幸存录》《三跋幸存录》。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运用征引、考据等方式对《幸存录》一书作了全面的学术研究。

《跋旧抄本幸存录》写于1928年9月7日,认为“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者皆有罪焉。惟见彝颇知党争之非,其意皆见于是录,故读是录者,可以知几社与复社政见之不同也。”其后并引用诸家于此书之评介曰:“而复社中人如黄宗羲等,遂深诋其书,指《幸存录》为‘不幸存录’。”

《再跋幸存录》写于1928年9月9日,文章开始即云:“余祖望《汰存录跋》谓‘巢先生因而序以证之,谓是录出于文忠身后,益冒托其名者’。”随后朱先生就该书是否为夏允彝所作加以考据,在短短的1400余字中,征引文献达16种之多,最终断定该书非托名之作。

《三跋幸存录》则写于1928年9月12日,朱希祖先生认为《幸存录》亡佚之由,“半由于社党之恶其言已,而妄加删削,且其子姓无存,未尝付刊,故肆笔无忌;半由于满清之焚毁,虽有原本,抄而不敢刊版流传。……今以旧校抄之,抄本之篇次,已为后人改编,不如刊本之尚存旧观,与《续幸存录》所说次第相合。而刊本脱误之处,有可以抄本校正者。”是文乃刊本与抄本相校之校勘记。

三篇文章将《幸存录》的内容概略、作者真伪、版刻优劣等情况研究得十分透彻,文字精炼,征引广泛,考据扎实,彰显朱希祖先生的学术功力,是学术研究与藏书整理紧密结合的典范。

藏书历尽迁徙,最后归公。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说:“在民国以来的藏书家中,还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人书都经历迁徙流离的。”从朱元曙先生对其祖父的回忆文章中即可看出,由于朱希祖先生的工作变动及时局之动荡,导致了最终的人书分离、书置三地的情况发生。

在20世纪30年代朱希祖先生的郇亭藏书经历了三次迁徙。

第一次是1933年。是年,朱希祖先生已从北平前往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1月4日军攻克山海关,平津危急。朱先生嘱家人将善本寄粤,后又派夫人返回北平料理此事,8月又亲返北平携重要典籍回广州,至此郇亭藏书已南北分置。

1934年春,朱希祖先生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史学系主任,于是随身的郇亭藏书中之善本又经历了第二次迁徙。

书的第三次迁徙,是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的8月1日至10月22日间,时政局不稳,朱先

生先亲赴北平携书12箱回南京,再将部分书籍装60箱经宣城、徽州等最终至隆阜,交由学生戴伯瑚保管。至此朱希祖先生的邨亭藏书分置北平、南京、隆阜三地。直到1944年朱希祖先生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置于北平和隆阜两地的藏书。

朱希祖先生深知中国私家藏书最终不可避免散失的结局,由此1913年2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藏书之人能自?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传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

1950年10月21日,朱希祖先生旧友柳亚子同朱偁教授商议,希望将南明史料捐给国家,朱偁慨然允之,亲手将家中所藏南明史料中最重要部分装订五大箱交柳亚子,由此邨亭藏书中最珍贵部分全部无偿捐给北京图书馆。

1956年,朱偁教授又将家中所藏邨亭藏书的镇库之宝明抄宋本《水经注》以及《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等海内外孤本捐与北京图书馆。至60年代朱偁教授将邨亭藏书的最后存留部分又无偿地捐给了南京图书馆。

在2001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楼·近代卷》中有《朱希祖与邨亭》一节,在谈及藏书去向时讲:“解放后,朱偁将南明史部分的书籍及一些宋刻本卖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大部分则捐给了南京图书馆。”此说有误。据朱希祖先生孙女朱元春女士讲,给北京图书馆的书亦为捐赠,她在给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信中云“朱偁先生在五十年代初,经柳亚子介绍,先将五大箱有关南明的图书文献捐献于北京图书馆。50年代中期,又由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王冶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经手,捐赠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和《鸭江行部志》于北京图书馆。”

邨亭藏书,价值连城,朱希祖先生的学生金毓黻教授云:“(朱希祖)先生所藏多珍本,在承平时已值二十万金,战后书价暴涨,高者至千倍,由是所藏书将值二万万金矣。”^[1]

朱偁教授在1956年2月29日日记中云:“上午乘电车赴东四头条文化部访郑振铎副部长接洽公务。余允将家藏善本、孤本捐给北京图书馆,以报国家对先君地下矣。”

作为知名教授,朱偁先生有能力将藏书保存,然其捐赠义举,既是遵从父愿,亦是热诚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一种表现,彰显出朱氏父子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轻财重义的高贵品德。

注释:

[1]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朱希祖邨亭[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2]朱元曙.邨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J].(台湾)传记文学,2005,86(4).

[3]李培文.朱希祖与邨亭藏书[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5).

[4]谢国桢.南京在望[J].南京情调[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 [5]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朱希祖郿亭[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 [6]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朱希祖郿亭[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 [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2.
- [8]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 [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C].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

参考文献:

- [1] 李培文.朱希祖与郿亭藏书[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5).
- [2] 朱元曙.郿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J](台湾)传记文学86(4).
- [3] 周文玖.朱希祖史学略论[J]史学史研究,2004,(4).
- [4]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 [5] 谭卓垣,伦明等.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6]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曹氏棟亭藏书聚散考略

李 军

【摘要】 曹寅作为清代初期有名的藏书家,从《棟亭书目》看,其藏书的质量、数量与当时的大藏书家相比毫不逊色,而后来棟亭藏书逐渐被人们所忽视和淡忘,在此考察棟亭藏书聚散与流传的线索,以见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曹寅;棟亭藏书;昌龄;昭槎

曹雪芹因《红楼梦》一书而被世人所瞩目,其家世的研究是当代“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曹雪芹的家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他的祖父曹寅。曹寅作为康熙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在整个清代藏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目前有关曹寅研究的著作中,他的藏书家身份并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这不仅使他的藏书家身份日渐被人淡忘,也使得整个清代藏书刻书史的研究中有所缺憾。曹寅作为清代初期有名的藏书家,从现存的《棟亭书目》看,其所藏书籍的质量、数量与当时的大藏书家如毛晋、钱曾、季振宜、徐乾学等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但今天的研究者对于两者的重视程度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点在现有的文献学教材、专著中不难发现。虽然也不无对曹寅的刻书给予较高评价者,但对其藏书成就的评价却为数不多。因此有必要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棟亭藏书。

曹寅之建棟亭,是出于对其父曹玺的纪念。启功《记〈棟亭图咏〉卷》说:“曹寅的父亲昭玺在江宁织造任职时,曾手植一棵棟树,这种树俗名金铃子。曹寅后来继承他父亲也在江宁任织造,为了宣扬他父亲的“遗爱”,所以起这一个亭名,并用作别号。请人作画、作诗、作文来作纪念。”^①棟树是一种落叶乔木,在四五月间会开淡紫色清香的小花,果实不大,味苦,可以入药,其木材坚实可制作器物。由此可见棟树坚贞有操守,味苦而利病,毫不招摇的清香,如谦谦君子,这正是大权在握的曹玺喜爱它的原因吧。曹寅建造棟亭,可以看作是

继承父志。从他招徕数十位友人作画题咏来看,我们又不难想见当年曹家诗礼传家之风的鼎盛,这种鼎盛更直接地体现在其藏书上。

关于棟亭藏书的来源,我想应该是曹寅在任职江南时所收集,这些书在1710年由曹寅编成《棟亭书目》。曹寅任职江南期间一直身居要职,康熙一朝最值得称道的文化盛事——《全唐诗》的编纂就是由曹寅在扬州主持的。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本已是人文荟萃的扬州文化活动因此而变得更加繁盛了,曹寅也就俨然以盟主身份来主持江东风雅。今据《棟亭集》和《棟亭图》及当时各家文集统计,与曹寅有诗文交往者约有两百人,仅从启功对《棟亭图》上人名记录来看,45人中有纳兰成德、毛奇龄、徐乾学、徐秉义、宋荦、王士禛等,他们在当时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也是全国闻名的藏书家,如徐氏传是楼、王氏池北书库当时已闻名于世,宋荦当时在江南身处要职,在任内与常熟著名藏书家汲古阁毛氏父子有过密切往来,据潘天祯《〈秘本书目〉所收录书的归属问题》^[2]考证:汲古阁毛氏所藏秘书最后归于宋荦。所以可以说曹寅的藏书环境是得天独厚的。这从现存的棟亭藏书来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王重民《善本书提要补编》收有《牧斋书目》一种,王重民题记云:

今按此诗载《有学集》卷六“丙中春就医秦淮寓丁水阁浹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中,注云:“胡静夫,好闭关”,则残记为静夫所作。卷内有:“胡致果图书记”一印,殆即其人。疑致果字静久,藏书处名春草斋,容日当考其事迹,冀为清初藏书家添一段掌故也。^[3]

其实,胡致果即胡其毅,曹寅曾为胡氏藏僧渐江所画《梅花卷》题诗^[4]。而胡其毅是江宁著名的出版家十竹斋主人胡正言的儿子,著有《静拙斋诗选》等。他家所刊印的《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举世闻名,作为明遗民,他与钱谦益有往来,也与身为满清高官的曹寅有交往,此书月胡其毅抄自钱牧斋,而后又转赠曹寅者,铃记即是明证。

另外,新从海外归来的翁氏藏书中有宋刻巾箱本《鉴诫录》(最初为项墨林天籟阁藏书)后有曹寅跋语云:

己丑夏五,竹垞先生来真州,持以见赐,愧不能藏,复影录一本奉还。曹寅。^[5]

检《棟亭书目》果然只有抄本。这个抄本傅增湘《藏园经眼录》著录,今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而朱彝尊其实也是曹寅座上宾客,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说:

棟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巢;又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棟亭皆有副本。^[6]

此外今人王利器先生在《曹寅与朱彝尊》一文中更加详细的说明了二人的关系。在宋刻巾箱本《鉴诫录》后有参加《棟亭图》题咏的王士禛的跋语,称也曾手录一部。可见当时曹寅周围的抄书、藏书环境。曹寅《棟亭词》中有《钞书》一词,寄调《古倾杯》写道:

清峭严城,笼灯解鞅,归卧书堆内。频年嗜好,多惭糟粕,索索都无真气。闲宵甲乙重编,缤翻判尾。古人好语,今生难字,等闲去取,束共牛腰比。岂不见论斤象米,应少胜虫钻故纸。笑万卷空摊,一编未竟,颖秃埋何地。知无足付儿子。待掩

帙蕉叶微甜，浇酬十指。烛跋漏下，颓然睡矣。^[7]

可见曹寅曾亲自抄过书，所以有感而发，写得十分真切。

此外，所藏尚有宋刻本《离骚集传》、《杜工部草堂诗笺》、《北磬文集》为汲古阁毛氏藏书，旧为项墨林藏之元刻本《毛露聚义》，还有毛氏所影宋写本的《挥麈录》等书，皆得自江南故家。纵观《棟亭书目》，多此类精抄本、精刻本，且多世人未见之善本。但曹寅作为一个藏书家，并没有将这些孤本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秘不示人，相反却选择当时不经见者校刻出版。他持着“藏书不如刻书”的理念，积极以自藏善本刊刻流传，其中以《棟亭十二种》和《曹棟亭五种》为代表，书后都有“棟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刊于扬州使院”牌记为证，世称曹棟亭本。

可以看出曹寅的藏书主要是受其所处的抄书、藏书、刻书的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藏书家之间书籍的互抄，正是曹溶《流通古书约》的具体实践。而晚年与曹寅来往甚密的朱彝尊，与曹溶也有着密切的往来，谢正光《清初的遗民与贰臣》论之甚详。何焯《法书考跋》：“先生（曹溶）歿后，将旧抄本宋元版书五百册质于高江村，朱垞先生倍其值而有之。”可见二人之间的交谊不一般，这种关系也体现在藏书上。因此曹寅在开明的藏书风气中获得了丰富的收藏，同时也濡染这种风气而刊刻家藏秘本，藏书与流传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曹寅在当时藏书家中的声名鹊起，跻身著名藏书家之列。至于后来为何曹寅仅以刻书传名，其棟亭藏书逐渐被人们所忽视和淡忘呢？这就要说到棟亭藏书的流传问题。最早提到曹寅藏书流传问题。

二

最早提到曹寅藏书流传问题的要属乾隆时期的李文藻，他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讲：

（延庆堂）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棟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葦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棟亭之甥也。^[6]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线索，后代的学者潘祖荫曾将藏书心得手批于钱大昕的《竹汀日记钞》上，今人王欣夫录存之，其中有一条说：

棟亭（藏书）传其甥，印曰“长白傅察氏”者即是，有方印曰“长白敷槎氏”、“葦斋”、“昌龄图书”印。^[8]

看着好像是承袭李说而来，另外《八旗文经》作者考（甲）曹寅条云：

甥富察氏昌龄，字谨斋，阁峰尚书子，有时命，集未见。^[9]

则说的更加确切了。再从现存的棟亭藏书来看，绝大部分都有“棟亭曹氏藏书”和“长

白敷槎氏墓斋昌龄图书记”二铃记。故棟亭藏书后归昌龄之说应属可信。

富察昌龄(“敷槎氏”今从《清史稿》用“富察氏”)作为藏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作有一诗,今人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一书中有小传。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四记有:

昌龄,字晋蘅,由检讨官至侍讲学士,藏书最富。^[10]

可见昌龄字晋蘅,号董斋,满洲镶白旗人,世居长白,为傅鼐的长子,曹寅之甥。雍正元年(1723)三甲135名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官至侍讲学士。藏书印有“长白敷槎氏董斋昌龄图书记”朱方“革斋”朱方、“昌龄”朱方、“晋蘅”朱方、“董斋图书”朱方、“稻香草堂”白方等,与其名字皆相符合。

然而为何棟亭曹家的藏书会归昌龄所有呢?这就不能不从两家背景和关系说起,我们知道曹家的衰败除了经济原因外,更主要是政治斗争的失败,曹寅的去世已经预示着曹家的衰落,康熙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庇护曹家的大树已倒,在换代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曹家后人已无力挽回注定家破人亡的事实。棟亭藏书的散失只是时间问题罢了。相反就昌龄的家世看,在曹家步履维艰的雍正朝,其家族地位却正如日中天。袁枚《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中说:

年十六,选入右卫,侍世宗于雍邸……雍正元年,补兵部右侍郎。^[11]

说的就是昌龄的父亲傅鼐,他在16岁时就已经是尚未当上皇帝的清世宗雍正的侍卫了,雍正一旦掌权,便立刻将他升任兵部右侍郎,而同一年昌龄自己又进士及第,我们不难想见当年昌龄家的显赫。在袁枚所写的《神道碑》和李锴写的《傅阁峰家传》以及《清史稿·傅鼐传》中都能看到雍正对傅鼐恩宠有加。据此我们就不难知道,正当曹家无力挽回败局时(雍正五年(1727)之前),富察氏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棟亭藏书在这个时候也就自然传给了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昌龄,另外负责抄曹家的隋赫德又是昌龄的族人,也为藏书的转移或多或少提供了方便。

其实,昌龄谦益堂藏书除了大部分来自棟亭藏书外,其家也原有不少收藏。《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中就说:

所居稻香草堂,……积书万卷,招四方人游。^[12]

其中“稻香草堂”一印其子昌龄依然使用,也就可以想象在傅鼐时已经是典籍盈架、宾客满座了。而后人所见善本书中也有只铃昌龄藏印而无棟亭曹氏藏书印者,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之《雅乐发微》8卷、《雅义》3卷、黄裳《来燕榭书跋》著录之《六经图》、张元济《涵芬楼原存善本书目》著录之《篁墩先生文集》等都是例证。

至此,虽然曹家败落,但棟亭藏书还是得归其人,由昌龄很好地保存着。然而昌龄也只能守其一时,并不能保证藏书永不流散。乾隆己丑(1769),李文藻谒选京师,逛琉璃厂时就看到有经棟亭曹氏和富察昌龄递藏的古籍自内城散出,从时间上看,棟亭藏书在昌龄家已

保存了40年左右,又经历雍、乾易代,昌龄一族显赫不再,当已无力再继续保守,只有任其流散到书肆间。那么,昌龄的藏书后来又流落谁家呢?昭槎《嘯亭杂录》卷四云:

傅察太史昌龄,傅阁峰尚书子。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今日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如宋末江湖诸集,多公白手钞者,亦想见其风雅也。^{[12](86)}

则昌龄的藏书确实是由于富察氏的衰落,加之昌龄的去世而散失了。昌龄作为藏书家生前也热衷于抄书。昌龄的藏书除了小部分流入书肆外,大部分正如《嘯亭杂录》所记的继而由昭槎收藏。

昭槎,字汲修,号檀樽主人,礼亲王代善之六世孙。嘉庆十年(1805)袭礼亲王,二十年坐陵辱大臣夺爵圈禁,二十二年释回。好诗文,尤习国故,与法式善、姚鼐、龚自珍等相往还。其藏书印有:“礼邸珍玩”、“檀樽藏本”等。至此棟亭藏书似乎可以说依然保存的比较完整。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少能见到经棟亭曹氏、谦益堂富察氏、礼邸递藏的书呢?这就不能不说到礼邸的大火,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续编·石仓十二代诗选跋》提到:“书归十日,礼邸有回禄之变,此书不可以知矣。”与《清代名人传略》所说一致:

永恩的儿子昭槎……1805年继承了礼亲王的王爵。两年以后(1807),他的王府失了火,全部被焚,他全家的珍宝以及他们的印绶一无所存。仁宗皇帝可怜他的不幸,于是赐银一万两,命他重建住宅,同时又赐给他许多衣帛。^[12]

可见棟亭藏书在流传了一百多年后,由于最后一个收藏者府第的大火而付之一炬了,其中经历了三代藏书家辛苦经营的古刻精抄顿时化为灰烬,其惨烈程度想来绝不亚于钱牧斋绛云楼之火,王府虽然能够重建,但藏书却不能恢复了。所以仅存于天壤间的棟亭藏书一般只有曹寅和昌龄两人的藏印,从笔者历年所搜集到的有关存世棟亭藏书资料中,且其存世数量达数百种之多(约占书目所记十分之一强),但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皇明大训记》一书铃有三家印记,这一弥足珍贵的实物是三家递藏的最好证明。

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棟亭藏书流传的源流:曹寅开创了棟亭藏书的历史,他在康熙鼎盛时期身居要职,任职于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扬州,又参加主持了《全唐诗》的编纂刊印工作,与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和出版家有着密切的往来和深厚的交谊。所以在他的藏书中有为后世藏书家所艳羨的稀世之珍,他作为具有很高修养的诗人、学者,能够主动刊印家藏秘书,最后还手定了《棟亭书目》,著录古籍3300余种,在三人中可以说其功最巨。接下来的昌龄以其与曹家的亲戚关系和当时与曹家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得以继承棟亭藏书,这时书已经由江南转到了北地,然而昌龄也只能守其成,没有像曹寅那样在各个方面(收藏、刊印、编目等)都取得显著的成绩。最后贵为亲王的昭槎因其强大的财力得以在昌龄家衰微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收购其藏书,但是,没等出什么成果就因为疏

于防火而使百余年的收藏之功毁于一旦。从而使得棟亭曹氏、富察昌龄和自己的藏书家身份被后世的人们所忽视和淡忘。

此外,不难发现棟亭藏书被人忽视的另一个的原因就是后来两位收藏者都是交际范围有限的满族人。曹寅的成功在于其与江南士人、藏书家的广泛交往,才得益于丰富的民间收藏,昌龄一生任职京师,昭槿也如此,也就不可能获得像曹寅一样的收藏环境。而满族藏书家即使拥有丰富的收藏,也不可能与汉族藏书家一样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的藏书往往只是将之视为古董,靳不示人,极少作学术和出版之用,如怡府藏书的出名是因其书流散后为海源阁杨氏、常熟翁氏、滂喜斋潘氏收藏与利用,由此可见藏书家的声名与其对自身藏书的利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今天我们仍有必要对这些逐渐被人遗忘的藏书家有所考察,以期总结历史教训,为后世藏书活动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潘天祯.潘天祯文集[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 [3]王重民.善本书提要补编[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
- [4]宋溥.红楼梦识要[M].北京:中国书店,2000.
- [5]黄裳.黄裳文集(春夜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 [6]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7]曹寅.棟亭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马甫生等标点.八旗文经[M].沈阳:辽沈书社,1988.
- [10]杨钟载.雪桥诗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 [11]袁枚.袁枚全集(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 [12]昭槿.啸亭杂录[C].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吴引孙藏书和藏书楼研究

李玉安

【摘要】 扬州吴引孙的“测海楼”，是晚清盛极一时的藏书楼，有人甚至将其与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范氏、瞿氏、杨氏藏书楼和藏书事迹已经多有文章撰述，本文就吴氏藏书略作考述。

【关键词】 吴引孙；藏书家；藏书楼；测海楼

吴引孙的“测海楼”藏书，位于扬州古运河西岸，其间的藏书楼为“测海楼”，与宁波范氏的“天一阁”齐名，被誉为“南国书城”，在近代扬州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不寻常的地位，2003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其藏书处另有“有福读书堂”，是其祖父时命名的藏书处。“测海楼”是吴引孙在光绪三十年（1904）做宁绍道台时，仿造宁绍台道的衙署式样，动用了四十万两纹银而建造。该藏书楼也是扬州仅有的一处浙派建筑，其建造的风格，从它的砖雕、木雕、悬背结构和石材等，和扬州传统徽派建筑有较大区别，具有很高的艺术、文物价值。吴引孙藏书最多时达8020部247759卷，其藏书数量和当时藏书界地位堪与当时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相媲美。但是，“测海楼”这个藏书楼，却未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研究，包括《中国藏书家辞典》、《中国私家藏书史》、《中国藏书楼》、《中国藏书通史》等工具书和名家专著，都没有收录和介绍吴引孙的“测海楼”藏书，仅《中国藏书家通典》中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限于词条的限制，仅数百字。本文就其藏书和藏书楼的前后史料整理于后，求方家指正。

一、吴引孙的官宦历程

吴引孙（1851~1921），一作1848~1917，字福茨、佛慈，一作茨甫，别号仲申，另号养宽，晚年自号曰拙圃老人、玉林居士、潜真子、玉公羽等。祖籍安徽歙县，自其高祖时迁入扬州，居郡城而属籍仪征。祖父次山，喜爱读书，建有书斋，名为“有福读书堂”；父名植，精于《易》、术数之理，旁通诸子百家之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能文章充选贡，后候选直隶州

州判,惜英年早逝。同治六年(1867)吴引孙十七岁时补诸生,同治十二年(1873)为贡生。同治十三年(1874)朝考一等三名,以七品小京官被刑部录用,在浙江司行走,光绪五年(1879)三月,补军机章京,同年中顺天乡试举人后,兼总办秋审处并兼派浙江司主稿。光绪九年(1883)九月,补湖广司主事,升贵州司员外郎。十二年(1886)以御史用充军机帮领班章京,历充方略馆协修、纂修、收掌提调等差,并派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差。光绪十四年(1888)以任命道府官员衔,被光绪帝接见,九月补授浙江宁绍台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委置按察使,二十五年(1899),奉旨补授广东按察使;先后被光绪帝召见数次;二十八年(1902)六月,奉委总理广东省城武备学堂事宜;同年奉旨补授甘肃、新疆布政使。二十九年(1903)正月,经前署总督德寿、署巡抚李兴锐会奏,以广东武备学堂巡警事务甫经开办,请俟新任臬司程仪洛到粤再交卸等因,奉朱批著照所请;闰五月,兼署藩司篆务;八月到京,蒙召见二次,并获赐御书“福”字。

进入民国后,国民协会总协理推举吴引孙为参事。吴本人亦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剪发去辫,但是不愿易服。据《年谱》称“余旅沪年余,交游甚寡,足不出户,客居无事,偶成感怀、答友各诗四十余首,聊以自遣”。

他的宦宦生涯,除了在广东任职时间较长外,在边陲时间亦多,随身携带书籍数种,以解孤独之困。尝自述其藏书经历云:“节省廉俸,广购储藏”。

二、吴引孙的藏书生涯及其藏书源流

吴氏藏书始于吴引孙祖父吴次山,吴次山喜爱读书,在他手上就建书斋名为“有福读书堂”,这对吴引孙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咸丰三年(1853),吴家遭兵燹,吴次山遗留之书籍“荡然无存”,当时吴引孙年少,又“无力购书,即辗转借观,亦不易易。因思寒酸之士,有志读书,恒苦于无书可读”。鉴于青少年之际读书不易,为官之后,决定节省俸禄,广购书籍。在他担任宁绍道道员时,专门拜谒了四明“天一阁”,登“天一阁”后,羡慕不已,随笔写下颂扬楹联:“高阁凌虚,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宸章在上,胜商彝周鼎传示子孙。”由此,发奋藏书之志,由此更加坚定不已。在以后的宦宦仕途中,不断励志藏书,并暗下决心,要有一座和“天一阁”媲美的藏书楼。为此,他委托表兄周颖孝在扬州北河下购地建宅,并仿宁波“天一阁”格式和规模建造一藏书楼。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在任职宁绍台道时的他,仿造宁绍台道的衙署式样,越二年落成。“测海楼”面阔5间,高2层,楼上藏书,楼下会客、读书。并取名为“测海楼”,其义为:学深似海,登斯楼读书,无异于以蠡测海,含有“学无止境”之意。“测海”二字出自《汉书·东方朔传》。蠡指海水中生长的贝壳,后用为舀水的工具,借指学无止境。吴引孙借“瓠瓢可以测

海,管中可以窥豹”之意,期望吴氏子孙能以测海的勇气,不畏艰险,努力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吴引孙的弟弟吴筠孙(1858~1914),曾任直隶河道道员、湖南岳常澧道台、湖北荆宜道台,民国初又任过浔阳道尹,遂以“道台”知名。兄弟俩都有心于藏书,为宦所到之处,尽力搜罗古籍,曾先后在两湖任职上,收集书籍数万卷抵达扬州。

藏书楼建成后,其藏书量要远远超过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当时“天一阁”的藏书量只有5000余部7万余卷,而“测海楼”的藏书,在高峰时达到了8020部,247759卷,是“天一阁”的三倍。自称“余惟视力量所及,耳目所周,不拘一格,凡元明刊本,旧家善本,寻常坊本,殿刻局刊各本,随时购觅,意在取其完备,不必精益求精,自宦游浙粤十余年来,节省廉俸,广购储藏,得八千零二十种,计二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卷”^[1](实际为8019种)。他每购置一部书就作一记录,记下所购书的卷数、函数、购买的钱数,精心地盖上“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的藏书印,并“函以板,悬以签,无折角,无缺页,完好整洁,无虫鼠之蚀”,还组织人将这些书统统编为一部书目,题名为《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12卷,并于1910年刻印成书。

1927年以后,军阀混战,“测海楼”藏书遭到军阀孙传芳所部士兵的严重骚扰,由于士兵驻扎该地,数百册善本书被陆续偷走。为了保住这批藏书,吴氏后人匆匆决定,将藏书尽快出售。经当地商人黄锡生的介绍,与直隶书局主人宋星五接洽,结果因价格问题未能成交。

这时北平书商王富晋得知此事,星夜赶往扬州。王富晋(1889~1956),字浩亭,河北冀县人,尝设富晋书社于京沪两地,颇通目录版本学知识。看到此书后,鉴定为颇具收藏价值,最终以4万元的价格购得了整批藏书,计8021种,589箱。1930年1月签订合同,夏季,款已付清,书将装运,不料发生了意外之事。据传因王富晋没有向黄锡生给好处费,黄锡生心生一计便向社会扬言,说王富晋是替外国人购书。当时江都县党部和县长下令禁止这批书籍运往外地,王富晋只好求助于任职于上海的陈乃乾先生,陈乃乾最后搬动了蔡元培和董康等知名学者和和人帮忙干预之,蔡元培先生担心此批古籍被流落外籍,重蹈“皕宋楼”藏书流落异国的覆辙,在了解了实况后,亲自出面向江苏民政、教育两厅保证,决不让该书流向国外,再由两厅令告江都县长放行。“测海楼”藏书出售,亦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时在北京留学,他在留学日记(《述学斋日记》)中写道:“……归路访徐森玉先生……云扬州吴氏测海楼书已落王富晋手。”言下之意是没有能将“测海楼”的藏书购运至日本而遗憾。倘若王富晋不努力插手此事而就此罢手,仓石武四郎则虎视眈眈,“测海楼”藏书真的就会被日人购走,那才是国人的永久遗憾和饮恨了。

1930年8月,王富晋并没有将书运往北京,而直接运到了上海,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开设“富晋书社”分号,由其弟王富山经营。并延聘学者陈乃乾为其编撰藏书目录——《测海楼旧本书目》4卷,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北平富晋书社铅印。后来这批书大部分售给了

北平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及中华书局图书馆,其余则在上海零星售出。“测海楼”藏书从大规模聚书到星散,前后不到50年时间。可谓聚也迅速,散也迅速。

三、吴氏“测海楼”的藏书目录

吴氏藏书目录目前已知的有五种:

1.《有福读书堂书目》6册。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吴引孙就开始编撰其家藏目录《有福读书堂书目》6册不分卷,红格抄本,此目仅供吴氏后人查阅,从未刊印过。书目共分经、史、子、集、艺、丛、医、试、说(小说、戏曲)、教(宗教)、阙(残缺不全的书)11类,计9028部,这是吴氏藏书中对通俗文学记载较多的一种。在这个书目里,他将通俗小说专门划分为一类,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说“小说,本子类之一,然中多鄙俚之作,不登大雅,未便阑入子部,故以说类别之”,显然,他是怕在四部之内入通俗小说之书,和当时的时局格格不入。也可能觉得在书目中收录通俗小说,有悖于藏书界传统,所以在书目的“序例”中,他强调说“以上十一类,仅凭臆见,酌量分门,便于翻检,识者幸勿以有乖四库体例而见诮焉”。^[2]由此可见,他这样处理是有其苦衷和特殊用意的。他的小说戏曲图书,在这部目录中反映的较多,而在下面的藏书目录中,反而将此类的图书删节了。经过11年之后,他感觉到有必要重新编制一套新的藏书目录,于是有了第二部藏书目录。

2.《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6册。光绪三十年(1904)吴引孙编定了第二份藏书目录《测海楼书目》。这一书目改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增加了御制书籍、丛书和杂著三类。这七部分别收录为:御制165种,27257卷;经部903种,21803卷;史部上下1710种,60311卷;子部上下1972种,39713卷;集部上下2958种,52623卷;丛书上中下150种,细目8360种,35721卷;杂著161种,10331卷。共计8019种,247759卷。他在自序中称“仿粤东《广雅书院书目》之例,分为七类,四部之首,冠以御制敕撰诸书;其一人所撰而兼涉各部者,别出为杂著。合众人所撰,而成一部者,别出为丛书”。^[3]增加“御制敕撰”、“杂著”、“丛书”三部,合为七部;宣统二年(1910)《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12卷付梓问世。

3.《测海楼旧本书目》4卷2册。王富晋得到吴氏的藏书后,1930年12月,延请版本学家陈乃乾编成《测海楼旧本书目》2册,陈氏延请姚光于1931年2月为之作序。

4.《测海楼书目》4册。1931年11月,富晋书社编就《测海楼书目》4册出版,富晋书社石印本。王富晋称:“本社专收宋元明清旧书,历二十余年,收罗颇称宏富,已刊有书目印行。客春辗转托求,几经波折,始将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归为敝社所得。今特印行测海楼藏书目录,以共同好而资流通。如蒙惠顾,无任欢迎”,“此目录专载扬州吴氏测海楼之藏书,计分经、史、子、集,装订四册”,书目数量与吴引孙编的原始清册接近,计7卷。在这个书目中,

对通俗小说著录有82种(另有通俗弹词小说近30种在此目中未有著录),也是以前的书目中所未刊登的,且大多是绣像、绘图小说本,颇为珍贵。

5.《仪征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简明总册》抄本,南京图书馆藏,今未得见。在该目中著录有国外最新的军事图书,如《美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俄属游记》、《华盛顿全传》、《兵船汽机》、《七国新学借考》等书就是在本目录中记载的。

从吴氏编撰的几个藏书目录来看,最完整的仍然是《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6册,这个时期也正是他的藏书鼎盛之时。他为什么一改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而增加了御制书籍、丛书和杂著三类,其编撰目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很明确的:第一,在广东任职时,受张之洞办学和藏书楼藏书的影响,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创办,广雅书院藏书楼(又名冠冕楼),院长廖廷相编有《广雅书院藏书目》2册。他看到《广雅书院藏书目》的分类体系,没有局限于四部分类,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第二,这个书目设置了丛书和杂著,是符合时代的发展特征的。在这个书目中已经表明,它在探索新的分类标准。第三,最主要还是把收藏的“有稍涉鄙屑者,删之弗录,无貽大雅羞”,在该目中删之殆尽,他也认为这些小说和通俗文学图书为“稍涉鄙屑者,删之弗录”,顾虑在此目录中反映,有损他的官员地位和藏书形象,这在清代都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叶德辉这样的藏书家,也是同样的心理。真正最能反映他的戏曲、小说、弹词等文献的目录,当属富晋书社编就《测海楼书目》4册,在此目“子总部·小说类”中,王富晋首次公布了测海楼所藏通俗小说的全部目录,计有110余种。

四、海楼的藏书特色

“测海楼”的藏书不同于一般藏书家的收书,吴氏的藏书原则是:“不拘一格,凡元明刊本,旧家善本,寻常坊本,殿刻局刊各本,随时购觅,意在取其完备,不必精益求精”。所以他的藏书颇具时代特色,不仅是文学、历史方面的著作,更有反映当代的世界科技发展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收藏有英籍史理孟的《水雷私要》、连提的《行军测绘》、克利赖的《前敌须知》,美籍金楷理的《兵船炮法》、林乐知的《水师章程》,德籍康贝《陆操新义》等国外最新的军事图书和《美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俄属游记》、《华盛顿全传》、《兵船汽机》、《七国新学借考》等国外新书。亦讲求收藏实用的图书,其中有医学、法学、农学、天文、历算、工艺美术等类图书。如:阮元刊《畴人传》、《纺织机器图说》、《银矿指南》、《西医内科全书》、《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图鉴》等;扬州地方文献有:影抄天一阁本《扬州赋》、《平山堂图志》、《扬州画舫录》、《广陵事略》、《邗江三百吟》、《真州竹

枝词》、《扬州义塾章程》、《韩江雅集》、《淮海英灵集》等；地方志也有三百多种。正是他的“收藏无类”的藏书原则，为吴氏后代的学习和成长埋下了伏笔。

对于诗词歌赋、通俗小说的收藏是测海楼藏书的另一特点，在他的“测海楼”中，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明清通俗小说，我们从《有福读书堂书目》及其王富晋编撰的《测海楼书目》中可以看到不少通俗小说。主要如：

《绘图银瓶梅》、《绣像粉妆楼》、《绣像全图笔生花》、《痴人说梦》、《绣像鹦歌记》、《米生福》、《绣像千秋恨》、《绣像梦影缘》、《绣像锦上花》、《双飞凤》、《绘图大红袍》、《绣像前后珍珠塔》、《绣像九美图》、《绣像双珠球》、《绣像双玉镯》、《绣像八美图》、《绣像天雨花演义》、《绣像双金锭》、《绣像云中落绣鞋》、《绣像珠玉缘》、《绣像百鸟图传》、《绣像双玉杯》、《绣像安邦定国志》、《绣像凤凰山》、《绣像施公案》、《绣像全图玉钗缘》、《双剪发铁胎弓全传》、《绣像再生缘》、《绘图永庆升平》、《绣像玉鸳鸯》、《绘图一棒雪》、《绣像明末弹词》、《岂有此理》、《绣像龙图公案》、《绣像清烈传》、《绘图游江南》、《绣像万年青》、《东周列国志》、《绣像后西游记》、《绣像水浒传》、《绘图五才子书》、《绘图续彭公案》、《画图缘》、《后红楼梦》、《绣像海公奇案》、《燕山外史》、《锦香亭传》、《绣像韩湘子传》、《绣像八才子白圭志》、《绣像五虎平西前后传》、《绣像希夷梦》、《绣像草木春秋》、《绣像五美缘》、《情天宝鉴》、《绣像闺秀英才传》、《九才子平鬼传》、《绘图镜花缘》、《绣像说唐前后传》、《增订儒林外史》、《绣像西游记》、《绣像争春园》、《绣像全图笔生花》、《绣像天雨花演义》、《增像小八义》等。虽然大多数是清代木活字本和石印本，但这种绣像、绘图本，是难得的佳本。

吴氏对小说的收藏，几乎是有一种狂热的至爱，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能够收藏到如此全面而丰富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清一代对通俗小说的禁锢和打压，自从乾隆开始，文字狱累兴，鼎盛之时是在全国征书预修《四库全书》前后，江南献书之人被打入牢狱以致被抄斩的事例屡见不鲜。再一个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鄙视通俗小说收藏的，学术界也不屑于对通俗小说的评价，并归纳出了通俗小说有四大“害处”：“一玷品行，二败闺门，三害子弟，四多恶疾”。但是吴引孙毕竟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不仅收藏了大量的明清通俗小说，还保存了不少的禁书，为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少稀见文献。

注释：

[1] 吴引孙. 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自序[C].

[2] 吴引孙. 有福读书堂书目序例[A] 附录于陈乃乾. 测海楼旧本书目[C], 富晋书社, 1932.

[3] 吴引孙. 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自序[C].

参考文献:

- [1]潘建国.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1).
- [2]吴引孙.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序[C].
- [3]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图书馆)

论陆游为代表的绍兴陆氏三世藏书， 兼及南宋浙江私家藏书风尚

顾志兴

【摘要】 本文详细论述了陆宰、陆游、陆子通陆氏祖孙三代的藏书活动，并以此论述了浙江藏书家的藏书风尚和藏书特点。

【关键词】 陆氏祖孙；藏书活动；浙江藏书家；藏书风尚；藏书特点

陆游(1125-1210)，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生以诗名世，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诗名甚著，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明毛晋“得翁子虚编辑《剑南诗稿》，又吴、钱二先生严订天天者，真名秘本也”，遂亟梓之，所辑跋语有云：

孝宗一日御华文阁，问周益公曰：“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对，由是人竞呼为“小太白”。篇什富以万计，今古无双。或评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或评如翠岭明霞、碧溪初月，何足尽其胜概耶！^[1]

这是对陆游诗的恰如其分的评价。陆游亦善词和文，可称是文学上的全才。陆游还是一位藏书大家，在藏书、校书、抄书、刻书等方面有诸多活动，成就亦著。明钱谦益《绉云楼题跋·渭南文集》云：“先辈题跋书画，多云‘某年月日某人观’。陆放翁跋所读书，但记勘对装潢岁月，寥寥数言，亦载集中。盖古人读书多，立言慎，于古人著作，非果援据该博，商订详审，不敢轻著一语，亦文章之体要，当如此也”。陆游有关藏书等活动多见于是书。

绍兴历史上人文鼎盛，以藏书而论，东汉时就有私人藏书活动，东汉末在会稽有王充《论衡》抄本流传，三国时王朗任会稽太守，得《论衡》即是一例。嗣后阚泽以“佣书”为业，及南朝孔休源藏书皆是其例。尤可注意者，绍兴板刻业发达，历史上刻书甚多，中唐之世，即有人刊刻元稹、白居易诗集卖于市肆。宋代刻书业更盛，著名刻书家黄唐、洪适、沈作宾、汪纲等为官于此，政余之暇，多有刊刻，世称善本。有宋一代，承前代藏书之风气，藏书业大盛，绍兴为浙江重点藏书地区之一。

宋代绍兴藏书，北宋时有石待旦万卷堂藏书。及至南宋，私家藏书更盛。据《嘉泰会稽志》称：“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上诸葛氏”。^[2]此外尚有李光藏书，特别值得注意的，以上四家皆为三世、二世世代藏书，反映了绍兴地区世代藏书风气之盛。

陆氏三世藏书为陆宰、陆游、陆子遹。陆氏祖孙三代都是当时全国闻名的藏书家。

一、陆宰与双清堂藏书

陆宰(?—1148),字元钧,号千岩。曾任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京西路转运副使等职。金兵南侵时,他隐居山阴老家,交往的都是当时志存复国的志士,如李光、曾开、曾几等人。陆宰平生处事为秦桧所嫉,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多领祠禄,处于投闲散置地位,未能有所展布。能诗,亦通经学,谙朝章典故。据陆游回忆,绍兴初年,亲见其父与“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3]陆家原有藏书传统。陆宰性好读书,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京本家语》中有陆宰于绍兴八年(1138)所题之语:

本朝藏书之家,独称李邕郭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减三万卷。而宋书校讎尤为精详,不幸两遭回禄之祸,而方策扫地矣。李氏书,属靖康之变,金人犯阙,散亡皆尽。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继而胡骑南鹜,州县悉遭焚劫,异时藏书之家,百不存一。纵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旧收此书,得自京师,中遭兵火之余,一日于故篋中偶寻得之,而虫齧鼠伤,殆无全幅,缀辑累日,仅能成帙,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损者,别以纸装背之,遂成全书。呜呼!予老懒目昏,虽不复读,然嗜书之心,固未衰也。后世子孙知此书之得存如此,则其余诸书幸而存者,为予宝惜之。

陆宰归隐山阴后,曾筑双清堂、千岩亭,藏书达一万多卷,双清堂就是他的藏书之所。南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据《嘉泰会稽志》卷第十六《求遗书》称:“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4]陆宰长子陆淞还参加了校勘工作。

二、陆游书巢与老学庵藏书

陆游是山阴陆氏三代藏书的承前启后者。陆游之父陆宰藏书一万三千卷以上,对陆游的学业和藏书事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解嘲》诗中云:“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就是一个例证。

(一)陆游爱读书,也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藏书

陆游幼年即好学,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少时就遍读了家中藏书:“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渊明集》)。在《渭

南文集》卷二十九《跋王右丞集》中回忆他青年时读王维诗的情景：“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几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昼无事，再取读之，如见旧师友，恨间阔久也”。陆游特别爱好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余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岑嘉州诗》）。

陆游喜藏书。《嘉泰会稽志》称：陆游……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四川是当时全国除杭州、福建以外的又一刻书中心，陆游购置大批蜀板书，更加充实了他家的藏书。陆游是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被任命为通判夔州军府事，第二年五月动身入川，十二月到达夔州（曾集沿路日记为《入蜀记》），时年四十六岁。他在四川时，四川宣抚使王炎曾聘任为左承议郎、宣抚使干办公事等职。他到过当时的抗金前线南郑，心情十分兴奋，写下许多爱国主义的诗篇。这是他一生中诗歌创作最有光彩的时期。后来陆游奉调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经剑门关到达成都。他在成都、嘉州、蜀州、荣州等地都任过职。在这段时期，大约生活比较闲散，因此有精力刻书和搜书。入蜀途中，就留心搜书，乾道六年（1170）十月舟过公安，见祖珠长老，得《卮庵语》（《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卮庵语》）。他在嘉州曾刻岑参的诗集，在《跋岑嘉州集》中说：“今年自唐安别驾（唐安，县名，唐安别驾，即蜀州通判）来摄犍为（嘉州属县），既画公像（即岑参像）斋壁，又杂取世所传公遗诗80余篇刻之，以传知诗律者。不独备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愿也”（《渭南文集》卷二十六）。又如乾道七年（1171）于巫山县得《砚录》、《香法》（《渭南文集》卷二十六），以是书“腐败不可读，乃录藏之”。

陆游后到荣州建有书斋“高斋”，过着清闲的读书生活。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五十四岁的陆游奉诏入京面圣。离开了多年生活过的四川，沿三峡取道回京城临安，又搜集和购置了大批蜀板书。以后他又曾在福建建安和江西抚州为官。福建是南宋的三大刻书地之一，藏书家颇多；江西也是北宋藏书家集中之地，虽然史乏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想得出，爱书的陆游，也一定会像在四川一样购置大批书籍带回家乡。他宦游各地购置书籍刻书的事，曾在《跋续集验方》中说道：“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已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说的虽只是医方书，其他方面的书当亦不例外。

陆游的藏书，得之于日积月累的搜罗。《跋尹耘师书刘随州集》中记述他得《刘随州集》即足以说明问题：“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褫”（《渭南文集》卷二十六）。此外书肆所见，致力购书，如《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祠部集》：“此小集，得之书肆，盖石氏所藏也。”七十四高龄的陆游，还徜徉书肆，庆元四年（1198）在书肆购得魏野《草堂集》，《渭南文集》卷二十八为此事专门记下了此书“得之书肆，……龟堂病叟手识，时年七十有四矣。”陆游藏书的另一来源是友朋所赠，这在《渭南文

集》中所记颇多,如卷三十《跋陶靖节文集》:“张缜学士自遂宁寄此集来”等。

陆游在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58岁时,作过一篇《书巢记》,形象地描摹了他的“书巢”。文曰:

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客有问曰:“鹊巢于木,巢之远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袭人者。凤之巢,人瑞之;巢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夺燕巢,巢之暴者也。鸠不能巢,伺鹊育雏而去,则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为未有宫室之巢;尧民之病水者,上而为巢,是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穷谷中,有学道之士,栖木若巢,是为隐居之巢;近时饮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则又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户墙垣,犹之比屋也,而谓之巢,何耶?”

陆子曰:“子之辞辨矣,顾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客去,陆子叹曰:“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吾侪未造失道之堂奥,自藩篱之外而妄议之,可乎?”因书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陆某务观记。(《渭南文集》卷十八)

陆游晚年归隐山阴,其书斋名曰“老学庵”,这亦当是他的藏书的“书巢”,他有《题老学庵壁》诗:

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
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

晚年的陆游以衰病之躯,还经常整理图书,《雨后极凉料简篋中旧书有感》一诗中曰:

笠泽老翁病苏醒,欣然起理西斋书。
十年灯前手自校,行间颠倒黄与朱。
区区朴学老自信,要与万卷归林庐。

陆游爱书真是老而弥笃。

作为藏书家的陆游,临终之前始终没有忘情于他的藏书事业。明代叶盛《水东日记》中载有《陆放翁家训》,其中谈到藏书的有:

余庆藏书阁色色已具,不幸中遭扰乱,至今未能建立,吾寝食未尝去心。若神明垂佑,未死间或遂志,万一賫志及泉,汝辈切宜极力了之,至祝至望。此阁本欲

藏左丞所著书，今族人又有攘取庵中供瞻储蓄及书籍者，则藏书于此，必至散亡，不若藏之于家，止为佛阁，略及奉安左丞塑像可也。此事本不欲书，然势不可不告子孙，言及于此，痛心陨涕而已。^[5]

生前未能眼见复国，婚姻的遗恨，藏书阁未建成，可说是陆游的生平三大憾事。

陆游的藏书，未见书目传世，然于《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所作大批跋文看，概可见其所藏书的范围和有关校书、鉴书等活动。

陆游藏书范围颇广，经史子集四部书中尤多诗文集，如《王右丞集》、《渊明集》、《岑嘉州集》、《温庭筠诗集》、《柳柳州集》、《半山集》、《李太白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收藏佛经道藏。乾道二年(1166)所作《跋老子道德古文》(《渭南文集》卷二十六)称：

右汉严君平著《道德经指归古文》。此经自唐开元以来，独传明皇帝所解，故诸家尽废，今世唯此本及贞观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传，而学者亦罕见也。予求之逾二十年，乃尽得之。玉笈藏道书二千卷，以此为首。

陆游也喜欢收藏佛经，《跋晓师显应录》云：“《法华》之为书，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利根之士，一经目，一历耳，自不能舍，虽举天下沮之，彼且不动，尚何劝相之有哉？然人之根性利钝，盖有如天渊者。善知识谆谆告语，诱之以福根，惧之以祸罚，亦有不得已者。譬之世法，道德风化，固足坐致唐虞三代之治矣。而赏以进善，罚以惩恶，亦乌可废哉！观晓师《显应录》，当作是观。”(《渭南文集》卷二十八)。从这段跋文看，陆游不仅收藏佛经，且对佛学体察颇深。又同卷《跋注心赋》云：“世之未通佛说者，观此，亦得其梗概矣”。

陆游的藏书中，还收藏了大量书画碑帖，这对后来浙江藏书家的收藏颇有影响，他的书画收藏：

某家旧藏孝严殿绘像，先正侍中冯公在焉。冠剑伟然，与太行黄河气象相将。……(《渭南文集》卷二十六《真庙赐冯侍中诗》)

此图吾家旧藏。予居成都七年，屡至汉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庙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谓“先主武侯同阆宫”者，与此略无小异，则画工亦当时名手也。(《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古柏图》)

予在蜀得此二卷，盖名笔规模龙眠，而有自得处。季子子聿手自装褙藏之。(《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归去来白莲社图》)

法书一编付子聿，能熟观之，亦可得笔法之梗概矣。(《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法书后》)

陆游对碑帖收藏亦十分爱好，且收藏颇多。如《瘞鹤铭》是“予亲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残璋断缺，当以真为贵，岂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装。”(《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瘞鹤铭》)。“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

皆废。此两轴，君谟真行草隶皆备，石在仙井，可宝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装”。（《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蔡君谟帖》）。“予集黄帖，得赠元帅及王周彦三诗，甚爱之。有黄淑者，家三荣，见而笑曰：‘绍兴中再刻本也，旧石方党禁时已磨毁矣。’乃出此卷曰：‘是旧石本。’其笔力精劲盖如此，因录藏之。”陆游对苏轼的书法有特殊爱好，《跋东坡书髓》云：“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之一编，号《东坡书髓》。30年间，未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缉之。”（《渭南文集》卷二十九）。关于碑帖收藏，陆游《渭南文集》所记尚多，不一一赘述。晚年的陆游还时时把玩欣赏所藏碑帖，《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临帖》云：

此书用笔，霏霏多态度，如双钩钟王遗书，可宝藏也。笠泽陆务观跋。时年七十九，当嘉泰癸亥四月二十八日，居于六官宅老学行庵。

陆游校书、鉴书是其藏书活动中重要内容之一，当其78高龄时犹校书不辍：“晁以道著书，专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然亦博矣。凡予家所录本多得于以道孙子闾。子闾本自多误，予方有吏役，故所录失误又多，不暇校定。及谢事居山阴，欲得别本参考，又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学庵记，时年七十八。”（《渭南文集》卷二十九）。《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柳柳州集》：“‘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哀于此。子京。’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书，藏其从孙家。然所谓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务观校毕。”《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唐肇集》论印本校核不精之害，他说：“子发尝谪春州，而集中误作青州，盖字之误也。《题清远峡观音院》作青州远峡，则又固州名而妄窜定也。前辈谓印本之害，一误之后，遂无别本可证。真知言哉！《病马》诗云：‘尘土卧多毛已暗，风霜受尽眼犹明’，是为当时佳句。此本乃以‘已’为‘色’，‘犹’为‘光’，坏尽一篇语意，未必非妄校者之罪也。可胜叹哉！”他常常边读书，边鉴书。“此本颇精。今当涂本虽字大可喜，然极谬误，不可不知也。”（《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李太白诗》）他两跋《中兴间气集》，并加考辨，其一云：“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适也。评品多妄，盖浅丈夫耳，其书乃传于今。天下事出于幸与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叹。”其二云：“高适字仲武，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议论凡鄙，与近世《宋百家诗》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于诗者多，而此等议论乃传于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载多佳句，亦不可以所托非人而废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中兴间气集二》）。陆游收藏碑帖甚多，赏鉴力颇高。《跋法帖》云：“鲁公书殊不类。纸乃烟熏，周副之语尤俚俗。罗绍威用罗氏世宝印，犯唐讳，益可疑。跋语诗句亦鄙甚也。君谟岂至是哉！惟钱希白字奇古可喜，然非题颜帖，乃剪它轴附卷后耳。”对于宋人作伪唐帖，所评入木三分。

（二）陆游藏书活动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刻书、抄书

陆游宦游各地多有刻书，入蜀刻《岑嘉州诗集》，在江西抚州刻《陆氏续集验方》。对刻

书亦有其真知灼见，他赞同前人所论“印本之害，一误之后，遂无别本可证。真知言哉！”（《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唐肇集》）。对于那些喜刻书而不加校讎的刻书者，他直率地批评“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讎，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叹。”（《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历代陵名》）。

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时年62岁，除朝请大夫，知严州（治所在今建德梅城镇），陛辞之日，孝宗谓游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宋史》本传）。在严州，他于政事之暇，除“赋咏”外，刊刻了不少典籍，约略计之有：

《南史》、《世说》、《大字刘宾客集》刊本。《世说》有陆游“跋语”：“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

《剑南诗稿》收陆游诗作2500余首，刻于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应弟子要求刻梓。知建德县事苏林编次，郑师尹作序。郑师尹《剑南诗稿序》称：“太守山阴陆先生剑南之作传天下，眉山苏君林收拾尤富。适官属邑，欲锓本，为此邦盛事，乃以纂次属师尹。亦既敛衽肃观，则浩渺闳肆，莫测津涯，掩卷太息者久之。独念吾侪日从事先生之门，间有疑缺，自公余可以从容质正，幸来者见斯文大全，用是不敢辞。”陆子虚《剑南诗稿跋》：“尝为子虚等言，蜀风俗厚，古今类多名人，苟居之，后世子孙宜有兴者。宿留殆十载。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东下，然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其形于歌诗，盖可考矣。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以见其志焉，盖不独谓蜀道所赋诗也。后守新定，门人请以锓梓，遂行于世。”《剑南诗稿》刊成，为当时诗界一大盛事，诗人颇多题咏。如张镃《南湖集》卷四《觅放翁剑南诗集》有“见说诗并赋，严陵已尽刊。未能亲去觅，犹喜借来看。纸上春云涌，灯前喜雨阑。莫先朝路送，政好遗闲官。”其他如杨万里、楼钥、戴复古等均有诗咏之。

《江谏议奏议》。此书陆游集江公望奏议而刊。江公望，字民表，建中靖国初年（1101）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谏，抗疏极论时政，蔡京当权，编管南安军，后遇赦还。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夏得《江谏议奏议》于临安，知严州时在桐庐访江家遗属又得三表及赠告墓志，因合并于淳熙十三年（1186）刊印。

陆游一生喜抄书，老而弥笃，56岁时淳熙七年（1180），陆游在江西临川借书于郡人王、韩、晁、曾诸家，传抄甚多。关于他的抄书，《剑南诗稿》卷十二有《抄书》诗，自言：

书生习气重，见书喜亦狂。

.....

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

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 借书于王韩晁曾诸家。而吕周辅字文子友，近借朱黄墨。

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仓。
 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
 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

《剑南诗稿》卷十二又有《初秋小疾效俳谐体》中有句云“专房一竹几，列屋万牙签”，句下自注云：“今年传书颇多。”于此概见抄书之勤。

在中国藏书家中，陆游可能是一位把藏书作为“余事”的藏书家，但从他的藏书事迹，校书、鉴书、刻书、抄书等来看，称他为中国的一位藏书大家，该是恰当的。

三、陆子通藏书

陆游诸子中，能继父业的，只有最小的儿子陆子通（1178—1250）。子通一作子聿，又作子律，字怀祖。曾官溧阳尉，知严州。陆游晚年在山阴曾有《冬夜读书示子聿》八首，其三云：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子通也爱好藏书，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子聿所藏国史补》中称：“子聿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兴者乎？嘉泰壬戌闰月既望，放翁记。”由此可见陆子通爱好藏书，一如乃父乃祖。南宋陆氏祖孙三代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藏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陆子通也是一个刻书家，他后来亦守严州（治今建德梅城），刻印了不少书。陆子通刊书约计之有：

《尔雅义》二十卷，陆游祖父陆佃所撰。《曷鸟冠子》三卷，陆佃撰。《鬻子》十五篇，陆佃校。《陶山集》二十卷，陆佃撰。《徂徕集》二十卷。《剑南续稿》六十七卷，陆游撰。《开元天宝遗事》二卷。刊于桐江学宫。《老学庵笔记》十卷，陆游撰。刊于桐江郡庠。《西昆酬唱集》二卷，《唐御览诗》一卷。《潘逍遥集》。

《东里集》。《钜鹿东观集》十卷。《二典义》一卷，陆佃撰。

此外尚有《春秋后传》二十卷，陆佃撰；《春秋后传补遗》一卷，陆宰撰；《皇甫集》六卷；《圣政草》等书亦为陆子通或其父陆游所刊。南宋时严州刻书亦为世所重。据《新定续志》载：当时“郡有经史诗文方书凡八十种”，而陆游父子前后所刻书即有23种。

以上南宋陆氏三世藏书，不仅在浙江，且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浙江藏书特点，特别是对浙江后世藏书影响很深。兹以陆游为主，兼及浙江南宋诸藏书家，略可看出彼时浙江藏书风尚和特点，亦为研究吾浙藏书文化之重要内容，概可分为三端。

一、士大夫藏书成为主流,藏书世家辈出。史家有言,旧时“民间则舍敕令所定之五经四书外,几无他书足供翻诵。惟一般士大夫凭借稍厚,每于升平之际,肆意蓄书,往往积至数十万册,奇文秘乘,有为内府所无者”^[6]。吴晗所论,与浙江宋代私家藏书状况基本相吻合。据《中国藏书通史》宋代部分统计,宋代沿袭二代以上藏书世家有数十家之多,其中沿袭三世以上有事迹可考的为十四家,其中浙江有三家,即是两浙东路山阴陆宰、陆游、陆子遹;鄞县史浩、史弥大、史守之;两浙西路为湖州周秘、周晋、周密等三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与江西并列第一。二世以上藏书全国为16家,浙江为鄞县陈湓、陈曦祖孙;上虞李光、李孟传父子,新昌石公弼及其及从子邦哲等三家。然考之史实应增北宋杭州关景仁、关东父子藏书,又《中国藏书通史》所列周邦、周焯父子藏书,周氏藏书实在杭州,据此计算,浙江与江西又并列第一。从家世考察,浙江的这些世代藏书多为世宦、世儒之家,且多数有科考功名。例如山阴陆氏,陆宰曾官朝请大夫、直秘阁;陆游曾参加科考,但为秦桧所阻,后赐进士出身,为中国文学史著名诗人、词人。后官四川制置使参议,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其子子遹,曾官溧阳令、知严州。如从陆宰的曾祖辂算起,陆家为浙东世宦大族。又以鄞县史氏三世藏书而言,史浩为绍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其子弥大为乾道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其孙守之官终朝奉大夫。鄞县史氏为南宋浙东第一世宦大族。再如湖州周玘,原为山东望族,自其父周秘扈高宗南渡起,其家族又为湖州世宦世儒之家,周秘历仕刑部侍郎、周晋历官富阳令、监衢州、知汀州,周密曾官义乌令等,为南宋重要词人,著述甚富。仅以上述三家而言,皆为士大夫阶层,是世宦世儒世家。此为宋代浙江私人藏书之主流。

二、抄刻并重,增益藏书。古人藏书,多为手抄笔录,故藏书数千卷,已称其多。及至宋代版刻盛行,致书方便,一掷千金,万卷可立至。北宋时杭州刻书已声名远播,叶梦得称“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及至南宋,杭州成为全国书籍刻印图书流通中心。刻书业的发达,促进了藏书业的发展,是增加藏书的主要手段之一,一般士大夫和藏书家更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抄书同样是当时士大夫的习气,亦是增加藏书的重要手段。

宋代士大夫官员宦游所至,常以刻书为事,或刊刻先人及自己著作,或刊刻当地文献以传播文化,同时增加自己或官府藏书。仅以南宋一朝计,福建黄唐绍熙间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常平公事时,刻《礼记注》、《毛诗正义》等经疏合一本,为中国出版史之经疏合一刊本之始,意义重大。此外如岳珂、洪适、沈作宾、汪纲、施元之、唐仲友、廖莹中等在浙江皆有刻书,不少均成为名刻。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则为陆游。陆游宦四川曾刻《岑嘉州诗集》,在江西刻《陆氏续集验方》。晚年知严州,尽管宋孝宗许其“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然陆游在严州则致力于刻书,到任的第一年即刻《江谏议奏议》。淳熙十四年(1187)他又刊《新刊剑南诗稿》,此书一出,海内轰动,“未能亲去觅,犹喜借来看”(张镃《南湖集》卷四《觅放翁剑南诗集》),此外陆游在严州还重刻《南史》、《大字刘宾客集》、《世说新语》等。及至其子陆子

遵守严州,子效父事,所刊书今知有十五种之多。同时之宁波鄞县楼钥亦刻有《攻女鬼先生集》等。

南宋时士大夫藏书家增益藏书除刻书之外,另一手段则是抄书。还是以陆游为例,他一生抄书,老而弥坚,《剑南诗稿》卷十二《抄书》所作自注“借书于王、韩、晁、曾诸家”,及同卷《初秋小疾效俳谐体》自注“今年传书颇多”,皆是以说明问题。除陆游外,南宋士大夫藏书家亦多以抄书增益藏书,如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卷一论及其藏书“其间往往多予手自钞”;陈振孙在江西南城、福建莆田、浙江宁波等地大量借录传抄,遂使其书之富,超过内府。周辉藏书亦多手抄。

三、收藏图书之外,兼及书画金石碑刻。宋代浙江藏书家所藏除图籍之外,收藏书画已成风气,使其藏品更为丰富多彩。如五代吴越王钱俶之子钱惟演除有丰富藏书外,又多藏古书画;钱穆四世孙钱昱,所藏书画甚多,太平兴国八年(983)曾献钟繇、王羲之墨迹八轴于朝。钱惟演、钱昱书画收藏活动主要在北宋(时吴越王已归宋)。南宋浙江藏书家收藏书画更为普遍,山阴陆游即是其中一家,在所著《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中的218篇跋文,有不少是为其所藏书画所作跋语,如卷二十六《真庙赐冯侍中诗》言其家旧藏孝严殿画像;同卷《跋古柏图》言旧藏名手所绘成都诸葛武侯祠古柏;卷二十八《跋归去来白莲社图》言在蜀州所得,为名笔,“规模龙眠,而有自得处”,陆游所藏名家手迹亦多。此外,湖州周晋所藏有北宋张先所绘《十咏图》^[7],陈振孙见之“如获珙璧”。至于南宋末期贾似道悦生堂藏书楼所藏书画更多,并有书画收藏专用印。

宋代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收藏金石碑刻亦为藏书家关注,并由此出现了一门金石学,此为宋代藏书家之创举,其代表人物则为欧阳修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宋代浙江藏书家在金石碑刻方面所藏亦富,且有专著问世。叶梦得在《岩下放言》卷中自谓“余好藏三代秦汉间遗器”,所藏各种碑刻有千余帙,曾著《金石类考》五十卷。嘉兴藏书家岳珂家藏自晋唐迄南宋大量历代名人石刻、手迹,编就《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评价颇高。杭州藏书家陈思搜录古碑拓片亦多,编成《宝刻丛编》。湖州藏书家周晋所藏除四万余卷藏书外,还藏有“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8],周晋亦自言冬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9]。山阴藏书家陆游对金石碑刻拓片,有特殊的爱好,收藏亦多,他赴镇江,登焦山摹拓《瘞鹤铭》,尽管文字不全,仅是“残璋断玦”亦十分宝贵,认为“以真为贵,岂在多耶?”(《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瘞鹤铭》);他在蜀州又手摹蔡君谟帖于仙井,并亲手装裱(《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蔡君谟帖》);他在成都见西楼下有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辑为一编,号《东坡书髓》,30年来未尝释手。在《渭南文集》二百一十八篇跋文中,《跋二贤传》、《跋崔正言所书书法要诀》、《跋中和院东坡帖》、《跋汉隶》、《跋东坡问疾帖》等等,此类文字在他所作跋文中随处可见。陆游所作此类跋文,部分为其亲见他人藏

品而作,多数为其藏品所跋。由于这些所跋对象,绝大多数已成为过眼云烟,不得再见,然通过陆游传神文字,使我们尚可得见其精髓一二,弥足珍贵。

此外,宋代浙江藏书家的藏书风尚,还有如杭州藏书家文莹的宋人文集专题收藏,陆游收藏佛经、道藏,陈振孙之撰《直斋书录解题》,以及不少藏书家之校勘和版本研究等等,都对后代有重大影响,对明清时期浙江藏书风尚、特点有直接影响。

参考文献:

- [1]毛晋.汲古阁书跋·剑南诗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4]嘉泰会稽志(卷第十六)[Z]藏书[A].清嘉庆戊辰采鞠轩重镌本.
- [3]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A].陆游集(第五册)[C].中华书局,1976(以上引《渭南文集》均见是书,不另出注)
- [5]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C].中华书局,1980.
- [6]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A]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84.
- [7]《十咏图》于1995年为故宫博物院以1980万元拍得,据云此非真迹而为摹本.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22日第42版.
- [8]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C].中华书局,1983.
- [9]周密.绝妙词(卷三)[C].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社科院)

略谈古籍拍卖与当前藏书(附倡议书)

范凤书

“拍卖”亦称“竞卖”，是商业中的一种买卖方式，出卖者用叫价的办法将物品出售给出价最高的购买者。

从中国藏书史上看，长时期的藏书渠道，过去主要是通过古旧书市场来完成，书估从旧藏书家手中去搜求，再转售给新一代的藏书家。又因为中国历代积累的古旧书籍相当丰富，足供新藏书家的购求，形不成争购的局面。再加中华民族传统敦厚的民风，没有竞购古籍以满足自己收藏的习惯。所以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这种西方人习惯的竞购方式才施用于中国的古籍市场。据苦竹斋主(周连宽)所撰《书林琐谈》记，中国古籍的拍卖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拍卖谢光甫和沈方圃的藏书。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商品经营活动方式，概行禁绝。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藏书活动基本停滞，古旧书市场渐形萎缩，线装古籍被列入内部读物，明文规定只有地师级的人才能购读。所以50~60年代只有部分高级干部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还有藏书活动，如毛泽东、董必武、李一氓、田家英、王冶秋、巴金、黄裳等人。中国老一代的藏书家所藏古旧线装典籍绝大多数捐赠或转售给公共、高校和科研图书馆。又有相当部分由于鄙视而被送去还魂的造纸厂，更有大批遭受“破四旧”等人为的焚毁，造成了当前中国传统古籍紧缺的局面。自80年代以后，一切文化禁锢已经解除，民众的文化需求日趋强烈，藏书活动蓬勃复苏兴起，又更趋平民化，对古旧书籍则成渴求争购的态势。依当时一般的看法，宋刻元槧难以出现，明刊清版已成凤毛麟角，物稀绝少，货源枯竭了。但近十年来古籍拍卖市场的火爆，促生了线装古籍的出世，真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中国毕竟是泱泱文化大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虽经战乱兵燹，禁毁焚烧，以及水火之灾，但还有免灾的角落和神奇的护持，中国历史古文物即使仍保留有千分之一，也是个可观的惊人的数字。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自从1994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首次国内古籍善本拍卖以来，12年中招回、涌现出了一大批古旧典籍，包括不少宋元善本。最引人注目的几大宗有：

一、苏州大藏书家翁同龢后人翁戈万携往美国的翁藏遗书，2000年4月通过嘉德拍卖行购得，入藏上海图书馆。这批翁藏遗书总计80种，542册。其中宋刻本11种，156册；元刻本

3种,53册;明刻本12种,明抄本1种;清刻本27种,清抄本25种,清稿本1种。宋本中《邵子观物篇》后附有《渔樵问答》一卷,如计入则宋本实为12种。此书又为传世仅存的孤本。

二、祁阳陈澄中荀斋的一批携往香港的旧藏。其中包括著名的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以及宋版《荀子》、《顾注东坡先生诗》、《李长吉文集》、元刻《孔氏祖庭广记》、金刻《李贺诗歌编》等书共计52种。从1955年到2004年三次拍购回归国内,藏入国家图书馆。

三、是常熟曹大铁半野堂和菱花馆的藏书。2004年嘉德春拍上拍32件,秋拍上拍30件,共成交39件,总成交额为559万元。其中钱谦益撰《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抄》一种拍出269.5万元高价,创中国古籍单件拍品成交最高价。曹氏实际原收藏有约400多种古籍精品。“文革”中被抄,后落实政策退还约270余种,这说明曹氏手中还有古籍精品200种左右。

近十年来拍卖公司迅速增加,北京有中国嘉德、翰海、中国书店海王村、德宝;上海有国拍、朵云轩、博古斋、嘉泰、敬华、崇源;天津有今古斋、立达。而南京、广州、最近也出现了拍卖市场。并且上拍品种越来越多,什么唐人写经、宋刻元槧、明清刻本、稿本、抄本、批校本、名人信札、日记等等,无所不有。古籍拍品的成交价格也一年年明显升高,如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零册,前几年单本价2000-3000元,2005年秋拍竟上涨到25000元。现在看来,拍卖市场已成了线装古籍销售的主渠道,谁都想卖个好价钱,好书都要送到拍卖场,不再拿到地摊上去卖了。总之拍卖市场带动了古旧书市场的活跃,大批古籍的出世,又鼓舞了藏书家的热情。为藏书又开辟了一个新渠道,想成为传统上的藏书家又有门路了。只是增加了一个前提条件,手中必须积有雄厚的资本,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是如此,谁也无可奈何。藏书之路毕竟是宽广的,不一定刻意追求宋元善本,量自己的财力和识力,搜求到自己最需求最喜欢的藏品也应知足了。

附录:

关于组织编纂集大成的中国私家藏书资料汇编 与其相关之书目·篇目索引的倡议书

中国私家藏书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汇聚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重要宝库。历史上的藏书家粗计也达数千人,历代文献对他们的生平和藏书故事的记述,更是广泛分布,无论正史、方志、文集、碑传、笔记、诗歌多所涉及。自近代以来,对私家藏书的研究,亦约有百年的历史,出版专著、论文当以百千计,但所论及者只不过两三千家,且对每位藏书家并非都是完整资料的反映,更欠记明资料来源出处,甚感遗憾。所以很有必要

集众人之力编纂出一部自古至今完整、系统的私家藏书资料汇编和完善全面的相关书目的篇目索引,以便为研究中国文化史、藏书史、图书馆史、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提供最具权威的参考资料。

笔者有志致力于此,已达40余年,曾系统翻检了《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文苑英华》、《献征录》、《耆献类征》、《渊鉴类函》、《明文海》、《笔记小说大观》、《清碑传全集》、《辛亥以来碑传集》等大部头资料书以及近年基本报刊。已搜集到自古至今近6000位藏书家资料,抄录积累64开两面活页横格稿纸80厘米高,草编《中国藏书家姓名索引》一厚册,《中国私家藏书专著书目、重要参考书目暨篇目索引》一厚册,写出专著书目提要70篇。

我所以呼吁组织众力编纂此汇编及索引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中国历史悠久,积累文献浩瀚,非一人之力所能翻全看遍,像近年所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民国丛书》、《丛书集成续编》,以及大量新旧方志、家谱、族谱等书,我就很少过目,都需要系统搜检。

二、我身处僻域,工作在小城小馆,没有条件,没有资格去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没有完成此汇编的物质基础,只能由有条件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合适人选去申请完成。

三、我现年已75岁,年老力衰,两眼明显昏花,又不会使用先进方便的电脑,就我所搜集到的几百万字的资料再去整理抄录一遍也亦力不从心。且子女莫爱于此,无人接班,我死之后,这些成果必弃若废纸,一生精力将付之东流,实在可惜。

四、我愿无条件献出我所搜集到的资料。中国私家藏书资料汇编可以此为基础,再汇总郑伟章、宋路霞、李玉安、刘尚恒、薛愈、王河、梁战、叶瑞宝、瞿冕良、徐雁、萧东发、沙嘉孙、顾志兴、江庆柏、曹培根、韦力、柳和城等同好研究者所搜集到的资料,并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搜索,使之尽可能详尽、全面、准确。

五、建议成立一个编审委员会,聘请像来新夏、谢灼华、徐雁、萧东发、周少川、袁逸等专家学者坐镇分头审阅裁定,以保证质量。最理想的是背靠一个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样的大馆,以便校检资料。申请得到科研基金后,买几部电脑,聘请三五位有志于私家藏书的青年研究者将资料排比汇总,校核打印成册,大约可在三五年内顺利完成这一工程。

我初步考虑《私家藏书资料汇编》的内容,主要是:

1. 查清古今藏书家姓名、生卒、字号、籍贯、藏书楼名、所在具体地址、所编藏书目录,使用藏书印章及藏书数量、特色、重要宝藏以及传递散失等先故实;
2. 遍查正史、方志、文集、杂撰中有关藏书家生平及藏书纪事;
3. 全录历代私家藏书专记文、书目序跋文;

4. 全录或节录藏书纪事诗、论书信札、日记等；
5. 详查藏书世家及其藏书传递流散情况；
6. 遍查、节录自清末民初以来各种报纸杂志刊载有关私家藏书的论文和记事；
7. 遍查、节录藏书史专著以补充其他文献失记的藏书家及其藏书史实。

还初步考虑私家藏书资料汇编的编排原则：

1. 主要以藏书家生年为序，一线序列。生年不详者，以卒年或确切的在世年集中分段插编入适当年份；在世年不详者以朝代有序，集中编在朝代最末年代。

2. 祖孙世家藏书，以最早有藏书者为首集中资料，以便了解藏书世家传递情况。隔时太久者，可各另行编排。

3. 各项资料以资料刊载年代先后序列为主，藏家生平史料居最前，综合资料次之，零星记载最后。

4. 重复资料，录用文献最早的原始资料，引录资料舍去。

5. 所辑录资料均详细注明作者、书名、篇名、卷次。

中国《藏书家姓名索引》以藏书家姓氏笔画多少为序，再以“寒来暑往”（即点横竖撇）序列。

《中国私家藏书资料书目篇目索引》主要分三大部分：

一、私家藏书专著书目；

二、主要参考书目暨篇目索引可细分：1. 综合工具书，2. 丛类汇编，3. 文化学术史，4. 书志题跋，5. 史传，6. 方志，7. 文集，8. 笔记杂撰，9. 书信日记，10. 其他。

三、报刊刊载有关私家藏书篇目索引细分：

1. 1949年以前报刊篇目索引

①图书馆学、文献学专业期刊；②其他期刊；③报纸。

2. 1950年以后报刊篇目索引

①图书馆学、文献学专业期刊；②其他期刊（综合杂志、文史杂志、学报……）③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省报、晚报……）

3. 港澳台报刊篇目索引：①期刊篇目索引；②报纸篇目索引。如无必要专列，亦可纳入上述各类。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焦作东方中学）

《四库全书》任事诸臣职名录补考

江庆柏

【摘要】 作者利用《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文溯阁文源阁详校各员等拟赏级匹名单进呈片》所附“拟赏详校四库全书各员名单”与殿本“总目”相核，对“职名录”作了补考，对四库全书的纂修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四库全书；任事诸臣；职名录

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列有一份记载四库全书馆内各项职务及任职人员的名单。浙本“总目”称为“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殿本“总目”称为“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两份“职名录”互有出入。浙本“职名录”总计362人，除去兼职二人，实际为360人。其中史国华（缮书处收掌官）一人为殿本所无。殿本“职名录”总计370人，其中张若准、李友棠（以上副总裁）、刘亨地、萧芝、姚颐、黄良栋、陈初哲、林树蕃、谷际岐、蔡廷举（以上纂修官）、吉梦熊（总阅官）等11人为浙本所无。去其重复，共得371人。不过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黄爱平先生《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根据四库全书档案，补出了22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102页）。其中张若准、李友棠、吉梦熊、刘亨地、萧芝五人已见于殿本“职名录”，所以实际为17人。他们是：庆桂、钟音（以上副总裁）、刘纯炜（总校）、钱载（总阅）、张运暹、陈梦元、郑熾、李光云、朱依鲁（以上纂修并兼校勘）、金蓉、朱诺、茅元铭、缪晋（以上纂修）、永善（监造官）、高中、王彝宪、胡予襄（以上分校）。

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又考得120人，依次著录如下。凡一人有多次见于“档案”者，一般只出首见者。

孙梅，分校。见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汉票签为查明龚敬身等在四库全书处行走事致典籍厅移付（一五〇，202。此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档案序号及该件档案所在页码）。

吴锡龄，原充全书校对，后授翰林修撰，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六日由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再请充任《四库全书套要》校对。见于敏中奏折（二六六，392）。

黎溢海,纂修、翰林院检讨;汪鏞,覆校、翰林院编修;田尹衡,纂修、内阁中书。以上3人见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奏遵旨将总裁等错误次数查核并交部察议片》(三七三,579)。并参见同日清高宗谕旨(三七四,581)。

叶兰,分校官、内阁中书。见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五日户部为程景伊等罚俸事移会(三八三,591)。

吴绥诏,任校勘。见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清高宗谕旨(三八九,620)。

徐立纲,覆校;王家宾,分校。以上2人见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军机大臣查明程景伊等错误次数上奏(三九九,630)。

胡绍濂,总校。见大学士于敏中等奏请再添设总校办理《四库全书荟要》折(四〇二,634)。

罗万选、蒋宽、吴甸华,均为分校。以上3人见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四三四,728)。

张虎拜,覆校、内阁中书。见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大学士阿桂等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四六七,770)。

缪琪,总校;杨懋珩,总校;周厚辕,分校。以上3人见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九日军机大臣遵旨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四九三,811)。

王钟泰,分校。见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军机大臣遵旨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五二二,859)。

潘庭筠、朱忻、汤垣、胡士震,均为分校。以上4人见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军机大臣为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五五一,928)。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九日《谕内阁四库全书告成翰苑各员著按考试等第分别升降革罚》(一〇八六,1859。以下简称“考试”),潘庭筠列为四等。

嵇承志,分校。见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全书处汇核缮写说错记过清单”(六三二,1063)。

康仪钧,分校。见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六四八,1110)。

孙溶,分校。见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三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六七六,1145)。

秦泉,分校。见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六八九,1160)。

黄晃,分校。见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七〇五,1183)。

李谔、章宗瀛,均为分校。以上2人见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高宗谕旨(七三

二,1233)“考试”李榕列为四等,章宗瀛列为三等。

潘曾起、陆湘、蔡必昌,均为分校。以上3人见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七四八,1252)。

翁树棠、苏青鳌均为分校。以上2人见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七九八,1381)。

富炎泰,侍读学士。见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等奏遵旨拟赏四库全书议叙人员及未经引见名单片》(八四六,1462)。亦见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多罗质郡王永瑤等奏遵旨议叙四库馆各项人员折》(一〇八三,1849)。

陆伯焜,纂修官、翰林。见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英廉奏遵旨派员检阅各省解送明以后各书情形折》(八五三,1516)。按: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多罗质郡王永瑤等奏遵旨议叙四库馆各项人员折》(一〇八三,1849)中,陆伯焜与德昌、瑞保、百龄等同列名办事处提调。“考试”列为一等。

阿肃,总阅官;徐以坤、杨炤、潘有为,均为总校。以上4人见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查明所进书籍错误次数上奏(八七四,1558)。

甘立献,分校。见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查核所进第二分全书错误次数上奏(九六三,1711)“考试”列为三等。

郭在遼,分校。见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稽核所进第三分全书错误次数上奏(一〇〇六,1754)“考试”列为四等。

祁韵士,分校。见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吏部为知照四库全书馆记过人员罚俸事致典籍厅移会》(一〇一二,1761)“考试”列为二等。

叶佩荪、章维桓、程嘉谟,均为总校。以上3人见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和珅等奏查核四库馆暨三通馆错误记过各员交部察议片》(一〇四二,1792)。按: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多罗质郡王永瑤等奏遵旨议叙四库馆各项人员折》(一〇八三,1849)云:“章维桓,由举人捐员外郎衔奏充。校过第四分书八千余册。”又云:“叶佩荪,由候补知府奏充。校过第四分书七千余册,身故。其子举人叶绍榘接办三千余册,共一万余册。”

又,据上文,叶绍榘亦曾在四库全书馆任校对。

舒宁、明启、观成、倭生额、常宁,以上5人见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多罗质郡王永瑤等奏遵旨议叙四库馆各项人员折》(一〇八三,1849),并为翰林院收掌官、笔帖式。

福克精额、苏楞额、长闾、依清阿、依常阿、永清、诚明,以上7人为督催、监造、收掌官,列为一等。富森布、奇明、舒和兴、梁海福、王海福,以上5人为督催、监造、收掌官,列为二等。同上。

吴璫,一等;曹仁虎、江德量、卢荫溥、童凤三、万承风、初彭龄、玉保,以上7人二等;彭

冠、陈嗣龙、蔡善述、芮永肩、白麟、吴敬舆、刘锡五、秦承业、恭泰、戴斯琯、寇赉言、褚廷璋、秦潮，以上13人三等；旷楚贤、许霖、孙效曾、敷森布、李簧、丁荣祚，以上六人四等；索尔敏、永德、沐特恩，以上3人不入等。见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九日《谕内阁四库全书告成翰苑各员著按考试等第分别升降革罚》（一〇八六，1859）。按：清高宗谕旨云：“朕因修四库全书，未免从权优用。兹书既告成，理应循名责实，以清翰苑。是以于乾清宫考试，而切题者不一二见，本氏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此处所列30人，均为不见于“总目”卷首“职名录”及今人补考者。

贡生陈照、张谦泰、戴凤苞，生员刘坚、刘堪、祝孝承、梁宝绳、胡纪勋、何天衡、席世臣，监生蔡本俊、戴奎、童潜、谢扬镇、朱文鼎、王绶长、蒋和、胡又兰、汪农、马德、刘滨、郑槐、梁承云、蒋光粥。以上24人均充江浙三阁全书校对。见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质郡王永瑤等奏请钦赐三分书校对贡生陈照等举人并准予会试折》（一一八七，1986）。折云：“乾隆四十九年，臣等因校对需人，奏请于生监中拣选文理明通者二十四人，令其自备资斧，充当校对，期限三年将全书校勘完竣，准作举人，一体会试。”按：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一日永瑤奏折称，为办理江浙三分全书校对事，需于生监中募有情愿校对者，“得二十一人足敷办理”（一〇一四，1766）。实际选用了如上24人。

朱文鼎，分校。见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纂等交部议处》（一一九一，1991）。

涂日焕，分校。见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议陆锡熊详校文溯阁书籍折》附清单“原办文溯阁全书疏漏之总纂、提调、总校、分校罚令总校书籍各员名单”（一三五四，2192）。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南三阁全书告竣，标志着四库全书主体工程的完成。我们统计四库全书编纂人员名单，亦应依此为界。据“总目”卷首“职名录”所记及黄爱平先生考订人数，并加上上文所补，总计为508人。此均为姓名可考者。

主体工程的完成，并不表示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全部结束。实际上，在七分四库全书全部抄完之后，因发现讹误较多，又重新组织了相当的人力进行复校。例如就在南三阁全书告竣的当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即拟写谕旨，派在京官员校改文溯阁文源阁书籍。据所附清单拟派看书人员将达270余人，涉及中央多个部院（一二〇二，2003）。实际参与者为258人左右。七月初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莫瞻菴又上奏，请于武英殿详校南三阁全书（一二二六，2038）。初八日清高宗谕内阁著照所奏办理（一二二八，2040）。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搞藻堂、味腴书屋所贮之《四库全书荟要》二分，亦需校勘（一三五四，2192）。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文溯文源阁详校各员等拟赏缎匹名

单进呈片》所附“拟赏详校四库全书各员名单”，为177员（一二五三，2070）。这些人员中，除极少数原来就参加四库全书纂修的，如梦吉等之外，大多是新参加的人，包括通政使蒋良骐，编修蒋攸铨、孙星衍等。

而且不仅是已缮写书籍的文字校对问题，还有大量图书的撤换、补改等。由此可见，涉及四库全书纂修的人员，前前后后是很多的。

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书后，附有“办理四库全书任事诸臣职名”，它仍然只是照录了浙本“总目”的名单，未能与殿本“总目”相核，更没有使用“档案”资料。有鉴于此，本文对“职名录”所作补考，或有助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研究。

参考文献：

- [1]四库全书总目[C].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本，1965.
- [2]四库全书总目[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殿本，1987.
-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4]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02.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总结百年旧书行业 弘扬华夏旧书文化(下)

——《中国旧书业百年》读后

吴永贵 黄镇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闪亮登场,犹如启动了一个百变的万花筒,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行业工艺、风俗习惯失去了往日蓬勃的生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传统悠久的华夏古旧书业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古旧书业是我国明末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的传统文化产业之一,她与历代文化人结缘,数百年间创造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辉煌业绩。当代文化人士面对古旧书业日见萎缩的窘境,无不忧心忡忡,不甘她的单独离场,谋划着令其重返文化学术台面的方略。徐雁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心承20多年的爱书情结,经历三年半的搜访苦思,精心结撰成我国第一部全面展示中国旧书业百年风云的专著——《中国旧书业百年》,听说又在精心写作其续编《旧书文化笔丛》。

就《中国旧书业百年》来说,全书史论结合,文情并茂,洋洋百万之言,在深广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描画中国旧书业百年盛衰的轨迹,深入剖析盛衰表象下的社会动因,切实探讨保护振兴旧书业的思路对策。全书九篇,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可归纳为三个单元:

(1)包括第一、第二篇,以燕京、江南为代表,分别选取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中国书店、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上海、上海图书公司等作为坐标,构成南北历史长廊。作者如数家珍,将其中的名肆名家、史事史迹、典籍典故等,一一拈出,组成一幅高像素的历史长卷,充分展示出中国旧书业百年的壮丽风情。

(2)包括第三至第八篇。作者将百年时空切分为近现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段,着重分析旧书业百年的生存状态。前者以叙述近现代书厄为基础,重点反映现代,尤其是抗战中旧书业与学者联手,奋起抢救和保护古旧书刊的壮举。后者从建国后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叙至改革开放后种种拨乱反正的措施,其中对文革书厄,作者痛心走笔,通过当事人的叙述,真实地再现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沉痛历史。文革书厄,使我国古旧书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使文化知识传播出现严重倒退,对此书中作出了准确、充分的估价。

(3)包括“弁言”九章和第九篇“振兴当代古旧书业”。这部分虽然篇幅只占全书的20%左右,却是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我国旧书业生存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如分析旧书业的三个经营特点,提出关于国营古旧书业发展的三个深层次问题,以及扶持私营旧书业,古旧书拍卖和收藏,网络经营等,作者的分析和阐述都极有见地,充满理论思辨色彩。

《中国旧书业百年》的出版,是中国图书文化传播史研究的重要收获。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徐雁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建构,为华夏古旧书业这一过去并不起眼,但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作用的行业,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其百年风雨历程,为中国旧书业史的学科构建奠定了学理的基础。

作为长期关注研究古旧书业问题的学者,徐雁对古旧书业的本质特点有着准确的把握,他强调古旧书业“原是中华传统文化生态圈里未尝缺失过的重要构件”,但又只是一种应社会读书人口中很少一部分成员的特需而产生的特种行业,因而是一种永远不能缺失的“夕阳产业”。这样的学术表述,为古旧书业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作者在书中准确地界定了古旧书、古旧书业的概念,指出以中国古籍的加工整理为核心衍生出来的,诸如分类、目录、版本、句读、工具、校勘、考据和传注等学问是离不开古旧书这一历史文献基础的,强调其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而古旧书业是指从书籍的持有者手中,回收其售出的古书和旧书,并再次将之投向市场向读者销售的行业,强调其文化传播中介的功能等等。这些为旧书业的研究界定了严格的学科内涵。

同时,全书对古旧书业百年中为保存传播文化典籍所作贡献的出色总结和叙述,必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同步引起海内外学者对华夏古旧书业作为文化传播重要中介的学术关注和研究兴趣,从而为文化传播研究开出新的领域。

其次,作者采用文献学方法,缀集了百年来参与古旧书业建设的方方面面的人物及其书业活动和相关著述。所以,书中每一叙述或论断,作者总能恰当地征引当事人的文字和相关文献记载。经初步统计,书中页注多达1500余条,这充分说明作者至少引用了千余种(篇)文献,而搜集阅读的范围肯定更广,其爬梳文献资料的艰辛,考察旧书业态的专勤,于中可见一斑。这么繁富的引证,在学术著作中是十分罕见的。文献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所有爱书、藏书、海书,对旧书业有情、有感、有话要说的文化学者。作者请出这么多有影响的当事人,征引他们在相同或不同时空发表的言论,正有力地保证并突出了这部专著的学术本色和史学品格。同时也为百年来,尤其是抗战以来为古旧书业发展作出贡献的文人学者,建立了一份可以传之永远的文化档案。如书中谈到启功先生晚年回忆年轻时于北京富有书文化修养的古旧书业主交往的至情文字,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在北京仙逝,这段文字的纪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全书充满对古旧书业崇敬、回护的感情,所以具有巨大的学术感染力。诸如关于抗战时期古旧书业奋起抢救民族古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文

化大革命”中,那些深知古书文化价值的文人学者“自觉焚书”的行为,都令读者回味无穷,思索不止。因为古旧书和那古旧书业,原本就是一曲回旋在作者心中永难消逝的生命旋律,也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样一部能让每一位有过在旧书店淘书经历的读者禁不住重温往日得书的惊喜之情,每一位曾在古旧书业服务的工作者油然浮现当年的奋斗场景,每一位知识分子切实考虑怎样为这“夕阳产业”的薪火永续作点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以其眼花缭乱的动感色彩,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轻而易举地俘虏了年轻人的心志,改变了他们的阅读习惯。据资深出版家巢峰在《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中提供的数据,自1985年我国人均购书6.3册,创历史新高以来,这个数字逐年下降,2003年为5.3册。这种因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而产生的图书消费趋势,将给旧书业的发展远景带来更多的未知数。而社会上有大量尚具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旧书遭忽视,被丢弃回炉,浪费了大量宝贵的人力和能源。这不符合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原则,亟待旧书业去有效地组织利用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国旧书业百年》已经理性地、辩证地提出并分析了这些问题,但尚未也不可能完全加以解决。然而她的成功出版,将引导全社会积极地思考,人人为旧书业的振兴共同建言献策。这应该是作者的心愿,也正是这部著作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所在。

从宏观上看,自清末学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开始,很多学者的著作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古旧书业的情况,因其切入角度不同,研究视野各异,参考价值的高下难以确定。但可以断言的是,今后中外学者要了解研究中国古旧书业的历史,乃至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这部《中国旧书业百年》都必然是最重要的参考论著之一。因此,我们热切期待着徐雁教授在即将杀青的新著《旧书文化笔丛》中的种种新的探索。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传奇的面食铺

袁 逸

历史真是让人捉摸不透。读书人的喜剧,有时竟选择了在某个小镇的面食铺开演,感觉阴差阳错,有点滑稽。吃点心吃出个天大的惊喜,犹如今天的打工仔上街闲逛,花2元钱买了张彩票,不意竟中了500万元的大奖。然而,好戏还是开演了,时间在明末的某一天。

小桥流水,参差烟柳。暮色中的江南古镇乌镇。市井一角的面食铺,贩夫皂卒、寒儒贫士、各色人等纷杂进出。一个商贾模样的人带着少许的疲倦凑了过来,他也是这众多的食客之一。四处奔波的生涯中,像这样临时找个小店解决饥渴是常有的事,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这一顿寻常不过的便餐会有天大的惊喜在等着他。此刻,他刚凑近柜台想跟老板说点什么,突然,眼前一亮:那用来包裹面点的纸是从整本的古书上撕下来的,这书正随意地扔在柜内的竹篓里,有两本。稍加凝视,凭他老辣的眼光判断,这书应该是有点来历的。原来,他是个书商,到处搜购贩卖古旧书正是他的本行。平日里,他驾船沿着江南的河湖江汉,主要奔走在苏南浙北一带(也就是今天被称作“长三角”的地区)访书贩书,这一天正好来到乌镇——这个文化积淀甚为深厚的古镇,传说中梁昭明太子曾经在此读书,那古朴的牌楼似乎印证着传说的确有其事;他更无法预见二百多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也会诞生于此,应该离面食铺不远。这会儿,他向老板要过竹篓里的两本书,稍稍的翻阅一下,立刻血脉膨胀,内心狂喜不已——要不是历练多年,心理承受能力强,他或许已晕厥过去。破篓里不起眼的书竟是珍贵的宋版本,且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缺失的北宋版《后汉书》中的两册!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劲。当下,他不露声色,向老板买下了这两册书。花几文钱,这书就轻易到手了?这一转手会是几十两的银子啊!他掐了一下自己的腿,确信这是真的。真的。

天上掉下个馅饼。那书商的狂喜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再仔细翻阅检查,却发现一本书的第一页少了。心里又是一颤,赶紧问老板,回答说是刚才对面街坊买面时用这纸包面拿走了。于是,忙作揖堆笑,好说歹说央求老板跑出去把那页撕走的书讨了回来。一番曲折,有惊无险。面子顾不上要了。

书商的惊喜事出有因。原来,这两册北宋版《后汉书》是他的一个老主顾委托搜访的。

这主顾可是当时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他的大名叫钱谦益，当朝大佬，学界泰斗，也是当时名闻海内的藏书大家。其时正春风得意，财大气粗，四处搜罗秘籍珍本；与意气相投的爱妾河东柳如是，专心经营其在常熟的藏书楼——绛云楼。天启年间，其以一千二百两银子的高昂代价从新安商人黄尚宝手中购得梦寐以求的北宋版《两汉书》，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的《后汉书》少了两册；让他的欣喜打了折扣。于是，钱氏到处托人，悬赏搜访缺失的那两册《后汉书》。这书商便是受托人之一。

且说那书商凭空得了那两册宝贝也似的书，哪里还顾得上继续南下？赶紧掉头返舟，披星戴月连夜往常熟赶去。结果不难想象。其同时代的晚辈曹溶的《牧斋遗事》生动记录了此事皆大欢喜的结局：“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以廿金。是书遂为完璧”。拿现在的话说，是双赢。钱氏珍藏合浦珠还，补遗增色，了却心病一桩；书商成人之美，况一夜间获利数千倍，也是名利双收。这事遂成了此后数百年文化圈中的美谈。

只是可惜，这人间的喜剧并未能始终演下去。未过多久，钱氏的景况便日渐窘迫，渐渐地开始变卖其藏书。这千辛万苦不计血本得来的宋版《两汉书》羊肉当了狗肉卖，以一千两银子的价甩卖给了谢三宾；时在崇祯十六年（1643）。钱氏那个心酸啊，犹如李后主当年挥泪别宫娥，梦里哭醒几回。其实，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仅仅七年之后，绛云楼的藏书便因火烛不慎而毁于一炬。又此后，随着满清铁骑的践至，其不多的余生将夹着尾巴，愈加灰头土脸。

面食铺的传奇百年不遇，千年难逢，可遇而不可求。但，又绝非偶然两字得以尽释。设想一下，同样的时间、地点、场景，只是换一个人，事情的结果可能完全两样；竹篓里的两册书或许撕完了也没人知觉。事实上，对邻买面者的反应已给出了答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传奇的极大的偶然性中又包含了一定的必然因素，正是书商良好的职业素养，高度的职业敏感与责任心，促成了此事的完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圆满结局。中华典籍数千年的绵延流传，也正是得益于无数有心之士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得以涓流汇大江，壮观天下。大约二百余年后，类似的传奇再次在面食铺重演，印证了这一点。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动静更大，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地点还是在浙江的一个小镇，杭州近郊一个叫留下的地方。留下镇之得名，源自宋高宗南渡后为皇城择址时金口一开蹦出的“西溪且留下”的圣言。该地河汉湖荡，梅树芦苇，野趣丛生，颇得历代文士僧侣的青睐。当21世纪的曙光照临时，这一带已建起了著名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此是后话。

事件发生的时间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主角是两兄弟。涉及的书还是一部，虽不是宋版，却价值更高了许多，因为这是一部巨无霸的书，古来独一无二的书，叫《四库全书》。

说起这《四库全书》，可有来头，它是乾隆皇帝为显摆其文治之功而搞的标志性的政绩工程。当年，乾隆爷脑袋一热，欲与祖上康熙帝比试伟业风光，武的各有千秋，那就在文采

风流上赶超，盛世修典嘛。于是号令天下，兴师动众，地无分南北，书不论公私，动用全国的资源编修《四库全书》。这一编整整用了10年时间，从乾隆三十七年初起兴，到四十七年初编成。说句公道话，尽管在这十年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被支使得鸡飞狗跳团团转，长江南北的各地百姓翻箱倒柜频受骚扰，但乾隆本人也确实为这部书的编修呕心沥血操碎了心。事无巨细事事过问，件件关切。查建阳勤有堂，询宁波天一阁，一年下来数百道谕旨全是为的编书。勤政模范，文化建设的带头人啊。书编成了，说是一部书，实则包含了3500余种近8万卷书，历代各科的经典珍善大致囊括其中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由此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规模超大固然让人得意，但印制却成了问题，即使以当时较为发达的印刷技术也难济其事，于是选择了抄写。

《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了7部，内廷供皇上御用的4部，分储北京故宫、圆明园、盛京故宫、热河避暑山庄。尔后，为表彰江南士人为编书作出的突出贡献，并体恤江南士子的勤勉好学，皇恩浩荡又命抄写三部，分别在镇江、扬州、杭州建楼储藏，允当地士子借阅。这个过程又用了十来年光景，期间的波澜曲折难以尽言，如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抄写就因质量管理等问题处罚查办了陆费逵等要员。大致在乾隆六十年光景，当最后一箱书搬进杭州文澜阁时，这项耗时20多年的巨大工程算是尘埃落定，大功告成。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江浙一带的士人学子或驾船，或雇车，或单行，或结群，背着行囊，提着饭盒，汲汲奔走于这三个皇家藏书楼，孜孜抄写寻常难得一见的珍籍秘册，开心得如天天过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然而，好景不长久。太平天国的义旗在惊扰了统治者的好梦的同时，也扰乱了普通百姓的安生，没收了普通学子读书抄书入场券。是时，大半个中国成了战场，烽火遍地，生灵涂炭。当年乾隆爷眷顾赐恩江南士人的标志的文汇阁、文宗阁已随着扬州、镇江的相继攻陷而楼毁书亡。接着，轮到了杭州。忠王李秀成部于咸丰十年、十一年间两度攻克杭州，昔日的东南形胜繁华地顿时哀鸿遍野；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文澜阁也终于在战火中塌毁。

我们再把镜头切回到留下镇。以今天的眼光看，留下镇距杭州府城不过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因其紧邻西溪湿地，河道纵横，交通多有不便，太平军的锋芒尚不及于此；因而有大量的难民躲避此地，其中就有杭州著名学者丁申、丁丙兄弟。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在当时声名显赫，列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在其身后，因其家属顾识大体，将藏书整体售予江南图书馆，而使今天的南京图书馆雄峙东南。

却说，难民的蜂拥而至打破了小镇往昔的宁静，留下镇呈现出战时畸形的繁荣，这丁氏兄弟也干脆在当地开起了米店，以为暂安之策。某日，丁申在街上看到那些从食品店、点心铺买出来的食物多用书纸包裹，细视之下，乃大吃一惊：这些食品包装纸竟全是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上撕下来的！阁书休矣！这座曾经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那样优美而富有的藏书楼毁了！丁申已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走回暂住地的，心中的圣殿崩塌了，祖先的文献毁灭了，

脑子里骤然空白又异常清醒。该做什么?能做点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心境可用“心焦如焚”来描述;也类似阿庆嫂为救助被困在芦苇荡里的新四军伤病员之穷思竭虑焦躁不安。兄弟俩急急合计的结果是,冒险试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即刻在当地招募胆大力壮者,许以重酬,潜入杭城,在文澜阁废墟乘夜捡拾狼藉散乱的库书,天亮前捆载潜出,暂存西溪的丁氏宅中。如是冒险往返,违禁偷运,竟抢救出数千册库书,约为原先规模的十分之一。1862年的这段非常的日子里,孤山脚下的草木宿鸟见证了这一群平凡草民的壮举伟业。每每读到这段史实,便徒生感叹,恨自己才思愚拙,不足以描述其惊世传奇之万一。论情节,论奇崛,论悬念,论惊悚,这支留下别动队的创举丝毫不亚于国内外大片中诸如《加里森敢死队》、《渡江侦察记》、《敌后武工队》之类。题目倒是想好了,就叫《孤山行动》或《冬夜的N个瞬间》吧。

只觉得,丁氏兄弟的觉悟一点不比阿庆嫂低。他们既非党团成员,又无组织派遣,家国危难之际,自觉,自发,自寻烦恼,自掏腰包,位卑未敢忘忧国,挺身组织了这场特别行动。丁氏兄弟的贡献远不至此。他们后来避难上海时又出资委托书商在杭州广泛搜罗流散民间的库书,收得八百余捆。清军收复杭州后还继续在浙江城乡购求。至同治十三年(1874),仅以丁氏兄弟之力,即已收得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7800余册,也即原藏规模的半数以上。丁氏兄弟的这一持续而卓越的壮举让我自然地想起了伟人的谆谆教导: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伟哉丁氏!

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正是在丁氏兄弟业绩与精神的鼓舞下,给了浙江人民重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信心和信念。此后近百年的岁月里,浙江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动作频频,持续发起补抄补购行动,终至阁书璧全。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光芒万丈,光耀千秋。2006年的春天,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杭州隆重开印,线装原版式,孤山佳话仍在延续。

从面食铺到文澜阁,一根历史的红线将它们串联起来,一股精神的力量将它们联结起来,这就是传统中国崇文敬学、珍惜典籍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 [1]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出版社,2000.
- [2]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史记》名称的由来及变迁

李文洁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不过,司马迁之《史记》在成书之时并未有“史记”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即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1]“史记”本是历史著述的泛称,但司马迁之史著最终专擅此名,形成了由泛称至专称的演变。

一、“史记”为史书之泛称

“史记”,最初泛指史官之记述。司马迁《史记》中即多次用“史记”指称前代的历史记述,凡11例:

- 1.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史记》卷四《周本纪》)
- 2.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
- 3.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一十四《十二诸侯年表》)
- 4.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一十五《六国年表》)
- 5.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史记》卷二十七《天官记》)
- 6.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
- 7.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卷三十八《晋世家》)
- 8.(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9.(孔子)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10.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提到的这些“史记”皆为春秋战国时的史书,即如张守节正义所说:“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2]。而且,司马迁并未以“史记”来指称自己的著述。“史记”在司马迁著述之时,还是史书的泛称。

《汉书》所言“史记”,亦指《国语》、司马迁《史记》和当时其他史书而言。靳德峻在《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一文中比较分析了《汉书》称引“史记”时事件的出处^[3]。其中有九例“史记”所引之事是《国语》和司马迁《史记》都有记述的;有三例《国语》记事而司马迁《史记》无;另外有四例不见于二书,其材料当来源于其他史书。刘知己在《史通·五行志错误》中就《汉书·五行志》中出现的若干“史记”说:“《史记》、《左氏》交错相并”,“《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不云《国语》而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乎”^[4]。刘知己批评《汉书》中所引之事出于《国语》、《左氏春秋》而以“史记”称之,是因他将“史记”视为司马迁著述的专称。这也从反面表明《汉书》所用“史记”,仍为诸史书的泛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又多举“史记”泛指史书之例。“逸周书有《史记解》。《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公羊疏》引《春秋说》云:‘邱揽史记’。又引《闵因叙》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之后汉犹然’。《越绝书》云:‘夫子作经揽史记’。《东观汉记》云:‘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公羊·庄七年传》何休注云:‘不修春秋谓史记也。’是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明太史公书当时未有史记之名。”^[5]另外,这其中提到《东观汉记》所说的‘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事,在《后汉书·班固传》中写作“私改作国史”^[6]。则“史记”之意可与“国史”相当,在此处指班固所撰《汉书》。

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及其他一些汉代史书中“史记”的用法可知,“史记”在汉代泛指诸史,而非司马迁著述的专称。

二、司马迁《史记》的多种称法

司马迁之史著初未有《史记》之专名,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不曾定名,出现了多种称法。史籍中可见的其他称法有四种,兹罗列于下。

第一,“太史公书”,凡10例。

1.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白序》)

2.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

3.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论衡·超奇》^[71])

4.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论衡·佚文》)

5.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论衡·案书》)

6.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论衡·对作》)

7.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卷四十四《班彪列传》)

8.(杨终)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卷五十三《杨终列传》)

9.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汉书》卷七十一《张汤传》如淳注引班固目录)

10.褚顛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史记》卷一十二《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引韦棣)

第二,“太史公”,凡8例。

1.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扬雄《法言·问神》)

2.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法言·君子》)

3.太史公百三十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4.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5.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牒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史公《表》、《纪》相似类也。(《论衡·超奇》)

6.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后汉书》卷二十五《窦融列传》)

7.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后汉书》卷四十《范升列传》)

8.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后汉书》卷四十《陈元列传》)

9.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晋书》卷八十八《孝友刘殷传》)

10.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汉书》卷一百《叙传上》)第三,“太史公记”,凡8例。

1.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汉书》卷七十八《杨恽传》)

2.《太史公记》诮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云。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论衡·道虚》)

3.太史公记凡百三十篇,五十余万言。(《汉纪·孝武帝纪》)

4.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风俗通义·皇霸·五帝》)^[8]

5.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郿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窥周室。(《风俗通义·皇霸·六国》)

6.谨案太史公记:燕太子丹遣荆轲欲西刺秦王,与客送之易水。(《风俗通义·声音·筑》)

7.太史公记: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风俗通义·祀典·杀狗磔邑四门》)

8.按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以为文成将军。(《抱朴子·对俗》)

第四,“太史记”,凡2例。

1.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质秦,始皇遇之益不善。(《风俗通义·正失》)

2.谨案太史记:秦始皇欺于徐市之属,求三山于海中。(《风俗通义·正失》)

以上材料显示了东汉人对司马迁著述的多种称法^[9]。其中,有些称法在某类书中出现的比较集中,比如正史多用“太史公书”、“太史公”。但总体来讲,这些称法也还不是司马迁著述的定名,同一部书中会同时出现几种称法,两汉书如此,《论衡》、《风俗通义》亦如此。

三、以“史记”称司马迁著述

陈直在《太史公书名考》中详析史料,论证东汉末年“史记”成为司马迁著述专称。文章据《东海庙碑阴》认为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有“史记”之专称^[10],而东汉以后,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名称已普遍流传。不过确切地说,司马迁史著在此时冠以“史记”之名,但文章史料证明的是“史记”专称的上限。“史记”专称逐步达到“普遍流传”的程度,还经历了与其他名称并行的一个阶段。

东汉中期,王充《论衡》有“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的称法。东汉末年,荀悦(148-209)在《汉纪》称司马迁著述为“史记”,亦称“太史公记”;应邵(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东汉灵帝、献帝时期(168-220))《风俗通义》则“史记”、“太史公记”、“太史记”三名并用。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多名并用的情况。如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云:“史记龟策列传云江淮间

居人为儿时，以龟枝床”，而《抱朴子·论仙》则有“按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时以为文成将军”，有“史记”、“太史公记”之称。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此处“史记”仍有泛称的倾向。而南朝宋时范曄的《后汉书》称指司马迁著述时也用到三种名称：“太史公”见于《范升列传》、《陈元列传》、《窦融列传》；“太史公书”，见于《班彪列传》、《杨终列传》；“史记”，见于《班彪列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上诸例说明，虽东汉末年“史记”已有专指司马迁著述的倾向，但直至南朝尚未最终确定下来。

“史记”在唐宋时期还有泛指史书的用法。《史记》为唐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及宋代裴驷集解，他们在注解之时也有这样的使用。比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约其辞文，去其烦重”，索隐曰：“言约史记修春秋，去其重文也”。又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有“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集解按曰：“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记之各有不同也”。其“二史记”指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

但“史记”从东汉末年指称司马迁著述开始，逐步成为此书的专称。这一点，从历代史志著录情况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沿用《七略》，称司马迁著述为“太史公百三十篇”。至《隋书·经籍志》则著录为：“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此后的史志著录俱以“史记”称之。史志著录以书名为标的，明确“史记”已是专称。至于“史记”仍用作史书泛称，也是在不会混淆的情况下应用“史记”本来意义的习惯做法而已。

四、“史记”之本来意义及其变迁

据王国维之说，“史记”之名是在流传过程中简略而称的结果。从《史记》的诸种称法来看，“史记”之称确有简化的倾向。如果从解释“史记”的本义入手，其名称的演变过程会更为清晰。

古书有不题书名、不题作者之例。一般所称的“太史公书”皆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来：“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这里对“史记”名称变化的考察，即以“太史公书”为起点，以“史记”为终点，推演在词义不变的情况下，前者向后者改变的途径。

“书”，本义为写、记载。“记”，本义为记住，引申为记述、记载。二者在记载义项上通用，《广雅·释言》：“书，记也”。又《礼记·玉藻》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汉书·艺文志》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书”、“记”二者出现在相同的语法结构中，意义相同，可以相互替换。因此，在作记述、记载讲的时候，“太史公书”与“太史公记”是同义的称法。

因司马迁著述的多种称法在东汉年间出现较多,我们可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名来看当时书名的习惯做法。《汉书》著录多为“作者——文体类别——篇卷数”的结构,如“陆贾赋十篇”、“左氏传三十卷”等。但也有大量的题名只有作者和篇数,如“晏子八篇”、“庄子五十二篇”等,这些著述,后人也常常只以人名指称,简称为“晏子”、“庄子”之类。那么,“太史公”也足以代指“太史公百三十篇”。

“太史”为史官官名。《尚书》、《周礼》中已有太史之职,负责记载邦国大事。秦时始称“太史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太史”一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俱任太史^[11],以其职事来指称人,则“太史公记”亦可简化为“太史记”。

由此来看,司马迁著述的多种名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其实是“太史公”的简称和换用同义的“书”、“记”两种做法的配合变动而已。进一步说,如果将“太史”换为仍能明其职事但更为简省的“史”,则有了“史记”之称。此为“史记”名称的变化途径。

不过,还有必要明了“太史公书”以及“史记”最初的词义。“书”、“记”二词都兼有动、名两种词性,动词义为记述、记载,名词义为用于记述的文字。视为动词,则“太史公书”和“史记”意为百三十篇由太史公所著述;视为名词,则释为太史公所著述的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就取其名词义,认为秦汉间历史记述本称为记^[12]。虽然两种词性并未形成词义上大的差别,但“史记”最后成为书名,也当是名词性词组。“记”的词性变化及其词义的引申,也是“史记”名称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本义为记住;引申为记述、记载,动词,又转化为记述、解释典章制度的文字,名词。古称史官为“史”,《说文》曰:“史,记事者也”,指人而言。则“史记”一词,原本当为主谓结构短语,意为史官记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名也。”^[13]“记”以所字结构出现,明确为动词。“记”的动词义在汉代前有较为普遍的使用,如《国语·晋语》:“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晋国。’”《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14]《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春秋之记臣弑君、子弑父之以十数矣。”^[15]《史记·老子列传》中还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这些例子中的“记”,都明显为动词。虽然“记”的动词词性在先,“记”的名词义也在较早时就有使用。比如《吕氏春秋·务本》:“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16]《史记·周本纪》中有:“周太史伯阳读史记”。而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二书名称也明显是偏正结构的短语。由于“记”的两种词性都出现在较早的典籍中,我们很难断言说“史记”之“记”一定是动词义而不是名词义。

查检东汉以前以“记”为名文献,可以进一步验证“记”在此时的特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东汉以前称“记”的篇章,仅有2人3篇。上古阙名的《瞽史之纪》;孔安国《秘记》存片段,记述张良的神仙轶事。而《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九种“记”:许商五行传记

一篇,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齐杂记十八卷、记百三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汉著记。这些“记”中除《瞽史之纪》外的绝大多数著述都明显有着评述、整理已有书面文献的特征。即如《乐记》条小注所言:“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乐记》是对与乐相关论说的汇集。而“瞽史之纪”一词中,“纪”的本义为丝的头绪,引申为记载,在这一义项上“纪”、“记”相通,瞽史之纪也即瞽史之记,不过其中也已包含有资料贯通整理的意义。其实司马迁著《史记》也不乏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所谓“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则“记”的名词义的运用,使“史记”由最初仅仅标示史官记录的行为,变为指示史官记述的成果。由此,视“史记”为名词性词组,它与“礼记”、“乐记”一样都有着记述整理文献材料的特征。

从词语的结构来看,司马迁著述在流传过程中的多种名称,其实是因简省和同义代指而形成的。而词语词性的变化,也显示出“史记”在文体上的一些特征。

司马迁著述所以能从古史的泛称而成为一书之专名,除了词语上的演化逻辑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在众多史书中卓然的地位。太史公书篇帙浩繁、体制完备,成为后人决不可忽视的著述,“史记”也就成为司马迁个人著述的专称了。

注释:

[1]史记(卷一百三十)[C]太史公自序[A].北京:中华书局,1975.3319.

[2]史记(卷四)[C]周本纪.张守节正义[A].北京:中华书局,1975.148.

[3]靳德峻.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A].师大国学丛刊(一卷一期)[C],1930.

[4]刘知己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33,551.

[5]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A].观堂集林[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2.

[6]范曄.后汉书(卷四十四)[C]班固列传[A].

[7]王充.论衡[C]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第七册,1986.

[8]应邵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9]另外,文献中还有“太史公传”一词,如《史记·龟策列传》和《太平御览》卷155引《帝王世纪》,但指的是《史记》的列传部分。

[10]陈直.太史公书名考[J]文史哲,1956,(6).文中书“东汉桓帝永寿元年”为公元159年,误,应为155年。

[11]《史记·司马迁自序》中言及司马谈、司马迁俱称“太史公”。有以“太史公”为官名的,如《汉书·司马迁传》如淳注引《汉仪注》;有以“太史公”为司马迁尊称其父的,如《史记》司马贞索引;有以《史记》由杨惲所传,以“公”称其外祖、外曾祖,如韦昭之说。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页312。俞正燮《癸巳类稿·太史公释名》考论三说,提出新说:“史记本名太史公书,题太史以见职守,而复题曰公,古人著书称子,汉

时称生、称公也。生者，伏生；公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书。时待诏者称先生，褚少孙亦自名先生，同一例也。”（俞正燮《癸巳类稿》[C]商务印书馆，1957.431.）

[12] 王国维. 太史公行年考[M]323.

[13] 春秋·左传正义[C]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3.页1下.

[14] 春秋·左传正义[C]97.

[15] 韩非子[A]诸子集成(第5册)[C].234.

[16] 吕氏春秋[A]诸子集成(第6册)[C]133.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浙东藏书史上的一桩公案

——吕留良与黄宗羲、吴之振购淡生堂藏书之隙辨证

刘尚恒

【摘要】 本文以丰富详实的材料论述了浙东藏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两位藏书家吕留良与黄宗羲从朋友走向“交恶”的各种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对吕黄交恶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吕留良；黄宗羲；吴之振；淡生堂藏书

在清初的藏书史上有两大公案久播人口，一是吴焯记载的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借金陵置酒宴请钱曾之机（一曰朱借龚佳育置酒宴宾之机）以黄金翠裘贿赂其侍书小史，一夜间偷抄钱曾秘不示人的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和《绝妙好词》，此后《敏求记》方得以流传于世。此贬之者称其为“诡得”，褒之者则称“雅赚”。吴焯是康雍间藏书大家，熟于书林掌故，其说颇能迷惑人，而事实真相如何，却并非如吴氏之言。笔者尝作《〈读书敏求记〉辨证两题》（见《二余斋说书》，2004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书林清话文库》之一种），为之辨白，此不赘述。再一是全祖望记载的清康熙初吕留良与黄宗羲、吴之振因购淡生堂藏书而产生的争端。这事情闹得很大，以致“绝其通门之籍”、“废师弟之经”、“伤朋友之好”。全祖望也是康乾间大藏书家，尤熟于浙东地方掌故，此说更具迷惑力，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全氏所言，却大有疑问。

一、全祖望所云吕、黄“争端”之启

全祖望记道：

呜呼，吾闻淡生堂书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宗羲）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吕留良字）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之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

起,是可为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于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名之振)。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是用晦一举而废师弟之经,又伤朋友之好,适成为市道之薄,亦何有于讲学也。^[1]

全氏这段话把这桩公案的起因、经过、结果说得有头有尾,指责吕留良行为是非。而造成这桩公案的关键是《礼记集说》和《东都事略》两种书。

据《淡生堂书目》卷一《经部第五·礼类》载,“《礼记集说》七册三十卷”;卷四《史部第九·杂史类》载,“《东都事略》二十册一百三十卷”。按,宋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统说》一卷,作者“阅三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者,所录不在此数焉。”^[2]因此该书被视为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初刻于宋绍定四年(1231,即江东漕院赵善湘捐资钁本),此本久不传。今存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其中卷三十四至四十、九十三至九十五、一百至一百六配清代抄本),有藏印证明历经明代华亭朱大韶和清代扬州秦蕙田所藏,并有黄丕烈跋文两篇。淡生堂藏本为残本。宋王偁的《东都事略》,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曾有宋眉山程舍人刻本、明翻宋本,今均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录有明抄本和清汪氏鹭振堂影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二、淡生堂藏书散佚与吕、黄购书

淡生堂藏书始自祁承燝。承燝字尔光,号夷度,又号旷翁,山阴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酷嗜书籍,精于汲古,藏书多达十万卷,其中抄本尤世人所未见者,编有《淡生堂书目》。其次子彪佳字虎生,一字幼文,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巡抚应天都御史,承其父业藏书。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占京师,彪佳投水自尽,卒谥忠敏。彪佳有两个儿子:理孙、班孙。康熙元年(1662)班孙因支持魏耕反清复明而受牵累,被遣戍辽左,理孙以痛弟郁郁而死。班孙从辽左逃回后削发为僧,于是“旷园之盛,自此衰歇。今且陵夷殆尽,书卷无一存者”。全祖望所撰《祁六公子(班孙)墓碣铭》(《结埼亭集内编》卷十三)和《旷亭记》(《结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均有详细记载。

淡生堂藏书散佚后,大部为杭州赵昱(号谷林)、赵信(号意林)兄弟之小山堂所购。因为二林兄弟之母朱夫人本为山阴朱夔元(字懋和,万历进士,官至少师,卒谥襄勤)之女,祁班孙遣戍辽左,妻日夕哭泣,其家为取朱氏女甥,使育之以遣日。朱夫人即祁彪佳之外孙女,以“外家之风”缘故,二林“于池北竹林中构数椽,即以旷亭名之”(按,旷亭原为祁承口游息之所,亭额为王穉登亲书,乾隆间,赵昱以四石米易得)。将所得祁氏淡生堂藏书,“别贮而弄之,不忘母氏之遗也”,可见其数量甚多,此在全祖望的《旷亭记》、《小山堂祁氏遗书

记》、《小山堂藏书记》中亦有明确记载。

吕留良和黄宗羲也得有淡生堂散佚之书,这在二人诗文中有所记载:吕留良有《得山阴祁氏淡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其子公忠)》诗二首。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笈,不抵当时装订钱。

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透参达摩禅。(原注:祁氏参曹洞宗)^[3]

黄宗羲也有文记道:

丙午(康熙五年,1666),余与书贾入山(时淡生堂藏书于化鹿寺)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4]

可见黄宗羲得淡生堂散佚的藏书,其数量也颇可观。黄氏所云的宋卫湜《礼记集说》和宋王偁《东都事略》二书中途为书贾窃去,书贾何人,未言明,二书归入何人,也未言明。

全祖望在《礼记辑注序》中说:“《礼记》之学,莫如栎斋卫氏之书为大备。……吾乡黄先生充宗(斯大),湛于经学……方崑山(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未刻也,栎斋之本,世间流传颇少,先生求之不可得。会姚江黄征君(宗羲)自山阴祁氏书阁见之,遽售以归,踔急告先生,而中途为书贾窃去。”^[5]全氏此处所言本于黄宗羲,惟谓系吕留良“授意”所为,不知其据。

卫、王二书后见于清初黄虞稷、周在浚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其中谓“宋卫湜《礼记集说》……此书近从□□□□得之”。而张芳的《征刻唐宋秘本书论略·论读藏书宜崇经史》有云:“□□□□□有《朱子遗书》行世。”《征刻唐宋秘本书目》,清道光十三年(1833)杨复吉辑刻于《昭代丛书辛集别编》,光绪三十四年(1908)叶德辉又辑刻于《观古堂书目丛刊》。两种版本挖空处均同。按《朱子遗书》乃康熙中石门御儿吕氏宝诰堂重翻白鹿洞所刻本,收朱熹、石、谢良佐、黄节端所撰辑书凡十五种,今国家、上海、天津等大陆内至少有25家图书馆有藏本。据此,前四个挖空字当为“石门吕氏”,后五个挖空当为“吕氏宝诰堂”,或者“石门吕留良”。按,吕留良于康熙十二年(1673)为搜书出游金陵,得交黄虞稷、周在浚、张芳、王概、王潢、胡征、倪灿诸人,不仅有相互书札往来和唱和之作,而且吕曾借抄书于黄氏千顷斋、周氏遥连堂藏本数十种之多。黄、周、张所言应是信而有征。宋卫湜《礼记集说》一书,后确归吕留良所有。

吕留良和黄宗羲联合出资收购祁氏淡生堂藏书。吕出资三千金,黄“以束修之人参焉”。黄之“束修”几何不知。据康熙元年(1662)吕留良自杭州发给其子吕公忠的家书《谕大火帖》云:“下半年修金已送过一两九钱,尚少一两一钱,又节仪四钱。”^[6]如此算来半年

束修包括节仪钱在内不过三两四钱,一年不过六七两。兵燹余生,家计至窘,黄宗羲能拿出的“束修”充其量也难过百金,百金与三千金,三十分之一耳。黄宗羲又与书贾亲自“入山翻阅三昼夜”,自言得“书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姑以经学书每种十册计,合计黄得书不下千册之多,相当于吕的三分之一,况且黄氏是亲自择选的。所以沈冰壶谓黄宗羲“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7]陈祖法谓宗羲“尝为东庄(吕留良)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8]。连全祖望也不得不承认“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如此说来,即使吕留良“授意”书贾,扣下《礼记集说》和《东都事略》两书,亦不为过。

三、所谓“绝其通门之籍”、“废师弟之经”

黄宗羲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吕留良生于明崇二年(1629),黄长吕十九岁;论辈份,黄宗羲的侄子黄廉远(仲弟宗炎之子)与吕留良为连襟。宗羲长留良一辈。黄、吕相识在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秋,地点在杭州之孤山,吕留良有文记道:“(庚子)其秋,太冲先生亦以晦木(黄宗炎,宗羲仲弟)言会予于孤山。晦木、且中(高斗魁)曰:‘何如?’太冲曰:‘斯可矣!’予谢不敢为友。固命之,因各以砚赠予,从予嗜也。……予又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以‘友砚’名吾堂。时黄宗羲以八角砚赠吕。显然二黄与吕、高四人以友朋相交,不是以师生相称。此后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时有书札往还,诗词酬答,同去虞山祝钱谦益八十寿辰。吕尝有《赠余姚黄太冲》诗,其二云:“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神宗以后难为史,刘子(宗周)之徒早失传。洛下久忘加倍算,灯前细注五宗禅。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逍遥江上船。”完全是友朋间互相探讨学术的语气。康熙二年(1663)四月,黄宗羲到语溪,馆于吕氏梅花阁,与吕留良、高斗魁、吴之振及吴尔尧叔侄相唱和,赏画作,并选宋诗,这些在宗羲之子炳堇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吕留良《依依集》、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中均有记载,恕不一一摘录。月余,黄宗羲因三弟宗会(字泽望)病危返归,仍有诗寄怀旧良,云:“书来相订读书期,不是吾侪太好奇。”^[11]吕留良也有《次韵答太冲》诗,云:“水阔难填山不移,犹思采药访安期。”^[12]康熙三年(1664)二月黄宗羲、宗炎兄弟并高斗魁重来石门。四月吕留良、吴之振偕黄氏兄弟及高斗魁赴虞山探病危中钱谦益。钱氏卒。十月黄宗羲三至石门,十二月旋里。康熙四年(1665)黄宗羲、黄宗炎、万斯选、吕留良、吴之振及其侄尔尧在语溪同拜辅广墓。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庆源人,师事吕祖谦及朱熹,宋嘉定初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著有《四书纂疏》等。黄宗羲与吕留良均有拜墓诗作,分别见于《南雷诗历》卷二和《依依集》。同年八月,吕留良自平湖至余姚访宗羲。宗羲作《八哀诗》吊刘灼、张煌言、汪汾、钱谦益、陈祖法等八人,吕留良为之作《跋尾》。康熙五年(1666)黄宗羲仍馆吕留良家,二人合资购淡生堂散佚藏书。

上述为吕、黄购书之前二人交往,可谓友善相处达五六年之久,其中康熙二至五年断续有四年之久黄馆于吕留良家,沈冰壶《黄梨洲小传》云:“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13]宗羲馆吕家为授留良之子公中(一名葆中、字无党),非如全祖望所云“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

购书事后,吕、黄有隙,尤其于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陈献章学术思想上可谓水火不相容。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载:“癸亥(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有二十三日,吴志伊、万季野、贞一、姜西铭、冯鲁庵、陈葵献、张汉瞻公酌。贞一极言东庄之失,然皆东庄前半段事。又言东庄之攻阳明,即以攻梨洲。此言甚过。或其初意气相左则有之,岂所以论后半段之东庄乎?季野云:‘东庄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有书数其失。又一日众坐中语及罗念庵,东庄不知念庵何人也,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东庄怨益深。’然此皆前半段事,不足道也。”按,“梨洲有书数其失”的《与吕用晦书》,今不见《南雷》各集和陈乃乾所编的《黄梨洲文集》,盖久已散佚,从康熙六年(1667)吕留良《与黄太冲书》所云:“余自越中来,辄言太冲有《与吕用晦书》,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之见,何也?……后问且中(高斗魁),则曰:‘诚有之,不过责善意耳。’某于是浩叹,谓太冲其果不知某者也。……太冲有责善之言,正某之所欲闻,奈仅书成不一示之耶!……或者又云:‘此太冲绝交之恶声耳,非真责善也,子欲见之,是又起争端矣。’此则大不然。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所言,自是某之病痛,两者岂相除算哉?……外明人选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二十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韩信同集》、《金华先民传》,俱望简发,天涯瞻奉,临书惘然。”^[14]可见吕留良此时尚坦然对待黄宗羲的指责,并催还所借阅之书。

康熙八年(1669)夏秋之交,吕留良托黄宗羲弟子万斯选(字公择)带去一封《寄黄太冲书》,告黄“复举一子”,“《潜溪》、《逊志》、《遵岩》、《荆川》等集,不知曾拨忙看定否”,“近得《程北山集》六本,为宋纸印者。又抄得《诚斋集》一本,则日本所未见。又《吕泾野集》二十本、《蔡蛟滨语录》四本及余明人集数种,俱待晤时呈览。《赵浚谷》、《霍渭岩》二集,并望借看。外书目一纸奉记,以备简发时遗忘。公泽行迫,不及一一。敝衣一件,松萝一觔,聊为寒夜著书之供”。^[15]可见吕、黄交恶既起,吕与宗羲及其弟子往还不断,还有书籍借还、鉴赏乃至衣物馈赠。

康熙九年(1670)高斗魁卒,吕留良至鄞县葬其于乌石山。黄宗羲为之撰《高且中墓志铭》。

康熙十四年(1675)十月,吕留良在杭州,“太冲遣其子主一(百家)持书及诗扇三首来索文”。吕依韵作诗答之。此时吕、黄“交恶”已盛,吕出语辞婉意严。严鸿逵有注云:“今太冲虽与子绝,子固无日忘也。”^[16]

直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吕留良卒后之十年,黄宗羲还作有《吕胜千诗题辞》^[17]。吕胜

千,名懿绪字胜千,吕公中之子,留良之孙。留良三兄愿良之子宣忠殉国之后,留良以懿绪为之嗣。

吕、黄“交恶”之时,吕留良与当时著名学者如张履祥(继宗羲后馆吕家)、陆陇其、黄虞稷、周在浚、张芳、施闰章、吴肃公等往还不断切磋学艺,而宗羲之二弟宗炎与吕留良交往一直未中断,留良之卒,宗炎以诗哭之,作《哭吕石门四首》,见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卷三十九。

如此看来,全氏所云:“绝其通门之籍”,“废师弟之经”,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所谓“伤朋友之好”,“为市道之薄”

全祖望谓吕留良购淡生堂藏书的钱出于同里吴之振(字孟举),及购至,吕取其精者而以其余归吴,于是吴与之绝,这样“伤朋友之好”,“为市道之薄”。全氏谓吕购书资金出于吴氏,不知所据,姑不论,然从吕、吴的交谊看,不论购书之前或之后,虽中间也有隙,但友谊一直是笃厚的。

吴之振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少吕留良十一岁。吴十二岁应童子试,即与吕留良定交试席间,年十七(顺治十三年,1656)从吕学赋诗,年二十一(顺治十七年,1660)与吕留良、黄宗炎、黄子锡、朱彝、高斗魁同卖艺。

吕、吴交谊素笃。吴之母范氏临死前对其子说:“朋友中如吕□□,汝宜深交,言必听,事必商,可无失。”^[18]就在购淡生堂藏书之次年(康熙六年,1667),二人产生点矛盾后,吕《与孟举》仍说:“以兄爱弟切,有请必应,叨惠良多。”^[19]在《与沈起廷书》更说:“昔弟与孟举,非寻常悠泛之友也。……其母夫人识弟于稠人之中,命之纳交,如其嫡从之属,孟举亦竭情尽欢,表里无间者十有五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既深且久,梦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负孟举耳,不可谓孟举负弟也。”^[20]

购淡生堂藏书后之第四年,康熙九年(1670),吴之振去北京,吕留良以背疮作恶,未得亲自送行,于是作《送孟举北游》诗两首,《临行余以背疮作恶不得执手》诗一首,《与吴孟举书》信札一通,叮咛关爱,情辞亲切。吴之振也有《□□□□》(似为《答吕用晦》)诗两首,其中有“个中只有兄知我,藉藉讥评恐未当”,“兄患痲疽势正岌,梦中语笑报平安”等语,吕又作《孟举以诗见寄次韵奉怀》诗回答。均见于吕氏《文集》卷三、《零星稿》、吴之《黄叶村庄诗集》卷一。

康熙十年(1671)吴之振辑《宋诗抄初集》成。吴之《凡例》云:“癸卯(康熙二年)之夏,余叔侄(其侄吴尔尧字自牧)与晚村读书水生草堂,此选刻之始也。时甬东高且中(名斗魁)过晚村,姚江黄太冲亦因且中来会。联床分爨,搜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焉。”^[21]且吕留良为之

作《宋诗抄序》而署吴之振之名。《诗抄》中所系各家小传，凡八十二家八十三篇，出于吕氏之手。

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为搜书刻书出游至金陵。吴之振致书怀留良，并相约作庐山之游，二人诗书往还不绝。当龚定孳欲约留良至北京选房书时，吴为之代谢辞，吕氏谓“孟举可谓深知我矣”，“叹老兄知弟之深，爱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此见吕氏《零星稿》及《文集》卷3。

迨至吕留良卒后之十一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吴之振检点吕留良为他所作的《寻畅楼诗稿序》时，有识语写道：“此老友□□序余癸丑(康熙十二年)以前作也。□□墓有宿草，余年齿亦衰颓，学业日益荒落。重阅此序，念老友勉励之语，不觉泪渍于纸也。康熙甲戌(三十三年)冬日，竹洲居士。”^[22]

如此看来，全氏所谓“伤朋友之好”、“为市道之薄”，何其之有！

五、吕、黄“交恶”的另外两个事端

吕、黄“交恶”另有两个事端，一是为刻明刘宗周遗集事，一是为高斗魁墓志事。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南京左都御史，以屡劾宦官佞臣，为忠良请命，时遭削籍革职，授徒讲学，创证人书院、讲学蕺山，提倡“诚意”、“慎独”，黄宗羲、陈确等皆为及门弟子，清顺治二年(1645)南明政权亡，他绝食二十三日而卒，享年六十八岁。

沈冰壶《黄梨洲传》有云：“晚村欲刻刘蕺山遗书，致刻费三百金。先生(黄宗羲)受金不刻，而曠姜定庵(名希辙字二滨)刻之，附晚村名于后，晚村温先生甚，辄于时文评语中阴诋先生为伪学，甚且迁怒(王)阳明，而先生亦之为纸尾之学，两家子弟门人，各树帜而争，几于雠仇，而先生之名亦为之少减矣。”^[23]

姜希辙之雨水亭所刻《子刘子遗书》，时在康熙五年(1666)。该书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边。包括《子刘子学言》3卷、《圣学宗要》1卷、《周易古文抄》3卷。今国家、南京大学两家图书馆有藏。书之卷末有“学人姜希辙校刻”、“后学吕留良同校”。同校者还有张履祥、姜垚、高斗魁、学人黄宗炎、徐锡缙、万斯选、吴之振、黄百家、吴尔尧。《周易古文抄系辞》卷末有“后学吕留良同子公忠校”。

吕留良谓“今每卷之末，必列贱名，于心窃有所未安”，其“未安”者有四：其一，“今此书(《遗书》)未曾一见原稿，直太冲传本耳，未知其于原稿无一字一句之误否？”其二，“所刻之为人删定而非全体可知矣，某又何所依托而校之乎？”其三，“某末尝磨对者，反每卷数见，尤所不安也。”其四，“至小儿公忠，则并无计工之劳，岂以其受业太冲门下故亦滥及耶？”于

是吕留良要求将其父子之名，“一一为某刊去”^[23]。至于吕所致宗羲刻资三百金事，尚未在其列。

第二件事是为高斗魁墓志铭之争

高斗魁字且中，号鼓峰，鄞县人，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少黄宗羲十三岁而长吕留良六岁。明亡后，不事举业，从黄宗羲讲学。宗羲仲弟宗炎因抗清下狱将被处死，高百计将其救出。其他明故臣蒙难时，高亦破产营救，或遇害为其主丧葬事。高以精研医理，擅长岐黄之术，著有《医学心法》、《桐斋集》等。康熙九年（1670）五月病卒。临终赋诗有“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随”之句。

同年十一月，黄宗羲、吕留良同亲临鄞县，葬高于乌石山。黄为之撰《高且中墓志铭》，谓高之医术“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亦未必纯以其术”，又改“明月冈头人不见”为“人共见”，且铭有“日短心长，身名就剥”之语^[24]。

吕留良谓“且中与余义同车笠”，二人且有儿女亲家之好（高之女许吕之四子晦中）。葬高时，吕“芒屨冒雪哭而往”^[25]。吕留良就黄宗羲康熙十年（1671）《与李杲堂（鄞嗣）、陈介眉（扬辍）书》中所云《高且中墓志铭》予以反驳。吕说：“今谓且中‘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不必纯以其术’，试取此数语思之，其人品心术，为君子乎？为小人乎？谓且中之医为下品，其不敢知；谓且中之人品心术为小人，此某之决敢信也。”况且“太冲尝遭其子百家字正谊者，纳拜且中之门学医矣。……太冲当时仅以不一救正之，而反标榜之，又使其子师事。”既然高之医不纯其术，何必让儿子投之门下？

其二，所谓“身名就剥”问题，不过是黄宗羲“讥其不学太冲之道而抹杀之也。且中生平，正志好义，才足有为，其大节磊落足传者颇多，固不得以医称之，又岂遂为医之所掩哉？”“且中身无违道之行，口无非圣之言，其生也亲人，其歿也人惜之。虽则且中之日虽短，而身名固未尝剥也。太冲欲以私意剥之，亦乌可得耶？”

其三，至于“且中临绝有句云：‘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见’为‘共见’，且训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即堕鬼趣。’夫且中之神，共见于明月冈头，真活鬼出跳矣！且中之句，以鬼还魂，道之正也。……即‘不见’、‘共见’，以诗家句眼字法而论，孰佳孰否，老于诗者能辨之。此文义之失，又其小矣”。

吕留良还说：“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如今“飘风自南，青蝇满棘，本不足与深辨之。但念且中畴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仅某一人而已。若复闷默畏罪，是媚生贵而蔑亡友也，故欲直且中之诬，则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26]吕斥黄“不仁之甚”，表示不得不为且中之辨。

其实黄所撰的这篇《墓志铭》，不仅遭到吕留良的有力反辨，而且也为吴之振所叹息，他的弟子万斯大就曾劝黄改动“且中之医行未必纯以其术”和“身名就剥”两语，黄执意不

听。然而黄这篇颇有微词丑诋的《墓志铭》，高氏子弟终不复刻于石。

黄宗羲至所以作如此丑诋高斗魁的“墓志铭”全祖望道出其中缘故：当吕、黄交恶之时，“先生（高斗魁）为之调停而不得，而梨洲颇卞急，深以先生不绝庄生（吕留良）为非，其作先生墓志，遂有微词”。^[27]在这一点上，全氏算说了真话、公平话。

六、结语

吕、黄二人从友善到“交恶”，应该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黄宗羲与吕留良生活在大离乱的明清之际。明代自万历以后，朝政腐败、宦党争起，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在内有农民义军和外有金兵的双重打击下，彻底完蛋，满族贵族入主中国，建立清王朝。黄、吕二位饱读儒家经典的汉族士人，出于传统的“严华夷之分”思想，面对清王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疯狂的军事镇压，经济和文化野蛮压榨，都参加到反清洪流中去。黄毁家纾难，建“世忠营”，亲率义军与清廷对抗，直至失败。吕同样散巨财助义军，跟随三兄愿良参加抗暴斗争，并且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痛，兵败之后，其侄宣忠慷慨殉难。吕虽曾改名参加过一次清朝秀才考试，后多自责自悔。黄、吕都多次拒绝清廷招聘，誓不为清朝官吏，他们皆称得起“抗清志士”、“明之遗民”。这是黄、吕二人前一段“友善”的坚实政治基础。到了康熙年间，清廷平定了“三藩之乱”，陆续击破各地抗清义军，明朝的皇子皇孙们或俘或死或投降，统治者坐稳了江山，“反清复明”已经到了“事不可为”地步，共同的政治基础没有了，学术思想上的分歧矛盾便上升了。

况且黄、吕二人家庭和社会经历各不相同，思想文化自然有差异。黄出身官吏兼书香人家，从父亲黄尊素起，黄氏子孙文名武功历代不绝，成为余姚望族。黄尊素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后为阉党魏忠贤迫害致死。宗羲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父宦游，结交学人，从学刘宗周，遍读家藏书，讲学四方，到了中年便与孙奇逢、李颀并称为三大儒，晚年“居乡甚不满于众口。”^[28]

吕留良祖、父两辈不过是邑庠生，举人，最多做了个县知事，主要靠农、商起家。吕留良本人还在金陵、福建等地刻书售书，还能为人把脉治病、精于医学。他尊程、朱之学，以评点时文讲章抨击陆、王。

同为“抗清志士”、“明遗民”的大学者顾炎尝谓：“梨洲、晚村，一代豪杰之胤，朽人不能比也。”^[29]可见于黄、吕推崇备至。黄、吕之间产生学术思想上分歧、争辩，以致弄到相当激烈程度，固然是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但毕竟属于正常的、不足为怪的。这些分歧、争辩（或谓“交恶”），非本文主旨，且章炳麟、钱穆、邓之诚诸大师皆有评说，故从略不论。

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传梨洲之学，同样无可非议，但全氏将黄、吕“交恶”，一古脑儿推

到吕留良因购淡生堂藏书事上,有违事实,失之公允。吕氏生遭家国之痛,死受著述焚毁之灾,戮屍暴骨之惨,株连族门之祸,复加如此诋语,且达数百年之久,可悲也甚。唏嘘之余,不揣浅陋,特为之辩白如上。

注释:

[1]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小山堂祁氏遗书记》。

[2]《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礼类三》。

[3]清吕留良《吕晚村诗集·梦觉集》。

[4]清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二《天一阁藏书记》。

[5]同①卷二十三《礼记辑注序》。

[6]清吕留良《吕晚村家训》卷二。

[7][13][23]清沈冰壶《黄梨洲传》,转自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庵日记甲集·同治八年十月十三日》。

[8][28]清陆陇其《陆子全书·三鱼堂日记》卷十。

[9]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友砚堂记》。

[10][12]同③《依依集》。

[11]清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一《寄友人》。

[14]同⑨卷二《与黄太冲书》。

[15]同⑨卷二《寄黄太冲书》。

[16]同③《零星稿·黄太冲书来三诗见怀以韵答之》。

[17]清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18]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言行见闻录》。

[19]《吕晚村墨迹·与孟举》。

[20]《抄本晚村诗文集》,又同卷三作《与某书》。

[21]清吴之振《宋诗抄凡例》。

[22]清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

[23]同⑨卷二《与姜垚书》。

[24]清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七。

[25]同⑨附录吕公中《行略》。

[26]同⑨卷二《与魏方公书》。

[27]清全祖望《续甬上香旧诗集》卷四十一《高隐君斗魁小传》。

[29]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78页,1959年中华书局。

参考文献:

- [1]卞僧慧.全谢山小堂祁氏遗书记考证.1936年12月稿本复印件
- [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9月
- [3]徐定宝.黄宗羲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4]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图书馆)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朱舜水遗墨考述^[1]

杨光辉

【摘要】 本文摘录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朱舜水遗墨二则,部分内容可补朱舜水集之不足,对于了解朱舜水之思想有所助益。

【关键词】 朱舜水 哈佛燕京图书馆 佚文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四明朱舜水手迹两通,涉及孔子、诸葛亮、朱熹、文天祥等历史人物,部分内容尚未披露,现对朱舜水及燕京图书馆所藏朱舜水遗墨作一介绍,以就教于方家。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楚瑜、鲁珣,浙江余姚县人,明万历二十八年生,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学者称“舜水先生”。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云:

先生在江户时,源光国敬礼之,不敢称其字,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先生答言无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舜水之称始此。”^[2]

祖上与朱元璋为族兄弟。“入国初,先祖于皇帝族属为兄,雅不欲以天潢为累,物色履征,坚卧不赴,遂更姓为‘诸’。故生则为诸,及祔主人庙,题姓为朱。仆生之年,始复今姓。”^[3]父名正,号定寰,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舜水排行第三,名之瑜。九岁时父亲去世,自幼过着清贫生活。《给诸孙男书》云:“汝曾祖清风两袖,所遗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贫,藜盐疏布。”^[4]

反清复明失败后,舜水东渡日本,在日本留下许多遗迹,对日本儒学文化具有重大的影响。哈佛燕京藏朱舜水两通手札即从日本购置,一为《致野道设》便札,一为《朱舜水尺牍》,内含《太师徽国朱文公像赞》等,前者《朱舜水集》失收,后者部分内容未收入《朱舜水集》,收入者亦存异文,可以与集本互校。

一、致野道设手札

《致野道设》手札，一幅，日本卷轴装。

野道设(1638-1696)，即人见传，字子传，京师人，称道设，后改又左卫门，号懋斋，因爱竹，亦号竹墩。本姓藤田氏，为壹所养。先从林春斋学，后从朱舜水学。彰考馆第一任修史总裁。著有《春秋备考》、《井井堂稿》等^[5]。朱舜水致野道设手札云：

道设野太爷翰史：

彦六事，俊闻之上公，伏听裁夺。辱爱白冈崎、藤田两执政，深荷玉成之雅，未知此子意向何如耳？诸容面谈，不一不一。暇时即愿台兄代为宾白。仲春十一日，之瑜顿首。

《朱舜水集》卷八收与野传(道设)书四十四首，答野传(道设)书十一首，此首未录。徐兴庆《朱舜水集补遗》(台北：学生书局，民国八十一年[1992]五月初版)亦未收此信。

朱舜水十二世孙朱力行编《朱舜水的一生》收录此札，云“在《弘文庄待贾书目》的三四号，即昭和三十四年(1959)七月，有致‘道设野太爷书’。……该书真品现被反町茂雄私人珍藏^[6]。被列为‘朱舜水自笔尺牍(见图二十三)’”。^[7]此札后归美国哈佛大学，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索书号：T6167/2921.1，藏于保险柜内)。

二、朱舜水先生尺牍

《朱舜水先生尺牍》，一卷，日本卷轴装。

尺牍分：《题孔子像赞》、《孔子兼四配赞》、《诸葛忠武侯赞》、《太师徽国朱文公像赞》、《答安东省庵书论文丞相》、《莲勺叙》等六部分，其中《太师徽国朱文公像赞》、《莲勺叙》等《朱舜水集》(简称“集本”)失收，即使已收入文集者，亦与手迹存在异文，可作校勘之用，现分别予以介绍。

(1) 题孔子像赞(《朱舜水集》卷十九，页558收，题作《孔子赞三首》之三)：

三王毕，素王出。亘万古，教惟一。文彬彬，剂(集本作“本”)忠贤。上律下袭，宪章祖述。滔滔已知皆是，何乃栖栖(集本作“周流”)无失。举世虽莫宗予，宁敢自遑暇逸。浮海藉(集本作“曰”)乘桴，居彝且以永日。疑为天下之清，终是声名洋溢。

(2) 孔子兼四配赞(集本题作“圣像合图四配赞”)

孔子集百王之大成，道则高矣，美矣，然其道可能乎？不可能乎(集本少“不可

能乎”四字)?不可能也,则及门不宜有颜、曾,而私淑不宜有孟氏(集本无“氏”字)子舆。如其(集本无“其”字)可能也,则至亲莫如父子,何以不传之伯鱼,而子思乃(集本作“子”字)复于曾氏得其宗?可见好学与不好学,存乎其人矣,非天之所以得而私之也,而(集本无“而”字)非父与师(集本下有“之”字)所得而私之也。

(3) 诸葛忠武侯赞

其一(《朱舜水集》卷十九,页565-66收,题作《诸葛武侯像赞三首》之三):

先生禀至诚之全资,立人臣之极则,而陈寿猥儒小生,不能敷扬其致君定国、垂世立教之口(此字不清,集本已省)美,反旁搜他事以神其说。又恣意讥评,曰:“将略非其所长。”而后之浅昧不经者,盖张大其神奇诡怪之术,而先生益晦矣。出处之正,见于先生之行事^[8];忠君忧国之诚,见于先生之二表与下教。即如李严、廖立,终身放废而不怨,反至哀恻摧绝,非至公无私,而能至于此哉!

其二(《朱舜水集》卷十九,页565-6收,题作《诸葛武侯像赞三首》之二):

先生以帝师之才而小用之,时也。志不与魏,意不在吴,则跨有荆、益而止耳。鞠躬尽瘁,成败则听之天;集思广益,责难则求之友。中庸也,非神奇也。“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知言哉。

(4) 太师徽国朱文公像赞^[9]

此赞分两部分,《朱舜水集》未收。

其一:

先生通籍五十载,立朝仅四十日^[10],世不容先生乎?先生自不为世所容也!疏纠唐仲友,六上而不已^[11];排内侍甘昇,忤德寿而罔恤^[12]。先生能容于世否?今不写其燕居野服之容,而图其垂绅端笏之像,有以夫。呜呼,当年不能究其用,累世而后殫其蕴,既南宋之不能少明其学,或东国之能大行其道,非然者,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

其二:

正心诚意之学,数为平治之规,岂徒托诸空言哉。下社念之,法繇救荒之劳,是委吏乘田而既教矣^[13],乃犹终身放弃乎?虽然,王子明负美珠之颡,寇莱公抱天书之慚^[14],直其躬而能行其道,自韩魏公而下无几人^[15],又何疑于夫子。独是穷理反躬,足音空谷,峨冠广袖,威仪骇观,为王淮、陈贾之所讥^[16],侂胄、阉竖之所侮^[17],宵小固然,何怪乎!

(5) 答安东省庵书论文丞相^[18](戊戌冬十一月寓福建思明州答)(《朱舜水集》卷七,页170-171收,题作“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之一”,此系节选)

细阅诸作,志大而任重,忧深而虑远。尚论古人,卓有独见。退自儆策,刻不容

弛。诗序隽雅警拔,时时不失本初,饶有风人之致,然品鹭不无太过太刻之弊。

文文山捐躯为国,万折不磨(“捐躯为国,万折不磨”,集本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肖亦亟称其忠。至于天下万世之称其忠者,虽由其死节安详,亦由《正气》之歌、《伶仃洋》诸诗及《告墓》之文耳。乃若称之为“圣”,则过矣。身为总帅,未建尺寸之功,北归而误中虜计,几为李督府捕斩;岭表再俘,过庐陵而复食,致王炎午有《生祭》之文,刘尧举有“谁向西山饭伯夷”之句,何忍冒蓬生麻中之嫌乎^[19]?事已无可如何,乃思黄冠归故乡。何处是其乡邦?何途是其归路?他若“道生”、“佛生”以名其子,甚非大儒所宜。故略其小疵,取其大节可也。犹未若张世杰者,一主死,复立一主,匪躬不懈,枹鼓不衰。其弟张弘范为虜大将,战必胜,攻必取,号令迅风雷,指麾摇山岳。间谍日至,游说万端。凡人至此,岂不动情?宋必不可为,蒙古必不可灭,岂不熟揣?富贵与穷蹙相形,猖獗与溃败相逼,而且辕门相向,而且铙角箫鼓日夕相闻,自非铁石为肝,未有不移。而且麾下吏士,孰不畏丧(集本作“死”)亡,乐富贵,谁肯委肉以当饿虎之溪,日夜裹疮(集本作“创”)力战哉?此必有大过人者。卒之,国亡与亡,终不失臣子之谊,终不使人纤毫疑贰,精忠贯日,岂不诚大丈夫哉?

(6)莲勺叙

此文《朱舜水集》未收,序云:

壬寅春僦居磨屋町,处非其地,因颜其居曰“莲勺”。

夫莲,华而不繁,香而不郁,清而不羸,矜而不争,群而不党^[20]。人不堪其穷,己不改其乐,故茂叔爱之^[21]。君子非无松柏之姿,经霜弥茂,非以入于群芳之中,乔然而高,挺然而劲,孤特而寡俦,故不若和而不同^[22],周而不比^[23],廉而不判^[24],尤居身之所珍也。

岁次癸卯(1663,康熙2年)长至日书于长崎/明舜水朱之瑜。

“壬寅”为康熙元年,1662年;“癸卯”为康熙二年,可见此文1663年作于长崎。长卷末有“溶霜斋”篆文朱长方印。“溶霜斋”为系朱舜水斋号。(哈佛燕京图书馆索书号:T6167/2921,藏于保险柜内)。

上述朱舜水真迹对于研究朱舜水思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尤其是“太师徽国朱文公像赞”部分,对于全面了解朱舜水思想观点以及朱熹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On Two Volumes of the Scripts of Zhu Shunshui i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Yang Guanghui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200433)

This paper records two volumes of the scripts of Zhu Shunshui, a famous scholar of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who is Ming Dynasty loyalist and refuge to Japan. This materials are useful to understand his thoughts.

参与文献/注释:

[11]此文写作,得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沈津先生帮助,特此感谢。

[2]《朱舜水集》附,朱之谦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8月,页644。

[3]同上,页645。

[4]《朱舜水集》卷四,页45。

[5]参《朱舜水集》附录五《友人弟子传记资料》,页831-33。

[6]按,反町茂雄(Sorimarchi Shigeo, 1900-1991),日本书志学者,著名收藏家。帝国大学毕业。经营著名书肆——弘文庄(Kobunso)。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萨专藏(Spencer Collection)大半由其提供。其出版弘文庄书目达五十多种。惜哈佛弘文庄《弘文庄待贾书目》第三十四号失藏,没法比对。

[7]台北:世界书局,民国七十一年(1982)初版,页137-141。按,所列图二十三有误,应作图二十四,与平凡社所收“道设野大兄翰史”札对调。

[8]“见”字《朱舜水集》称此字阙,可补遗。

[9]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县(父朱松曾任尤溪县尉)。1148年考中进士,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谥赠太师,封徽国公。参《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0]《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页12767)

[11]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学者称说斋先生,与宰相王淮同里姻家。朱熹曾六上奏折,弹劾其贪赃枉法。《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早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页12756)

[12]甘昇:寿王赵德芳的太监。《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时曾鞏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为言。上曰:‘昇乃德寿所荐,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页12758)德寿:指宋孝宗父亲寿王赵德芳。

[13]《孟子·万章章句下》:“(孔子)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卷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页2744)

[14]美珠之颡:《淮南鸿烈解》卷十七《说林训》:“若珠之有颡,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四部丛刊影印影写宋本)王子明(957-1017):宋代宰相王旦,字子明。北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进士。真宗咸平四年(1001)任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监修《两朝国史》。一生谨言慎行,廉洁自持,知人善任,多所建树。寇准屡加非议,他却常称誉之。天禧元年(1017)以病罢相,荐寇准继其任,后世称贤。但对真宗所行封禅“天书”等活动,则从不反对,犹如白璧之瑕,故称其“负美珠之颡”。详参《宋史》卷二百八

十二《王旦传》。寇莱公；即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十九岁登进士第。因刚直不阿，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即位，召其回朝，景德元年（1004），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辽军入侵宋境至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众议迁都避敌，寇准力排众议，力促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宋辽议和，订澶渊之盟。景德三年罢相。天禧三年（1019），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度起用为宰相，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遭副相丁谓诬陷，贬逐至雷州司户，死于贬所。著有《寇忠愍公诗集》。详参《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两人皆为宋代名臣，皆因天书之事而受污。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三“论王子明寇平仲”：“甚矣富贵权宠之能动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伟然一代人豪，然天书之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终。二公且然，其于王钦若、丁谓，尚奚责焉。”（魏中平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1997年12月印本，页26）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五：“永兴天书”：“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固无足言。而寇莱公在永兴军，信朱能之诈，亦为此举，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驯致雷州之祸，夙德之衰，实为可惜。而《天禧实录》所载云：‘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政惧得罪，因共诬潜，言：‘捕获道士谶文易，蓄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故罢相也。’朱能之事，钦若欲以沮寇公之人则有之，谓其陈规谏，当大不然。况非出于寇，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实录》盖钦若提举日所进，是以溢美，岂能弭后人公议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月，页469）

[15]韩魏公，即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推行庆历新政。嘉祐元年（1056），任枢密使，三年，升宰相。英宗即位，封魏国公，故称韩魏公。著有《安阳集》。参《宋史》卷三百十二《韩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0221—10232）。

[16]王淮；宋孝宗时任宰相。陈贾；任监察御史，诋毁朱熹为“道学”。《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页12756—57）

[17]侂胄；指宰相韩侂胄。闾竖；指太监王德谦。《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桎梏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官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页12767）

[18]安东省庵（1622—1701），安东助四郎，立花家家臣，安东连直之孙，安东亲清次子，柳河藩藩学之祖。少年出众，二十岁即为九州著名学者，师从朱舜水。舜水初至日本时，获安东省庵资助，并在安东省庵推荐下成为水户家宾师。安东省庵尊朱舜水为“大恩师”。

[19]宋·王炎午《吾汶稿》卷四《生祭文丞相》：“丞相见执，就义未闻，豪杰之见，固难测识，因与刘尧举对床感恻，共赋嗟惜之。尧举先赋曰：‘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仆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尧举读之流涕，相与誊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语出《论语》第十五《卫灵公篇》：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影印《十三经注疏》本《论语注疏》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页2518）

[21]茂叔；指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今湖南道县）人，相传著有《爱莲说》。

[22]和而不同；语出《论语》第十三《子路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影印《十三经注

疏》本《论语注疏》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页2508)

[23]周而不比,语出《论语》第十二《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影印《十三经注疏》本《论语注疏》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页2462)

[24]廉而不刿,语出《老子》五十八章:“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张震点校《老子·庄子·列子》本,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8月,页14)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图书馆)

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

——近现代文人学士与北京厂甸旧书集市

徐 雁

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

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1]

此乃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通州潞河(今北京通县以下北运河域境)人杨士安(字静亭)之《都门杂咏》竹枝词之一,是时厂甸已隶于“古迹”一门。杨氏另著有《都门纪略》,是他为到北京科考和经商的人士编辑的一部游观指南。

话说新春期间,位于燕京琉璃厂门口隙地厂甸的书摊集市,乃是清乾隆以来两百多年间,让读书人和藏书家魂牵梦萦的迷人去处。所谓“厂”,即明清时海王村琉璃窑所在的琉璃厂,窑前例有大片空地,此即北京人所谓的“厂甸”,位于正阳门外二里许的西侧。自乾隆年间开始,这一带逐渐形成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的市场。后来所说的“厂甸”,即主要指琉璃厂中间的海王村。而琉璃厂东街路北,有建造于明代、重修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火神庙。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迄光宣,文人笔记中都留有厂甸书摊的记载。

潘荣陛于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有“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之类的描写。嘉庆间,戴璐在其《藤阴杂记》中引鲍軫(西冈)《春游词》云:

丛胜书多卷帙残,几人着眼笑寒酸。

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成骨董摊。

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

岁岁灯棚变式样,鳌山结撰到西洋。

戴氏写道:“琉璃厂,正月游人杂沓,名曰‘逛厂’。”邓云乡为此发表评论说,在北京的言语中都有了专门的术语,“可见当年逛厂甸的盛况了。”《藤阴杂记》还载有这样一则掌故:程晋芳以诗寄袁枚,其中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之句。袁枚阅后笑称:“此必琉璃厂也。”

晚清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一个不爱逛厂甸的。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初七、十

三日,时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的林则徐在日记中先后记道:“上午剃头,赴琉璃厂,晚回。”“上午观厂,晚回。”此时林则徐就客居在虎坊桥南,两次逛厂甸都是早出晚归,一逛就是一整天,想来就是去观书、赏古董去了。

陈康祺于同治初年(1862年)自浙东家乡到京师,随即与博古斋主人祝华封等厂肆老贾多所过从。他在《郎潜纪闻》卷八中不无遗憾地表示:“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而同光间张祖翼也有记载:“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而东头之火神庙,则珍宝、书画、骨董陈列如山阜,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十日乃止。”

王同愈于光绪廿三年(1897年)正月初八日与亲友同逛厂甸。他记道:

珍奇罗列,如入五都市,目不暇视。珊瑚、琥珀、翡翠、珍珠、玫瑰、玻璃、玳瑁、玛瑙、碧霞、水晶之属,聚天下之精华,供都人之玩赏。走盘之珠,大逾指顶者,累累如贯豆。问其价,动以万计。然视五年前已差弱矣。辛卯年(1891)犹得见朝珠数串,有全身碧霞者,玻璃绿者,大红宝石者,珍珠者,珠光圆如出一模,洵希世之珍也。^[2]

缪荃孙回忆自己在光绪年间做京官时的情景道:“厂东门火神庙,正月三日起至十六日庙会。从前四大家:一宝森堂,一同立堂,一三槐堂,一善成堂,后各家均败,止有零星小摊,无复牙签锦贖,留人寻玩矣。”

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述说,厂甸“街长二里许,麇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唯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正是在1935年冬的厂甸旧书集市上觅得此书的,其写于2月14日的题跋云:“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

对于老北平风土人情之美,郑振铎在《燕京岁时记》的题跋中,曾有一长段有关春、夏、秋、冬四时花事和人事的描叙,读之令人心移。作为一个藏书家,他自然不会忘记了写上一笔厂甸书事儿,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厂甸市集与北京平民文化消费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专有《书市·书铺·书摊》一节,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北平文化古城时期”:“年年厂甸书市,仍然十分热闹。仍是中外专家、大学

教授、中学教员、机关职员、大中学生访书淘书的好场所,尽管层次不同、要求不同,购买力也大不相同,但都能得满意的甚至意外的收获。”他分析说:

文化古城时的文化环境,除去各种图书馆之外,还有不是图书馆而更为自由的“图书馆”,那就是正月里厂甸书市,平时琉璃厂、隆福寺街、东安市场中的丹桂商场书铺、西单商场的书铺,以及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大小书摊,宣武门里甘石桥马路边上的破书地摊,这些地方是最自由的读书天地,是文化环境、文化气氛最重要的成分。这些地方活跃,就说明文化气氛活跃,读书的人多。因为文化气氛首先表现在读书气氛上,而不是表现在歌坛舞榭中。

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厂甸书市。几百年的厂甸,内容简直像一部“二十四史”或一部“大百科全书”,不要说一篇文章写不完,即使是几十篇、几百篇恐怕也写不周全。因为厂甸的内容太丰富了,意趣太浓了,同人们的感情太深了。这里只就书市说个大概而已……^[3]

说“几百年的厂甸”,内容简直就像一部“二十四史”或一部“大百科全书”,这评价假如再加上了“北京平民”的四字定语,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今几个在下就利用寒假闲暇的时光,来说道说道正月间厂甸的旧书摊,这道消逝已久的北京旧书业的老景儿。或许还能够从中寻觅到一点报国寺、潘家园旧书刊市场应运而生的文化因缘呢。

一、“玩好图书百货陈”:晚清文人逛厂淘古实录

北京城居百姓购用日常杂物,大多仰仗在各城区举办的约定俗成的庙会。据杨氏《都门纪略》记载,每月逢初一、十五日是药王庙集,逢三是土地庙会,逢四是花市集,逢五、六是东岳庙会,逢七、八是护国寺庙会,逢九、十是隆福寺庙会。又有年度举办的庙会,如正月里的厂甸庙会即是。

(1) 翁同龢、李慈铭“游厂”

据翁同龢(1830—1904)现存日记,他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开始有“游厂”记录,并接连四次前往游观,不过当年度逛厂甸,看来他并没有在书册上有何收获。有意思的是,晚清诗人李慈铭(1829—1894)首次逛厂甸,也在是年。他在正月十三日(是日“立春”)的日记中写道,偕友两人“同车游厂甸,都中岁华,唯此地为最盛,百肆罗列,车马驰扰而已。”初游厂甸,他当时得到得印象很一般,似乎也没有淘到什么书。而这一天,翁同龢也在日记中留下了第三次“游厂”的记载。

在随后的京官生涯中,无论是翁同龢,还是李慈铭,他们几乎每年春节都有逛厂甸买书的记录,呼文朋唤书友,游厂甸逛书摊,成为他们在京都生活的重要节目。或者可以这么

说,也许正是“游厂阅书”的情绪激发,让他们对逛旧书肆的热情更高了,直至形成情感依赖的情愫。在翁同龢和李慈铭的日记中,分别留下绿润堂、世经堂、学福堂,以及文华堂、西山堂等众多书铺的名号,成为中国旧书业研究的珍贵史料。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翁同龢从初六至初十,共计连日“游厂”五次,第一次仍无所得:“游厂,车马寥寥,无复年时光景……见董香光临《阁帖》十册、曹云西画轴、明拓《化度寺碑》(后有何义门跋)、旧拓褚遂良《佛顶尊胜经》(碑立于咸通中)、文征伸手钞宋人说部四册、新罗山人画册、金寿门画册、东坡书《金刚经》。”第二日,见恽南田仿宋人画《茂林崇山图》,以二两多银子购回董香光临《阁帖》十册,感到价格十分公道而笔端似有得意。

至正月初十日,翁同龢最后一次“游厂,无所得”,而那天李慈铭却收获颇丰:

以钱二十五缗,买得临海洪筠轩先生(颐煊)《读书丛录》二十四卷,歙县金辅之先生(榜)《礼器》三卷,江都焦里堂先生(循)《群经官室图》二卷,高邮王文简公《经传释词》十卷,栖霞郝兰皋先生配王婉侏安人《列女传补注》八卷,《列仙传校正本》二卷,及马令《南唐书》一部。计前日博进钱二十二缗,今日尽以买书,亦一快也。尚歉二缗,借之叔子,日晚捆载而归,适奴子告煤乏,默无以应,据案纵阅,自惠而已。

同治二年(1863)正月十一日,李慈铭记:“下午同予恬游厂甸,是日为今春第一佳日……于火神庙书摊购得郝兰皋先生《尔雅义疏》一部,王石渠先生《读书杂志》一部,明代合刻马、陆两家《南唐书》一部,计钱二十六缗。”随后两日又接连前往,买到了石定金所注《金刚经》等书。

(2) 恽毓鼎“游厂”纪实

恽毓鼎(1863—1917)于光绪十五年(1889)会试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长期作息于京城。其逐年日记中,留下了自己游逛厂甸的不少珍贵史料,更有李姓书贾求售巴陵方氏遗书,在琉璃厂论古斋买《朱子古文读本》,在文友堂买《曾文正公文钞》和《四书本义汇参》的种种记录。

光绪廿二年(1897)正月初六,恽氏于午饭后游厂,买到一部《理学宗传》;十一日又游火神庙,“见有《孙夏峰全集》,以价太昂,未购”。^[4]

光绪廿三年(1897)正月间,他共逛三次:第一次是初六日前往火神庙,买牡丹古画、字各一,“如获至宝,捧之而归”,同时“在翰文斋买《樊榭诗文集》一部”。十一日再次“游厂”,在火神庙花钱20余两,购得闽刻本《杨龟山全集》42卷等两书。次日复逛,买得明刻本《文献通考》16函、《史汉评林》8函等。他在日记中欣喜地道:“我因流连各书摊,傍晚始归。乐哉此游也。”^[5]

光绪廿四年(1898)正月间,他于初三日午后偕兄弟作厂甸之游;初七午后又游,“以银

二两八钱买《孟子义疏》一部”,这是通志堂的初印本,由蔡谟集疏,版刻甚精。初十再游,买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扫叶山房四朝别史初印本)、正谊堂《五子》、《横渠理窟》、明槧本有王渔洋图章的《中论》、汲古阁刊本《汉制考》。由于浏览甚多,购买多种,他盘桓至天暮时分才回家,并感慨道:“连日颇得悠闲之乐。”至十六日,第四次游厂,买得《初月楼文集》一部。^[6]

光绪廿五年(1899)正月间,初四日午饭后游厂,“买玩物数种而归”;次日复逛,“买《宋诗钞》一部,价银四两”;初九日逛火神庙,无所得;十一日再游,路泥泞难走,却买得《归震川文集》一部,花瓶一个;十四日午后,第四次游观厂甸。^[7]

1899至1902年日记不存。光绪廿九年(1903),恽毓鼎四十一岁。是年初三首游厂甸;初六日复游,买得汲古阁刊本《李习玉集》;初八日再游,买得正谊堂零本,尹和靖、李延年、张南轩、黄勉斋四先生集,又“在文友堂久坐,携《□□亭全集》而归。他注意到,有一部影宋刻本甚为精致的《河岳英灵集》在堂,且发现:

维新之书层见叠出,稗贩杜撰,几于千手雷同。略看一二编,即可意其大概(近人译者尤劣)。余积习难化,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非此竟无以遣日。中年乐境,无逾此者。

十一日再游,“买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价二十四金)……前日得‘谢山集’,今更得此,澄斋展卷,足以消遣春光矣。又以钱四千买汲古阁本《五代史补》(陶岳著)、《五代史阙文》(王禹□著)合一册,遗闻轶事足补正史所未及。乙部书如此类最佳,置之案头架上,极有味。”^[8]

次年正月间,则燕京风俗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初九日记:“饭后偕大兄游厂,流连至暮。以洋二元买初印精本不全《历代诗话》,朱墨套本何义门、朱竹?批点《昌黎诗笺注》(仿秀野堂本)。”次日又记:

午后偕大兄游厂,妇女联车,途为堵塞。诡装□服,为从前所未有。真风俗之忧。路遇熟人极多,揖不胜揖。以钱九千买《茶山诗集》一本(共八卷),武英殿聚珍板初印,乃平定张石州先生所藏(有□斋藏书小印)。面签“曾文清公诗集”六字,尚系先生手署也(又有“靖阳亭长”小印……今又得《茶山集》。物各聚于所好,信然。十四日再游,并无所得。^[9]

光绪三十二年(1906),恽毓鼎两次游厂无所得,至十三日“独游厂肆,买明南监本《晋书》、《宋书》各四函,字大行疏,最省目力,唯中多顺治、康熙配板,不甚可贵。”^[10]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七日参加午宴后,“游厂及火神庙,买汲古阁初印本《松陵集》、《田山□全集》”。并记道:

厂甸向设于吕祖祠、土地祠外,厂街地狭人稠,物摊林列,车马壅塞,殆不能

行。今年民政厅令移于琉璃窑门内，兼辟北路通西河沿，地既空旷，游车出入各途，游人虽多，一无阻碍，亦善法也。

十二日“游厂，买初印《渔洋感旧集》（翻雕本则削去钱牧斋）。”隔日复游，“买《述学》两册，医书一本。”^[11]

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五日，“绕厂市一游，彩棚栉比，笙管嗷嘈，踵事增华，迥非从前景象矣。”隔日午后复游，“在火神庙盘桓至暮，买吴山尊影宋精刻《韩非子》并顾千里《识误》。又陈硕士刻本《惜抱尺牍》八卷，高伯平写本，付刊绝精美。又买拓颜书《东方画赞》，以廉价得之……又买《西汉升官图》一纸，归与子、侄、婿共掷为乐”。初十日，午后游厂，至傍晚才归：“以银一两买秋碧堂残帖一册，系东坡书三帖，山谷书一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去来辞》），镌拓俱精。帖贾方以残缺贬价求售，余则大履所求，一夔已足矣。”十二日与友人再游，“买零碎书三种，《诗韵萃珍》一部。自诗赋废后，词章之学殆歇，士人将不知有诗韵矣。又代笏斋买《相台五经》全部，价五金。”次日记云，曾以银五两买《晋政辑要》十卷，“此种书列诸书摊，过问者甚鲜，余独喜而购之。盖政治类各书虽极小部分，将来必有用处，务实远胜蹈虚也。”^[12]

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七日，与友人游火神庙，发现“书价之昂，过昔年四五倍。余唯买原板《青门稿》以归（吾邑邵子湘长蘅著）”，次日午饭后又前往独游，买到了《黄氏日抄》和何氏《馀冬序录》两种。^[13]

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七日午后游厂，花银八两，买得镌刻甚工的雷学淇校刻本《竹书纪年》和周亮工《书影》两部书。^[14]

宣统三年（1911）因奉差离京，于正月初六日命子宝纶、宝懿“在厂肆买林琴南同年译著新小说数种，为征途遣闷计。琴南工古文，深于马、班二史。其所译皆择泰西小说之素著名而情事笔墨佳者，各以古文义法行之，故所著最有声价。新小说之极恶劣者，无如学生所译之东洋各种，猥陋之词，不可向迩。”^[15]

1912、1913年两年正月，虽也曾择日涉足厂甸，但由于政局的变异，民生的动荡，因此，“景象萧索，书画无一足观，废然而返”。^[16]

1914年初七日游厂后记：“在文友堂、清韵阁、敬古斋各小憩，遇旧友甚多，皆委蕤无兴趣……买原板《寄园寄所寄》两函。此书余十三四岁时即知，剧爱之。所见皆小板，乌焉、陶阴触目而是，格格不畅于怀，求之三十余年，始得此本，快不可言。”^[17]

二、“厂市有常期”：现代文人学士逛厂甸

厂甸集市是属于北京百姓的，因此，它必然按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存在和发展。而国家

政局的变更,官宦地位的浮沉,以及国门的开放和人民趣味的鼎新,又影响了集市的内容成分。就文物旧书而言,在经营对象方面也就有了一些显著的新变化。

在二十世纪上叶,厂甸集市先后受1900年“庚子事变”、1911年“辛亥革命”、1928年改设“北平”、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五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发生相应波动。

“庚子事变”无论矣,但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共和观念,就使得原本在前清封建制度下一些视为至要的饰物摆件,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沦为冷摊上百计求售的货物;而以正经正史为代表的“国学”根基要籍,也随着“新学”的传入和蔓延,很快边缘化。

或如周肇祥(1880—1954)在民国初年所著《琉璃厂杂记》中所说:“新学初胚,国粹尽失。今日之琉璃厂,冰清鬼冷,不特非同、光全盛时比,即去年夏间气象亦不复见。各肆伙友多袖手坐食,有一两月不卖钱者。旧日厂友见余至,甚欢迎,岂知余亦眼馋囊空,不能大有利于君耶?”他指出:

古董玩物,亦运动品之一种。“国变”后,运动品亦为之一变。古董玩物,要者殊少,民国新人物,嗜好自不同也。至昔日京曹官爱金石书画者,多失势星散,即在都稍有蓄积,亦无不惴惴然逃乱糊口是计,不敢出救命钱以添累赘物。此冷寂所由来也。

近来厂肆每发见内府图籍、玉册、官扇等物。问厂友所从来?云系门市收买者。此必豎珰辈窃出易钱,而隆裕太后崩逝,一时官中无主,盗物出者纷纷,国破则家亡,千古最伤心事也。^[18]

瞿兑之(1894—1973)也曾指出:

民国初元,京师卜居最贱,南北往来又畅,人海浮沉,转多乐趣。而新兴之士大夫亦颇喜提倡一二闲雅之事。时值改革之际,故家收藏名迹,固多流出。乃至内库所存之笺、纸、颜料、笔、墨,盈筐累篋,俯拾即是。山颠水涯,道观梵宇,壁画造像,一切有关艺术之物,销路大佳,层出不已。春明侨寓,冷肆闲坊,偶一经过,即可载宝而归。^[19]

如1913年正月的厂甸,前述恽毓鼎的观感是“景象萧索,书画无一足观,废然而返”,此由周肇祥所记可得旁证:“辛丑正月初一日(1913年2月15日),晚车入都,商民习于旧俗,逛厂甸尚未阑也。草草一睡……(次日)独自入海王村,绝不似旧时热闹。回忆己亥(1899)初入都时,车龙马水,堵塞厂门。所见贵人天姬,胜流词客,姣童俊仆,朱轮雕鞍,绣衣珠屐,一切旖旎奇丽之景,恍如梦境。(今)厂东已改设电话局、高等师范学校,游人不至。土地祠门内外沿墙一带,古董、字画、荒货,旧错杂陈,亦无奇特之品”。尽管如此,还是“得宋邛州瓷小罐一、乾隆青花夹彩碟二,甚雅丽。孙衣言书扇一、汪承霈臣字款画扇一,后面清道光帝

楷书王维诗,款称“子臣”知系嘉庆帝御物。价四番。张叔未八砖精舍吉金拓本四帧,明万历时刻佛经二册,共七种。”“十七日逛火神庙,珠宝玉器摊占全庙十之六七,书画古董亦少佳者……各摊皆系徒弟们看守,不以生意为事。喧哗笑谑,甚失雅道。”^[20]

经过短暂的人心浮动和情绪调整以后,社会秩序很快地又纳入了轨道。至1914年人日,周肇祥逛厂甸,地已“甚喧闹,贵人达官空署出。同行四人被挤散失不可复得,可恨。得吉金拓本于土地庙,又于火神庙书摊得《词律》、《稽古录》、《徐霞客游记》。”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入秋以后,燕京古玩业也随即萧条起来。据周肇祥说:“欧战未已,古董一行,不独外人无问津者,即京朝官,亦以薪俸支发不以时,囊中稍有余钱,亦留备缓急。故厂肆冰清鬼静,甚于民国元年。我辈间或一至,亦以无所得而不愿往。”

于是到1915年厂甸集市“更不如前,字画百中无一真,但旧书颇多满洲故家所藏者,索价甚昂。稍罕见之书,即清初本,每册至三四元。豹岑得宋本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季沧苇故物,百番,尚不贵。余不甚买旧书,仅得朱象贤《印典》一部,徐紫珊藏,价四番。”“豹岑”乃袁克文(1890—1931)字。

1917年,政府当局在琉璃厂桥东新辟“海王村公园”,园中由东、西、南三面围合成为一所宽敞的大院,分别为旧书、古玩、字画、照像、琴室,北面南向之西式楼房,在清末由端方设立为博物馆,公园成立以后改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

历经时政和社会的重重事变,当姚华(1876—1930)于1924年正月间逛厂时,他已深感北京的古书、文物市场,在官、商共同控制和盘剥下,经过外国人的掠夺式抢购已大量流失境外。于是感慨道:

过火神庙求故书,一无所见,惟胡人购珍宝者四塞,仅乃于庙隅得画摊,买金晓珠“双凤轴子”归。及出门则高榜曰:“文化商场”,于是旧京数百年之流风荡然尽矣。庙本道院,去年道士无端斥卖,而庙有碑,镌左翼总兵捐数,遂没官置商场焉。丹垩既訖,因重租税,书画遂奇贵。

文章自昔关风化,不信输官直可商。

空有莱华前度客,了无芸草旧时香。

争春红绿愧崇富,窃地丹青称霸王。

及获冒家双彩凤,居然画本见金娘。^[21]

据以燕京为代表的华夏本土文化,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实际上划出的进行性衰微的轨迹,^[22]那么虽说像姚华这样的大藏书家看来,厂甸“了无芸草旧时香”,已经难求古书秘籍了,但是普通文人学士,尤其是新一代的学子文人依然趋之若鹜,因为普通旧书陈本、寻常骨董也还多见。

多少年了,正月里的厂甸儿,是一个百货云集、商贸活跃的大集市,它招引着举城三百

六十行都到此设摊,书商们自然也不会错失良机。1926年,当时政府在北京城墙的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新开一门两洞,命名为“和平门”,次年又对应地拓一马路称为“南新华街”。

瞿兑之(1894—1973)曾经分析说:

当民国十年以前,北京鼎盛时代,一个人(特指“自前清以至民国十七年以前做京官的士大夫”——引者注)兼上几处差事,竟有拿到千元以上薪俸的。既食厚禄,又享清福,承平未远,雅道犹存。于是上衙门之暇,买买古书,玩玩古董,听听名脚,逛逛西山,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北平为“文化中心”是十七年以后常听见的一句口头禅,名流学者之多,出版物之热闹,旧书之可买,一切设备之齐全,天然景物之可爱,人们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却是求学最好的地方。^[23]

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通令北京改称“北平”,原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接收清史馆。政府当局还曾作出硬性规定,厂甸集市于阳历新年(元旦日)即可开市,可以一直延伸到农历正月里。可行政命令发布以后的市场效果并不好,阳历年里的集市始终没有火热起来,商贩们只是一味敷衍着。直到正月初一,人们才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厂甸的生意上来。而市民的反应也陡然热烈了起来,不要说老人孩子,官宦仕女,就是连当日社会知名的文人学者,也没有不到厂甸一游的。

1927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师范大学的徐铸成曾经在《逛琉璃厂》中说:

从夏历正月初一到十五,那时的北京人,不论老幼贫富,都要逛逛厂甸——以琉璃厂为中心的一大片市集。出了新华门,就到处是地摊、小贩,卖旧书、古董的,卖糖葫芦的,卖豆腐脑的,还有搭了高座卖豆汁的……其次,则是为小孩子买一串有的高达四五尺的糖葫芦串,上面还饰以红绿的三角小旗。庙会的中心在海王村,旧书摊,多半是假古董的古董摊比较集中,也有买拳、耍把戏的。而真想买卖古董的,则要去比海王村更东的火神庙,这里是什么名贵珍奇的东西都会有的。

此外,当时位于廊房二条胡同附近的第一楼市场,“也有旧书摊和古董铺”^[24],它们大都是由“打鼓的”沿街收买旧货时一并收罗来的。1935年问世的《旧都文物略》中有这么一节:

平市书摊,向称琉璃厂、火神庙,今则东安市场、西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护国寺,随在皆是,琉璃厂已不足豪矣……今之设摊者,略分二种:一为专售旧本秘本之书摊,如隆福寺、护国寺、火神庙、西安市场等是;一为专售新版洋版之书摊,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是。间有并售者,亦属附带,而非大宗。二者以后列之一种营业为佳,亦可见我国之时尚矣。^[25]

韩少华在《忆厂甸儿》中说:“大凡是老北京人,该不会不记得厂甸儿吧……逛厂甸儿,

曾是北京人过年的一件大事儿。”因为厂甸庙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八大庙会之一，据1931年春节的不完全统计，较大的商贩多达一千余户。

那么，外地旅京的人士呢？

张中行先生在1936年所写的《北平的庙会》中的建议是：“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上三年两年，你然后才有时间去厂甸，去鬼市，逛庙会，吃爆肚，喝豆汁等等。不然你走马观花，专追名胜，那他只有给你一副残破相。”

笔者多年前曾于深圳书城见到过一部商务印书馆旧版的《国朝名人书札》，原收藏者在其书首册的封面上用毛笔记道：“癸酉上元四时散值，出和平门，盖为旧例，厂甸之所在，以十二缙易得此书。”癸酉上元，当是一九三三年的元宵节，此亦可证当日厂甸淘书掌故。

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就位于南新华街街西。据雷梦水在《张少元与厂甸》一文说：

自旧历新正至十五，由和平门外西河沿以南，南新华街北口，往南直至沙土园口，摊商纷集，游人接踵，琉璃厂中间一部分……更形拥挤，游者俗称‘逛厂甸’。海王村公园（今中国书店大院）内南边设有玩具摊，古玩摊多在北边，园外北边为售风筝摊所在。厂甸至师范大学两旁为旧书摊，迤北则是画棚，为文人荟萃之地。^[26]

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兼任附属中学校长的张鸿来先生（字少园或邵园，天津人），因为近水楼台，所以每逢厂甸开市，总是捷足先登，淘书数十年获得佳本不少。其生平最得意的厂甸书摊收获，是清代道光间刊本、浙江萧山考据家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道光间木活字印本、武宁张汝霖《学诗毛郑异同签》。因此，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有句：“海王村近朝朝过，断璧零珪似拾遗。”

张向天先生在《忆北平的旧岁》中最后写道：“更热闹的是厂甸，又叫海王村公园，附近多是旧书摊，古玩，金石玉器等。在这里用极低的价钱，可以买来很好的宋刻元版等等好版本书籍。”^[27]

戴蒂在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说，“在偌大的北平市里能够把差不多所有的旧书业者都聚合在一起，却只有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会而已”。他交代说：

合计起来，总会有里许之长的，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须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若是“走马看花”，当然不在此例了。这些书摊多是宣武门内外的小市、东西牌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街等处的小书肆小书摊的“化零为整”的集合。此外还有那些终日走南闯北，跑山东，下河南，搜求书籍的贾人，也把他们平日里积存的残余书籍拿来凑趣（在这里是常常会被我们发现珍贵的册籍的）——平时他们并不做门市的交易。现在稍大的书肆和琉璃厂的来薰阁，隆

福寺街的修缮堂之类,多不到厂甸摆设浮摊了。〔28〕

于是便有人专门寻着这时间逛。思慕回忆说:“朋友中有好几个是有逛琉璃厂的癖好,辛苦得来的修金,却有不少转到‘风雅’的书贾的腰包里。自惭还没有收藏线装书的眼光和身份,在北平一住四五年,除了旧历新年到厂甸去挤一下之外,一年中到那儿张望也不过两三回。”〔29〕

(1) 鲁迅逛厂甸

鲁迅自1913年2月6日至20日,共涉足厂甸庙会七次之多。他先后以十元买到《墨池编》一部四册和《印典》二册,以一元买到《陶庵梦忆》一部四册,还以七元买到一部二十二册的《湖海楼丛书》,以二十元买到一部三十二册的《佩文斋书画谱》,以一元买到一部4册的《欧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等。

鲁迅还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家名唤宏道堂的书铺老板,在买书时与他的交谈:“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云云。〔30〕

(2) 钱玄同逛厂甸

钱玄同(1887—1939)是1913年9月起,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教员的,后兼任了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一年后,其家眷迁居北京,赁房于东安门北河沿北头一个叫做“北箭亭子”的地方。1917年初移家于琉璃厂西北园。他有用毛笔在书首用白话题写购书年月,以及“从厂甸买的”或“玄同从海王邨旧书摊买的”〔31〕的习惯。1931年5月曾为《来薰阁书目》第二期题签。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问世了《钱玄同日记》12卷,从中我们已经不难获得这位有“厂甸巡阅史”之称的学人的淘书实录。

试以现存的1933年2月5日开始的日记为例:当日因为天气阴寒,可能下雪,又有两个饭局之约,所以“未逛厂甸”;次日“下午至厂甸、土地庙中略略一顾,以六角购得《干禄字书》一册”;又次日,“午后本拟逛厂甸”,因有事作罢;8日“午后略逛厂甸、火神庙”;9日为当年厂甸之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说:“宜打起精神去一逛也”,结果于午后逛东、西两路书摊,终于购得五种旧书。

1939年5月,钱玄同去世以后,知其极深的黎锦熙在长篇传记中说:

要以“史眼”穷经,钱先生只承认都是“国故”,“国故”就是史料(他不赞成“国学”、“经学”这些名词),所以他也极留心于古今的“文献”资料(他自从到北平,每年阴历岁首半个月大逛厂甸,每天都有他,朋友们戏呼他为“厂甸巡阅史”。他当然是找旧版书,但却不是讲究玩古董式的版本之学,他是有目标的,除留心那些希见的文字音韵等书外,就是搜“文献”。有几年是专搜戊戌到辛亥间出版的杂书和残本杂志之类。

到民廿三年,有南桂馨先生发起编印他的老友刘申叔(师培)先生的遗书,和

我接洽,我急报告钱先生请其参加搜辑,他概允,岂料后来竟是钱先生他一手编成的!因为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32]

编订《刘申叔遗书》,则是1937年春的事。

(3)刘半农逛厂甸

1917年到北京的刘半农(1891—1934),与厂甸有着不解之缘。得自厂甸的旧书,成为他写作的材料。

刘半农曾在1926年2月的《语丝》杂志上写过一篇介绍道光年间出版的《小慧集》,这是他刚到北京那几年买到的东西。他说:“《小慧集》并不是部稀有或珍贵的书,但也总得要是常常逛逛地摊的人才能看见,所以我现在将集中所录各谱的词句重新抄下,以广流传。”

1920至1925年,刘半农先后有欧洲留学之行。至1925年1月28日,在巴黎致周作人函云:“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隆福寺、琉璃厂等地名,心目中总以为这就离我大门不远,我可以随意去走走,花上一毛两毛,拾几本不相干的书。”^[33]

1926年正月间,刘半农逛厂甸时,意外地买到一部借说鬼话来痛讽人情世故的《何典》,便叹为奇书,于是标点了重印。后来又请鲁迅作文,于是有《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偶然在光绪五年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34]

这年他还买到了一部《长岔脆岔合钞》,是朱笔勾点的精抄本,断为嘉庆、道光年代的东西,于是写了一篇《逛城隍庙牌子曲》。次年他又于冷摊上得兰陵忧患生所著《京华百二竹枝词》,这是宣统二年(1910年)写成的书,便以《二十年前的北京》为题做了篇介绍文章。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语丝》杂志上。

1930年2月1日,在厂甸书摊又买到了一部《李师师外传》,次日夜读后为之跋,其中说道:“今年厂甸书摊大不如前,不知明年又冷落至何等也。”

1934年2月15日下午,刘半农在厂甸得罗叔言、宝瑞臣、傅西园、袁珏生等四人为出卖书画而致南纸铺掌柜的书札十二通,抄本金陵癸甲新乐府一册。四天后的下午,又去逛了一次,“略得零星书物”。两次淘故的观感是:“本年厂甸,更较往年萧索,料阴历初六以后,亦未必大盛”,“凡逛厂甸者,均言没有东西可买,商人亦言没有东西可卖。如此情形,如何得了。将来新年厂甸,势将成为东、西庙会之类。”^[35]

刘半农对于厂甸是如此缘重情深,难怪1934年,周作人在《厂甸》一文中感慨说:“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

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36]

当1934年刘半农不幸去世以后,面对相交十七年的老朋友英年早逝,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论定其为人学为学的两种好处道:“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言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37]

(4)周作人逛厂甸

周作人(1885—1967)是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即1905年第一次到北京的,后从北京到日本留学。1917年春重到北京,供职于北京大学。因为阅读之需,与旧书店多所交往。1928年3月27日,曾驰函委托江绍原代搜袁宏道《皇明文集》、袁中道《珂雪斋集》和袁宗道《白苏斋集》。1932年4月28日,致江氏函,则说到德国辛默耳旧书店所编《东方书目》“已以转呈,而另写一信去要一本希腊的书目,今日得回信,大拉其买卖,云一切旧书可照码打九折,如买德文新书尤为克己,可折收百分之十六又四分三云。除《希腊书目》外,并将所存各种目录又寄一份来……”^[38]

1933年1月24日,周作人致函江绍原道:“新旧两次过年可谓忙矣,到了逛过厂甸书摊,便可云结束,未知兄亦有此兴趣否?”9天后,他又在函中关切地询问:“厂甸书摊颇多,不知去看了没有,大地要找单本小册甚便耳。”^[39]

1934年3月15日,是年周作人岁到半百。他以“岂明”之名写了《厂甸》一文,发表在林语堂在上海主编的半月刊《人间世》创刊号上。他详尽记叙其格局道:

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的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要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当年的厂甸集市,总共“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结果只寻觅到“聊堪自慰”的《戴氏注论语》、《白华绛柎阁诗》等四册“小书”。文中还记述了一段在厂甸淘书的掌故:

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此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

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

而周作人曾见到清刻本《读诗一得》,书本上有钱玄同先人的题跋墨迹,便购下赠送钱氏。

1935年1月15日,周作人又作一文,曰《厂甸之二》,记的是“新年逛厂甸,在小摊子上买到两三本破书”,即《诗庐诗文钞》等。2月17日下午,周作人又与马隅卿、马幼渔同逛厂甸,据回忆:“我得了一册木版的《楹书》,此外还有些黄虎痴的《湖南风物志》与王西庄的《练川杂咏》等,傍晚便来薰阁书店作别。听说那天晚上(他)同了来薰阁主人陈君去看戏……”^[40]。当年3月13日,他为谢墉《食味杂咏》作文时评论道:

今年厂甸买不到什么书,要想买一本比较略为好的书总须得往书店去找,而旧书的价近来又愈涨愈贵,一块钱一本的货色就不大有了。

1936年元旦,天虽然十分阴寒,但好处是没有呼啸的北风,周作人又循例走向厂甸。他在1月2日致江绍原的信中说:“民国廿五年元旦,不免到厂甸去白相一番,结果只买了几种一毛钱一半的‘知不足斋’,其中有吾家去非著的《岭外代答》……”,其实除《知不足斋丛书》几种零本外,他还买到了其绍兴乡亲潘素心的诗集《不栴吟》正、续编,共7卷。后来他又去过两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这一年逛厂甸所新收的书,他后来多写成了书话。

1937年丁丑旧上元日周作人游厂甸,买了一册张之洞著的《輶轩语》,是湖北重刊本,阅后感,旋作一文推介之,以为观点“平实而亦新创”,颇有见识,“现今学子不妨一看”。^[41]他还买到了一本去年差一点失之交臂的书《莲花筏》。他于1937年2月16日作文中说:

去年厂甸时我在摊上看见一本书,心里想买,不知怎的一转头终于忘记了,虽然这摊上的别的书也买了几本。不久厂甸就完了,我那本书便不在能够遇见。今年的旧元旦天气很好,往厂甸去看看,一看就在路西的书摊上发见了去年的那书,很是喜欢,赶紧买了回来。说起来也很平凡,这只是一册善书,名曰《莲花筏》。略为特别的是颐道居士陈文述所著而已……

后来又择日顶着严寒,“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也许是在患流行性感胃的过程中,兴致受到限制的缘故罢,“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

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42]这就是他于1937年1月16日试笔所谈的《双节堂庸训》6卷等书。

在周作人历年文字之中,诸如“顷于琉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从来薰阁得李小池著《环球地球新录》四卷”,“富晋书庄书目中有‘吴中土风记《清嘉录》,顾禄著’,请一查”,“从隆福寺买到一部笔记,名曰《常谈丛录》,凡九卷”,“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见到一册洋装小本的书,名曰《遵主圣范》”,“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偶然在旧书店里买了一部《蠲范》,京山李元著”,“从书摊上买了两部《谈史志奇》,此书既然不大高明,板也刻得很坏”,“从估客书包中得到一册笔记抄本,书名《曝背馀谈》”,“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卞宋竹枝词》一册”,“偶从书肆估得《野园诗稿》抄本,四册三种”,“偶从旧书估得《稗海纪游》一编,纸散墨劣而文可读,价亦不廉,但终收得之”,“偶从估人得《见物》五卷二册,明李苏所撰,惜阴轩刊本也”,“前日书贾携《林和靖集》来,喜而留之”,“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从杭州书店得旧书数种,均颇可喜。此店在清波门内花牌楼”,“乞仍向抱经堂买《隐秀轩文集》一部二册,如无此书,改买《越谚》可也”,“大暑中从名古屋买到一包旧书,书有三部,都是关于图画的,颇可销夏”,“见日本旧书目中有日本医学史,唯需价三十二元,因函稻孙请北京图书馆购入,俾可借阅”,“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有王韬的《淞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感兴趣”,“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今春间书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昨日以六金买得《恒言录》二册,可得廉矣”,“今日往琉璃厂,已买到‘大鹤山房全书’,计洋三元六角”之类的记载所在多有,不仅由此可见其读书兴趣之广泛,亦可藉知其逛旧书摊、铺之勤快,以及坊间书友与之往来之密切也。

买书而读,周作人早在1927年9月就在致江绍原函中作过一比:“近来无钱买书,稍觉无聊,殆犹妇女之不能买衣饰欤?”次年10月又叹息道:“在平收入尚不很少,而总苦窘乏,每月不能多买书”;又次年1月云:“买书之兴仍不浅,只可惜钱仍不够……”5月4日又称:“近颇想购书而不敢花钱,想作文而不能静心,每日麻麻胡胡过日而已。”^[43]

他自述道: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即龚馥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44]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洋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的说目的是想知道罢了,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

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45]

开卷旧书读,自然也有其不足。此可于1937年1月17日,周作人于北平苦茶庵所发感慨为证:“我颇喜欢玩具,但翻阅中国旧书,不免怅然,因为很难得看见这种纪载。”^[46]他后来又说过:“虽然我曾说看旧书以消闲,有如吸纸烟,可是老实说,老看线装书也渐感觉气闷。”^[47]这是1944年的12月1日,他为谈柳宗悦所著《和纸之美》一书所写的开场白。

大抵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较诸今日,信息交流手段少而知识传播效率差,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也远未集其大成,蔚为大观,因此,旧书摊、旧书店正是当日社会的文化渊薮、信息终端也,尤其宜人的是,旧书的书价往往要低于市面上的新书。持之以恒地杂览各种旧书,满足了周作人求知和索未知的欲望,成全了他的知识结构和随笔写作。

张中行回忆道:“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几乎都看过……何况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总而言之,还是无所不读。人,精力有限,生也有涯,这样贪多,没有困难吗?克服困难的办法或本领是三项:习惯于勤,能快,善记”,“知堂读书之多之快之勤,在现代学人当中,可称为中国之最。”

1940年11月11日,周作人在《旧书回想记》引言中说:

旧书固然以线装书为大宗,外国书也并不是没有,不过以金圆论价,如何买得起,假如我有买一册“现代丛书”的钱,也就可以买一部“藕香零拾”来,一堆二十二本,足够好些日子的翻阅了。从前买的洋书,原来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过早已忘了,有些还未细看,但总有点爱恋,不肯买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年的过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变成了旧书,正如人也变成老人一样。这种在书架上放旧了的书,往往比买来的更会有意思,因为和他有一段历史,所以成为多少回想的资料。但是这也与书的内容有关系,如或有一部看了特别佩服或欢喜,那么历史虽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时想到也想执笔记述几行,以为纪念,新旧中外都无一定,今统称之曰“旧书”,止表示与新刊介绍不同云耳。^[48]

《旧书回想记》写于1940年11月至1943年10月,收入《书房一角》,由北京新民印书馆于1944年5月作为“艺文丛书”之一出版。

(5) 胡适逛厂甸

在北京的正月里,“逛庙会”大概是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的人生一乐。据其现存日记的最早记载,1922年2月5日下午四点,他先到火神庙逛书市,买了一部《瓯北集》,后又到劝业场,买了三部小说;2月9日,又以三十元,买到一部明万历版的《王龙溪集》。至11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今日是旧历元宵,为火神庙书市的末一日。我去逛了一遭,买了几部书此行

共买书八种,其书目和价钱如下:

《烟画东堂小品》十二册,似是南陵徐氏刻的。中有宋人平话《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七种,甚可贵。此外只有全祖望的《公车徵士录》尚有用。价十二元。

《唐三藏取经诗话》残本一册,罗振玉影印的。此书末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王国维考定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之中瓦子。此书中已有猴行者,可供《〈西游记〉考证》的材料。价一元。

《〈儒林外史〉评》二卷,二册。价一元。合刊天目山樵与黄某之评。光绪十一年当涂黄安谨子睿(黄之子)刻。

《四书或问》(朱熹著):《大学或问》二卷,《中庸或问》三卷,《论语或问》二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附《中庸辑略》二卷。首页书“墨澜斋藏板”,但板式字样皆似吕留良天盖楼刻的。价一元。

《延平答问》(朱熹辑)二卷,附《四先生年谱》。延平府署板。价一元。

《陆桴亭遗书》二十二种,二十册。唐受祺辑,光绪己亥刊。价五元。

刘安世《尽言集》十三卷,四册。《畿辅丛书》本。价一元半。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咸丰二年至五年自刊本。价一元半。^[49]

加上此前一天,他买《王龙溪集》所费三十元,总计两天买书的花费是五十余元。

1931年2月19日下午逛厂甸,仅买得一部明嘉靖刻本《二郎宝卷》。22日又游,“见初刻本《恕谷后集》,每篇有评语,是‘四存’本的底本。没有买得,颇怅怅。买得一部合信氏《全体新论》,与哈士烈的《体用十章》。”3月1日下午再游,“买得《恕谷后集》,甚喜。还买了几部小书。有一部是……《冷庐杂识》,凡八卷,成于咸丰六年。偶尔看看,颇多有用的掌故。”^[50]

1933至1937年期间,曾经入住胡家帮办胡适文字秘书事务的章希吕先生(1892—1961年,安徽绩溪人)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2月18日,“午饭后同适兄、嫂去玩土地庙,里面全是卖线装书的,适兄买了二十余元。适兄遇着熟人很多,中有一人所谓全国闻名,即疑古玄同是也……后游厂甸,次游火神庙,三处游人都很多。途中遇见江泽涵、傅斯年。”^[51]

土地庙位于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原名槐树街)南口路西,临近广安门和右安门,始建于元朝。以农历每月逢三为庙会之日。由于空地不多,商贩摆摊大多在庙门前下斜街两侧或者庙后门外广场上。1937年1月8日,胡适在北京大学教课完毕后,与毛子水同去逛厂甸,结果因天已晚了,只买到了几本书。2月24日再记:

与子水同游厂甸,只到土地祠一处,买了一些杂书。朝鲜本《朱子百选》(朱子的书札)、《宋词钞》(山阳王官寿选)、初刻本江永注《近思录》、《诸子文萃》、《左文襄公家书》、杨守敬《晦明轩稿》、刘蕺山《人谱类记》、《千唐志斋藏石目》、《历代法宝记》(金九经印)、广百宋斋《封神演义》。

在胡适与毛子水逛摊的次日,大概还是下午,朱自清与沈从文、林徽音、杨今甫、金龙荪一行五人也把厂甸逛了一遍。朱自清在日记中记道:“逛厂甸……今日为旧历上元节,西四牌楼一带,人如潮涌。”但此行似乎并没有淘到什么好书。

1946年春夏间,孙楷第曾代胡适在北平收购《水经注》版本,结果颇有所得,总计花费270640元,另一方面也可见其时线装书版本之丰沛:

- 遵雅斋:全校《水经注》,十六册,7000元;
- 来薰阁:《(永乐)大典》本,八册,50200元;
- 《水经注》笺,二十册,35000元;
- 吴琯刻,八册,25000元;
- 汇校,十二册,4000元;
- 张氏刻赵本,十六册,8000元;
- 黄晟本,十六册,7000元;
- 寓晋书社:谭刻,二十四本,30000元;
- 赵本(初刻),二十册,25440元;
- 来薰阁:项纲本,十二册,16000元;
- 文渊阁:章刻赵本,三十册,20000元;
- 沈氏集释订讹,十八册,25000元;
- 《水经注》摘,20000元。

而他自己回到北平以后又继得四种。胡适与朋友春节逛厂甸的爱好,大概一直维持到他匆促离开大陆的那一年。1948年1月8日,王重民先生在致胡适函中表示遗憾道:“只因天气不佳,未奉陪先生逛厂甸。听说阴年要比阳年热闹,等到阴年再逛罢!”^[52]

(6) 朱自清逛厂甸

1925年8月,因俞平伯之荐任教于清华学校大学部的朱自清(1898—1948),也是个“厂甸书迷”。逛厂甸淘旧书,其实正是他从热衷新文学,开始与重视旧文学并行不悖的一个学术标志。在到京执教的第二年11月中旬,朱自清与好友俞平伯等十人集资合股开设了一个“景山书店”(朴社门市部景山书社)。据陈竹隐回忆:“当时的北京,旧文学的市场很广,书店里出售的都是旧文学书籍。佩弦认为应该开发新文学园地,扩大新文学市场,使新文学大众化”,这个书店“专门出售新文学书籍、刊物……而出股的十个人都没有收入,纯粹是为推广新文学尽义务。”^[53]

由于日记的缺失,他自1926年至1931年间如何逛厂甸的情节莫明,但他于1930年所写的一首诗咏厂甸的诗却已传世:

故都存夏正,厂市有常期。

宝藏火神庙,书城土地祠。
 纵观聊驻足,展玩已移时。
 回首明灯上,纷纷车马驰。^[54]

同时所作的《所居》诗云:“一室才盈丈,朝朝寝食并。参差图籍乱,宾客往来清……”,可见其时朱自清的读书治学和交游概貌。原因在于他“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一个题目”着手研索,那课题大抵就是为清华学生“古今诗选”课程,编纂的中国古逸歌谣和诗人诗集资料,他甚至为了获得创作实践的经验,自己还认真做起一个时期的拟古诗词来。下文所述他于厂甸淘得阮籍《咏怀》诗注文一册,就是服务于这一课题研究的。可见朱自清前往厂甸淘书,只是为了搜集为自己合用的教学科研资料。

在1934年所作《买书》一文中,他还说: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他在书摊上购下收藏的《伦敦竹枝词》,就是在1933年2月1日这个晴朗下午的厂甸书摊上淘到的,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早入城……下午阅厂甸书摊,较往年殊有逊色。得《伦敦竹枝词》及阮嗣宗《咏怀》诗注文一册,甚喜。”第三天,他就把《伦敦竹枝词》这部清光绪刻本读了一遍,词共计一百首,“所述情景,与余去年在英京所见什九相合,读之如重温旧游”,^[55]至4月16日,他写了介绍该书的书话。

在厂甸书市期间,每年都要去逛一下,果然是朱自清的积习。查其日记可知,1947年2月1日:“进城……去厂甸及雍和宫”;次年2月15日:“逛厂甸”,3月12日:“进城……游厂甸。”^[56]

(7) 浦江清、吴晗、潘光旦、游国恩、周一良等逛厂甸

1931年1月6日,浦江清(1904—1957)独游厂甸,发现“古董摊书摊零落,大不及旧历年,但比往年新历年为盛,是亦国民政府提倡新历年之功也”。但次年2月6日旧历元旦下午,他与王庸(字以中,江苏无锡人,1900—1956)、钱穆同游厂甸逛旧书字画摊时,却发现:“虽游人不少,自不得比往年之盛矣。大概旧历新年一年不如一年,新历新年则本无点缀。民穷财尽,无所谓年景矣。三人各搜得旧书数册而归。薄暮天极寒,手足皆冻,乃知出外之冷。”^[57]

1933年正月间,吴晗在《碧血录》卷末写道:“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著,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碧血录》是一部写明朝东林党人同朝廷的阉党作斗争终于被害性命的纪实。

1937年2月6日,老兰在《国讯》第157期上发表《旧都的旧年》一文,其中说:“在故都的人,没有不知道厂甸的,出和平门就是。平常宽大的马路,整个换了模样。一座座临时搭棚的字画陈列所接着站在两旁……字画铺以外,两边是一条一条的书摊,古今中西新旧版本,凡百科目,应有尽有,开价也不见得如何便宜。”^[58]

自1937年北平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厂甸集市日趋没落。据韩少华《忆厂甸儿》所说:“听一位住在火神庙后院儿的老管理员说,抗战之后,厂甸儿已是‘残灯末庙’景象了;可游客每日仍过万。半月雷击,约二十万人次。而当时北京人口,也只百万上下。”^[59]

1939年5月16日,王礼锡在《宇宙风》乙刊第6期上发表的《香港竹枝词》中,就有一首道及港岛旧书摊:“满头珠翠晚看山,斗峭斜坡置足难。可喜留人山上路,琳琅到处有书摊。”注云:“北平厂甸,伦敦迎陵十字街,巴黎塞因河畔,旧书铺各有风味,而香港书摊则每每在斜坡上,上下歇脚浏览,两得其便。”^[60]

1947年1月21日,潘光旦(1899—1967)整理书房,用大镜框悬起“胡卢连理之斋”匾额,“地点则自客室移书斋西壁正中”。他述志云:“今后将于图书上再事充实”。24日授课后,至清华大学图书馆,“阅书贾送来家谱、年谱若干种,备(馆内)采购”。两天后,“约今甫同至厂甸,今甫为前导,先后至玉池山房、火神庙两处看字画,标价尚不高,惟已较余在天桥所得诸件为昂,约一倍至两倍。”2月1日,天晴,他与朱自清由清华大学进城办理公事毕,于午间“再度到厂甸土地庙、海王村、火神庙,佩弦购图章石七八块,余无所获。”^[61]

除了“逛文物或地摊,选一两件价钱不贵的小玩意、小古董回来”,他儿子潘乃穆回忆道,“父亲的书虽遭战争洗劫(抗日战争之前藏书和手稿计30箱,因北平沦陷而散亡——引者注),加之抗日战争后经济拮据,但他买书的兴趣仍不稍减。琉璃厂的书商带着布包送书上门,看到好的版本和难觅的书,他总是很高兴地留下。为此时常还欠着书商的款,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结清。”^[62]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师索文清先生于六十年代初期,时常前往潘家求教。他回忆说:“我经常驻足在书柜旁,浏览他的藏书,特别是那些有关社会学家族史方面的旧平装书,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已很难找到。潘先生在校内是有名的,据说他每月的工资很大部分是花在添置藏书。”^[63]到潘先生去世时,其藏书又渐积至万余册,“虽然并不都是什么珍贵善本,但多为他所从事专业的有用之书”,^[64]后来都捐献给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收藏。

无独有偶,是年春节期间的某一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游国恩先生居然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在酷寒中带着女儿也逛起厂甸书摊来,一时被传为杏坛佳话。^[65]

1948年春节期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周一良先生曾以二万元购买《新疆访古录》,以五

万元购买《元和姓氏》于厂甸,并在藏本上题识作记。

三、“此中味,常有香”:怀念厂甸旧书集市

老北京过春节的传统习俗,街面上的市肆自正月初一起歇业,至初六再正式开市,春假休息为期五天。初六日凌晨,竟放鞭炮“破五”,就此开始一年的新生意。而自十三日至十七日,则属于上元灯节的范畴。届时各家大市肆入夜纷纷亮起各种花灯,吸引客户,夸耀兴隆,至十五日达到鼎盛,常常是万人空巷,争睹其盛,成为“灯会”。

在此春节期间,据翁偶虹在民国年间的记忆:“出门走逛,最热闹的集处是琉璃厂的厂甸”。他说:

上自文玩书籍、字画碑帖,下至民间各色手工艺品和各种风味小吃,如艾窝窝、豌豆粥、果仁奶酪、炒扒糕、豆汁、灌肠等,无不列摊以待。点缀春光的如风筝、风车、空竹、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串沙燕、串铃鸽子、百鸟朝凤、彩蝶迎春、琉璃喇叭等,都是春节特展的手工艺品。间有用镂出花样的纸盒子,内垫沙土,叫卖“白家雀儿”;或悬售关关酣叫的玉鸟、黄雀等,“有鸟鸣春”与“平添春色”的鲜花摊出售的水仙、梅花、迎春等,渲染出有声有色的初春景象。^[66]

除了丰富的吃喝玩乐内容,足够全家老少品尝游观、添置什物外,琳琅满目的珍宝古玩,也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可见,厂甸集市实际上是北京老百姓在春节期间,人人乐意参与之的博览会和展销会。

就其中的旧书买卖来说,更是读书人个个向往的旧书集市,邱震生在《古都的文物事业》一文中说,具有庙会性质的厂甸集市的字画棚和旧书摊,让“游人可以纵情观赏,任意选购,是个规模宏大而为知识界所欣赏的展销会”。^[67]思慕回忆说:“朋友中有好几个是有逛琉璃厂的癖好,辛苦得来的修金,却有不少转到‘风雅’的书贾的腰包里。自惭还没有收藏线装书的眼光和身份,在北平一住四五年,除了旧历新年到厂甸去挤一下之外,一年中到那儿张望也不过两三回。”^[68]

1931年夏到北京大学上学的张中行,在《北京琉璃厂的昔年》中说:“相当多的是书迷,遍览书摊,由残旧书中搜罗希见本。还有追字画的,钻入画棚,希望由鱼目中拣到一两颗珍珠”,而他自己则自1932年起,“每年厂甸十五天,至少要去两三次”,出和平门南行不远,“马路中间是字画棚(席棚,临时搭的),两旁靠墙是书摊……有时候买不到书,却看见周作人、钱玄同之流也在逐摊搜寻,顿生吾道不孤之感”。^[69]

在《我的琉璃厂今昔》中,他还说:

由老北京看,厂甸也是庙会的一种,定期,男女老少都去,有卖有买,可吃可

玩……厂甸庙会不拜神，会期长，由正月初一到十五，有些人却天天到。原因之一是展出待价而沽的是古旧书籍、古旧书画以及古董等；之二是货多，勤换，天天有巧遇的机会……席棚北端往南不很远，两旁都是背墙面街的书摊，整齐大部头的不多，因为意在清楚丛残存货。但是反而容易发现罕见的，所以摊前总是不冷清，其中还有不少戴花镜的老朽。我也买到一些，其后有的散失，剩下的一些混在丛杂中，辨认也难了，只有一种，《粤雅堂丛书》本《苏米斋兰亭考》二册，日前偶然见到，已沦为一旧砚之座，记得确是逛厂甸时候买的。^[70]

既为古旧书集市，则拾遗补阙、拣漏获奇，便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光绪廿三年(1897)正月初四，王同愈游海王村，于旧书摊上购得《元次山墓碑》拓片和寻常版本的《醴泉铭》《王圣教》。初六日，又与叶昌炽“游海王村、火神庙，遇同年许少翼编修(叶芬)、曾重伯、陈梅生、李橘农、徐研芙。至文友堂书肆，定购《施注苏诗》(二两)、林同人(来齐)《金石考略》(一两)”。原拟于十五日最后一天与叶昌炽再同游厂，因大风取消前议，心中不无怅怅。他在是日记道：

初与缘督计游海王村。贺年毕，如释重负，如清积逋，故有此闲情也……火神庙内杂陈诸珍异，期始于初五，止于十六，岁以为常。我辈所好者，故纸堆中物耳，不必定于期内求之也。^[7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六日，恽毓鼎游厂无所得，次日复游，“买医书数种，颇为世间罕遘之本。此事千变万化，非可执一而论。直当广参博证，务极精详，庶几临证略有把握耳。”他因此感慨道：

又买零种数本。凡丛书之不全者，其中得一二种作单本收藏，最可爱，往往有至精者。吾辈流连厂中，最宜于此着眼。破摊中能获奇珍，有时惊喜忘寝食。此新年乐趣也。若大部通行之书，平日自可购买诸肆中耳。^[72]

而在业务上，古旧书集市与古旧书铺正好形成经营上的互补。唐鲁孙说，民国期间在北平，“读书人闲来无事最好的消遣是逛厂甸溜书摊”：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起，经市公所核准列市半个月。海王村里是儿童耍货……海王村外书摊大摆长龙，有些书店在自己门前，设摊经营，有的是别处书商赶来凑热闹的，大致可分木版书、洋装书两类，还有卖旧杂志、旧画报的……好的宋、元、明、清版本精镌的古籍，书店恐怕放在外面风吹日晒，纸张变脆变黄，多半把书名、作者，写在纸条上，夹在别的书里。纸条垂下来，给买书者看，如果中医，摊上招呼别人的伙计，就把客人引进店里来了。^[73]

1928年，张恨水在北平《益世报》上撰文说，“新春厂甸开市，全北京小书商，遂各各列摊于海王村之东偏。计其摊，约在百数外，不啻为一旧书展会也。予每届春节必在此处有数

度之徘徊。经验所得,固知书商为不识货矣,试数事证之”:

(一)抄本书,亦彼等所珍视者也。有毛边纸抄本两册,装订整齐,字则蝇头小楷,亦楚楚有致。询其价,则告以十元,予大笑。盖所抄者非他,乃人家窗课,所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之文。

(二)清代文人笔记,虽已刻版,至今荡然无存者,为数甚多。苟有残篇,吉光片羽,自可宝贵。予无意中得乾隆年间某文人笔记续篇一本,约三四十页,绝版书也。予度价必不小,姑闻之,则索值一毛五,予铜子二十四枚即得之。真是拿着蜡烛当柴卖矣。

(三)有相术书一部,约十册,予遇一老人持卷把玩爱不忍释。询价,告以十元,还四元而不售,老人快快去。越一日,一又遇老人在彼议价中,老人出六元,而书贩非十二元不可,老人指袖而去。此书除此等人不售,虽存十年无人问可也,而竟交臂失之。

他认为:“由是以言,则北京旧书者之负有盛名,一经研究,技至此耳。于是知经验所得来之本领,究不如书本上所得为佳也”。

因此,逛厂甸书摊儿的诀窍,贵在“识货”,且要善于讨价还价。张恨水先生以其多年逛书摊的经验介绍说:“苟欲某书,吾持以不屑之态,略略论价,而其值又未尝不可大让。于是知彼等内行之称,究亦银样蜡枪头耳,大抵彼等于书之研究,皆耳食与传统之训练,初非自能辨白书之高下。世人相传曰名著,曰好书,彼即以为内容佳矣。”^[74]

这说的当然是实情。也正因为如此,文人学士各由一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出发,才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假如旧书商们对于图书、碑帖、书画的鉴赏,个个目光如炬,那么,厂甸淘古的欣喜快感大概就要煞去许多了吧?

戴蒂在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曾经发表《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一文。起首就交代说:“为什么偏偏要从厂甸说起呢?无他,在偌大的北平市里能够把差不多所有的旧书业者都聚合在一起,却只有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会而已”。他交代说:

几年来厂甸的旧书摊还不算少,他们占据的地带是在海王村公园西边的南新华街的东西两条便道上,南起琉璃厂中间,北迄国立师范大学,也许还要过去些。合计起来,总会有里许之长的,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须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若是“走马看花”,当然不在此例了。

这些书摊多是宣武门内外的小市、东西牌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街等处的小书肆小书摊的“化零为整”的集合。此外还有那些终日走南闯北,跑山东,下河南,搜求书籍的贾人,也把他们平日里积存的残余书籍拿来凑趣(在这里是常常会被我们发现珍贵的册籍的)——平时他们并不做门市的交易。现在稍大

的书肆和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街的修绾堂之类,多不到厂甸摆设浮摊了。

戴氏回忆说,自己就曾在这里的小摊上以八角钱买过一部完整的《雷峰塔传奇》,要是在琉璃厂来薰阁、隆福寺街修绾堂之类的店堂里买,“便非二元五角不可”。正因为厂甸是小书摊和小书肆们的集合,收罗范围既广又杂,而拥有的购买者多是普通读书人和大、中学生,因此,就热闹了起来:“近来私人收藏家和大学教授们也多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在厂甸集会的上午,东、西大街的傍晚,西单商场的黄昏,宣外小市的清晨,你常会遇到‘道貌岸然’的斯文老人,或是臂下夹着皮包的教授先生伫立在书摊旁翻阅那一堆一堆的陈旧古董。”^[75]

也许正是逛厂甸书摊屡有意想不到“收获”的缘故,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钱稻孙先生(字介眉,号泉寿,浙江吴兴人,1887—1966),从本校教授也喜好在旧历新年时,到“书贾蝟集,书摊中常有名贵旧籍发见”的厂甸淘书一事中受到启示,在1937年春节前夕,他就想好了一个请清华的“教授书迷”代馆购书的好主意。为此,他手拟了一则通告云:

各系教授先生大鉴:

敬启者,春节在迩,诸位先生或浏览海王村厂肆,如遇馆中未备而足资研究参考之廉价书籍,敬祈留意,即为馆中购买。其办法:一,暂定价目,签开同式二条,一注摊贾名号,交付馆中;一交摊贾保留书本,待馆派员购取,或令书贾送校,俾得乘时量力收供研讨。无任企仰感荷。以研究参考资料为主,至于价求其廉。专此敬颂教安,图书馆主任拜启。^[76]

这真是一个绝妙主意!据事后报道:“闻其收集结果斐然,得稀板旧籍不少,物美价廉,师长同学咸获非浅。”可见钱先生出此创意新招,实际增益清华图书馆书库不少。

厂甸的旧书集市得以成为读书人在春节期间一个魂牵梦萦的所在,还因为那里事实上成为了学子们博览群书、求知益识的文化教育天地。在1929至1935年间师从陈垣先生的陈述,后来成为我国辽、金史领域的专家。他在陈垣诞辰一百周年时,就曾回忆起有一年老师带他和另一位同学边逛厂甸边谈话的情景。^[77]

刘叶秋先生(1917—1988)说,当年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叙述的光绪间的春节厂甸种种,“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我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虽然兴趣爱好,随着年龄而变化:由买食品、玩具,到买旧书、旧画,逛的范围,由大而小,可是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关厂甸古玩、旧书摊的回忆是:

由新华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东西即琉璃厂街,海王村,坐落在东西街西口路北……出园再东,路北为火神庙(民国初年,曾称“文化商场”),乃珠宝玉器之集中地,货摊密集,晶莹夺目,而真仿相杂,索价甚昂。如能识货,于此亦可得珍

品……

至于书摊,则从南新华街的大沙土园往北,大街小巷,到处皆是。刻本、铅印、影钞的各种古旧书以及过期的报刊杂志,无所不有,可以慢慢挑选,仔细翻阅,价钱也能商量。即使你看了半天,一本都没买,那位看摊的“掌柜”,也不会有何怨言。有时顾客把书弄乱,他也只是默默地照旧整理好,放回原处,不说什么。我有一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失去上册,无意中从厂甸书摊上找到缺下卷的残书,以很低的价钱买来,补足我那部书,甚为高兴。我还购得一套清初刻本的苏东坡诗集,上面有清咸丰年间署名“信翁”的跋语和诗句墨迹,也是逛厂甸的收获。^[78]

周祖谟先生(1914—?)在1987年回忆往事时说,他因为家居北京琉璃厂附近,在三十年代前后他求学期间,“最不能忘怀”的是每年正月间的“厂甸儿”,其中有卖鞭炮的,卖风箏的,卖小吃的摊位,“而卖古旧书的最多”。他说,“在和平门外街道两旁都是书摊,这是一个特殊的出售古书的书市。这个风习从清代就已如此”,通称“厂肆”:

在这样的书摊上,经、史、子、集各类书无所不有,琳琅满目,任人挑选。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这个期间,除了下雪天以外,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市上去看看。可尊敬的终身在传播文化的书商,是竭诚欢迎人来自由翻阅的。从十六七岁起,我就慢慢买起喜爱的古书来了。如《楚辞》、《文选》、《古文辞类纂》、《史通通释》、《书目答问》、《杜诗详注》之类。遇到有朱墨批点的诗文集等书,,即使不全,残缺一二,有时也一并买下,观摩前人是在什么地方着眼的,藉此也可以提高自己鉴赏的能力。父亲看了,也很喜欢。

在买书看书的过程中,跟许多位年长的书商交往熟了,从他们的口里,又学得有关书籍的纸张和板刻的知识。如对连史纸、皮纸、官堆纸、开花纸,以及不同产地的竹纸和各省雕版字形的特点等都有所了解。这对我后来注意板本目录的学识大有裨益……我记得钱玄同先生、张鸿来先生都是厂甸儿书市上来往很勤的人。厂甸儿的书籍、字画、文玩、古物,都给我增添了不少的知识,我认为比上课还重要,恰恰是社会文化教育的一种……旧时厂甸儿是难以忘却的。^[79]

有文献记载表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逛厂甸”仍是北京人传统的春节娱乐节目。据《北京游览手册》:“春节期内在厂甸设立临时市场,摆满各式各样的货摊,售卖古玩、字画、书籍、绒花以及各种日用杂货,还有各种小吃摊。特别吸引游人的是那些儿童玩具摊,摊上有风车、空竹、风筝、氢气球等。”^[80]

周沙尘先生说,1963年春节,厂甸货摊的规模最大,有750多个货摊,“从和平门外护城河桥头起(现已改成暗河),一直摆到了虎坊桥十字路口,长达三华里的大街两旁,摊位鳞次栉比,游人摩肩接踵,总人数达到四百多万人次……”,^[81]成为当年春节百姓生活中的一

件乐事。

姜德明先生在晚年听说北京市政府有意要恢复春节厂甸集市的时候，曾经提笔写下了《久违了，厂甸》一文。其中说道：

解放后的厂甸庙会已经几起几落，似乎都与政治运动的起伏不无关系，“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停办了，到1963年经济好转时又恢复了厂甸。人们期待已久，场面甚是热闹，当时我也挤在人海中走了一趟。

但是，由于社会兴革，各种条件的变化，往日风景很难再现矣。风车、糖葫芦、驴打滚倒是留了下来，古玩字画和旧书却不见了，这能说是完整的厂甸吗？即使如此，由于阶级斗争的加强，遂亦停办。^[82]

于是，厂甸从此只在人们的梦寐之中。

二十年以后，当知名国画家王羽仪先生挥毫创作《旧京风俗百图》时，“厂甸字画棚”“厂甸旧书摊”和“厂甸古玩珠宝摊”，即是他意念中的三大风俗景观，于是分别写为第四、五、六图。其中“厂甸旧书摊”的“解说”云：“厂甸旧书摊和字画棚一样，是吸引知识分子的场所。琉璃厂原有不少书店，厂甸集市期间，全市各书店都把它们所收存的异书善本集中到这里来。因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据悉，鲁迅寓京期间，很爱逛厂甸，每年春节必去，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个月间，竟去了七次。他到厂甸，旧书摊大概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

端木蕻良先生为之配咏的诗则大有韵味：

海王村，琉璃厂。旧书摊，夸琳琅。
有宋槧，有巾箱。良与莠，共一堂。
剔沙石，靠眼光。此中味，常有香。^[83]

华孟阳、张洪杰在《老北京的生活》中，专有《厂甸庙会》一篇探讨厂甸旧书摊的底蕴：

中国是文化古国，北京是文化古国的首善之区。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便没文化的人对书也要高看一眼，有文化的人则更视为至爱珍宝。除去“焚书”和“浩劫”的年代，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厂甸庙会既类同于博览会，书摊自然少不了，而且细数一下，整个庙会期间，就数书摊最多。众多的书摊，根据地点和书籍的不同，也分成几等：土地庙、海王村公园内的书摊规模都较大，大多为琉璃厂的各书铺及城内隆福寺等处的书铺所设的摊点，其书量大类全，不乏精刻善本，全部为线装古旧书，也有出售洋装的当代旧书的摊点，多为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书铺所设；新华街路西便道上的书摊，比上述两处要多，大多为一般书铺所设，且书的货色稍差一些；此外，庙会区域的边缘所设备书摊，就属于再次一等了，类和量都较零散、残缺，难见善本，多为城内各庙会的书摊赶厂甸，当然无法与中心区域大书铺的摊位争长短了，由于

问津者少,故又称之为“冷摊儿”。但有时“冷摊儿”倒能满足寻觅者的愿望。所以,有心者除大逛书摊外,“冷摊儿”也不放过。

与画棚和古玩摊的情况一样,书摊上的标价要比平日里摆在书铺中的价格要高。所以厂甸庙会的书摊,要么门庭冷落(货色太差),要么人流簇拥。但看书的居多,掏钱买的很少。厂甸书摊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意白看,且时间长也没关系。故多有穷学生来此名为“逛厂甸”实为“白看书”。看一些想看而没看过的书,看一些听过而未见过的书,看一些没听过也没见过的书。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逛厂甸的一大收获。^[84]

难怪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说:“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过不少书。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我希望有一天北京又有了旧书摊,就是那种不用介绍信,不必拿户口本就进得去的地方。”^[85]

我国百姓逛庙会的习俗由来已久,相传庙会源起于古时的“社祭”(到土地庙祭祀土神)。在辽代的北京,就有“上巳春游”的活动,当时设在城隍庙街(今成方街)。到了明代,城市面积扩大、居民人数激增以后,庙会得到发展。至清代继续发展。

人类紧跟和追逐时代进程的功利本性,使之总是不能立足现实、珍惜所有,可是在一旦失落了以后,又常常极为留恋,对于那些日见稀少的物事,更表现出珍惜和向往的人文心态来。横亘约二百年的厂甸庙会的商机,正是在于曾经迎合、把握和发扬了这种心理,从而做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民俗、古玩、旧书大市场。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北京人基本告别了物资短缺和家庭清贫的生活状态以后,离开了具有庙会民俗特色的旧货集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城市的文化底蕴,也就缺失了一个展示的场地和宣泄的渠道,而怀古念旧的人们,似乎也就塌陷了一方心灵的殿堂,荒芜了一处精神的家园。

这也许就是报国寺、潘家园旧货市场应运而生而日方兴未艾的某种文化因缘罢?

(2006年1月至2月间)

注释:

[1]杨静亭《都门杂咏》,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75页。

[2]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17页。

[3]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第183—186页。

[4]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91页。

[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16—117页。

- [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49—150页。
- [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80—181页。
- [8]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05—206页。
- [9]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05—206页。
- [1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94—295页。
- [11]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41—342页。
- [1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68—369页。
- [13]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20—421页。
- [14]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73页。
- [1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522页。
- [1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630页。
- [1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677页。
- [18]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页，第8页。
- [19]瞿兑之《铢庵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36页。
- [20]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5页，第6页。
- [21]邓见宽选注《姚华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34—135页。
- [22]可参读谭其骧为邓云乡所著《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所作“代序”。谭先生说，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像他这样大学毕业，已有资格做图书馆馆员或讲师职位的读书人，其城市生活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譬如，“阴历新年里要逛几次厂甸，不用说了。平常日子隔一阵子要逛一次琉璃厂书铺，宣武门内西单商场书摊也逛，最经常逛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摊。逛不一定买，为财力所限，买的不多。”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的郑敏女史在《忆冯友兰先生》中说：“中华文化的宝贵泥土已慢慢流失近一个世纪，一个失去对自己昨天的记忆与认识的古老民族，往往只能以模仿西方文明来建立新文化的模式。”见谢冕、胡的清编《北大遗事》，青岛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4页。
- [23]瞿兑之《铢庵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76—177页。
- [24]徐铸成《逛琉璃厂》，见《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84页。
- [25]《旧都文物略》，汤用彬等编著，华文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92—293页。
- [26]雷梦水《张少元与厂甸》，见《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07页。
- [27]张向天《忆北平的旧岁》，见《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23页。
- [28]戴蒂《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见《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2页。
- [29]思慕《东京随笔》，见《野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1页。
- [30]鲁迅在日记中仅记宏道堂老板“程姓，年已五十余”。经检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宏道堂 程存立，字书屏，冀县人，于光绪□年开设。至宣统间，聘族人程锁成（字信斋）经理。至民国十年，易邢继有（字效先）经理。凡经营四十余年歇。”鲁迅所指之人当是程信斋经理。

[31]陆昕《闲话藏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57页。

[32]鲁迅在日记中仅记宏道堂老板“程姓,年已五十余”。经检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宏道堂 程存立,字书屏,冀县人,于光绪□年开设。至宣统间,聘族人程锁成(字信斋)经理。至民国十年,易邢继有(字效先)经理。凡经营四十余年歇。”鲁迅所指当是程信斋经理。

[33]刘复《半农杂文》,见《野菊集》,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6月版,第194页。

[34]常维钧(1894—?)本名惠,以字行,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人。是时已于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是刘半农的及门弟子,在校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时为北京研究院出版部的干事,同鲁迅往来十分密切。晚年著有《回忆鲁迅先生》。

[35]《刘半农日记》,见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48—249页。

[36]周作人《厂甸》,见《周作人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24页。

[37]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见《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52页。

[38]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46页。

[39]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69页,271页。

[40]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见《学林碎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2页。

[41]周作人《栖轩语》,见《书房一角》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6页。

[42]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503页。

[43]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4页,106页,130页,172页。

[44]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603页。

[45]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631页。

[46]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559页。

[47]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862页。

[48]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559页。

[4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54—555页。

[5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5—66页,72页。

[51]《章希吕日记》,见《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53页。

[5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王重民信一三五通”,黄山书社版,第105页。

[53]陈竹隐《追忆朱自清》,《扬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7月印行。

[54]朱自清《厂甸庙会》,见《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84页。老兰《旧都的旧年》,见《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2页。

[55]《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90页,193页。

[56]《朱自清全集》第10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42页,494页。

[57]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51页,第81页。

[58]

[59]韩少华《忆厂甸儿》,见胡乃光等主编《老北京风物散记》,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84—85页。

[60]王礼锡《香港竹枝词》，见卢玮銮编《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12月版，第162页。

[61]《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34页，236页。

[62]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见陈理等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9—90页。

[63]索文清《记与潘光旦先生相识的一段往事》，见陈理等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51页。

[64]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见陈理等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9—90页。

[65]《游国恩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8页。

[66]翁偶虹《春节话旧》，见《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21页。

[67]邱震生《古都的文物事业》，见《北京工商史话》第1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79页。

[68]思慕《东京随笔》，见《野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1页。

[69]张中行《北京琉璃厂的昔年》，见《步痕心影》，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2—113页。

[70]张中行《我的琉璃厂今昔》，见《步痕心影》，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7—118页。

[71]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29—230页。

[7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62—263页。

[73]唐鲁孙《北平的书摊儿》。

[74]

[75]戴蒂《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见《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2页。

[76]《陈述教授谈陈垣先生教育青年治学的几件事》，见《治学之道》，《文史哲》编辑部编，齐鲁书社1983年10月版，第87页。

[77]《清华大学图书馆搜集厂甸名贵书籍》，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2卷第4期第23页，1937年2月。

[78]刘叶秋《由〈帝燕京岁时纪胜〉等谈厂甸》，见《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89—190页。

[79]周祖谟《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92—193页。

[80]《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57年5月版，第144—145页。

[81]周沙尘《古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57—258页。

[82]姜德明《久违了，厂甸》，见《人海杂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4—86页。

[83]《旧京风俗百图》，王羽仪画，端木蕻良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10月版，第122页。

[84]华孟阳、张洪杰《厂甸庙会》，见《老北京的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1—34页。

[85]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8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撷藏书家精华,扬典籍史光彩

——《中国藏书家通典》读后

林 英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李玉安先生和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馆长黄正雨先生通力合作编纂的《中国藏书家通典》一书问世了,它囊括了自商代以来到1949年以前出生的几乎所有的藏书家,从而为我国藏书界又增添了一部新的藏书人物工具书。

据考证,中华民族出现文字、书籍之时,就诞生了第一个藏书家鬻熊,自此中国人对书籍的热爱和痴迷,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而《中国藏书家通典》共收录中国古今藏书家2445人,连同参见词条共2541人,达1088544千字。

长达四千年的藏书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发展史。

藏书,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先秦两汉南北朝时期,由于雕版印刷尚未发展起来,所以很多藏书家的藏书多为笔抄手录而得。生产技术的落后自然也限制了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的数量。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抄书之风盛行,书肆也逐渐增多起来,一般私人藏书数量也随之越来越多。

两宋时期是我国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其间,由于雕版印刷的逐渐推广与广泛运用,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涌现了一大批集图书整理、研究著述于一体的大藏书家。继宋元之后,明代藏书进一步发展,藏书之风已形成传统。私人藏书家人数之多,藏书数量之大,已远远超过前朝。如范钦的“天一阁”收书达7万余卷,并且“天一阁”至今尚存,是我国私人藏书保存最久的藏书楼之一,现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明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律令的颁布,在制度上保证了皇家贵族成为藏书之人,从而促进了藏书风气的发扬。实际上,在封建王朝,皇帝就是最大的藏书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样,普天之下,也莫非王“书”。开明重视文教的皇帝,往往重视皇家藏书,下旨天下,广为收藏。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唐玄宗李隆基,设立“丽正书院”和“集贤书店”,专供藏书、校书,开创唐一代藏书最盛之世。

清代的学术研究趋向于经典考据和文献整理,学者们往往喜欢收集古籍,藏书致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藏书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黄丕烈,藏书有十余处,一生与藏书家交往甚多,有名者如孙从添、顾之逵、张燮、陈臈等,先后造访各地藏书家数十人,鉴定古籍无数,俨然为一代藏书领袖。此间,藏书家之间往往关系密切,如赵怀玉“藏书富于一时,与黄丕烈、鲍廷博、吴翌凤为书友”;钱馥“家富藏书,拜周春为师,与周广业、陈臈、吴騫、陈敬璋等藏书家互相往来,互借其善本校读”。到了近现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很多藏书家的藏书多毁于战火,使中国文物古籍受到严重的损失。此其间,藏书的特点多体现在保护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粹上,如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叶恭绰等人组织参加“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沦陷区古籍数万册;黎庶昌、杨守敬等在日本广泛搜求国内失传的旧籍;阿英、潘世兹等大批有识之士为防止古籍落入他国,努力收购,将自己所藏之书捐献给祖国等,他们为保存我国文物典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藏书的理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古代中国是一个私有制发达的农业国度,文化产品的私有观念惊人的发达,往往将藏书重钥深秘,不予公诸士林,甚至告诫子孙,若将书借人为不孝之举。唐知名藏书家杜暹,居长安时,倾全力以购藏图书,藏书万余卷,深藏楼阁,概不借阅,每书卷后题家训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迨至后世,竟“以深藏为旨”,阻碍了学术的进步,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是随着藏书文化的发展,藏书的理念也逐渐开化。到了清代,不少藏书家开始向社会开放自己的藏书。如清代藏书家宋咸熙感于“藏书家每得秘籍,不轻易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不借阅而被鼠伤虫蚀”,认为这样往往导致典籍残缺,甚而湮没。因此他以所藏图书,广借他人,供寒家子弟就读。清代藏书家李大汾同样“乐于借书于他人,凡有借阅者则纳入书堂中”。到晚清,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宋楼的主人陆心源,也在清光绪八年(1882)“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因而向政府申报,愿“以守先阁所储归之于公”。守先阁是皕宋楼的一个藏书处,专刻明清刻本和普通钞本,从此以后,便向公众开放。清末学者国英声称自己所藏之书,“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遂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藏书家逐渐将藏书向社会公开的趋向,也为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通览全书,《中国藏书家通典》(以下简称《通典》)的编纂特色在于:

该《通典》是在李玉安先生1989年出版的《中国藏书家辞典》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和补充的。《中国藏书家辞典》是我国较早问世的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藏书家的专门工具书,出版后得到了专家和学者的肯定,还获得过一些奖励。在此良好的基础上,李玉安先生和黄正雨先生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对其进行再整理,历时6年之久。由此可见,两位作者对待学术的严谨与扎实,对《通典》的用力之深。

一、**综合集成**。《通典》完整地收录了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藏书家,是一部藏书家生平业绩之大全。编者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详略得当的介绍,对其藏书成就及其对藏书史发展的贡献作出合理的评价,同时对重要藏本的流传情况也加以梳理说明。百千字的一段文字,就将一个藏书家基本轮廓勾勒出来,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一目了然,无论是对藏书文化将发兴趣的入门者,还是对藏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

二、**尊重史实**。不以藏书家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为取向,不因人因事而废言。如南宋权臣贾似道、秦桧之养子秦熈、明代严嵩、清代和绅、民国陈群以及当代的康生等人,他们或许在其所处时代,做了很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但他们藏书丰富的事实毕竟是历史存在的,所以通典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地记载了其藏书的事实和公正地评价了其藏书的功过。这也体现了该辞典客观、忠于历史的精神。

三、**配有图片**。该书附有著名和知名藏书家的图谱426幅,图片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清晰美观,具有很强的文献和欣赏价值。图片的选录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它改变了过去人物工具书中很少有图谱的惯例。俗话说:一图值千字。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图片的价值往往要高于文字。

四、**便于查检**。工具书因为需要常年翻阅、查询,因此对词条查询的方便度要求很高。《通典》在这方面下足了工夫,尤其是在索引上,不单按照汉语拼音为序提供索引,同时在每一条后面都加注了传主的别名、字、号,这样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进行查询,避免了只知其号、不知其名而无法查阅的问题。同时,在书眉上标识该页词条所属的朝代,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议《通典》在积极寻求再版机会的同时,进一步加以修订补充,让这朵藏书文化园地的奇葩开放得更加耀眼夺目。我认为需要正视的两个问题有:

一、校对不够仔细审慎,造成以讹传讹

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藏书家通典,校对工作肯定是相当繁重和艰巨的,所以难免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只要认真细致些,诸如“辨别”写做“辩别”这样的小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本书的质量,不仅在于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同时也在于其校对印制的质量。而后者往往只需多加注意,下点苦功夫即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图书,如果由于校对的疏忽,存在很多纰漏,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焚琴煮鹤”之感,那就实在是太遗憾了。因此,校对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从思想和行动上重视起来。

二、收录人物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

该《通典》根据作者的编纂思想,尽可能地搜罗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藏书家,成绩斐然。但收录还有待进一步完整,如对于一些于当时当地有名的藏书家当力求收录,而《通典》却稍有遗漏。略举几例,在介绍明代著名藏书家李开先时,提到“当时著名藏书家边贡、

刘西桥等人也以藏书知名”，可《通典》中却没有收录“刘西桥”的词条；明代专科目录学家殷仲春“又至江西宁国，结识医书收藏家朱纯宇、饶道尊和其他医家”，可书中却无朱、饶二人之介绍；在介绍明藏书家林章时，谈到“藏书甚富，架上多谢翱、郑思肖等人的旧藏”，由此可推知谢、郑二人应收书颇丰，可书中亦无二人之词条；明末清初藏书家陆宝的“藏书楼称‘南轩’，和范氏‘天一阁’、陆朝辅‘四香居’合称鄞地藏书三大家”，陆朝辅“四香居”与范氏“天一阁”齐名，却不见有对其的介绍。

爬梳文献，对各朝各代的藏书家进行整理，实属不易之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通典》用力不可谓不深，但作为工具书，其查全率显得尤为重要，对藏书家的收录，除了穷搜远绍、广采博取，也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所收录到的藏书家的资料，对资料中提到的知名藏书家，力加收录，提高辞典的查全率和权威性。

至于仅仅在目录学方面有成就的传主予以收录，就更有待于商榷了。对藏书家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方家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清著名学者洪亮吉提出“藏书家有数等”之说，将藏书家划分为收藏家、考订家、校雠家、赏鉴家、掠贩家等。而清末学者耿文光对洪亮吉之说有不同看法，认为“此大概言之，未可细为区别，考订家皆能校雠，收藏家亦深赏鉴，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当代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教授提出了三大类藏书家的范畴：一类是为著述而藏书、读书的著述型藏书家；一类是为搜集、收藏典籍，而且藏书有特色的收藏型藏书家；一类是为校勘、整理图书进行出版活动的出版型藏书家。无论是何种定义，其核心都落在“藏书”二字上，只有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方可称之为“藏书家”。

该《通典》中有部分传主，如北魏目录学家卢昶、南朝梁目录学家丘宾卿等，他们在目录学方面造诣颇深，却未见其有任何藏书事迹。虽然藏书与目录学之间关系紧密，但既是一部藏书家的辞典，一部详细介绍藏书家的生平事迹、藏书成就、重要藏本的刊本的流传情况的辞典，窃以为将仅仅只在目录学方面有成就的学者、专家收录有待商榷，虽为《通典》，也不能贪大求全，泛滥无涯。

然而瑕不掩瑜，《中国藏书家通典》对于对中国藏书文化具有兴趣的读者来说，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十辑《藏书家》的精魂 ——齐鲁书社《藏书家》丛刊始末记

叶安然

《藏书家》丛刊由齐鲁书社在1999年4月创刊发行,大32开平装,前两年每年出一辑,2001年之后,每年出二辑,到2005年初共出至第10辑后停刊。《藏书家》的刊名,是编者借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夸张之意,泛指天下所有的“爱书人”。前六辑每辑定价8元,第七辑后调价为10元。主要刊发各类人的读书、淘书、藏书生活,以及各种古籍旧书的版本考据的专业文章。

该刊宗旨,如创刊号编后记中所述:“是联系世间所有爱书的朋友,倾听他们求书若渴、爱书如命的心声,记载他们访书的苦辛、读书的痴情和藏书的乐趣,从而展现爱书人的思想境界和生活追求。”

创刊号一经问世,受到爱书人的好评,很多读书人写信感谢周先生做了一件“好事”,编者在第二辑的“编后记”中进一步敞开心扉,与读者分享其办刊的心愿:“即借《藏书家》这块小小的园地,通过学者、藏书家、爱书人从不同角度、视点谈书,侃书,让现代与传统交融,今人与古人对话,使广大读者既能增广见闻,汲取知识,又能因之陶冶性情,增强读书品位……从而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和总结中国的书文化,并进而了解书文化对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深远影响,作为后人,我们薪尽火传,继往开来,使书香飘逸万代。”

一、创刊缘起

当《藏书家》在周晶先生构想里初具轮廓:为天下爱书人提供一片可以自由交流读书、藏书心得与经验的书香四溢的园地的时侯,他深信,我国现阶段的读书与藏书是有文化底蕴、有环境、有人群的。

从虚拟的选题到备受读者欢迎的国内唯一藏书类正式刊物,周晶先生集组稿、编校于一身。杂志的缘起与主编周晶先生藏书家的情怀,与他钟情古籍及相关专著的近三十年编辑生涯密切相关。

在接受济南日报记者赵晓林的访谈时,周晶先生曾如此回忆自己的藏书经历:

自己从小就喜欢看书,那时是在大连,由于历史原因,中文书和古籍很少,只是看些小说什么的。1958年随父亲迁到济南后,才真正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真正的好书。那时的济南,旧书店、书铺、书摊很多,自己没事就跑去看书,也省下零花钱买一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刊,那时这类书可谓比比皆是,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大家的著作版本非常多,《人间世》、《文学》、《论语》等新文学刊物也很多,让我大开眼界,我也是在这时喜欢上文学和写作的。记得当时这些书刊的价格十分便宜,最多几毛钱一册,我曾买了不少,后因故大多都损失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可惜。

我现在收藏的最重要的是线装古籍。记得第一次买线装书也是1958年,是在当时西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套乾隆版《笑林广记》,花了5毛钱,买的时候是觉着好玩、好看,但是越看越觉得比平装书有意思、有味道,从此也就一发而不可收,不停地买了40多年,到现在已经收藏了600多部、300余册线装古籍,其中明版书有30多部,不少已经是很稀见的善本了。而这些古籍里有一半是山东的地方文献,以山东籍文人的集部书为主,这部分是自己比较看重的,在国内也是属于比较罕见的古籍专题收藏。

“夸大点也可称得上是坐拥书城”,自谦的概括中透着爱书人的自得其乐,而周晶先生的书缘还不止于这单一的维度,他的编辑生涯与爱书情怀相得益彰。

1982年进入齐鲁书社当编辑,近30年来,主持编辑了大量古籍及相关专著,在古典文学编辑界收获颇丰。工作中与诸多高校老师和文化老人的接触与交流对他的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而对其藏书也起到了不小的助益。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编者这样阐述他的创刊缘起:“幸近二十年来中国走改革开放、科教兴国之路,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读书热’‘藏书热’又悄然兴起,并正方兴未艾,为爱书人提供了良好的读书、藏书的气氛和际遇,也为《藏书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策划、创办、编辑《藏书家》杂志,也许正是多年深厚积累的自然流露,亦是藏书家与资深编辑双重身份相互映射而激发的灵光。在第六辑的“编后记”中,编者坦言:“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编者甘于寂寞,甘做嫁衣,编辑出版了许多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但真正能与作者、读者作思想感情交流,与时俱进并为之倾注大量心血的,还是已出版的或即将出版的《藏书家》。”

作为编者,妙手别裁而隐于字里行间再平常不过,而从这段真诚的告白中足可发现《藏书家》对于编者的意义非比寻常,所以,了解编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对《藏书家》办刊过程的透视;而“编后记”又是全刊中编者直面读者的唯一园地,在十辑刊物的九篇“编后记”中,的确能读出五年来的点滴甘苦与办刊思路。

当从刊进入稳定连续的状态之后,“编后记”中开始更多涉及关于文稿的探讨,《藏书家》对稿件的要求是:“我们欢迎的是既有思想、有内容,又生动活泼的文章,而不是说教式的宏篇大论。”自创刊以来,多是通过书信、电话或前辈及友人推荐而约稿。而自第二辑以来,自投稿量也逐渐增多。

当然从每一期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藏书家》的作者群依然有相当的集中度,多数文章来自业界的前辈、知名的藏书人。“我们欢迎老一辈学者、藏书家多多赐稿,留下历史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藏书家》兼具书卷气与专业性,在国内藏书界广受认可的原因。自创刊以来,除曾在若干辑的“编后记”中申明本刊宗旨及对外来稿要求外,还从未登过“征稿启示”,关于这一做法编者也有过直接的解释:“《藏书家》编辑力量有限,每年基本上只出两辑,每辑文字也只约十万字。”

二、栏目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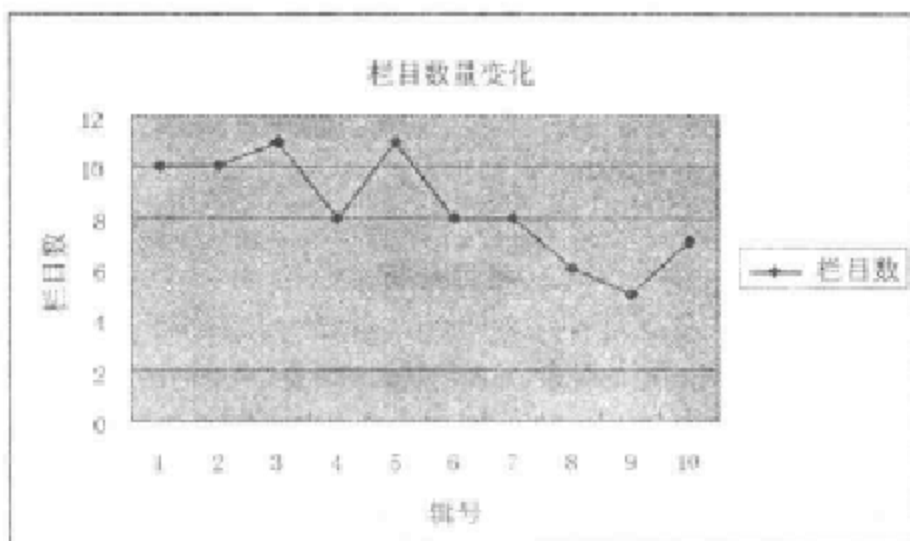
杂志是依靠栏目支撑起自己的骨架,并展示其知识含量、学术内涵和文化丰采的。下表(表1)是有关《藏书家》每辑具体栏目的一份统计表,以其揭示的信息为基础,可以展开以下的若干分析:

| 辑号 | 栏 目 | | | | | | | | | | | 合计 |
|----|-----------|-----------|-----------|-----------|------------|-----------|-----------|-----------|-----------|-----------|-----------|----|
| 1 | 发刊 题辞5 | 藏书 忆往4 | 书林 一叶2 | 书海 披沙2 | 雪泥 鸿爪3 | 版本 谈故8 | 著书 新语1 | 访书 纪闻3 | 学人 书事1 | 藏书 架1 | | 10 |
| 2 | 友情 题辞2 | 藏书 忆往2 | 书林 一叶2 | 书海 披沙4 | 雪泥 鸿爪4 | 版本 谈故4 | 学人 新语1 | 书市 漫步1 | 藏家 写真1 | 新著 快读2 | | 10 |
| 3 | 藏书 箴言2 | 藏书 忆往2 | 书林 一叶1 | 书海 披沙1 | 雪泥 鸿爪5 | 版本 谈故6 | 书市 漫步1 | 访书 纪闻2 | 书人 书事1 | 读书 闲话1 | 藏书 逸话1 | 11 |
| 4 | 藏界 论坛1 | | 书林 一叶1 | 书海 披沙7 | 雪泥 鸿爪6 | 版本 谈故5 | | 书海 浪花1 | 藏家 写真1 | 新著 快读1 | | 8 |
| 5 | 读书 偶得1 | 藏书 忆往3 | 书林 一叶2 | 书海 披沙2 | 雪泥 鸿爪8 | 版本 谈故4 | 藏书 闲话1 | 书市 漫步1 | 书林 锁谈1 | 学者 剪影1 | 藏界 论坛1 | 11 |
| 6 | 藏书 讲座2 | | 书林 一叶1 | 书海 披沙3 | 雪泥 鸿爪6 | 版本 谈故6 | 读书 偶得2 | 藏书 闲话2 | 异域 书情2 | | | 8 |
| 7 | 藏书 讲座1 | 藏书 忆往2 | 书林 一叶2 | 书海 披沙5 | 雪泥 鸿爪7 | 版本 谈故5 | 读书 偶得1 | 域外 书情1 | | | | 6 |
| 8 | | 藏书 忆往1 | 书林 一叶2 | 书海 披沙3 | 雪泥 鸿爪12 | 版本 谈故5 | 书市 漫步2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9 | 藏书 讲座2 | | 书林 一叶1 | 书海 披沙2 | 曹泥涛 爪12 | 版本 谈故9 | | | | | | 5 |
| 10 | 藏书 讲座2 | | 书林 一叶2 | 书海 披沙3 | 曹泥涛 爪10 | 版本 谈故6 | 藏书 闲话1 | 淘书 新语1 | | | | 7 |

表1:《藏书家》栏目统计(栏目名称后的数字为该栏目在本辑中的文献量)

十辑《藏书家》丛刊的栏目数量变化,则如下图(图1):



从图1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印象:

(1)《藏书家》单辑的栏目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栏目数量本身并非衡量一份刊物受欢迎程度的指标,但栏目数量在连续期号中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刊物的稿源丰富程度,编者驾驭全刊的思路,以及全刊运作状态的生机;

(2)1-3辑的曲线显示,《藏书家》办刊初期的栏目数量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每辑10个栏目或以上,这是整个办刊过程中栏目最为多样的时期。这一数据很好地应和了该刊初一面世就以其对于藏书界广泛的关注度、丰富多彩的内容广受爱书人欢迎的现象;

(3)4-7辑的曲线显示出《藏书家》办刊中期的栏目状况,除了第5辑的波动以外,这段时期的栏目数量比较平稳,但平均数量低于初期水平;

(4)7、8、9三辑栏目数连续减少。基于第一条中的认识,7、8、9三辑的曲线显示出栏目数非正常的连续下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藏书家》办刊状态已经开始衰落;

(5)第10辑有7个栏目,与前段时期相比栏目数量有明显的回升,这一奋力的回升令人想起编者的期待,“《藏书家》是我付出心血最多的书刊之一,共出了10期,在我自己说也算“十全十美”吧,以后能否继续就看机缘吧”,但并没有回归到中期水平,编者和读者在共同期待中,多少透着无奈。

十辑《藏书家》从刊的栏目分布变化如下表(表2):

*栏目分布:

| 栏 目 | 出现次数 | 栏 目 | 出现次数 |
|------|------|------|------|
| 书林一叶 | 10 | 发刊题辞 | 各1 |
| 书海披沙 | 10 | 友情题辞 | |
| 雪泥鸿爪 | 10 | 藏书箴言 | |
| 版本谈故 | 10 | 著书新语 | |
| 藏书忆往 | 10 | 学人新语 | |
| 藏书讲座 | 6 | 学人书事 | |
| 书市漫步 | 4 | 书人书事 | |
| 读书偶得 | 4 | 读书闲话 | |
| 藏书闲话 | 3 | 藏书逸话 | |
| 访书纪闻 | 3 | 书海浪花 | |
| 藏家写真 | 2 | 淘书新语 | |
| 新著快读 | 2 | 书林琐谈 | |
| 藏界论坛 | 2 | 学者剪影 | |
| | | 域外书情 | |
| | | 异域书情 | |
| | | 藏书架 | |

表2:《藏书家》栏目分布表(按栏目出现次数排序)

该表格是严格根据同名称栏目出现次数来统计,并没有考虑一些名称有细微差异的栏目范畴相似的情况,为了更深一层研究《藏书家》的栏目分布,将以栏目内容为参考,对出现5次以下的“小栏目”范畴进行分析;出现5次以上的“重要栏目”在范畴上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其中的篇目主题为参考对栏目范畴进行概括。最后两者结合,试图揭示《藏书家》刊物的内在结构。

用上述方法进行总结后,得出如下栏目结构,刊物的栏目受稿源影响可能发生中断,这一总结是基于十辑刊物的内容所形成的总体栏目布局:

(1)藏书讲座/藏界论坛/藏书箴言

有关藏书的理念性方法性文章,由来新夏先生、林夕先生等主笔。

(2)书林一叶

名家书话系列,以黄裳先生的《来燕榭书跋》连载为主。

(3)书海披沙

各地搜寻旧书以及对所得之书的记述,也许是稀见的“披沙”一词形象地点出了爱书人在书海中乐此不疲、忘我拣选的过程。

(4)雪泥鸿爪

历史上关于藏书的遗踪:人物、事物、活动。

(5)版本谈故

古旧书版本知识,内容较专深。

(6)藏书忆往

上一个时代的藏书故事,但与“雪泥鸿爪”的历史性不同,这一栏目关注的时代在作者可回忆的范围之内。

(7)藏书闲话

以漫谈式的笔法讲述爱书人在藏书生涯中产生的关于藏书的感悟。

(8)藏书逸话/书林琐谈/书海浪花

这三个栏目的集中以其都可算入藏书界的“逸闻”,逸而有益,轻松耐品。

(9)学人书事/书人书事

对藏书界前辈的回忆性文章。

(10)藏家写真/学者剪影

藏书家和学人的记述性文章。

(11)读书偶得/读书闲话

学人读书的意外收获。

(12)书市漫步/访书纪闻/域外书情/异域书情

国内外书市的访书经历。

(13)著书新语/学人新语/淘书新语

这三个栏目的合并因一“新”字,新事物新思想不分大家与后学,编者的办刊思路中存有这样一个平台。

(14)新著快读/藏书架

这是一个书评栏目。

从以上的栏目布局,可知编者原本的办刊思路是非常开阔的:

(1)关注面的开阔,版本知识、藏书楼历史、业界学者、中外书市、藏书往事、藏书行业的新事物新现象、书话、书评(书介)都有包括,没有局限在某一些主流的关键词上,有助于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并引导他们登堂入室,由一般兴趣爱好向专业知识发展;

(2)风格的多元化,既有学术性很强的栏目如“版本谈故”,较为严肃的栏目如“藏书论坛”,又有抒情性人文性的栏目如“藏书闲话”、“藏书忆往”,甚至更为轻松的栏目如“藏书逸话”等;

(3)主次搭配,节奏感强。稍稍浏览下一辑中的各栏目的文献量就可以发现,栏目的

布局重点突出,知识性、学术性的栏目一直是全刊的重心,栏目少而文献量占有绝对优势;其他栏目名称多变而文献量少,恰如其分地起到丰富和协调的作用。

十辑《藏书家》丛刊的重要栏目变迁状态,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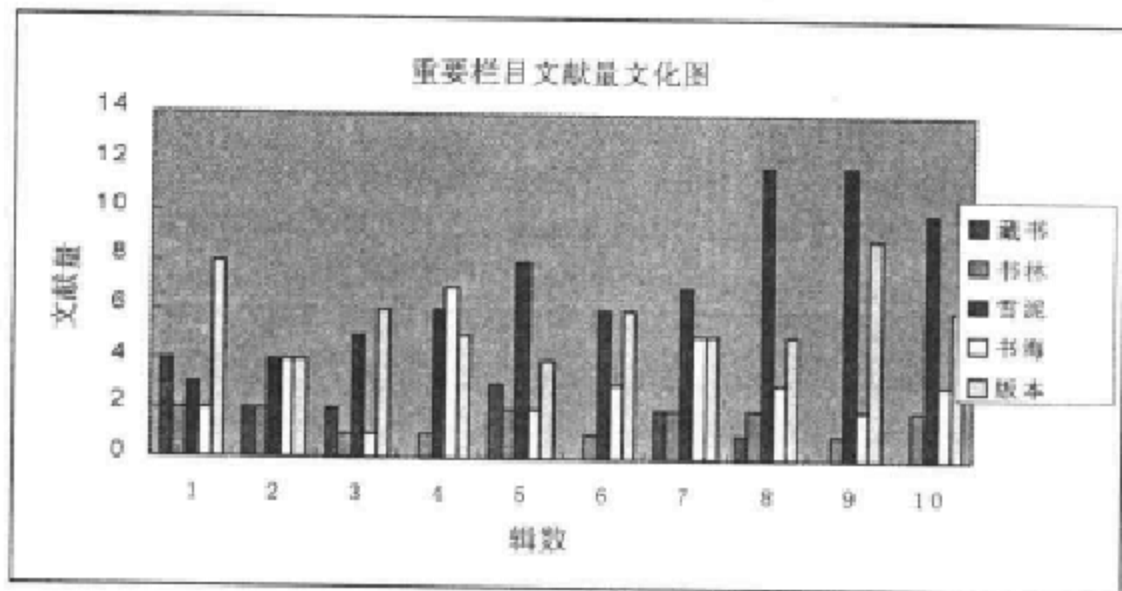


图2:重要栏目文献量变化

这幅图表所反映的是最具连续性的五个栏目在文献量上的变化,除“藏书忆往”在第4、6、9、10辑空缺之外,其他涉及栏目都是每辑出现。从这幅图表中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1)“雪泥鸿爪”和“版本谈故”的文献量的总体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栏目,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了这两个栏目定位在藏书行业的核心主题,稿源丰富并且受关注度高;

(2)“书海披沙”的文献总体水平仅次于上述两个栏目。如前文所述,“书海披沙”是藏书人对寻访旧书和所得之书的记述,如果说上述两个栏目是藏书界核心主题,则“披沙”的经历是藏书人共有的话题,所以这个栏目也在一个较高的文献水平上保持了持续性;

(3)“书林一叶”在每一辑中不超过两篇文章,但相当稳定,这个栏目的成功之处在于所选书话少而精当,尤其黄裳先生的《采燕榭书跋》以连载形式刊出,被很多读者评价为“读来相当过瘾”。

(4)“藏书忆往”是独具魅力的一个栏目,老一辈作者亲历的书缘往事,给全刊带来深厚的人文气息。这一栏目有中断现象。

然而,从上述的栏目布局,也可知编者虽然有着丰富的栏目准备,但在实际的编刊实践中,却没有足够数量的相关文章予以支撑;另外对于古今中外藏书著作的推荐介绍也嫌不足。

三、主题分析

“雪泥鸿爪”是《藏书家》里文献量最大并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栏目。对这一栏目的文献进行主题统计,所得数据如下表:

| 主题 | 藏书楼 | 藏书人 | 古书旧刊 | 旧书市 | 其他 |
|-----|-----|-----|------|-----|----|
| 文献量 | 30 | 20 | 10 | 9 | 5 |

表3:“雪泥鸿爪”栏目主题分布

根据表3的信息,结合篇目的具体内容,可以分析得出如下印象:

(1)该栏目从五个大的角度追溯藏书界的历史遗踪,分别为:藏书楼,藏书人,古书旧刊,旧书市,其他。其中关于藏书楼和藏书人的文章占有显著比重,10篇文章以古旧书刊为切入点揭开藏书的历史一页,也有一定量的文章记述旧书市的今日面貌,“其他”一栏中的视角往往别出心裁;

(2)在“藏书楼”这一主题方面共计发表了30篇文章,先后介绍的藏书楼有:天一阁、铁琴铜剑楼、函宋楼、嘉惠堂八千卷楼、池北书库、海源阁、嘉业藏书楼、脉望馆、曝书亭、天放楼、测海楼、抱经楼、吕氏藏书楼、阅微草堂、卧雪庐、言言斋、古越藏书楼(开放的藏书楼)、从书楼、慕湘藏书楼、帆影楼、抱经堂、菱花馆、振绮堂、寿松堂、铁铜、天壤阁、旧山楼、湘素楼、虹隐楼等。这些藏书楼大多建于明清,在坎坷的历史道路上起到了文化驿站的作用,对传统文化的保存的延续尽一己之力。所以不论是藏书家还是一般的爱书人,对这些极富文化意味的建筑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不论所列举的这些藏书楼现今犹存还是早已损毁,关于它们的记载和寻访都是备受关注的主题。

在“藏书楼”这一主题下有一个独具特色的系列:韦力先生的《藏书访古日记》。据第六辑“编后记”中的介绍:“韦力先生是近年来崛起的年青的实力派藏书家,他不仅大力搜藏散落民间的历代名槧佳刻等善本,并颇具规模,而且多年来长途跋涉,自费到全国各地去寻访古代藏书楼遗址孑存,录以文字,存在照片,以期保留曾经辉煌过的历史残照,使藏民收传统薪尽火传,《藏书家》已刊出的的几篇文章仅印证他一小部分足迹。”这一组文稿后来以《书楼寻踪》为书名结集,纳入傅璇琮、徐雁先生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之中,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3)在“藏书人”这一主题累计有20篇文章,记述的知名藏书人和学者,清代的有12位:刘燕庭、袁枚、周永年、张海鹏、李文藻、孔继涵、丁祖荫、叶德辉、王闻远、蒋恢吾、吴芝瑛、翁同龢;现、当代的有10位:唐弢、胡适、钱锺书、程千帆、安子介、李格非、李慎之、戈宝权、

顾廷龙、薛冰。这些文章并不单一地记录他们的藏书世界,而是以散文的笔法勾画出学问以及为人,使读者全面地了解人物的风范。

在这一主题下有一个明显的聚焦:写周叔弢先生的文章出现了三篇,依次是天津图书馆李国庆所写《弢翁购藏敦煌遗书散记》和《弢翁与古代活字本》,周清澍所写《谈弢翁藏书》。李国庆先生曾编著《弢翁藏书年谱》,由安徽黄山书社在2000年9月出版。据其介绍:“弢翁藏书继承了明清以来传统路子,注重宋元版及明抄明校本,看重的主要是传本稀少和校勘精审这两点。但他不受前人的囿,往往自辟途径。在解放初期将所藏宋元善本举献国家后,又开始着手搜集活字本书,一发而不可收……网罗天下铜、泥、木、活字四百种,不谓不富。”这一文献的集中也印证了周叔弢先生在当代藏书界的泰斗地位。

(4)在“古书旧刊”这一主题下有10篇文章,其中有《四部丛刊续编草目》、《二十八宿研斋善本书录》、《藏书目录》、《蛾术轩篋存善本书目》所注录的六种《文心雕龙》、民国年间发行的七十回本《水浒》,另涉及《中国文学史简编》、抗战时北大学生存在图书馆的书、《艺海一勺》、日本古佚书、老注本、《弄堂博士》等。关于这些善本与旧书刊的文章,并非就书论书,而是以一部书,一个版本为切入点,揭示一藏书界的一段往事。

(5)在“旧书市”这一类共有9篇文章,济南、南京、苏州、福州的旧书市场都有介绍,书坊书摊都是藏书行业的流动环节,正是因为有旧书市场的存在,藏书传统才得以生生不息。

(6)“其他”这一类共有5篇文章,视角独特,如白化文先生的《藏书家身后盖印》,写得风趣而又引人深思;徐雁先生《建国初的“救书”运动》,重现了一段可能被忽视的历史。类似于藏书历史上的“逸闻”,给这个栏目带来灵动感。

在《藏书家》的编后记中有两处与稿源相关的文字:“我们欢迎的是既有思想、有内容,又生动活泼的文章,而不是说教式的宏篇大论”,“我们欢迎老一辈学者、藏书家多多赐稿,留下历史的记忆。”自创刊以来,多是通过书信、电话或前辈及友人推荐而约稿。而自第二辑以来,自投稿逐渐增多。但闻编者言,少有可用者。

无论出于哪一方面的缘由,《藏书家》这样的组稿方式客观上集中了当今藏书界重要的作者群,如来新夏、黄永年、王绍曾、黄裳、孟宪钧、林夕、谢其章、涂宗涛、陈子善、辛德勇、韦力、止水(薛冰)、徐雁(秋禾)、韦明铨等。这些国内收藏界著名学人的文章使《藏书家》丛刊的格调,一直保持在中国藏书界的最高水平。

四、终刊的反应

当《藏书家》丛刊发行第二辑的时候,长期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的南京大学教授

徐雁先生就曾发表评论指出：“从《藏书家》所刊文章，我们不难窥见文化人深厚的‘淘书情结’……书香馥郁的《藏书家》丛刊，当是所有淘书爱好者最合适的枕边读物之一，因为它指点着淘书的路径，凝结着昔贤藏书的经验”，并表达愿景道：“同人们殷切期待该丛刊能够不断出版下去，必能臻成恢弘藏书文化香火之大功。”书评写于整整五年前，收录在其《书房文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中。谁能料到，至《藏书家》第十辑时，它竟无疾而终？

2006年6月，笔者以“《藏书家》停刊”为关键词，借助google搜索引擎获得1470项检索结果。其中不乏被多次转载的消息和评论，但仍可以看出《藏书家》的悄然告停，在爱书一族中引起的冲击浪。下面转录较有代表性的几则：

我是1999年8月见到《藏书家》第1册的，一见就喜欢了。几年来，每次上书店都留意它的芳踪，册册购买，几年下来，如今9册读物（第10册还没有到）一册不少都排在书柜里，我是把它作为当代珍本收藏的。因为它的出版周期长，又不是流行书，每册印数只有4000，北京的大多数书店里都见不到它，所以把10册读物弄在一起，还是不容易的。我还把这本读物推荐给不少朋友，使许多人对读书和藏书产生了一些兴趣。去年底我第一次给它投稿，是写袁寒云的一枚藏书印的。没有想到的是，在《藏书家》影响日盛的时候，却传来了它停出的消息。

《藏书家》要停了，但有了以往的10册读物，《藏书家》就不会在读者心中死去。今天，我们与《藏书家》无奈地告别。我期盼的是，在不久后的一天，《藏书家》又忽然现身，给我们惊喜。

——《藏书家》即将停刊，见《中华读书网》（作者：胡博）

《藏书家》……一以贯之，不改初衷，面向藏书界的读书人，不媚不俗，默默无闻地为藏书界尽力，为社会传递文明。可以说，在20世纪之末《藏书家》是因社会上“藏书热”兴起而出，应运而生。几年过去，藏书界仍是“热”浪不息，为读书而藏，为藏书而藏，为卖书暂藏，藏而兼卖以书养书者愈来愈多，然而，为什么国内唯一的《藏书家》反而办不下去了呢？

同时也暴露了时下“藏书热”的虚热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图书馆、“藏书家”，却很少有人订阅值得一读的《藏书家》呢？只能这么说，在当今中国真正能称得上“藏书家”的人还不是很多。最后，还盼望齐鲁书社能够保住《藏书家》的牌，那怕是一年出版一辑也好；再就是能否在不改变办刊宗旨的情况下，挤出几个页码面向书肆地摊，以增加读者群，扩大发行量。

——滕城论坛

几天前的夜间，闲读刚到手的九、十两辑《藏书家》——我一向喜欢卧在床上

夜读这类闲书，闲闲翻来，不须多动脑子的。一页页读下去，读到编后记，却赫然见了终刊的告白。我坐了起来，脑子也醒了似的，急急去翻，居然一至十辑，全在呢。我将它们码齐了，堆在桌前。

“藏书家”三个字是顾廷龙写的，只墨印出第一笔，似乎是描红的意思，等着我们续完。1999年的第一辑，是素白的封面，查书前笔录，购于次年3月19日，随后往顾一平家中小坐，送了样报，请顾老题签了他的《扬州名医录》——前几日还见得他的，依然是微白的华发，蔼然的笑意，叫我去玩。

许多年前，王元化主编了《新启蒙》丛刊，我读了前两册，是很仔细地读，第二册上见了第三册的目录在，但不久便兀地停掉了。还是许多年前，江苏版的《书与人》杂志，也是一期期地买了的，后来也是停掉了。偶尔翻见了一册册的《书与人》，也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慨在。

突然想起一本书的名字来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者是伯曼，副题是“现代性体验”，于是释然：后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况乎几张薄纸。

——龙川一木 <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00824/>

一本叫《藏书家》的连续出版读物，在推出第十辑之后，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自己不足六年的“生命”。一直主持《藏书家》编辑出版事宜的老出版人周晶老师，把一本毛边“终刊号”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以作纪念。我又把带来的前九辑，让周老师——签名，当时的情景似乎有点悲壮。

——《〈藏书家〉之终了》，见《齐鲁晚报》（作者不详）

以上的网络评论大致代表了对于《藏书家》停刊的几种不同态度：怀念与期待，不满和批判，甚至有失落以后的漠然。

一方面在爱书人中影响日盛，一方面却悄然停了刊，《藏书家》丛刊的进退确实令人关注。本文从栏目结构、主题分布、核心作者群等几个角度对该杂志进行分析，就是试图探索到这一刊物从产生、发展以至停刊过程中的内在因素。虽然出版社对该杂志的经营方面的原因常被许多评论者一再质疑，然而出版社终究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有维系的尺度，对自己的刊物有取舍的权限。

周晶先生面对记者曾颇为无奈地表示：“《藏书家》是我付出心血最多的书刊之一，共出了10期，在我自己说也算‘十全十美’吧，以后能否继续就看机缘吧。”在《藏书家》第十辑的“编后记”里，他将停刊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他自身——

“现在因编者年龄、身体、精力等方面的原因使《藏书家》的编辑出版告停，在此除向支持、喜爱它的作者（特别是书稿未能刊出者）和读者致歉外，也百感交集，依依惜别，并由衷

地祝愿中国的藏书园地越来越广阔,读书种子绵绵不绝;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藏书家》会以新的面貌重新面世,我们期待着!”

在这个一切都被加速的时代,信息的迅速发生和烟消云散早已被司空见惯,各式图表上的起起落落已经在受众的心中激不起多少波澜。而《藏书家》的横空出世与遽然停刊,却给一批书友和读者,带来了曾经的期许和思念。杂志内在的精英品质和傲岸气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它在现实社会中的落寞,尤其是在俗字当头的书刊市场上的劣势。

旧书精魂谁人续?那么刊面上从来都是缺失一角的《藏书家》丛刊给予我们的,该是经验呢,还是教训呢?就对市场发行的一份杂志而言论,它需要的是自身品格的优异化提升呢,还是回归市场规则,以适应这个大众文化的俗世呢?……存世七年的《藏书家》丛刊还将启发我们做进一步的思索。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天一藏碑知多少

——纪念天一阁创建440周年

徐雪凡

【摘要】 本文概述了天一阁自建阁以来收藏金石拓本的兴衰、存佚及其历史价值与现状,肯定了创始者范钦及其后裔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不朽功勋。值此天一阁440周年华诞之际,与各界学者同仁们一起,为天一阁成为我国历史最悠久、亚洲最古老、跻身世界三大藏书楼之一,致以热烈的祝贺!

【关键词】 范钦;天一阁;金石拓本;文化遗产

明范钦创建天一阁,藏书达七万余卷而名闻海内。其子大冲、孙光文、懋柱等承其志,续有增藏。其中碑帖七百二十余通,收自三代至宋元止,明碑弃而不录。惟其时管理甚严,外人未得观览。清阮元《天一阁书目序》曰:“司马歿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相约为例,凡阅厨锁鑰,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至清初,黄宗羲以其裔友仲之导引,登临阁门,为之录目,并撰写藏书记,昆山徐乾学闻等争相借抄,世人乃知有天一阁书目。

不过,其时碑帖仍无目。直至清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再次入阁寻觅金石拓本,并随手录之,才有碑目问世。其《天一阁碑目记》(载《鲒埼亭集》卷十七)记当时天一阁所藏碑帖情况曰:“皆散乱,未及装轴,如棼丝之难理”,而拓本却完好无缺,且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以为甚有价值,“足以补史氏之阙”,“今不烦搜索,坐拥古欢,而听其日湮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乃亲手检阅款识,编撰碑目。惜传之未久即佚失。

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访阁,未见有碑目传世,乃感叹道:“天一阁碑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世,岂非阙事?”即范钦八世孙懋敏及金石家张燕昌合编《天一阁碑目》一卷。钱序记其经过曰:“拂尘祛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至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画可喜者,以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嘉庆中叶,阮元督学浙江,登阁观书,命范氏手裔光甸分厨编录,于嘉庆十三年刻成《天一阁书目》十卷,《天一阁碑目》即附其后。

上述《天一阁碑目》，收先秦碑三通，汉碑四十九通，魏晋南北朝碑二十二通，隋碑五通，唐碑一百四十四通，五代碑五通，宋碑二百零二通，金碑四十一通，元碑二百五十七通，年代不详者二通。成书后，范懋敏又增录九十四种，连同原先的七百二十余通，合计八百余通。清嘉庆七年（1802），金石学家孙星衍编《寰宇访碑记》，取自天一阁拓本凡二百零四通，均注明“鄞县范氏藏本”或“鄞县范氏拓本”字样。其中传为稀世碑拓善本者，有北拓本《石鼓文》，《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以及汉《冀州刺史王纯碑》、《酸枣令刘熊碑》、《圉令赵君碑》，梁《旧馆坛碑》等。

降至清中叶，天一阁碑帖已散佚尽多，全祖望《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一文说：“范氏帖大半万卷楼故物……石刻所传仅有其半。”（《鮚埼亭集》卷十七）天一阁藏帖大量流向民间，其中归全祖望的有《唐开元泰山摩崖》、《元揭文安公天一池记》等。经太平天国兵燹，藏书损失尤为惨重，赵之谦《刘熊碑跋》曰：“咸丰辛酉，阁中碑板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黑矣。”（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光绪间，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仅得目二千零五十六种，其中碑帖仅存二十余通。民国19年宁波市市长杨子毅重编天一阁书目一册，得书九百六十二种，阅三年；海宁赵万里约鄞县文献委员会主事者冯孟颀等，重编阅目，其中几无碑目。另据原浙江通志馆洪焕椿载：“诸城刘喜海服官浙中时，曾登阁览书，辑成书目十二卷，稿本未刊，今浙江省立图书馆藏有传钞本。”（洪焕椿《乾隆四库征书浙江进呈秘籍之七大藏书家》）未知载有碑目否。

1933年，宁波有识之士发起捐资，在维修遭台风破坏的天一阁同时，于天一阁后园建“明州碑林”，搜集碑碣八十多方。1928年宁波拆除城墙，出土的碑碣有宋《楼公告记》、《耕织图诗》、《能仁院新佛殿记》，元《庆元绍兴等处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唐刺史吴侯庙碑》、《张循王庙碑》、《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等残碑，均归此碑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天一阁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碑林规模不断扩大，先后访得各类碑碣三十六方。近又有所增加。现碑林有唐碑（经幢）一种，宋碑十三种，明碑四十二种，清碑六十二种。其中著名的有元《庆元路重建儒学记》多方，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前后十六次重修宁波府的碑记。北宋熙宁二年《众乐亭诗刻》，集北宋名家王安石、司马光等十多人的诗作为一碑，颇为壮观。

此外，天一阁所收明代丛帖刻石有《天一阁帖》八通，《万卷楼帖》三种，《义瑞堂帖》十一种，共存二十六方，保存了文征明、丰坊、薛晨、薛选等明代书法家的书法，内有范钦题跋二通，极为珍贵。上世纪50年代后，又续增清代刻石《三忠遗墨》和《老易斋法帖》二通。上述丛帖保存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大致有以下十六通：

庆元路儒学重修灵门记并额。正书。元郑奕夫撰，赵孟贯书。翁达观篆额。茅士元刻。至元八年（1348）四月。一张。

薛文时墓志。正书，明文征明书，吴少鼎刻。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系《义瑞堂帖六种》之三。天一阁藏石。一张。

丰道生草书千字文。草书，明丰坊书。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万卷楼帖三种》之一。天一阁藏石。共七张。

李攀龙游太华山记。正书，明薛道选书，吴应祈刻。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义瑞堂帖六种》之六。天一阁藏石。一张。

薛晨草书千字文。草书，明薛晨明书，吴少鼎刻。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义瑞堂帖六种》之四。天一阁藏石。四张。

薛选行书千字文。行书，明薛选书，吴少鼎刻。嘉靖癸亥(1563)八月。《义瑞堂帖六种》之五。天一阁藏石。三张。

丰道生草书底柱行。草书，明丰坊书。范钦跋，正书。万历八年(1563)十月。天一阁藏石。共八张。

丰道生篆(籀)序论。篆书，明丰坊书。范钦跋，正书。万历十年(1582)。《天一阁刻石七种》之六。一张。

甬上三忠遗墨。明陈良谟、钱肃乐、张煌言撰并书。清嘉庆十九年(1814)八月。黄定文题识。(附遗像)共四张。

天一阁南亭榭图。袁定寅绘，周楚题并刻。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月。一张。

重模泰山石刻，二十九字。篆书，传秦李斯书。无年月。《天一阁刻石七种》之七。一张。

史太师薛居实札子。行书。宋史浩书。明无年月。《义瑞堂帖六种》之一。天一阁藏石。共二张。

丰道生与薛晨诗启。竹书，明丰坊书。明无年月。《义瑞堂帖六种》之二。天一阁藏石。共四张。

丰道生临大士像并正书普门品。正书，明丰坊书并画。无年月。《天一阁刻石七种》之二、三。一张。

丰道生正书大悲咒并大慈礼拜观音文。正书，明丰坊书。无年月。《天一阁刻石七种》之四、五。一张。

大悲咒及观世音菩萨文。正书，明丰坊书。一张。

义瑞堂帖。明薛晨模刻。《上十七世祖札》，宋史浩书。《薛文时墓志铭》，明文征明正书。《与霞川文学启》二通，明丰坊竹书。共十四张。

综上所述，天一阁自明嘉靖创办至今近五百年来，金石拓本由于时代的变迁，虽然损失严重，但它与其它古籍一样仍然保存着一定的收藏量。新中国成立后经多年访求，回收流散的天一阁原藏书3000余卷，加上当地藏书家的慷慨捐赠，阁藏古籍成倍增加，目前总

数已近30万卷,其中珍槧善本就有7万余卷。这首先要归功于创始者范钦及其后裔们,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和弘扬民族文化所做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同时这些成绩也倾注了天一阁几代工作人员的心血,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为保护与承存天一阁藏书立下汗马功劳的社会各界仁人志士。

明清两代,我省私人藏书楼众多,如秀水(嘉兴)朱氏潜采堂、钱塘汪氏振绮堂、钱塘吴氏瓶花斋、仁和孙氏寿松堂、仁和鲍氏知不足斋、钱塘汪氏开万楼,以及祁氏澹生堂、郑氏二老阁、赵氏小山堂等,皆已成为过往烟云而不复存在,独范氏天一阁巍然屹立,且跻身于世界藏家之拱璧,成为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藏书楼,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值此天一阁四百四十周年华诞之际,我们谨向范氏的后裔、天一阁全体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关心天一阁藏书事业的专家学者同行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七[M].四部丛刊·集部
- [2]骆兆平.天一阁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3]骆兆平.天一阁的藏书目录[J].文献,1982,14。
- [4]洪焕椿.乾隆四库征书浙江进呈秘籍之七大藏书家浙江通志馆馆刊[J]1卷4期,1946
- [5]骆兆平.天一阁藏碑帖概述[J].文献,1989.1。
- [6]中国碑帖网:无名氏.碑碣拓本[J].2003.6.2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后记

纵观中国文明史,有多少知名藏书楼昙花一现,给人们以莫大的视觉冲击,然终究逃脱不了书亡楼毁的命运,消失在历史的记忆当中。作为后人,我们今天除了肯定它们曾经辉煌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更多的还是扼腕痛惜。

然有一座藏书楼,它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它给了我们后代学子最后的安慰和精神寄托,它就是天一阁,一座现存中国第一、亚洲最早、世界第三的私家藏书楼。在中国,能够在数量众多的皇家、官府、寺院、私家藏书中脱颖而出,天一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幸运。

然而五百年,谈笑一瞬间。但对于一个藏书家及其后人来讲,要传承和克守一座藏书楼于十三代而不散,个中滋味外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到的。五百年前,在普通百姓家庭出身的范钦,历史不仅给了他机会,也给了浓浓的寄托。人生在世,当立德、立功、立言,这是铮铮铁律,也是每个读书人都想追求的人生目标。而范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也给了中国藏书文化一个惊喜。他于三立之外,自创了一立:藏书。以藏书立世,以藏书鸣人,确实是范钦的非凡之举,同进也在考验这个家族的耐心和毅力。孔子曾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更何况已被世人证明难以久藏的书籍呢?

但范钦和他的后人却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们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人定胜“天”。他们做到了,用他们十三代人的青春与热血,用这个家族坚强的决心和毅力。这是一个怎样的家族,我不敢想像。但有一点可以说,我们今天不管用多高的赞美也不为过。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所在。窥一斑能知全豹,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范氏家族一样的优秀人才,我们今天才得以向全世界高呼“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有近3000万册古籍存世”。

藏书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包对天一阁的认识及研究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是文化工作者多年来默默耕耘、辛勤劳作的结晶,是人类对自身活动逐步揭秘的共同精神财富。

在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我们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藏书文化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候,甚至在有些领域的研究还是一大片空白,如对四大藏书系统之外的宗族藏书认识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把它片面归入私家藏书行列;如对中国私家藏书史方面的研究虽出了不少成果,但缺乏整体和系统性的成果,这一点河南焦作市范凤书先生就提

了书室一个很好倡议；另外我们对中国藏书文化的某些个体如对天一阁的研究尚存有很多的不解之谜，如天一阁的建阁时间、天一阁最初命名和用途、天一阁某些藏书的来源、范钦罢官之罪名最后定性问题等等还存在诸多争议。因而，摆在所有科研人员面前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本期藏书文化节志刊编辑共收到各类文稿九十余篇。欣慰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老朋友、老面孔，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进来。藏书文化的研究领域也从前面三期的以刊登国内研究成果，转向以刊登国内成果为主、报道国外成果为辅的新阶段，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在国内成果研究显著的同时，学者把更多的眼光投向国外的藏书文化研究。

我们非常庆幸在范钦诞辰五百周年和天一阁建阁四百四十周年之际，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近百名嘉宾汇聚天一阁，济济一堂，共度我们文化人自己的佳节。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赐稿。

本次盛会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宁波市社科院有关领导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鼎力支持，特别是宁波市广电局的领导从会议的组织、策划到项目的立项、资金、人员配备及文集出版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文集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版还得到了天一阁古籍部各位同仁的鼎力支持。

最后，我们预祝本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也同时祝愿天一阁的明天更美好！

编者按

2006年9月18日

天一阁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

